

# 心理学统治世界

全三册



博集天卷  
CS-BOOKY

# 目 录

---

[心理学统治世界.1，政治篇：领袖意志](#)  
[心理学统治世界.2，群体篇：大众心理](#)  
[心理学统治世界.3，战争篇：理性操控](#)



# 心理学 统治世界 1

政治篇·领袖意志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文刃 译

Gustave  
Le Bon

大众心理学创始人勒庞经典全集  
全面超越勒庞成名作《乌合之众》

个体终将被群体淹没，群众的力量可以被调动！

3次被禁，7次限级阅读，被译成24种语言，畅销全球136国。

全球经济学家、政治家、心理学家都在推荐的心理学巨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  
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 目 录

---

## [版权信息](#)

## [第一篇 本书宗旨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政治心理](#)

### [第二章 经济需要和政治理论](#)

### [第三章 政治心理的研究方法](#)

## [第二篇 政治生活的心理原因](#)

### [第一章 法律本源和立法幻想](#)

### [第二章 法律的危害](#)

### [第三章 恐惧的政治力量](#)

### [第四章 神权在近代的变化——国家主义](#)

### [第五章 战争的心理原因](#)

### [第六章 经济冲突的心理原因](#)

### [第七章 大学教育的心理影响](#)

## [第三篇 民主政府](#)

### [第一章 精英与群众](#)

### [第二章 怂恿之源](#)

### [第三章 工人的心理状态](#)

### [第四章 平民思想的新形式](#)

### [第五章 失去人心的议会和竞卖加价方法](#)

### [第六章 专制政治的进步](#)

## [第四篇 社会党和工团党的幻想](#)

### [第一章 社会党的幻想](#)

### [第二章 工团党的幻想](#)

第三章 工团主义中无政府派的发展

第五篇 关于殖民政治心理的错误

第一章 法国的殖民原则

第二章 欧洲教育对落后民族的心理结果

第三章 欧洲制度和宗教对落后民族的心理结果

第四章 欧洲文化不能改变落后民族心理的理由

第五章 殖民的新方法

第六篇 变乱的发展以及反对社会解体的斗争

第一章 社会变乱

第二章 犯罪的发展

第三章 政治暗杀

第四章 虐待宗教

第五章 社会斗争

第六章 近代命运说以及命运的分析

第七章 社会防卫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 第一篇 本书宗旨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政治心理

### 一

凡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表面看起来越是普通寻常、容易明白的，想要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出解释就越难。从前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候，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都满足于简单的答案；随着科学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就不得不摒弃原来那些简单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入，以探穷求源。

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进化过程，也不外乎这个道理。从前的历史学者已经尝试着解释了一切问题，现在看来，这些解释多半自相矛盾。这大概是因为社会现象形态各异、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而一个民族的进化过程，其复杂性与生物的演变进化一样。如果仅仅以简单的方式来研究、解释，个人认为，这实在是不可取的。

科学技术在今天可谓飞速发展，达到了相当

的高度。即便这样，众多的科学家、研究学者仍在探求生物种类的变化，以及它们之所以发生各种形式演变的规律，也仍不能得到全面合理的答案。研究社会进化也是这样，能够发现的规律非常少，可以明确表述出来的只有几种而已。所以今天的人解释社会发展的进程与规律，还不能脱离空泛概括的阶段。一群理论家只能对那些明显的规律进行详细解释，而对于那些隐秘、潜藏的因素却只能从略或者回避。这就是为什么从前的历史著作中仅有君主事迹以及相关的战争记述，却没有关于整个民族发展事件、经历的叙述。

由此可见，如果从现在科学的发展程度来看，就不能再用从前的简单方法来解答当代民族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制度、宗教、语言、审美，为什么会有进化、发展和灭亡的各个阶段？是这几个因素限制约束了社会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限制约束了这几个因素？为什么伊斯兰教能在短时间内创立起来，而其他宗教却需要若干世纪才能得到发展？为什么伊斯兰教能够脱离政治而独立，其他宗教比如景教、佛教却近似衰微？能解答这些“为什么”的理论，现在固然有很多，但我认为还不够。

从前，人们都认为是神祇在统治世界、创造历史，人的力量如此渺小，不能战胜上天；如今，无神论已经被普遍接受，人类脱离了神的束缚，在某些方面能与自然抗争。自然的力量当然常常胜过人力，但人也能在不同程度上暂时性地战胜自然。这正是所谓的进步。

仅仅达到人力战胜大自然是不够的。人类生存于社会中，需要自己管理自己，需要遵守公共规则。至于订立这些规则让人有所遵循，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领袖的任务。法治由此出现。

所谓法治，就是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方法，而它的实质就是政治心理。这种问题从前想要解决并不容易。而现在，伴随着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新的经济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快，往往让领导者们力不从心，不能根据变化及时做出相应决策；如此，想要进行总结性研究就更难。再加上各种社会学科都不能提供明确的规律、理论，这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时代发展太过迅速，而领导者们的施政方针、政治策略和具体措施一旦错误，坏的影响远不仅止于一代，常常要让后世几代人来担负结果。所以，我

们不能坐等那些误人误国的政治规则产生。情势如此紧迫，我们不能不就现在的能力所及，尽量做些研究、解释，希冀有所裨益。

说到统治人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力，也就是政策措施的执行。什么时机行动，怎样行动，以及行动的限度是什么，集中回答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政治方略的全部内容。

### 三

如果能仔细地剖析一下历史上发生的那些政治错误，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往往能归根于一点——心理错误。就像治学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必须遵循，不能随心所欲地违反逾越一样，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方法也是如此。但想要发现这方面的规律太难了，前人对于这些规律能清楚认识、明确解析的，也少之又少。

有关政治心理这一问题，前人公开发表的言论极其稀少，只见于400年前佛罗伦萨人的著作中。

我游览过佛罗伦萨著名的圣十字教堂，那里名人之墓林立，包括米开朗琪罗、伽利略、但丁等人，他们的生平事迹都镌刻在金字墓碑上。其

中有一座墓碑，碑志非常简单，只刻了“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和“1527”这一时间，以及一句墓志铭：“任何赞美之词都不配此名。”就是这个人，为我们带来了“政治心理”这一概念。他的那本书叫作《君主论》。书的作者亲历了1502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裁统治的建立，他认为这一政体是平民共和政府和混乱政局之后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察眼光非常清晰，很有洞察力，大概是因为当时意大利的各共和国政体都是由从前的希腊、罗马共和国继承来的，这让他有着自己的现实体会。作者的观察方法注重实际，追求简便易懂，而非求最优解。我们如果想评价他的著作，万万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先入为主。如果固执地用现在的观念、理论去评价当时的政治现象，无异于用今天的想法去评价昔日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显然都是不合适的。

马基雅维利著作中阐述的统治原则和规律，用在400年后的今天固然不合适，但是也没见过有谁能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取而代之。

政治心理是政治家们必须要知道的，不可或缺的一门学问，但是因为研究这门学问并没有一定之规可以遵循，所以现实中，政治家们大多随着某一时代的政治风潮鼓噪而头脑发热，不经深

入思考，就把自己平常见到的简单规律作为指南来指导行动。

这种指南本身就未必正确，所以据此采取的措施更容易导致重大错误，从而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比如深知法国人心理的拿破仑，却对俄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心理所知甚少，这必然导致失败。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又误听误信，在克里米亚、墨西哥、意大利各战役中不断犯下重大错误，最终致使法国不得不遭受外来军事力量的入侵。

由此看来，只有卓越的心理学家才能成为卓越的统治者。德国的统一，如果没有俾斯麦这样深刻理解个体和民族心理的人，那么，仅仅依靠日耳曼军队的强悍，我认为是不能成功的。

## 四

政治心理由个体心理、群众心理、民族心理各个分支组成，我国的教育专家们都认为这种学科没什么用，因此并不把它列入学校课程。即使是专门的政治专科学校也不知道这一学科的存在，以至于所谓的政治学博士反而不知道这一政治的真正基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被今天的平庸政治家们奉为金科玉律，亦步亦趋地遵循，以此作为行动指南的，都是些陈词滥调，是老掉牙的理论。一旦有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发生，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毫无解决办法；因此往往不得不根据所在政党的意愿进退，以至于错误百出，局势不可收拾。

现在，不妨列举近年来的一些错误的政治现象来做一个概述。比如，国家与教会分离，教会所获得的独立性是从前最虔诚信仰宗教的君主都不敢赋予的，这正是危险的政治心理错误。与德国的教育原则——促使并保障工业、经济大举进步相比，我国的教育原则大不相同，这是政治心理的根本性错误。对殖民地实行同化政策，反而使得当地的社会经济衰退，这是一种政治心理错误。从前把流氓另编为单独的军队，现在却把良民和流氓合编在一起，流氓不会近朱者赤，良民反倒近墨者黑，这是一种政治心理错误。邮政系统人员第一次罢工，政府就采取了妥协态度，这也是一种政治心理错误。制定无数所谓的人道法律，希冀用法律条款来改造社会，以为这样民族就可以与过去的历史脱离关系，独立发展，这都是政治心理方面的错误。

我们应该知道的一点是，能决定民族行为的因素非常复杂，如自然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历



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等，都包括在内。应该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以此确定我们的思想方向。这种综合因素虽然庞杂，但归根结底，就是政治心理因素的变化与整合，这才是根本所在。

## 五

国家之间的重大外交事件，有时候当然不能不兵戈相见，诉诸战争。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只是靠强权武力取胜，以强制弱而已，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意义。就像此前的普鲁士与奥地利、英国与德国、日本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那样。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激化的国际矛盾，如果能恰当运用心理因素，那么也可以化解矛盾，转变局势，让形势平稳下来，未必非要发动战争。当然，对于国际纠纷，解决之法，有时固然仍要如拿破仑、俾斯麦等人那样诉诸强权，但这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处在今天这种国家间互相缔结同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期，没有人敢置邻国于不顾，一意孤行。摩洛哥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就当代的国际政治形势来看，在这种各国势力互相制衡的情况下，政治心理因素在外交方面的地位，无疑是重大的。

当然，现在的外交活动不再像从前那样了，有政治事件发生时，民众可以通过电信、电话、

报纸等传播渠道，迅速获得相关信息，这似乎对外交官们延迟公布事件经过，以便暗中秘密交涉，会有所妨碍，但也不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近来有几种重要的国际纠纷，都是通过外交手段得以解决的，比如，俄国击沉英国渔船事件，德法之间关于卡萨布兰卡事件等。而之前俄奥之间的塞尔维亚事件，如果发生在1870年前，当我国的外交官们还不都是庸劣无能之辈的时候，战争或许就可以避免了呢。

平时发生的日常事件，也可以用政治心理来解决，难点在于，政府对民众提出的要求，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拒绝反对，什么时候妥协接受。今天的政治家，或者一味退让接受，或者一味拒绝反对，没有谁能够合理利用二者。其实对于这些事情，有的需要拒绝反对，有的则可以妥协一下，接受要求，而不能偏执于一种方法。两种方法相结合，用得适当，问题可以顷刻解决；用得不合适，则会发生重大错误。如法国1788年财政空前危机、农业严重歉收的恐慌时代，贵族们如果能不抵抗纳税平等的改革措施，那么阶级矛盾也不会那么激烈，革命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 六

我从事探究事物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已经有

10年了，并且出版了《物质进化》一书。无奈的是，这种试验性研究耗费巨大，因此我不得不返回从前研究的领域。很早以前我就发现，政治心理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很少。现在，我以为已经应该有著作能提供一些原则和规律，可以用来研究现今的政治问题了。于是我咨询了朋友黎波教授，请他给我推荐一些现在出版的政治心理学书籍。结果他却回答说，现在还没有这种专著。我非常惊讶，这竟然和15年前我开始研究群众心理时没有相关专著的情况一样。

所谓的没有相关著作，并不是没有关于政治的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政治的著述其实非常多。但是这些人的作品，都是从理想出发，不考虑现实情况，不解决现实问题。所以，能为我们提供参考依据的，实在寥寥无几。

学者们既没有专门著作论述政治心理问题，学校也不设这样的科目开展教学工作，这些都足以证明当代人对这一学科的轻视。我撰写这本书，就是要明确肯定这门学科的必要性，这是本书目的之一。

构成政治心理学内容的材料，来自个人心理学、群众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以及历史教训，这

些材料来源能够让人对这一学科有一个大略的了解。

在当今的情况下谈论政治问题，不外乎是使日常行为与需要相适应，无论需要合理与否。然而既然是需要，它遗留积存下来的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不符合理性的。但真正的政治家绝不会采取打击的方式。只有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理论家，那些只知道用纯粹的理论来统治世界、改变民众性格的人，才会这样持反对态度。智慧的力量固然足以让国民精神发生变化，但这是一个渐变过程，并非朝夕之间就能一蹴而就。有多少事物是忽然之间就能发生根本改变的呢？

今天，政治心理学还处在没有明确界定、解释的阶段。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正在努力地把那些明显的规律逐步进行推理阐释。我这样做，并不是非要证明它的价值，而在于说明不认识这些规律的危险后果。这是本书的又一目的。

我在前面所主张的各个原则，如果要详细探究、解释，就不是这本书的范围所能包括的了，读者可以参考之前的各种专著。

本书仅限于用政治心理学的规律对最近发生

的时事做出分析解释，虽然涉及的时间线并不长，但有时我仍然不能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比如研究政治心理在民族发展史中对于信仰构成的影响力，以及战争中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如果想要完全详尽地发挥阐释，非要几本书才能说清楚。

以下几本书供参考：《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社会主义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群众心理学》《东方古文明》《阿拉伯文明》《意见及信仰》《法国革命及革命心理》《印度文明》《真理的生活》。

## 七

本书有一章专门论述怂恿这一要素，具体深入地论述了“重复”的有效性。也正因为重复的有效性，我不惜一再地重复阐释。所以各本书的措辞有很多相同，存在重复之处；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觉得遗憾呢，因为还没有把重复的作用阐述到极致。拿破仑常说：“重复是修辞学的主要语法。”我现在不妨换一个表达方式：“重复是确立主张的主要要素。”

各个大政治家之所以对自己手中的权力充满自信，是因为用了“重复”这一方法让民众相信了

他们。德国皇帝能够让民众为制造舰队做出必要的牺牲，也是用了这个方法。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说：“终极真理常因为不断重复阐释而让人觉得累赘，可即便如此，还是应该不断地对真理进行重复阐释。”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那些人人皆知的真理，当然可以反复地进行宣传；而那些还不为人知的真理，就更加需要反复宣传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试过。从前布道者能够让人们的观念、信仰有所改变，也是用这种方法。

我们所说的“确信”，与书中所说的有差异。理性的推理、研究固然有益于学术上的证明过程，但却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要素。某种意志能让人们顺从接受，不是因为它正确，实际上是因为对它的不断重复阐释以及重复阐释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两者。

## 第二章 经济需要和政治理论

### 一

对一件事情的描述，贵在真实可信而不是虚假和夸张，所以，如果用凭空想象出来的事物去打比方，那么留给人的印象、对人的感染力都微

乎其微；但如果换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来比喻，那么感人的程度就会大大加深了。比如对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叙述战争，和那些经历过海难的人谈论海难，对方的兴趣必定很浓厚。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用现实中的事件和过去的情况对比研究，结果也是一样明显的。

我曾经乘车游览比利时的于伊市，经过桥上时，天气不好，大雾迷蒙，车子没法开动，迫不得已，只好暂时停下来等待。没过多久，云开雾散，阳光刹那间穿透云雾射进来，我突然发现两岸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左岸，巨大的城堡和壮观的大教堂巍峨地挺立着，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右边，则分布着工业化的大工场，围墙整齐划一，不带什么装饰性的色彩图案，大烟囱不停地喷吐着烟雾。不一会儿，到了下班时间，街上一下子热闹起来，满脸汗水，手上皮肤皴裂的工人络绎不绝，喧哗声清晰可闻。这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代表着两种文明。左边代表着过去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逝去，但仍在无形中影响着我們；右边代表着现在的文化，我们可以跟随着它进入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

新旧两种世界互相敌视对立的情况，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在从前的社会情况下，还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对此进行调和，如今却连这个能调和

感情的基础因素都没有了，致使贫富两个阶级互相仇视，愈演愈烈，不可收拾。今天的劳动者们已经脱离了与过去社会的关联和信仰基础，总是表现出攻击和迫使他人服从的态度。而一群立法者又多半听从他们的说法，像奴隶服从主人一样。依此发展，不在将来造成一种空前的群众专制是不肯罢休了。

## 二

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活，其实就是让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生活的环境相适应。但人类的性格发生改变是很慢的，而环境却会因为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而快速变化，所以，处在今天的情况下，想要追求“适应”并不容易。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们都觉得有一种抑郁的趋势。所以，想要调和人类与周围经济环境所造成的压迫感之间的矛盾，正是难题之一。

如果就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两方面来辨析，新旧世界之间的确差距悬殊。今天统治着我们的新的思想核心，是我们自身需要的发展结果，并不是经过理性思考后，随着我们的愿望以及伦理道德、知识所产生的。因此就竞争和互相敌对等方面而言，新社会与旧时代并没有本质差别；但如果就时代发展中，民族进步这一主要因素比较，



则新旧时代大不相同。现在就这一点详细说明。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经济要素代替了昔日的君主权威和法律；另一个是今天各个民族间利益交错的复杂情形，与昔日小国寡民、互不联系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其中，第二个特征出现的时间晚，但却非常重要。从前各个民族之间没有贸易交流可言，而今天，国家民族间贸易日益发达，这让大家不可能再彼此孤立。假如让英国现在起闭关锁国，取消对外贸易，不再进口粮食，那么饥荒的出现是指日可待了。

各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已经有了巨大差别，工商活动的变化又足以改变国民生活的状况，所以贫富之间的界限愈加明显。至于政府的力量，从前固然重大，现在却出现了随工商活动潮流发生转移的趋势。因此可以说，在今天，经济力量才是真正的主人，它左右着人民的意志，蓬勃发展，不可抗拒。

放在60年前，一国的君主还敢自作主张，决定国内的自由贸易，而现在，权力再大的人，也没有谁敢这样行事。那些保护贸易的政策，曾经遭到多数经济学者的非议和反驳，但最终因为它

能够与当下的民情民意相符合，于是现在也没有人敢反对了。

1910年3月11日，上议院开会的那一天，经济学家梅林指出，在英国，50年间，小麦产量减少了一半；这种经济状况，是被自由贸易政策损害的。再看法国，1893年前，法国的物资缺口高达6.95亿法郎，一经采用贸易保护政策之后，不但迅速填补了需求差额，还获得了500万法郎的财政盈余。这之前，法国粮食是依赖进口的，现在却可以出口了。梅林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推测他的想法，似乎是认为来自农民的这7亿法郎的收入，全是他所提倡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功劳。这一想法的对错暂且不说，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没见过像他这样倡导、提出一部法律的。其实，农产品产值的增加，是因为农业状况面临窘境之后，穷则思变，迅速借助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科技进步成果才取得成功的。

仔细想想，英国在农业方面不能有同样的进步，跟自由贸易政策阻碍他们与外国竞争无关，实际上是因为英国的工业制造业发达，其产出利润巨大，用工业产品的销售额来购买粮食绰绰有余，所以农业的发展并不那么迫切。

贸易保护政策的利与弊，跟我现在的研究无

关。在当前的政治情况下，也不是非要找到完美的制度，关键在于能找到一个与我们的社会现状接近的，并且适宜采用的，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处在今天的环境中，无论哪一种专制制度和强权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再强迫人民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自由贸易政策或者贸易保护政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人民认识不清，自欺欺人，那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出现这种情况时，很少有能挽救的。偶尔有英雄人物适应时代潮流，借助时势推动，或许可以力挽狂澜，然而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根据上面这些论述可见，现在推动民族进步的主要因素与之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可以再进一步推论的是，对于民族进化而言，政治学说、理论的影响力和作用会越来越小。而科学技术、工业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制衡变化则是潜在但作用重大的因素，是所有国家、民族以及他们的统治者都应当接受和服从的。

### 三

今天，我们的需要有两种，一个是与民族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经济要素，人们只能顺从接受它，而不能逃避。这是天然的需要。另一个则是人为的需要，是由政治理论家们尝试倡导产生

的。现在我们就研究这种需要。

生物体是不能一下子有本质改变的。有时候，有些动物、植物虽然会稍微变化一下外在形态，但这种变化是不能持久的。那些生物学家虽然有实验室，有各种设备，但是我们也没见过他们能突然改变哪种生物的本质。

既然生物体的本质不能用人力来突然改变，那么社会的性质可以靠制度来改变吗？综观百年来的政治学说，多数都认为社会是可以因为不同制度而发生改变的。这是革命家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那些主张，最为激烈尖锐。这也就是今天的社会政党理论。提出这些主张的人都认定可以用纯粹的理论来计划和建设社会。

这种理论如果用生物学、心理学以及历史等各门学科来辅助证明，多半是不能与所期待的结果相符的。它能够用科学来证明和表述的部分仅仅在于，我们对于社会的行为能力是有限的。想要对社会进行深远的改造，只能借助时间的力量，经过时间验证，才能取得成功。制度，是一种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只能来适应内容，而不能创造和规范内容。所以，这个国家的制度可能最完美，最先进，但如果移植给那

个国家，则有可能是最恶劣的，阻碍其发展的。这大概是因为，制度是政治发展进化的归纳和总结，而不是政治发展进化的前提和开端。

当然，一种制度形式以及人类本身的力量对于政治时势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和影响。这种影响力和起作用的情况，在历史中也常能见到，但并不会像历史所描述的那么夸张。要知道，那些政治手段和个人行为能够见成效，是因为能够经得起时间的验证。而如果一个措施，一个人的行为不适合当时情况，就会变成破坏力量，像侵略者一样。

不过即使这样，信仰、制度和法律可以改造民族精神这一理论学说也已经成为定论，我们虽然屡次攻击驳斥，还是没能打破它。

如今，拉丁民族还不能明白这种观点的弊端，当然，他们也因为抱有这种幻想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经历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血最多的革命，经历了数百万人的暴死，经历了殖民地经济的衰落倒退，也经历了社会政党威胁到社会进步的情况。

对殖民地的统治决不能适用于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常用它，以至于现在殖民地的民众怨恨情

绪严重，并且发生叛乱。像近日各个报纸所刊载的消息，在法国的殖民地科特迪瓦，因为一位总督给当地行政长官发的通告不得体，而导致地方发生了暴动，军官被杀；甚至要本国派出军队来镇压，消耗了大量财政经费。这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了。而如果英国人、荷兰人用这种方法来统治他们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恐怕早就被当地人民群起反抗，消失殆尽了，哪还用等到今天。现在不妨节录这个通告，以证明一种民族精神不会因为法令强制而发生变更。

通告大意说：“应该强迫我们的臣民，使他们达到这样的进化……要对他们中不服从的人进行诱导。政府应当强制执行。……应该让黑人改变心理状态，使得他们能领会、理解我们的意图。……不用顾及土著人的愿望和想法，应该强制执行措施以达到目的。……不要畏惧将来的利害关系。事情一定要这样做，等等。”这就是通告的内容。其实如果想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则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黑人的心理状态，而是当地政府中行政官吏的心理状态。可惜的是，在现在的法国，相信制度、信仰可以改变民族心理的说法还是牢不可破的，而且各个党派都接受这一论调，即使最顽固的保守党也是这样。

## 四

今天，心理学已经非常发达，我们因此得以知道，理性虽然是一切政府管理民众时所依靠的工具，但它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还是非常薄弱的。

我之前在另一本著作中已经表示过，理论是有不同种类的，不能仅仅像旧的哲学课上那样，认为能用一种理论来分析研究问题。因为此外还有很多种理论，尤其以神秘理论和情感理论最为重要。而且仅就这三种理论而言，已经各有对错，不能混为一谈。

用出于纯粹理性思考推导出的理论来组织建构一切知识体系，这是科学产生的源头。而把神秘理论和情感理论结合在一起来建构信仰体系，这是民族和个体行为的向导。理性理论的作用体现在自觉的范围中；神秘的和情感的理论的作用，则体现在潜意识的范围中。

就所能见到的情况来说，任何社会都受到神秘理论和情感理论的统治，而非纯粹理性思考推导出来的理论的影响，后者不能改变社会尤其明显。可惜的是，一般思想简单的改革家还寄希望于在理性之中建设理想制度，这真是愚蠢的想

法！现在的英国政治家大多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某位内阁成员最近在议会中论及英国宪法的优良时指出，它的优点就在于，它有很多是不迎合所谓的理想理论的。的确，英国宪法的优势诚如某位所说，再看法国宪法，自从大革命以来的百余年间，法国的宪法版本甚多，收效却甚微。可以说，这是因为非得要找一个合乎纯粹理性的完美理论，以至于程度太过造成的。

这个深刻内涵不是那些拉丁种族所能领悟理解的，但我们却能由此推导出一切构成民族发展的重要线索。

像宗教、政府、政治行为这些都是不从理性出发的。只有知道运用情感因素来影响群众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发表的演说，表面上似乎符合理论逻辑，但实际上起作用的却是诱导。群众之所以能感动，产生共鸣，是因为由那些字句以及字句组合之后产生的情感因素。而所谓的理性、逻辑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

## 五

有学者认为，说理性理论不能统治国民，引导人们产生信仰，这与大革命的事实似乎不相



符。因为1789年的大革命，就是在由理性思考产生的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发生的。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以卢梭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力。卢梭认为人类处于自然状态时最快乐，而人之所以感觉困苦烦恼，正是恶劣的制度所造成的。今天的当务之急，在于“等贵贱，均贫富”，消灭贫富差距，把主权赋予全体人民；改良社会的办法，只有建立新制度这一个途径。对这一观点，卢梭的弟子们继承发扬并且身体力行。对那些反对派，比如，国王、贵族、教育者，都不惜使用强硬的办法镇压。这正是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雅各宾派党人执政时候的政策。再参考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情况，也似乎与理性不能影响社会的说法相抵触，尤其与我的观点矛盾。因为我曾经说过，不同时代的民众都被各自的一种当时还很小众的观念统治，这种观念形成的时间很缓慢，等到变为情感因素，渗透进民众生活之中后，才开始发生作用。这个说法无异于证实了我的自相矛盾。但这种反证法“似是而非”，表象虽然看似矛盾，实际上也不尽然。现在来看革命时代的人民要求，如果根据1789年的《请愿书》来考察，当时人民的意愿在于废止封建特权，订立固定法律，主张公平判罚，要求法律裁判的一致性、平等性，而没想过要废止封建王朝。这足以证明革命的发动并不出自卢梭的学说。他的学说要等到三年之后

才大行其道。并且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卢梭的学说看似是一种创新的理论，其实内核却是陈旧的。他的学说足以影响民众情绪，是另有原因的。从前，民众承认王权，接受不平等地位，是因为天然的需要。因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大前提是不能破坏的。等到一旦有人明确提出统治者的威望不足以令人畏惧，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应该用人民的专制代替君主专制；财产的不均是不应该被公共道德容许的，应该把财富平均分配给人民，那么人民的嗜好欲望自然会被鼓动起来，自然乐于跟从这样一种破坏君权的说法。如果现今的政府借助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声望，订立出杀人、劫夺财产的法律，民众也会欢欣鼓舞、钦佩跟从的。无论什么时代，社会都是一样。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持久，因为它对于社会来说，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几年之后，社会破败混乱的现状必定会让民众幡然悔悟，于是他们期待、寻觅一位刚决果敢，有决断力的，可以平定混乱局面的独裁者，然后拥戴他，服从他。这是屡见不鲜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纯粹理性能够改造社会这一理论，只是障眼法，是用来扰乱社会，而不是用来改造社会的。那么，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对我的理论主张又有什么威胁呢？

今天，民众总是对政府的政治措施产生种种幻想，寄托希望；其实，政府的权力实施，不足以做好事，做坏事却有余。破坏社会极容易，建设社会却很难。所以现在，我们不能仅仅防备严酷的经济需要，更应该警惕那些统治者因为盲目立法而危害社会的情况。对这个问题，后面的章节会另有说明，现在仅就近年来的恶劣立法案例大略论述一下。比如所谓的社会法，不但不能让任何个人得到好处，反而足够阻碍工业的发展；比如关于年轻人学习技艺的法律，影响力大到足以把学徒们从工厂驱逐出去，让他们无处可去，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变成强盗、杀人犯之类的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异常多，足以证明这一点；再比如抑制宗教，结果恰恰是把法国民众分为两个互相仇视的部分，社会怎能不动荡；又比如关税法，正足以煽动其他国家的报复之心，一定要达到让法国断绝国际商务往来才肯罢休。如此种种法律，都是人为制造的祸患。再加上自然灾害，我们的负担可真不能说轻啊。

我的本意不在于反对纯粹理性的理论，只是想要指出，那些理性理论不能改变的现象，就不能期待用理性理论去改变。总之，纯粹理性的逻辑的推导和理论，只适用于科学研究及一切客观知识的探究，只有情感和信仰因素才能统治人民，创造历史。

### 第三章 政治心理的研究方法

#### 一

想要研究政治心理，先要观察政治现象的实际情况，接着可以就事实进行分析解释，然后再就此推理和阐释背后的规律。这一过程，与其他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程序是一样的。

在政治生活中观察事实、现象很容易，但解释这些事实、现象就很难了。所谓解释，就是揭示内在的原因，并预测它的结果。我国的革命力量在1870年的失败，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应该用什么样的改革方法才能让他们免于再败？研究到这里，困难就出现了。就20年来的军事规程和专门著作来做考察，其中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所以想要解释政治现象的规律，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当中尤其增加难度的地方在于，政治现象层出不穷，形态万千，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仅仅是它的某一部分，某一细节，而并非是现象、事实的整体和全部。观察的过程如果发生错误，那么看到的现象、事实就会有偏差、谬误，又何谈正确的分析和解释呢？

这种研究仅凭直觉是不足取的，必须采用严肃而有系统的，经得起推敲的研究方法，如博物学上所用的方法，这样才能谈得上是研究。

心理学家研究社会现象，应该像博物学家一样，把各种不同的现象综合起来考量，并且要能够在具有迷惑性的表象之下，探求它们潜在的实际情形，就像博物学家把鲸鱼列入哺乳动物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它们的外表来观察，显然鲸鱼与鲨鱼相似，和松鼠不同，而博物学家的观察则恰恰相反。可惜在政治生活中，我们能够接触、感受到的，常常是表面情况，是表象，而非现象内部隐藏的潜在关系。

由此可见，研究政治心理的第一个困难，在于发现一种事实、现象产生发展的近因和远因。而这所谓的“远”也有几种情况，我们不能偏执于其中的一个，误以为只有一种远因。现在就以社会发展理论为例，来证明研究的复杂和困难。

## 二

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二字：民众希望改良社会现状，改变自己的现实命运，创造幸福的未来。仅就这一种原因来说，这一理论就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了。然而仅仅这一种原

因，并不足以完全地解释社会发展理论。因为改良社会制度，改变社会现状的美好愿望，人类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种现象并不是和社会发展理论同时发生的。

从前人们希望社会制度得到改良，生活状态得以改变的心态，固然不像今天这样迫切，那是因为彼时民众尚有稳定的信仰，在精神世界里有可以自行宽慰的空间；而现在，人们的信仰如此薄弱，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幸福，寄托希望。可是面对如此残败的现实，人们又能产生什么快乐，借以宽慰自己呢？又有什么可值得希望的呢？所以，社会发展理论的产生，似乎另有其他原因。根据近代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宗教情感很难消灭，他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怀有必须“信仰一种什么”的想法。所以说，现在所谓的社会理论，既然表示要取代旧的宗教，那么传播社会理论的人，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布道者而已。

前面说到的心理原因，是社会发展中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性质，不过即便如此，各地的社会发展理论还是有不同的形式，需要另外加以解释。

各个国家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种族的差

异，因此政治主张上也各有不同。从这一方面来探讨社会发展理论，所谓的社会民主政治，实在是各个民族在表达不同意愿的时候共同采用的一种概念。例如，把美国人与拉丁人比较，美国人自我意识强烈，往往凭借自己的能力，自主进行社会政治的改革、进化；而拉丁人则习惯服从，时常觉得需要依靠别人，需要受主人的保护。这两种民族在社会发展理论中也自然应该有所区别。

除了一个种族自然形成的性格、性情有不同，还有过去所经历的不同历史因素。数百年来，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民族、民众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方面受国家干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与那些国民政治生活历史短暂、受过去的影响很小的民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中央集权的集体主义制度，在拉丁民族中已经实行很久了，跟从前君主时代所推行的政策，名字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拉丁民族采用这种所谓的社会民主政治理论非常容易。

今天的国家政权，既然被公认为是一种保护性的“宗教”性质的存在，各个政党、各个阶级便都致力于寻求它的干涉和保护。刚开始，热衷于

这种行为的是工业家，他们请求国家用关税奖金、补助费等措施，让自己富裕起来。这些人当然因此变得富有了，而竞争的机制却也因此而消亡。社会经济自主发展的动力也随之弱化，萎靡不振。总而言之，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停止。

等到劳动界的人数增多，劳动者势力逐渐强大，劳动阶级随之崛起，便也跟着致力于寻求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要求国家政权反对自己的资本家主人，于是国家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只好走上靠专制制度掠夺财富的途径。如关于工人养老金的规定，回收铁道，扩充专利，征收重税等。这样发展下去，必定会极大地破坏、损害大工业发展的现状，经济怎么会不受影响？人民又怎么会不穷困潦倒？阶级地位又怎么会平等？

前面列举出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产生原因还不是很完备，应该再来考察、探究一下这个学说能在群众之中传播的原因。如此空泛、不切实际的论调，缘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势力？这是因为在群众心理之中存在着这方面的需要。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在没有知识的人中间传播，即便在诸如教师、中产阶级这样的人群中，也大有人在。他们因为感觉能从这一学说中得到满足，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也奉行它。这就又需要深入探究其他方面的心理原因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精神



濡染。

### 三

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会发现它产生的原因非常多，就像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而其中包含的各种力量，强弱也各有不同。那么怎样评判、确认它们的分量、价值呢？方法有两个，其中之一非常简单，就是人们习惯使用的方法。

普通人以为凡是出现一种现象，都只有一个原因。原因既然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更容易。比如某个地方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不满，提出改变现状的诉求，那么政府就可以订立所得税法来抑制富人，接济穷人，以此来改变现状。再比如，一个国家中人口停止增长，就对子女太少的公民征收重税，以此来达到促进生育，提高人口增长速度的目的。那些心理简单的政治家，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接近于这种状态。

另一个方法则较为复杂，是观察者采用的方法。这一种方法大概从政治心理的教训中得来。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有远因，有近因。我们应该先鉴别分析它的种类，然后再来评价它的价值，判定它的重要性。这是物理学家对于一种现象常采用的方法。所以物理学者做起来

很容易，而政治家做起来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物理学家有经验可循，而政治家所能凭借的只有观察。社会生活中并非没有经验，只是这种经验的产生，既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意志决定，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使它们再次发生。

评定一种原因的价值和重要性，有时也很平常，很容易。比如，无论何时，无论什么种族，这种原因的产生都是一致的，而其他原因也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评定方法只能在寻常的简单的事实现象上用到，而所得的结果也没有多大帮助。例如政治混乱之后必然出现军阀专制，弱势民族必然被强势民族征服之类。

至于鉴别原因种类的方法，我们应当知道的是，每一种社会现象都有两种原因，一个是永久性的，一个是暂时性的。第一种原因对于各种社会现象永远都有关系，比如种族遗传特性，以及过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固定的宗教、政治、社会情感等因素。第二种原因则因为时常变更而不固定，但是不能代替第一种原因。综观历史，一个民族改变他们的信仰和审美方式的情况是有过的，但遗传性不久就会再次表现出来，使得民众改变之前经过激烈革命所采用的社会形式，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

种族在过去的历史中，长时间形成的隐性力量，因为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人们都忽略了它。其实在民族进化中，这种力量影响很大，是我们研究社会发展时必须要注意的。比如法国的政治生活变动非常大，但始终遵循两个原则，也就是：相信国家政权有改造社会的权力和能力，相信法律有绝对的权威。这两者是国家集权主义发达、社会民主理论得以扩张的根源。关于这点，后面还有相关论述。

据此来看，想要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现象，应当先知道这个民族的特性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民族性的研究并没有多困难，因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特性并不多。比如美国人的民族性是刚毅、自信、乐观，需要公平、道义，有个人的自由习惯，能用自动自觉的行为代替政府干涉。研究其他民族，可能需要先研究他们的政府。美国则不然，观察美国人的民族性，应当在政府之外，观察个人的行为方式。一个国家的人民性格如此，其发展前途是可以预见的。再看美洲那些可悲的拉丁共和国，每天都处在混乱动荡的局势之中，但也可以找出少数几个重要的民族特性来研究。

研究社会政治现象，既然有重要原因可寻，那么解决政治心理问题自然比较方便容易了。但

是那种暂时性的原因很多，有时也会增添研究的困难。不过即使这样，也还是有踪迹可循的。每个时代中，除了永久性的原因，还有一种少数原则能够规范、约束当时民众的思想行为，比如第二帝国的政策是以国民主义为指南；今天的社会民主政策，以在国家政权的监护下追求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一主要观念为依归。由此不难按图索骥。

## 四

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有很多种原因了，而每种原因又在重要性上有所区别。政治心理的作用，就在于评定这些原因的重要性和价值，找出其中主要的原因，去掉其他次要的、附属性的原因。因此，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做减法，去除附属因素的困难，政治学科与科学研究大概是相同的。

今天科学进步的程度，已经能够认识到，每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多种多样的，但对于原因的解释，却都偏向于简单的方式，这是由于观察方法上的不足。比如在秤盘里放置一个物体来称重，对这个物体产生作用的因素不仅是地球，还有其他很多种力量，只是这些力量相较于我们所处的星球来说很小，因此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对于一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博学者只注意探

求其中的重要因素，而忽略次要因素。开普勒定律得以成立，就是因为他忽略了影响行星运行的次要的、微小的力量。

真正的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的，抓住主要因素，不纠缠次要因素。不过同时必须要知道的是，某一个原因在某一时刻固然不重要，在其他时间或许就变成重要因素。物理学家们都认为马里奥特准则是正确的。但要知道这一准则之所以正确，也是因为它忽略了其他次要因素。如果气体在弱点附近，那么忽略的那些因素就会变成重要原因，马里奥特准则就变得不再正确了。

## 五

对从前的学者来说，规律绝对性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都认为规律是固定不变的。而今天，这种观念正在逐渐消亡。关于政治心理的规律，我们更不敢说它比物质的物理性规律更固定。因为这种规律常被不可预知的因素干扰，有时一个常见的因素会被猝然发生的舆论潮流淹没。如果政治家能洞见这其中的诀窍，就可以制造这种潮流，至少可以引导这种潮流为己所用。俾斯麦之所以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猝然出现并且形成浪潮的舆论，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且有时是无法抵挡的。因此，拿破仑说：“议论家们都认为是现实情况在引导公众的言论和情绪，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自主过，我常常是被时势挟制的。”

这种民主运动的不稳定性和它对社会进程的作用，历史中并不缺乏例证。就拿百年来的帝国来说，英雄豪杰的伟业，王国的复辟，浪漫主义的盛行，第二帝国的建立，布朗热事件，都是明显的例子。其实马基雅维利所称的君主，现在可以改称为群众。因为他们有庞大的势力，社会的一切意志都趋向于同一方向。只是这种趋势不能持久。这也是政治家所应该知道的。

一个时代的民众情绪、社会潮流，往往是当时的人们难以深刻领会的。就像革命最开始阶段，没有人能预料到将来会出现专政的恐怖情形。就像有谚语说，船要沉了，船客互相祝贺。德让利斯夫人是奥尔良亲王世系的后人，她曾目睹了攻陷巴士底狱的情形。当时的贵族都对政治运动表示同情，就像今天中产阶级盲目地对第一次邮政系统员工罢工表示同情一样，但没有人知道各种心理现象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累积越多，发生变化就越快。这种情况，古往今来如出一辙。

在今天这样复杂的环境下，足可以想见执政者想要谨慎治理国家有多难。而尤其难的地方在于，统治者心理与民众心理之间互不相同，在各种想法和行为上都有隔阂，于是彼此之间无法理解。

只有处于同类之中，才能知道同类的心理。如劳动者联合会这种引导民众情绪的机构，能让人服从的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那些大道理和完美动听的人道主义学说，他们都知道群众不熟悉也不明白，所以也就不怎么担心他们会追根究底。而群众只知道服从那些由意思简单情绪激烈的言论所形成的所谓信仰，以及有声望的人或是委员会的命令，其他的都不想知道。

这些能引导民众的人，心理活动固然极其简单，容易理解，但因为恰好能符合心理同样简单的民众心理，所以才能轻易地驱使他们，使他们唯命是从。政客所犯的错误，这些人也常常能洞悉。因此他们的教化言论，对于统治者非常有益。常常想起政府对于罢工的邮政员工表示退让时，一位劳动团体领袖所说的话：“让邮政员工知道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自己的潜在力量，这是铸成不可饶恕的大错了。”

把远因、近因、永久性因素、暂时性因素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成立了一个社会发展公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由这个公式能否精确地确定来决定。这个公式往往由天然法则所决定，但也需要立法者不肆意破坏扰乱才行。

一种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已经如前所述。而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又往往是隐藏潜伏起来，不可见的。这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左右民族命运的力量，而民众常常是一味顺从接受这力量，由它来指挥。在这种意义上说，民众就像是傀儡，线动了他们才动，自己不能自由行动。

尽管这种势力非常强大，民众也不应该一味地顺从接受。先民如果只知道听从这种力量左右，受它挟制，怎么能够脱离蛮荒愚昧的时代而跻身于文明社会呢？！这说明，人本身也会有一定方法对客观规律产生反作用力。这种方法，本书篇末另有阐述。

简要来说，不外乎预测与预防二者。预测的作用非常大，而预防的价值尤其不可估量。怎样才能预防，后面另有探讨。



## 第二篇 政治生活的心理原因

### 第一章 法律本源和立法幻想

#### 一

许多政治事件和现象，都是被一种少数性原则催生出来的。这种原则浸染、影响民众的心理，比如对法律权威至上性的信仰，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一种活动。

法国人自称要与宗教信仰脱离关系，不信奉神祇，鄙视、嘲笑迷信行为，不相信梦境预兆以及“13”这个神秘数字的人非常多。但想要找一个对宪法条款或法律权力稍微有点怀疑的人，可就难上加难了。他们都深信法律条文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也就是说，如果运用法律手段，一切改革措施和目的都可以实现。限制富有阶级，救济穷人；社会有自由空间，可以持续、无限地发展；普及福利，保证人民得到幸福，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筹划、建设而实现的。

这种法律万能又神圣的教条论调，是今天的

理论家所崇拜的唯一理论。如果政党的意愿、施政方向可以用概念来定义，我们敢说法国只有一个政党，因为各个政党都具有用法令改造社会、要求国家干涉民众社会生活的意愿。当看见一个法国人时，我们或许不知道他是教会党，还是非教会党，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是“国家党”。

法律万能的说法，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中，影响力一直都存在。革命时代的人，深信建立一种制度就可以改造社会，以至于把理性奉为神圣之物，进而用它的名义来颁布法律。

对于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的民族来说，民众希望用法律来拯救苦难现状的意愿应当非常急切，大概是因为，既然没能在理想世界中得到神灵的回应，那么只能转而寻求现实中那些宣扬法律万能的人的神通。在民意胁迫下通过表决而颁布的法律，虽然不见得完全有效，但还具有一定的宗教性的凝聚力量；法典中那些简单的命令性的规定，也还能显示出略带神秘感的威信；而它真正的作用，不在于颁布者的统治心理，而在于受统治者的服从心态。

这种观念在拉丁民族中最为盛行，也导致了历史上最不幸的错误发生。为了维护这一观念，亿万民众失去生命，繁荣城市变为废墟，强大帝

国陷入衰微之中。

幸好已经有少数哲学家提出并且辨析了它的荒谬，我也曾试着在《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一书中指出它的错误，可惜收效甚微。大概是因为普通民众的直观印象、感想很容易发生改变，只知道听从那些过激党派的谄媚、颂扬的论调。一本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但即使这样也不要放弃，因为一种真理是不惧怕被反复阐释的。将来或许可以找到能萌芽生长的土壤，我们不应懈怠。

## 二

颁布法律的人深信法律万能，却不明白社会痛苦的根源所在，以为法律可以拯救人们的痛苦，于是表决通过无数条可能随时失效的法律；颁布之后，又对法律不能起到作用表示愤怒；然后再重新制定法律，期待它一定要得以实施，一定要见效。要么质问内阁成员，要么任命委员监督执行，总之不断干涉行政长官的事务。今天的议会制度，与从前的例行的国民会议没有多少差别。其实，拉丁民族脱离专制不久，就恢复了专制制度，是以群众专制代替了个人专制而已。

我国历史中受法律之害的情况举不胜举。比如1848年订立了众多有关工作的法律，创设了工厂，都以为这就是最好的制度了。没想到在立法者的意志之上，其实更有经济需要的存在。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工厂不得不倒闭，并由此引发了革命和恐怖的杀戮。最后的结果，则是帝国的复辟，直到普法战争中色当之败，外国势力入侵。

法律实施后的结果与最初颁布时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情况也非常多。像航业奖金法，原本是为了鼓励航运业从业者的，结果却使得商船航运业变得衰微。把我们本国的社会制度用在被征服的殖民地民族那里，原本是为了发展当地的社会文明，结果却使得殖民地经济变得落后。更有甚者，立法者不顾公正、道义，在受到民意压迫后，就订立最暴烈的法律。比如，订立教会分离法，谋夺教会的巨额财产等。

我们的社会还能维持下来，是依靠了那些不容易实施的法律的存在。因为每次制定一个法律，就会连带着增加无数官吏。有时候因为增加的人数过多，法律变得无法实际操作。像《劳动法》中规定要增加50万视察员，人数巨大，成为实行《劳动法》的障碍。法律由此不能推行。这其实是工厂的大幸。如果真的实行这个法律，众多官吏干涉工厂事务，那么工业的衰微是可以预

见的事情了。

还有一种情况，国家因为触犯某种法律的人数太多，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实行这种法律。大概是因为，少数人触犯了法律可以定罪，而如果大多数人都违反了这一法律，那么从前的罪行现在就变成权利了。这样的法律也很多，比如，反对投机活动、限制无限公司以及由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种种契约法等，本来都已经成文了。对于这种法律失效的情况，我们如果研究法律的真正本源，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

总之，像这样的法律，不如停止和废弃。当然，法律也不完全是有害社会发展的，有时候也不乏有益的法律。但这种法律的好处，是由一定的经济、社会需要所决定的，与立法者的主观意志无关。我们想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立法，什么情况下不应该立法，只能根据法律的本源来求得答案。

我们尤其应该知道的是，一个民族不能采用与自己心理因素不同的民族的法律。罗马法体系表面看来似乎已经被德国采用了。但其实在采用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德国法。采用英国宪法体系的国家也很多，但是能够真正贯彻实行的，其实也仅仅是英国本国而已。

就法律的产生问题来追本溯源，其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习惯，接着是相对固定的惯例，最后才成为立法者能够颁布使用的法律条文。

法律常常是根据习惯来形成条文的，这是法律的真正任务。我国的民法典，人们大多以为是出自拿破仑的起草委员会所编订的内容，其实它仅仅是集合了各地的习惯来写出具体文字，形成完整的法律条文而已，并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这时候的法典，是旧法典而非新法典。

所谓习惯，来自每天都在发生的社会、工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需要，继而由惯例固定下来，法律再据此加以限制、裁定。法律所做出的判罚，是针对某一时代的社会现状的。所以在今天文明进程比法律发展更快速的情况下，有时候不得不根据惯例来改变法律中已经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地方。

在法官没有自主权利的国家，将习惯形诸文字成为法律条文要迅速。在法官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比如英国，就没有必要急着更改法律条文，因为法官可以自己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进行

调整。

社会需要在不断发展，比法律的调整更新速度更快，因此惯例的影响力在各个国家都非常大。这种情况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从前罗马人恪守法律，但是根据克吕艾的考证，当时法庭做出的判罚和法律中的明文规定相悖的情况很多，而现在的人还在把罗马法奉为金科玉律，这难道不奇怪吗？！

事实上，法律如果不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就不能继续存在，然而历史中还没见过这样的法律。伊斯兰教的法律，从前固定在《古兰经》这部经典上，使用的时间非常久，而实际环境早就变化了，还想要根据这个经典来规范人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天的《古兰经》固然仍被伊斯兰教徒共同恪守奉行，但实际上，具体法律的内容已经随着具体解释的不同而一起变化了，这和罗马人奉行《十二铜表法》但并不具体应用是没有差别的。

由此可见，习惯和惯例的发展都超前于法律的发展，而且有时候还会跟法律背道而驰，法律从来都不可能与习惯、惯例相抗衡。迪尔凯姆教授说：“如果家庭生活的发展趋势是乱伦婚姻，那么靠法律来禁止并不一定会见效。”这当然是

假设的情况，但这个推论和解释却是正确的。请问今天什么样的法庭能对决斗杀人者进行苦力劳动的判罚呢？法律也曾禁止堕胎，但是罪犯却常常被陪审团释放了，最终导致法官也不愿意再去追究。

如果没有不断更新的惯例来矫正，法律几乎就要成为不公平的规定了。法律规定水手的妻子如果没有丈夫的死亡证明，永远不能改嫁。如果不靠惯例来纠正，这些女子岂不是要当一辈子寡妇？法律禁止追究私生子的父亲，而按照惯例，诱奸者要赔付给女方金钱，给孩子养育费用。可见惯例的实际作用是很明显的。

如前所述，立法者的任务在于赋予已经实际成立的法律以裁决、判罚的权力。也就是说，立法应该在习惯已经形成、惯例已经固定的时候。如果没有经过这两个阶段而立法，那么法律在公布的那天就已经宣告了失败。

现在不妨举一个由习惯、惯例形成的新权力来证实我的说法。我国的行政法院，从前仅仅是个不重要的行政机关，现在的权限却得到扩张。之前它隶属的部门，现在反而隶属于它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习惯和惯例的作用导致的。至于习惯和惯例之所以成立并起作用，则是因为人民



想要限制部长们和行政机关弄权行私，所以就消解了部长以及各个政府官员的权力，把这些权力赋予行政法院。法律并不一定有具体规定，但大凡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这种具有独立裁决权力的固定机关是必不可少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职务也跟这一样。

再以英国为例，以证明法律权力的产生并不源自成文法令。英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并不以成文法为基础，如议会上下两院的区别，如两会议员的责任等，都没有经过法律明确规定。但是英国政府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不失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典范。今天我们可以把英国称为民主国家，是把国王看作了总统，人民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现在的民主国家中，唯有美国可以与它媲美。他们的人民有宗教信仰上的自由权利，也不受有形或无形的势力强迫、干预；人民可以获得产业，不会被国家征收使用。我国实行的秘密逮捕制度，从来自国王国的“密札”，现在则出自预审法官之手，而在英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而且英国人和我们在秩序、理性、严整统一等方面的观念正相反。张伯伦说，英国宪法的优点在于它不迎合世俗意愿。这个见解很对。大概可以说，法律的产生是出于情感，而不是本于理性。

可惜法国民众对于理解和接受这种观念还相距甚远。对法律本源的误解，导致了我们的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经历了多次革命，反复的破坏，很多次残酷的杀戮.....将来还不知道要再付出多大成本呢。总而言之，法律不能靠凭空的想象创造出来。这一点可以贯穿整个法律产生、发展的历史。

## 第二章 法律的危害

### 一

想要证明前面一章所说的事实，就不能不从那些满脑子奇思妙想的立法家们所订立的法律中，略举几个例子来进行评价。

有一个故事，古代波斯有一个著名的皇帝薛西斯一世，他的船在大海里沉没了，他非常生气，便下令用鞭子鞭打大海。揣度他的用意，似乎是想警告大海，让它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这种心理简单而可笑，跟今天的立法家们想要改造社会的想法是非常相近的。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今天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与物理规律相似。这些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人们只能顺从接受，又怎

么能徒劳地想用法律来抵抗、改变呢？要知道今天的立法家以及革命党派改造社会的行动结果如何，等将来就知道了。

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等到结果出现的时候才能最终破灭。在君主专制国家比如法国，独裁政体的危害已经在色当战役中体现出来；而在民主共和制国家里，民主专政的独裁性危害，将来也肯定会有一些经验能证明。

## 二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研究了立法的过程，已经对法律的形成和本源进行了大致的说明。所谓法律，就是根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习惯，经由逐渐固定下来的惯例加以确定；它是一直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社会生活法则在某一时代的成文部分，并且随着经济需要以及民族性质的变化发生改变，并不像社会理想家们凭空想象、自行加以规定的那么容易。

我经常思考这些社会理想家是从哪里冒出这种幻想的，他们大概是以为从梭伦到拿破仑，所有时代的法典都是一个人就能制定的，却不知道这些法典实际上都是集合了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各时代的旧有习惯，加以统一整理，系统

化形成具体条文而成的，并不由哪个人来倡导发生。所以拿破仑法典可以在那个时代制定颁布，而瑞士、德国的法典只能在最近才成立。

令人感慨的是，自从社会革命学说广泛传播之后，理论家们都认为社会是可以依靠法律发生改变的，于是想要把宗教所拥有的神圣权威赋予法律。其实这种源自信仰的力量，只能在从前宗教可以干预社会生活，民众相信君权神授、君主是代为传达神的旨意的时代产生作用。当时的理论家这样主张，是因为不知道存在着铁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今天的理论家们，竟然也完全不知道这些规律，以至于在传播这种论调的时候，其心态的狂热并不亚于旧时的布道者。

我的看法恰恰与这种空想的理论相反，我认为凡是历史中的重要现象，基本上都是由各种远因、近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无数隐藏、潜伏的小因素积累在一起，才造成一个影响巨大的结果，就像星星慢慢形成固定轨道，就像一颗小种子发芽、成长，最后成为大树。当各种微小因素积聚的最初阶段，力量还很小，还可以预防、抵抗；等到越积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了一个社会现状所能容纳、接受的限度，大堤就不能免于这种潮流的冲击，于是溃堤决口，民族的自然进化就变成人为的社会革命

了。

从前依靠宗教立国的君主，早就知道理性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并不在这上面寄托希望，而是专门借助情感的力量来统治人。只是这种个人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今天这样的科学发展、工业进步的时代，宗教信仰的力量已经被经济需要代替，神的旨意已经不足以凭借依靠，更何况是要靠法律来改造社会呢？这就好比是想要光凭演说就让铁路封闭、火车停下来一样，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考察过去的社会历史经验，再审视一下今天的时局就会发现，社会生活状态越不完美，法律条文增加的就越多。而法律条文越多，对社会生活的危害就越大，因为它阻碍了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和趋势，强迫其发生改变。

### 三

想要逐一列举这些有害的法律及其影响后果，非要巨大篇幅才能穷尽，这里只能先列举几种。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指责谁是不良的立法者，只是想说明这种盲目立法的后果。

商船奖金法颁布之后，政府每年要耗费4100

万法郎支持这项法规。结果我国商业航运业衰微，德国航业公司利润上升。现在引述儒勒·休特与德国的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经理普拉特的谈话予以证明。

儒勒说：“我询问普拉特先生，‘您亲眼见过德国海港异常繁荣的情景，应该能够告诉我德国商船航运业进步，法国同行业却停滞不前的原因’。”

普拉特说：“这个原因非常简单。你们实行商船奖金法，自己加速了死亡。你们政府出钱，让从业者不作为；他们什么都不干，商船航运业哪能兴盛呢？你们这个奖励办法的结果，尤其值得揶揄。你们的奖金啊，实际上是让英国人、德国人得利了。其实我不应该把这个情形告诉你，因为实际上得到利益的是我本国的人啊！只是先生既然询问我，我也不得不以诚相告。”他还说：“外国人因为法国政府给予奖金，于是集资在法国设立公司。而给奖金的标准，是按照航海距离来计算的。这样一来，商船航运业实际上是在用法国政府的预算资金来周游世界。一个船主告诉我说，如果用空船巡游八年，在这艘船上投入的成本就完全可以收回来了。所以这些商船都拒绝装载货物，以求行驶轻便，便于高速航行。”

儒勒说：“现在这个法令已经修改了，商船只有载货才能得到奖金，您可别危言耸听、言过其实呀。”

普拉特说：“虽然有这个限制，但仅限载货量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得奖，这限制其实等于没有。有几个德国人也想要效仿法国政府这样的办法，要求给予奖金，但都被各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拒绝了。理由都是法国航运业因为设立奖金而衰落，我们更不应该步其后尘，让自己失去自主发展的动力，以至于加速航运业衰微。”

1900年发布的限制工厂使用童工的法令，看似有益，实际上的结果却是，一是使学徒人员失去了原本可以学习行业知识的可能性，这势必造成将来工业发展上技能工人数量不足的恐慌；二是少年犯罪的人数加倍上升。上议院议员托伦在报告中说：“这一法令实行之后，人们都认为工业资本家必须终止雇用童工当学徒。这就导致了这些无业人员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自然不免走上犯罪之路。仅仅就巴黎一个城市而言，青少年犯罪人数已经由1174人增加到2273人。”

产酒、酿酒特权法允许酿酒原料的生产者可以自己酿酒而不用纳税。这样，他们每100升酒就可以获得220法郎的利润。其结果，一是使国

库每年损失1亿法郎的税收，二是饮酒对社会的危害大大增加了。从前那些因为酒的价格太贵而喝不起酒的家庭，现在都能享用到酒精了。

关于教会团体的产业收入的法令，其最终结果暂时无法预料。但是以目前所见而论，之前预计能够实现的产业收入额是10亿法郎，而现在实际上似乎还没超过1000万法郎。这是收入额方面。而支出方面，则是增加了数目众多的学校、医院，以代替从前教会产业管理下的所有学校、医院。等于说是10亿法郎的收入还没实现，就先花掉了几千万法郎。这仅是就利益来说。如果再就社会结果而言，这一法令也遭到无数民众的愤恨。因为持社会发展理论的党派明明知道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这一理念，却还要制定这类法令。外国人也对这样的行为很不满意。相较之下，我们的损失比几次战败造成的损失更大。这需要另外的章节专门论述了。

制糖业奖金法实行的结果，使得糖的生产过剩。法国糖生产商向本国出售糖的价格比英国要高出三四倍。换算成政府的损失，达到几亿法郎。现在这一法令虽然已经废止了，但是糖生产商从消费者那里剥夺来的利润已经多到无法计算了。



咖啡馆、酒店、饮料店自由营业法，表面上看来似乎没让政府出一分钱，而实际上民众要付出的费用却非常大了。不但在这方面的消费增多，饮酒的危害也由此而变得高发，医院里病人人满为患，国力也随之衰落。细想一下，哪有比这更大的损失呢？！

回收西部铁路法试行的时间还不算久，想看最终结果还需要几年。但就目前而论，这个法令刚一公布，员工们就纷纷要求加薪。1910年间，国家的损失，如果根据杜摩尔的报告，已经达到5000万。大体上所有收归国有、市有的事业，没有不蒙受这种损失的。这个情况，社会民主党派不能不知道。

对于南部葡萄种植方面的救济法令数目就更多了，但无论怎样，最终还是不能用人为的法律战胜自然规律。当南方的葡萄种植过度的时候，葡萄酒产量就过剩，再加上还掺进了很多别的原料，葡萄酒产量就更多。合适的救济办法，应该是效仿从前发现茜素的时候，舍弃价格高的茜草不种，改种其他品种。而今天国家的救济方法则相反，或者政府出钱收购，或者补助酿造费用。这种现象，在英美等国家没出现过，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有自主发展的能力；不像我们，对国家的力量深信不疑，动辄希望政府出面干预。

工人养老法，这一法令虽然没有完全实行，但我们可以推测出它将来的结果，一定会被多数工人反对，一定会成为扰乱社会的根源。今天，由私人发动的公共慈善事业非常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用国家来强迫进行。而如果政府一定要强制规定实行这样性质的法令，结果就会导致，一方面使得多数人耗费金钱到没有实际意义的方面，而让少数人谋取利益；另一方面让私营业主原本已经很重的负担雪上加霜，这样又怎么能消除扰乱社会发展的因素呢？如果是互助互救，大家集资还可以还，但如果是养老金，集资的事情可不能实行。《时报》的言论非常对：“让工人避免利益损失，达到养老的目的，劳动者需要满足各种条件。其中之一，并非是工人自己就能自由决定的，即年满65岁。如果不能到这一年限就死了，那么生前所缴纳的钱都被其他人剥夺占用了。教给民众储蓄的方法，这样做合适吗？而且政府恐怕工人不能尽到集资的责任，就用法律规定让资本家从工薪中扣除，使得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都会产生矛盾；这是在人为地制造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启战争之源了。”

## 四

前面提到的盲目立法的坏处其实还有很多，

不能一一列举。立法者带来的祸患就是这样。再加上他们越来越不能满足民众的希望——具体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我在后面会另有论述——就像病人在药方不能奏效时也不能原谅医生一样，人民对于立法者的情绪也是同样的。

总之，这些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法律条文，各有不同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互相叠加，累积起来，就会酝酿成一个严重后果。这种效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了。

如果因这类法律的实施而使得工业发展趋于衰微，利益受损的只有劳动者自己。再加上工厂停业的情况不断出现，外国同行业的竞争不断加剧，这些劳动者将要靠什么生存呢？指出这种法律危害的，还大有人在。

保罗·德隆布尔说：“现在，整个社会的负担正因为实行的这些所谓的社会政策而日益加重；如果这些政策真能起到一点缓和、平复社会矛盾的作用，我又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是特别担心，在平息当前社会中过分激烈的民众不满情绪之前，这些政策就已经把我们引入破产的境地了。”

儒勒·路尼说：“我们现在这些议员，正在为

民众引导、制造一种神奇的心理，不但让群众深信议员们有把水变成酒，把铜变成金子，把面变成饼，把穷人变成富人的能力，甚至让那些改革家也深信国家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的神奇，相信它们比神仙还要灵验。至于不能快速见效的原因，则是议员们倡导的这些制度、政策实行时间还不够长。”改变法国社会现状的办法就在这儿，两院议员何不乘兴而来？！

这种忠告未尝不恰当，但是却没有用。古代神话中的天神朱庇特想要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会先让他失明，双眼看不见。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这种草率制定的法律实行之后的结果，正渐渐反过来波及倡导者自身。历史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多了。波舒哀说：“人类思想常常被意志、倾向左右，但意志、倾向也常能超过思想，而且有时会反对思想。”说得非常中肯。

### 第三章 恐惧的政治力量

#### 一

神秘主义我向来不熟悉，但我也曾试着对神秘的东西加以分类、进行区别，并研究、探求它们的构成规律。我们敢说，历史上的大事件，其经过都是神秘事物及其力量造成的。历史，就是

各民族创造或者消灭神秘力量的集合；而从古到今的政治现象，就是神秘力量之间从未中断的争斗厮杀。

种种神秘之物的能力并不一样，而是各有秩序等级。最厉害的是一群势力最大、声势可畏的神秘者，只有时间才能制伏他们，没有别的方法能够与他们抗衡。这就是各大信仰的创立者的潜在影响力。这些人身处墓穴之中，却能让亿万人民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人民也尊敬地供奉、膜拜这些人。为了他们，人们曾创造灿烂的文化，也曾进行激烈的战争。最近这些年有3万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也是这个原因。

比这种恐怖的潜在影响力略逊一些的，是英雄的声望幽灵。这些力量仅存在于某个民族的思维意象中，在民族古老的传说故事中流传着，然而他们的势力仍足以影响后世。比如拿破仑的声望足以帮助他的侄子登上帝位，而使我们蒙受色当之败的耻辱。

最下等的是无数骚动的喧嚣浮躁的小势力，这些势力没有真正的力量，而且也不能持久。就像肥皂泡，手指一碰触，它就破灭了。它足够挟制人的意识，大概是因为有一个大的隐秘之物在它后面。这个隐秘之物，没有什么能撼动它的地

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让它受伤。自从有人类世界存在以来，它的势力就没有削减过。它的名字叫恐惧。无数小势力都是它产生的。

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说，恐惧的力量是宗教信仰自身所产生的。这一说法我尚不能证明对错，但我敢断言，如果一个民族和它的领袖不被恐惧挟制，历史的进程必然会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所差异。我还敢断言的是，如果由恐惧产生的无数小势力不干扰议会的活动，今天我们所见的各种问题，必然会被社会业已形成的不可缺少的秩序、纪律代替。

## 二

这种由恐惧产生的潜在而巨大的力量，只有杰出的大政治家才知道如何运用。那些庸常的政客，只知道顺从接受而已。

邮政员工的罢工就是值得慨叹的历史。它一方面显示出统治者的无能，对这种声势感到惊悚恐惧；另一方面可见统治者们不知道如何运用，这种潜在的力量虽然扩张得很大，但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消失于无形。

邮政员工所创造的无形恐惧，刚开始的时候

势力还很小，很容易消灭。这一点，我已经在《意见报》中预言了。只是政府自己感到害怕，只好宣告投降，有点卑躬屈膝、咎由自取的意味了。就像邮政员工所说的那样：“政府几乎是跪求大家回来工作。”

尽管如此，这次屈服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一个国家中，如果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团体、一个党派自以为力量强大，必然会以主人自居。这个邮政员工阶层，自己都惊讶于自己的力量，认为威力足以让议会、政府和军队屈服，于是以为自己强大得不可抵挡。没有耐心等待自己的力量增强、扩大再加以利用，而是借口某一事件又宣告罢工。除非我们承认法国政府已经被邮政员工代表统治，否则不能不加以防备了。政府于是进行抵抗。冲突刚开始，肥皂泡就灭了。这个无形的力量既然已经消失了，其他无形的势力也随着灭亡。像政府所最惧怕的总罢工之类，就是这样。这当中最滑稽的，就是发动总罢工的人，也就是内阁成员中的一个人，只不过当初他还没有进入内阁而已。

总之，胜负双方都不知道利用潜在力量，导致积累下无数不可原谅的心理错误。第一次退让，是政府的心理错误。征服国家的举措，可以有一次但不能有第二次；如果不量力而行，一旦

落败，局势将不可收拾。至于又要以罢工作为要挟，更近似愚昧无知了。这是邮政员工的心理错误。劳动联合总会的人员，拿着罢工的说法加以操纵当然可以，至于想要实行，以显示政府的无能，这是最大的错误。可惜谈论神秘主义的人，没有人能指出这种势力擅长在幽暗中生存，却会在光明下毁灭。这个真理，是不能被蒙蔽的。

劳动联合会亲自作为公安委员会，庄严宣布实行总罢工；等到罢工结果没能起到作用，正告诉我们抵抗的好处。从这次罢工的过程变化可以看出小股势力不足畏惧。如果让它们知道我们惧怕，它们得到扩大的容易程度，就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了。

邮政员工前后语气的变化，可以给我国的政治家提供不少教训。最开始他们还知道恭敬顺从，政府表态妥协后，他们的语气一反之前的态度，并且加入劳动联合会，成为反对党、革命党，并以用激烈手段破坏社会为目的。这些都有报纸上所登载的对邮政部长的访问作为证明。

### 三

仔细思考民众产生不满情绪、扰乱社会的因素逐渐增多的根源，大多是政府的软弱庸劣所



致。这种教训历来不少。如果政府稍微有点毅力和决心，就能够抵抗这种借口自由表达意见而鼓吹损毁、焚烧和破坏社会的闹事者。但是真正想要做到也很难。对于这些闹事者，今天判刑了，明天又赦免，那又何必实行这种惩罚呢？当时，邮政员工罢工之后，某议员战战兢兢地建议赦免他们的罪行，表决同意的人还不在少数。有这样平庸懦弱、大言不惭的议员，法律还怎么能够执行呢？

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民众牵制着统治者的行为，而在于领导者的言论一旦渗透进民众心中，将演变成不可避免的革命。之前巴黎公社时期的乱局，首都的部分地区被焚毁，都是由言论太过激烈、暴力导致的。这一点，我们应当时刻想到。

那么我们应该在恐惧的影响力刚刚代替昔日的宗教信仰之后进行抵制；如果等到它的势力更强大，即使我们想抵制也没有用了。

处在纷扰变乱的时代，恐惧的力量最容易发展，它的势力也足以把平和的市民变成杀人暴徒。革命时代如卡里尔淹死人、富基埃·坦维尔砍头的恐怖行为，都是恐惧所导致的，我们也应该时刻记住。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虽然有社会党的威胁，但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极端。恐惧的力量仅仅在法律这一方面作祟，被它危害的，还只有工业而已。

至于它能作祟的原因，是选举人只顾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关注法律的订立。如果以收回西部铁道这一件事咨询选举人，我敢相信10人中，或许只有一个人会赞成。

至于立法者盲目顺从附和，大概是因为一群由俱乐部、委员会、劳动团体所制造的，诸如“帮助左派转变方向，铲除没有廉耻的资本家，财产向社会公开”等说法的引导。

这些说法不一定全都没用，知道利用群众心理的人常常说起，但从来不实行。因为他们知道群众是不可理喻的，群众只知道服从由自发情感产生的说法。群众非常愿意观赏布鲁图斯刺杀恺撒，然而对于谁将成为恺撒，群众怎么会知道呢？

## 四

只有那些非常杰出的人，才能知道群众心理；当群众心理突然发生变化时，这些人也能随

机应变。至于那些寻常的政客并不知道这个道理，只知道自缚于被恐惧心理引导的狭隘理论之中，根据那些荒谬怪诞的不符合现实情况的说法来制定法律。这是无数有害而不能实行的法律产生的原因。工商业以及国家财富的基础行业即将受到这种法律的迫害而受损，这坏处是不能说尽的。

即使这样，这种性质的立法仍然不停止，最近又增加了出于恐惧心理所产生的加价行为，订立不能实行的工人养老法草案，这是下议院议员人所周知的。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单是实行的费用，每年就需要七八亿法郎。下议院明知道不能实行，表决的时候还是说可以，这是摆明了让上议院一定要有所改正。德隆布尔说：“下议院表决的强迫养老办法，足以导致公共财政受损以及国民劳动力衰退。”这是真理。只是议员们被恐惧的心理挟制，真理又有什么用呢？

仅恐惧心理的势力这一种就已经非常可怕，如果再加上怨恨和羡慕两者，力量就更大了。这是控制今天的政治现实的三驾马车。所得税法草案大体上就是由这三者而来的，而舆论界还说这法律的起草是本着公道，本着有利于人民。这种说法，连嘲笑都不值得。

这法令能得到人们赞成，是因为它先利用了怨恨和羡慕这两个因素；如果人们知道了纳税人仅有50万，那么公道何在？然后他们又利用恐惧心理而获得多数人的认可。我此前曾说过，隐秘之物适宜在暗处而不适宜在明处，现在舆论界已经意识到少数社会党人嫉妒少数大工业家事业兴盛，想要破坏、毁灭他们的意图。法盖说得很对：“某党派力主实行所得税，是因为征税额度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喜欢的就免征，不喜欢的就征收重税。这对选举来说可是非常见效的。”儒勒·洛奇说：“这种民主改革就是退步的草案，极其恶劣也极其危险。把公民的产业交给独裁的党派官吏，这是在破坏法律，也是在让法律自相矛盾。”雷蒙·庞加莱说：

“这草案对公共财产构成威胁，使得将来的国民收入受损，纳税人横遭压迫。这是对国家产业和民众生活的危害。如果实行，我确信必定发生最大规模的反抗。”

大家既然都这样认为，这种行为贻害将来，又像他们说的那样明显，议员们竟然还是通过了决议。对将来的危害为时尚远，而目前在选举中具有势力的小学教师、酒商、社会党人、委员会等的愤怒情绪已经来势汹汹，似乎无法抵抗。至于那些工团也是一股政治势力，我没提到他们的

原因，是这些人曾经宣布不参与此事，大概这税法跟他们无关吧。

## 五

统治者依赖这种潜在力量活着，并且受制于恐惧这个因素已经20年了。从中获利的只有工人阶级，受害者却是工商业人士。他们不时被苛刻的法律、赋税政策刺激着。

采取立法的手段来反对那些能够代表国家力量以及尊严的人，以便让一个阶级获利，这是恐惧这一因素导致的。或者拿宗教当借口来剥削一些人，或者拿社会财富当借口来剥削另一些人，总之都是出于恐惧。害怕教会，害怕工人，害怕社会革命党人，以至于连普通职员都害怕，将来恐怕见什么怕什么，没有不害怕的了。

订立很多苛刻的法律，就能博得劳动者的感动、高兴吗？不能。群众靠威胁获得想要的东西，是不一定知道感恩的；而政府退让的结果，仅仅是得到怨恨情绪而已。

那么这个威信扫地的政府为什么还能存在呢？答案是因为暂时还没有什么能够代替它。所以多里亚克在《今日法国》一书中说：“政府能

维持存在40年，与其说是它本身的能力所致，不如说是它的对手太软弱，它才得以延缓的。”

这意见已经变成时下的共同看法。政府今日的燃眉之急，在于减少敌人的数量，放弃从前掺杂着各种因素，各种手段并用的懦弱制度，以及那些狭隘的、有诸多限制的政策。否则，将来不但不能得到任何人的认同，而且还会被所有人反对。

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期望这种忠告能得以实行。最难的地方在于，自己摆脱恐惧心理这一因素的挟制。由此看来，我们的国人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逆来顺受呢。而这世界最后的神秘力量，将随着这世界最后的一个人的而一起结束。

## 第四章 神权在近代的变化——国家主义

###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国家主义的自然表现，被拉丁民族一致尊奉为国民宗教。流传时间很长，在人民心里留下的印迹也很深。它的影响非常强大牢固，不像那些过渡阶段的信仰，还可以用理性或情感做诱饵。所以今天除了少数没有

威望也没有权势的离经叛道的人进行驳斥非议外，没有人敢提出质疑。

这个国民宗教的教义已经很普遍了。我国的政党，虽然有信仰最坚固的教会党，思想最为顽固保守的保皇派，观点最为激烈进步的社会党等种种名称，但其实都是崇拜国家权力的政党。他们表面上各异其趣，本质上却合而为一。他们选择传道者的方法固然各不相同，但其实并不一定是针对教义进行讨论。

他们的教义，说起来也很简单，很容易理解。广泛地说，一切拉丁民族；狭义地说，单指法国人，都把国家作为“公共教皇”，由国家统治管理一切、制造一切、指挥一切，并避免让公民产生一点点自主的创造力。我们世代遗留下来的不可缺少的宗教性神明，现在正逐渐被它取代。种植葡萄的人，葡萄如果卖不出去，而国家不收购，人民就群起暴动。船主不能和外国同行业竞争，就要求国家赔偿他们的损失。工人怠惰，贪图享受，不肯干活，却反而请求国家让他们休息。时间久了，各种要求越来越多，遍布各处。这种“公共教皇”的行为也逐渐扩张。工厂、铁道、航运业公司渐渐落在它的手里。而共产主义还想要把一切工业都一并送给它。

国家主义不只代表神权，而是把从前所有宗教、君主所拥有的权势一并承袭下来了。路易十四死了很久了，然而国家还保存着他的统治方法和原则。如果请通灵人士去质疑一下这位著名君主的魂魄，他必定会告诉自己的继承人，让他们完全遵循自己的旧习惯，只是集权专制稍微有点过火而已。这位著名君主的魂魄或者还会展示古今共同遵守的一个原则，比如现在驱逐教会集会结社，与之前他驱逐新教徒大致相同。

今天的情况，有一点是可以让这位著名君主评论的，那就是现在的统治者靠着谄媚阿谀来求得群众宽容，实在是太过了。在这样的状态下，想要实现统治是很难的。这位君主或者会更进一步地评断说：“从前的君主所追求的往往是公众利益，而今天的国家代表们往往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再当选，才订立那些有害的法律。这种话如果被这些代表们听见，他们必定会赶紧让路易十四的魂魄快点回地下和他的祖宗们的鬼魂为伍，因为他不理解进化。”

省长多尼亚克的书，我此前已经引用过了，现在再引用他对于国家专制的评论，以证明国家官吏中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他说：“自从革命政府成立一直到今天，都是遵循旧日君主时代的统治方法。对待外省人民，与对待偏远殖民



地的居民没有差别，甚至像对待异族一样。”外省政府权力虽然小，但都仰承中央政府的意思，如建造市场，开通源泉，都需要经中央许可，其他方面更加可想而知了。这是效法旧日国王用监督官统治外省的老办法。

不用再举君主时代的例子来证明今天国家专制的形势较为严重，仅就法律的危害这一点而言，今不如昔已经非常明显了。立法者只顾目前利益，不问将来情况。眼下的、表面看来需要的，任由民众随意表达。即使违背信仰，损害公共利益，也无所顾念。再也没有比今天的政府更失民心的了。

国家主义的扩张，不仅是实施压制人民的苛刻政治，而且还破坏、扰乱国家事务。这些会在后面叙述。

## 二

根据前面所述的心理学概况来解释最近发生的、看似不可解释的事件，其实非常容易。比如国家印刷局一案，和海军的衰败这件事，曾经由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检举揭发，但是至今还没查明原因。如果是哲学家，则不需要探寻究竟。

重新修建国家印刷局，除建筑师外，所有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当时的预算费用共计442350法郎。而据监察委员会记载的修建所用的实际费用，数目不下1000万法郎。工程应该四年完工，但从开工到现在已经七年了，距离落成还是遥遥无期。至于为什么耗费这么多，如果根据委员会的举报揭示，这都是国家垄断的官吏滥用公款造成的。比如建造楼梯，本来已经完工，又说它与装饰风格不符，于是毁了重造。又比如数千平方米的地板，本来经过许多困难才能完工，某位官员却说这种地板妨碍了他的足疾，又恐怕受寒得病，便下令全部毁掉，用不能经久的、最劣质的木板代替。官员贵重的脚倒是可以避免受寒了，可是国家已经耗费了数十万。除此之外，其他的新奇事情还不少呢。建筑完工之后，花费巨资购买各项机械。买来之后才发觉，竟然忘了给安置各个机器预留所需的孔穴，于是再毁掉一部分房屋以弥补这一过失。前后耗费不少于百万。如果私人这样营业，早就已经倒闭了吧。而国家之所以不至于停业，是因为这损失与官吏无关，费用都出在无名的纳税人身上。

举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平时耗费有多少了。然而如果和调查委员会所揭发的海军状况相比较，这种耗费还算是小数目呢。

根据杜迈的报告，我国海军计划不统一，发展速度也不一样。既没有方法，又没有责任感，再加上废弛已久，弊端丛生，于是导致数年之间，实力一落千丈。

同时，根据同一委员会的委员阿贾姆的统计，海军耗费的数目不下7亿。如果再加上卡约的计算，从1899年至1909年，商船航运业的奖励资金数额是6.93亿，那么相当于耗费的数额加倍了。究其原因，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对军事航行无所裨益，另一方面又有损于商船航运业，所以耗费的数额才会翻倍。

海军中军务废弛的混乱情况很多，有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从阿贾姆所述的一件事，我们可窥一斑。某种钢甲舰的钢甲太重，于是换成轻的。换了之后又觉得轻，便又重新换回来。军舰已经成形，浮在水上，花掉300万了。因为这种种的怠惰废弛，我国制造钢甲舰的费用超过英国30%。其他国家制造一艘军舰仅需要两年，我国则非用上五年不能完工。因此阿贾姆说“这是国家主义应该警觉、恐惧的事情，也是国家应该专门进行惩戒的事情”，等等。

类似的事情各处都有。当土伦城逮捕捉拿几个兵工厂的军需品承办人的时候，检查结果发

现，25年中，货物入厂从没经过检查，承办人可以随意交出所愿交纳的货物，而收取国库所不应付的钱款。更奇怪的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实行这种国家主义的政府常说的。但这种看法如果在私营业主中实行，那么破产是指日可待了。

### 三

海军、国家印刷局和其他各种国家行业紊乱的唯一原因，已经在前面详细叙述了。所有国家控制的事务都转化为政府管理，实际上就是把所有责任都分散到无数的政府局、司部门，以至于责任消失不在了。这种分科而治的人员，既缺乏自主的行为能力，又互相嫉妒猜忌，不知道所谓的公共利益。如果同样一个人被私人企业雇用，他的行为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外国海军日渐兴盛的原因，是他们依赖私人企业；而我们则渐渐转变为依赖国家。这就是他们逐渐强大的地方，也正是我们逐渐衰微的原因。如果其他民族也听凭这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国家主义的侵入，堕落的后果应当是一样的。

英国议员哈罗德·考克斯的讲演，被政治和议会的杂志刊载的部分说：“英国政府极少经营工业，而一旦政府经营，必然蒙受重大损失。如果同一行业交给私人经营，则获利非常多。比如电报事业。在1870年前由私立公司经营，股东年利6厘。自从交给政府管理之后，旧有利率一下子变为2500万的损失。”

这是心理学规律的必然结果。大凡一个人缺乏自主的动力，而又推卸责任，他在知识上和生产上的价值都必定大大减少。社会党派不愿意挑明这个道理，不一定是他们没有发现。大概因为这个道理一旦挑明，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拉丁民族的共产主义国家还在不停地迅猛发展。西部铁路收回之后，其他路线也难免要被收回。我们将会见到各种新的专门产业出现，官吏也将大大增加。某位内阁成员最近在下议院宣称，他想要把酒业和保险业改为官办。《辩论日报》对于此举已有所讨论，现在转录如下，以此体现舆论反应：“我们即将见到专为盈利行业实行的财政政策在选举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现象，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疯子一样的政策过不了多久就将变成立法。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都会对这种中央集权的发展感到吃惊。个体自主

能动性麻痹萎缩，官吏增加，人口增长率停顿，预算入不敷出，国民得不到休养生息，现在又在继续增加国家的负担，添设无数职务，让国家来当酒商、保险商，议会里的大多数人怎么会一点都不担心呢？之前国家就已经假借体恤民情的名义，干涉各种社会事务。现在又借口资本积累太多，想要抑制富人，接济大众，把经济事务分成各种专门的营利性行业。”

所得税是国家掌握、持有资本的开端，我们不知道社会党派的这种合法掠夺还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能停止。工人养老法是国家慈善事业的开端，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社会性质的博爱行为会在什么地方停止。专门教育是集中教育的开端，我们更不知道这种普遍教育的方法什么时候停止。可能是想要等到国民实力的主要源泉，比如自主能动性和创造力枯竭之后，再在荒原中重新建设起新社会来吧。

## 四

国家主义和官僚制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想要削减国家的权力，应当先抑制官吏的特权。

国家自从掌握了众多工业企业以及专门营利

行业之后，出于管理各种事务的原因，行政机关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现在这些机关已经结成很多小的利益团体。它们的势力刚刚强大起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政府，比如近日的邮政系统罢工事件。现在，官吏们还嫌自己已经享有的特权和势力不够大，还要求巩固自己的地位。将来，议会必定会被这些势力的领导者要挟，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承认、巩固他们特权地位的法案。这是可以预见的。

某位财政部长曾说：“由这个地位法形成的寡头政治，把管理国家大事的大权交给官吏，而不再由国民操控，这将滋生一种真正的类似中国封建社会八股取士所产生的官僚政治。然而为什么要将经过如此大的代价得来的革命成果，交给这些人来统治呢？”这个见解实在切中要害。

承认这些不遵守制度的，总是要挟政府的官吏的特权，无异于承认他们是主人。这些人都自视甚高。凡是代表国家某一部门的官吏，都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地觉得可以作威作福。他们对待公众犹如对待臣仆奴隶，公文上的称呼语气很没有礼貌，平时出现在公共场合，其轻蔑的样子几乎让人不能接近。

想要免除这种弊端、断绝这种官僚政治的混

乱之源，我们民众的行为应当与平时的行为相反。换句话说，应当否决所谓的地位法，不让他们终身享有特权，不让他们能自己做主。如果要这些人听命于国家，我们应当效仿私营业主对待雇员的方法。员工的取舍、去留都是业主自己说了算，不要用成规。至于那些处理专门事务的人员，如工程师、电报生，合同契约上的期限不要超过十年。

这种做法必定有人反对，认为官吏在某一职位上工作的时间还不长，恐怕能够称职的人很少。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的是，如果真能这样，让那些资质聪敏的年轻人从事工商业活动，也算是国家的幸运了。看目前的情况，一个职位空缺刚刚出现，候补者就纷至沓来。财政部的一个助理人员日薪不超过五六法郎，而申请候补这个职位的人中，有大学学历的人已不下50人。假使将来我的理论能够实现，是不担心没有后备人选的了。但是，我的理论真的能实现吗？

## 五

国人受国家主义的影响很深了，以至于都已经不觉得是在受人控制、驾驭。今天，受这种影响的人不知有多少，也渐渐开始有人结成团体势力加以抵制了。现在，人们逐渐明白了国家的职



责不在于当工业家、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国家无权迫使公民信教或者不信教，也无权强迫民众遵循它的道德教化。国家的真正任务在于当各党派的仲裁者。在国内，它要用警察来维持秩序；而对外，它则以军队来保证民众的安宁。至于其他的事情，并不是它的能力所及的。

这种道理其实很普通，很平常，但是知道的人却很少。非常希望有一种迟缓的社会进化过程，能够慢慢消除国家的苛刻政治。但是期望不能太大，因为纸上谈兵地改造一个民族的特性固然容易，现实中却很难。

## 第五章 战争的心理原因

### 一

就今天文化的进步来说，如果用一种哲学家的角度来观察，战争似乎可以避免。然而在今天的各个民族中，战争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习惯。科学的进步能否减少战争的发生还很难说，但足以使战争中的杀戮行为越来越残酷却是可以断言的。列举历史中的数次大战劫难，即使如成吉思汗和阿提拉所发动的战争之惨烈，战场上伏尸流血的程度，恐怕也不能跟当下电气时代的战役相比。

如果一种现象的表现方式能始终严整如一，说明它是人类不可避免的需要，想要抗拒它，无异于与死亡相抗争。而且民族之间的争斗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原动力。古人如果没有这一动力，就不足以脱离野蛮状态，不足以建立灿烂帝国。而艺术、科学、工业等活动，就都不可能产生。世界上的诸多文明，有不经战争的吗？有平和的民族能在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吗？

但现在并不是评论战争利弊的时候，之所以说到战争，是想证明战争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考察、探究战争发生的心理原因。

这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强者想要抑制弱者。这大概是各级动物的共同规律。文化的不同固然可以减轻这种抑制活动的程度，但其发生却在所难免。因为各民族心理结构、生活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不同，会在思想意识的深层潜伏着某种嫌恶。民族冲突大多是因为这种不同造成的。世界上一切大的战争，名目虽然不同，比如，侵略战争、皇朝战争、宗教战争之类，其实常常都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伊朗和亚述的战争，希腊和亚洲人的战争，罗马和蛮族的战争，以及最近的日俄战争，没有一个不是种族战争。再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也是种族战争。大约都是一个地方的民族主张个人主义和思

想自由，而另一个地方的民族主张集权以及各种限制，从而造成冲突。

有人说这种战争是各国君主之间竞争的结果。可是我们怎么能仅仅看历史的表象，而不探讨其内容呢？君主在位时间非常短，怎么能完全代表一个民族的特性、爱好和想法呢？

## 二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文化的进步和各个民族之间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而减轻互相之间的嫌恶吗？事实都在这里，可以作为回答。

距离现在还不算太远的时候，交通不便利，语言也不通。民族心理的不同之处，还被一种表面上大体相似的欧洲文化掩盖，因此无从见到它们的具体差别。现在交通已经便利，各种商业利益交错，交际活动日益频繁，民族心理的不同之处也日益显现出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每个人的观察都会不一样，想要融合折中很难。交际越频繁，意见越有差异。利益越紧密，精神越疏离。想要追求的原本是博爱，结果却相反，大家互相憎恶。由此导致种种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结果。

各个国家自从蒸汽、电力等得到发展之后，空间、时间上的距离都缩短了。他们各自增加军备展开竞赛，而且在国境周围设立形如中国长城一样足以断绝交通的关税禁令和限制。不仅如此，各民族似乎还觉得由这种无形长城造成的孤立不够，因此无论本国实行的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大多数所谓的文明国家都以驱逐外国人为通行的观点。澳大利亚首先开始排华，接着是美国，现在又禁止运载贫民的船进入口岸。英国工会要求解雇外国工人。俄国曾经按照民意在大城市驱逐犹太人。德国也有同样的事情，普鲁士政府曾经驱逐在铁路工作的意大利人、波兰人。瑞士自1892年否决了《禁止外国工人劳动草案》之后，现在又限制军需商人只用本地工人。其他国家的趋势大多如此。法国也一样。由此可见，说20世纪是博爱时代，似乎有些可疑。想要实现博爱，需要使各民族互相之间不认识，不了解；如果消除了距离，使他们互相接近，互相了解，等于是使他们互不相容了。

可见，现在各国民众已经开始反对外来者入侵了。各国政府，从专制到最自由的共和政体，都采用同一方法。可见这一举措在今天的必要性。那么，仅仅根据民族间厌恶情绪加深这一因素，已经不足以解释了，似乎应该有一个比这更好的理由。

今天一切政府采取同一手段排斥外来人，虽然还出于不自觉，但都有最正确的心理根据可凭借。大凡一个国家之中，外国人势力不能太大，否则会使这个国家解体。可能他们的力量足以消除该国民众所崇尚、看重的精神。从前罗马历史上外来民族最多的时代，帝国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假设我国人口减少，各个接壤的邻国人口不断增加，如果听任他们的移民入境，我们必然有危险。这些移民，既不服兵役，也几乎不纳赋税，获利又比本国多，而其他国家又多半拒绝移民入境，他们自然不用选择，就高高兴兴地来这里。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国内大多不能自给自足，品性也多半是下等，对社会的危害尤其大。而我们被自己崇尚的人道主义原则逼迫着，只能接受这种祸患。马赛那里的移民之多，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意大利殖民地了。而且就算意大利殖民地的移民尚且没有那里多呢。如果法国不赶紧阻止外国人渗入，将来法国将三分之一是意大利人，三分之一是德意志人。那么种族及其存在所凭借的根本还怎么能存在呢？！与其受这样的入侵，不如接受战场上最惨烈的屠戮。

古代的人自然也有惧怕外来人的时候。但他们知道一个国家的价值，不在于较量居民数量，而在于较量公民数量。

由此可见，文化进步是不足以减少各个民族之间冲突的。尤其能增加民族之间隔阂的因素，除了前面所举的心理原因，还有后述的经济原因。哲学家、慈善家们常常叹息战争之祸还不能在短时期内消失。能够宽慰他们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以为能用一种神秘不可测的威力来实现世界和平，那么一切文化、一切发展进程都将从此停止，我们的民族将迅速恢复野蛮的旧状。因此福格耶说：“如果你相信和平的必然性，那么早在50年前你就会见到那种人类的腐败衰微趋势。因为它的破坏力比最酷烈的战争还要大。”

战争当然是有害的，而且这害处还很大。我们应该比较利害的轻重，以决定接受还是尽量避免它的发生。战争的危害有三点：损失财产，人员伤亡，民族被削弱。

财产的损失关系很小。历史中富有的民族常被贫穷的民族灭亡，说明想要用贫穷来消耗一个国家和民族，这种做法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用的。统计数据曾经告诉我们，德国为了维持从我们这里夺取的土地，需要耗费数十亿资金。欧洲各国多半也是每年支出几十亿的军费。我没发

现这对他们有什么大碍。中间固然有几个国家看似趋于破产，然而实际上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本身习惯艰苦生活，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国人应该知道这些军费必不可少，它们是避免国家民族受侵略的保险金。纵观今天的欧洲，除了对世界无益的民族外，能不凭借军队而存活的国家是没有的。一个国家一旦没有军队自卫，就会被强国吞并。那么将来要负担的重税，比现在这种军费开支不知要重多少倍呢。

今天，无论政府还是人民，都在夸大和平的好处。然而，也有一个道理无人不知，那就是假如一个大国和民族稍稍有个弱点，抑或暂时不能振作，那么它立刻就会被它的强邻侵略。比如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发动战争，和我们结盟的俄国军队势力刚刚衰微，德国立即在摩洛哥向我们挑衅。在外交电文中，德国人的傲慢言辞实在让人难堪。后来德国皇帝放弃战争的原因，是怕英国人炮击他们的海港。由此可以证明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的弱点表现给别人看。

各个大国的民众经过这一番教训后，都立即增加军备。想要增加军备，就应该先增加赋税。英国每年增加的海军费用就有10亿左右，如此巨大的数目，甚至引起了政治恐慌。可见其影响波及之大。所以各民族在真刀真枪的战斗之前，已

经打开了财力之战。

战争的第二个危害是人员的伤亡。这个危害的结果还很遥远。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在20年间损失了300万人，这些我们都曾经历过。唯一可以确定的危害在于，战争中的死亡者都是身强力壮的成年人，这对未来人口的增减和未来人口的身体素质都不可能没有影响。当然这种结果只对人口增长迟缓、停顿的民族有害。

## 四

统计学家们计算战争的成本，仅仅估算费用而不估量收获。而收获也是战争问题的一方面，怎么能忽视呢？

若说战争的收获，最主要的一点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它需要经历战争才能产生、形成和固定。一个民族没有灵魂，必然没有文化可言。

获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可以巩固一个民族的灵魂，但战败也能使它的势力得到增长。人们都认为耶拿之战是德国的不幸，我却不这样看。如果没有这次败绩，德国的强盛及统一或许要推迟到数百年之后。正是这场战役帮助德国迅速崛起。如果从更长远的结果来讨论，耶拿之战不是德国



的不幸，而是法国的不幸。

最近的这次大战，整个欧洲都开始穷兵黩武，其结果如何呢？统计学家认为这是在破坏财政，心理学者则认为这是民族性格的复兴。如果没有义务兵役制使全欧洲的强壮青年都投身于军旅，那么无政府主义、社会党和其他破坏近代文化的因素早就已经飞速发展了。近代社会所有的宗教信仰基础已经被毁坏殆尽，我们还没发现相应的替代物。而义务兵役制既然能教给民众一种坚忍、刚强、牺牲的精神，那么它也可以暂时成为民众的希望。今天，我们的民族正逐渐被优柔寡断、自私自利浸染，只有义务兵役制才能对它们形成足够的抗衡力量。这种兵役固然沉重，几乎与古代的农奴制相同，但如果没有这种兵役，欧洲社会就会被野蛮分子破坏。与此相比，似乎利用从前的宗教信仰成本更低廉，但我们又能拿这已经崩塌的不堪用的神权怎么样呢？

这种义务兵役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相当深重，数不胜数。现在举德国将军毛奇的笔记加以证明：“青年在学校中受到有益的影响，这一时间非常短暂。幸运的是我国在个人教育结束之后，就接着对青年人进行军事方面的基本教育。这是其他国家不能与我国相提并论的地方。人们都说我国能取得战争胜利，是学校里教师的功

劳。但仅凭借科学知识的学习，是不能使人尽义务、爱护名誉、报效祖国，为一种观念而牺牲生命的。因为人类的发展趋势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学校的教师，而是真正的教育者——军队。军事教育在16年间对我们的青年人进行智育、体育方面的锻炼。军队训练他们，使他们知道遵守军纪；使他们言行一致，不差毫厘；使他们正直，知道服从命令，热爱祖国；使他们刚勇，等等。”

义务兵役制的好处，不仅在于锻炼民族性格。近代工业，如金属工业的大幅度进步，正是随着军事装备、武器的研究、改良而发生的。这使得工业呈现出50年前见都没见过的果敢、精锐的状态和气势。再如，由于战术的需要而扩充了铁路，并改良了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义务兵役制。

## 五

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威胁，都是民族精神的催化剂。军事精神是支持近代社会的精神层面的后援力量。那些毁谤这种精神的民族，都应该相反，好好颂扬它。

前面说过的这些，如果还不足以让那些没有

远见又容易冲动的哲学家信服，我们不妨再举一个某民族被所谓的和平逼迫的例子。印度地广人多，百年来享有和平的幸福。虽然有3亿人口，却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所享受的和平可以说时间很长了，但结果不见得就好。近20年间，印度人口增加了3000万，每平方千米所容纳的人数，是欧洲人口最密的国家的倍数。由于人口日益增加，产出供不上需求，所以穷困是印度社会的普遍现状。如果没有饥荒，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他们的人口还应当更多，可见饥荒带来的危害之大，即便是流血最多的战争也不足以相比。仅奥里萨邦一地，在1866年就饿死100万人。旁遮普省在1868年，死了120万人。德干高原在1874年饿死130万人。有什么战争能跟这种灾害相比呢？！难道是饿死比死于炮火更好点，所以有人宁愿舍弃一个而追求另一个吗？

## 六

前面说到的这些，固然对战争的利与弊、好与坏都讨论到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能自己选择，只能逆来顺受而已。不过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应该在战争有利的一面多做准备。

为战争做准备的最好方法，在于铸造一种军

事精神。这是一支军队的真正威力。没有这种精神，即便有最完备的军事装备，也不过就是没有自觉心、缺乏抵抗力的群众组织罢了。从今以后，我们应当认准一件事：那些想要破坏这种精神的作家、演说家都是祖国的敌人，是想要搞破坏的匪徒。如果这种军事精神一旦消失，就将会有破坏力最大的入侵者来结束我们民族的历史。

这个意思应当详细解释一下。军事作家们对于欧洲战争将来结果的预言，我们应当铭记于心。一定要记住，这一战是历史中多次发生的那些战争的一次总结。这次战争将导致某一种国家、民族的完全、决定性的灭亡。这一场大战已经不再有所谓的怜悯之心，无数地区将受它蹂躏，直到城市变为废墟、民众死亡才肯罢休。

我们在培养年轻人和军人时，应当永远铭记这一精神，不要听那些演说家对于平和、博爱或其他琐碎无益的事情的毫无裨益的演说。我们应当想到，穆罕默德兵临城下之日，拜占庭还在讲经论典。这些人与他们又有什么差别呢？

或者还有其他的现实问题能使我们免于战争，或暂停冲突。然而军备万万不能废弛。如果一旦战争不能避免，我们应该知道战争的实质不

在兵力多寡，而在于能集合那些具有坚决抵抗精神的人。这样才能稳操胜券、获得胜利。

战争不仅是战术问题，也是心理问题。那些著名的将帅，大多都知道这个道理。拿破仑说：“战争一半是精神作用。”只有善于坚忍的人才能获得胜利。

我说战争是心理问题，或许有人不明白这一点，现在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各位研究军事的专家都公认军队损失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一限度，那么这场战争就算是打败了。这个限度被定为军队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损失一超过这个数目，部队的气势就很难振作了。军事专家们称之为士气受挫限度。军队人员损失五分之一，对实力来说还不算大的挫败。那么导致士气受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心理因素，这是经过数百年间发生的事情验证的。不过有时候部队损失的人数超过了这个限度，也不一定就是败仗，如日本人最近的例子。失败与否，还要看军事教育、军事精神的具体情况才能确定。如果部队教育得好，那么即便超过了限度，士兵们还是能抗击敌人，直至让敌人达到这个士气受挫的限度而结束。这样就能转败为胜。所以我才说，兵不在多，而在于有一种被情感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 七

能够取胜的原因，不只是刚勇果决的性格，还要有同样刚勇果决的行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心理原因，并且所起的作用相同。这是长期教育的结果。想要让这种因素起作用，收到成效，需要使教育浸入将士的内心，并转变为自动自觉的行为。读毛奇的笔记，这样的例子不少。法德战争的时候，德军侦查到对方参谋部计划的变更，于是也让自己的军队随之改变行动。虽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但军事行动已经自觉地开始了。这是行为与思想一致的效果。读一读1870年左右，我们同时代的将领们的笔记，会发现我国军队的运行恰好与敌军相反。没有接到作战命令，就不会随机应变。别人有发自内心的自动自觉的纪律，而我们只有呆板的身体的纪律。军队规模小的时候，这种外在的纪律当然也够用了。但当军队规模巨大的时候，这种发自内心的自动自觉的纪律是决不可缺少的。可见，只有知识的教育才能够养成这种纪律。

## 第六章 经济冲突的心理原因

民族间利益交错越多，想要互相了解的想法就越迫切，而互相嫌恶之心也会随之增加。所

以，距离消除战争的时间还早得很呢。其中特别能够助长战争危害的因素，是文化的进步所增加的经济冲突。这种冲突的原因是不同民族心理结构的不同。它在无形之中杀人流血的本事，实在超过了战争。

我早年间就曾经预言过，当电气化时代的工业文明缩短东西方之间距离的时候，世界将会发生一种空前的冲突。当时人们大多以为我是在乱说，可是最近，日俄冲突表明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

欧洲向东方国家输出其产品已经很久了，东方国家长久以来就是消费市场。而现在，形势开始向反方向发展。我们从前出产的产品，现在东方国家也能生产了。而且东方国家的工人要求更少，工资更低，劳动力更廉价。目前已经有东方国家的农工产品入侵我国市场。欧洲国家曾试着设置关税壁垒，然而并不起作用。

今天的冲突还仅限于农工产品，恐怕将来，这种冲突的扩张会更加迅速。印度、日本和马上就要加入这一行列的中国，与我们在一切市场上互相竞争。从前，印度的纺织品是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供给的，现在他们却在用我们的机器夺取欧洲的专利，用他们的纺织品供给英国。中国所

需的棉线，从前也由曼彻斯特供给，现在棉线转由孟买出口。印度和中国的工人工资非常微薄，而他们所制造的产品与欧洲工人制造的一样。正是因为这种竞争，美国和澳大利亚才排斥他们，把他们驱逐出境。至于我国梅鲁城的纽扣工人停业，则是日本在外国市场上与我们竞争所导致的。

如果印度、日本、中国把本国所有的煤都用来供给设立工厂，如果让他们用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产品在全世界流通，试问能有哪种壁垒可以限制住这种商业扩张呢？！将来欧洲工人的工资，将与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一样。有人说：“将来社会经济的调节器应该以劳动工资最低的国家为准。”那么，将来欧洲人的工资就将以东方人的收入为准。那些社会党还梦想欧洲工人工资能增加，不是很愚蠢吗？

25年前，当我有这种推想的时候，印度、英国的舆论界虽然承认我说法的正确性，但却认为东方工人的需要也将视西方同行业的程度而增加。这种意见大概是因为没明白种族特性才产生的。一个民族的心理性格是最牢固、不容易变更的。这类经验并不少，都可以作为证明。中国人在美洲居留时间已经很久了，却没有因为环境的奢华而改变生活方式。一杯茶，一把米，足以自



给。他们何曾用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取代自己原来的习惯呢？而印度工人每天收入五六苏（法国铜币，合20苏为1法郎）就满足了。可见我们的文化还不足以撼动并改变这种民族特性，那么，还怎么能说他们的需要会增长呢？！

由此可见，经济上的革命等于是把生产的权利送给了亚洲、美洲的民族。目前这一趋势还是萌芽时期，但已经晨光微露。等到将来，欧洲的产品输出必定会日益减少，直到整个社会衰落下去。

美洲的生产现在已经出现这种状况了。但美洲的工人多半是欧洲的移民，他们带有欧洲人的需要，生产价格不会减少太多。所以欧洲今天固然不能向美洲输入产品，但也并不惧怕美洲的产品入侵欧洲。

然而，日本、印度、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他们不但拒绝我们生产用不上的产品，而且还要用他们的产品来阻塞我们的市场。即便不能达到目的，也足以导致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发生竞争。当我们的工业失去了欧洲顾客时，就不得不降低产品价格，降低工人工资。

我们千万不能相信设立关税壁垒就能免于与

东方的竞争的说法。只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或许才能达到目的。但欧洲人口日渐增多，想要自给自足也是很难的。

经济学家会计算欧洲多数国家居民的生活成本。当生产日益减少，自足已经很难，还要实行关税壁垒孤立自己，这无异于主动向饥谨靠拢。想要避免被饿死，势必要打破关税限制。因为已经负担着沉重的税债，如果再实行关税，本就凋敝的欧洲，将来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它的文化必然会衰落，人口必然会减少，一直减少到经济上可以自给的数目。经济学家们这时可能才明白人口增长过快的危害以及人口少的国家的优势。

在各民族的经济冲突中，欧洲人的智慧固然不可忽视，但杰出人才数量很少。而手工劳动者的能力方面，多数民族都一样，不能认为欧洲工人就优于中国人、日本人。美国、澳大利亚人害怕这些国家的工人竞争，才把他们驱逐出境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如果东西方的竞争是双方民众中精英的冲突，结果可以不必过虑。但冲突主要集中在中下层人群，他们的知识水平、智力等相差不多，只是在需要上不均衡，所以结果当然是需要少的人获胜。

前面所论述的那些理论，其影响的显现时间

尚早，而目前的问题较为紧急，所以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关乎将来的问题进行研究了。

## 第七章 大学教育的心理影响

### 一

莱布尼茨说，教育可以在百年间让一个民族发生变化。但是他没有扩展论述，以说明不恰当的教育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一个民族发生变乱。

德国科学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的确是国家百年来大学教育的功劳。莱布尼茨的话，也的确正确。而我们国人的不振作，也正是旧的教育方法导致的。所以我说，不适合民族需要的教育足以带来危害。这可悲的教育制度，只知道制造没有品行的人、阴谋叛乱的人，以及众多夸夸其谈说空话的理论家。让这些人去实验室或工厂，根本没什么用，他们只知道死学书本。

教育问题也是心理问题。我们的旧式教育，从小学到高等教育，所依据的根本原则，都是一种错误的心理。我们的大学，实在是社会发生变乱的根源。

## 二

一天午后，有一位目光锐利的高个子老人，拿着我著的第九版《教育心理》来见我，对我说：“我国的教育制度是把法国引导到最衰败境地的根源，不能再用了。我是上议院议员、理学院和医学院院士、前医学教授，在多处讲学。您对于教育的观念，非常值得注意。我将在上议院发表演说，希望您能把有参考价值的作品提供给我，进行研究。”

我与这位先生素未谋面，但知道他是昔日最有能力的外科医生。这次晤谈后，这位先生又来过几次。我们两个人讨论的结果是，想要改变国人的教育方式，必须先改变主持大学事务的人的心理，再改变教授等人的心理，最后才能改变学生及其家人的心理。这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位卓尔不凡的上议院议员不得不取消了他的演说。

## 三

关于教育的论著最多，所以研究起来最为烦琐。那些因为一直被民族传统观念束缚而产生的问题，也都是教育方面的。就法国的教育问题而言，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人们都承认改革的必

要，人们也都知道改革不可能实现。

议员、教授、学者、文人都一致承认，中小学阶段是虚掷光阴的时期。大家都认为如果想要在社会中有所成就，就应该主动谋求其他途径的教育，以在第二阶段的光阴中，消除、纠正之前所得的幻想、错误和习惯使用的思维方式。

大家的意见都相同，但在50年间，力图改进教育的措施最终都不能收效。每次改革，只能看见教育的缺点在增加。

我论述这改革不可能实行的原因，对教育有不少裨益。从前的改革，最大的误解在于改良课程。我们应当知道的是，需要改良的地方在教育方法而不在教学课程。可惜教授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只知道靠空想来做理论式的推导，没有实际根据。那么又如何使学生理解领悟观察、思考、推究、判断的道理呢？

读者如果想了解大学人员如何被有缺点的教育蒙昧，以及不知如何探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建议您读一读两位大学人员在科学求进会上的演说。一个是理科教授李普曼的演说，另一个是同专业学长阿珀耳的演说。

李普曼认为法国的各种教育成绩都非常差，而德国大学的教育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都非常好。这种观点与他的同事的意见完全相同，但如果作为他精心考察、研究的结果，就颇为愚蠢了。可见所谓的专家，一旦离开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就变得懵懂无知了。如果李普曼不是严谨的人，听众必然以为在受他愚弄。论及教育弊端的原因，他则认为本国教育的恶劣之处，是耶稣会传教士造成的。说到改革的方法，他则认为非常简单易行：“让大学不受政府束缚，收回授予文凭的权力。”他觉得应该这么做，是认为政府的权力仅体现在在文凭上署名而已。还从没见过思想这么荒谬的人呢。

李普曼的演说已经非常迂腐粗浅了，而阿珀耳的演说，我们也可以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他说：“政府机关能够洞察教育的弊端，并且找到对症下药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加强初级师范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联系。”至于改革意见，他主张“废止博物馆的一部分课程，改为全民的参与性学习。”这样就可以起到改革的作用了吗？最近，阿珀耳发觉自己的观点有些单薄，又在杂志中再次阐发说：“第一点改革应视课程是否有益而分别安排，第二点改革则应该让政府和大学根据这一点来研究课程的伸缩，从而确定要不要安排讲座。”

由此可见，这种专家并不能探究教育的真正原因。他们不研究改良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自己能支配课程而津津乐道。

在同一本杂志中，勒·夏特列用假设的例子说明实验家与仅凭借书本的理想家的不同，以揭示和阿珀耳等人一样的大学人员的书本教育法的弊端。“假定让工程师装置西门子式生热炉。这种炉子有一百多种，用书本所教的方法进行安装，必定要花费无数时间，每天消耗无数金钱，也不能成功。最终必然要请教那些不凭借记忆力、所受教育与法国工程师不同的人。这工程师一定是本着经验，用一天来试验吹管，一天来试验煤质或灰盘所需的水量，不出几天时间，就能完成安装，所费时间和费用也很少。”哪种教育方法好，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 四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的需要也在发生变化；对每个时代来说，必定有一种新的必要的教育方式。只是我们不懂这个道理而已。

前外交部长阿诺托说，在法国教育中，年轻人在25岁之前纯粹是为了书本而被困在教室里的

椅子上。他们经济上越来越拮据，所得的知识也越来越少。除了朗诵教科书，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说想要找个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方法，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让我们知识界的精英生活在故纸堆中，埋头于固定规则，不讲实际，不知道自己的社会价值，这就是我们近代教育的根据。我们的自由职业（如医生、律师）大多受到这种浸染。

寥寥数语，已经将近代的教育原则阐发得淋漓尽致。如果还要写出它的结果，非得一本书不能完成。我们的教育所根据的错误心理，现在已经遍及各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级教育都涉及了；现在还在渐渐侵入专门教育领域之中，国家工业即将受到它的危害。

## 五

我国的大学对于人在生活中的真正价值，比如性格等，向来不注重。教职人员固然不需要这个，但是其他各种职业的人却不可缺少。

英国人非常重视这一点，看他们在殖民地的设施就可以知道。在参加印度政府高级人员考试的人当中，印度人记忆力最强，考取也很容易。但实际工作起来之后，因为性格上的缺陷，他们



渐渐被辞退了。

现在引用谢莱《英国印度》一书中的一段，以证明英国人对于纯粹的知识性教育和性格培养的区别。

印度人所具有的是才能，而英国人所崇尚的是性格。什么是性格？那就是人类的纯真善良的价值。比如行事果决迅捷、不拖沓，有拒绝诱惑、试探的良知，有抵制胁迫的毅力，等等。总之是对于社会和自己的责任感。说到那些辉煌的考试成绩、诡辩一样的演说或狡黠的文字所体现的智慧，英国人则视为次要选择，仅是用在适当方面而已。劳伦斯爵士并非最有才能的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因为他有别人无法比的天才，比如正直、意志等。

至于怎么才能培养这些品质，使人能自制、守纪律，我另有研究，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 六

我们的大学用这种死记硬背书本和凭空推想的方法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这样的了，读者如果去德国的学校参观，一定会自愧弗如。比斯所著《美国教育制度》一书，我非常希望大家能读一

读。现在引用雅克曼教授的观点，也可见其大概。

美国的教育都是以个人的自主能动性为基础。学习方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授，随年级而发展，以实际动手操作练习为根据，就连文学也是这样。因为课程都离不开图画、模型一类，所以不用依赖教师的语言来传递。这就使学生能自由、自主地学习，就像课程是为他单独设计的一样。等到专门的和实验性的知识，学生都是自己在仪器中观察现象，求解原因，探究规律。其他各种课程，哪怕是最抽象的问题，也用具体的形式来表示，使学生们心手如一。总之，美国的课程都是把动手能力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据。

英国的教育原则也一样，苏格兰教育局致教师的一段公文可以作为证明：“教育的第一目的，不在于获得几种具体事实，而应注重把正确研究事物的方法和习惯植入儿童内心，使他们知晓，研究应该是个人在实验室的问题。教师的表现尚在其次。实验室的课程，教师可以先做一些必要的讲解，使学生了解他们所研究的问题。等到研究完毕之后，教师再就学生们所得的成绩加以分析，讨论学生们的不同特点，进而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教师的作用在于评判这一结果，在于指引学生，诱导学生，使学生们知道新问题的兴

趣所在，而不应仅仅陈说已有的成绩。”

## 七

这种方法并不是新生事物，各国大多已经采用。德国经济和科学的昌盛，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只有拉丁美洲的国家还是固守成法而不变。他们不能改变的原因在于，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尤其以改变教师的心理最为重要。而这些人的心理是被旧式教育形成的，产生于书本，还要受书本的引导。他们就要死在书本中了，还怎么能知道有现实世界呢？

所以想要改变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心理并不容易。他们希望大学能做到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使青年能迅速通过考试。而想要能应付考试，非得死记硬背书本不可。死记硬背的方法固然能应付考试，而事过境迁，转瞬即忘。求学之道哪能这样呢？偶尔有一两个教师知道动手实验的方法虽然不足以应付考试，然而可以锻炼思维，从而主张使用，却被大学里的管理者排挤。即便每天都提醒他们说，学生把有用的时间用在无益的死记硬背、应付书本考试方面实在太可惜了，可是这种提醒并不起作用。学生家长们的意见也一样固执。那么导致大学这种积弱的状态没法改变，到底是谁的罪过呢？

普通的小学教师们对于教育方法的意见，往往高出学院派。现在转录马恩郡小学教师联谊会的一段宣言，可以证明上面的说法。

“教授知识不是简单表述，而是使学生们有自己的见解；不是直白地告诉，而是诱导学生们自己发现；不是盲目地带着他们走，而是把要走的路指给他们看。所谓教授，不仅是教点知识，更应该使他们能观察、能思索、能自己做决定、能自主行动。”

## 八

常常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最激烈的社会党派会在教师中招募成员，从师范院校开始以至于小学都是这样。《意见日报》曾就此事发表了他们的调查成果，说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多半是激烈的社会党成员。实际上等于说，他们多数是臆想破坏社会现状的人。

这种心理状态如果用大学的主流观念加以印证，其实不足为奇。大学的死板规定是以文凭作为区别人才的标准。最低的是毕业生，稍好一点的是学士，再好一点的是博士。比这几者都高的是助教。当教师获得了这种种头衔，都以为自己是卓越的人才，自命不凡。等到发现自己并不为

人所重视，薪金又微薄，于是只好指望着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地位。然而如果在现实社会中好好看看，人品的鉴别的确不能仅凭考试文凭来区别。

尤其能够加剧这些人的怨恨情绪，从而反对社会的，是义务兵役制这一新法律。义务兵役制迫使这些人到部队服役，不得受制于行为粗鲁没有学问的部队长官。一个社会之中，如果毕业生、学士等人认为自己被愚昧的人统治，却不希望改良这个社会的情况很少。这个反对爱国主义和反对军队主义的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原本产生于大学中的上层人士，而今天则已经成为小学教师的普遍观感。

这就是教师们所以逐渐趋向于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原因。如果教育部长意志坚固，还不难预防、遏制。可是现在的教育部长是民主政治的奴仆，而小学教师们则是民主政治的主人。部长们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敢触犯他们的威严呢？平等的观念膨胀成这样，大学教育又是这种现状，真是值得叹息呢。

即便如此，我们的批评还是不能太过分。这些朴实的小学教师是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奉为经典的书本，多数是大学教师所编定。措辞

的怪诞虚妄，甚至只有宗教法庭时代可以草拟出来。其中甚至有改写拉·封丹的寓言字句的情况。《渔夫和小鱼》的故事可是尽人皆知的呀。

## 九

我阐明教育基础的心理原则的作品，似乎很受读者欢迎，从多次再版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但它对于大学教师的影响非常微小。这些人被拘束在课程中，所教授的东西自然不超出课程规定的范围，所用的方法当然也不会超出他们自己求学时的方法。

不过，普通大学中对我的观点似乎充耳不闻，但其他方面却不乏反响。我想要说的是培养未来将领的陆军大学。这个学校似乎没受普通大学的影响。之前的博纳尔将军，现在的毛德会上校曾把我著的《教育心理中的根本原则》作为教授军校军官的方法。最主要的是“教育是使自觉转入不自觉之术”一语。郭色少校所著《军队及统帅心理》一书，也是根据这一原则展开论述并出版的，现在已经大见成效。这些都足以证明，人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即使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说，也应该说出来，不要犹豫。

## 十

由改革教育制度所引发的教训不少，如果立法者是在现实经验中探求改正之道，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利益，那么差不多就可以知道一点了，那就是国民的精神是不能用法律来改造的。法律，我敢再次断言，把它用在体现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状态方面是有效的，然而它不能自己创造这种心理状态。

将来不知要经历多少次经济失败，才能明白处在科学及工业主导社会发展的时代，想要在民族生活中承担重要任务，需要几种能力。成为未来科学、工业、商业的主人，需要有主动性、观察力、刚勇果决、判断力、自制力等种种能力。这是教育应灌输给人的，我们不妨在未来试一试。

# 第三篇 民主政府

## 第一章 精英与群众

### 一

今天的社会有一种不断膨胀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恐怕某些民族将沦陷于野蛮势力之手。

智力进化产生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地位的截然不同，这是今天文化的特征之一，但却不为人所知。现在虽然也有各种平等之说，和各种并不见效的法律尝试，但智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日渐明显。因为这是人类社会自然需要的结果，是不受法律管辖的。

现在，各种专业科技的进步已经成为近代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由于这些专业技术错综复杂，非得有广泛的学术理论和实验知识，以及英勇无畏的自主创造能力才能达到。这就是精英们之所以高出寻常人的地方。领导者能力越来越得到展示，而寻常执行人的能力越来越被削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机器改良致使劳动者的任务越来越简单，几乎不需要复杂技能和知识。



阶级之间的差别日益明显，他们之间的壁垒鸿沟也日益增大。教育的力量很少有能超越这一界限的，因为它仅仅教给人一些单薄弱小的能力。那些被平等的欲望蒙蔽的人，发现精英们的出类拔萃势在难免，哪能不受到刺激进而愤恨呢？！事实上，精英们的功绩怎么能够埋没呢？科学、艺术、工业的进步，没有精英人群，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天的工人工资比百年前要超出三倍，而他们所享受到的安稳便利，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达官显贵们也享受不到的。与其说是这些普通人在为精英们劳动，不如说是精英们在为普通人劳动。

精英们的责任继续增加，他们的辛苦也随之增加，八小时工作法并非是为他们订立的。今天的各种发明和进步，全是精英们的孜孜以求、勤奋劳动才实现的。他们固然可能成为让盲目追求平等的人士受刺激的富豪，但工业界的精英们的最后结局，不外乎贫富两个结果，很少有能中和两种结果的。如果什么事都能在事前正确预料、计划、指挥，必然会富裕。然而如果稍有错误，破产衰败也会随之而来。外表看来固然奢侈，光鲜亮丽得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却需要惨淡经营。比如创办工厂并安装当时最好的机器，可一旦新发明出现，意料之外的竞争就会纷纷出现，他们不得不重新谋划盘算。有时竞争的惨烈，新发明

的迅速，甚至令企业家不敢尝试。

历史上，古人致富是让别人贫穷而自己富有，如罗马人让别人破产，以增加自己的财产。今天，人们致富则是在自己富裕的同时也让别人富有。达维内耳的话可以证明：“封建时代私人争斗盛行，人们都是破坏邻居的产业让自己富有；其后则是用所谓的公共事业消耗国家的财产，以让私人得到好处。现在的情况则是自己富裕了，邻居、国家都富裕。”

今天这富裕的源头，并不是从普通民众那里盗取，或是从国君手里获得的，而是出自科学，如取自虚空一样。一人获利，众人都可以获利。所以今天这种利，真可以称得上是“利益众生”了。

## 二

近代的文明是精英们创造的，其存在和发展进步也要依靠精英。想要解释本章开始所述的问题，需要先明白这个意思。现在说明如下。

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促使知识、能力都超群的精英们开始管理近代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政治观念的进步又赋予下层群众以民主统治的权

力。如果群众能在引导文化发展的精英之中选择代表，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解决。只是他们选择精英的情况并非常例，以致精英与群众两不相容。承认精英的必要性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然而却并不为人所接受，这种不协调从未如今天这么明显。在资质超群的精英人群中，也有贫寒不为人所知的人。这时候，精英与群众还能相容。至于工商业中的精英，往往因表面的奢华而常受社会法律的苛刻对待。这些法律是群众代表所制定的，用以剥削精英们的财产。这就是今天这个社会存在阶级差别和冲突的常见情况。

精英们是国家生存必不可少的，而多数劳动者又想要摧残他们，就像古代的蛮族要摧残罗马一样。那么如何使这两种人相安无事呢？问题固然难，但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考察历史的教训，群众虽然表面看似具有革命的本能，然而实际上是最保守的人。群众常在破坏之后，又重建他们破坏的事物。所以那些扰乱社会、专事破坏的人，其实并不能长久改变一个民族的进步过程。只是如果破坏太多，那些毁于一瞬的东西，再建设可能需要数百年。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应当首先避免破坏行为。

避免的方法非常简单，限制人民的权力就行了。但观察一下各国，民主已经成为一种需要，

所以反对之说很少有效果，想要限制它也不容易。既然不能避免，就应该寻求适合的方法。所谓适合，就是让精英适合民主政府，对那些怪诞偏执的思潮因势利导，就像工程师筑建堤防以御狂澜一样。

从理论上说，赋予平民以主权这一说法的不合理性，与宗教理论相同。前人已经生活在宗教之中，今天人的生活也大多不离开宗教。从历史教训来看，人类适应荒诞，比适应理性更容易。但换句话说，其实是二者都可以适应。

从实际情况来说，如果没有那些空想政治家把错误观点和怨恨情绪植入工人大众之中，那么让精英适应群众并非难事。

这种错误和怨恨是双方对抗的依据。想要消除这种对抗，需要等待群众自己觉察出真正的利益所在——精英的绝迹或衰落会导致群众自身的贫苦落后。

让工厂没有资本家管理，一如工团的想法；或者把工厂交给政府的代表来管理，放在百年前科学技术以及各种专门产业不发达的时候或许可以试行，但今天这种组织是不能实行的。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无法使群众明白。社会党的成员

们置身于现实社会之外，每天都生活在幻想之中，以传播空想学说为事业。现在引用1910年2月社会党大会中，某位工人代表所主张，而且经众人赞成的说法，以证明这种行为的荒诞。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们获得解放，那就是用全民的产业代替资本家的产业。这些产业都由你们来管理，使你们由薪资的奴隶变成自由的联合的生产者。”

工厂由工人管理，犹如没有船长的船被水手驾驭，仅能短期支持。工厂被国家代表管理，或许可以多坚持几天，但如果代表不肯改变，那么经营的退步指日可待，工人工资也将随之减少。

这种道理浅显易懂，我国的数百万民众却似乎并不知道。然而在外国，这个道理已经渐渐传播开来，尤其以英、比两国明显。因此这两国的社会现状才没有出现如拉丁民族社会的激烈形式，也没有爆发阶级战争。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能完全理解，可见在民主社会实行新的教育的必要性。新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明白知识、资本和劳动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等待这项改革完成之前，我们应当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并先学着认识他们。

我们应注意的是，平民政府并非就是平民统治，实际上是领导者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只能接受领导者的意愿，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一味地接受顺从之后，群众就会像被催眠术控制了一样，把领导者的意志激烈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舆论运动。

群众从来不曾自己创造出这种运动，而仅仅是给予这种运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推动力而已。当西班牙人费雷尔执行死刑时，巴黎人民还不了解这个人的品行。几名领导者率领数千人攻击西班牙大使馆。群众并不了解这件事的原因经过，但被演说鼓动，变得激烈起来，开始暴乱，抢掠杀人，无所不为。当时的领导者们都很惊惧，于是下令改在次日进行和平游行。结果，这同一拨群众，昨天还暴烈到极点的人，第二天却表示出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温和。

如果管理群众的方法得当，群众全都会极端顺从。这个办法，今天的著名领导者没有不知道的。

由此可见，群众统治是一种表面的民主统

治。今天的政府其实是少数领导者的政府，离真正的平民政体还很远。

舆论既然是领导者们所造的，我们就应该知道他们的创造方法。这样，群众心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这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的必备知识。15年前我已经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首先著述《群众心理》一书。而今天，探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就多了。

这里我无意历数群众的性格，只列其中较为重要的，在最近的时事中有所表现的而已。

列举之前，我要声明的是，《群众心理》虽然被陆军大学采用授课，但政客们还不知道呢。这些人天天矜夸群众的温和、群众的判断、群众的良知，其实这几点都不是群众的性格。群众当然有时表现出值得称赞的美德，如为某某理由而牺牲，但他们从来不能做出判断。历史经验就在那里，不信的话可以翻出来看看。

我们的立法者误解了群众的心理状态，以为群众知道感恩，知道以德报德，于是特意订立不起作用反而有害的法律来讨好群众。殊不知群众深深鄙视懦弱的人。因为他们一经威胁，就开始退让，无异于自己夺走自己的名望。订立这种法

律的结果，只是让领导者们知道可以用武力威胁来迫使他们退让。所以，当订立铁路雇员养老法，给予铁路雇员以军官、法官相等的养老金之后，这些人知道可以用威胁来达到目的，于是又群起而要求增加工资。这个要求必然会得逞，这还用怀疑吗？

现在想要论述的，是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的差别。他们的思想方法、行为方法以及利益都有区别。

群众的性格不能一一列举，但应该知道的有这样几点：群众没有理性，追求简单，容易受到感染，盲目轻信等。想要让自己在观念上接近群众，必须使用简单的可以用意象比喻的话。如资本家就是懒惰的，大腹便便的，吸工人血汗的中产家；国家就是宪兵和军队；教会主义就是教师的政府；社会主义是让资本家认错，并让工人不做事就能生活的政府，等等，这样的话。

政客们都知道群众不能同时理解几种观点，也不明白激烈语言的功用。所以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常用一种所谓选举跳板达到目的。如把教会的几十亿法郎、教会的危害、所得税之类的内容互相援引，以引起到说服的作用。



英国人对于这种方法运用得更加巧妙，常使用一些容易留下印记、容易感染人的比喻。他们最近这次选举，足可以证明简单标语口号的力量。英国人选举的时候，标语贴得到处都是，但看不到类似拉丁民族竞选者的连篇累牍的解释。把党派的全部政见统一起来，用几句凝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比如投票给激进党，就是投票给反对英国海上霸权的行为等话语。我们都知道英国海军的强大，英国人视海军为骄傲，崇奉海军如宗教，一旦听说有人要遏制海军，自然反对。

画家的力量尤其能增长这些标语口号的气势，暂且举他们对选举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一种绘画，可见一斑。画的左面仅仅写着“1900”，下面则画了一艘大战舰，比喻英国海军，旁边画了一只小船，代表德国海军；画的右面，也仅仅写着“1910”，下面所绘的德国战舰，几乎与英国大船相同。看见的人就知道英国的祸患已经在瞬息之间了。这资料的真伪没有人真会去检查。因为想要检查事情真伪，就需要各种知识以及推论、评判的本事。而这种能力正是群众所缺乏的。

这种方法的运用，大体上是根据普通人群的心理知识，如易感动、轻信、需要反复说教等，这些都是应该知道的。至于英国选举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议院里两党人数势均力敌，不分伯

仲，这是因为竞选双方都知道使用这种方法，用的是同一种兵器，所以都不能见效。

因为群众容易感动，容易盲目行动，所以想要操纵他们很容易。群众会因一时冲动而把某个人推举到殿堂上成为英雄，也可能因一时冲动而把他投到塔尔皮亚岩成为罪犯。罗伯斯庇尔失势之前，被巴黎平民崇奉为神，可是他上断头台时，追着他的车欢腾咒骂的也是同一批平民。

马拉的遗骸被运送到先贤祠时，群众的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数年后，同样是马拉的遗骸，又被同一群民众丢弃在沟渠。克伦威尔也曾受到同样的待遇。

群众是如此不可理喻，所以领导者就应该利用那些能够让他们兴奋感动的事情，来让他们产生情绪；如果对手也是用同一种方法，那么只有获得呼声最强烈的人能取得胜利。

激烈行为的必要性，在英国最近这次选举中已经体现出来。英国的部长们向来以循规蹈矩著称。可是他们对群众发表演说的时候，却用革命时期那些激进派的口吻不停地诅咒诋毁对手。劳埃德·乔治对公共演说时称上议院是“把可怜的懦夫集成可悲的无能者，既没有良心做善事，又

没有勇气做坏事”。类似的毁谤词句，各部长常用。

研究平民心理应该注意的是，相信权威以及一种下意识的推卸责任，使得他们易受刺激，同时还有一种自尊心。近期发生的事情，经过本书列举证明的，已经不少了。

无论群众的感情是哪一种，在程度上常常是过度的。群众的自尊心过度就不用说了，而他们的卑微服从的态度也是别人不能比的。如果遇到有名望的人，这种状况更明显。我们曾经说过，革命委员会的荒诞、苛刻的命令被各个工团小心翼翼地奉行。

这种群众的心理状态古今如出一辙。1790年德国人康帕在笔记中叙述了群众的自尊心和自卑感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就可以证明。笔记所述的，是国民会议中塔吉特宣读《请愿书》的情形。

塔吉特激情朗读《请愿书》：

“国民会议谨……”

下面呼声和蹬踏声四起：“不用‘谨’。不

用‘谨’。删去这个字。”

“.....呈于陛下之足.....”

骚动、呵斥、拒绝的声音更大了，墙壁都在震动。

“最憎恨‘足’。国民会议无论什么都不能在人脚下。”

塔吉特非常狼狈，做出无奈的神情，接着读。

“‘国民会议与陛下’.....”

叫好之声四起：“.....‘贡献’.....”

反对的声音四起：“不用‘贡献’。”

.....

当天的会议情形始终这样。这个德国人既恐惧又失望，于是离开会场。次日又去凡尔赛宫，看见民众向国王送呈《请愿书》的情景，突然觉得心中大快。昨天那些尊严不可侵犯的立法者，一看见路易十六出现在门廊下，立即全都变成狂热敬慕君主的人。昨天最傲慢的人，现在却或者

跳在桌子上，或者攀附在柱子上，或者踮着脚，一同赞赏说“这是位仁君”。“伟大国王万岁”的声音震动整个宫殿，然后民众就恭顺地跟随在国王身后到礼拜堂去了。

## 四

群众的缺点固然如前所述，但也不要忘了他们的优点。由于他们不会逻辑推理，所以利他主义非常发达。这是社会的美德，对社会颇有好处。那些知道按照逻辑研究推导事物规律和本质的人，常常存有自私自利的心，很难决定为公共利益而牺牲生命。只有群众才有这种克己奉公的力量。即便一件事看起来很虚妄，也常见有千百人冒死进行。大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多半得益于群众的协助。群众固然不能创造文化，但可以凭借着勇敢、忠诚、顺从的特质保证文化的存在。

群众心理的特性还有轻信。他们轻信的无限度，就像儿童一样。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没什么东西是得不到的。如果群众想要得到星星月亮，你也要许诺给他们。政客们向来拒绝这种许诺，但在选举中不妨诬谤对手，群众常信以为真。但你不能诬谤对手犯重罪。如果这样做，不但不能减少对方的价值，反而会增加

群众对他们的感受。大概是因为群众对于重要的罪犯，常常怀有一种敬仰吧。

无限度的轻信不全是群众特有的感情，我们平常的心态也是由轻信构成的，还没有谁会以怀疑为基础。我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物的了解具有一个限度。一旦超过这个界限，我们便表示怀疑。但千万不要相信怀疑论者的学说。这些人只是改变了人们所信仰的东西而已，如用空想的天堂代替神话故事中的天堂，用稀奇古怪的东西代替宗教神明。

群众的轻信与原始人的轻信几乎相同。制造传单广告的人明白这种心理，更明白承诺和反复诱导的作用，所以常常赖以获利。比如正是凭借广告的作用，很多制造虚假药物的人都变成了巨富。

如果在广告的诱导性上做足文章，向那些思想简单的人传递可以获得重大利益的信息，那么所得的利润尤其丰厚。无数财政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广告编辑都不用想象，只要在同一事情上做出相同的承诺就行了。《环球报》所载的关于阿根廷从没存在过的某股票的历史，可以代表同类问题。他们每六个月发布数百万传单，不停地说马上有巨额红利要分配了；又说如果这

时购买股票，将来价值应该增加十倍。小资本家信以为真，唯恐失去机会，纷纷争相购买。所谓的红利是不可能得到的，这还用说吗？但五年间，这件事没间断过，因这种充满欺骗性的广告而获利达1200万之多。其实股票的实价与纸价相差不多。

同样的事情非常多，列举不过来，姑且就同一报纸所载的内容加以论证。

储蓄者的轻信无法估计。他们不问证据，也不问真假，只相信听到的许诺和断言，只听凭虚假迷惑人的宣传愚弄。对方手法越是拙劣，他们越会相信。即使这个希望明明没有用，明天就足够证明它是虚假的，他们也不管不顾。

把这种情况推及政治领域，就可以知道某人和某种政策得以成功的原因了。许诺一些妄想的东西，给群众无法证明的承诺；而对于对手来说，这又相当于在增加竞争的成本。这是很有效果的方法。

我们虽然都处于普遍的轻信当中，但也不能说绝对有危害。因为文化的原动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轻信，值得欣慰的强大宗教及强大帝国才能成立。因为有了这种有

益的轻信，维持国家长久盛世的习惯才足以保持。国家的信仰，理想的信仰，未来的信仰，这些心理生活的主要因素，都靠轻信维系着。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会失去精神动力，社会关系也会随之被破坏，国势自然日渐衰微。所以那些怀疑主义者，其实是加剧本民族衰落的工具。

## 第二章 怂恿之源

### 一

在民众势力得到扩张的情况下，政治事变往往发生迅速，这是公众和政治家们所不能预测的。事变发生的迅速，土耳其革命曾有所体现，用时数日便推翻了数百年政府的邮政员工罢工也体现过。他们的罢工宣言都是在最短时间内发布。西班牙巴塞罗那之乱，和平市民都变成杀人强盗，焚烧修道院、教堂，挖掘坟墓。

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爆发，如果用理论来解释，是不能说明真相的。想要探究原因，必须撇开理性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只能让我们自己空想事变发生的原因。

这种种事变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产生于不自觉的情绪，同时也有规律可循。根据这个规律追



寻探究，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有一件事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那就是这种倏然发生的变乱，常以领导者的煽动蛊惑为起点。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人是怎样行动的。他们的行为，从我们的理性评判而言，实在是值得蔑视的，但为什么却能这样迅速扩展开来呢？

## 二

童年时，我在外省一座小城的大街上得到一个心理教训，至今不能忘，并且花了30年的光阴才找到答案。

让我记忆犹新的不是教训，而是送给我这个教训的人。那个人穿金戴银，不是伊朗的高官，就是亚述的州长，或者印度的贵族富商，具体身份不好判断。他的马身上也有名贵的装饰，他驾着古式的车，车上设有宝座。这个人后面站着两名武士，兵器耀眼。长喇叭中发出响亮神秘的呼声。四周围观而且敬仰的群众越聚越多。这个人忽然举手一挥，四面俱寂。他于是起来向众人宣告。群众也俯首聆听，没人敢喧哗。他所说的是什么事，我离得太远，没能完全听清楚。只知道他来自远方，用廉价的药饵救治一切疾病痛苦，保证人人幸福。他刚说完，喇叭声又响起来。群众目眩神迷，竞相购买这灵丹妙药。我当时非常

想学大家的样子，只是苦于兜里没钱。这件事后来尤其增加我的悔恨的地方在于，据说这种药粉治病非常有效。但也有本地的药剂师说这药盒里装的是糖。然而，一个寻常商家与身穿华服又有武士随侍的僧正相比较，说出来的话当然无足轻重。

随着时间流逝，我在学校学到了一些没用的知识。我还记得师长们教过我的，构成我们的信仰和领导者行为的，是出于理性的理论。但这个僧正的神药的功效，我还是没忘。为什么书中所讲述的，和我眼中所见的迥然不同呢？既然我们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而这明显虚假的药粉却能治疾，那么它的威力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几乎无法解决。思索时间长了，才领悟出，这凡夫是知道运用产生自民族生活和历史的根本原动力。他所卖的，是引导世界不灭的无形元素。这元素就是希望。一切宗教的主教、各时代的政客所卖的，和这个有区别吗？

这个人能够成功地推销自己，是复制了宗教创造者的故事，依靠四种重要元素来加固围观者的想法。这四种元素，第一个是可以诱导、强迫民众想法的声望，第二个是没有证据的承诺，第三个是让人相信的反复灌输，第四个是使人的信

念由弱变强的精神濡染。这四者是怂恿宝典的四项根本元素。如果理论家告诉你们说，理论应该在其中，尽管由他们说，你不必相信。

这些元素，无论何事，无论何时，都可以使用。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江湖术士，可以用它们来卖药。你如果是个地位卑微的投资人，可以用它们来卖廉价债券。你如果是强国的皇帝，也可以用它们来让你的民族、你的百姓做出重要的牺牲以建造海军。

这种怂恿的元素，只能用在情感上。实际上就是用在我们的行为习惯的起因上，对于智力来说则不起作用。如果教师或学者想要讲解一种试验，就不宜使用。因为通常这些听众是要探究客观知识，而不是为了追求信仰。

知识和信仰二者有区别。从前柏拉图已经说过它们建立方法上的差别。一个人竖立信仰容易，探究知识则很难。知识含有证明、阐释和推导的过程，而信仰则不需要。怂恿宝典的重要元素只在于一点，那就是能适用于创造以情感为基础的意见和信仰。这种意见和信仰，引发了我们大多数的行为。谁能创造它们，谁就是我们的主人。

如果演说者针对听众的智力方面演讲，必定没人相信，也一定没人愿意听。只有用动作、口号和活灵活现的词语，才足以影响听众的感觉，进而影响他们的意志。

能让群众有所行动的方法，已经在前面详细论述。但还有一种个体具有的元素，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元素颇为复杂，合在一起说，就是诱惑。

演说家中善于使用诱惑手段的人，出自个人魅力的诱惑，比言语方面的诱惑更有用。听众的精神犹如古琴，每一次响动，演说者都能知道他们的声调，揣测着应该说哪些话，以及如何说话。至于庸常的演说家和胆小的政客，只知道一味谄媚取悦，盲目地奉承听众的意愿。但凡要真正操纵人，就先用诱惑。群众或女子一旦被诱惑了，就只有一个意见，那就是诱惑他们的人的意见；只有一个意志，那就是诱惑他们的人的意志。

诱惑者似乎具有神秘的吸引力。一旦有了这种力量，只要简单下定论就足够了，不用再说什么是大道理。至于大演说家在发表演讲时，有时会做一些明显的解释，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文字的怂恿方法，与言辞怂恿方法区别很大。不过即使是

这样，个人巨大的声望也还是能在文字中体现出来。大著作家卢梭等人，并非是靠着最平常的论据说服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声望足以使人信服。

诱惑者只有一个劲敌，就是深深印刻在听众心中的信仰。如果这种信仰侵入智力、知识层面，那么一切接触到它的事物都会被粉碎，信仰就像是一堵墙壁，不能越过。

磁石的吸引力固然通常都够用，但也不是常常够用，还需要其他性质的辅助。这也是演说家需要考虑的。现在就次要的善于言辞这一项来说一说。语言想要怂恿人，需要先表达思想，并且能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听众，然后让周围群众一起感动。让听众听从摆布之前，要先与他们一同感受。这就是安东尼所做的。他在恺撒遗骸之前发表了一通最机敏巧妙的演说，这个演说在刹那间就使得那些对刺客表示同情的听众，变成预备报仇的人。

无论寻常群众或是精英集会，这种怂恿的元素都有作用。先揣测听众的思想，然后顺从他们的思想，接着使他们反过来服从你的思想。

关于这个原则的功用，塔迪厄的著作所述的当代大演说家之一，当时的德国首相布洛的事

迹，可以证明：

政治会议中，演讲技巧的精要在于觉察听众的期望所在，如果演说的一方和听众的思维能相互接触，就会稳操胜券。布洛是精于此道的人。他对于听众情绪的应变能力无人能及。他演说中有应付、讨好时人的话，曾再三宣称德国的发展以及值得骄傲的地方，如“德国不愿被其他国家踩着走。……德国不愿旁观。……德国不愿孤立”之类。这固然是人们寻常习用的话，但常用的并非没有道理。他知道议员们多半是庸庸碌碌又自负的人，只有这种常见的说法才能取悦他们。他操纵公众情绪，犹如操控一盘棋局。

群众的轻信无度，前面已经说过。所以他们被人诱导而相信遵从的那些观点，势力并不大，因为这种信仰不能持久。历史中的少数时代，牢固的信仰可以保持一定时间，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和革命时代中，信仰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今非昔比。那些苍白无力的革命社会党人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人敢大呼小叫，却在群众面前畏畏缩缩，还怎么能激发群众，煽动他们行动呢？

领导者的任务，在各个时代都已经有明显体现，人们也早就已经知道了。但心理学家们的解

释并不充分。如果想要充分地加以解释，非得在意识范围中探究不可。这大概也是我们的行为原因和思想形式发生变化的地方。

这个意识范围非常神秘，往往有很多事情发生，即使动物心理也是一样。引领我们接近这个还不可知的领域，科学仅仅能够观察表象，还不能深入内部进行探索研究。

这个领域既然不可知，那么我们就应该探索、观察那些最容易的事情。关于怂恿，我已经举过几件事做例子。当然只是大略举例，因为如果要每一个都举到，非得写成一本书不可。环境的怂恿、报纸的怂恿、各个委员会的怂恿、个人利益的怂恿……可以引起心理学者注意的内容非常多，但还没有人进行具体研究。探讨这件事，比讨论康德等人的各种理论，或者讨论宇宙本体更为有用。不过，讨论起来也更为困难。

加固民众信念的重要元素，还有精神濡染这一点不可忽略。这是骚动得以扩展的根本元素。邮政员工的罢工、巴塞罗那之乱，都由此而起。

这种骚动是领导者们所倡导的。最开始是因为公众的不满情绪，让群众对这种骚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容纳；接着就用濡染这一武器，使

群众处于骚动情绪的包围之中。

濡染的责任非常重要，大多数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是因为这种元素。没有它，无论多大的信仰都不能成立，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不能传播。而所传播的，其实只是精神濡染，而非理性。

大革命时期的舆论运动，以及构成一个时代精神的众多事件，都是借助这种精神濡染得到扩展普及的。处在今天的环境下，濡染的行为尤其重要。因为群众的时代已经到来。

### 三

想要鉴别群众及个人行为真正的起因，就不要忘了情感和客观知识的差异性。研究二者的规律互不相同，所以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观点多次成为我写作的指南，哲学家黎波也在他的书中反复论述其重要性。

即使这样，现在的人还是固守成见，用客观知识来解释情感，以致二者混淆难分。我们只好另辟蹊径，将纯粹的情感现象单独提取出来。应该牢记的是，客观知识的理论与情感无关，也不能用它来解释由情感引发的行为。



那些博学的作家深受严格理论的教诲，所以他们建构历史时，纯以理论为材料。殊不知影响民族前途及其文化的重要事件，都是由心理原因引发的。换句话说，大事变的发生是非理性的。理性创造科学，而非理性创造历史。

### 第三章 工人的心理状态

#### 一

我不愿意掩盖、忽略近代心理学者们所进行的有益的新探索。能够仔细观察两栖动物和蛛形纲动物，当然是因为他们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但我常常不理解，这些心理学者为什么不去研究社会生活中每天都能见到的事物，探究它们的原因，或许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规律。这功绩不是更大吗？

可供观察的事物很多，至于它们常能令人惊讶，则是因为近代的心理学还没有提供确定的规律。

德拉韦伊城的叛乱及类似事件，都是不可预料的平民骚动。事件突然发生，常让人惊愕。大概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明白民众心理需要发泄。人们都记得德拉韦伊城的民众接受劳动联合会的命

令，持械暴乱。军人为避免被屠杀，只好被迫自卫。结果则是大多数工团加入劳动联合会。活版印刷工人罢工，以阻碍报纸出版；电业工人罢工，巴黎城一夜无光。

这些事件，没有研究过平民心态的人，是无法做出解释的。而事发之后政府采取的笨拙方法，又可以证明向来自称明白事理的人，也不了解群众心理。

德拉韦伊事件的表现颇为特别，因为这件事之后没有产生任何异议，错误都归咎于其他方面，而道理都归在这一面。也难免要对违反法律、激烈攻击保护私产的军队的行为进行惩治。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政权，都应当尽自己的职责。

由此可见，政府方面的理由很充足，但工人们却愤怒地责备政府。这是什么原因呢？答复这个问题之前，应当知道群众是服从煽动的，讨论他们行为的动因是否合理，并没有什么用，应当从深刻影响民众内心的方面来认识。

想要知道动因的力量，需要思考一下幻想对于平民精神的影响。不认识它的效用，就是不了解历史。当一连串事故频繁发生时，理性的作用非常小，而幻想的力量非常大。千百万人常因为

尽忠于幻想而死，强大的帝国也凭借幻想而建立。

现在，虚幻声望的力量比之前更大。群众之前就受到虚幻想法的迷惑，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只是这种虚幻的想法改变了说法而已。

## 二

研究工人的心理状态之前，应该先将群众共有的普通性质说明一下，然后再论述工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群众，不必非得是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当报纸、电信等媒体发布了带有诱骗性质的信息，即使是互相隔离的人，精神也可以相通并联合起来。群众既然是互相之间有联系的，于是产生了一些性格，如刺激性、没有恒心、愤怒、轻信、没有一点鉴赏评价的能力、没有受理性影响的能力、崇奉某一人物如同偶像、有服从主人的需要，等等。他们最激烈的举动常常是被几个领导者煽动的结果。群众已经准备在暴君面前跪倒、拜服，只是这暴君常换人而已。这种情况，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塔尔德说：“群众之间的相似性是有一定痕

迹可循的，如非常不宽容、可笑的自尊、病态的轻慢恶毒、完全出自幻想的毫无责任感的狂热、互相影响产生的无限制的冲动情感等。或崇拜，或憎恶，或颂扬，或嫌恶，或者高呼万岁，或者诅咒亡灵，群众真是不知道平和中庸的道理。”

这种心理特性在民众的大型运动中常能见到，德拉韦伊骚动就是一个例子。工人们服从几个领导人的命令，猛烈攻击军队。军队的反攻，反而激起全法国工人界的公愤。这些人与其他群众相同，大概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应凌驾于法律之上，于是和这些聚集闹事的人集合在一起痛骂政府。政府的罪过，大概只在于没有让军队放弃防护坐等屠戮了。斯达尔夫人说得对：“群众自负心理的刺激，是死亡的必要条件。”

至于群众盲目听从领导者的命令，不但能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时见到，变乱被镇压之后又相继发生的两次罢工，也可以证明。活版印刷工人的罢工是想阻碍报纸的出版，但罢工的目的仅达到一半，因为领导者们互相商讨，不能果断地做决定，以致延误了时间。至于电业工人罢工，成绩就很大了。因为命令是在最后时刻发布的，不再等待讨论，只是强迫各处实行。每个工人都接到如下的严格命令：“委员会命令一切工团成员于1908年8月6日星期四午后八时停工，只能在

十时开工。署名P。”

P先生被大家服从的程度，即使如俄国皇帝或其他的独裁君主，也比不过他。或许只有高僧可以与他相比，因为他是神的化身，权威很大。

报纸对于这种独裁者的宣言，也谨慎地加以登载了。据报纸所载，P先生是反对军制的人。他蔑视政府，并严厉谴责国王，不许国务总理用军人代替电业工人，并称将要颁布法令加以告诫，等等。

这位蜉蝣式的有权人，把总罢工当作神杖一挥，工人们就被他利用。他的权力固然大，但我有一句忠告：千万不要以为权力大就可以倚仗。这时民众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其他人也能加以利用。群众固然容易服从，但也是善变的。所以没过多久，这位P先生就被群众遗忘了，遭遇和南方叛乱的首领一样。为他着想，可以努力争取去一所大学的实用心理学专业任教，把他操纵群众的权术，教给各政党的政客和工人领袖。因为这些人对这一方法都很无知，而他正好精于此道。

为什么说这些人不知道操纵群众的方法呢？我是从联合社会党在德拉韦伊事件后的宣言中看

出来的。这些人虽然被工团联合会的领导者鄙夷詈骂，却还是不知羞耻地表示说：“与罢工和奋争中的领袖、各工团同心协力，今昔如一。本党参与群众团体的一切行动。”这无异于某报所说的：“把自己的威严和权力送给了劳动联合总会的领导人。”这种奴隶心理，可能由从前教徒服从教皇的精神而来。但把这二者相比较，我们更看重那些服从教皇命令的信徒，而不看重听从罢工领导者召唤的政客，因为前一种人不是图谋私利。

如果不了解宗教精神的威力，就不能明白那些聪明人为什么与闹事者合谋屠杀军人，为什么要让报纸停刊，为什么要让公共生活停滞不前，也就不会明白那些如罗马皇帝尼禄、黑利阿迦巴鲁斯一样想不到的新奇事情。

这些人能从卑微无耻的服从中得到什么呢？只能换来他们愿意服从的主人那明显的鄙弃表情而已。

社会党议员固然不明白这种心理，那些维护社会秩序的人的见解也十分可笑。报纸所载的某位温和派议员的意见，说德拉韦伊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表决工团所要求的法律不及时。猜测他的意思，似乎认为西部铁路收回之后，应当迅速颁

布所得税法，把公民的私人财产状况公之于众，好让社会掠夺。总之，议会对于革命工团的命令，是无条件服从。其实工团已经表示出轻视改革的态度了。而政府仍然不断服从、永远服从。恐惧心理的力量，已经这样危险了。

想要详细讨论恐惧心理的结果，可以在电业罢工的第二天，到国务总理那里看看。当天，总理把巴黎六位电业段长召集到自己家里，商议善后方法。一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不能听命于少数的工人团体，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总理劝他们开除工人，用工程队的军人代替。六位段长中，只有一人赞成，其余五个人宁可服从工团领袖的命令。

群众所蔑视的是懦弱，所敬佩的是刚强。历史中从来没发现有凭借怯懦震慑别人取胜的现象。其实更换电业工人非常容易，各段的机器都是自动运行，工人的任务非常简单，无论什么人，只要简单学习就都能操作。对于电业段长的懦弱，各大报纸莫不责备。《时报》说：“自从社会发生变乱以来，衰弱的征兆，没有比这次更过分的了。革命派的放肆态度不足担心，需要担忧的地方，是任何方法都不能治愈的怯懦。政府想尽到自己的职责，而职员却不想给予援助。不愿意帮助政府，却愿意受工团打击。”

如果私营业主们不愿意自己多加防备，不知道好好利用平民心理，他们被赶下台也是指日可待了。

### 三

工人的心理状态，除前述的普通性格外，还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原本产生于一种小观念，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固定理论，基本上靠反复说教和濡染两个办法形成。

这种观念很简单，也很错误。劳动联合会的宣传人员用下面的说法表达。他们大致认为：“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利益却不属于工人，而属于那些没有创造财富的人。”想要纠正这不公平的地方，应当为工人破坏现在的社会。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固定的便于资本充公，以及能用公共计划改造社会的团体。”

现在委员会所用的方法，就是命令工人屡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使企业的利润逐渐减少，直至消失，运动才能停止。这种运动不断扩张，在旧的企业中进行很容易，因为旧企业的管理者既威慑于运动的威力，又不顾股东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断退让，直到利润降至零才停止。也就是说，将来股票的价值，也要减到同一数额了。



由这种状况引发的明显结果，则是新的企业寻求投资人的困难。股东们已经处在这一境地，当然必定会向外国公司投资。货物在外国生产、在法国出售的名单已经很长了。工人没有远见，只顾眼前利益，顽固不化，非得要在已经衰落的道路上行走，这跟杀掉一只产金蛋的鸡有什么区别？

这种工业界发展的趋势是在走向深渊，而现在情势更加紧迫。这是由那些一知半解的制造混乱言论的学者的愤怒诽谤所导致的。这种学者，自负于由背诵书本所获得的文凭，自认为应该享有高尚地位。但社会并不重视他们的才华，所以他们诅咒诋毁社会。还有比他们更不懂引领当代文化的实际状况以及经济需要的人吗？

工人们已经被这种大学生产的降级者误导，确信自己是最不公平的制度的牺牲品，于是不免偏向于闹事这种方式。这是平民最容易产生的幻想。最寻常的手工业者臆断自己的收入与付出不相当，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攫夺。却不知道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农夫、工业家、工程人士、学者，等等，总之是工人以外具有能力的人。手工劳动当然足以对机器工业有所帮助，但近代工业技术不断进步，使得手工操作日益受到限制。电厂的工作只要少数工人就足够用了。这一点前面已经

说过。大部分工业，如汽车工业之类，工人手工劳动的价值仅占制造品成本的五分之一，那么手工劳动的报酬还不够吗？如果与中产阶级中的无数法官、医生、工程师、律师、官吏相比较，他们二十年的劳动收入，还有不及工人所得的。何况还有培养这些职业的教育费用，成本可不低呢。

巴黎的多数工厂中，姑且以前述的汽车厂的工作为例。手工劳动的最低工资，每天已有六法郎。这是大学中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当助教的薪金。而工厂中的熟练工人，日薪还有达到十三四法郎的。

在平民的幻想中，有一点是希望人类能在知识、智力水平上平等。他们认为工厂管理者收入过多，认为平常工人管理工厂或公司，和有学识的人是一样的。其实工人们已经有过这种经验。在能力方面的不足，他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工人们自创的企业做出成绩的，是可以数得过来的。

这种嫉贤妒能的心理日渐普遍。大城市如布雷斯特、第戎、鲁贝、图卢兹，大多选举普通工人、车站的运输员、庸庸碌碌的人做市长和市议员。其结果的危害性，尽人皆知。财政大量消耗，政府组织被迅速破坏。所以改选时，人们都

尽力摆脱、清除这些人。

其他各地也得到同样的结果。阿尔萨斯·洛林的最近一次选举，在斯特拉斯堡、米卢斯两个城市都不再用工人。在米卢斯，出于行政混乱局面的考虑，市会议员改选时，竟然没有一人再重新当选。

民族只有接受经验教训，才能发现错误。经验虽然足以让人破产，但有时也应该推行。因为它有危害，同时也有好处。如果使法国全国的自治区全被社会党派的工人统治，必然会让全体民众产生对社会党的最深的厌恶。到那时，群众或许就能知道不平等是自然条件决定的；知道实际能力是最大的权威，是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根源；知道实力只属于具有高等知识的少数精英，如学者、工业家、艺术家、工程师、被选拔出来的工人等。更需要知道真正的资本是智慧，并不是那些只知道幻想的愚夫所能攫夺的。

## 第四章 平民思想的新形式

### 一

就目前的结果所见，邮政员工的罢工与其他罢工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就远因观察，这件事是

民族历史变革的一个新现象。

一个社会将分化为无数个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只有爱本团体的心，而没有爱国心。如果有利于本团体，即使牺牲大众利益也不管。邮政员工的罢工已经证明这种小群体分化的开始。他们对待社会的其他人，就像对待围城中的人，务必让他们与外界断绝关系，忍受饥荒。即使因为这种公共生活的停顿导致社会的衰败，他们也不管不顾。

这种以团体自私心理代替大众利益的事情，大多数外国人都感到惋惜。英国最重要的报纸《时报》说：“观察现在的罢工，表明法国国民的生活已经陷入一定的险恶状况。真令人惋惜。”

如果欧洲现在的恐慌可以由战争顷刻间解决，那么法国的军事力量恐怕会在几天之内被消灭。真这样的话，那么一种可怕的灾害将不可避免。

当此危难之际，一部分政府官吏却不忧虑，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常识，或者是没有哪怕一丁点的爱国心。

一部分公民对于大众利益的蔑视，是这次罢工所得的教训之一。同时还有其他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突如其来，是社会新力量形成的结果。它在暗中发生、成长、壮大，人们都看不见。等到这种力量自认为足够强大了，才在盛行于议会的国家主义面前挺立起来，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获得成功，以此来表明它足以承担责任。

这种让人猝不及防的势力的增长，不只反对国家职权，而且也反对社会党的势力。社会党还在庆祝这次罢工的成功，真是盘算错了。

邮政系统员工的罢工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国会逐渐失去民意，只知道订立没有意义的法律，苛刻地对待全社会的民众。

人们大多知道邮局女员工到教堂做弥撒却被政府免职，大家都为这件事打抱不平。所以公众对于罢工者表示同情、接受，跟这件事未尝没有关系。

这种平民意愿的新变化，把我们带进一个混乱倒退的时代。大革命时期曾经用自由的个体代替团体，现在团体又得到重建；当时也曾经废止

人头税，以避免纠察；而现在纠察也恢复了，比从前的宗教苛政还严酷。旧日的苛政，现在都逐渐复苏，只不过是改变名目罢了。将来民众唯一的自由，恐怕只有怨恨我们现在的做法而已，工团管理下的政体不会容忍其他方面的自由了。

这种罢工发生得突然，又缺乏理论基础，足以证明它发源于群众的一种新的心理状态。发布罢工宣言时，邮政员工自己都很难明白其中原因，这从他们的宣言中可以看出。1909年3月19日《晨报》所载的罢工委员会中央会议的宣言说：“我们向来不把罢工当作保护职业的方法，这次罢工，是因为邮政部副部长塞班对我们女员工的侮辱，所以全体人员都抱不平。”

显然，把这当作让一个国家的生活停滞的借口，罢工的理由不充分，邮政员工们不得不再寻找其他理由。于是他们找到增加个人福利这件事。所谓增加个人福利，也不过是把每三年自然晋职这一期限，提早三个月而已。这个理由也不充分。所以，实际上罢工是另有原因的。

邮政员工的地位特别高，15年来，自认为已经是选举活动中的主要力量，他们所提的要求，没有不被满足的。他们的薪水比大多数官员都多，也比大多数工人优厚。而他们所接受的教

育，仅仅是初等教育；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又比其他人的简单。

指挥罢工的人，年薪有6000法郎。即使成绩考核中最不好的员工，45年后也能有4400法郎。参与游行的员工也有5500法郎。养老金是薪水的三分之二。工作勤勉的员工，每三年能晋升一级。差一点的，晋升时间也不过就是被推迟三个月。当时，公布晋级令的时候，报纸已经表达了政府机关的宽容，因为晋级只有年限的标准。既然境遇已经如此优越，他们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是群众过分浮躁骄傲的心理导致的。

《时报》论述过这件事的原因：“10年或12年来，历任部长、副部长都把博得属员的好感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对于属下人员的要求，部长、副部长们都认为是合于原则、易于实行的，于是加以承认。如果这种要求用命令的形式表示，尤其容易被满足。大概是当权者认为可以避免冲突。于是这种命令形式的要求成为常例，而其实是在酝酿更大的冲突。”

政府官员对工会代表极尽谄媚之状。据说工会的领导者每星期都去政府官员家里吃饭，副部长对于人员的任用、升职以及下级官员的任免等事，都进行咨询。没过多久，他们因为某件事发

生争论，双方之间态度冷淡。至于争论的原因，则是因为政府经费不足，无法满足工会日益增长的要求。这些工会人员，在这些政府官员面前习惯以主人自居，突然发现对方开始抵抗他们，哪有不愤怒的。因此在1909年3月12日，出于最琐细的理由，派代表去见部长，要求取消人员升迁的方法。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愤怒之下，他们吵吵嚷嚷地出了办公室，来到电报总局，鼓动人员闹事罢工。于是次日邮电人员聚集在一起，一致表决，决定实行罢工。

这件事情的结果人们都知道了。政府在几天时间里也做了空泛无力的抵抗，并以开除作为威胁，而且也得到了议会的帮助。可是不久就完全屈膝宣告投降，态度实在卑下。掌握大权的政府竟然屈服于闹事官吏的命令。罢工代表宣告胜利时曾经说：“昨天我在国务总理办公室看着统治者几乎要跪下来求我们平息冲突。我觉得我们的势力如此强健，是因为我们有决心。”

罢工人员不久就明白了这次胜利的主要经验，所以他们的某位代表说：“因为这次运动，我们得以知道了‘主人’一词的意义。据我们的认识，现在已经没有‘主人’了。我们不是属员，而是与他们共事的人。我们是平等的。”



这代表还真是有些过于谦虚。与其说邮政员工是共事的人，不如就称他们为主人较为恰当。

其他人都知道了威胁的手段可以满足要求，没有所谓道德的约束加以抑制，于是都纷纷提出要求，即使城市中的警员也一样。

工团的领袖P先生，是最富有经验的心理学家。自从经过这件事之后，他总结出一段理论：“执政者铸成了一个不可宽恕的大错，那就是让属员们知道了从前自己没有觉察的力量。”这个人明白纪律的价值，所以知道使官吏服从的方法。他曾对众人说，如果他命令将负责主要事务的官员丢进汽锅里，人们也会立即服从。幸运的是这种威胁性的措施实行得慢，否则就真的危险了。

社会党派对于这次的胜利，也在他们最重要的报纸中进行了评述：“工人们既然知道自己拥有电报、电话、邮政系统等斗争武器，那么如此大的力量与其用在今天这种为满足一个特别要求，或免掉一个副部长职务的罢工上，不如用在决定性的时刻，为解放大众而奋斗。”

既然已经走在退让的道路上，那么最终就会停止在堕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作所

为。

报纸最近还刊载，国有大型企业的董事会将派一名书记加入宣告打破现有秩序的革命式联合会。这个报道暂时还不能辨别真假，但执政者的恐惧态度是可以想见的。

倡议罢工的人的胜利虽然是暂时的，但他们将要达到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却是可怕的。现在仅就近的方面说一说。我们即将看到事实上早已经开始的社会秩序的完全破坏，财政及公共事务被颠覆。各种破坏的速度快慢固然不一样，但结果却是必然的。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凭借的唯一的力——道德，也已经全部被粉碎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的。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客不断以不可能达到的承诺讨好选举人。现在，选举委员会、小学教师和酒商们，已经成为我们的真正主人。有他们这种共事的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一切秩序、一切纪律、一切对于公共事业的忠诚都逐渐毁灭，将来必定会重蹈罗马、雅典和意大利共和国的覆辙，用扰乱社会秩序来为最残酷的独裁政体做准备。

对于邮政系统员工罢工所造成的混乱状况，也应当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政客们沉浸于法律万能的空虚幻想里不能自拔，于是建议用法律来惩治骚乱。政府于是提出限制官员地位的法律，用于惩治罢工的官员。向来以严肃闻名的某家报纸也认为这方法有效。但试问，万人罢工也能用免职或坐牢阻止吗？没有人相信这种可能的。最近这次罢工，也曾经用免职来威胁，有效吗？没有。

他们解决的方法可不止这一种。议会在进行讨论时，愚蠢的更多。某位思想简单的议员甚至建议把副部长管理具体事务改成部长管理。

其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当时第二次罢工发生之后也曾被迫使用过。电业罢工时，如果不是段长们怯懦，邮政系统罢工又怎么会相继发生？比如一支军队，敌人在前，逃跑又不可能，于是只有两种态度可供选择，或者自己过去接受俘虏，或者战斗。如果选择退让，就等于听任胜利一方的处分。如果选择御敌，或许还可以战胜；即使败了，结果也不过跟前面所说的一样，而且还能保持名誉呢。由此可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与议会同心协力，与罢工的团体力量战斗。

电业员工、铁路员工和其他政府官员或许会与邮政员工联合在一起，民众生活或许会被扰乱，巴黎在几天之内或许会发生饥荒，战斗也或许会很严酷，但胜利是必然的。如果一味怯懦退让，那么将来就会有不可避免的战斗。而且今天军队还值得依赖，将来或许连军队都靠不住了。秩序和革命这两种原则是不能并立的。一个民族经过的动荡再多，但也没见过谁能一直处在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革命的环境中，还能生存发展的。这个办法非常好，然而政府不敢采用。因为有几个部长在没进入政府之前，就曾经煽动罢工。他们与罢工人员是互相通气的，又怎么敢抵抗呢？

那么这种社会力量的对抗不能得到缓和、解决吗？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对抗仅仅具有表面上和解的可能。从实际情况而言，困难重重。因为其中一方的力量是出于情感的，不能用理性来触动。怨恨、愤怒、羡慕、渴望，以及口号的魔力，被另外的力量约束，不是理性所能达到的。

由此可见，需要发生改变的是精神，而非政治制度。而精神由经济需要产生，常常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改变群众的错误心理状态，平复他们的嫉妒和愤怒情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当前的

这些政客，距离明白社会不能任意改造、国家并非万能的宗教、民族改革要根据群众心理的发展进化的那一天还很远呢。

现在的邮政员工罢工所体现的工团主义是最危险的。所谓危险，并不是指他们追求财富的目的，而是说他们的纪律和毅力。今天的议会已经失去信用，各个党派分化成没有实力的小团体，还怎么抵抗呢？

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观察，一个社会常常被这样一些果敢的人掌握，他们被一种虽然没有实际价值，但却很强健的希望控制。大帝国的灭亡和能统治人类精神世界的宗教的创立，都是这样的人造成的。

新观点在哲学理论上的薄弱，并不能妨碍它的传播，因为有纪律和自由意志保护着它。而使它变得可怕，让人畏惧，哪怕仅仅是维持现状，就已经足以创造一种新权力。所谓权力，大体上就是一种势力的延续。

## 第五章 失去人心的议会和竞卖加价方法

法国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砍掉反对派的头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而圣茹斯特已经在觊觎德穆兰的人头，只是还无法办到。这位著名的政论家在生命将尽之前，在《老科德利埃报》中发表了最后一次意见。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没看过，我如果不是偶然发现共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793年12月20日）的那一期，也不会知道。

这篇文章证明革命的最初阶段，那种竞卖加价方法正在严重地危害民主政治。德穆兰对此感到忧虑，于是举罗马时代的一个故事来反驳这一方法。

这位著名的政论家说，当时罗马有一个共产派议员名叫格拉古，常常向人们承诺不可能实行的事情，人心逐渐归附于他。他因此被元老院忌惮。元老院为了保持威望，反对这共产议员，于是贿赂收买了一个无党派的人，名叫德鲁苏斯，用加价法诋毁格拉古。如果格拉古要用4苏一磅把面包卖给平民，德鲁苏斯就比他的价格低2苏。这就是大致的方法。没过多久，格拉古就失去人心，以致那些昔日崇拜他的人，群起而攻之，一同打碎他的头颅。元老院的得意之状，是可想而知的。格拉古死时，很少有人怜悯他，后世人更是不关心这件事了。

这就是故事的大意。这位著名政论家的论证竟然没有能听懂的人。处在现在这种不断加价的情况之下，民主政治必定会陷入粗暴、动荡、混乱的境地，岌岌可危。

从表面上看，加价方法是战胜敌人的良方。社会党的议员许诺在该党获胜之后，给各位选举人6000法郎的年薪，那么别人也可以让数目翻倍，再答应赠送一辆从中产者手里抢来的汽车。大家的许诺都像真的一样，加价法就这样没了限度。但如果最后兑现时差得太多，也是有害的。

加价方法这么方便，所以政客们随意使用，这已经成为积习，直到现在人们才觉出它危害很多。

许诺很容易，兑现却很难。许诺的人固然可以借口政党反对而稍微延缓期限，但最终必然会被选举人发觉，发现受到了他们的欺骗。现在议员因为加价法而失去民心的已经不在少数了。

这种立法家，当然不能说他们没有热心，只是因为没人能创造不可能的东西。何况他们所许诺的，的确是不可能办到的。他们所订的法律，总是与自然需要相抵触，不但不能救济民众，反而会日益加深痛苦。不断地加价，比如议院已经

表决了每年要耗费8亿法郎的工人养老法之后，又表决了每年需要耗费2亿法郎的铁路人员养老法。如此种种，相关人士是明知道这种决定的谬误的，所以才听任上议院核减数目。

民众刚开始还被华丽的许诺欺骗，现在已经有所觉悟了。当选人在选举者投票时，表现得非常谦卑，现在对弱者却非常强暴。而且他们的承诺也很难实现。在今天的状况下，议员一方面是他们的选举委员会的奴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为他投票却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来说又是暴君。所以他们的地位不见得有什么好羡慕的。庞加莱所描写的外省一个公证人的生活可以作为借鉴：

“他曾经抱有很多幻想，但很快就都破灭了。刚开始他受选举委员会的左右，等到当选之后，他也试着摆脱他们，自主做事。但人们告诉他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他不得不也加入一个党派，寻求依靠。于是，同党或者有关联的人要求得到棕榈勋章、请求救济帮助、谋求职位的信件纷至沓来，他又怎么能不受外力胁迫呢？”

没过多久，他当了部长。刚刚任命，就有二十多个想要谋取显赫职位的热血青年找到他。尽管他勉力地拒绝，但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们做主管



事务的正副官员、协理官员和办公人员。

在他的理想中，也想实现治理社会的目的。但现实中内阁会议的集会就使他绝望了。他只好尽力避免麻烦，好让自己能任职时间长一些。即便如此，他还是免不了下台。对于这种境遇，这个人又疲倦又厌恶，于是偷偷回家乡去了。

有一种议员，刚刚进入议会时，也意气风发；等到融入群众之后，就变得无能为力，进而无所作为了。左派政党议员拉博里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发表如下的意见：“议员关心公共利益的主动态度，竟然等同于零。”

议会行事没有标准，没有秩序，没有诚意，不能监督那些用欺骗行为获得表决的方法。议员因为对选举人施舍了所谓公平正义的恩惠，所以都得到部长的认可。

议会和政府都被日渐强大的民主政治要求，以及财政界少数保护自身利益的财阀所挟制。所谓的政治生活，就是用加价法和贿赂三种强权来不断调解社会矛盾。其中两种强权，是过激的民主政治和金钱。

议会根据眼前利益，轻率地表决通过法律。

四年中，让我得到如下教训，即议会中那些具有良好意志和正直思想的人，都是徒劳无功的。

## 二

加价方法的使用是人们厌恶议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具有这种反对心理的公民非常多，后面另有论述。现在所说的，是由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行为。

出于加价的心理习惯，人们自然而然地向威胁行为妥协。大家都担心别人退让，所以自己先退让。考察威胁的来源，常发生在工人之中。所以议会不问反响，不怕招致怨尤，制定了很多社会法律。

这种可怕的社会法律给整个社会带来龌龊腐败的东西，给财政带来沉重负累，也严重妨碍了工业发展。某个大的海上航业公司总经理，最近论述海洋航运衰落的可悲局面，基本上就是这种法律造成的。这种规定限制了工业发展的道路，使各个工厂都不再使用学徒，导致儿童犯罪的人数以千计。老人的救济费用，每年需要9000万法郎。根据正式报告，这些费用都是选举人的津贴。如果加上在酿酒业花费的上亿法郎，工人养老法上花费的几亿法郎，以及预算费用和工业发

展的重负，还有出于个人利益因为担心而加价，最终结果也就清楚了。

立法者们都不考虑通过一项法律的后果，还用说吗？往往表面看来不重要的法律，其耗费却是非常大的。根据1908年4月2日巴黎《市政公报》所载某市议员的报告内容，新制定的工人法律的结果，是使市政部门每年要付60万法郎给为水力工厂供给煤炭的公司。

市议会想要诉苦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市议员们使用加价方法，并不下于政客们。根据《环球报》所载，巴黎市议会实行的所谓的人道主义方法，致使巴黎各个电车公司的股东年损失7500万法郎。电车公司发现资本全部被消灭，营业只有损失，所以不分配红利给股东。社会党对这种情况必定会叫好。但恐怕将来股东们罢工，市政局将不得不自己维持公共事务的运作。那么受损失的，将是一切纳税人，即使社会党也包含其中。到那时候，这些人才会明白经济规律的威力吧，然而也为时已晚了。

现在，加价方法、人道主义和恐惧心理已经是控制我们的因素了，即使加以批驳，也不见得有用。这种危害只在没有固定心理特质的民族中流行，而民族的衰败也将随之而来。

议会失去人心的主要原因已经很容易明白了。由随便承诺而产生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这是其一。为实现这种不可能的承诺而勉强进行的行为，以及搅乱商业、工业、财政生活，这是其二。为了实现承诺而虐待不同阶级的人，这是其三。让所有信仰国家威严权力的人失望，这是其四。

现在就对社会各界都反对议会势力的扩展这一现象进行论述。

教徒和旧教信徒们反对议会就不用说了。他们是国民中的大多数。议会先是掠夺他们，接着是包围搜查，最后是虐待，以让他们向压制自己的人表示好感。哪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们反对的理由很正当了。

在小学教师和大多数官吏中出现反对的情况，理由固然不太合适，但他们也是出于同一种厌恶的情绪。其实，再也没有能像现在的共和政府这样，为小学教师们考虑的人了；但结果令人失望的程度，也没有像现在的共和政府这样的了。近来小学教师联合会加入了劳动革命联合会，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现在纯粹的官吏人数约为八十万。他们的要求越被满足，反对的势力就越大。如果不能加以控制，将来必定会使我们受更大的危害。不只为预算带来极大负累，而且他们将取代其他所有权力，在国家中形成许多小王国。如果他们的欲望得逞，政府暂时可以依靠他们的力量。一旦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就会像邮政员工那样，纷纷起来反对了。官员们现在所要求的，是取消各部的权力，把它们分散到行政机关，让政府成为行政机构官僚们的专制垄断组织。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还不如拥立一个暴君。因为暴君弄权也只是暂时的，不会太久，人们还可以期待结束的那天；至于这种无名的专制统治，和不可能被消灭的官僚苛政，是足以让我们断绝希望的。

然而我们已经被这种情况胁迫，处于不能自主的境遇里了。试想百年之中，在法国，我们已经推翻了多少政体、多少元首、多少部长，到现在为止，只有官员们的势力没有被触动。无论何种荒废、颓败的形势，都只看见他们的势力在增大。所以将来，他们成为我们的唯一主人的那一天，是指日可待了。

## 四

20年来，工人从立法者那里得到的好处，并

不少于小学教师和官吏。然而立法者们要面对的最激烈的敌人，也还是工人。不必成为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学者，也已经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了。这是群众心理中铁的规律的结果。群众只知道恭敬服从于一个强势的政府，对于通过威胁手段所得的满足，决不会感恩。蔑视懦弱者，常是这些人的规则。

广义上说的工人，狭义上说的劳动联合会，都反对议会，这一点毋庸辨析。他们反对立法者的愤恨情绪普遍指向各个党派，尤其愤恨社会党；对于教会党则稍显宽容，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状态与这些人相近。

现在，工人们梦想在激进的民主专制政体之前，树立起一个平民专制政体。他们深信凭借自己的神秘能力，劳动阶级可以实现中产阶级所不能实现的普遍幸福。

罗素先生说，早听说过议员们都有许愿的本事，又天天听议员们宣称，民众是一切事物的主人，享有一切权利，没有义务。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愿望就能达成。现在，大多数群众都已经相信了这一点：议员是他们的臣仆。

“不需要政客，不需要议会，只要直接行动

就够了。”这是今天的平民领袖的箴言。

社会党成员也感到了反对情绪在逐渐增长，也曾经试着用谄谀方法来取得民众的宽容和接纳，然而最终归于失败了，甚至都不敢出席工人大会。即使偶然出席发言，也必定会被人呵斥。1909年5月21日《时报》所载巴黎议院的德让特参加工人会议而遭到羞辱，就可以证明了。

## 五

工业家和资本家反对的理由不同，然而却非常正当。因为他们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源泉。他们不能对政府表示好感，不仅是因为政府不曾保护他们不受破毁焚烧，以及其他种种暴行，而且还因为苛刻的社会法律正逐渐妨碍工业发展。而现在，他们只是在等待最苛刻的租税来把他们产业剥夺尽了而已。

博丹在《实际政策》一书中说，现在人们不想宽容对待的原因，是“社会已经不是由精英们所代表”。就表面而言，这句话似乎是对的。然而，对于精英的需要程度，再也没有比今天更迫切了。精英的职责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将要大大增加。没有精英，就没有科学，没有工业，就没有物质文明。这样的社会，是属于窘迫、困苦的

奴仆们的低层次平等，是社会党所希望的最衰败的情况。

由此可见，议会已经自己创造出这么多不同的敌人。这么多阶级都表示出厌恶态度，唯一没有反对的，只有中产阶级。他们不反对，是因为漠不关心，冷淡对待。我常常引用多尼亚克先生的话，现在再举他的说法如下：

“法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很多，已经被多次革命影响，对于各种政体都冷静、平淡地对待。”

既不是保皇党，也不是君主主义者，更不是共和党。他们向共和国投票，是因为现在是共和国。他们有最强的保守性。但他们所保守的，是现在存在的事物。他们也有很深的忠诚度。但他们所愿意表现忠诚的，是能给他们提供平和安宁环境的人。如果某个政权失败了，他们就会变得像不认识那些人一样，因为那些人现在已经没用了。

议会令人失望的原因，是外省议员的暴虐行为。他们想要当选，不得不把委员会的怨恨变成自己的怨恨。对于非本党的公民，一定会残酷对待。卢贝在当总统之前，也当过下院议员。《新闻报》所载的对他的访问说：“在县区选举中的



单选法，使代表制堕落到可悲的程度，还怎么指望保持呢？这种选举制在外省已经改变了形式，它所造成的危害，巴黎人竟然还不能理解。”

“不给我投票的人就是我的仇敌”已经成了一句口号，没有人会违反。冰雹降在对手的田地中，或者他们的牲畜遭受瘟疫而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必要的选举者才享有抚恤金，其他人是不能得到的。家产颓败只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不在选举获胜者的行列呢？在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国，这种风尚可以长久存在，但已经超过了一定限度。恐怕不平之声最终将变成普遍的舆论声音。

智慧超群的人对如下议院的态度已经非常严厉了，从均选共和委员会的宣言就可以看出来。署名的都是学院、大学、工人界、律师会的知名人士，如卡诺、布夏尔、克洛斯特、达斯特、班勒卫、阿尔芒、迪尔、福雷等。这个“等”字之中，大约有50位这样的优秀人物。这宣言的深刻含义是，精英们正受着过度压制，这宣言是在鸣不平了。现在节录宣言如下：

“县区单选制的沿袭使用，使得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败坏的政治、选举风俗一直存在。比如当选官吏的人品，行政上的专制行为，法律执行

中的专制行为，用私人恩惠代替公平正义，公共事务的混乱，个人私利重于公共利益等情况，数不胜数。应该解放那些被迫服从议会的议员，彻底执行选举权，应该使人们有道德和尊严，应该用观念的斗争代替人的竞争。”

## 六

议会制既然有这么深的积弊，为什么还能存在呢？因为它是文明民族唯一可行的制度，所以各国都采用。无论议会制的元首是世袭的君主，如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还是选举出来的首领，如法国、美国等，立法者常是议会，管理者常是部长。欧洲最后的专制政府，如俄国、土耳其两国，最终也不能免于采用议会制，可见别无他法。

如果一种制度与时代不适应，那么就应该追求改善之道。应该改革议员选举法，使议员能够取得相对于选举人的独立性。用我前面所说的方法，反对有危险的官吏队伍。使这些人和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登记录用的时候，不用先约定什么，这样就能像更换奴仆一样，很容易就更换人员，他们就不至于像主人一样乖戾倨傲。

改善议会制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统治者应该

有起码的毅力，不要借口缓和局势而与闹事者缔结和约。大赦的法令不断颁行，而闹事的人、放火的人、毁坏公共财物的人却越聚集越多。前面举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我不理解执掌权柄的人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软弱的危害呢？

政府不断发布安抚的公告，事变还是多次发生。总的算下来，社会状况更加严重。1907年有南方两个郡的叛乱，以及军人哗变。1908年有德拉韦伊的持械暴动。1909年有邮政人员、海航人员罢工。梅鲁及马扎梅两处的革命罢工，使用了各种毁坏方法，甚至还有用炸药炸毁航船的。1910年有马赛的海航人员罢工。真是不胜枚举。

如果我们的统治者这样软弱，当然不足以寄托民心。如果变乱的状态不断严重，而维持秩序的党派又一直软弱，恐怕无政府主义终将获胜。

## 第六章 专制政治的进步

### 一

共产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是向绝对的专制主义的进化，是当代政治的特征之一。某家大报纸举了一个例子如下：

最近，在赛特发生了一件工团苛刻对待工人的事情。有12名工人被工团逼到不能劳动的境遇。换句话说，让他们不能生活。那么这些工人犯了什么罪呢？因为他们在最近举行的罢工中，不愿意附和众人而接受了别人的雇用。

其他地方受工团迫害的情况，都没有赛特这个城市严重。因为赛特原本就是一个贫困城市，现在又被经济恐慌所累。船运工人人们的希望非常奢侈，所以罢工也就很频繁。结果现在，罢工已经把我国地中海边第二海港城市破坏无余。穷困的情况日渐严重，海岸荒凉，都看不见有航船进入港口。

类似的事情不仅在这一个地方出现，各地都能见到。刚开始还只是偶然发生的情况，现在却已经变成平常的事情了。

现象这么普遍，必定有它的原因。政治和社会事件是不会自己发生的，常常是前面出现过的现象的积累和发展。

从大革命时代一直到现在，政治辩论家的演说常宣称专制的可憎，以及自由的可爱。同时期的历史反应则相反，憎恶自由，尤其憎恶别人的自由，并且热爱苛政。我们所有的政治运动，都

是围绕着什么党派在施行苛政，以及什么人在对这种苛政逆来顺受的问题进行的。自从路易十四以来，社会没有仁爱可言。当时的国家任意虐待新教徒和詹森主义教徒。今天，对待思想不同的人，也是用同一种方法，而且剥削他们的产业。我们这些小的暴君，固然不足以和路易十四相比，但他们统治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工团，是君主帝制思想的延续者。

法国所有党派都具有相同程度的粗暴的不宽容，以及相似的暴力倾向。法盖说得好：“最开始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时候，教授的就是憎恶各种公民的观点。人们都知道无数小学教师在平民中鼓励这种情绪，真是热心啊。”

对专制的强烈嗜好以及对宽容的憎恶，是社会各种人所表达出来的情绪，我们只能顺从接受。最初被贵族和国王使用，接着被中产阶级继承，现在的专制权力则掌握在平民手中。要实现专制，一定还要有这些人特有的激烈手段作为辅助。这种激烈手段，社会党派还没感觉到不快。这从他们向主人谄媚求荣的状态可以看出来。那些谄媚的话，只有黑人奴隶主从各个奴隶的口中听说过，其他的时候还真没有。

一群人聚在酒店里，推杯换盏酒气缭绕的情

况下，由工团的领导者提出的一切决定，政党成员都谨小慎微地听从。这种领导者和跟随他们的群众，蛊惑煽动的力量非常可怕。忠实于这种主人非常不容易，即使永远跪在他们面前，结果也是一样的。原始人不知道什么是不公平、荒诞和无能。只是这些人是大多数，自然应该服从多数人的嗜好和欲望，应该表决通过一些没有关系的法律，丢弃习惯，蔑视经济需要，反对自然规律，只顾一时的煽动和眼前利益。

这种煽动行为代表了工团和革命主义的意志，领导者中最有势力的人是劳动联合会的几名领袖。他们的专制权力之大，可以让社会党失色。但这种领导者的心理状态非常卑劣，德沙内尔在演说中曾经解析了其中的要素：“这些人的心理要素是专断的、贵族的和神秘的。”

所谓专断，可以从他们蔑视议会制度，以及劳动联合会的专制领导方式看出来。所谓贵族，可以从他们轻视普选制度和民主政治看出来。所谓神秘，可以从他们相信社会将有大变革、新社会将因他们而诞生看出来。这些人自称不信神话，然而其实他们自己就生活在一个神话之中，和原始人相同。只不过神奇已经换了位置，改变了形式，平常的事情变成了神奇而已。

简单的想法代表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完全退化，代表了一种向野蛮的原始时代的复古。这就是被共产主义支配的时代。人类想要冲出这个时代，已经大费力气了。

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和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与最初的基督教徒有很多相似之处。犹太的预言家也曾反对富人，并且先告诉人们公道和平等的时代是可以期待的。教会的神父也曾与圣·巴西莱、圣·让·克里索斯多姆等宣称富人是盗贼。

## 二

对苛政的需要是我们民族的心理因素中所具有的一种情感。如果不信，可以看看同一种制度在其他民族那里所得到的结果。

不妨就举一个在各民族中都得到发展的工团主义来证明。在法国，这种主义成为一种激烈暴力的武器，煽动怨恨情绪，鼓吹暴乱，反对爱国、对抗军队，导致社会解体，危害了国家的存在。而在英国，工团主义则是一种调和资本家工厂主和工人的平和的制度，并不鼓吹怨恨和骚乱，与我们恰好相反了。

我国的工人代表团到英国调查，见到这种现

象，感触很深。现在节录他们的报告如下：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行为作风，我们非常惊异。他们极力向我们表达出平和友爱的精神，没有人对英国政府表示厌恶。在曼彻斯特城的劳动者聚会中，曾几次见到工友们举杯祝愿国王健康，跟我们动辄批评本国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见工友们去参加工厂举办的招待宴会，工厂主的团体和工团之间的交际，似乎比外交官之间的交际还礼貌周到。”

这种新时代的“宗教”能否发生，我不知道；如果有，并且能赋予我们以拉丁民族所缺少的宽容气度以及对专制的憎恶，我们将赞不绝口。

工人领导者们所实行的政治行为的结果，如果用暴乱或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都能看到。然而还有一种最危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到的。这些人持续不断的政治行动及其结果的不断积聚，将使公共事务和工业慢慢解体。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活的要素的解体。

处在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下，劳动减少，成本增加。由于这种恐惧心理的主宰，自从电业工人罢工以来，人们不敢有最微小的举动。兵工厂造船甚至要五年之久，而英国人仅需要三年就足



够完成了。

这种情况渗透社会生活，波及非常广，政府机关自认无能，不能尽职尽责的情况势必越来越普遍。官员们只顾个人利益，不过问公共事业。细节上的疏忽以及对整个机体的微小破坏不断积聚，导致灾害时常发生。数年之中，海军销毁了六艘大的军舰，这不能说是纯粹意外的天灾。

它有很多情况与民主专政相辅相成，如苛刻地对待教会、剥削私人财产、反对工商业发展等。现在又实行了所得税，税额是百年来法国所没见过的，于是成为压制个人的最大武器。经济学者们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德隆布尔所著的论文分析了多次，都说这种税破坏财政，而且不能减轻任何一个人的负担。那些社会党也知道这点，但他们深爱这种方法。他们大概是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排除异党，使他们难堪；另一个是用财政方面的检查，随时了解财产数目，以便像没收教会财产一样故技重施，全部或慢慢掠夺民众财产。但这种法律暂时只能起到压制异己、减轻同党负担的作用；等到将来，这种财产检察制度实行之后，必然导致民众的嫌恶反对，民主的国家制度将与它同归于尽了。这种情况社会党还没来得及疑虑。其实他们应该知道，羊虽然软弱，但逼得太急，也可能被激怒。只不过这

些人心中的专制欲望太强烈，蒙蔽了内心，所以也不值得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 三

倾向于粗暴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蔑视自由，是法国的普遍风尚，这一点毋庸讳言。但这中间仍然有一些追求自由的具有智慧的精英，他们不愿意虐待、奴役民众。只是这样的精英人数非常少，不足以组成有势力的政党。而且现在，他们的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逐渐减少。

据此，一个难题出现了：为什么数目本来就很少的精英还在减少？议员和选举人之中，不乏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如教授、医生、工业家、工程师等，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主张最激烈的颠覆学说的人呢？为什么革命主义、反爱国主义、反军队主义的传播者和领袖，大多在大学中发展呢？

如果说知识、能力与教育无关，或者说人的聪明之处不仅仅表现在知识水平上，似乎不能作为令人满意的答案。决定这种心理状态的原因颇为复杂，最主要的一点，是恐惧已成为议会表决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这个我前面已经说明了。前社会党议员傅立叶曾说：“我们当中，从最激烈

的政治派别到最纯粹的议会派政党，都戴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枷锁。对于社会的教师，我们曾经向他们许诺天堂，可是现在，我们把这些信徒带向什么地方了呢？”

议员被选举委员会的声势恐吓、威胁，但他们又觉得委员会看起来畏畏缩缩，似乎不敢做什么，不能尽量讨好平民，于是他们试着超过委员会。他们想要让民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只好大声喊叫以超过竞争对手。结果说得太久了，不知不觉之间就连他们自己也相信了做不到的承诺。

我想说明的原因不止这一点，还有拉丁民族想用法律改造社会的错误想法。一切党派都相信法律可以救治每个人的主要痛苦，议员们也都有想要对社会有所作为的志愿。但社会的需要有多复杂，他们大多是不知道的。他们统治、管理社会，就像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医生给人治病随意放血一样错误。

这种认为国家法律万能的观念，在法国已经成为宗教信仰一样的确定观点。无论你怎么证明，都不能削弱民众对它的信心。布尔多曾经分析过一位大学教授阐述国家职责的书。据这位教授所述，国家应保证人民幸福，及其在这世界上的平安、健康；国家履行职责应当像中世纪的教

会一样。我们的民主政治教育家里竟然有这样的人。而像他一样生活在幻想之中，不知道社会的实际领导者的，还大有人在呢。

国家垄断主义对社会党的影响非常深，他们甚至主张国家可以插手一切事务，而不必顾惜一切契约和社会权利，国家可以任性行事。

这种心理状态，只有非洲黑人奴隶主才会有。然而黑人奴隶主有时候还会考虑取信于民，而在社会党看来，国家可以完全不必考虑这些。社会党领袖最近在议会上已经发表了这种主张。某位部长曾答辩说：

“国家和公司订立一个合同，当双方发生争端的时候，却只有一方有解释权。做事能这样容易吗？国家用全国民众的名义与私人订立契约，却在次日或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违约，那么国家的信义何在呢？”

这个道理非常明晰，却竟然还要进行辩论，足以证明专制言论对人心的诱惑程度之大。

## 四

根据前面的观察，立法者的心理状态已经有

所表现，并且也做了大略的解说。而那些中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又来自何方呢？

他们没有省察世界、描绘想象未来的能力，只好采用几种流行的观点掩盖平庸的思想。“与时代同行，做进步的人”等口号的意义，这种人怎么会知道。况且法国人都是国家党，具有从众心理，不会自己表现出差异。所以教会党、社会党、保皇党等各党派中的中产阶级，都同意要求用法律改造社会。社会党于是综合这种普遍的社会倾向，以最快的速度在中产阶级中传播。

除了前面所举的现在中产阶级的心理原因外，还应该加上他们对传统习惯的表面厌恶。没有人比中产阶级更习惯受传统的束缚，也没有人比中产阶级更憎恶传统习惯的束缚。他们明知道传统习惯的势力非常强大，不能消灭，却还是要憎恶它们，就像奴隶憎恶奴隶主一样，可同时却又不免服从于主人。

那些通达事理的人，也屈服于新的如宗教一样的普通而激进的民主党派，就像亚洲国家那些幸臣如奴仆一样听从专制君主一样，这原因也很复杂。偶尔也有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抛弃主人而不服从的，比如比利时的社会党的一个前首领、上议院议员皮卡德，他曾经在公告信函中公开表达

了这个意思，现在节录如下：

“我并不想离开工党，我想要离开的，是一个骚动的团体。有学识懂道理的人被传统习惯所累，跟随其后，而且出于恐惧、怯懦的心理原因，不得不采取不可避免的竞卖加价方法。我向来反对这种不宽容，出于保持人格榜样的考虑，我不愿意妥协屈服。这个‘教会’想要招募奴隶，可以到别处去找找。”

社会党的这个“教会”想要招募奴隶并不难。有了这种心理因素的发展，愿意接受比君主专制更可怕的苛政的人还有很多。今天固然还有人愿意为自由进行理论上的辩护，但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都被专制主义诱惑，辩护还能有什么用呢？

# 第四篇 社会党和工团党的幻想

## 第一章 社会党的幻想

### 一

社会党的理论和我们所能看到的，蓬勃发展于各处的社会连带主义迥然不同。前者是我们所讨论的观点，而后者并不是由社会党的理论产生的。这些运动的进行，对社会党颇为不利。在国家的强硬统治下建立的平等，不仅不能改变工人的命运，而且还会阻碍社会进步。

我们反驳社会党的理论，并不是要攻击社会连带主义。大家都知道工人界的精神，他们带来了物质进步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他们为了了一定目的而尽力做很多事情，比如设立灾害保险，建造工人宿舍，推行养老金制度，发展卫生和教育，实行农业信贷，发展慈善互助事业等，这些都是普遍关怀社会的依据。但这不是社会民主，而是社会义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之前，社会党的派别非常多。这些年来，共产主义势力迅速扩大，似乎有取代各派别的势

头。他们把持议会，常常鼓动、诱惑代表们表决。只不过这样得来的胜利不能持久。所以近些年来，德、法两国出现了一种逐渐扩张的新理论，名为工团主义，现在这种理论正在侵略工人界，完全挫败、摧毁共产主义。

这两种理论明显不同。工团主义成员极力宣称两者有所区别，而共产主义成员则对此讳莫如深。尽管共产主义成员一再卑屈退让，工团主义成员仍然不罢休。所以，在党报上以及各种大会中，他们经常会发表言论，声明二者的不同。

亚眠（法国北部城市，工业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学城）的大会，有一千多名工团党成员参与，并派遣了四百名代表。有人建议工团党和社会党接近，几乎被全场一致否决。

工团党通常认为共产主义是幻想。一位有势力的工团党成员曾在1907年的大会中对法国社会党领袖说：“你们的理论纯粹是空想。你们大概想要赋予国家政权所无法承载的价值。你们总是期盼将来，但即使在将来，你们也不能建造一个完美社会，不能赋予工人管理生产和交易的能力。你们只能是暂时的主宰者。你们能掌握的只是从前中产阶级所掌握的权力。你们能集中法律，但你们不能让工人代替资本家。既然不能改



变群众心理、改变民族情感、增长群众能力、创造生活的新标准，那么把政权交给几个政客来操纵，是想要干什么呢？请你告诉我吧！”

不只法国的情形是这样，德国的工团党和社会党也已经分离。1906年曼海姆大会，社会党和工团党聚会时，倍倍尔想要保留自己的一点权威，竟然完全失败了。而工团党在报纸上则高傲地拒绝社会主义联盟。其中一家报纸说：

社会主义意在扩张行政制度的权力，管辖社会事务，对于个人行动所不能达到，希望以权势进行干涉。这是软弱无力的原则，只有积贫积弱的民族、经济衰败的国家才会这样。

这个道理数年前只有少数心理学家知道，现在工人们也知道了。对于评论家们主张的民主专制代替中产阶级的空论，社会党中有见识的人大多反对。伯恩斯坦说，平民的专制，犹如俱乐部里的演说家和文学家的专制。

社会党见工团党频繁攻击，不得不忍耐最激烈的言论，如反对爱国主义。他们的党报在第一版画了一幅画，寓意工人撕碎了写满我们光荣历史的国旗。但这种最卑屈的退让，还是不能阻止社会主义的解体。现在他们只能在一些小教堂里

互相对骂了。

他们的理论派报纸叹息党内的政见不一，对自己也有所忏悔和反省。1908年1月15日《社会主义运动报》说：

社会主义已经逐渐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恐慌。它在20世纪发动了很多启发希望的光荣运动，现在却在向最可悲的破产境遇行进。工人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身边，竟繁殖了很多怪异的、毒菌一样的社会主义阻碍它的生长。前面已经有国家社会主义等附带各种形容词的社会主义；现在又有爱国的社会主义。那么照此看来，资本主义会在何时出现呢？

共产主义的空想色彩已经被多数人发现，然而仍不能阻止它在议会中壮大声势，以及订立有危害的法律，所以我在本章专门论述它的危害，至于工团党则在另外的章节论述。工团运动的危害也不小于共产主义。大概后者来自空想，而前者则产生于近代的经济需要。

## 二

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抑制天然的平等，建立社会地位的平等。达到的办法，则是

废除产业和个人财产，以及所有工业由国家管理。这个理想代表历来穷人反对富人、无能者反对有能力者的冲突形式。这种情况有史以来就存在，一切民族都知道。古希腊就是因此而失去独立，古罗马就是因此而导致共和国的覆亡及帝国的建立。

法国革命不太热衷于社会主义。他们最开始固然已经宣布了平等，但在没收贵族和教会资产之后，便急忙宣布产业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虽然也有几次财产公有的尝试，但随即这一理想的传播者就被砍头了，为的是让这种思潮停止。

近代的社会主义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成一种宗教性质的理论，我在《社会心理》一书中已经说明，兹不赘述。

在政治和宗教中，空泛无意义的说法最为有益，每个人都可以任意解释它。社会主义的含义模糊不清。生活适意的人，就说它是改良平民生活的一种理想；境遇不好的人，则说它代表了不公平。赚1500法郎的雇员认为加薪太慢，做杂役的人觉得没人知道自己的能力，酒商看见有竞争者在自己附近开店，都可以成为社会党员。至于理论家，则说它是一种强制取代当前社会形式的

组织。只是社会组织的定义因人而异罢了。

社会主义的主要性质是一种对优秀的积恨。如出众的才艺、优厚的资产、杰出的智慧，都足以引来嫉妒。

持这一主张的人则说它能代替古代的宗教神明，能形成一种可以改变不公平命运的神秘力量。所以共产主义才能凝聚新的信心，要在旧社会的残余基础上，再造一个像从前那样的，人人可以永远享受幸福的天堂一般的世界。

这种荒谬、虚妄说法的不足取，早就妨碍了自身的传播。因为它能宽慰那种散布最多的低级本能。那些明确的诋毁，经由希望而不由推想。即使不合理的，但只要改变一定人的心理，就可以得势。传播的任务，就是引发这种改变。社会主义从没缺少过这一点。

考察它普及的效果，能让我们想起基督教开始传播的时候。基督教理论虽然弱小，虽然也经过哲学的驳斥，但还是利用诱导和濡染进行传播。影响所及，连杰出人物也信奉。

社会主义能取得成效的要因，则在于当它出现的时候，恰好赶上人类已经不相信旧的理论，

开始寻求新的神灵。宗教神明有消灭的时候，但宗教心理却一直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宗教就不能生存。换句话说，没有希望就不能生存。

这种心理状态，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都一样。如果有人不信神灵，必然会崇拜偶像。这是社会党的“宗教”能在中产阶级和平民中同时成功的原因。新的信心的魔法般的力量致使聪明睿智的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正确，而不知道反对强硬的诡辩家的方法。这些人已经被恐惧心理和空泛的人道主义控制。人道主义是利己主义的简单形式，也是衰败的象征。这一点雷南已经说过了。

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由低级欲望导致的，而是得益于它能唤起神秘之感，能引发人们追求永享幸福太平的人间天堂的希望。历史之中，人类为理想而死的志趣常基于满足物质需要的出发点。我常说，如果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专政之下，用劳动换取食物听起来很动人，但人们不一定买账。达维内耳在他的《社会经济的发现》一书中，用另外的途径推导出同一个结果。

幸福在国民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最微小，国民很晚才知道要为幸福深思熟虑。

之前他们所偏好的是别的事。古代和中世纪，追求美排在追求利益之前。在制造灯具、伞等这些实用物品之前，就已经精于建立神庙、塑造偶像。在知道追求温暖之前，就知道写字了。在制造餐叉之前，就知道制作笔了。

相对于物质而言，这些人偏重于理想多些。战争常常导致民族的痛苦，而民族却表扬战士的荣誉。发表思想和创作艺术品的人没有实际功益，可民族还是要表扬他们。而那些发明生活必需品的人却被遗忘。由此来考察历史事实，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只有对理想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今天也是这样。现在的人表面看似乎依赖于金钱享乐，但其实精神上的满足还是胜过身体的需要。

### 三

我自从读了社会党对于将来社会的猜想之后，才明白中世纪神学家的诡说。这两种人都不明白人类的特性和经济的主要需求。他们那种空妄的幻想和要建造理想世界，以及所有破坏当时世界的需要，都是一样的。

神学家现在已经被消灭了，但他们的精神已经被继承，只不过是改变了这种空想，以及由这种空想所产生的观点的名称而已。那种威胁到我们的破坏性，古今如出一辙。现在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宗教。那些传播者，都具有那些所谓的先进者的不宽容性。理论、语言、信仰以及传播的方法，几乎全都相似。

最初的基督教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相似点很多，但基督教有一种有效的要素，是今天的社会主义理论所缺少的。从前的人所期待的奖励，是没人能到达的天堂。而社会主义60年来所许诺的为时不远的人间幸福还没实现，所以民众的信心不免动摇。所以才会有新的信仰产生，才会有工团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势头。这种新的宗教性质的幻想，或许会比它存在的时间长点。

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幻想，人们现在已经看出它的虚妄荒诞，只是受它抑制的时间还没到头。这种幻想，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一种社会可以经过革命，用法律完全地加以改造。第二，资本是万恶之源，可以废除，从而建设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第三，国家应该控制所有产业、所有工厂，用一个官员系统加以管理，并且平均分配产品给社会成员。这种理论不考虑个体需求、情感和经济需要，以及其他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在纸

上建设各种社会。它是思想简单者的天堂。

这种幻想在法国势力非常大。那些选举委员会中的咖啡商、外省旅行社的店员都深信这种幻想。议会据此订立危害最大的法律。某重要铁路收归国有以及将来的所得税等，都是被共产党鼓动的。这点毋庸讳言。第一件事开启了国家垄断一切工业的开端。而所得税则是在开列公民财产账目，以备将来剥削方便。想要让这种税法实行，就必须付出检察这一项代价。不但不能惠及一人，而且会导致反对共和政体的敌人奋起反击。社会党并非不知道这种情况，然而仍然要表决，是因为社会党的选举委员会已经有了这个决定，所以国会应该像奴仆一样服从。

社会党的各种幻想中尤其荒诞虚妄的一点，是他们想废除中产阶级。大概工人的生活多依赖于中产阶级的才能、智慧、资本和工业的繁荣发展。

假定一个每年获利4万法郎的工厂的厂长，把工厂赠给该厂的一千名工人，每人每天所增加的工资不超过十生丁。所以现在能管理大企业的人很少，管理者的能力如果小了，获利也随之减少，工人加薪必定少于这个数目，而且恐怕会更少于改变之前的所得。所以有能力的人被当代人



看重，人们不惜花重金请他们来管理。因为花的价格越高，实际获利越多。

假设社会主义获胜，用行政手段管理工业，平均大家的工资。那么一切优秀人才如学者、艺术家、发明家、技能工人，肯定要去邻近国家了。现在，各处都看重技术才能，邻国必定非常欢迎。那么社会主义所统治的，其实是一个集合了庸常低劣的人的社会。值此之际，如果有侵略者想要夺取国家，真是易如反掌。但这对社会党并没有影响。可能这些人已经逐渐成为反对爱国党、反对军队党。在社会党眼中，工厂主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一样，都是工厂主，并没有区别。

想要除去这种幻想，只要看看历史就够了。历史上，国内动荡导致外来势力入侵，波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先是被德国人占领，接着被俄国人侵略。反抗的呼声稍微高点，就立刻受到欺辱；学校中孩子们都不能学习母语。这都是由国家内讧所致。波兰的命运，可以用金字镌刻在那些宣称反对爱国的社会党的大会场所中作为警示。

共产社会党如果获得胜利，必定难以长时间维持，冒解放之名的独裁者必定会随之兴起，被

人民欢迎接受。这是法国革命的经验。但在达到这一境地之前，暴乱已经非常可怕了。拉夫莱描述社会主义获胜时曾经说：“我们都将会被炸药、石油毁灭。那种野蛮，那些能够确定计算的破坏，必定会超过1871年巴黎公社时代的巴黎。”我与他的意见非常一致。

法盖也跟我研究同一问题，他说社会党获胜的原因，在于军队的懦弱。南方发生暴乱，一个团的军人不服从命令。等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处在这种境地，只能立即颠覆。

这种颠覆，如果再辅以立法手段，尤其容易成功。法盖又说：“只要一个立法决定，就可以没收中产阶级的资产。如1790年革命时对贵族和教会，以及最近对教会资产的攫夺。”现在的中产阶级似乎已经不闻不问了，大概他们所凭借的基础被社会的支柱力量如财政政策 and 军队等动摇了。所以他们支持纪律的逐渐废除；对于社会党所提议的财政、军队法案，他们也推动表决。而他们不知道，社会党如果获胜，将如革命家马拉脱所说：“是一种比君主制更危险的独裁制。因为它是非人的，是可以控制的。”

中产阶级的随波逐流也是被幻想蒙蔽的。当然不能阻挡水流让它向高处走，但可以因势利

导。而中产阶级不明白这个道理，自己主动放弃了优势和权利，不明白社会不能没有纪律、习惯、等级的道理。

他们尤其不明白的地方在于：群众的心理其实很简单，他们需要的只是对群众发言的技巧。工人唯一的一个政治理想，就是认为自己被资本家利用欺骗，政府应该增加他们的工资。

布尔多的意见非常正确：“群众没有一个固定观念，把对他们发表演说的演说家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而不问这些人是维护国民还是反对教会，是爱国还是不爱国，是政客还是革命工团派。”

群众只知道根据演说者的声势所留下的印象，凭感觉做出决定，并不问是否合乎理性。就像对一名女子，只爱她的人，不管她说的话。如果一个人让人喜爱，无论说什么人们都相信。至于讨人喜爱的方法，则在于果断。有人曾经见过北方的某个选区，是社会党的重要阵地，谁知竟被一位意见较为保守的当选人夺取。这个人是出于民众理性才当选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能取悦于群众，群众觉得他就是自己想要的主人。

群众表面虽然看似具有革命本能，其实只会

服从。历史事实都在那里，可以作为证明。最激烈、暴力的工人，一听到革命委员会代表说的话，唯恐服从得太慢，不经思考就跟着去罢工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没有这种委员会的力量。

## 四

社会党中不少有见识的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放弃自己的理论，转而与中产阶级沆瀣一气。看看社会党人维维安尼做了部长之后，在演说中对中产阶级的褒奖赞誉，实在不能不令人惊愕。

在普通民众周围，也有一种为了民众的利益、意志、欲望而存在的中产阶级。如果对这些人也加以打击，任由劳动者蔑视或愤恨，其实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敬重一切信念。应该用他自己的理论来统治、引领民族，而不能用民族本身的信仰进行管理、统治。

文化的进步的确应该归功于各时代的中产阶级。历来的艺术家、工业家、哲学家和博学者，常出现在中产阶级之中。

克莱蒙梭的演说中提到：民主政治不是多数人的政府。追溯一切进化过程的源泉，我们常可以发现，是思想家的个人力量在起作用。至于说到普及、进步等，其实就是把几个卓越之人所发表的观念在群众中进行试验，使社会渐渐与理论相符合。

这种真理，千万别说它平常。那些政客直到执政那天才能发现。所以他们不能够动摇想要破坏社会的革命社会党人，还用说吗？

如果这种鼓噪、传播的人稍微明白点事理，一定能明白取代他们所诅咒诋毁的政府，没什么利益可言。他们费尽精力，最终看到的却是政府没什么变化，而保守的情况比以前还严重。这就是他们镇压了乱局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

得胜的革命党，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仍旧当革命者。这会让骚乱的态势一直存在，最后会导致一切舆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或用前人的统治方法。这是一切激进的民主党派获胜后所采用的方法。当他们执政之前，蛊惑煽动骚乱、实行总罢工和暴乱；一旦得到政权之后，都会果断采取措施打击这些行为。这样做并非是违背自己的原则，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想要维持正常的民众生活，就不得不遵守一定

惯例。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革命者的暴力和激烈，而在于统治者的软弱。如果一个国家饱受动荡之苦，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太多，随处可见空头承诺和无效的法律，那时候，整个民族自然倾向于可以维持秩序、保护劳动的独裁者。这是民主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独裁专制固然可作为临时秩序的保护者，然而也是滑铁卢、色当之败以及被外国入侵的原因所在。古罗马人固然不后悔让奥古斯都即位，然而他执政期间也酿成提比略、卡里古拉时期的缓慢衰落以及蛮族的蹂躏。

再造这个已经破坏的世界，需要经历漫长的阶段。现在是被过去创造的，而过去不可能再再造。今天，破坏者已经兵临城下，我们要任由他们来颠覆这个建设起来极为困难的社会吗？这些人只会颠覆，不能代替我们进行创造。社会的灭亡有时极快，重建却需要若干世纪。

## 第二章 工团党的幻想

同类人因为利益相同而集合在一起，已经成为近代社会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大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只是被它加以扩展罢了。

之前的各个国家都已经出现过各种集会。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大概就是工团结合的共和国，是今天的理想家们所向往的地方。革命时代所废除的帮会，也是实际意义的工团组织。

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把个体所不能掌握的权力交付给小团体。这种小团体可以免除个人不好练习的和不太流行的自我行动和意志。

工团的关系，有逐渐变成人类社会唯一关系的趋势。今天，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尊敬服从已经不如从前那样了；国家观念也已经变弱，而工团的观念则日渐扩张壮大，处在产生新权力的过程中。比如订立公共契约，工厂主不和工人接洽而与工团组织接洽之类，现在逐渐成为工业的通常制度。

没有见识的工人当然可以以此获利，但有时也有附加条件：接受最严酷的苛政统治。工人能保存对权力的幻想，但不能保存对自由的幻想。

由这个平常的道理可以看出，制度本身没什

么好处可说。而它的势力，则会因为不同民族的心理性格而有所差异。工团主义的历史都在那里，可以作为证明。

从民族角度加以区别，工团主义有两种方式：和平的工团主义和革命的工团主义。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适用的工团主义，他们只顾经济利益，不管阶级冲突。至于拉丁民族之中，工团主义则成为破坏社会的工具。我们所研究的，就是这种工团主义。

在法国，迄今为止仅限于保护自身利益而没有破坏行动的工团屈指可数。这种情况与英国、德国的工团都差不多，势力都很小。

至于声势浩大的劳动联合会所代表的革命工团主义则不然。把他们看作国家主义是很有道理的，我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用工团首领P的话说：“当局使属员们知道了自己所不觉察的力量，是铸成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人对法律的价值颇为了解，趁着政府软弱和社会普遍混乱的状态，利用少数规则获得最大权威，让人服从。从心理因素和政治角度两方面来观察，他们的历史很有趣。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少数有决心的人可以建立一个与国家平行的机关，并胁迫议会迅速表决他们所认定的法律。



就政治而言，权势最重要。但有时不必非得真正具有权势，只要让人相信你有就足够了。巫师的影响力能延续存在千年，凭借的只是人们相信确有巫术而已。

想要建立一种个人权势，是非常复杂的；而创造一个无形的权势，则是极为容易的。因为第一种权势常常容易受到指责而引人非议；至于对第二种权势，大多数人只有安心接受而已。在法国社会中，委员会的权势常被人们尊重。他们现在掌控整个议会，成为议会的主人。著名政治家潘伽烈在演说中描绘那种癫狂的议员时说：“接连不断地动用他们用以表决的选票，瞪大眼睛盯着他们当选的区域，然后问自己说：‘这些人能够取悦我们的委员会吗？’”即便是最激进的、经常敢咆哮着打断部长发言的社会党员，当他面对像醉汉般胡言乱语的委员会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起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怠慢之举。因为只要得到委员会的一种报纸支持和少数酒商赞助，他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委员会有如此大的势力，由来已久，但现在似乎稍微受到了一些遏制。如妨碍工业发展的法律的制定，虽然有委员会的授意，但却受到商人的联合抵制。之前政府听从社会党委员会的命令收回西部铁路，商会虽然没能阻止，但由于零售

商的联合抵制，议会在多种赋税政策之间犹豫不决，最终没敢表决通过。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利益的联合，或者是政治利益的联合，或者是行业利益的联合，将来的命运，都不会被某种个体势力拥有，而是被由领导者所操控的小团体所有。

劳动联合会的创建人深深知道这个简单浅显的道理。他们表面的章程是在组织一个集合众人的团体，由一个外表看来没有丝毫权力的委员会管理。而事实上，看似没有权力的委员会却拥有各种权力，尤其以强迫成员执行不容讨论质疑的命令的权力最为重要。

因此想要专权，必须先要争取得到大多数工人的表决同意。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平常的政客遇到这样的困难大多束手无策，但是联合会的创建人不会因此而受到拘束。这些人轻描淡写地宣称，这是用少数人的权力代表大多数人的权利。他们还反对民主观念及融合各党的观念，借此自圆其说。他们某位成员曾经说：“民主政治用普遍选举的工具赋予那种不由自主的缓慢行动以监督制约的权力，用以镇压将来有希望掌握权力的少数人。而工团主义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则不同。激进的行为是由那些自觉的人、那些反对派

影响产生的。这是两种方法大为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少数反对派的态度有什么根据呢？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本能罢了。这个派别的领导者对一名普通工人所处的斗争环境的了解，要比各个派别中最隐秘的理论家所知道的更多。反对派的工人如果是联合会成员，便和处在法律之上的封建男爵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都会为他出谋划策，和给专制君主出谋划策一样，不必再理会什么法典了。应该向前进的时候，只听从自己的本能冲动，只相信自己。换句话说，不是让我们的言行适合、遵从法典，而是让法典更适合我们的意志。

专制君主的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由联合会员所结成的“贵族团体”也可以不遵守法律。这种新的独裁政治的一位领袖说：“法国工人可以超越一切权势、一切规范、一切阶级，行动之前不必问法律是否允许，行动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这种妄自尊大，就连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也不敢自信拥有。”

群众受这种新势力的蔑视，已经超过了受亚洲各专制君主统治的程度。他们说群众接受一切诱惑而不能醒悟察觉。这个说法不能说错误。处在革命之际，民众自然倾向于最坚强勇敢的人。

而在平时，民众可以保持缄默。“只有自觉的人、能战斗的人，才有代表工人界发言的权利。”这自觉的人，自然是联合会的监督人。这还用说吗？

这些人深知普通群众的平庸和目光短浅，所以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奴隶一样。这些人的代表从来不解释所下达的命令，如罢工之类的。如果那些稍微有点独立思想的工人表示抗拒，立刻就会被服从于委员会的同伴排斥。这些代表的命令，就像过去黑奴种植园里监管人的鞭子。

罢工经常由怪异的诱因所引发。劳动联合会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成员格里菲勒，有一本关于旅行的书，可以作为印证。

“马赛岸边，每个地方都设一名工人代表，权势很大。往往因为一个极微小的缘故，在人们正劳动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代表就吹响小笛子。这是罢工的信号。工人就会立即离开工作的地点，开始罢工。如果要追问罢工的原因，连厂长和工人自己都不知道。”从中可以看出，具有声望的人收服工人群众有多么容易。工人的服从程度，可以达到最残酷的暴君都不能让他们做出的牺牲。人们都知道巴黎附近某位砖厂主的事情。这个厂主想要退休了，又没有继承人，于是把砖

厂改成股份公司，把股份赠送给了工厂中的工人，并且为了避免工厂经营受到影响，暂时仍然由他管理工厂。砖厂工人真心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没想到这件事被劳动联合总会知道了。因为害怕这件事开了一个头，于是，命令工人拒绝接受馈赠。而工人们竟然都服从了，丝毫不敢有异议。厂主的好意没达成，只好关闭了工厂。

工团派的领导者们所使用的统治方法已经没有什么新奇了，从前的暴君都已经用过。在当今的形势下，仍然敢使用这些方法，是深信群众对他们的相信、服从的程度。

那么维持这种能取代其他权势的新权力的方法是什么呢？革命工团派既然不考虑民意和法律，问题就比较简单了。这些人利用他们具有威胁性、破坏性的暴力罢工，几乎能够实现所有要求。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比较和平的罢工，委员会就会派几名富有经验的代表进行蛊惑煽动；等到骚乱终于开始了，他们就离开这里再到别的地方进行传播、鼓动。

这种方法足以让那些崇尚普遍选举权和法律作用的社会党愤怒了。工团主义想用抵制、破坏和部分罢工达到目的。这些方式是你们用以改造社会的唯一武器。你们是用这种武器来侵犯

自己的国家，并加以嘲弄。有比这更过分的吗？

工团派的成员并不多，而想要创建一种新的“宗教”，传道者也不用有太多。我前面已经说过，社会党的主要领袖格德也反对联合会的方法和他们中权势最盛的人。他曾经说：“若说打破路灯、伤害军人、焚毁工厂可以改造一个行业，实在很让人费解。现在应该和这种所谓革命的矛盾言论划清界限了。无论哪一种暴力的团体运动，部分罢工也好，全体罢工也好，都不能够改造行业。”

革命工团党回答他说：“方法最管用，因为效果最好。可以引用的证据不少，比如职业介绍所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不断向政府进行激烈的示威活动之后，库姆斯内阁迅即在议会上提出了法案。上下两院都来不及喘口气，就在三天之内表决通过了。其他类似事件也都像这样，效果明显。

上面提到的内阁，如果能有当年剥削、驱逐老教徒和毫无反抗能力的女教士的四分之一毅力，社会的混乱态势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这一点毋庸置疑。

联合会的权势其实是建立在政府极端懦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状态只有在法国才能得到发展，英美等国绝对不会这样。前面已经论述过，这种暴力人员在美国肯定要坐几年牢，而且也不要指望能够被赦免。而在英国，工团组织要对团员的破坏行为负经济责任，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破坏社会的事情。

这种懦弱政府被联合会的心理学家们利用。但这种胜利过于动荡、混乱。不过过度的激烈也不一定没好处，将来会导致一个保护型内阁的出现，靠严格实行法律来制伏这些人。

当德拉韦伊发生罢工的时候，联合会自信不会受到惩罚，所以行动肆无忌惮。罢工者毁坏机器、劫掠行人、攻击路过车辆。法庭不能不过问，也难免有追究的说法。联合会立即威胁政府，要求停止追究，否则立即宣布总罢工。这等于说工人焚毁工厂、劫掠车辆的权力在事实上得到了承认，只是没被载入法典而已。当时也不免有几件小案件进行了判决。可是几星期之后，屈服于民众压力，又不得不表决大赦。

这种革命尝试行为的功绩在于，表明了动不动就威胁这种荒诞念头其实来自政府。政府才知道联合会的权势建立在他们能够激起恐惧心理的

基础上，只对不知道抵抗的部长起作用。

政府的力量当然不足依赖，联合会还有比军警势力更重要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们旗下的无政府主义党派。这两个党派在破坏社会、建设共产主义的政见方面相似。工团党虽然憎恶他们加入，但也没有办法拒绝。

在无政府主义党派成员的认识中，只知道毁坏和焚烧这种暴乱行为不容易引发。但这些人未尝不想试着打破全社会、暗杀各位君主。把这种人收入阵营中，想让他们遵守工团的纪律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劳动联合会虽然在共产党大会中获得胜利，但不能离开这种新的同盟党人。这种结果，我们在后面论述。

等到工人已经习惯了服从，就等于是处在被统治的情况下了，自然没有什么利益可言。因为工资是随着工业的繁荣情况而发生变化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不能振兴，就算全体工人都加入了工团组织，又有什么用呢？工资不能多加一分钱。再看看现在，工业已经开始衰落。再等到资本家们因为恐惧而转变投资方向，到那些没有激烈暴力的罢工，没有破坏行为，也没有苛刻法律的国家时，工人的工资会减少更多。



这种真理，那些自称是工业界保护者的人都不敢指明。这些人不是不知道没收私人财产并不能够改变劳动者的命运。因为有能力的人被当今时代最大的强权——无能者——代替了。工人为什么不效仿亚当所说的那些美国工人那样，早上穿着工作服去工厂劳动，晚上洗漱干净之后，就到俱乐部里娱乐。这样做，只会增加他们的职业价值，而无损个人私利。

在美国，有优秀的工人日薪25法郎，也有手工艺人日薪4法郎。但是，能用文化意识来把手工艺人提升为绅士，或者把绅士变成手工艺人吗？我已经知道了社会党人的答案，也知道了有见识的人的答案。只要蔑视这些因为低级欲望而产生的不切合实际的所谓人道主义观点就行了。我们应该向那些强大的、健康的民族心理尽力学习。所谓进步，应该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融合与融洽相处，而不是各党派所常说的阶级仇恨和斗争。

社会对工团的创立建设曾经态度很好，等到后来才发现他们要求越来越多。虽然已经试着平息他们的怨恨情绪，并且在态度和行为上都表示服从，但劳动联合会始终傲慢地拒绝。在最近的大会中，甚至还禁止社会党议会成员出席。

工团派的想法还很空泛，现在只知道破坏。他们的著作家也试着描绘未来的工团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所有生产者的集合，由负责各种社会事务的工团组成。这种社会组成与社会党所宣扬的国家组织差别极大，所以两派在思想上南辕北辙，没有调和的余地。

## 二

一些有阅历有见识的人郑重地说：“工团主义是新时代的曙光。”这些人是真的没有怀疑过，这个曙光其实是倒退的信号。工团主义之前在意大利和各个共和国已经实际存在数百年之久。这种共和国，其实就是工业团体联合会，是由工团选举出来的会议所统治的。这种政体的成绩，法兰西学院的教授雷纳德已经叙述过。这个人是人道主义社会党，现在举他所说作为例证，以避嫌疑。

城市之间、街巷之间、家族之间争斗不休，世仇、叛乱、焚毁、杀人、阻断、流放、没收，连绵不绝。这就是数百年间意大利各个城市被骚乱破坏的状况。美丽的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相信自己会堕入但丁所说的恐怖地狱。

昆廷·布夏尔曾在书中论述过这种工团制度对工人的过度压制。人们都希望能摆脱这种制度，哪怕是受最残酷的军人独裁政治也心甘情愿。大革命时代以为应该废除帮会制度，其实这种帮会制度的危害，远不及意大利和共和国时代工团政治危害的万分之一。

因为有了文化方面的推动，各个大国政治才开始形成。所谓的文化推动，是用公共利益代替个人私利与行业帮会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可见，工团主义并非进步，而是倒退的。

因为利益相似而结成团体，是常见的情况。德国有很多工团，国内各个阶层的民众，如屠夫、教师、法官、杂役等都安心地组成工团。但只有法国的工团才有推翻国家自己做主人，以致文化出现倒退的行为。

假设将来工团主义获胜，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混乱动荡时代的开始。社会上的各种组织都无法抵挡这种局面。反对法律的乱民，最终一定会沦入暴君的统治，遭受外国的入侵。希腊和波兰不明白这个道理，才导致亡国。

现在，以邮政员工罢工为表现的运动获胜，仅仅是精神解体的一个结果。在工团派的大会

中，经常宣扬反对军队主义、反对爱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巴尔干事件发生之际，法国似乎要被引入一场可怕的战争，而这些人却进行罢工。可见这些人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祖国”一词对他们来说，只是空有其名的工团而已。

现在，革命工团主义和共产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这两种苛政都令人叹息。我相信前者比后者要好些，因为多数小团体的专制统治，还可以互相之间制衡一下；而社会党所梦想的一个团体的专制统治，苛刻程度谁能受得了？

由于民族性格已经逐渐被消灭，再加上自然规律普及方面的懵懂昏昧，我们已经受到了其中一种苛政的惩罚。这两种政治力量互相匹敌，或许可以缓和一下局势，但是不要寄托太多希望。

### 第三章 工团主义中无政府派的发展

#### 一

从前，先知的能力是天赋异禀的。《圣经》中提到的先知很少，而且对他们都很尊重。而现在，因为“宗教”的进步，能够预测将来已经成了一种普通能力。一天之中不预言几次的人，已经

很少见了。我这话不仅仅是针对社会党说的。这些人都是眼光长远的先知，把所有动词都配合上将来时。我想说的是那些不了解社会现实却善于辩论的人。如果你跟这些人见面谈话，想要在十分钟内不听一句预言，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们所预言的，不是关于法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将来，就是关系邻居的命运。

我也难免从众，有时候也做点预言，但是预测的时间期限都很长，以免不能达成现实。当然，我也试着做短期预言，基本上都是依据心理学最简单的理论。比如巴黎某家大报纸所登载的费莱事件，虽然此事在巴黎舆论喧嚣，但我预言在西班牙绝不会有影响。又比如对于劳动联合会，我预言他们一定会收罗无政府主义分子到麾下，现在也都得到了证实。

对于最后这一点，劳动联合会已经辞职的书记尼尔在我预言的一年之后，发表了他的意见：“刚刚关闭前门抵抗社会党的危害，又开了后门迎来无政府主义者的毒害。我们阻挡工团主义入侵所能达到的成绩，仅此而已。无政府派政客渐渐把无政府主义并入工团主义，以至于无须引用别人的言辞，就能为无政府主义政治谋求胜利。工团主义，其实就是不挂名的无政府主义。”

这种不挂名的无政府主义，完全可以作为今天拉丁民族工团主义的定义了。和平的工团主义的创建者想要发现这个含义，需要费一点时间。工人将来也会有发现的那一天。醒悟无政府主义不能成为一种政治学说，而是一种被病理学家综合在一起的病态心理，并且会发现毁坏机器、焚烧工厂、谋杀军人都是疯疯癫癫的人做的事，不能改变任何人的命运。无政府党派成员被病态的冲动激情迷惑，哪里顾得上改良工人的生活，创造像英美国家有见识的工团主义那样创造的成绩呢？

美国劳动联合会的会长冈珀斯曾经向法国的工团派表达有益的教训。美国工团成员有200万人，法国的工团成员有30万人。美国工团组织拥有巨额财富，已经成立了三百多种报纸。显然，美国的工团派对法国工团派的毫无意义的骚乱行为是轻蔑的。他们认为法国工团派的思想近乎儿戏。冈珀斯的演讲曾说：“从前，我们处在幼稚时代，也有共产派、无政府派和劳动理论家。那时候，我们的民族非常衰弱。”

工团主义不应该进行破坏，而应该从事建设。用破坏和罢工来毁坏民族工业，是如中世纪扎克雷起义一样的暴举。这一点，法国劳动者并不知道。

美国劳动联合会会长还有一个足以让法国工团派惊骇的说法：“废除工厂主不一定是进步。它也可能让我们恢复奴隶时代的状况。”

相同的论断，我们的工团派也可以从英国、德国那里听到。但是这些人心理肤浅狭隘，不能明白这个真理。只有善于观察的劳动者才能领悟工厂的生产和工资都决定于工厂主的能力。这种观念，拉丁民族的工团派从来不承认。如果有人让他们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梦想，他们一定会回答说“消灭资本家工厂主”。真是异口同声呢。

这就是从不到工厂来了解现实情况的思想家的幻想。如果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工厂的价值取决于管理者。有什么样的管理者，就有什么样的工厂。

当前的巨大困难，被近代的复杂技术扩大了。问题不在于召集工业生产的力量，而在于寻找能够管理他们的领袖。聪明能干的管理者能让工厂繁荣发展，如果换一个没有经验的生手，失败很快就会来到。自由散漫没有管理者的工厂就像没有人掌舵的航船，今天发生混乱，明天就会衰败。

这种真理对于已加入工团派的无政府党派，

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于破坏社会，代之以空泛的共产主义。其实这些人不仅是工团主义的敌人，而且也是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敌人。他们足以生存的原因，是国家力量的懦弱。国家用法律保护他们生存发展，而他们却反过来对抗国家。

我在前一章中曾经历数法律的巨大危害，现在再以1884年某位部长所创立的职业工团法来进一步证实。这个人是个好的演说家，但却是个平庸拙劣的心理学家。在订立这个法律的时候，就听到很多提醒、警告的话。上议院的一位议员说：“要担心的是，将来国会要被接受大工团命令的工人联合会所控制。”结果这位议员受到了这位部长的揶揄回答。还有一位上议院议员说：“将来要受的专制统治必定是绝对的、没有中间道路的。要么不存在工团联合会，要么受到工团联合会的绝对统治。人们都知道工人很容易服从，所以不能把无限专制的权力交给工团。”更有人指出，这个法案的结果必定会导致反对军队主义、反对爱国主义的扩张。这些都没能阻止这个法案的表决和危险的增加。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法令，工人联合会得以向国家军队和社会资本宣战，不停地鼓动人们反抗军队，鼓动放火，并且劫掠工厂。



这些狂热的人都生活在幻想之中。当社会大学开学时，若雷斯曾经根据两个革命工团党员的著作进行观察，发现这些人所要建设的，就是他们想要用激烈的革命行为破坏的。现在节录若雷斯的文字如下：“这些人所宣传的革命，其容易程度实在让我们惊愕。消灭政府，解散国会，顷刻间都如云烟散尽，军队也附和平民意见，一切都要退让。”

然后，工团要重建社会了。调停争端，和解冲突。采取的折中方法，甚至可以让今天最温和的议员效仿了。被破坏的国家要重生了。国会根据联合大会的形式重建。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有工团问题，还有土地问题、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社会的所有元素都在其中。他们所凭借的方法，大致是民主政治的规则。这些人常说我们是折中派。等到他们一旦接触到社会实际，也不免堕入和我们一样的悲惨之中。

## 二

在实现未来改造社会的任务之前，当前劳动联合会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工业都因此衰微。这些人大概从没怀疑过，工人生活在这种工业环境下，穷苦也将随之到来。我国商船航运事业的衰败也是受到海航工人罢工和要求增加工资的影响。

响。看看十年中各大海航公司红利的变化，就可以明白。

梅林在上议院发表演说，提到由于干扰立法以及工人现在的心理状态所造成的局势。现在转录1910年3月11日《公报》的内容如下。

现在所看到的工人界现状，是因为缺少经营的动力以及自主发展的动力。至于缺少的原因，则是威胁资本存在的连续不断的罢工、反对劳动自由的无法无天的迫害行为，以及反对有产阶级和金融业者的税收政策等因素。

把我们驱赶到这种境地的革命派实在是过分了。这些人的举动无异于把一只下金蛋的鸡杀掉了。如果没有富人，大家都会变得贫困，而原本就贫穷的人会更加贫穷。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普遍的穷困。

至于政治家所引用的，统计方面所显示的表面商业利益也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乐观的幻想，前面提到的演说家的言论不难加以反证。20年来，多数国家如德、美、比等国的商业利润倍增，而我国所谓的进步，实际上降到了第十位。

我国这样停顿不前，其他各民族的工业又进

步得这样快；恐怕将来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小，产品积压、滞销越来越多，于是由经济困难而演变为民族的冲突了。

别的国家之所以强盛，是因有为数众多的能为本国谋求迅速发展的青年。梅林认为将来我国官僚主义的弊端根除之后，也会有这样的青年。但我认为官僚主义正是结果。我们应该拿这个最重的病根，到我们的大学去治疗。

### 三

一个政党的成立，无论他们的政见、理论怎样，只要主张毁坏机器，或者把国旗插在粪土之中的偏激行为，都可以吸引到无数懵懂无知的人。我们的旧教育所制造的人只能这样，而不能对社会尽其他责任。所以那些无政府派的工团主义能招募到那么多善辩的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毁坏工场、切断电线等行为，无政府派成员因为惧怕法律，所以还没敢过分明显地加以提倡鼓动。而那些无政府派的教授试着发明了一种哲学，用花言巧语来掩饰无政府派的工团主义行为。

这种尝试比较困难，所以效果不佳。人们大多感到吃惊的是，最温和敏锐的哲学家如柏格森，他在法兰西学院所讲的理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工团派的《圣经》呢？所以布克烈教授说：“新党派所崇奉的是柏格森。”此外，如现代主义、新天主教派和其他种学派也不乏这种牵强附会的人。总之，这些人之所以寻求那些出乎意料的人作为导师，是被反智主义引导的。应该用有启发性的直觉代替推想。只有这种直觉能让人用一种不可言喻的欢愉情感体悟、理解生活。应该信任一切，信任工人的情感就是大众生活的情感等。

读者能理解这些话吗？我敢断言不能。我也不能理解。就算工团派也不能说他们理解。一种学说的力量就在于不能让人领悟理解，群众之所爱之如命，也因为它不可理解。就事实而言，工团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政治学说的作用在于有一个哲学理论做根据。黑格尔、孔德及其他几位学者的理论既然已经被各党采用，未免有些陈旧，自然应该再寻求一个新理论。所以无政府党派焚烧工厂，可以借用一个新的哲学说法进行，也就是“具有启发性的直觉”了。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哲学的危险倾向。它大概是忘了人类费了多少时间才能够脱离本能冲动而

进入理性时代。人类能不断实现文明进步，正是逐渐脱离了本能冲动的控制。所谓文明，就是用理性克制本能。革命及其连带的野蛮行为，是本能冲动对理性的报复。本能的哲学只有野蛮人和历史上的匪徒才使用。

革命工团主义的偏执理论以及政府的懦弱行为将开启可怕的混乱时代。结果也可能获得有限的收益。民族精神是最稳固的，哪怕想要稍有改变，也非得要用最长的时间或者最激烈的革命才能成功。革命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收效却极其微小，但有时也能给我们留下一点东西。想想那恐怖时代，那欧洲战争时代，那三百万人横死的时代，到底是在做什么事呢？只是赋予法国人以权利平等、法律平等罢了。这种平等，不用革命的手段也能获得。压路机铲平道路的力量比断头刀要强大，只是需要时间等待。但神明没有赋予拉丁民族以等待的能力，有什么办法呢？

## 四

工团主义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但想要深入研究，没有巨大篇幅是不能详尽说明的。本书所论述的，也仅仅是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工团主义能脱离无政府主义而与共产主义相抗衡，或许能有点好

处。共产主义让我们越陷越深，必定会让我们落入奴隶一般的所谓平等的穷困中。

更不能忘记并且不怕反复论述的是，工团主义是共产主义不可驯服的对手。把二者合起来说，相当于把基督教徒和自由思想教会派混为一谈。不明白这个区别的人，和不愿意承认这点区别的社会党员，我非常希望他能读一读工团派的波尔斯的书。他对两派的区别分析非常详细。共产主义是国家主义的极端表现，而工团主义反对国家的干涉最为激烈。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攻击得更多，说后者“代表了对进步的抵抗或对进步的分解”。至于被社会党苛刻对待的资本主义，工团派非常明白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波尔斯对此说道：“工团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它用个人的自主行为以及协作精神产生的果敢，通过社会劳动创造出无限的人类生产力。”

社会党已经逐渐屈服于对手，已经知道工团主义意在夺取他们在工人界的选举人。由这种敌对形势可以窥测将来的战斗，但我们不必过于恐惧。因为战斗不可避免，但还没有发现其他因素会助长这种形势。其实斗争无处不在，如不同动物种类间的斗争，民族间的斗争，个人间的斗争，直到我们机体内细胞之间的斗争。这最后一种斗争当然看不见，但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和我

们一起前进，或者反对我们前进，都要看我们自身的选择。有自然需要引导我们，我们无法避免。你大可以诅咒、诋毁它，但你也还是要心甘情愿接受它。

# 第五篇 关于殖民政治心理的错误

## 第一章 法国的殖民原则

### 一

东西方经济领域的冲突，是20世纪应该重视的事情。将来或许会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导致被毁坏的东西和所流的血，都比过去的战争更多。处在这两种文化冲突之中，殖民地的主要管理者责任因此更为重大。我们要保持与殖民地的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对此攻击驳斥了，所以我们更不应该淡漠地对待殖民地的发展。

在欧洲，各民族所建立的殖民地治理原则视种族而异，但大体上不外乎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几乎是我们所专用的。第二种则是其他各民族大多使用的。这些国家建立殖民地，是为了保存该地并收取利益。而我们对于殖民地，则是要用我们的制度和观念来统治该地。所以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一样地嫌恶拒绝我们。我们自信理由十分充足，于是固执不变。这是在等待灾祸频繁发生，来证明我们的殖民原则，不管从理论上讲，



还是从实际上讲，都是令人痛心疾首的错误。

我曾在《印度文化》一书中阐明英国对殖民地所用的侵略和行政管理的主要原则，对印度论述尤其详细。为什么这个地方能以如此巨大的人口和财源隶属、臣服于英国；英国的治理方式有多么慎重；最近是因为怎样的一种错误的心理原则，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将来或许就要脱离征服者而独立……

本书不能细致地叙述一切内容。我就在本章中，仅就法国对邻近的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的治理观念，以及在当地实行之后的成绩，做一评述。

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非常多，其中有两本书，都是有见识的人所著，可以代表舆论的基本情况。其中一位作者是法兰西学院的博学教授勒罗伊·博利厄，另一位作者是前任领事维尼翁。

本章中，我的目的不在于详细探究我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成绩，而是要考察研究此前以及今后政府统治的根本心理观念的价值。我的评论只针对原则，而不在于执行的个人。今天的这些政治家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理论的需要。所以需要是舆论之子。有可以议论的才是舆论，而

不在于强迫谁来顺从接受制造舆论的人。何况现在有没有谁能离开舆论的手段而达到统治目的呢？舆论可以改变吗？不能。法兰西民族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最容易革命的民族，其实却是天地间最保守的民族。

阿尔及利亚的面积和法国相等，人口却只有归顺于我们制度的500万穆斯林。但这种服从却需要6万人的军队加以巩固，而英国人在印度管理2.5亿印度人的军队数量也不过如此。印度有穆斯林5000万，他们的可怕和难以统治，也不下阿尔及利亚的同教信徒。

在这些穆斯林中间，又有80万欧洲人，法国人占一半，其余的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这些欧洲人不和穆斯林通婚。因为这种通婚势必会在将来形成一个在性格上有区别的新人种，他们会把阿尔及利亚的利益看得比祖国利益还重。现在他们对待祖国就已经像是施舍恩惠的保护人了，专门为了供给铁路、公共设施和各种救济金。

至于民众中的大多数穆斯林，则是非洲侵略者的后裔。三分之二为柏柏尔人，三分之一是阿拉伯人。两种人的区别非常微小。想要区分穆斯林，可以看他们是游牧还是定居。但这两种方式

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中都有，所以也不能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单纯用游牧和定居来区别。

勒罗伊·博利厄的著作可以用“穆斯林法国化”一句概括。这也是法国对于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流行观念。

至于采用这种法国化的国民政策，它的野蛮程度，和从前美洲移民对待红种人所用的方法相同，剥削他们的游猎地，让他们饿死。

再看看维尼翁所述的我们政府所用的驱逐原则，其余的就不用说了。

总督们对待那些反叛部落的办法是，每次反叛就没收一部分土地。政府看到这种方式，还能不效仿吗？所以他们也选择好的地方进行移民，把土著驱逐到远的地方。欧洲移民越增加，土著的土地就越少。那些把居住地看作祖宗遗产的部落原住民，现在大多被驱逐到家园之外。30年来，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了。在一个地方被不停驱逐的阿拉伯人，无法定居进行生产劳动，因为劳动成果必定会被别人侵夺，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尽力耕种或者改良土壤。到了另一个地方，部落耕地又会被别人侵占，连水利设施都不能享用，无法抵抗干旱，粮食收成完全不能自给自

足，牲畜数量也日见减少或者干脆失去了。总之到处都遭受着无限的痛苦。所以土著对于移民的痛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与日俱增。

1863年元老院的决议书固然曾经宣告有产业的部落可以享有自己的产业，但不能废止驱逐的方法。现在只是改变名义，称为公益征用罢了。这个方法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夺取土著的土地交给移民，构成欧洲人的范围，把土著排斥在这个范围之外。另一个是让失去产业的土著遭受穷困。原土地拥有者的赔偿金由法院决定，大致是每公顷50~60法郎不等。之前，土著有30或40公顷的土地就足以供养一家人，生活一辈子绰绰有余；现在，却变为1500~2000法郎，一两年间就会用完了。

因为国家专权的干涉而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怪异的统治方法，可以称为政府殖民了。想要知道这种方法的可悲历史，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作品，不难看到结果。把土地分赠给被学校教育摒除在外的人。这些人不会耕种，就像不能教授梵文一样。政府还出面创建村落，现在已经变成荒地了。这种种举措所耗费的巨额资金，还不足以让我们的行政官员们觉悟。几年前，某位总督还提出用5000万法郎征收阿拉伯人的土地，创建官办村庄的请求。幸好这个提案被两院否决了，否

则穆斯林将发生新的叛乱，而我们要虚掷上亿资金，也是可以预见的。这个提案虽然被否决了，但当时也曾经被提出来进行讨论，而且差一点就通过了。可见法国的舆论界对于殖民地事务的观念有多么幼稚。

有了阿尔及利亚这样的经验教训，还要怪代价重大吗？计算一下给那里花费的资金，减去收入后，净耗费40亿法郎。牺牲这么大，就能巩固当地统治吗？这只是自我安慰罢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想要维持相对稳定，还是要常驻军队的。

## 二

自从入侵阿尔及利亚以来，两种根本原则交替使用，都是由殖民舆论引发的。其一是没收阿拉伯人的产业，不久又驱逐他们到沙漠地带。其二是用制度强迫他们接受法国化。阿拉伯人不肯顺从接受驱逐。原因很简单，沙漠不能让人生存。这数百万人在认命做饿殍之前，现在都开始抗拒了。既然他们不愿意接受驱逐，那么还能让他们法国化吗？也不能。因为哪个民族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心理构成因素而服从别人。

这两种方法都很恶劣。就算交替使用，还是

不能侥幸地改良统治局面。即便这样，这种有害的经验还是被屡次运用。直到将来某一天，我们的统治者才能觉悟，到那时才知道这种方法不对。然后再利用被侵略地的制度、风俗、生活信仰来管理，就像英国人、荷兰人统治属地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简单、最省力也最慎重的方法。只是这种方法现在很难实行。舆论界反对政府的行为，和书报刊物中所表达出来的观念，都足以证明。

西方世界的宗教信仰几乎脱离政治，我们因此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在欧洲，很少有人明白东方的宗教问题比其他各种问题都重要，政治的或者民主的制度，公共的或者个人的生活。穆罕默德的弟子就像湿婆的信徒或者释迦的信徒，都由宗教规则来规范。饮食、起居、耕种、收获，东方都看作是宗教行为一样。英国人深知这一特点，所以本身虽然是严格的新教徒，但仍不惜重新修建寺塔，赡养湿婆和毗湿奴的信徒，并且不包庇英国本土来的传教者。今天，如果想在英国统治的范围内找一个主张宁肯让属地灭亡，也不废弃统治原则的人，是不可能的。

保护穆斯林，要依赖有势力的伊斯兰宗教组织。与其削弱伊斯兰教会的权势，倒不如加强它。这是我们的政策应有的基础。法国派驻突尼

斯的总督是一个少见的熟悉东方国家情况的人。他曾经示意突尼斯当地的行政长官颁布宗教命令以安抚信徒。他的政见可谓深远了，但还是没能维持长时间的统治。

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习惯，就是尊重发源于宗教信仰的制度。但勒罗伊·博利厄反对这个意见，认为这是放任的政策。而且说完全尊重所谓阿拉伯民族的习惯和风俗，无异于令我们的军队和移民离开非洲。

为什么尊重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必然会导致军队、移民离开非洲，这位先生忘了告诉我们理由。但我相信他必定难以自圆其说。我前面所主张的政策，也就是英国人在印度对待穆斯林的政策，英国人可没打算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勒罗伊·博利厄所提的建议，和我民众主张普遍平等的观念正相符。这一观念在于“让土著融入欧洲人”。这种融入，是“让两种本源不同的人民都处在相似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中，服从相同的法律。在生产过程中听从同一种引导”。

这种纸上描画出来的景象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只是这些1793年革命最激烈时期的，和今天的理论家们所抱有的平等幻想，甚至不值得印度

小官吏的一声嘲笑。一个人可以成为杰出的博学家，却不了解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思想、感情上的巨大差距。

这位先生对于融入政策也预言了一些困难，但认为这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他认为“柏柏尔人与欧洲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宗教”。我们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根据在哪里，但无疑是错误的。如果说文明的欧洲人和今天的柏柏尔人的巨大差异，与酋长布伦努斯时代的高卢人和今天的巴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相似，这还差不多。

根据勒罗伊·博利厄的看法，柏柏尔人和欧洲人既然很相似，那么应该法国化的只有阿拉伯人了。方法也非常简单容易。所以他说：“应该从根本上改变部落制、原始的公有制、多妻制。这三者改变后，再在细节上调整，以合乎时代，就可以了。”

这种足以让社会党欢欣鼓舞的小改变，这位先生认为非常容易，所以连改变的具体方法都从略了。但我认为，只要稍微熟悉阿拉伯人，了解他们的心理构成因素，必定会认为这种改变的难度，就像让澳大利亚的土著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或者是让两栖动物飞翔。



勒罗伊·博利厄还说阿拉伯人是野人，说他们的组织就是“一切游牧种族的组织”。他相信所有阿拉伯人都是游牧民族，而所有柏柏尔人都是定居民族。其实这两种方式，在两个民族中都有。最纯粹的柏柏尔人如图阿雷格人，都是游牧民族。据14世纪依本伽东的叙述，在阿尔及利亚，游牧和定居的区别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从文化能力方面对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所做的区别，是从前几位著作家表面观察的结果，不足以作为证据。我现在要反复说明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中，游牧、定居两种方式都有，具体要看土壤情况，而不是用种族加以区别。沙漠平原中，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会游牧，而肥沃富饶的地域，他们就定居下来，聚居生活。阿拉伯人从事游牧和定居两种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以及阿拉伯本土国家都有。

从智力发展上观察定居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两个民族相差不多。如果一定要评判高下，那么宁肯认为阿拉伯人好一点。因为这个民族从前曾经拥有一种最先进的文明，而柏柏尔人的文明还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

勒罗伊·博利厄所最注重的改革，是废止多妻制，但也没有说明废止的方法。他曾具体说明一

夫一妻制的优点。他说：“家庭应该限定在一妻的范围。否则，会缺乏家庭精神，丧失兴盛的动力。这就是阿拉伯社会停顿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不愿深究这个问题，并且嘲讽、毁谤所有东方人都是多妻者。要知道这个习惯的存在肯定是有几种力量强大的原因的。我也不想评判东方人的法定多妻，就好于欧洲人遮遮掩掩的多妻现象及成群结队的私生子。这种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可以参考我著的《阿拉伯文明》。

多妻制没有导致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停顿，现在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把希腊、拉丁文化带给我们的人，正是阿拉伯人。600年间，欧洲各大学，即使巴黎大学也包括在内，专门从事翻译阿拉伯书籍，并且使用他们的研究方法。阿拉伯文化是历史中最灿烂的文化之一。不能因为他们的文化已经衰落，就认定多妻制是他们停顿的原因。

这种德高望重的教授又说多妻制仅限于富有人家，但其实数量很少。那么又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至于说多妻制是阿拉伯社会停顿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不知道他的根据究竟在哪里。

勒罗伊·博利厄把我们的拉丁式教育方法作为改变阿拉伯人的方法之一。这种普遍的观点，我从前也曾经赞同。只是自从游历渐广，观察的事物渐渐多了之后，才幡然醒悟这种方法不足以凭借。我这个观点固然不能取信于任何一位读者。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不能不在后一章详细说明。由它可以知道，欧洲人的教育方式，只能让土著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成为可怜的人。

我们对不同于欧洲人的民族实行欧洲式教育的结果不难预料。这种教育经过了世纪之久的改变，才适合了我们的情感和需要，不能再适应不同民族的情感和需要了。非要实行，那么第一个结果就会让阿拉伯人、印度人，或者其他东方人突然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据，比如制度、信仰等遗传的观念。如果勒罗伊·博利厄和其他主张对阿拉伯人实行欧洲式教育的观点实行，那么阿尔及利亚之于我们来说，将如同从前的韦尼蒂对于奥地利，今天的爱尔兰对于英国，阿尔萨斯对于德国的关系。

我国的历史研究者有时在书中惋惜狄普来侵略印度的时期不在。惋惜可以，但不能过度悔恨。如果当年统治印度与我们今天统治本地治里和其他属地一样，换句话说，就是用勒罗伊·博利厄所述的原则，那么印度人早就已经水深火热，

进而反抗脱离我国统治了。

在越南，我们已经铸成相同的大错，导致那里成为不能容忍的、统治衰落的领地。我们任用政治人员治理东方人。这些人带领一队官员，像管理法国的一个省一样治理该地，没有人了解一点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处处掣肘。如果根据阿尔芒的说法，该地每年可以供给法国本土2亿法郎收入。而现在，不仅没有收入，还要本土输入巨额资金并派驻军队，得到的却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深深愤恨，让我们丧失了声望。由此可见，我们并不了解其他民族的需要、情感和观念，并且也不能有效地统治其他民族。

### 三

把外来民族的制度、观念、需要施加于殖民地的土著民族，这种危害非常明显。我们可以再多加一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实行。欧洲教育暂时的表面的成就，对于改变当地人来说，力量非常微小。如果你和毕业于英国在印度所办的学校的印度人谈话，会发现这些人所受的教育虽然和欧洲大学里的学生们相同，但在观念上却和我们相距甚远。那些继承罗马帝国遗业的蛮族，需要经过久远的时间，才能成就适合于他们自身需要的文化、语

言、艺术。所以，大的变革只有时间才能实现。

两种迥异的文化相互碰撞，是决不能融合的。这已经经过历史证明。那些侵略民族能影响其他民族的原因，是他们在情感、观念、制度、信仰上相距不远。东方人统治东方人比较容易，西方人不能做类推。

这就是阿拉伯人能够在东方世界具有重大势力的秘密。现在他们还在非洲、中国、印度等地拥有这种势力。他们所到之处，都能让那些与他们接近的民族适合自己的文化要素，比如宗教、语言、艺术等。而一旦在一个国家里稳定下来，伊斯兰文明便似乎能够一直存在下去。它能让印度古老的宗教退让，又能让波斯、希腊、罗马都不能同化的法老王的埃及，接受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教徒在印度有五千万，在中国有三千万。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他们已经渗透整个非洲大陆，而那些欧洲的传道者，只能在同一地域内遭受可怜的失败。当欧洲的探险家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非洲中部，却发现阿拉伯商队早就来过，所过之处，宗教、语言都已经开始流传。

欧洲人可以是成功的殖民者，但唯一一个开化的民族，其实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只有他们能让别的民族接受自己的宗教信仰、制度

和艺术。

欧洲人统治一种落后的民族，比如英国人统治印度非常容易，但想要改变他们的心理，则是不能有的妄想。我们的主流情感需要和他们相距甚远，不能使他们越级前进。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文明，不一定适合这种民族。我们的民众所创造的生活、一直以来的动荡、经常发生的革命、人的自然需要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劳动、工厂和矿井里的工人的生活、只有劳苦没有自由的状态，都不能够影响他们。我在游历中，经常遇见来自东方的游历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没有谁被我们的文明诱惑和驱动。东方人在和欧洲人接触之前，都认为比欧洲人更为幸福，更为正直，也更为有道德。而我们的文化对于东方人的唯一作用结果就是，让他们的境遇变坏，让他们更为窘迫贫苦。

想要阐明上述道理，非要一章的篇幅才能说清楚，现在不过是说个大略情况而已。我希望勒罗伊·博利厄先生深思一下。想要用教育达到法国化的目的，虽然是现在法国国内的普遍观点，但有学识的人还是不能一味盲从主张。

不如让社会党来主张这种观念。一个种族的制度进步，有一种必要的联系性，不能任意选

择。要根据发展进化的规律，以及适合需要。不必追求理论上比较优越的文化，只求适当的文化就可以了。

20年间，我曾不间断地主张这个说法，现在渐渐有听得进去的人了。阿尔芒大使是熟知东方情况的人。他在著作中表达意见如下：

“种族和社会形态会因为自然以及发展环境的不同，而程度有高有低。相距越远，用同一种法律、同一种教育方式进行管理和教育就越难。不承认这个道理，就是殖民者和殖民地民众最大的和最不幸的错误。”

这种信心是由考察实际情况得来的。欧洲人想要拓展领土，让异族臣服，就应当遵循这一点。进行统治的时候，一定不要用同化的方法，要尊重适合于这种民族精神及物质需要的心理构成因素和社会政治组织。这样做，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都有利。

我国的多数政客都离这种观念太远。我国的行政官吏常常对殖民地民众宣示自己的人权主张，想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制度有多好。这种幼稚观念可以作为他们对殖民地心理认识的标准了。

## 四

除了对殖民地实行同化方法，还有连带的激进党派的专断方法。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即使最小的政治领地的总督，也经常以君主自居。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奥地利、亚洲等国的暴君无异。《晨报》1910年3月29日的一期载有某位在圭亚那的旅客的信件，可以作为证明。现在节录如下：

“国内派驻属地的高等官吏，都想在当地经营某项事业以求利，或者是谋得一个议员席位。如果驻留时间长一点，则染上一种专制的疯病。颁布皇帝的上谕，命令捉捕缉拿民众，不法监禁，驱逐出境，恐怖的气氛遍地都是，酝酿出混乱局面。这些行为一旦过于激烈，他们被中央政府召回，也会立即派往别处，接受有利的使命。”

至于那些不幸的移民，根本没有安宁可言。政治上受专制，商业上受专制。关税率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官吏收受贿赂优待甲而压制乙。营业没有安全保证。如果买地种植椰树，报告时政府答应给80生丁补助金，等到资本已投入之后，补助金却减少到30生丁。怎样发放，预算上没有定额。如果当事人提出要求，对方则必定驳斥



说：“政府又没让你们来，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由此可知殖民地的景况。只要跟相邻的地方比较一下，成绩明显。英属以及荷属的圭亚那日渐兴盛，而法属的圭亚那则日渐落后。

我在前面节录过科特迪瓦现任总督的布告，从中可见我们殖民方法的恶劣，过度扰乱了民众心理。英国《非洲邮报》曾对它的危害发表看法：“两年以来，科特迪瓦变成了战乱不绝的地方。这种状况在近代非洲西部的历史中从未见过。政府种下的祸根，政府就要接受结果。”

从科特迪瓦的现状所得到的教训大概有几种，最重要的是残暴的税收政策。向那些森林中的部落征收重税的疯狂举动，只有用野蛮的方法，如焚烧村落、抢掠，才能实现。

如果自称文明的政府却把土著首领的头颅悬挂在长矛上示众，如果要扣押土著村落的收获来纳税，又怎么能怪当地民众要叛乱，要脱离这个可恶的政府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德国人的殖民成绩也不见得不好。但这种自我安慰无济于事。德国人所用

的方法有时候也很暴虐，但他们的方法很多，能人也不少。所以他们能获得刚果殖民地的财富。他们从没有自居为人类的功臣，他们仅自认为是本国的功臣。而所谓殖民的目的，如果说出什么来，也就在于此了。

## 第二章 欧洲教育对落后民族的心理结果

### 一

法国对于殖民地的看法前面已经研究过了。所要说明的是一个专门问题，也就是欧洲文明、我国主要制度、教育对殖民地土著的影响。这个问题在法国是常被热烈讨论的问题。舆论和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选择的错误道路，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专门注意的是，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越南的黄种人、马提尼克的黑人，在这些地方强制实行我国的风俗、法律等，想要像统治法国国内的省市一样统治他们。

这个问题不仅对法国关系重大，而且也是个国际问题。凡是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迟早有一天会提出这一点。

我所主张的原则，在国内赞同者非常少。要

知道这些固执己见的人，要经过多次游历有所收获，才能相信有这种说法。英、荷所属的殖民地采用了这种原则，日益兴旺繁盛。而我们使用不同的心理方法，以致相形见绌。从统计数据中所表现的来自殖民地代表的诉讼以及预算负担的日益加重，就可以知道了。

## 二

在各种文化要素中，人们认为教育最重要。现在就专门研究这一问题。

欧洲教育对于土著民族的成绩没有明确证据可说。我前面所述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人们可以回答说那是因为施行的范围太小了。还有人说，应该举一些别人在殖民地的观察来证明。那么就先说一说英国人在印度所实行的欧洲式教育的经验。这种经验在2.5亿人中实行，为时七十余年之久。历史中能称得上重大经验的，应该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

这一举措由麦考利提出。1835年时，他是加尔各答总督府参事。他认为印度的书籍和学问都不如《圣经》和英国作品。受他影响，本廷克总督及政府于是决定，印度的英国学校专门教授英国文学和欧洲科学。试验开始后，一直继续下

来，从未间断。印度今天所设的大学有四所，普通学校13万所，学生300万人。教育经费每年5000万，以三分之一供小学使用，其余则供给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之用。

如果从直接的功利目的而言，英国人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的廉价的下级官吏，以供邮电、铁道等处各部门使用。如果使用来自欧洲本土的英国人，价格要增加20倍。这个好处实在无可厚非。

但这仅仅是就这一方面说的，此外还有别的需要仔细研究的地方。一个是，被英国教育所熏染的人，他们对于施行这种教育的殖民国家来说，是敌是友？另一个是，欧洲教育能增加他们的知识，增强他们的道德性吗？

对这种问题，在理论上的回答毋庸置疑。教育难道不是宇宙间包治百病的良药吗？能在欧洲取得成绩，在印度也应如是。何况印度民族的文化还是最古老、最发达的呢。

但是，来自现实的情况与理论绝对相反。足以让教师们惊愕的是，欧洲教育把印度人的精神世界打乱了，让他们失去推理、想象的能力。后面我会专门论述道德低落的程度像其他方面一样。

这是今天主张进行欧洲式教育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地方。这种观点可以从莫尼埃·威廉姆斯的书看到。他之前是牛津大学的梵文教授，也是和我一样在印度游历过的人。他的书中说：

“我对于教育事业的总体成绩的看法，感觉并不好。这是不能不自己明白承认的。我已经见过很多接受了不良教育，导致不良成长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特点，没有精神。这种人可以在书本中获得多数知识，但是缺乏坚定的思想。他们大多数都是只会说教，似乎都患上了一种语言疾病。他们不能持久努力，即使有一点行动力，想要做点事情，可是行为却不符合规矩，与他们所宣称的书本理论相悖。”

“就算他们放弃了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学、哲学和固有的阶级传统，以及长久流传的习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是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好学生、正直的怀疑派，或者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们尽力培养这种所谓有学问的殖民地原住民，他们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利用他们所受的不完全教育来反对他们的师长。”

所谓有学问的原住民有语言疾病，的确像他说的那样。他们一看见欧洲人，就庄重地询问这

个人喜欢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还是蓬松·杜泰拉伊，英国国王是否在伦敦打猎，以及国王有几个妻妾。

观念上的无法沟通是显而易见的。毗湿奴、朱庇特、英国王储、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古代的共和国、当代的君主制国家，都在他们脑海中出现。他们也很容易就把英王、国务总理和王储，想象成婆罗门教中三神一体的梵天、湿婆和毗湿奴。即使接受了英国式教育，但他们还是会借助民族传统观念来解释新事物。

### 三

欧洲教育培养出来的民族是敌是友？这个问题前面所举的文章已经有明确回答。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印度人中，受英国学校培养的人，没有不反对英国的；而被印度本土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则相反。他们认为英国的管辖统治比蒙古国要宽松，而且可以享受平和的环境。

想要知道接受欧洲教育的印度人的意见，只要读一读他们刊行的多数报纸就够了。他们对待英国政府的言论，比我国的在野党对法国政府的批评都苛刻。从前以温和出名的印度人，一旦接受了英国式教育，就立即变成凶徒。至于英国还

能保存声望的原因在于，这种攻击言论在印度的大多数人中得不到响应，因为识字的印度人太少了。

英国人所培养的印度知识阶层，都把“印度属于印度人”作为口号。但这个口号实在缺乏意义。因为印度种族非常多，语言不下二百种，各部分没有共同利益。除了村落和种姓外，他们没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要求。

这种知识阶层还不甚可怕，是因为人数太少。但他们的数量在逐日增加，将来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必定会有受威胁的一天。

## 四

欧洲式教育能否增长印度人的智慧，以及能否让受教育的人变得友善，这一问题，都已经分析过了。现在要说的，是欧洲教育能否扩展印度人的道德性这个问题。

答案很明确。欧洲教育不仅不能增长印度人的道德品行，而且会让它低落到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程度。这种教育把平和正直的人变成欺诈贪婪不知廉耻的人，对于同类则傲慢专横，对于主人则卑躬屈膝。现在再举前面提到的英国教授的

文章以证明。

“欧洲人固然有很好的美德，但恶劣的地方也不少。印度人学习我们的优点很少，而学到的缺点则很多。富于经验的军官常常跟我说，刚并入新土地的时候，居民都不会欺诈、虚伪、吝啬、好诉讼以及其他缺点。并入之后，在法庭前和正式交际场合中，这些缺点开始表现出来。”

接受英国教育的下级官吏，缺乏道德性尤其明显。英国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严加防备，以免铁路、邮局的员工被他们影响。

为什么接受欧洲教育的人一定没有道德呢？因为我们的教育不适合印度人的心理构成因素，以至于破坏了他们行为所依据的传统势力和旧有信仰。他们既丧失了先人遗传下来的道德，又不能采用欧洲人的主流道德观念。从前的印度人，需要非常简单；新的教育却让他们产生了无数不能满足的需要。他们一方面轻视同族，一方面又自知是被主人轻视的。他们在社会中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窘迫困苦，陷入迷途。所以一下子变成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人的劲敌。

这不是不适合一种民族心理构成因素的教育本身所造成的结果，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印度的



知识分子，接受印度本土教育的人，都是正直可亲的人。他们中有多位列席欧洲学者会议。他们那种可钦可敬的态度与那些英国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既傲慢又卑微的人不可相提并论。

憎恶师长的心态，不仅印度是这样，我们在越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收到了同样的结果。读1909年12月27日《新闻报》所载的越南总督克罗比古斯基的报告可以知道。报告详细叙述了越南人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结尾说：

“谈话中，讲演中，人们都非常激动。人民反对法国政府以及对我们的事务有帮助的越南官员。除了传播冒险观念的知识分子外，情绪最激烈的人是毕业于大学但没有取得相应社会地位的人。他们自负于出身，却又被社会事务摒弃在外。其中有我们眼看着他成长的人，这些人要求非常多，学问却一知半解，据说还想要达到日本人的程度。”

克罗比古斯基看到了拉丁同化观念的坏处，又表达了忧虑之情。“想要用我们的习惯和社会观念，改变他们流传几个世纪的礼教，这不是在劝他们进步。”有一个例子，越南的乡制最好，却因为我们政府的屡次直接干涉，发挥的作用常常受到阻碍。

对于世代遗传下来的东西不应该做大的改变。它们都是一个民族法律、风俗依据的因素。它们被时间巩固，不能更新，不能违反习惯。我们在政治和行政范围内进行的突然改变的举措，会对未来造成威胁。

## 五

放下这个不说，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大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大多数法国政客的观念，都认为非得用教育进行法国化不可。这个地方的民族跟印度有区别，所以结果或许会比英国人在印度的下场要好。

想要考察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的教育情况不容易，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在学校学习的很少。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结果。现在节录保罗·杜马所著的《非洲的法国人》一书如下：“1868年是个灾荒年。阿尔及利亚大主教拉维热里收养了很多当地弃儿，希望借此传播宗教。但这种慈善行为的经验，可以当作教训，也可以让人叹息。不久前，我从阿尔及尔到君士坦丁去的途中，和一位地位尊贵的教士谈话。他对于改良阿拉伯人似乎已经绝望。”

据他所说，拉维热里的孤儿院“收养的孤儿有四千人，但他们成为基督教徒的仅百人，其余人都回归伊斯兰教。这些孤儿在阿尔及利亚名声特别恶劣。欧洲移民雇用他们，不久就会辞退。所有民族的恶劣品性，比如偷盗、懒惰、嗜酒，以及我们的坏习惯，他们都有。人们也试着让他们通婚，并把他们安置在特别的村落，给他们工具，又给他们土地耕种，但结果却实在可悲。1880年，这种村落里竟然有人杀害了神父。”

前面所讲的经验，对阿尔及利亚来说都并不陌生。教育对象是儿童或青年，教授的方法或者是学校的书籍，或者是人的口授，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各种纪律中，足以约束、规范人的，当属军队纪律。阿尔及利亚由法国军官统领的军队所招募的阿拉伯人，能在数年的接触过程中法国化吗？不能。阿拉伯人是勇敢的士兵，我没有异议。可一旦脱掉军装，他们被浸染的最少的那点欧洲元素也就同时被剥去了。

“士兵退伍之后，穿起原来的衣服，回到原来的村庄，或者游散在外。每天只想着吃饱了，娶很多女人。在道德信仰上，他们只信一个神，那就是上帝和上帝的唯一弟子穆罕默德，和法国人差别巨大。他们和法国人相同的地方，只有恶劣的缺点。其中有一种缺点，是他们后来学的，

那就是嗜酒。”

如前所述，通过教育把我们的文化灌输给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难比登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些曾经研究过阿尔及利亚的人，他们既没有偏见，也不涉及个人利害，但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认为。即使对象换成从摩洛哥到亚洲腹地的穆斯林，也都认为我们的教育能把伊斯兰教徒变成强敌。有见识的伊斯兰教徒答复我的咨询时都说：“我国这种教育试验的结果是，把他们民族的特性改变了，让他们生出很多不能得到满足的需要。总而言之，让他们民族的命运更暗淡，把他们变成不安分的人。”如果把这种教育在我国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普及，那么接受英国文化的印度知识分子的“印度属于印度人”的呼声，将变成“阿尔及利亚属于阿拉伯人”的呼声。

这种事实在印度，在阿尔及利亚，或者在别处，都完全能够证明想要用教育来改变民族，是没有希望可言的。继续实行这种试验，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如前所述，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反对教育的人。我只是想说明，适用于文明的欧洲人的教育，不适合于其他文明，更不适合于没有教育基础的民族。

欧洲教育对文化落后的民族有所帮助的地方，只有技术教育、简单知识的教授，比如算术和适用于农工生产或者手工艺的知识。可以作为根据的，仅此而已。如果教给他们法国君主系统或者百年战争的原因，我没见过他们谁会对此产生兴趣。

### 第三章 欧洲制度和宗教对落后民族的心理结果

#### 一

如前所述，欧洲教育的结果，只会让原住民风俗败坏，变成欧洲人的敌人，而且不能增长他们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不再讨论。现在就另一个同化要素进行论述。这个要素就是制度。欧洲制度是否能影响殖民地的土著民族，又是一个问题。

改变制度以改造某一民族，这种观念在法国颇为流行。我国的制度似乎非常先进，再加上我们的民族有一种统一的嗜好。时间上的统一自然不可能，空间上的统一似乎可以达到，于是他们把纯粹理性的和抽象的政治理想作为真理。想要像布道者一样，把它传播到世界，求得人类的幸

福，这种实现法国化的方法真是百折不挠。

我们的国人是想凭借这种理论引导人们把殖民地都改成国内的省市行政区，而不管那里是黑人、黄种人、阿拉伯人还是野蛮民族。他们都应该享有我们的大原则，以及公布的人权权利。所有殖民地都应该有普遍的选举制度、自治机构、各级委员会和审判机关，在两院中有议员代表。他们想让那些思维还与我们石器时代祖先相似的黑人越级前进，一蹴而就，跳过现在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

这个方法实行很久了，所以不难看到结果。危害还用说吗？昔日兴盛的地区，现在都变为落后的地区，预算上都要依靠国内供给。

这种衰败局面固然是由于同化造成的，但殖民地要求同化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一直都没停止过。我们可千万别认为他们这样的要求，是真赞赏我们的行政司法制度。他们是想要得到跟本土相同的财政利益。与其效仿英国在殖民地，由当地出资建筑道路、海港或运河，我们殖民地的民族宁愿国家承担这种公共工程。他们所追求的同化，是想要成为国家养活的人。听一听留尼旺岛首脑的话，就能发现他们的本意。他说：“我们希望殖民地渐渐被本土同化，成为一个省，但不

愿意因为同化而像法国本土人民一样纳税。”

## 二

同化的制度从理论上说，看似很简单，所以才具有诱惑力。但就实际而言，复杂程度不可言说。我国的行政司法制度最复杂，因为它适合的是一种最久远文化的复杂需要。在文明的国家中，行政行为最烦琐，就像生死、婚姻的条文，数不胜数。即使就法国国内而言，懂得自治机构事务、各级委员会事务、调解法官职责、初审法庭职责、上诉法庭职责的，又能有多少人呢？现在却想让黑人、阿拉伯人、越南人都明白这种复杂的体系，完全采用，可能吗？还要想到，需要对种种违反的行为进行处罚，增设监管他们行为的官吏，还要为买卖一点土地、索还一笔债务规定各种条文格式，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民族只接受能适合他们需要的制度。如作用简单的审判、赋税制度，他们都已经熟知了。想要对这些生活上不愿意受到拘束的人，用复杂制度加以管理，我们所谓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就是苛政。

这种困难不足以阻止我国理论家们的热心，他们还是想强迫殖民地获得这种“幸福”，让他们享有我们这种复杂制度的利益。

为了维持这种制度，于是派遣无数官吏。这算得上是我国唯一重要的输出品了。马提尼克一个地方的居民95%是黑人，而法国官吏有800人之多。我国在印度还保存的三四个村落，除了上下院议员不计，官吏也在百人以上，其中法官有38人。而在越南，官吏都可以组成军队了。

官吏离国赴任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热诚。但实际实行后，才知道强迫一个民族放弃固有制度而服从别人，实在是书本中的幻想，结果只有制造混乱而已。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他们只好另外寻求一种制度，以调和各方利益。但效果并不好，不能满足任何人的要求。偶尔遇到严厉的总督，会对这些官吏免职，殖民地才能得到暂时安宁。这就是康斯坦斯在越南实行的方法，裁减多数官吏，让一个小城市安定，每年可以节省开支八百万。但他离任之后，那些被裁的官员就复职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种恶劣结果不应该都归罪于官吏无能，而应归咎于职务太小。当他们离开法国的时候，就赋予他们推广实行我们的制度的任务。不能拒绝，也不用了解。看着很容易，但一到地方就发现困难重重，官员无能为力之感顿生。所以总督们大多放弃这个过于沉重的任务。越南在六年之中换了15个总督，每人在职时间五个月而已。现



在固然不乏任期时间长的，但实际上是因为报酬高，或者上面把这种位置给了那些有势力的政客。

每位新总督上任时，知道前任总督失败之处，于是试行另一种不同办法，但恰恰又增添了混乱局面。而且这些方法也并非出于他们本人的主张，其实都是遵循国内电报传来的强迫性命令。前述的总督康斯坦斯在下院演说时曾说：“我在任六个月，已接到四位总长的授意。每个人都给我不同的命令。”

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刚开始还只是社会混乱，接着就会有公开的暴乱。即使不这样，也会积攒民众的痛恨情绪。对于这一点的证明，很不幸，都是一致的。越南海盗聚众扰乱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于当地民众的爱国心，而是非要招募原本平和的民众做运输工，让他们离乡背井做苦力；焚毁他们的村庄，虐待民众，并征收重税。税额有的要超过物价的两三倍。海盗是我们的行政机关所造成的灾祸，以及我们所包庇的当地官员过分恶劣的结果。

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可悲结果，不仅在越南是这样，在所有新旧殖民地都一样。例如让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全部归顺我们的制度，几乎导致

我们丧失了这块殖民地。又比如科林在巴黎某个大报上所述的，在塞内加尔所见的事实，也完全可以看出，强迫实行我们的制度的危害。他说：“排斥、废止黑人的社会组织，无异于酝酿一场永久战争，让一切崇奉偶像的人、穆斯林和奴隶都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些都是在殖民地实行欧洲制度所得到的结果。

### 三

教育和制度的影响都已经研究过了，现在要研究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家主张传教主义，这是冤枉人了。靠武力庇护传教士，扰乱东方社会制度的行为，已经成过去式。今非昔比，我们的殖民地的民众都有信仰的自由。我想要说明的是，凡是进步的、高级文明的各个要素，都不能强行在落后民族中实行。

列举几个数字，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宗教信仰对东方人的影响。但如果只听传教士们无能的自说自话，前面的那些可以不用提了。

阿拉伯人能否接受我们的宗教信仰，我已经引证过拉维热里大主教的四千孤儿的事情。孤儿培养于基督教之中，却经常和当地民众接触，于

是大多数孤儿成年之后都会回归伊斯兰教。

英国人在印度的成绩也不见得好。英国教会大会时，教士泰勒报告说：“传教士传教已经有一些年头了，虽然有英国政府的庇护和重大经费投入，但所能募集的教民为数很少，而且都是下层民众。”至于在那些没有政府可以依靠的伊斯兰国家，成绩应该更不好。传教士在阿拉伯、伊朗、巴勒斯坦等地，耗费大量资金，劳心劳力十年，只能勉强让那些低级仆役信教。除了仆役，能使之改变信仰的，只有一些痴傻的女子了。由这种种证据可见，要把我们的观念、思想、文化灌输到东方人的脑子里，用任何方法都不可能。

我只是想说宗教不能同化东方人，并不是要责难传教士。他们的勇敢和理想我都非常尊重。他们常常在半开化地区为国家尽职。比如在叙利亚，通过学校传播我们的语言文字，是著名的例子。

我似乎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在殖民地实行我们的教育和制度的结果，只能扰乱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强敌。

这种事情必定事出有因，这才是我想要解决的问题。事实都是总的规律的结果。我想要阐明

的就是这总的规律。为什么不能把落后民众和野蛮人提升到我们的文明程度，种族没有统一性的理由在哪里，这就是我所要勉力为之，进行研究的问题。

## 第四章 欧洲文化不能改变落后民族心理的理由

### 一

文明的各种要素，如制度、信仰、文学、语言、艺术等，和民族所依据的思想、情感产生的方式相关联。方式变了，文化才会随着变化。

教育只能大略呈现一种文化的成绩，制度和信仰代表着这种文化的需要。如果一种文化与一个民族的观念、情感不相符，综合这种文化的教育方式就不能产生影响。制度也一样。制度和一定的需要相关联，而与别的需要没有关系。

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距离甚远，制度并不通用，观念、情感、信仰、生存方法也都大相径庭。当西方民族日渐脱离传统势力的时候，东方民族却还生活在传统势力之下。东方社会的习惯没有改变，但欧洲人还没认识到这种固定习惯。我们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却恭谨地保持着

自己的信仰。家族的势力在西方民族中已经失去根基，而在东方民族中则掌握着大权。我们已经失效的原则，在他们当中还保持着相当的权威。他们有最稳固的信仰和简单的需要。而我们的信仰已经不确定，但需要最多。古代社会的基础，如宗教、家族、传统、习惯等，在欧洲都早已被颠覆了，但在东方，它们的势力还在，还没有被危及以及被替代。

其中尤其足以表明东西方之间的鸿沟难以填平的，是制度。东方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论阿拉伯或是印度人，都本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即便是信仰最坚固的民族，他们的政治制度与信仰分离也已经很久了。

东方人没有民法法典，只有宗教法典。新的判例的增加，需要有来自宗教的命令。英国人在印度修复浮屠，优待毗湿奴和湿婆的信众，并常表示尊重他们臣民的宗教信仰，就是出于这种宗教性制度的考虑。《摩奴法典》是宗教和民事的古老法典，是印度2000年来最根本的法规；《古兰经》则是伊斯兰教自穆罕默德以来的最高法规。

东方民族和我们的主要差异，不仅在制度和信仰方面，在生活琐事上也有巨大差别。尤其明

显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需要简单，我们的需要复杂。东方人很简朴，他们的生活状态如果在欧洲，必定会被看作是最穷困窘迫的。但他们却能泰然对待，居住在陋室或者帐篷里，寝食都很简单。同样一个人如果在欧洲长大，必定会产生很多被我们的文化所创造的人为需要。所以他们很难自给自足。由此，原本简朴的人、自足且自得其乐的人，一下子变成不满的人、窘迫困苦的人、激动愤怒的人。在印度，欧洲教育造成危害的地区非常大，这种状况尤其明显。当地人接受英国教育而且受到帮助的人，月薪可得到30法郎；一旦任职，就学着欧洲绅士的样子，西装革履，出入当地的俱乐部，吸雪茄烟，看报纸。结果却是，他们仍自认为薪水太微薄，命运太可悲。但如果用这些薪水去供养当地传统的印度家庭，供两家的生活都绰绰有余呢。

再比较一下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欧洲移民在需要方面的不同，也可以发现同一环境下，不同文化的差异。有一把储存的谷物做饼，有一碗清水喝，有一套衣服穿，对当地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再看看与他们相邻的欧洲移民的需要。即使是最下层的移民，也要住屋子，有酒肉食用，有各种衣服可穿。总之，凡是在欧洲环境中养成的人为的物质需要，他们都有。

从各地所见的这么多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的心理规律。欧洲教育一旦用于当地，让当地人深受困苦，让他们勉强接受新观念和一种无法自给自足的精细的生活方式，必定毁坏他们过去的传统习惯，使得他们对现代社会无所适从。

能否希望我国的制度和教育方式能让东西方互相接近，填平鸿沟巨壑呢？根据前面的证据，这是不可能的。就理论方面而言，民族最难改变的就是遗传的情感，想要相互接近更难。何况使得东西方产生巨大差别的，正是这种遗传性呢？

在国民情感的基础上，构成一种相同环境、相同制度和相同信仰的行为，已经有几个世纪了。这种情感不是教育所能改变的。它代表一个民族的过去，是历史经验和行为的结果。综合在一起，就是民族的性格。它力量极大。

这种民族性格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古罗马人能制伏希腊，少数英国人能制伏印度，坚忍果决的力量要大于智慧的力量。无论什么样的教育，都不能遏制黑人易于激动、没有远见、缺少决心、不能坚持的特点。

如果把教育当作巩固记忆的方法，如牢记书中理论一类，那么落后民族如黑人，也可以和欧

洲人并驾齐驱了。我国大学教授伊波从美洲归来时，对黑人赞赏不已。他看见黑人在教室里做几何的证明题，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非常完美，于是认为“黑人与白人同为上帝之子。造物主并没有让他们有根本区别”。

黑人和白人是否同为上帝之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位先生被幻想所误。被这种幻想迷惑的人还很多呢，那些从事于落后民族的教育的人，如传教士等，都是。

所谓的幻想，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即使从旧的教育方法来说，人重要的是记忆，落后民族的智慧只能达到一定限度。从离开学校后的白人和黑人的生活观察，可以发现他们的差别。当地人所接受的欧洲教育，就像舞台上的临时服装，演出完毕就要卸妆。我曾经和得到学位的印度人谈话，常能发觉他们和我们的主要观念、伦理、情感的距离非常远。那么落后民族和野蛮人永远不能达到欧洲的文化程度吗？这也不是我的本意。他们将来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但需要经过若干阶段，不能越级，不能一蹴而就。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处在野蛮落后的状态中。需要经过千年的努力，才能享受今天发达文明的利益。



社会有明确的进化规律，和生物进化相同。种子长成大树，孩子长成大人，文化程度的提高，都需要循序渐进。我们固然可以用暴烈的方法妨碍民族的发展，就像要阻止种子长成大树就直接砍断一样，但我们绝不能人为改变社会进化的规律。

## 二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强行实施于落后民族的主要理由，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文化过于复杂。一种制度、信仰和教育方式能适合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的原因，在于它具有简单性，能够让人了解，而不致扰乱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文化。

伊斯兰文化就是这样。这是他们能够在东方世界有巨大势力的原因。被伊斯兰征服的民族，大多是东方人种。他们在情感、需要、习惯上相近，能比较容易地被伊斯兰文化同化，而不会有欧洲文化的复杂性，使得他们在进行根本变革时产生弊端。

历史学家认为，伊斯兰民族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无形的和智慧上的巨大声誉，是因为他们的强大实力，所以今天，伊斯兰民族已经失去政治

势力，但他们的文化却继续存在。在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他们从来没有执掌政权。在印度有5000万穆斯林，比蒙古统治时期还多。自罗马人统治以来，能让其他各个民族采用其文化要素，如宗教、制度、艺术等的民族，伊斯兰民族是唯一一个。

现在，他们的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相较于他们掌握实权的辉煌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兰经》以及本于《古兰经》的制度都很简单，大多都能适合原始民族的需要，所以很容易被采用。穆斯林所过之处，即便是最寻常的商旅民众，人们都能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制度、宗教等。近代的探险家到达非洲内地，都能看见当地土著部落的伊斯兰教信徒。今天，大概是要回到伊斯兰民族开发非洲土著民族的时代了。如果追随欧洲人在东方的足迹，只能看到他们要么是侵略者，要么是商人，不曾想着要留下点无形影响的痕迹。

### 三

本章和前章的结论都非常明确。欧洲人不能用教育、制度、信仰或其他方法迅速改变东方人和落后民族的文化。即使像日本最近些年的历史，也不能够改变前面的结论。这个民族已达到

一种文化的高度，但如果换成另一种高度的文化，还是一个特例。我这本书不能详细说明，只能述其大意了。日本人虽然完全采用了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成绩，但他们在根本规则、信仰、性格上没有发生变化。就像是封建时代的男爵再生，人们教给他使用机车枪炮的方法而已。他们的心理状态能因为这种教育而发生变化吗？日本人的性格从来没改变过，只是在外表上、生活上表现得像是欧洲人，隐藏了他们固定的生活本质而已。

总之，我们侵略的地方，在侵略之时，从没见过有像日本古代文化这种教化程度的。我们可以反复申明同化或者法国化一种民族，纯粹是危险的幻想。保留当地人固有的习惯、制度和法律，我们只保持一种高级监护权就可以了，不必强行使用我们的复杂的政治体系。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大大减少我们在殖民地的官员数量，应该要求这些官员多了解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并应该保证他们地位的尊严，要让他们有必要的威望。

这种简单的改革计划，我只是说个大概，不用细说。想要让它达到广泛的舆论程度还为时尚远。当前的政治观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挽回的潮流。我们耗费无数人力和财力，想要实现这种同

化的幻想。这种幻想是被情感指导的，理性理论无法挽救、纠正。想要用理性加以挽救，只有用牺牲巨大的最残酷、最暴虐的实验。只有灾难才能让人清醒，从而放下虚空的幻想。

我们不禁要痛彻心扉地扪心自问，我们的祖先牺牲无数生命，我们却固执于错误想法。还有政治家自信能求得其他民族的幸福吗？还有经济学家主张要改变阿拉伯人的心理状态，根本改良他们的共产观念和家庭制度吗？

再试着思考一下，我们为这几种人道的和简单的理论所做的牺牲。我们为民族的自由和统一，流无数鲜血，而这种民族现在却与我们为敌。我们固执地要用这种理论来法国化那些处于传统势力下的和平民众，我们所获得的，除了怨恨和不断的战争，还有什么利益可言？

那些去法国之外的殖民地，如英国人、荷兰人的殖民地游历的法国人，全都自愧不如。英国人统治2.5亿印度人，官吏不过千人，军队仅有6万人。印度却能享有和平，运河、铁路和其他工程遍布各地，而且没要求本土贴补一分钱。统治者的实力，植根于无形的威望。而这种威望，我们想不到的是，它得自当地民众。这亿万原住民，没有所谓的普遍选举权，没有各级委员会，

没有代表当地的两院议员。统治的方法只是遵循旧的传统习惯，同时稍微受到少数欧洲人的高度宽松的以及不常加以干涉的监管。

他们的境遇比我们殖民地的原住民要差吗？当然不是。如果有人相信我的话，可以到法属印度的几个村落调查一下，当地人的痛苦一目了然。如果再到英属印度看看，可以发现他们那里面积广大的地区却只有一名官员，当地人也不仇恨他。还能发现英国人尊重当地的制度和风俗习惯，给予当地人以真正的自由。看到这些，你必定会愕然惊异。如果我能让所有法国人都做一番这样的游历，我敢说，再也不会会有一个人反对我的说法，非得要主张那个同化的大原则了。

当然也不能轻视这种原则。它也是一种新的思维。这种新想法是我们所失去的宗教幻想的产物。人类不能离开幻想而生存。但我们何妨放弃传道者的角色呢？我们应该知道近代经济矛盾激烈，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虚妄的幻想不但不能保证祖国的未来，而且还会让我们丧失发展能力。

## 第五章 殖民的新方法

历史中殖民的方法有两种。罗马人最初使用的方法，是用武力侵略一个民族，掠夺他们的财宝，贩卖壮丁，再任由别的人种在那里繁殖。等到那里再次变得繁华后，他们再进行侵略。这种方法固然很简单，但因为耗费太大，不利于战胜国。到了帝国时代，产生了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是设总督进行管理，对那里的居民征收重税，以保安宁。从那以后，这种方法到现在也没有大的变化。

这种方法也难免有难题发生。就是需要对那里进行军事防御，以免别的国家武力夺取。再者，治理当地也要有一定的程序和知识。如果治理不好，被统治的民族会让统治者感到不快，可能会发生冲突。我们的殖民地不但不能让我们的国人有所收益，而且耗费非常大，危险与日俱增。这一点，人们都知道了。

除了上面的两种方法，德国人又增加了第三种巧妙方法。让外国人统治、防护一个地方，而德国人仅仅收获利益。这就是他们在摩洛哥所用的方法。想要实行这种计划，需要具有一定的特性，以及足以排斥竞争对手的工商业方面的优势。德国人的技术教育非常好，已经具有了这种优势，与他们竞争非常难。英国人已经放弃了竞争。德国人所到之处，最初人数很少，但很快就

开始增加。他们抢占一切工业和商务领域，现在只是在等待他们成为实际掌控者罢了。

20年来，德国人侵略蔚蓝海岸（法属地中海沿岸的一部分）的方法就是这样。那里是地中海沿岸风景秀美的地方，在历史上是必争之地。现在德国人势力所及，已经有二百公里。那里不但成为德国移民的地区，而且成为他们的经营之地。他们先侵入旅店的经营，目前几乎被他们掌控了。营业的人员全是日耳曼人，顾客也几乎都是。1906年时，我在芒通调查当年的旅客人数，在22所旅店中，德国人有350人，法国人只有50人。蔚蓝海岸一带，由法国人开设的，仅有几所低级旅店。

战争之前的德国人贫穷而能吃苦耐劳。现在他们依旧能够吃苦耐劳，但已经不再贫穷了。工业的发展帮助他们增长了财富源泉。现在贫穷的只有法国人了。

德国人靠劳动致富，劳动之后，就来到蔚蓝海岸休息娱乐，并希望能再做点有利可图的生意，如贩卖货物、投机地皮等。

德国人所开设的旅店，营业获利巨大。各旅店的经理也都想着自己再开设一家，只是需要等

待汉堡银行家的借款。德国的银行非常愿意投资于工业。而我国的银行公司只知道骗取公众资本，投资到可以得回扣的国家公债或外国股票中去。无论任何国家，如委内瑞拉，或海地，或类似的国家想要出售公债，必定有法国的大银行为他们代销。我们不能说德国银行家的爱国心比法国银行家强烈，但可以说他们更聪明，善于投资。之前有人对我说，蒙特卡洛某位旅店经理储蓄了6万法郎，竟然有一位银行家借给他20万法郎，让他购买一所旅店。五年后，这个人把旅店转卖给别人，售价达到了100万。我曾调查两家旅店的收入，其中一家在1904—1905年冬季，收入397444法郎，另一家收入167153法郎。这种营业利润，就算是镀金都比不上。可惜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法国可以利用的财富源泉，只是盲目鼓励到偏远的地方去殖民。在出发去越南、马达加斯加之前，为什么不利用一下法国遍地都是的财富呢。

## 二

我在去巴黎的快车中，和一位德国的老哲学教授谈论上面的观点。交谈之初，我就表示了朴素的善意的悲悯之情，说德国人不应该屈服于一个意气用事的专制的恺撒政体之下。这位哲学家



微笑着回答说：

“不要说恺撒。历史上，一个民族在战乱过后，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名字有时叫苏拉，有时叫波拿巴。你也不用可怜我们生活在半恺撒制度之下，你们现在正向衰微的恺撒政体的道路上大步行进呢。战乱时代即将到来。与其拥立那些偶然出现的恺撒，不如拥戴我们这著名的恺撒。”

“现在只要说一说蔚蓝海岸的经济事实就行了。”

“你所说的都对。德国人从前非常贫穷，以至于能吃到肉就是奢侈了。现在已经今非昔比。这是技术教育和一定的民族性格的作用，再用纪律和方法进行约束。这就是德国人成功的诀窍。所以今天德国人在各地都具有优势。排斥竞争，吸收工业，即使是巴黎的工业，如化学药品、精密仪器、电气机械，都在德国人掌握之中。其余的也将尽可能地被吸收。现在德国人已经在法国国内设立工厂。所谓的关税保护，即将失去作用了。”

“我们在蔚蓝海岸殖民的方式，就像我们在摩洛哥的殖民方式。土地任由你们占领，工商业却被我们把持。要知道能控制工商业的人，才是

真正的主人，而不在于所负的政治虚名。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不需要战争，仅用战争作为威胁就够了。我们就等着你们当中的平和派、国际派、反对军队派以及其他愚蠢蒙昧的人，分解了你们的国家观念，然后你们就会完全遵从我们的意愿。”

“我们并不想要战争。但我们的工商业发达，而汉堡太小，容不下这种发展，需要另外寻觅一处大的军商两用海港。附近的地方只有安特卫普合适，所以我们在那里增加、拓展商店、银行和海上业务。英国人和比利时人都明白我们的意思。比利时这时就和荷兰合并，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状况。但要知道，将来的世界中，是没有小国民众的位置的。将来英国人必定反对我们的经营，战争必定在所难免。你们必定会加入。你们将来必定会比现在更加贫弱。”

“从现在到那时，你们的宗教、政治之争，必定会进一步削弱你们的实力。你们将来必定会变成一个小国。想要拯救目前的危急状态，应该放弃政治和宗教上的怨恨情绪，改变教育的方法。它们具有连带关系。但你们无法做到这点。你们有发达的艺术，善于表达，但却不善于发展工业。再加上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们的势力正大，社会党的势力也在。你们不明白当代的经

济需要，多说又有什么用呢？”

“今天，德国的人口不断增加，生产的产品充裕。而你们的人力不足，产出有限。所以现在，世界可以利用的地方越来越小。东方的市场已经被日本占领。我们将向你们的国家输入人口和产品。一等到你们分崩离析，我们就派驻军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2000年来都没有变过的道理。”

这位日耳曼人所说的话，我无以作答。车子接近巴黎。我觉得他的话似乎是真理，临别时只好微笑耸肩而已，但心中却觉得在坠向深渊。

# 第六篇 变乱的发展以及反对社会解体的斗争

## 第一章 社会变乱

### 一

罗马执政官塞索里努斯并不是和平家，也不是人道主义者，但他知道利用敌人的心理。当这位有谋略的人带领军队来到迦太基，正值这里是世界最富饶之地的时期。艺术、商业繁盛，和平主义的势力也很强大。塞索里努斯向迦太基人矜夸和平的好处，痛骂战争的弊端，然后得出结论：“把你们的兵器都交给我，让罗马代行保护居民的职责吧。”心理简单的和平派争先恐后地遵从这一要求。兵器交出来之后，他又说：“把你们的战船交给我。这种舰队耗费太大，而且很容易积滞。罗马既然都代替你们实行防御，你们留着它也没什么用。”和平派又遵从了。他又说：“既然你们都服从了，是值得嘉奖的。现在我只有一件事了，罗马为了预防叛乱起见，命令你们削平迦太基，并且迁到沙漠去。地方随便你们选，但必须离海岸极远。”迦太基人至此才知道和平主义的危害。不想成为沙漠里的饿殍，只

能筹划防御的方法，但为时已晚。城市 and 居民都已经被别人占领、焚毁。迦太基的历史，由此告终。

这固然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足以给我们现在的人教训。当邮政员工罢工开始的时候，国务总理或许是有感于斯，在甘贝塔遗像下发表演说：

“只有强者才能拥有权力，将来才能不怕被别人侵占。凡是姑息官员叛乱的社会，必定在众人的蔑视之下被颠覆。尽快镇压，才能保持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宁。”

这些话和某位内阁成员意见相反。这位内阁成员帮助官吏叛乱、威胁罢工和毁坏行为的方法，大致如此：“注意新的社会现状。做新时代的人。给工人们信任感。”并劝告他说：“幸运的人才能对工人、官员施与恩惠。”此种可怜言辞，是今天的新人道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示。与其说是人道的哲学，不如用索瑞尔先生的正确说法，把它叫作矫饰怯懦的哲学。人道主义是我们社会的疾病。

那些闹事的工人和官员全都知道这种言论。越明白它足以令人恐惧，对政府的蔑视和威胁越

强。政府稍微要抵抗一下，他们就罢工、破坏财物、放火。

统治者不幸被恐惧制伏。这是最可怕的恐怖，足以让战争失败，并导致无数的革命行为。前国务总理的话如果被大家认同，那么进行防卫非常容易。妥协退让只能让叛乱者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表现出他们的蔑视态度。群众要依靠强力俘获，他们不知道感恩。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早就提出过了。

只是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太远，不足以让人听从，人们只知道退让。所以报纸就刊载了给邮政员工加薪的公告。这种方法，正足以增长他们的要求。政府应该知道，服从也不容易呢。

于是邮政员工又进行了第二次罢工。傲慢的态度和激烈的威胁行为前所未见。其他官吏看见这种威胁有用，于是纷纷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想要满足他们的要求，非得让预算成倍增加，再增加赋税不可。

内阁成员和议员们倒是没有顾虑，因为他们明知道需要负担怯懦行为的结果时，他们必定不在其位了。他们希望要求再过点，又担心舆论愤怒，才不得不稍做抵抗。

第二次邮政罢工也不能说没有好处，它使公众稍微感受到邮政、铁路等罢工的危害。要知道一些工团制度所酝酿的状况，舆论才会攻击革命党人。

如果顺从、接受闹事者的意愿，国家之中必定又会再创立一个小国家，那么将会变成国家反对国家的局面。因为几千人而阻碍一个大国家的生活，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应该熟知防卫、抵抗的方法，不要惧怕。恐惧是流血骚乱和军人专制的根源。如果让邮政员工、小学教师们不知道他们的演说能产生恐惧心理，他们敢表达报纸所载的那种言辞吗？能放任国家所供养的官员来蛊惑、煽动反对爱国主义、反对军队主义、破坏社会吗？能接受小学教师们表达的下面这些意见吗？

“为了解放平民界，我为小学教师提出要求，有权加入劳动联合会，并在儿童思想中传播对中产阶级的怨恨。”

这种领头的人，其实是中产阶级中地位比较优越的人。鼓动邮政员工罢工的首领，年薪在6000法郎，养老金也有3000法郎。他们还是以平民自居，实在是太荒谬了。如果一旦工团主义得

势，恐怕这些人的薪金将要和工人一样了。

敢问国家由什么构成呢？不是立法的议会，也不是行政的政府，而是成千上万个分权而治的、执行法律的官员。如果这些官吏都叛乱，国家还怎么存在呢？内阁成员可有可无，没什么大关系。但官员怎么能替代呢？万幸的是，培养一个机械工人或铁匠，需要几年的训练；但培养一个科长、一个邮局人员、一个税收人员、一个邮递员，只要几星期就够了。

## 二

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能鼓动人心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它所产生的意见。”今天的危害就在这里。因为危害不在于事实，而在于由事实所激发的幻想和观念。

只有虚妄的幻想才能让一个民族产生动荡。历史表明，想要动摇一定的潜在势力，就应该进行历时长久的战斗，付出流血的代价。

平民受到的待遇，没有比今天更优厚的了；但平民的抱怨不满，也没有比今天更多的了。利益不同还可以调和。所不能调和的地方在于，由政客们所散布的怨愤、嫉妒的情绪。心理濡染又



助长了这种怨愤情绪的普及。前不久的社会主义，今天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成了治疗百病的良药。

被新理论浸染的群众成分最复杂。有热衷的野心家，有轻信迷惑的人，有酸腐的大学生，有惯于痛哭流涕表达悲悯之心的人道主义者。其余的则是一群平庸的人，只知道附和别人的行动。

这种革命党敢作敢为，大体上是基于政府的怯懦。索瑞尔曾说：

“决定社会政策的原动力是政府的怯懦。工团首领们不用多久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告诉工人不用请求恩惠，而应该利用中产阶级的怯懦，强迫他们实行平民界的意志。这种植根于怯懦的社会政策，最终会产生判处中产阶级死刑的观念。他们被消灭的日子不远了。”

革命党人只知道破坏，而不考虑破坏后的情形。即使工团得势，工人的命运恐怕也要比现在还困苦。至于工人界倾向革命党徒的原因，则是因为处于懦弱的政府和专制的工团之间，当然要倾向于有权势的一方。这是群众的本能，不要怀疑。

工团主义的权威非常大。他们领导工人群众的方法，是最专制的君主都不敢用的。这种人发言的时候非常少，却能让最不守纪律的群众服从。群众只知道行动，命令则由委员会颁布。发动罢工时，离得近，就用哨声做信号，远的就用自行车送达命令，不需要格外说明。有人要反抗，就会被狂热的同伙殴打。埃尔瑟朗格的工头被工团命令驱逐，当他回去取衣服时，如果没有宪兵干涉，就差点被人打死。这种事人们都应该记得。

所有命令，即使过于偏执狂乱，也没有不奉行的。阿兹布鲁克的工人奉一个工团代表的命令，罢工几个月。至于原因，则是某纺织厂的经理用英国已用了十年的新式机器替换旧式机器。工人有这样的心理，政府又是这样的懦弱。如果法国现在没有铁路，恐怕现在连建造都不可能。

这种举例可以用来反证那些相信平民团体有推测、想象能力的说法。联合会领导者的优点就在于不用推测、想象，而能让人服从他们的实力或声望。所以他们反对普遍选举权，主张少数人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工团几位领导者的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不合乎民主观念。但群众既然已经顺从了，将来必定会有实行的那一天。

革命运动的危险，不在于激烈暴力的行动。因为这种暴力不会持续太久。需要担心的，是由于濡染，而在各界人心中产生的骚动心理。邮政员工罢工、里昂市警员罢工、小学教师闹事、官吏结为团体等，都因此发生。政府已经被他们威吓，闹事的人就更加相信威胁可以达到目的。

立法者被相反利益挟制，只看到闹事的人都是将来的选举人，丧失了经济需要的意义。立法听任偶然要求，而不管影响范围和法律之间的矛盾。他们又是人道主义者中胆小的人，常认为，既然工厂已经被毁坏，军人已经被杀害，工业已经衰微，那么对于这种迷途的人，何妨表示些宽恕态度。何况还有好的办法让他们归于正路。所以对于杀人放火的人，监禁在牢狱里几天，就表决大赦。如果他们再犯，便认为是法律不好，于是急急忙忙地修订法律。

因此，在议会中，和中产阶级一样，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心理状态。今天我们所处的动荡氛围，基本上就是由这种状态造成的。潘伽烈在演说中曾表达过这种意见，而把动荡的原因归咎于当局者的新的心理状态。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他的上院同僚曾经想依赖他来反对收回

西部铁路，谁知道他当时竟也不发一言。恐惧心理的力量之大，可见一斑了。

这就是政治家言行不能一致的原因。某位国务总理曾反对工团的“胡作非为”，但仍然不妨碍他像某报所说的，“仍把纳税人的税金用在传播反对爱国的用途上，而美其名曰‘工团津贴’”。今天拉丁民族的心理状态特点，是意志柔弱。大民族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不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低落，而是因为他们的意志柔弱。

## 四

当前发生的这些事情，除了表面的近因之外，常有远因的关系。政治恐慌对我们的打击固然极为苛刻残酷，但它连带的事情和据以发生的事情也不少。综合起来，则表现为一种偏执迷乱的精神状态。

放眼看看周围，民族所依赖的一切无形力量都在解体。如家庭破裂和人口增长缓慢，需要的增加快于自给自足的方法，没有人尊重政府机关，反对优秀、主张平等的观念，道德堕落和犯罪过度增加，意志柔弱，官吏反叛，法官不能执法，小学教师传播骚乱情绪，可忧虑的非常多。工团组织逐日增加，他们所集中的，都是不满和

怨恨。恨祖国、恨军队、恨资本、恨能力，几乎没什么不恨的。奇怪的是，社会既然像这样在解体，那么由遗传所构成的心理力量为什么还能支撑呢？

社会的阶梯由上至下。纪律被消灭，权威、声望都丧失了。从前下命令的人，现在只求服从。巴黎大学教授奥拉德曾举一例，以证明今天的心理状态。这种来自平民心理的教训，我敢相信，一定会比由他所收集的革命时代供参考的堆叠如山的资料还强大。

某一天，因为火车晚点，这位深信群众品行的教授到巴黎某火车站的储物室取行李。屋子里有四个健壮的运输工人在随意游荡。他们见取行李的人穿着简朴，态度平和，以为不能多给他们报酬去喝酒。这位教授见他们态度轻蔑冷淡，于是到官员那里去投诉。这位官员认为他的投诉理由充分，但又不敢指使下属，只好自己取下行李放在小车上，亲自推车送出门。没想到这情况被四个工人看见了，他们愤怒于失去了可以喝酒的报酬，于是追赶出来，叫骂不停，要官员立刻放下行李，否则就打他。这位官员一面请求放过他，一面躲开了。

对于一位历史教授，我当然知道不能无限地

信任他。他们只知道搜集材料，却不能做出解释。但前面所讲的事情，没听到相关人员声明纠正。即使是半真半假，也是教训了。

大家都看看四周，相似的事情并不少。试着留意一下普通的清洁工人，再调查一下他们的劳动所得，比较20年前的收入，今不如昔。但这清洁工人还是安心工作，为什么呢？他们可能是确信议员和酒商们足以庇护他，让他可以反对自己的上司。

## 五

这种混乱状态，不仅是下层社会这样，也是一种流行的心理病。影响范围之广，居然使得今天的保守党与最厌恶的无政府党派联合起来。我们最近已经看到巴黎的天主教与劳动联合会的首领来往亲密。最近的天主教大会中，竟然有教师坚决地主张罢工的权利。《时报》也说：“教师辩护并传播最放肆、最具有破坏性、最激烈的反社会理论。”由此可见，对民心的需要不仅在最激烈的社会党人中扩展，那些本应是社会支柱力量的保守派也一样了。《时报》又说：

“保守党能协助他们破坏本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如果保守党想在这种破坏之中获得一种

政治利益，这是妄想，也是虚幻的念头。工团派和革命派有时或许会利用他们，但绝不会给他们利益。”

我们的社会混乱状态的扩张，尤其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反对爱国主义的发展。内阁成员们在演说中不禁赞颂小学教师和大学生，还粉饰说，今天人们把反对爱国主义和反对军队主义合起来，叫作埃尔韦主义，这在法国是一个例外的主张。我们应该知道，隐藏一种危害不足以救治另一种危害。潘伽烈曾说到它的危害：

“埃尔韦先生是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人吗？是思想迷乱偏执的人吗？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某些大会的讨论，我们会感到不幸的是，持此主张的并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当埃尔韦发表他亵渎神明的言论时，倍倍尔在德国议会发言说：“如果有人侵犯德国，如果关系德国的生存问题，我敢断言，所有党员，无论老少，都将拿起枪来抵御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要保卫它，死而后已。我敢向各位这样发誓。”

如果比较一下两段话，一个是德国社会党的

发言，一个是法国革命党的发言。两者截然相反，不能不让人想起埃德加·基内的话。他说：“如果法国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必然要受一切异族的欺负。”

如果不能维持，那么就会灭亡。

## 第二章 犯罪的发展

### 一

犯罪的扩大也是社会普遍混乱的结果之一。议会对犯罪和死刑的讨论记录，可以作为参考。发言的人智力自然应该不在普通人之下，但是却只根据情感做决定，所说的都是没有条理的话。还有人把相同数据集合起来，得到的结论则完全相反。

为了保护杀人的人，并答应不妨碍他们做事，理由非常多。某位社会党员说：“如果公民不被资本制度压制，能自由生活在阳光下，犯罪可以消灭。”出于这个理由，他们只好忍痛决定。现在将下议院反对死刑的主张列举如下：

死刑不能保护社会，而所惩罚的人都是无罪的人。



死刑既不能劝人向善，也不足以警示众人。

死刑是社会的罪恶，没有人能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

死刑只有复仇的观念可以解释。

多数上断头台的都是疯人。既然不能在执行之前，查明疯癫的情况，那么砍掉疯人的头，不如废除断头工具。

死刑是侮辱执行的人，而且比受刑的人程度还重。

无论任何国家对罪犯进行的死刑，都不能起到作用。

上述各种理由，只有最后一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布里昂部长的说法。他的这一主张煞费苦心，可是不但不能取信于人，甚至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为了证明死刑不能对犯罪产生影响，可举的数据非常多。这些数字非常明确，让人感慨。仅谋杀一项，就增加了30%。五年之中，犯罪倍增。现在节录下议院司法改革委员会委员长的说明书如下：

“不说判决的案件，仅就犯重罪的总数来说，1901年795件，1905年1313件，1907年1434件。自从在事实上废止死刑以来，犯罪有增无减。杀人的人明知道不会受死刑惩罚，所以即使犯最重大的罪行，也敢泰然自若，毫无顾忌。各地的议会看到犯罪增加，都请求政府仍然维持并且执行死刑。”

可见，犯罪的人惧怕死刑，证据明确。所根据的是犯人的口供，历任警长、探长的意见，以及罪犯辩护律师的意见。

一个犯人供述说：“犯罪的后果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是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或者圭亚那而已。我已经接受过教育，我可以当一个顺从的犯人。一两年后，还能做机关的小官吏。十年内，我就能获得垦荒地，可以享受到在法国所没有的幸福生活。”这说明他杀人，是明知道不会受砍头的惩罚。

其他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也很明确。瑞士从前已经废止了死刑，现在有十个地方又重新启用了。

再说到杀人和故意杀人两者的区别，非常荒

诞。因为被害者同样是死亡，所以前面提到的官员主张废除这个区别，他认为匪徒杀人，是用杀人取乐，虽然不是预谋，但也跟故意杀人一样。“一旦确定为杀人罪，和故意杀人是没有区别的。”但司法部长布里昂想要保留这种区别。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一定默不作声。因为从议员们拍掌赞成的情况可以看到，发言又有什么用呢？

## 二

这种探讨暂且搁置不管，现在就问题的根本原因和众多长篇演说的起因分析一下。

讨论的起因是责任的问题。50年来，在刑罚上受这个问题的影响非常大，但现在已经梳理清楚了。

所谓责任，是就自由意志而言的。只是今天的博学家和哲学家，都不相信有这种自由意志。由此可见，犯人似乎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从哲学方面来说，当然不用负责任。但是从社会方面说，则完全应当担负责任。社会想要保证存在，就要做出防卫，不必顾及哲学方面的琐碎因素。那些杀人匪徒具有匪徒的心理，而不具有巴斯德的心理。这当然不是匪徒的过错，但匪徒和

巴斯德在名望上有区别。羊又何曾负有作为一只羊的责任？但它就是羊，只能受屠夫的宰杀了。

这种社会责任和哲学上的无责任的区别，很长时间都难以让人接受。各种研究大会，如1907年日内瓦的医生大会已经进行了阐明。现在转录一下古尔蒙所综合的意见：

“无论这个人是疯子还是半疯，无论他有意还是无意，违反、触犯了社会规则，一旦犯罪，就应该进行惩罚。精神上承担责任的观念应该放弃，但对社会承担责任的观念则不能放弃。犯罪的不论是否出于自觉，他的行为都对社会造成了危害，理应逐出社会之外。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躲避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没有社会责任，就没有文明可言。”

法学家加罗法洛说，以前的刑法，随着自由意志和精神责任的观念而递增。这种错误应该改正了。要知道没有人能够拥有绝对自由。我们惩罚犯罪分子不能用自由的程度来考量，而应该从社会利益考虑，根据犯罪的危害程度而定惩罚的标准。

巴德医生的意见更激烈。他说：“如果我是立法者，一定把半疯作为犯罪加刑的标准。因半

疯汉是罪犯中最危险的人。”

医生们对于放弃精神上承担责任的观念，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意见。但他们对于罪犯所应负的社会责任，则全体断定具有必要性，并且主张对罪犯的惩罚应该从严加重。

这个观点不仅是医生和法学家所主张的，法盖先生也这样认为。

凶手索莱扬在精神上负有责任吗？没有。他不用负责任和狗不用负责一样，没什么区别。只是，他不是有罪的，但却是最危险的人。

想要做索莱扬做的事，就应该具有特别的身体脊髓。也正是因为具有特别的脊髓构造，所以应该砍断他。

如果对于病人，对于可怜的病人，我又有什麼可说的。但如果他的病在于杀害同类，我就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延长他的生命了。

我认为死刑是一种适合时代的问题，应该用它一方面消除猛兽，一方面用以威慑其他猛兽。

我主张严惩有罪的人，尤其特别主张严惩有病的罪人。因为他们最危险。我确信这种方法对

于一定范围内的病人，可以收到治疗的功效。

惩罚的可怕，对于感化大多数败类、半疯的人、嗜酒的狂徒、精神错乱的人，具有巨大力量。刑法越严，他们越害怕。

有一种卑贱的人，砍头刀的用途是绝不可少的，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我想要说的是，附近的凶徒以杀人自娱，晚归的游人和偶然遇到的妇孺屡次受害。捉到之后，他们只不过受几个月的监禁。一旦释放，又旧病复发。

这种嗜好杀人的需要如果不加以严惩，必定会更加扩张。因为这是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容易重生。那些文明人游猎的行为，无非是满足这个需要而已。某位著名法官也嗜好游猎。他叙述游猎的心理，和杀人的匪徒的心理非常像，只不过他们的野性施与的生物不同罢了。

叙述狩猎者的悔恨心情，非常让人痛心。他们进行这种没有慈悲心的杀戮，特别残酷的是，他们觉得杀戮是最快乐的行为。捕杀那些好看的鸟而停不下手，让那些没有罪的生命流血而不想放弃。人性的弱点哪能说得过来？

匪徒杀人也是觉得在享受极乐。他们不能自

已罢手，也跟那些狩猎者一样。如果我们不消灭这些匪徒，将来必定会被他们消灭。

再说说这些年中，医生和法学家观念的改变。前不久所有罪人还都被认为没有责任，现在则认为罪犯完全应该负责任。就社会利益而言，人们现在要求严格执行法典，只监禁是没有用的。因为一旦释放他们，他们还会再犯。

我的意见和必须惩罚的新看法相同，而且希望惩罚能普遍在各种屡犯的罪犯中实行。我曾在哲学杂志上发表过意见，现在可以引用一下。我曾说一切罪犯都应该负责任，而结论之一是，偶然犯罪的人，应该用体罚的方式来惩罚；惯犯则应该流放边远地区，就像从前人们对付传染病的远离危险的方法。也可以把惯犯编在一起，让他们修造非洲中部的铁路和道路。

### 三

死刑不常用，所以影响非常小。现在就我们的刑法制度加以考察，这也是议会讨论的重要问题。犯罪日渐增加，每年虽然会执行十几件死刑案，也不能够阻止犯罪。而且故意杀人罪和杀人罪数量不多，应该受到攻击的，是其他种犯罪。

我们惩罚犯罪的方法，只有流放和关进监狱。我们的人道主义观念，已经把前者变成了别墅，而后者变成奢华的居室。

一位总检察官最近告诉我说：“现在的模范监狱的舒服程度，中等偏下阶层的人都不能享受。比如，电灯、暖气管道、冷热水、浴室、有树荫的游园美景之类。所以有时有人专门为了能在冬季享受六个月的清福而犯罪。因为一旦住进监狱，一切奢华的享受都有了，所缺少的只有自由而已。”

英国的刑法制度则相反。他们的刑法比较简略严厉，影响罪犯精神的力量最大。监狱中所用的方法，也就是做苦工和鞭打而已。

这种方法消灭犯罪非常迅速。拉卡萨涅说，伦敦只有一群匪徒，自从实行了强迫劳役和鞭笞之后，这群人就在几星期中绝迹了。而现在巴黎的匪徒还有三万人呢。巴黎受到相反的刑法制度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法官和检察官的宽恕。无赖之徒在晚上被捕，十有八九在第二天早上就被释放了，仅仅进行父辈一样的谴责批评而已。比较两种制度，一个用体罚，一个用误事的容忍。哪个比较有道理，不难判断。只是体罚对于惩罚那些以犯罪为业的人才有效果。丹麦在1905



年的抢劫杀人案非常多。自从恢复鞭笞的刑罚之后，这股风潮慢慢消失了。拉卡萨涅教授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应该采用体罚。英国的试验已经看到成效。这种刑罚不但有作用，而且合乎人性。鞭笞的痛苦比常年监禁要轻、要优厚吧。

所以，无效的、不起作用的惩罚会导致犯罪的增加。所谓人道主义法律，其实是异常恶劣的法律。劳动法把无数青年摒弃在工厂门外。这些人无所事事，自然不免四处游荡，成为匪徒。如果对杀人犯的惩罚不再加重，对犯人的判决和待遇又很优厚，就都成了鼓励犯罪。

最近巴黎自治会开会的时候，有两位议员陈诉夜间抢劫的危害。警察总监利宾纳回答说，因为法官的懦弱和频繁颁布赦免令，致使惩罚手段没法使用。他做出结论：“数年来鼓吹的人道主义，今天已经见效了。”

只有病到一定程度，才会想到要找一种治疗方法。那种主管想要感化的办法，将来肯定要受经验教训的惩罚。等到各大城市都变成抢劫杀人的场所，郊野变成汽车夫、匪徒们劫掠害人的区域，不全副武装就不敢在巴黎夜行，到那时或者才会想到需要一种方法保护我们自己了。

惩罚的法律既然已经形成具体条文，每个人不得不自己寻找保护的方法。到那时，群众必定自己惩罚犯人。私刑的情况，必定如下议院委员会的报告所述：

“群众的裁判是激烈的、暴力的、简单的，有时还是盲目愚昧的。把保护善良、执行死刑的权力，用在没有责任的人身上。出现这种情况，政府不能说自己无罪。如果让那些相信法律可以保护自己的公民拿起武器，自己进行惩罚，政府的罪过尤其大。”

那些法官怯懦无能，害怕罪犯报复，不敢严惩罪犯。而他们严惩的人，只是恶劣的低级警员引来的犯罪轻而且不能自我保护的妇女。这也是犯罪增加的原因。某位法官曾经告诉报社的人员说：

“你们只知道说诉讼程序，却不提惩罚。你们知道刑罚已减少了50%吗？你们知道假释和在押日期的扣除，足以麻痹、削弱法庭的行动力吗？流放的方法从来没有实行过，屡犯的罪犯日益增加。你们想要采用英国的诉讼程序，可以。但只能应用英国的惩罚方法，如做苦工和鞭打等方法。惩罚罪犯不必体恤他们而削弱政府的权力。英国的警员没有刀也没有手枪，却可以在伦

敦独行。而我们的警员非得全副武装聚集很多人，才敢出行。等到你们用惩罚手段的恐怖性震慑、消灭了犯罪行为之后，我们再来说诉讼程序，才有可能。”

惩罚手段的恐吓作用，是阻止犯罪的唯一方法。麦克斯韦的《犯罪和社会》一书，也是这个意思，就是疯子也应该接受惩罚的威慑。

## 四

想要实行必要的惩罚，需要先治疗公众病态的人道主义，和法庭的恐惧心理。现在已经有了几种表现，虽然还不够，但稍微有望除去这种弊病了。

最近，某位警员被匪徒刺杀。葬礼时，自治会长曾发言说：“所谓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毒害，要比匪徒的危害更严重。人们所有的力量都变得麻木不仁了。当今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首先拒绝这种理论。”这和我的意见非常符合。

即使这样，这种人道主义扩张如故。把惯犯编入军队，也是其中的一种。第82团中的匪徒不下百人。1909年12月28日那一期的《日报》曾说到结果：

“10月以来，蒙塔基人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明目张胆的两起盗窃案。一件发生在某位上尉家中，仅仅是被窃了。另一件发生在某位居民家中，还杀了一个人。凶手是两个军人。距今八天前，警察在运河中发现了一个淹死的军人，风传是被同伴所害。把匪徒编入军队的后果就是这样。”

要是没有舆论的反对，这危害巨大的法律将完全败坏军队了。下议院议员索迈想要限制犯罪的发展，曾主张实行必要的体罚。不惜触怒那些有怜悯之心的人，斗胆要求用体罚来惩治匪徒。

在空谈哲学之前，应该先讲求一些生活问题。不在于罪犯是否应负有责任，只要知道他是否对社会有害。对于这一点，想必都没有异议了。野蛮的杀人案、袭击案、谋杀案，没有一天不发生。凶犯都是青年。至于他们犯罪的理由，或者是逞强好胜，或者为了取乐。

要解析这种匪徒的心理并不难。他们是懒惰的人，是善于表演自夸的人。他们不在工厂里劳动谋生计，而是吃用妓女的供给，在酒店里游荡，在同类面前矜夸自己勇敢。

他们杀人的目的，固然常常是为了盗窃，但

其实都是为了虚荣。这些人常用杀人来打赌。“赌一瓶酒，我会让刚出现的人倒地不起。”既然下了赌注，结成赌约，一个无辜的人就将要受害了。

想要惩治他们，就应该注意这种心理。想让惩罚见效，那么惩罚的手段就不能增加他们所期待的希望。

体罚的主要作用在于足以让人吃苦、受辱。匪徒可以把流放的地点或者砍头的工具拿来向同类夸耀，但不能把受鞭笞的次数作为自负的借口。体罚是保护善良、警示恶人的工具，反对者应当没话可以反驳了。

而且嫌犯们现在还在寻找为他们辩护的人。某位女博士在报纸上发表意见，说“名誉只适合保护富人；工人厌恶它；匪徒的行为可以自娱自乐”。还有这么荒谬的人吗？

总之，与其让匪徒们享受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别墅，或者暖和监狱的优待，不如让他们接受鞭笞、苦工和断头的惩罚。如果真能这样，巴黎可以在几星期之内，荡涤所有匪徒。我们的立法者将发现，人道主义是所有愚蠢的事情中危害最大的，衰败常源于此。

### 第三章 政治暗杀

今天，政治暗杀已经成为平常的事情了，也是社会混乱的表征之一。公众对所发生的暗杀的印象和观感很复杂，既觉得可怕，又觉得太荒诞。那些被害的人，不管是俄国皇帝、意大利君主、奥地利皇后，还是法国总统、葡萄牙国王等，被害之后，立刻有新的人选代替。他们所代表的制度，没看出有什么改变。而且这种暗杀事件所激起的反动情绪，更加助长了被反对的制度的势力。而暗杀者自身对于暗杀罪行，也不期待什么。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致使所有流行的，认为犯罪是基于私人利益，如复仇、贪婪之类的行为的心理学说，竟然无从求解。

这种政治犯罪的动因，既不是个人利益，也不是公共利益。今天的心理学能解释吗？想要理解这个意思，应该就犯罪传播的方法和势力来探究。

服从信仰的必要性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本能。追求信仰，用信仰引导生活，让自己免于推理、想象的辛苦，这是人类的志愿。这种情况源于思想的奴隶性，而不是思想的自由。

强大坚固的信仰完全不受理性的影响。传道者可以把错误变成真理。他们心里认为是对的，常常不惜牺牲一切。研究这种半疯癫的人，固然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围，但他们在历史中承担的任务却很重大。

这种人产生于具有宗教本能的人之中。他们的特征在于追求一个必要的信仰，并且能自我牺牲，好让崇拜的事物获胜。他们都臆想一个和祖先们的天堂相接近的人间天堂。俄国的革命党和各种无政府党派所提供的例子不少。在这种被传统观念控制的简单的大脑思维中，都想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用具有神的意志的国家政权进行统治，为人们进行平均，并且具有古代神明的无限权威和声望。

传道者既不能自己进行推想，又必须进行传播，还不明白需要和实际情况，所以危害非常大。因为受他们影响的都是群众，而群众也没有推论的能力，只有被濡染、被影响之后得到的意见。

近代最大的错误，在于相信可以用理性来鼓动、怂恿群众。其实只有确信、重复、声望和濡染这四种方法。这些要素足以反对他们的利益，以及明显的不可能，都不用说了。信仰一旦被接

受，虽然荒诞不经，但也具有强大的势力。世界的混乱，大概就是用这个反对理性的信仰的名义进行的。

用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可以解释政治暗杀。这种行动能让我们愤怒，但不足以让我们惊愕。传播信仰者的特质在于，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进行传播，并且毁灭那些阻碍他们的人。

这种毁灭的必要性，是传道者的心理要素。没有传道的人，就没有杀人、毁坏物品的需要。想要毁灭自己信仰的敌人，不惜屠杀数以千计的无辜者。他们向坐满人的剧场里，或者挤满人的街道上投掷炸弹。在他们的想法中，想要改良人类，追求真理，消灭错误，积尸如山在所不惜。

这种凶恶的传道者，不只出身于底层社会中，有时也是半个文化人，曾经接受过大学中不能适合他们心理的教育；有时又是平和博爱的，具有改造社会的固定观念的人。托尔克马达、拉瓦亚克、马拉、罗伯斯庇尔等，常自命是人类之友，只想着人类的幸福，并且预备为之牺牲生命。

隆布罗索说：“疯子和热心博爱的人，各个时代都有，即使野蛮时代也是这样。那时，他们



把宗教作为工具，后来则投身于党派之中。最初是十字军，接着是叛党，不久又成为游侠骑士，最后是信仰或反对神明的殉道者。”

在今天的拉丁民族中，如果能出现一个博爱的、善于迷惑的人，他只能立足于社会的或经济的起点之上。他所依据的，基本上都是争论最多的和意义不确定的学说。如果是一个神学或形而上学的问题，可以迷惑上百人。但如果是一个几何公式，没有一个人会被迷惑。观念越怪异越荒谬，愿意追随的疯子就越多。这种情况政治界中最为常见。被迷惑的人，常常为观念而不惜殒身。

现在无政府主义所蛊惑煽动的政治暗杀非常多。印度部长的一位副官，被一个印度学生所杀，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学生被某家报纸的观点煽动，才做出这种举动。那个观点大致是：“宁肯失去老朋友的尊敬，我们也要敢于申明，政治暗杀不是犯罪。一切自由的和没有成见的人，都应该认为暗杀犯不是罪犯，而是为人道主义复仇的人。”

在印度，孟加拉一地，一年中的政治案件有329起，其中很多是普通的强盗案。

30年来，无政府党派、革命党和其他信徒所犯的杀人案，数量有增无减，将来必定会更多。蛊惑神秘和迷惑的人，从前被宗教吸收，现在都倾向于政治了。和这种精神错乱的人讨论是没有用的，应该消灭他们。否则，我们就将要被他们消灭。

## 第四章 虐待宗教

### 一

对宗教的怨恨，是法国社会混乱局势扩大的原因之一。政府被声势浩大的党徒驱策，不得不走上虐待宗教这条路。没有人能从这种虐待中获利。国人不明白心理学和历史，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这种虐待可以从教会和国家分离法，以及教会产业法看出来。人们要不是被怨恨蒙蔽了眼睛，绝对不至于表决这种法律。这个法律的真正目的，在于剥削教徒们赖以生存的微薄供给。足以妨害民主共和制的措施，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教徒们其实不应该进行哀诉。因为这个法令赋予了他们一种连最虔诚信教的国王都不敢赋予的自由和权威，让教权脱离了俗权的羁勒，由教皇来任命从前沿袭成规的由政府任命并供养的主

教。还有比这更不合适的措施吗？它尤其拙劣的地方是，把教徒驱逐到教堂之外，断绝他们的生活方法。德国人在阿尔萨斯的举动正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在无形之中成功侵略那里，就是凭借教徒的力量。他们不但不虐待，反而优待，大量增加供给。可见德国人有多聪明，而我们有多愚蠢。

想要让一种穷困闭塞没有政见的教徒顺从民主政治，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我们被缺乏远见的所谓命运蒙蔽，反对我们自己最明显的利益。要知道无形的权威，无法用暴力进行攻击。这种简单的道理，是小学就应该教授的知识。

至于教会产业法，不仅是一个拙劣的政策，而且还是一种野蛮的不公平法令。人们都知道，这个法律本来就是为了攫夺教会所有的几十亿产业，而用养老金的方法分给工人，以保证工人们投票。而这个法令的唯一结果，恰恰是保证了工人们产生怨恨情绪。几十亿产业转瞬就成了泡影。财产清理的最终结果，所得不过千万。而无数需要靠教会收入救济的事业，现在都要由国家来负担供给了。

唯一能从中获利的，就是财产清理人和投机者。这些人借此暴富。这个法令主要的提议人库

姆斯也承认，执行它，是一种强盗行为。他接受报纸访问时也曾说过：

“读一下雷吉斯芒塞在上议院所做的报告，就可以知道黑暗情况了。某处的财产清理人所清理的财产值60万法郎，谁知态度殷勤的法庭决定给予的报酬金额，竟多达10万法郎。另一名清理人，在28000法郎的资产中，获得了10000法郎的报酬。在尼斯，竟然还有一个清理人，在一钱不值的资产上获得了16000法郎的报酬。”

这种清理人和他们的保护人所得的数目，与工业家中持有资产的人所得到的利益相比较，还是个小数目呢。资产竞卖的时候不明白通告，而竞卖又定在当年买方很少的时候。竞争很少，所以获利巨大。维兰尼在1909年12月14日的议会中，讲了几件事，可资参考：

“用这个方法拍卖，导致森林修道院仅售价260万法郎，而赎买的人立刻获利800万。圣心教堂的产业，面积52000平方米，而要价仅520万法郎。它售出时，也才涨到600万法郎。这是把巴黎价值400法郎一平方米的地方，用100法郎的价格出售。买的人可以用低价获得至少值2000万法郎的产业。”

当时的国务总理也认为这种公开拍卖的规则不公平。公开拍卖的时间在夏季7月末，所以竞拍者不多。而且司法部长也认为广告说明不够，他已经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检察厅。检察官的意见相同，已在当地的民事法庭提起请求，现在也由法庭受理了。

公开拍卖的舞弊行为，法庭的腐败行为，司法部长都已经承认了。查特公司值800万，竟以50万售出。当时没能阻止，后来因为舆论的攻击，于是不得不阻止另外一桩公开拍卖中窃夺500万的行为。至于资产被收用了的人，都陷入窘苦之境。可是没有人会想一想这些人。政府又不付给他们救济金，恐怕将来他们要被饿死了。现在转录《公报》所载的一份演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质问国务总理，就是从此以后，什么人来供养男女教徒，又怎样救助他们的需要？他们既没有养老金，又没有收入来源。斯坦尼斯拉斯学校的校监，一位60岁的老教士，没有一块面包可以养活自己，只能凭借教课生活。我代他请求要养老费已经六次了。人们窃夺了这个学校的200万资产，教课时间久的人，是应该统计一下，发放养老金的。我们已经知道教会的几十亿产业的最初用途。我们知道它用于驱逐纯洁女子和善良人。那些人的志愿只是要行

善，要救济穷苦人，保证儿童的生活。你们侵犯、剥削、驱逐我们当中的好人，而把金钱供给恶人。你们知道责任的重大吗？”

像这样的愤怒言论举不胜举。不仅法国这样，其他国家也在鸣不平。巴西某家报纸所载的某位候补总统的话，可见一斑：“法国被教会的潜在势力所迫，所以反对教会的情况日益加剧。20世纪，在共和自由形式之下，出现了过度的专制行为。他们把教徒驱逐到境外。被美洲收留的漂流海外的流放人，都得到和平兴盛的发展，没有被虐待的担忧。罗马主教到新教徒罗斯福的宴会上，都具有一种亲和友善的感觉。”

左派议员也有反对虐待教会的观点。拉波里说：“20年来的大部分事业都消耗在宗教战争之中。今天所谓的反对教会主义者，并不是要防止教会主义的干涉，而是借口信仰自由，滥用一种权力罢了。那些要消灭宗教的人，自己或者他们的亲属都不免遵守仪式。既然自己还信仰，又为什么要勉强反对呢？从前路易十四的时代，也曾利用天主教进行精神的统一。当时法国上下都觉出沉重的苦痛。不希望今天的共和国家再用官方势力来反对宗教，再筹划这种精神的统一。”

今天的虐待宗教，后来人必定会有评判，就

像我们现在评判昔日的教会检查，以及撤销南特敕令。我们的统治者所根据的理由，也是为谋求国家精神和政治的统一。这一点与昔日相同。至于有害的结果，也和昔日国王诏令的结果相同。

## 二

想要为驱逐教会找一个具有科学外表的理由，就是教会传播的都是错误观念，应该用学识渊博的好教授代替。即便这个道理正确，也只能作为驱逐教会的辩护之词，不能用它来为没收产业进行辩护。更何况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从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来说，信仰都不能从理性价值上进行评判，只能从它所鼓动的行为上评判。美国出现的新宗教不少，因为成效显著，所以很受民众敬仰。例如摩门教徒在荒凉的土地上兴建多个繁荣的城市。不能不承认他们对美国的贡献。这种出于功利的观点也应该重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宗教所包含的真理固然不多，但就历史经验来看，重要文化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实现的。没有一种哲学像宗教那样，能让人克己、博爱。宗教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非一种应该加以破坏的力量。如果一种宗教要迫害其他种信仰，那么的确应该

加以遏制。否则，我们应该善待它。

而且宗教是一种长久希望的创造者，没有它，人们就不能减轻对死亡的恐惧。那些发明神明的人是人类的功臣。他们的事业和功绩，应该受到思想家的崇拜。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宗教的科学性，也不反对它了，而且承认它的巨大力量。过去，民族精神的固定性就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将来也许会有改革的行为，但如果人类常怀有希望之心，那么宗教就不可能被消灭。

## 第五章 社会斗争

### 一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地处北欧，算是世界的一个偏僻角落。那里经常浓雾笼罩。因为名气不大，所以游人也并不多。但根据向导所讲，这个城市和意大利名城威尼斯相似，虽然很少有游客常驻此地，但也曾经盛极一时。当时有游人偶然经过那里，见到了自从有人类世界以来，从没看过的景象。传统社会的阶级分工都被颠覆了。泥瓦工人成为领取年薪的人，贵族要做泥瓦工人的事情，工程师成了司机，银行家打扫街道，法官成了清洁工，而工人们很清闲，逍遥自在地在街道运河一带散步。



是什么神奇的魔术导致这种变化呢？是北欧神话中那些遍布天空大地和海面的神的力量促成的吗？当然不是。神明的力量还没有这么大。即便是奥丁神，也会束手无策。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可见的无边力量造成的。这种力量就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需要。

一个国际工团组织自恃权威和影响，认为劳动者肯定会服从，于是向社会宣布总罢工，进行挑衅。对于这种情况，社会各阶层都意识到进行抵抗的必要性，谁也不能坐视国家沦落、工商业衰败，让没有知识的下层民众代替推动社会进步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凭借着自身的主动性和勇敢，没有指望求助政府，而是自己主动取代了工人群众，从事各种社会劳动。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大罢工失败了。社会因此击退了工团的要求。

瑞典这种勇敢的自我保护措施，对文明进步有巨大贡献，使得其他国家中不知道抵抗的政府，学到了自我保护的方法。

这次罢工也体现出，对我们有威胁的社会主义，也危害到了无数的人道主义者。瑞典一家重要报纸说：“事件的结果是团结了非社会党。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人民结成紧密的团体，来坚

决反对社会党的危害。”自我保护的可能性，也需要有工厂主的团结、联合，以及舆论方面表现出来的同情态度。此外，中产阶级的手工技能也是主要武器。中产者中在乡村居住的人，应该会锯、刨、锻造冶炼等技能。这些都是瑞典人所具有，而我国所缺乏的。相反，法国人有一种忍受、退让的性格，瑞典人却没有。如果法国中产阶级不结成团体进行抵抗，将来必定会受他们的剥削，即将被消灭了。洛张说：“生在今天的世界，对国家的态度如果只是会辩论、会屈服、态度软弱，是没有用的。应该表现得强硬。如果不相信，不妨看看工人们。他们联合在一起，态度强硬。再看看中产阶级、工业家和商人，他们互相分裂而且态度懦弱。”

## 二

总罢工的尝试，如邮政员工的罢工和官员闹事、希腊的起义，原因似乎各不相同，但都是同一个心理规律的结果。各民族、各时代都是这样，这已经有历史经验证明了。

这种规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一种人由于某些原因发现了自身的力量和扩张趋势，于是便占据优势，进而想要制伏其他人。

刚开始的优势，最终会被控制。等到社会生活的各种构成元素失去了平衡，必定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民族生活和个人生活一样，只有势力均衡才能维持。均衡被打破，会导致疾病。混乱的状态一直存在，会置人于死地。社会有疾病和个人有疾病是一样的。把社会病理学编辑到一起，可以编成一大本。理想家们建议的治疗方法非常多，但能找到病源的学者却为数极少。

看一看历史上具有优势的阶级制伏其他阶级的例子，就能证明这个规律。罗马威震世界的原因，在于它的军事力量。等到均势中的元老院权力被皇帝消灭，军队就成了主人。帝国末年，只有军人握有创造恺撒独裁政治的力量。

之后，同样的控制行为由社会中据有优势的各个元素来执行，比如封建教会、王朝一类的势力。如果优势太大，超过限度，破坏了阶级之间的势力均衡，就会导致覆灭。法国王朝的灭亡，正是不明白这种均势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维持社会各种元素之间的势力均衡，不要助长一方扩张而压制另一方，是一种根本的政治原则。王朝不明白这个规律，最终灭亡。我们如果也不明白，也会走上灭亡之路，只要听任我们能看见的新的权力扩张，也就是劳动

联合会的官吏团体势力扩张就行了。谁能掌握这种能力，谁就能做唯一的主人。

这种普遍规律经常得到证明，我们能看见的希腊历史就是一个明显证据。希腊任凭军官阶级的势力扩张，最终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军人独裁制度。

### 三

没有用的人道主义空谈、对骚乱永远妥协的态度，现在都无济于事了。我们的敌人进行的破坏非常明显。一旦失败，就别指望他们会对我们施与恩惠了。

某位著作家说：“革命工团主义已经处在反对军队和祖国的阵地上。”还有巴黎社会党一位下院议员在演说中，对从军的青年说，要模仿巴塞罗那工人的样子，不听从入伍的动员令，要反对军事机关的要求。

可见工人的领袖已经向社会秩序宣战。听从他们的人中，有一些下院议员，有大多数官吏和小学教师。像中产阶级中的富人想要做的那样，和他们妥协议和，是一种可怜的心理。这种卑微可鄙的懦弱，恰恰增长了敌人的胆量。处在这种

战斗中，可选择的途径只有两条，要么夺取胜利，要么战死，别无他法。讲和既不能免于失败，又会被羞辱，更会让后世子孙蔑视。

今天的革命社会党，战术非常简单，常能达到目的。恐惧心理是议会表决的重要原动力之一，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而这种情况下通过的议案有多大危害，我也已经说明了。

## 四

看得见的行为，常是不可见的力量引导的结果。我们只知道行为的成效，却不明白原因。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不只鼓动我们的行为，而且还为我们事后进行解释时，提供理由。

这种规律适用于只相信情感的人。而政客们既然没有其他可相信的东西，当然也就包括在这个范围内。他们用来解释行为的理由，和鼓动别人行动的理由有所差别。因为后一种理由形成于不自觉的范围中，了解的人非常少。

一个时代的学者，他们的主动原则很少。政客们的主动原则也不多。探寻30年来我们的统治行为的原动力，有三种。第一个是对选举人的恐惧心理。第二个是为了取悦于选举人而虐待少数

人的信仰。这个“少数”，即使是全体公民也不管。第三个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现在一一证明。

恐惧心理的效果我已经在别的章节说明了。它的巨大力量想必没有人会反驳。近来法律的制定大多由它决定。内阁成员和议员们的卑微服从态度，也都是因为它。

第二种原动力也很明显，各种虐待行为都是维持内阁的武器。一家报纸曾说：“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凭借反对教会法维持了三年。库姆斯内阁靠封闭学校、驱逐教师，也取得了相同的执政时间。鲁维埃内阁凭借教会国家分离法得以维持，希望通过把教会财产分给平民，来平息他们的愤怒情绪。”

第三种原动力的力量较强。共产主义学说使用怂恿、重复、濡染等方法，已经成为比旧信仰更为不宽容的说教。不信这种新学说的人也受他们影响，以至于不敢反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基督教刚开始传播时的情况没有区别。

各种有害的法律都是共产主义所鼓动的，比如收回西部铁路之类。再有空泛的人道主义，也是共产主义产生的。这是我们的工商业、海军、

道德信仰被破坏的根本原因。最近的所得税法也源于此。虽然还处在讨论中，但表决通过是必然的。

总之，共产主义学说、虐待和恐惧心理，是政治的三大原动力。各种政治行为都以它们为根据。

## 五

我们的未来，就悬系在现在能看见的这些青年人的思想言行之上。青年们已经处在衰败的社会生活之中。他们看到传统信仰被消灭，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解体，又看到旧式的阶级、家庭、产业、国家、军队都已经碎裂，没有希望可以期待；自己虽然自信有所作为，却必然劳而无功；他们的性格将被消磨，最后不得不顺从接受虐待和暴力行为。

这种被动态度会鼓励革命党的野心。他们这些人，只想着攫夺别人辛苦劳动所得的财富。邪恶如果不被善良正义抗拒，那么将变得强大不可阻挡。中产阶级的青年们，现在还不失为精英群体，科学、工业、文学、艺术还被他们掌握着。但如果是没有性格的精英，将不能成为精英。罗马的精英在帝国统治末年也是非常杰出的，只是

失去了毅力，所以不能抵抗意志强健的蛮族。如果统治阶级渐渐受人指挥，那距离末日也就不远了。

将来的斗争从表面来看，是经济的斗争，但也是观念的斗争。或者说，是由观念所引发的情感斗争。

综合各种情感构成的民族性格，改变更加缓慢。不过，历史中也能看到民族性格发生改变的情况。法国的教育危害不小，但如果换到别的国家，可以在百年之中完成改变。德国学校的教师当然不能战胜敌人，但却可以创造出击败敌人的心理因素。改变民族的情感，就能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

## 第六章 近代命运说以及命运的分析

### 一

想要预测一个时代的命运，需要研究能指导时代意志并决定其行为的主要观念。但怎样探寻这种观念呢？在群众的行为中寻找吗？不可能。因为群众只有欲望而没有思想。在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的学者中寻找吗？也不可能。这些人能给我们的，只有能诱惑读者和听众的舆论而已。



探寻一个时代的指导观念如此之难，但如果我们听一听人们最期许的师长的讲论，就不难知道大概情况了。

聆听近来学院的演说，如拉维斯和皮埃尔·洛蒂的演说，可以知道这些青年人的导师们所关注的东西。这种演说不能够给人以勉励，只是说无论怎样都不要悲观。尤其让人不能忘的是，他们勉励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信仰，表现出一种对于时事的被动接受的忍耐，还有科学不能阐明的包围我们的神秘力量。之前最富有期待的思想家们，现在似乎都被一种黑暗的命运说打败。

这种命运说不仅在教授和学院的院士中可以听到，即使当代的政治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前总统卢贝说：“事物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着人类的意志。一种神秘理论引导着我们。”至于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神秘理论的元素，后面另有论述。

在我前面所说的学院院士之中，洛蒂表示的忧虑最大。他指责创造文化进步的科学无能，指责它不能做出解释。他说：“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什么；而将来，我们必定什么都不知道。真正的科学现在已经没有从前所具有的解释事物的自信。每次有人发现了某种事物的原因，就像是打

破了一重铁门，踏上一条黑暗恐怖之路，进而到达一扇更恐怖、封锁更严的门。我们越前进，秘密越多，黑暗越重，惊恐情绪越增加。残留的基督教信仰还试着为我们低声辩解，安抚我们的内心。但我们明知道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自我安慰说，在不可解释的边界上，或许可以期待真理的存在。”

这位著名的著作家既不相信科学的解释能力，又不相信努力可以抵抗时事的威胁。所以他说：“没有战斗能够抵抗这个破坏一切、平均一切的风潮。”

我对于这种平均主义非常怀疑，而且相反，我相信文明越进步，个人及其地位越不会相同。因为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复杂，学者与平民的心理、工程师和工人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表面上看，似乎一天比一天均衡，但人类实际上的均衡程度却一天比一天小。心理的不同，是不可改变的，无论如何激烈的暴力行为都不能抹杀。

拉维斯的悲观主张和命运说也不亚于洛蒂。他在接待潘伽烈来学院的演说中曾说：“如果你相信用几个旧式的简单的原则，就能在今天的政治活动中指导人类，我可要为你担心了，我也会为我自己担心。”至于新原则，他却不曾提及。

实际上是因为他不熟悉。他还说：“国家和社会现在处在危险之中。民主政治最初就是出于本能、欲望、观念的骚乱。他们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没有人能为将来的城市建设做出规划设计。他们被制度、法律、习惯阻碍，于是对现在的城市支柱力量进行攻击。现在一切都动摇了，似乎趋向衰微了。”

将来必然会有一天，世界各国都要在军事费用和社会费用中间进行选择。这个日子已经接近了，它将会让两种世界的人、两种不同的知识互相碰撞。那一天就是盛典。

这位预言家所说的，前人已经说过了。从古到今，各种民族如雅典、罗马、佛罗伦萨，都提出过同一个问题，也进行过相同的讨论。尤其一致的是解决的方法。蛮族的名称经常改变，但对内对外，都应该进行斗争。值得忧虑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人在变乱之前，总是忍受。

看看今天拉丁民族的和平派、社会党、大学生之间的相互联合，拉维斯所说的“盛典之日”或许可以出现。但是，“每一天”都会有它的“第二天”，这个“盛典之日”的“第二天”，就将是手无寸铁的民族遭受邻国入侵、劫掠的日子了。这种可悲的现实，可惜被人道主义梦想蒙蔽了。

前面所述的悲观主张的和命运说的趋势，不只出现在学院的院士之中，教育界也逐渐被影响了。那些不属于忍受派的教授，现在都已经成为蛊惑煽动暴力的人。投身于革命社会主义并成为首领的人也不少。

拉丁民族的教育家中，大多是这两种人。一种是忍受命运的人，一种是煽动骚乱的人。革命主义的力量只不过是酝酿暂时的暴乱，而命运说延续的时间非常长，也更为危险。命运是懦弱者的宗教，表面上依赖科学，所以看似可怕的怪物，但实际上没有实力。

## 二

命运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经过宗教家和神学家们不断补充而形成的。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有一种能统治一切的至尊权威，古人把它叫作命运。没有人能违抗命运。昔日，神对俄狄浦斯说：“你会弑父，并娶自己的母亲。”俄狄浦斯虽然不相信，但仍然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

各种宗教都继承了这种传统，现在的几个新的教宗派还在崇奉宿命论。根据这个说法，上帝在最初，就已经预定了哪种人应该升入天堂，哪种人应该堕入地狱。

今天的教育考试中，又有决定论的说法，人们于是借此来与命运说进行辩论。其实决定论和命运说并不相同。决定论把某种现象解释为某种前因的当然结果。同样一个原因再次出现，那么同样的结果也将再现。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没有控制和干涉。从前人们不明白一切自然力的错综复杂，于是奉为神明，希望用祈祷来让它改变。至于决定论，则反对控制和干涉。

命运说的定义又有所区别。决定论在我们的控制之外，而多数的命运说，在我们的意志控制之中。

我们可以听任形而上学的学者讨论自主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从实用上来说命运，以证明命运是各种愚昧因素的总和。如果能分解所集合的元素，命运可以立即消除。

### 三

命运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比如，衰老、气候、星辰运行等。我们充其量只能研究它们的规律，或者进行预测，以及有时出于自我保护目的而反抗。

第二种是可以避免的命运。只要科学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就能分解它的元素，并各个击破。那时它就会被消灭了，比如昔日夺走亿万人民生命的瘟疫、饥馑之类。

第三种是人造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在历史之中随处可见，想要打倒它很难。因为原因已经形成，结果也应当立刻出现。想要制伏它，就应该明白，需要一种力量巨大的原因来抵制这种有一定力量的原因。伟人们之所以能摆脱命运的束缚，就在于此。

从科学在解释现象方面的能力来考察，也可以发现，从前被认为是不可解除的命运，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分解和消灭的方法。40年前，在巴黎医院截肢的病人，几天后就会死亡。又比如疟疾和黄热病，从前也被认为是一定地域的人的命运。但今天，这些命运的元素已经被分解，可能会被消灭了。自从解毒方法发明之后，截肢的人不一定死亡了。疟疾和黄热病也经人研究发现，是寄生虫侵入血液。至于侵入的方式，是被某种蚊虫叮咬。于是又发明了消除这种疾病的疫苗。刚开始只能稍微控制发病，后来又有人发现，蚊虫在沼泽或积水中滋生，于是人们把这些地带变干燥，消灭疫情的源头。古巴首都哈瓦那之前是重灾区，现在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不再受危害，

可见命运已经解除了。

鼠疫也是一样。这种疫情曾经导致2500万人死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原因是死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细菌。还有非洲各地的疟疾，也因为科学的发展而被消除。

其他可以举的例子非常多。之前荷兰的海水泛滥成灾，现在已经努力解决了。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沙地和勃兰登堡泥坑，现在都已经变成美丽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一切能够征服自然的人，都是在与命运战斗中获胜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忍受困难的束缚。

## 四

上述这些分解一定自然命运的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历史命运。这种人造的命运建立在民族和政治的过去之上，有时候力量非常大，但也没离开可以分解构成元素进而消灭的规律范围。

历史中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事情不少。现以1870年的战争为例。如果解析这一战争心理方面的远因和近因，必定会发现，战败固然不可避免，但如果能有杰出之人，及时消除各种元素，可以不必像现在这样积重难返。

现在的心理错误和不能对未来进行预见，累积在一起，成为后世命运的根源。50年前，由君主的近臣所造成的命运非常多。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日俄战争中。俄国人不明白日本人的心理，才导致战败。

围绕我们的人为命运非常多，比如嗜酒的危害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征兵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具有遗传的嗜酒习惯。我们对这种命运没有办法遏制。国家还担心预算入不敷出，从而鼓励这种行为。

我们人为创造的命运没有停止过，势必造成过于严重的形势，没有分解的办法。前商务部长克吕比新近著作中所举的例子可以作为证明。书中说，有权势的部长竟然不能在所管理的部门中施行改革，只能坐视混乱状态。由他公开的行政事务中的混乱状态包括，部员之间始终存在的争斗、责任的混杂、命令不统一、机关老旧无能，他竟然没有办法进行指挥。这位部长在职两年，不能做出哪怕一项有用的改革。他自己不但不明白原因，而且还说补救的方法在于用“选举改革来改变民主道德”。想要治理积弊，应该先认清情况。他实在是没认清造成这种情况的力量。

命运中结果最可怕的是被情感造成的命运。



这也是人道主义成为近代法国一大危害的原因。社会基础逐渐被它侵蚀。我前面已经说明，无数酝酿着可怕的革命的法律，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制定的。把匪徒编入军队也是因为人道主义。优待这种匪徒，让他们在狱中所享受的安逸，比工人还优越，也是由于人道主义。

凭借着人道主义者的力量，杀人犯增加了两倍。如果没有舆论的爆发，人们竟然不能执行死刑。当人道主义者让整个民族堕落之日，就是祸患、危害积聚之时。大革命前这些人已经很多。人道主义进化到极限，只能看到被屠杀的尸体堆积在一起。鼠疫固然让人们恐惧，但更恐怖的却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不是进步的人，而是妨碍进步、消灭民族的自主行动力的人。

## 五

用心理学知识分解命运的功用，似乎非常明显。我曾就这一点，问过前外交部长阿诺托。据他说，政治家没必要掌握心理学知识。

政治心理不但能教人反对妨碍民族生活的命运，而且能教会人引导民众，指挥时事。大政治家如黎塞留、加富尔、俾斯麦、英王爱德华七世等，不但深谙治理之道，而且能分解历史命运的

各个元素。这种杰出人才，能精确地操纵心理因素。他们了解各时代发生的宗教、社会、经济等需要的能力，区分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可以避免的命运，不做无益斗争的消耗，是政治心理的要点之一。

我们当然不能消灭那些超越意志力的命运，但杰出的人能利用它，就像海航者利用风向一样。例如德国人对生产过剩和竞争，不但不反对，而且利用它创设了生产者联合会。我们不知道这种工业集中的必要性，便用法律来反对这种联合。可见德国人的聪明，而我们是多么愚昧。

如果不能利用产生于自然规律的命运，而是反抗，必定会贻害无穷。每次人为创造的命运，必定会有必要的波及和影响。我前面所举的1870年战争，现在人们大多已经忘记了，竟然连高等师范的考生都不知道有这次战争。但我们还在受到它的影响呢。即使就财政而言，我们每年还要付出4.5亿法郎。这是战争赔款的利息。这次战败引发的其他结果，则是军费的消耗。据郭色的计算，40年来共耗费530亿法郎。政治家没有远见而累及后世，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可见能够对未来稍有预测的政治家之可贵。不幸的是，这样的人数量太少。

自从议会主义得到扩张以来，多数政治家都认为政治仅仅是善良人的方法，不看重思想，重要的是用言辞来诱惑听众。虽然能够成功，但也难以维持长久。

大演说家们习惯把言辞当作事实，所以他们是拙劣的政治家。那些掌握了人类和客观世界知识的人，能迅速而坚决地做出决定，哪里需要华丽的辞藻呢？

所以没有远见的政治家是那些灾害性命运的创造者。英国现在增加赋税、扩张海军、抵制德国的霸权，就是因为40年前他们的政府没有远见。

英国想要平息怨恨情绪，在德法战争之后拒绝召集国际会议。否则，德国的野心是可以遏制的，也不至于发展到将来的程度。俾斯麦朝夕忧虑的地方就在于此。这位大心理学家在他的笔记中曾说，这种国际会议可以“削减战胜国的利益”。这也是他在数年之后召集柏林会议以遏止俄国人战胜土耳其的要求的原因。

拉丁民族的前途很难确定，因为他们的政治家生活在现在而不考虑将来。一种只顾目前利益的政策，通常都是拙劣的政策，必定受一切命运

的拖累。政治和工业相同，只有有远见的人，才能成功。

根据最近的历史可以知道。40年前很少有人知道非洲，只有极少数探险家知道那里。一位年幼的具有远见的国王预感到亚洲即将脱离欧洲羁绊，而欧洲的将来在非洲。当时，他手中资源非常贫乏，竟然能不管人民反对，毅然在非洲大陆建设了一个帝国，逐渐扩张，以至于面积几乎达到俄国的一半。现在，那里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财富来源。让这个小小国名列世界经济大强国的原因就在于此。

## 六

这本书如果能教导几个人，也算不至于徒劳无功了。我常说的，其实是平常的道理。人们稍微想想，就能得出相似的结论。那些从前要追随我们，而现在走在我们前面的民族，都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那些有先见的人，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听美国前总统罗斯福1910年4月24日在巴黎大学的演说，就可以知道了。他也说明了平等观念的不合逻辑，社会主义的危害，生活中性格要比智慧有优势，以及其他各种道理。现在节录如下：

“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智慧如何出众，无论民众如何知书识礼，都不能够代替性格中根本品性的缺乏。比如，自制力、常识、共同协作并主动负责、勇敢、坚决等，这些都是民族应该有的品性。没有这些，一个民族就不能自主发展，而且还不免于被动挨打。”

我当然佩服有智慧的人。但我敢说，最重要的，还是民族共有的品性和民众日常表现出来的德行。过去，有很多民主制共和国，但都倾覆了。至于它们倾覆的首要原因，就是用贫富来作为划分民众的界限。无论什么党派执政，无论在什么党派纲领下导致的倾覆，无论是少数专政还是民主政体，总之如果是用忠于一个阶级代替忠于国家，那么民主共和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这些都是我前面说过的，但也应该经常说说。只有反复言说才能影响、浸染人心。一种观念，因为正确性而让人服从的，其实很少。只有让它浸入我们的思想，才能产生作用。

## 第七章 社会防卫

### 一

我前面所讲的社会动荡和充满斗争的情况，

在想要脱离历史，从而导致失去了心理特性的民族中表现最明显。

经由传统固定下来的习惯、信仰、公共情感、理念等，构成了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引导我们民众的思想，在指挥着我们的行为。所有民族都是这样。

正是因为存在民族精神，社会才能巩固，国家的观念才能得到保护。在民族精神形成之前，民族仅仅是一盘散沙，充其量只有暂时的凝聚性，而缺乏持久的力量。民族精神如果被分解，民族就将退回野蛮的状态。罗马的灭亡正是因为失去了精神凝聚力，它的后继者需要花费数百年时间才能再次形成可以让人脱离野蛮状态的民族精神。现在，我们正处在岌岌可危的时代，能引导我们的思想行为的宗教、政治、道德信仰日渐衰微，而能够取代它们的因素尚未形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缺失信仰。群众需要一个能创造希望的东西。

神明的具体性有时会发生改变，但不能自己消失，只会有一种新的信仰取而代之。今天，社会主义的理念有逐渐代替基督教信仰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它能附着于民族的传统信仰。国家这一神明是我们从前所崇拜的天堂的小模型；社

会党所宣称的天堂，是古代神话中的天堂的近亲。

自古以来，这就是民族蜕变的过程和途径。最古老的民族背负的传统力量最重，只有能让民族改头换面的信仰才能起作用，而历代遗留下来的情感不可能立刻消灭。

社会党所树立的信仰是基督教信仰的直接继承者。他们能在群众中传播，一部分理由正在于此。宗教神明不能给普通民众以希望，社会党能给予。科学的发展让人们不再迷信，社会党却能再次为人们树立幻想。

社会党理论的传播者憎恨旧的传统理论，这实在是错误的。教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其实是同一心理的不同分支。他们的精神都受到同一种幻想的控制，心理状态相同，所崇拜的事物相同，满足需要的方法也都相同。

如果这种新宗教的传播者能和平地传播理念，自然谈不上什么危害。可是社会党的特点是，强制其他人服从他们的相信自己能改造世界的信仰。这一点和其他的布道者是一样的。

由社会蛊惑而产生的怨恨情绪已经被这种宗

教传统控制并利用，于是在工人中迅速传播开来。今天，工人的命运似乎比从前更幸运，但他们对现在的社会组织的诅咒、诋毁，却与最初基督教徒对待社会的态度无异。

## 二

社会受到的攻击一天比一天猛烈，自我保护能力一天比一天弱。所以，古代的各种社会形态都会对新的信仰表现出相同的态度。从古到今，精英们都不相信建设社会的原则可以巩固。他们一方面被传统势力挟制，另一方面又被当时的需要强迫。他们没有强健的意志，所以对一切民众运动都妥协退让。民众的情绪最容易改变，往往一点微小的事情，就能导致他们爆发激烈的情绪。

既没有一个原则性的公共基础来预防、制止民众的心理动摇，又没有明确的行动指南来引导群众的行为。统治者本应该引导群众，现在却反过来跟从群众。所以说，精英们正逐渐失去影响力，即将不再拥有以往的社会地位了。

所有集合了群众的本能需要，鼓动人们完全破坏社会的口号，都是由一群思想偏执狂热的人传播的。这些人的名称很多，或者被叫作领袖，



或者被叫作传播思想的人。但实际上，虽然历经长久的世代更迭，他们的心理构成因素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些人知识能力有限，但却非常顽固。对同一个事物反复宣讲，而且预备为这种观念取得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他们不断许诺给人们光明的天堂，所以他们对群众精神的影响力最大。因为天堂就是希望。而希望，正是人类行动的最大动力。

这些人自己醉心于梦想，从而鼓动群众，让他们也陷入迷乱的狂热之中，让他们愤怒地反对一切阻碍力量。群众的心理状态，虽然也经历了世纪之久，但也没有发生变化。人类在知识水平上可以进步，但控制着我们的情感和欲望却不曾改变。

不幸的是，传播者和传播者相斗争。可惜制造混乱的传播者多，而理性的传播者少。人们常常对错误表现出偏爱，却对冰冷的理论不太欢迎。

称赞幻想很容易，但为现实辩护却非常难。告诉工人说工厂主是盗窃犯，应该把他的工厂烧掉，人们很容易就相信了。如果想解释工厂主降

低工资的原因，告诉工人说，是因为亚洲人在制造同样的货物而且物美价廉，这种话是没有人听的。

今天，世界已经被虚妄的幻想扰乱。从前那些大帝国的灭亡，都是受到我们现在认为无意识的情感信仰的影响。理性在过去就无所作为，所以也不要指望它在将来能做什么，准备接受幻想的力量就可以了。幻想逐渐渗透到群众的精神之中。一旦植根，就会长久存在。想要预测它在未来的危害，就不容易了。

### 三

前面我已经说明了，革命的暴力行为基于原始的野蛮本能。这种本能常隐伏在民族精神之中，凭借一定的哲学理论，成为新权力的根源。人们都觉得自己的行为合乎理性，而且还经常引证。其实却是反对理性的，以脱离羁勒的传统本能为引导。恐怖时代的统治代表了一种低级恶劣的本能变成权利。这是本能制伏理性的现象，而不是像著作家和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理性战胜本能的現象。

这种遗传的本能的合法胜利，在历史中还属于新的现象。社会所有的存在所必需的劳动，在

于用传统规则、习惯、法律来约束由原始兽性遗留给人类的本能。控制它其实很容易。一个民族控制得越好，文明程度越高；但并不能消灭它。它在一定兴奋剂例如社会主义的作用下，就会重现。

那些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都是非理性的结果，而且还常常是反对理性的斗争。想要用理性理论来解释由本能的理论所制造的事端，这是不了解历史的。

今天的革命运动，是为野蛮本能谋取脱离社会约束，并且消灭社会关系的反动行为。和之前的革命运动相同，许多被幻想蒙蔽的人，他们认为的进步，其实是在向低级拙劣的生存形式退化。

所有的文化中都包含强制和妨碍的因素。了解了这些之后，才能成为文明人。增强这种社会约束，民族才能脱离野蛮状态。如果这种约束变弱，社会就会恢复旧状。

只有坚持劳动，才能维持由文化所创造的社会约束力。社会衰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劳动无用，而放任自流。

这种无能的观念普遍流传于有见识的民众中。他们忍受社会灾害，就像从前人们忍受瘟疫一样。这种对我们衰弱原因的解釋，不曾影响革命传播者。他们对成就的自信，是他们的力量的构成因素之一。

今天，劳动者的待遇已经十分优越，但那些传播者怂恿他们，说社会对他们不公平。他们于是相信，事物实际的发展取决于具有什么样的观念。近代工人的主要心理状态，已经逐渐恢复了原始本能，堕入野蛮境地。

让他们迷途知返，回归文明的任务非常艰巨。应该先告诉他们，智慧、资本和劳动各方的价值，再让他们明白，别人用来诱惑他们的新社会，其实会让劳动者更加窘迫穷苦。但现在，还有能传授这种说法的教师吗？

## 四

既缺乏这种教师，又不能依靠没思想没头脑的大学教育，以及没有势力的政府，我们的中产阶级应该向自身寻求，并且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就像瑞典此前反对工人罢工的斗争一样。

由瑞典政府的经验和教训，可知今天推行的

罢工权，是把阻碍一国公共事务进行，并且埋下扰乱祸根的权利，给予少数闹事者，这和文化进步是完全不适应的。于是国会提出对群众进行约束的规定，并严惩导致妨害公共安全的罢工的草案，设立一个特别法庭解决争端。我们从前如果有这种法律，也不至于有种种导致衰败的罢工。

相似的运动在法国已经开始。但想要订立这种法律，需要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决心，非常软弱。只有坚决地攻击才能有坚决的保护行为。所以索瑞尔说：“将来工厂主发现他们不能从社会事业和民主政治中有所收获，要受制于人，那时或许可以期待他们能重现旧日的意志力。他们的势力能在结成团体的工人中扩展，增强资产阶级实力，让他们能在工业斗争之中挺立。”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处在世界发展的时代，不知道防卫，就不能生存。我们的中产阶级想要在这声势逐渐增大的斗争中获胜，应该拥有一定的美德，剔除一定的恶劣品性。有的暴发户生活奢侈无度，这就是恶行之一。工人们大多认为这种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他们的辛苦劳动之上。这种行为容易招致怨尤，比一切社会党演说的鼓动都容易。

无论是和英国贵族相比较，还是和法国昔日的贵族相比较，我们的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都太快。如果没有较为下阶层的人加入，以巩固势力，中产阶层将不复存在。

旧的贵族能长久维持，是由于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需要个体的杰出。而智慧的贵族则不然。想要长久存在，必须维持智力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能从遗传获得。我在另一本书（《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则》）中已经说明了。所谓社会的精英群体应该时常更新。因为遗传规律会把他们的后代恢复到民族的平均水平。可见自然力有时也进行均衡，但并不是社会党梦想中的平等。自然力不但不均衡同一代人，而且还会加以区分。精英们的后代恢复到平均水平，可见，天然的均衡是为了未来；而社会党所要达到的均衡是针对现在。

## 五

社会自我保护的表现，似乎不在中产阶级中的上层，而在中产阶级的下层，比如店铺老板、零售商之类的人。他们常受到威胁，从没有进行过防卫。现在发现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于是谋求自卫的方法。

他们结成团体、组织联合会，而且还筹划训练民兵。得自瑞典的教训不少，应该加以勉励。

他们对现在的地位已经忍无可忍。《时报》议论说：

“商人们因为立法者和暴民政体的加价，以及政府的柔弱，以致成为工团的猎物。他们处在社会政策的统辖之下，要缴纳营业税、罚款等费用。更有社会法让他们负担加倍。”

“他们的这种与日俱增的牺牲，能得到交换来的保护吗？不能。时常有可以直接行动的志愿兵进出。如果商人不服从命令，就被强力威胁。即刻会被告知要遭受驱逐，顾客也会受到惊吓。”

“小商贩受到的惊扰和掠夺最严重，所以决定自卫，并计划组织民兵，以暴制暴。这是十余年来政府不作为的结果，要让受祸害的民众直接防卫。”

前述这些反对暴烈行为的自卫方式，重要性不可忽视。从中可以让我们获得几种固定原则，帮助我们在混乱之中找到方向。

这种固定原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报纸所刊载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社会史最有益的断章，很常见。如维伦纽夫勒鲁瓦想要建设一个车站，一个议员率领群众阻止快车，就是一例。这种举动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灾祸。若不是具有一种野蛮人的心理，何至于到这种程度？

## 六

如果法律普遍存在蔑视性、政府无原则，一切保证文化进步的纪律都被废弛，那么社会的倾覆将近了。今天除了实力，没有什么会被尊重。官员对于上司、水手对于船长、工人对于工厂主，态度都极其傲慢。

更不必讳言的是，旧的行政机关日渐不受尊敬，法庭不能主持公平，政府服从各党派的党员而不能保护公民、反对强暴。有时政府也能态度强硬，但只是用在那些被剥削和虐待的不能还手的老教徒身上。

一种文化被完全倾覆了，一段荣耀岁月也被消灭了。相似的现象曾经出现在大革命之后的督政府末年。一个专制者的铁腕固然能恢复秩序，但民众付出的代价可堪回首吗？我们现在又能再进行这种尝试吗？



那么，这种约束力又能求诸何处呢？统治者？不可能。立法者？更不可能。这种立法者和统治者既没有自由，又缺少尊严，只知道服从选举委员会。

潘伽烈曾说，那些在议院里极其傲慢的议员，其实是在为县选举委员会做准备。“走路时，人人都能听到他们戴着奴隶的镣铐之声”，并准备“跪拜在可怕的神秘的神明，即各县的选举委员会面前”。

今天被选出来的立法者其实是社会的危害。他们没有主见，只知道谋划着再次当选，并且服从于群众的低劣本能。

## 七

处在现在的世界里，想要追求一种能指挥将来社会的道德规则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注重现在的道德规则，并争取让它延续下去，阻止混乱局面的扩张。

足以指导民族的主要原则，如果力量非常强大，人们就都重视它，而不在于数量的多少。罗马人的宗教就是罗马人的信仰，足以维持罗马的强盛，绰绰有余。等到这个信仰变弱了，罗马也

就走向衰落。

我们今天应该孜孜以求，捍卫国家观念，探索进行道德组织的方法。社会党徒知道这一观念是社会的枢纽。枢纽被破坏，社会自然随之倾覆。

附属这个主要意思之上的，还有其他几种。尤其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没有军队，没有秩序，没有政府的尊严，没有精神上的自律，就不能生存。这种不可缺少的元素，除了革命党，没有政党会抛弃。

爱国心是维持民族威严的真正黏合剂。祖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徽章和烙印。我们由它而生，也应该为它而生。土耳其革命的领袖之所以能聚拢人心，正是由于鼓吹爱国。他们的一个宣言里说：“一切具有良心的自觉的人，都知道祖国的神圣不可侵犯。它比父母更可贵。总而言之，比世上一切都可贵。”

不幸的是，这种爱国心，昔日能创造罗马的权威，今日能促使德国兴盛，在我国，能够奉行的人却很少。在德、美等国，爱国心经由大学教育传播到知识阶层，由小学教师传播到下级平民当中。在法国，能找到相似的守护者，传播到青

年和儿童中吗？这点非常让人担心。

今天，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保护社会、反对野蛮人破坏的责任。野蛮的党徒如果获胜，就会导致普遍的衰微、社会内讧和外敌入侵。所以，保护国家、抵御混乱，是每个人都不能推卸的义务。

由国家观念所引发的道德规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武器。但它的实力轻重，取决于它影响人心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凭借法典达到的，那么实力必定弱小。

由此可见，能把国民聚合在一起，变得强盛，并且得到维持的因素，不是宪法，不是庞大舰队，也不是陆军部队。真正的力量，只是信仰。信仰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是看得见的事物的创造者，是指挥人心的工具。一个民族需要经过若干世纪才能获得；而一旦失去它，就将退回到野蛮状态。

## 八

习惯、制度的衰微，是我们现在的鲜明表现。原因在于性格的懦弱。现在，懦弱的人非常多，尤以需要最迫切的精英们最为明显。上自国

民要员，下至小官吏，都没有决心，非常懦弱。

而革命党人则不然，他们有强大的毅力，所以非常可怕。在强健的意志面前，所有懦弱的人都要屈服。

这些人现在还没看到危险，是因为社会还被过去的传统力量撑持着。我们的真正主人在坟墓中。我们是在用死人的专制，抵制活人的怪癖欲望。

现在能帮助我们而且具有毅力的，似乎只有死人了。但死了的人不可能一直帮助我们。过去的声威能维持，可我们还是需要现在人的扶持。

## 九

全书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总结一下。物理现象、生物现象、社会现象的规律固然不同，但都是被同类的需要限制的。

近50年来，知识界范围的扩张比以前要大。除了发明新事物，更有解释原因的理论学说出现。

近代科学放弃了对宇宙唯一的固定元素的研究

究，一切学说都在逐渐被消灭。即使是物质说，也失去了它的永恒性和不朽性。今天，确定性被不确定性代替，绝对静止被势力均衡的动态静止代替。事物的物质原理，已经退到不可知的无穷世界里。现在可以认识的，只有现象之间的关系。潘伽烈曾就经验的总和下结论说：“在我们所处的相对世界中，对任何一个物体下绝对定论，都是虚妄之言。”

今天，科学已经放弃了那些过于简单的解释，用无数积聚在一起的小原因代替总规律。根据科学的教训，物理界、生物界和社会界都是最小的个体事业。这种个体，孤立则没有力量。但如果联合起来，力量非常强大。陆地的出现、植物萌芽、维持生活，都从最微小起步。文明的进化也是由于综合了个体民众的力量。

科学不但证明了现象的发展有众多复杂的原因，而且还证明了所有个体，如物理的元素、生物的细胞、人类的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力量来激发、引导，那么就没有功效可言。所以，在物理、生物、社会各个范围内，确定发展方向的力量不可或缺。一旦不受这个力量影响，个体就成了没用的散沙。生物的主导力量就是生活，停止了，也就死亡了。社会的根本规律也一样。

人类范围内的引导力量，就是信仰、观念等因素。这种力量只会继续而不会消失。名称会变化，但本质却一直存在。历史各时期所需要用来确定方向的工具，或者是信仰，或者是刀剑武器，或者是科学技术，或者是理想观念。社会一旦失去引导力量，就会灭亡。

统治者引领民族的任务，和学者们运用现象进行研究一样。政治家们对于客观力量，能利用但不能创造，但可以利用反作用力来与它抗衡。

## 十

人类所用的各种力量之中，可借以制胜的，常是意志力。它是具有至尊权威的神明。能让学术在虚空的世界里生发出奇异的光彩，都是意志力的作用。

从历史上进行考证，一个民族能够昌隆繁盛，就像一个学者顽强地要求宇宙赋予他秘密一样，都是有强健的意志力做基础。

如果再考察某个民族衰微的原因，比如罗马曾经是世界的主人，最终却被蛮族覆灭，原因大体上就是意志力的薄弱。

这就是个人和民族的主要品性。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健人的意志，而不是让人变得懦弱。意志强健的人从不会失望。意志是创造事物的源泉。

近代史告诉我们，某国家民族强盛、某国家民族停滞不前、某国家民族衰微，原因在于他们所具有的意志力不同。所以，统治世界的力量，不是命运，而是人的意志。



# 心理学 统治世界 2

群体篇·大众心理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高永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版权信息

心理学统治世界.2，群体篇：大众心理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译者：高永

责任编辑：方小丽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 目 录

---

## [版权信息](#)

## [第一部分 乌合之众](#)

### [第一卷 群体心理](#)

####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 [第四章 选民群体](#)

#### [第五章 议会](#)

## [第二部分 革命心理学](#)

### [第一卷 革命的一般特征](#)

#### [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 [第二章 宗教革命](#)

#### [第三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为](#)

##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 [第二卷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化](#)

####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 [第四章 革命大众的心理](#)

#### [第五章 革命议会的心理](#)

### [第三卷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 [第二章 旧制度的心理基础](#)

####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与哲学家的影响](#)

### [第四卷 制宪会议](#)

#### [第一章 制宪议会的心理](#)

#### [第二章 立法议会的心理](#)

#### [第三章 国民公会的心理](#)

#### [第四章 国民公会时期的法国政府](#)

#### [第五章 革命暴行的实例](#)

####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 [第五卷 古代传统与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

#### [第一章 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挣扎：督政府](#)

#### [第二章 秩序的恢复：执政共和](#)

#### [第三章 最近一个世纪的传统与革命原则相冲突的政治后果](#)

第四章 革命原则的新近发展

第五章 民主演进的结果

第六章 民主信仰的新形式

# 第一部分 乌合之众

## 第一卷 群体心理

###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一般而言，“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不管他们的民族、职业或者性别，也无论他们因何走到了一起。不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一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与群体中的个体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集体转向了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心理。虽然它是暂时的，然而确实表现出了某些非常明确的特点。他们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定义，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是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这样，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到群体精神统一的支配。

很显然，人们偶然性地站在了一起，仅仅这样的表现，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的群体特点。就像有1000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他

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根本不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特征，必须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也必须对他们的性质加以确定，这是基本前提。

组织化群体中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是他们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他们作为个体同时出现在某一个地点。有时候，在某种狂暴的感情——比如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因此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重要特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迅速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了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从这个角度讲，一方面，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时，却也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由此可见，组织化群体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目的；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巨大影响的作用力下，它当然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但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的特征。除了这些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加的特征表现，这种附加的特征表现，因为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于心理

群体，我们不难进行分类。当我们将对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即由不同成分但为了同一目的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如由相同的宗派、等级或者阶层组成的群体）非常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的特征以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两者有所区别。

不过在我们深入地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很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开展这项工作，自然科学家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所有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去探查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的特点——我们也会如此。

对于群体心理，我们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这样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这个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的区别而有所不同。同样，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因为一个人让自己的性格始终保持不变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事只会发生在艺术创作中。只有单一性的环境，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的单一性。对此，我曾经在其他的著作中给予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了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就解释了法国的国民公会中那些最野蛮

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一些谦和君子。在正常的环境和条件下，他们自然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者性格善良的官员。在风暴过后，他们又会恢复这样平常的性格，安静守法，典型的好公民。因此，拿破仑才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全世界最为恭顺的臣民，正是基于对这一个特质的把握。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群体表现出来的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做全面的研究，因此只能专注于那些较为明显的、已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形态。只有在这种发达的组织化阶段，一个种族一成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的特点。这时，你会发现，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讲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会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性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与孤立的个人可能无有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是群体所特有的，只能在群体中才能看到。现在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群体性的特征，以便揭示其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是：无论是谁，只要构成了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者智力，不管同与不同，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都会使他们获得一种集体心理。这将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其单独一人时大为不同。如果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情感或瞬间的思维在个人的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至少不可能变成行动。但当他们结成一个心理群体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了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就会表现出一些集体特点，与单个的细胞所具有的特点非常不一样。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构成因素的总和或者它们的平均值并不存在，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物质——比如碱和酸——发生反应后形成的一种新物质一样，它具有的特性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也就是说，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证明这一点并不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我们要想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在现代心理学中所确认的那些真理：无意识现象不但

在有机体的活动中，而且在智力的活动中，都发挥着完全压倒性的作用。这种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力量巨大，有意识因素只能起着很小的作用。就算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很少的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主要受到了遗传影响，而造成了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在这个深层心理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可以为我们的行为给予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地隐藏着没有说明的原因，但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的许多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经常是不被发现的）。人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其实都是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导致的结果。

在无意识构成种族的先天禀性这个方面，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总是十分相似，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这是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独特的遗传条件形成的差别，以此区分彼此。在智力上人们的差异最大，不过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与情感。而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件事情上，比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即使最杰出的人也很少能比芸芸众生高明多少。从智力上相比较，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鞋匠之间一定会有天壤之别，但是在性格上，一定差别甚微，甚至根本没有差

别。

很普遍的性格特征，受到我们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他们都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因此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然后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与个性被削弱了。结果就是，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在群体中占了上风。

对群体而言，它一般只具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那些需要高智力的工作（这表明群体的非理性）。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议会中的杰出人士共同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笨蛋所采纳的决定更加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人与生俱来的平庸的才智来处理面前的工作。群体累加在一起的只是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这是事实，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一个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平常所言，整个世界比伏尔泰更加聪明，倒不如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也就是说，群体中的个人如果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的品质集中在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绝不会和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

这些新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正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群体所独有的、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即使仅从数量的角度去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保护性的），这使他敢于发泄出本能的欲望，但在他独自一人时，却必须对此加以限制。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下面的念头：群体是一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如此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就在群体中彻底地消失了。

其次，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能接受的倾向。传染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是普遍现象，却不易解释清楚。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催眠方法，下面，就对此做一些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一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达到的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精神倾向，如果不是作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会具备这样的念头和能力。

最后，群体特点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正好对立相反。在这里，我指的是那些易于接

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群体暗示的现象，就必须注意最近一些心理学发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体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绝对服从，会做出一些同他平时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我们通过最为细致的观察已经证实，那些融入群体行动很长时间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受到了催眠师的操纵而进入了一种迷幻的状态。他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变成了自己的脊椎神经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他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辨别力和意志力也不复存在，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受到了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而言，群体中的个人也会如此，他不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他的一些能力被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极大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些行动。这种群体中的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加难以抗拒——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的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作用，且相互影

响，使其力量倍增。其中，具备了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这种暗示的个人则是非常稀少的，所以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利用暗示的力量，去违背原则地做些事情，比如，有时只需一句悦耳的言辞或者一个被即时唤醒的形象，就可以阻止群体最为血腥的暴行了，这是群体中的明智者唯一可做的。

现在我们知道，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如下：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壮大，思想与感情因为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时，他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就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发生文明的倒退。孤立时的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却会变成一个野蛮人：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会表现得身不由己，狂热残暴，原始似的热情和英雄主义。且与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地让自己被各种形象和言辞所打动。相反，他以个体孤立存在时，这些形象和言辞对他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能够以最熟悉的习惯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举动进行警惕和分析。而在群体中的个人，则如同众多沙砾中的一颗，他可以被风吹到

无论什么地方。

基于这些原因，人们就会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则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都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那些委员，个个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型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清白无辜的人送上了断头台，并且对自己人也大开杀戒，放弃了他们那些不可侵犯的权力，违背了自己的根本利益。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其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可以让一个守财奴从此挥霍无度，将怀疑论者改造成忠实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恶的犯人，让懦夫成为豪杰。比如在1789年8月4日那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们一时间激情勃发，毅然地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可他们如果是单独地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的，死也不会同意。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会低于孤立的个人，但从感情以及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这

全看所处的环境如何，而且一切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从犯罪学角度研究群体的专家，是完全理解不到这一点的。群体当然是经常犯罪的群体，但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这样的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才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了一种教义或者观念的凯旋，提供了数量和力量的保证。他们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一种“伟大”行为的诞生。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去向异教徒讨还上帝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保卫自己的祖国。在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中，有着无可置疑的无意识的成分，也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因为如果人们只会以一种残酷无情的办法去做大事，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多少他们的记录了。

##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在概括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我们还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详细研究。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群体的某些特点，比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批判精神和夸大感情等，几乎总是可以在处于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像妇女、儿童和野蛮人（非歧视，只是指不文明的人）。但这一点我只是附带一说，本书并不论证。而且，这对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没有用处，



也很难让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相信。

现在我们将逐个讨论在大多数群体中可以看到的那些不同的特点。

### （1）群体的冲动、易变与急躁

我们在研究其基本特点时曾经说过，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受大脑的支配，而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群体和原始人非常相似。就表现来说，他们的群体行动当然可以十分完美，然而却并不受大脑的支配，个体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行动的。所有的刺激因素都会对群体起到控制作用，并且其反应会不停地变化。可以说，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仆。孤立的个人和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影响，但他的大脑会给他提醒，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因此他能约束自己，避免受到这种摆布。此道理可以用心理学的语言表述为：“孤立的个人拥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相当缺乏。”

根据产生兴奋、刺激的原因的不同，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者懦弱的，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和强大，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

们。刺激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会屈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非常多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群体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以及表现得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成为刽子手，又很容易慷慨就义，为了每一种信仰的胜利，它们不惜血流成河。如果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我们不必回顾所谓的英雄主义时代，在起义中它们就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前，突然出现一位名声大噪的将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拉过来上万人，然后一声令下，这些人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群体绝不会做任何预先的策划。它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又总会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它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一个方向飞舞，再落到地上。后面在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就会举出一些群体感情多变的例子。

这种易变性使群体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更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当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时，民主就几乎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另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狂热的愿望，却不可能持久，因为它根本无能力做出任何的长远打算或者思考。

群体冲动而多变，不仅如此，它像野蛮人一样，还不承认。在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的障碍，但群体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会让它感觉自己势不可当。对其中的个人来说，没有不可能，只有不敢想。每个人都很清楚，在他孤身一人时，不能焚烧宫殿或抢劫商店，即使有这样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但在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却马上意识到了人数给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和抢劫的念头，并且会马上屈从。他会狂暴地摧毁障碍，他们的机体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激愤的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的来源，它也总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就像它会影响到一切大众的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总是急躁而冲动，这毋庸置疑，不过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拉丁人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很显著的差别。在最近的法国历史中发生的事件为此提供了生动的说明。二十五年前，据说某位大使仅仅因为一份侮辱性的电报被公布，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在谅山关于一次很轻微的失败的电文，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怒火，导致政府立刻垮掉。不过就在同时，英国远征喀土穆时遭受

了一次严重的失败，在英国国内的反响却很轻微，甚至没有一名被解职的大臣。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一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最多，凡是赢得了它们的信任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大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是在悬崖边上散步，指不定哪一天便坠入深渊了。

##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在定义群体时我们说过，群体的一个普遍的特征是极易受到暗示的影响，我们还指出，在一切人类的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受理性控制的）。不管你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总是处在一种期待被注意的状态中，所以很容易受人暗示。暗示产生后，通过相互传染，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暗示变成控制），群体感情的共同倾向就立刻成为既成事实了。

正像所有处于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会变成行动。不管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都会在所不辞。这一切都取决于外在的刺激因素，而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对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合理的理由非常重视，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动极为对立而且非常理性。

就此，群体永远在无意识的领地漫游，随时听命于任何的暗示，像对理性的影响无所反应的生物一样，失去了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以外再没有别的。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是不会存在的，如果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一定的理解，就必须牢记这一点。

那些能够轻易地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群体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的曲解之后产生的结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即面目全非了。群体的思维是形象的，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没有逻辑关系的一系列的其他形象。只要我们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系列的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了。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群体对此事实却视若无睹，将歪曲性的想象力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了。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进行区分。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会被它当作一种现实，尽管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

群体对于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形式，既多又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彼此不同的倾向。不过，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作

为相互传染的一种结果，其歪曲程度是一样的，在群体中的所有个人都会表现出相同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一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这种传染性的暗示过程之起点。比如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它出现在所有的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第一个感觉到了它的存在。然后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下，由一个人编造的谎言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成为一种奇迹。

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的特点，因为它就是被成千上万个人所观察到的现象，尽管都产生了幻觉。

如果要反驳以上所说，我们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和品质。这无足轻重，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开始，有知识的人就像白痴一样，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有不通之处，因此如果要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要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就算写下很多书，也难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希望读者认为这是些无法得到证实

的主张。因此我会为它举出几个实例，它们都能从可以引用的无数的事例中被随便挑出来，并具备可信度。

下面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它来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其中的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有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过去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海上游来游去，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失去联系的巡洋舰“波索”号。那时是白天，阳光灿烂，值勤兵突然发现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看去，都清楚地看到了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但是，这却是一种集体的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了一条船去营救，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可到达目标时，人们却发现自己不过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是从附近的海岸漂过来的。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幻觉才算消失。

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值勤者发

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的一个暗示。相互传染开始了，这一暗示被全体官兵接受。

在眼前发生的事遭到歪曲，无关的幻觉取代真相——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很多人数。只要几个人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就算博学无比，也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就会马上消失。

作为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他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在让他们仔细看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标记以后，当着他们的面，达维演示了精神现象（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记录下来。结果这帮人全都同意，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来获得。但他却向他们表示，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骗术。

“达维的研究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的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假。”文献的作者说，“甚至众多的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该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发明的办法非常简



单，人们对他竟然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能让这些人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我们在此遇到的依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由此说明，对于头脑比较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当然更能轻易地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了。

类似的例子有许多。就在我们讨论此问题时，报纸上还有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五六个目击者确信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都是这样，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的怀疑，于是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她们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却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就如同前面的例子，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对其他的目击者产生了影响。

像这样的事情，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一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此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了。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了尸体，有时当然会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者其他让别人产生同感的装束

细节。这种同感就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征服理解力，扼杀一切的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了，而是头脑产生的幻象。在报纸所记录的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然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了，由此可以向我们解释，我们从这种现象中，一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经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有一个小孩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之旅。接下来，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在同学辨认了尸体的第二天，有一个女人大喊：“天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并观察他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的儿子，”她说，“他在去年七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她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到现场，说：“那是小费利贝。”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这个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也有孩子的同学，他的根据是尸体佩戴的一枚徽章。

然而，这些人全搞错了。六周后，那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

杀死，又被人运到了巴黎。应该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也就是最缺乏主见的人。这件事同时向我们表明，这样的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对儿童来说，绝不能相信他们的证词。地方长官习惯说童言无忌，但如果他们有一点点的心理学知识，他们就会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很无辜的谎言——可它仍然是谎言。就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凭借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倒不如采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我们的结论是，它们的集体观察很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们所表达的不过是传染过程中影响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我们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很不可靠，甚至能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二十五年前的色当一战，数千人参与了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的证词，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定指挥这场战役的到底是谁。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为止总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由数百人证明过的所谓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几乎为零。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

意，因此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准确性的最为强有力的证明了。但是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却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其文章需要重写。要知道，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应该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如果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名目击者所证实了，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他们公认的记述相差太远了，完全不可信。

由此得出的明确结论是，我们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毫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于思考结果的自我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过去的真相就一无所知了。那些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像赫拉克利特<sup>1</sup>、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过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可能没有一句。可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没什么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了什么形象。你要知道，打动群体心灵的往往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当时的真实的英雄。

很不幸，神话虽被清楚记录，却毫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

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sup>2</sup>爱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没有多少的共有点。

英雄的神话就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改变了，让英雄离我们而去，也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现在的时代就能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的神话，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很多次。比如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的眼里，他注定会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可三十年后，这个安详、仁爱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野心，就使接近三百万人丢掉了性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发生了变化。在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家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了，就像现在已经有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从他的身上，人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者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于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人们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比起来，他们更加明白群体的特点与心理，同时也知道，除神话之外，历史无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 （3）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单纯

群体感情无论好坏，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夸张。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野蛮的原始人，不能做出细致区分，而是将事情视为整体，看不到中间的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了另一种事实的强化：无论什么感情，一旦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迅速地传播，其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剧增。

结果就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就像女人一样，瞬间便会陷入极端。而怀疑一经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反驳的证据了。像厌恶或者反对，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但若是群体，却能立刻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暴，特别是在异质性的群体中间，又会因为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人数越多，对这一点就越肯定，而且因为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就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以及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白痴和心怀妒忌的人，他们摆脱了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极为巨大的力量。

更可怕的是，这种群体的夸张倾向，经常作

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说起来，这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物，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到惩罚，会对其有所约束，但群体却不会，因此很容易干出最为恶劣的、极端的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无能力经由巧妙的影响，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者最崇高的美德。有时，他们甚至比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道德时，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

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群体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那些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且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和绝不以说理的方式去证明任何事情，这些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伎俩。

进一步来说，对于他们自己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与美德，肯定总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很敏锐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的品质。

这种在剧场中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认识到了其重要性。它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逻辑基本上不相关，打动观众

的艺术当然品味低下，不过也需要特殊才能。像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多么成功，往往不可能。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成功，因为若想作出判断，就必须把自己变成观众。

所以我们又一次可以做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比如一部在某国掀起了热情的歌剧，在另一个国家却很失败，或者只是取得了部分的以及平常的成功，这是因为它没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进行补充说明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而对智力不起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其智力会迅速下降。有一位学问官员塔尔德先生，他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群体仅仅能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者极低的境界。

####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懂简单而又极端的感情。外界提供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它们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者绝对的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才有效果，历来如此。和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以



及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了。

一方面，群体对什么是真理和谬误的认知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于是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但群体绝对不会这样做。就像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都会立刻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以及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将大败而归。而且，如果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的因素，反驳者可能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但是它们的强度各有不同。在此方面，支配人们感情和思想的最基本的种族观念将一再表现。尤其拉丁民族，专横和偏执更能发展到难以理喻的程度。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的发展，已彻底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意识。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其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对独立，他们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推翻他们自己的信念。在拉丁民族中，从宗教法庭时代以来，每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对于自由一直做不到另一种理解。

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就是专横和偏执，它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只要有人在它们中间进行煽动，就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施。群体对于强权俯首帖耳，但很少为仁慈心肠所打动，它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群体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领袖，只向严厉欺压它们的暴君低下脑袋，而且总是为这种人塑起一座最为壮观的雕像。它们似乎很喜欢践踏被它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它们，他的权力威慑着它们，他的利剑让它们心怀敬畏。

它们会随时起来反抗，然而对强权却始终低声下气。不是很稳定，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们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对它们的心理完全误解了。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很容易屈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如果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和恐惧，本能地变成

奴才。当波拿巴将一切自由都压制住，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忽略了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特别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旧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表面的事情。事实上，它们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怀有绝对的迷恋与崇敬；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 （5）群体的道德

假如“道德”指的是持久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和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

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着眼于它们的犯罪行为，在看到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存在。但为何是这样呢？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知道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因而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将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慢慢杀死，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精神，即孤立的个人无法做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迅速传染给

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热血沸腾、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随处可见。只有集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视死如归，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就是私人利益，然而它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它们甘愿自己被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其实这些东西他们本可以据为己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里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觊觎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使他们享受基本的生活。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肯定是要发生变化的，然而它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

态。甚至不像我刚才说过的在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的品质极为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也经常会模仿一下绅士所表现出的风度，虽然与他们习惯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它也经常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可算作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它在实践这些美德时，当然不会有清醒的意识，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它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它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那么人类文明则不会出现，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 （1）群体的观念

我们在前一本著作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就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寥寥无几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所具有的力量。最后我们又谈到，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就是历史大动荡。

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很详尽了，因此我现在不想旧话重提。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个问题，以及它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因一时的环境影响而捉摸不定的观念，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在这类观念的范畴之内。现在，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面临坍塌。它们的稳定性已不存在了，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我刚才说过的那种过眼云烟一般的观念每天都在大量形成，但是看来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而且发挥的影响也绝不会很持久。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其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群众才可能接受它们。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解释了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的原因。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因此能够做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由于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种现象并不是群体所特有的。许多孤立的个人，不只是野蛮人，还包括在智力的某个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比如宗教信仰中的狂热宗派成员——这种现象同样可以发生在他们身上。我曾看到，在我们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并拿到了文凭的有教养的印度人，就令人费解地表现出这种现象。一部分西方观念被附着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根据场合的不同，他们会表现出这一套或那一套的观念，并伴之以相应的言谈举止，多种观念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会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真正存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如果相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那非



世代相传的观念莫属。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间时，他的行为才会真正不时表现得背道而驰。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纠缠它们并无益处。我的意见是，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到各地去观察一下。

群体若要接受一种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必须要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对它们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是由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决定的，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这解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换言之，很少存在有高下之分的观念。一种观念，不管它刚一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它们产生影响，便会被剥夺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固有价值，而是它所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20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都算不上十分高

明。从哲学的角度看，它们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但是它们却有着十分强大的威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

甚至当一种观念经过了彻底的改造，但是群体若要真正地接受它，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时才会产生作用，其中涉及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论述。

不要以为一种观念仅仅因为它正确，便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多么无足轻重，立刻就可以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他原来的观点。人们看到的是，过不了几天他便又故态复萌了，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支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会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毫无用处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得以深入人心。一旦它们根深

蒂固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其不可抗拒的威力不言而喻。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行将崩溃，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证不已，欧洲出现的大屠杀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都心惊胆战。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的后果。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一段漫长的时期，而要彻底地根除它同样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 （2）群体的理性

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都是相当拙劣的，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

如同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需要观念来辅助，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很相似，他们知道，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便愚蠢地认为天下的所有雇主都在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谄于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唯一论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有理可据的，因此可以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读读某些演说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令人吃惊，但是它们对听众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煽动、蛊惑、说服集体的。熟悉群体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目的便实现了。二十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还不如几句有号召力的话。

进一步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这是毫无必要的。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换言之，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但绝非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都高明许多。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普遍赞同，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 （3）群体的想象力

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是很强大而活跃的，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它们头脑中产生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束缚起来，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随即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它们认为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原因便在于此。实际上，分析一下一种文明便会得出结论，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恰恰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

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最终的结果，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因此，最能栩栩如生地反映出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他们心目中幸福的理想，于是他们非常满足。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种理想几乎没有改变。戏剧表演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同样的感情被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即使是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会认识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象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很快地就会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那些罪行完全是虚幻的。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

的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几乎与现实无异，它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进行研究。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除此之外，任何时代和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对它使用暴力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停止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立足，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象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铭记于心。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若要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取论证的方式。安东尼<sup>3</sup>让民众反对谋杀恺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地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恺撒的尸体。

无论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麼，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赘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种大奇迹、一场伟大的胜利、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是秘密的。上千个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个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五千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象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五百人而不是五千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则是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



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的想象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八百五十条船和二百零三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并不是事实本身影响民众想象力的，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矫舌不下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它们的艺术。

####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需要推理，它对观念全盘接受也好，或是完全拒绝也罢，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立刻行动起来。我们还证明，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它就会对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敬若神明。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立刻就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解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作更为细致的考察时，我们还

会发现，无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它们采取的总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归结为宗教感情之外，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称呼了。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象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不切实际地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进行思考，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拥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在同等程度上它还会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某种神秘的力量看作一时激起它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一个人如果仅仅是单纯地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是有虔诚信仰的信徒，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内心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标准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与妄想随着宗教感情的出现而产生。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某种信念激励起聚集在一起的人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出现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盲目的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存在于群体的信念中，因此，它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这个群体就会将他当作神一样来看待。拿破仑就当了一年这样的神，一个受到狂热的崇拜、随便置人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立足，皆因他们成功地支配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因此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都无一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指出，并不是武力维持着罗马帝国，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还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三十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言听计从，这真是匪夷所思。”他

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已经成为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虔诚膜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一种新宗教的兴起随处可见，而皇帝本人就是它的神。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一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我们不可能将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整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并不仅仅是那些廷臣崇拜君主，而是整个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控制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而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依然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先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只要对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深入探究一下，就很容易破解历史的奥秘。不管群众需要什么，他们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上帝。

切莫以为，这些事情只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未失过手。对于“神”“宗教”这种词群众固

然是听不到了，过去，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长期被奴役和压迫着。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偶像，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深知，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能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地位。

由此看出，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若想植根于群众当中，不得不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稀罕的例证。同阳斯安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也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将蜡烛吹灭，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的著作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代替，然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改变

了，然而真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跟着改变了吗？

我再重申一遍，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宗教形式，否则对于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便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着眼于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往往是看不到的。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令他感到惶恐，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肆无忌惮，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只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同类的现象还有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铲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得不到这样的评语了。

正如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当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甚至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们的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王一样愚昧。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握有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基巴托洛级惨案或宗教战争，其实并不完全是国王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在研究过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它的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的形成。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即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它们能够使群体深刻地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容不下其

他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会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虽然它们的自发性仅仅是一种表象。某些观念的爆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上去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准备性工作的延续，使之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可能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决定一个罢工，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根于这种因素。

在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痒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群体



的一切信念和意见都植根于间接因素。这些因素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 （1）种族

我们不得不把种族的因素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中曾对它有过细致的研究，因此不需要再详细地讨论。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一个历史上的种族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秉性，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便具有了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它在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的气质的外在表现。我们指出，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个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与种族的暗示因素对立，换言之，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反，那么它注定是不会持久的。

我们在本书下面的一些章节里，还会不时提及种族的影响，我们会说明，这种影响是非常强大的，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大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 （2）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且对我们发挥着巨大影响。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光深刻地影响着生物进化以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这种理论更加广为人知，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出现相似的变化。然而目前它尚未得到足够广泛的普及，许多政客同20世纪的学者相比，仍然高明不了多少，他们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所指引的唯一道路前进。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因此就跟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加如此。他们能够轻易地给传统造成的变

化，就像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

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不管是民族气质还是文明，一旦脱离了传统，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从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疯狂地毁灭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不可能产生；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社会也不会产生进步。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无济于事，由此造成的结果，或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是对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无政府状态便随之会取代衰败。

因此，对一个民族来说，保留过去的制度是最理想的状态，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的实现并非易事。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那种抱残守缺，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更是如此。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且指出，最狂

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20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或许会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被一扫而光。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重新建立起来了，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卷土重来。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中的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很快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 （3）时间

时间对社会问题就像对生物学问题一样，这个因素是最有力的。它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同样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原有的现象。人们正确地认为，如果蚂蚁有充足的时间，它也能将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不过，这里我们仅仅讨论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有着巨大的作用。一些重大的要素，譬如说种族，也取决于它，没有它便无法形成。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获得力量靠的是时间，同理，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未必能在另一个时代实现，源系于此。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起来，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也是未来的母亲，然而却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的变化，应当让它任意地发挥作用。今天，面对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感到深深地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建立于一夜之间。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

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之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为动荡的。”

#### （4）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能够清除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进制度与统治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我认为这些想法仍然得到普遍的赞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而且目前的各种社会学说也仍然以它们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一直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论。哲学家和史学家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它的荒谬，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如同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这个时代造就了它们。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它们一时的奇思妙想，而是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注定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

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毋庸置疑，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仍然无法撼动其本质。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对事物的深层进行研究时，很少对它们多加留意。正是因为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仍然存活于君主制的统治下，而经常表现得十分嚣张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主义，却是存在于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有共和制的宪法。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书中，通过提出典型事例来证实了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愚蠢的修辞学家徒劳的工作。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责任，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同时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办法，如同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应当由衷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现出一片荒谬与矛盾，然后他又对拉丁民族蜂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

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后者总是循序渐进慢慢地发生变化，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从来不考虑是否对称严谨，仅仅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地以不一致为理由将不一致消除；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会进行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控制着我们长达二百五十年的议会，因而使它变得从容不迫。若要说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项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每个种族的需要，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而要对它们逐一进行审查。比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研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民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这种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必须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侈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对他们可怜智力水平报以怜悯。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他们的成功马上会预示着一场残酷的内战，这又会立刻带来一种比旧政权更具残酷性



的新的集权制度。

由此而论，深刻影响群体秉性的手段，是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的。我们看到，某些国家，譬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类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无联系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性格控制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只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毫无疑问，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着，而且还将持续发生。人们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这些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制度反作用于群体的头脑，它们才引发了这些大动乱。然而并不是制度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和词语，特别是词语，它们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荒诞，下面我就简单地揭示一下它们令人吃惊的影响力。

## （5）教育

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先面临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将他们改造，甚至能够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复，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它成为最坚实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已经很容易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可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可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害处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他们告诉我们，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随着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杰出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里说，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1，在五十年时间里，人口的犯罪比例从每十万居民中二百二十七人骤升到了五百五十二人，即增长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得尤其严重，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他们，已经由免费义务教育制取代了交费制。

当然不可说，即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不可能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谁也没有坚持过这种主张。就算它不会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之上，即使有些最杰出的头脑，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它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很多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制度的主要危险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书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会死记硬背，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他来说除了背书和服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前公共教育部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重复得很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荒谬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

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愚钝而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怜悯，他们尽管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毕竟学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sup>4</sup>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的危险性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态度，极度想要摆脱这种生活状态。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也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低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仅仅是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须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愤怒，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浮躁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若天道，却又时时对它怀有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到政府身上，脱离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拥有文凭的人，

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所事事。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人，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最卑微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攻击着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想要谋得一个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两千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对农田和工厂全都蔑视，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自然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谁领导的这场革命，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显然，迷途知返已经无济于事。只有经验这位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指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如今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现在，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今天，在凭自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支配世界的民族

中，这种教育依然强盛。泰纳先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还会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很相似。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也许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以为，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虽然它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但是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毕竟能够提高智力水平。可是它真能提高智力水平吗？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来自于判断力，来源于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给予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怎样能使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大大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纳先生作过出色的说明。他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可以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中获得

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还要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无论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获悉的各种细节，有些粗略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早或晚地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正是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经验、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封闭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和判断。十个人之中，至少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白白浪费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是 $\frac{2}{3}$ 的人，是因考试而活着——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还有一半或 $\frac{2}{3}$ 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我指的是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崇敬，他们必须要做到正确——对这种事所抱的期望实在太过分了。在那一

天的那两个小时内，他们也许正确或接近正确，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弱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终结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精疲力竭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了生活的俗套，而只要一旦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锁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称得上本分，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如英国或美国一样，采用的却是恰恰相反的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并无不同，甚至更好。

此后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又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差别。后者并没有我们如此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比如，他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所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进一步拓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很有天赋，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于他在十九岁或大几岁时一次几个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也更有利。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呆板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些一般性教育的课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起来，而且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得以施展各种各样的技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获得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们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们今后将要从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在二十五岁时——如果有充分的各种材料和条件，时间还有可能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拥有了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一整个的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令人惋惜的。关于我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

点长得过分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仅从这个角度看，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顶，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于繁重，对以后的时代不加考虑；对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加考虑；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加考虑；对我们活动于其中、他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加考虑；对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加考虑；对为了站住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并且意志坚强同样不加考虑。这种不可或缺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都没有教给法国的年轻人。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这种素质。因此从他们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们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们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给他们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修复，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种试验既困难又危险。这个过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

以上所说的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

酝酿、明天就会出现各种想法和信念，就必须对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一些了解。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为当前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让人沮丧。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怎样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怎样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今天，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

##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我们刚才讨论了赋予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的间接性准备因素。现在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面内容里我们将会看到，若想让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应当怎样运用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一章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依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从影响它们心理的方法中，归结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激发群体的想象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染过程。然而，正

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必须对它们分别给予研究。这种研究是有益处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sup>5</sup>，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 （1）形象、词语和套话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象力时已经看到，它特别易于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支配。这些形象不一定随时都会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激发。经过艺术化处理之后，它们毫无疑问有着神奇的力量，可以在群体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可以平息风暴。因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sup>6</sup>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系，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可能最大。比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能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各种大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无法战胜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便会肃然起敬，俯首帖耳。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乃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才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词语唤起的形象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会随着时代或民族而异。不过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牵连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按钮。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拥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逐渐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什么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足以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的变化很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

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的结论是，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是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是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毫无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效仿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希腊人的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设计出来的制度有何相似之处呢？那时的共和国实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建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可能存在。

“自由”这个词也是如此。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什么相似之处？像“祖国”这样的词，对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

除了指对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之外，还能有其他的含义吗？它当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断的敌对城邦构成的全希腊。在古代的高卢，“祖国”这个词又能有何含义？它是由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构成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宗教，恺撒能够轻易将它们征服，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实现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无须多言，就拿两百年前的事来说吧，能够认为今天法国各省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伟大的孔代——他和外国人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是同样的吗？然而词还是那个词。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恪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投降，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不是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保证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遍地都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称呼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作大量的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改动。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所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所给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形成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改头换面。聪明的托克维尔很早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次，换言之，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制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流行词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惕。名称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选择恰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够被民众所接受。泰纳



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运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比达荷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似的审判台，做出与古墨西哥人所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运用辞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的语言不尽相同。

在以上事例中，时间是促成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与极不相同的观念相对应。如果见多识广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所以我不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指出，正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义。比如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事实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冲突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

无论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援于国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可能地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以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中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中，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

## （2）幻觉

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它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建塑像，设立祭坛，超过了其他人。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古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它们而建立的；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的；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以逃脱它们的强大影响。有时，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铲除这些幻觉，然而似乎注定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如果没有它们，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如果没有它们，他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这种野蛮状

态。毋庸置疑地说，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虚幻，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如果有人毁坏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的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全部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否则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这一项任务迄今已有五十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20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入到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中，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终结。幻想遭到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不闻不问。哲学即使取得了再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那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追捧他们、需要他们的巧舌如簧者。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绝对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如今社会主义为

什么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虽然存在着一切科学证据，它依然继续发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扬长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更愿意推崇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沦为他们的牺牲品。

### （3）经验

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根深蒂固、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而且得以再次出现。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太大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作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尽管仅仅想成功地动摇牢固地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史学家毫无疑问会把19世纪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当作一个充斥着奇异经验的时代，任何时代

都没有尝试过如此多的试验。

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宏伟的试验。发现一个社会有待于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自上而下翻新一遍，这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让欧洲在二十年里陷入深刻的动荡中。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需要在五十年里来上两次破坏性的试验。然而，即便是试验结果明确无误，好像仍然不那么令人信服。第一次试验的代价是三百万人的生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试验导致割让领土并在事后表明了常备军的必要性。此后几乎还要进行第三次试验。恐怕没准儿哪天它肯定会发生。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三十年前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让人认识到贸易保护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至少需要二十年的灾难性试验。这种例子显然数不胜数。

#### （4）理性

在列举能够对群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时，根本就没有必要提到理性，除非是为了指出它影响的消极价值。

我们已经论证过，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

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所以，那些知道怎样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必须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伪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有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这样才可以——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这种根据讲话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讲完全不可能事先进行准备和研究。在那种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演讲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听众的思路，仅这一个事实就会使这种演讲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讲究逻辑的头脑，惯于相信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因此在向群众讲话时，不免会借助于这种说服的方式，他们面对自己的论证起不到作用，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位逻辑学家写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一组公式上——的数学结论是不可更改的……由于这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即使是无机物，如果它能够演算这一组公式的话，也会表示同意。”这句话说得当然不错，然而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守这种组合，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只要尝试一下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例如野蛮人或儿

童的头脑——就知道这种论说方式是多么一文不值。

如想看清楚同感情对抗的理性是多么渺茫，甚至不必降低到如此原始的水平。我们只要试想一下，就在几百年前，与最简单的逻辑也不相符的宗教迷信是多么顽强！在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必须在它们的规矩面前俯首称臣。只不过到了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来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指引，是否应该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不必贸然称是。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太大用处。作为支配着我们的无意识的力量的产物，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每个种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并且由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只能服从这些定律，即使这种冲动显然极不合理。有时，各民族好像被一些神秘的力量所控制，它们相似于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彗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

我们若想对这些力量存在一点认识，就不得不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如果仅仅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一个加利利的木匠 <sup>7</sup> 似乎不可能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似乎不大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的领土更大的帝国；在欧洲已经十分发达、各地政权都已有了等级森严的制度的时代，区区一个炮兵中尉似乎也不太可能征服众多民族及它们的国王。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不用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比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群体的精神构成，我们也了解了能够对它们的头脑产生影响的力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是，这些力量是怎样发挥



作用的，以及是什么人把它们有效地转化成了实践的力量。

## （1）群体的领袖

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

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的头领，有时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们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温驯的羊群，没了头儿羊就会无所事事。

领袖最初常常不过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本人也是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才变成了它的信徒。他对这些观念十分推崇，以致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全消失了。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罗伯斯庇尔，他对卢梭的哲学观念痴迷不已，在传播它们时竟然采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才

能，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产生犹疑。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出现这种人物。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是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的思维对他们都起不了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蔑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全无踪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认同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各民族从来就不缺乏领袖，然而，它们并非全都受着那种适合于使徒的强烈信念的激励。这些领袖往往熟悉巧言令色之道，一味地追求私利，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很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效果通常只是暂时的。有着狂热的信仰，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即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之流<sup>8</sup>，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他们是在自己先

被7种信条搞得眼花缭乱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想入非非。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即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被自己的梦想吞噬。

不管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不管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是最为惊人的，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确实如此。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籍籍无名的信徒酿造的，他们除了自己赞成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或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之所以建立，靠的并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

然而，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为数不多，史学家很容易把他们清点出来。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是个权势显赫的主人，下面则是一些出力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们不停地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着只言片语，慢慢地使其迷恋。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也

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行，一定会导致一切希望和梦想的实现。

在每个社会领域，由高到低，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特别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只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不过，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所代替，虽然往往效果不佳，这些定期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

群众领袖掌握非常专制的权威，这种专制性当然是他们得到服从的条件。人们常常注意到，他们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能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狂暴的人听命于自己。他们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他们发出罢工命令，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部凭借他们的一声令下。

如今，由于政府甘心受人怀疑，使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因此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夺取政府的位置。这些新主子的暴政带来的结果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政府温和得多。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当初群龙无首、不堪一击的状态。在

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当两个指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时，罢工便立刻解散。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无论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明显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包括那些充满活力，但只一时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和他们相比，另一类人更为不寻常，他们的意志力更持久。前一种人一身蛮勇，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视死如归、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别派得上用场。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缪拉就属于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加里波第也属于这种人物<sup>2</sup>，他虽然没有什么特长，却是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他只带领一小撮人，就可以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即便它受着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保护。

不过，这类领袖的活力虽是一种应予考虑的力量，它却不可能持久，很难延续到使它发挥作用的兴奋事件之后。当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时，正如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一样，他们往往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他们虽然能够领导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控制自己的

行为。他们是这样一些领袖，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本人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有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驯兽，不然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另一类领袖，即那些能够持续保持意志力的人，尽管不那么光彩夺目，其影响力却要大得多。在这类人中，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比如圣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布皆是。他们或是聪明，或是心胸狭隘，这都无关紧要——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所具备的持久的意志力，是一种不寻常的、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成就什么，并不是总能够得到充分的评价。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不管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首肯。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怎样的结果，德·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来的例子。他是一个把世界分成东、西两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过去三千年里曾有最伟大的统治者徒劳地作过尝试。他后来败在一项类似的事业上，但那是因为他年纪太大的缘故，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如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需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克

服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就可以。一位见证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数语，记录下了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日复一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在讲着那个关于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述他所战胜的一切，他怎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遇到的一切反对意见、与他作对的所有联盟，他经历的所有失望、逆境和失败，都未能让他灰心丧气。他追忆英国如何打击他、法国和埃及如何迟疑不决、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如何带头反对他，以及他所遇到的反对的性质，有人试图用拒绝供应饮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他还说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一切富有经验、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责任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全部都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计算出它会在某日某时发生，就像预测日食一样。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会包含太多的人名，可是这些名字却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

让它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比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不得不让群体对暗示做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特别是希望影响它们的人应具备某种品质，对于这种有待于做深入研究的品质，我称之为名望。

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比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会不一样。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忽视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就越显得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使措辞不发生改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



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只需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坚信不疑。广告之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即在于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是这样说的，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最知名的人士”，我们一旦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拿来试用一下。若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相互拼杀一番。

假如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

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如同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效仿它；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癫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在自己是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时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惧症，也可以由人传染给动物。

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些事件能让所有的头脑产生一种独特的倾向以及一种群体所特有的性格，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相距遥远的人也能够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更加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面临崩塌。

很多影响要归结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已经作过说明，因此在这里我只想按十五年前我就这一问题说过的一段话。下面引述的观点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人就跟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不管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呢？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并非论证。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公然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出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优点很多，他们对东方民族却只有无足轻重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都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

着一种相近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怎样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环境中，并没有必要同他作长时间的交谈。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传染是一些著作在某个时期受到轻蔑——可以拿《唐豪塞》评为例——的原因，就在几年后，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褒赏。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从而得到普及。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当然，每个时代创立的群众信仰的方式，也大都相似。勒南就曾正确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时也提及，“在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一些最恶劣的败类”。

应当指出的是，与我前面提到的情况相似，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展到社会的上层。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它正在被那些会成为它首批牺牲者的人所接受。传染的威力是这样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不复存在。

由此解释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扎根于社会的最上层，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清晰。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为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任何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从长远看是智力在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是十分间接的。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终于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早已化为灰尘。

以名望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进行普及的观念，因环境而获得了巨大的威力，这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名望。

世界上不管怎样的统治力量，不管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望”。每个人都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因此不易做出定义。名望所涉及的感情，既

可能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有时这些感情是它的基础，但是没有它也完全能够存在。最大的名望归死人所有，即那些我们不再惧怕的人，譬如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祖。此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赞赏的虚构的存在——印度地下神庙中那些可怕的神灵，但是它们因为具有名望而让我们害怕。

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使我们的批判能力麻痹，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无论神仙、国王还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没戏。

形形色色的名望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它可以独立于个人的名望。相反，个人名望基本上为一个人所特有，它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共存，或者由此得到加强，不过没有这些东西，它也完全能够存在。

先天的或人为的名望更为常见。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即便是他本人多么没

有价值。一身戎装的士兵、身着法袍的法官，总会令人肃然起敬。帕斯卡尔则正确地指出，法施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装扮。缺乏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即使是最狂放不羁的社会主义者，王公爵爷的形象对他们也多少总会有所触动。拥有这种头衔会使剥夺生意人变得轻而易举。

以上所说的这种名望，是由人来体现的，除了这些名望之外，还有一些名望体现在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事物中。后者的名望往往只是长年累月重复的结果。历史，特别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不过就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判断。谁也不想证实这些判断，每个人最后都会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出现一些再没人敢说三道四的称号和事物。相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研读荷马肯定是极令人生厌的事，然而谁又敢这么说？巴台农神庙按其现存的状态，不过是一堆非常没有意思的破败废墟，但是它的巨大名望却使它看起来并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所有的历史记忆——如果他的财产能够使他拥有自己的身份，他事先便可断定他们是爱戴他的；只要能与它交往，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自己手里。很容易看得出来，当他露面时，他们高兴得脸上泛红；如果他向他们说话，抑制不住的愉快会让他们满面绯红，眼睛里闪烁着不同

寻常的光芒。这么说吧，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崇拜，如同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喜欢革命一样。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不十分浓烈，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满足和骄傲也算不上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述贵族的书销路相当不错，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就如人手一册的《圣经》。——联系在一起。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痹。群众就像个人一样，总是需要对一切事物有简明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普遍性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关系，它们只受制于名望而已。

现在我来谈谈个人的名望。它的性质与我刚才说过的那些人为的或先天的名望完全不同。这是一种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品质，而且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即便是这些人与他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们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

所有伟大的群众领袖，如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拥有这种极高的名望，他们所取得的地位也同这种名望特别有关。



各路神仙、英雄豪杰和各种教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都是因为各有其深入人心的魔力。当然，对他（它）们是不能探讨的，只要一探讨，他（它）们便全部消失。

我提到的这些人在成名之前，早就具备一种神奇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他们也就不可能成名。比如说，达到荣耀顶峰时的拿破仑，仅仅因为他的权力这一事实，就享有巨大的名望，但是在他还未拥有这种权力，仍然籍籍无名时，他就已经部分地具备了这种名望。当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将军时，多亏了那些有权势者要保护自己，他被派去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愤怒的将军中间，他们一心要给这个总督派来的年轻外来户一点教训瞧瞧。从一开始，从第一次会面时起，他没有借助于任何语言、姿态或威胁，他们一看到这个就要变成大人物的人，就很快地被他征服了。泰纳利用当时的回忆录，对这次会面作了引人入胜的说明：

师部的将军中间包括奥热罗，一个一身蛮勇的赳赳武夫，他为自己的高大身材和彪悍而扬扬自得。他来到军营，对巴黎派给他们的那个暴发户一肚子怒气。对于他们得到的有关此人怎样强大的描述，奥热罗打算粗暴地不予理睬：一个巴拉斯 <sup>10</sup> 的宠儿，一个因旺代事件而得到将军头衔

的人，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是街头斗殴，相貌平平，有着数学家和梦想家的美名。他们被带来了，波拿巴让他们在外边等着。他终于佩戴着自己的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戴上帽子，说明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下达命令，然后让他们离开。奥热罗一直沉默着。直到出门后他才重新找回了自信，让自己能够像通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说话。他同意马塞纳的观点，这个小个子魔鬼将军让他感到敬畏，他无法理解那种一下子就把他压倒的气势。

变成大人物后，拿破仑的名望与他的荣耀持续增长，至少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和神灵的名望已所差无几。旺达姆将军，一个粗悍、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甚至比奥热罗更粗野，1815年，在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里宫的楼梯时，他对元帅谈到了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人物对我施用的幻术，我自己也搞不懂为何这么厉害，一看到他，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禁不住打战。他简直能够让我赴汤蹈火。”

凡是和拿破仑有过接触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达武在谈到马雷和他本人的奉献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放过任何一个人，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马雷是会为他保守秘密的，不过他还

不至于顽固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座城市。而我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这里。”

必须记住这种命令让人神魂颠倒的惊人力量，才能够理解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名望，他深知，如果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尚不及马夫，他的名望就会更上一层楼。这些人中包括国民议会里的一些令欧洲人胆战心惊的显赫人物，当时的许多闲谈都可说明这一事实。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就曾粗暴地羞辱过伯格诺，其无礼就像对待一个男佣。发生效果后，他走到这个人面前说：“喂，笨蛋，你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一个如鼓手一般高大的人，深深地鞠躬。那个小个子伸手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起来。“这是令人心醉的宠信的表示，”伯格诺写道，“这是主人发怒时常见的亲见举动。”这些事例可以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名望能够产生多么无耻的陈词滥调。它也能够使我们看到大暴君对其喽啰们极为轻蔑的态度——他只把他们看作“他灰”。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的壮举——他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对他的暴政想来已感到厌倦的大国，却能闪电般地征服整个法国。他只需看一眼那些派来阻挡他、曾发誓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将军，他们没作任何商量便屈服了。

英国将军吴士礼写道：“拿破仑，一个来自他的王国厄尔巴岛的逃犯，几乎是孤身一人在法国登陆，几周之内便把合法国王统治下的法国权力组织统统推翻。想证明一个人的权势，没有比这更惊人的方式了！在他的这场最后战役中，从头至尾，他对同盟国又施加了多么惊人的权势！他们让他牵着鼻子走，他差一点就将他们打败了！”

他的名望远远长于他的寿命，而且有增无减。他的名望让他的一个懦弱无能的侄子变成了皇帝。直到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仍然不绝于耳，足见对他的怀念是如此强烈。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只要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施的天才，人们就会允许你这样做。

诚然，我所谈的都是名望的一些罕见的例子。但是为了了解那些伟大的宗教、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帝国的起源，提提这些事例是有益处的。没有这种名望对群众的影响，这些发展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名望并不是完全建立在个人的权势、军事业绩或宗教敬畏基础之上的。它可以有较为平庸的来源，其力量也相当可观。我们这个世纪

便提供了若干实例。能够让后人世代不忘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那个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了地球面貌和通商关系的大大有名的人物的故事。他实现了自己的壮举，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意志，也因为他能让自己周围的人崇拜。为了克服他遇到的无数反对，他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说话。他言语简洁，他的魅力可以化敌为友。英国人反对他的计划尤其卖力，然而他一出现在英国，就把所有选票都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晚年他途经南安普顿时，一路上教堂的钟声不断；而今又有一场运动在英国展开，要为他树立一座塑像。

征服了必须征服的一切——人和事、沼泽、岩石、沙地——之后，他不再相信还有任何事情能挡住他，他想在巴拿马再挖一条苏伊士运河。他按老办法着手这项工程，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此外，虽有移山填海的信念，如果那座山过于高大，也是不能移动分毫的。山会进行抵抗，后来发生的灾难，也抹去了这位英雄身上耀眼的光辉。他的一生说明了名望如何出现，也说明了它怎样消失。在成就了足以同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媲美的业绩以后，他却被自己家乡的官僚打入最下贱的罪犯之流。他去世时没人留意，灵柩经过处，是一群无动于衷的民众。只有外国政府像对待历史上每个最伟大的人一样，怀着崇高的敬意对他表示纪念。

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仍然属于罕见的例子。要想对名望的心理学有细致的认识，把它们置于一系列事例中的极端是非常必要的。这个系列的一端是宗教和帝国的创立者，而另一端则是用一顶新帽子或一件新服饰炫耀邻居的人。

在这一系列事例的两极之间，文明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科学、艺术、文学等，所导致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名望，都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可以看到，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在斐迪南·德·雷赛布受到指控后，人们不再对哥伦布的可悲下场表示惊讶。如果说雷赛布是个骗子，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便都成了犯罪。古人会用荣耀的光环来缅怀他，会让他饮下奥林匹克的甘露，因为他将地球的面貌改变了，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艰巨任务。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因为指控斐迪南·德·雷赛布而成了不朽的人物，因为各民族总是需要一些人，他们不害怕把信徒的帽子丢向一位老人——他的一生为当代人增光——以此贬低自己的时代。

在资产阶级憎恨大胆创举的地方，再也不要谈论什么不可动摇的正义的未来！民族需要勇士，他们充满自信，只要了所有的障碍，不在乎

个人的安危。天才是不可能谨小慎微的，一味谨小慎微，是绝对不可能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的。

……斐迪南·德·雷赛布明白凯旋的狂喜与挫折的创痛——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在这一点上，这颗心对成功的道德进行了叛逆。当雷赛布成功地贯通了两个海洋时，国王和人民向他表达了虔诚的尊敬；如今，当他败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时，他仅仅是个毫无教养的骗子……从这种结局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战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和雇主的不满，他们借助于刑法，对那些在其同胞中出类拔萃的人施加报复，在面对人类天才高远的理想时，现代立法者心里充满窘迫，而公众对这些理想也不是很理解。一个大律师不难证明，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是个疯子，德·雷赛布也是个骗子。

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受到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效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进而说，这种模仿通常是并非自觉的，这解释了它的彻底性这一事实。临摹某些原始人的单调色彩和僵硬姿态的现代画家，很少可以做到比他们灵感的来源更有生命力。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若是没有哪个杰出的大师复活了这种艺术形式，人们便会一直只看到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那些效仿

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满了紫罗兰色的暗影，但是他们在自然界并没有看到比五十年前更多的紫罗兰。他们是受到了另一位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即受到了他的“暗示”，而这位画家尽管古怪，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在文明的所有因素中，都可以举出类似的事例。

由此可见，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人们便不再怀疑他（它）。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阶梯，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流逝。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羞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把陌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当年罗伯斯庇尔把自己的同伙和大量的人处死时，他享有巨大的名望。当几张选票的转移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便马上失去了名望，群众齐声咒骂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就像不久前对待他的牺牲品一样。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缺少成功的名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消磨，只是需要时间



更长一些。总之，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名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非常密切的相似之处。在这些解剖学特征中，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毁灭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比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很容易就能加以改变的特征，有时它们甚至会使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也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不可更改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多变就如岩石上的流沙。

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不同的两

类。首先是我们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够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或许就是以它们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观念。其次就是一些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生生灭灭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例子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意见往往都是表面的，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它们类似于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它们的兴衰是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并不困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容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以确立，要想彻底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进行作用。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作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怀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只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跌跌撞撞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并且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丧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目前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完全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持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

各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明白，这种信念的消失便是它们衰败的信号。使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膜拜；当这种信念销声匿迹时，罗马便注定衰亡。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具备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他们才取得了一定的团结；只有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的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是有原因的。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如此多的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在绝望中死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得以立足，它便会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是多么荒谬，它都会钻入最清醒的头脑。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是毋庸置疑的吗？有个上帝因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顺从，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可笑至极。有过人天赋者，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相当令人怀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再也找不出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具有典型性了，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新的教条一旦植根于群体的头脑中，就会成

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此环境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实干家苦心孤诣地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则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念所赋予它们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几种宗教信仰的寥寥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给它们留下了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的存在，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检验。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左右，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挣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才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斗争。诚然，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对人类实施着更为深刻

的专制统治。利用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何可利用呢？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法国大革命最终屈服了，虽然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虽然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残酷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是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普遍的信念在哲学上讲往往是十分荒诞可笑的，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取得胜利的阻碍。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就不可能获胜。所以，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显而易见的破绽，但这并没有阻止它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仅仅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在来世得以实现，因此我们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一览无余，从而使这种新的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也只能增长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 （2）群体意见的多变

以上我们论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过在这个基础的表层，还会生长出一些不断反反复复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许朝生暮死，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加长久。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见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比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各政党表面上看有很大不同——保莫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但是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完全取决于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会看到一些截然对立的理想。不管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瞄准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施<sup>11</sup>，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的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寻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这种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群众时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

史，不管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似乎都已经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为佐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年到1820年这三十年的时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却变得十分革命，然后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再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上。这些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群众中，而且也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摇身一变，成为拿破仑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的行列中。

在以后的几年里，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21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做了法国的盟友。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最终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随即而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轮番登场，生生灭灭。昨天还在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人痛斥不休。



可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又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关的东西，都没有永恒的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重新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毫无关联，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任凭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随着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其影响力，因此它们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在当时形成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衰败，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机会。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缺乏制衡力量。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近来的发展，它

们不断地将完全对立的意见带给观众。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将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云烟。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所接受，就成了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愚蠢无能。

过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经毫无任何影响力可言，报纸则只是反映意见。对政客而言，他们不要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所以，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强迫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由大众运动造成的。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论和审判。在政治事务上

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理性又影响不到他们，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偏就。当然，它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地迎合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地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已经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浑浑噩噩，出于竞争的要求，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作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亡，就是转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任何一家报纸都没有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极其微小。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却不能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

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多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或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变化多端，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斥的做法更为寻常。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兼之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任何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群众对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漠不关心。像社会主义这种信仰的问题，只在没有文化的阶层，譬如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中间，能够得势，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若非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

过去二十五年里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并不太远，人们的意见还仍然大致保持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仅仅依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

实，就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仅仅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轻易地说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由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一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其实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辩解，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总要有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万万不可在提到时不予以猛烈的痛斥。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丧失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会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越发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理念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不容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即将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而言，可以发挥更重要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了，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所以，假如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的接

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完全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丧失。群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提比留斯一样，但他们也是狂暴的、反复无常的。当群众对一种文明占了上风时，它就很少有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我已在本书中论述了群体动理的普遍特点。仍然有待于说明的是，不同类型的集体在一定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变成群体时各自具有的特点。我们首先用几句话来探讨一下群体的分类。

我们的起点是简单的人群。当许多人组成的人群是属于不同种族时，我们便看到了它最初级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形成团结的共同纽带，就是头领多多少少受到尊敬的意志。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进犯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来源十分复杂，因此可以把他们当作这种人群的典型。

比不同种族的个人组成的人群更高的层面，是在某些影响下获得了共同特征，因而最终形成一个种族的那些人群。它们偶尔表现出某些群体的特征，不过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不过种族的因素。

在本书阐述过的某些影响的作用下，这两种人群可以转变成有机的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我们把这些有机的群体分为以下两类：

### ①异质性群体

a.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

b.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

### ②同质性群体

a.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

b.身份团体（军人、僧侣、劳工等）

c.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我们将简单地指出这些不同类型群体的特征。

## （1）异质性群体

本书前面研究的一直就是这种群体的特点。它们是由有着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个人组成的。

我们只根据事实便已知晓，人作为行动的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集体心理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他们的智力很容易也会受到这种差别的影响。我们已然得知，智力在集体中不起作用，它完全处在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之下。

一个基本因素，即种族的因素，使不同的异质性群体几乎完全不一样。

我们经常讨论到种族的作用，指出它是人们行动最强大的决定性因素。它的作用在群体的性格中也可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由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如果他们全是英国人或中国人，同有着任何不同特征但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个人——如俄国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组成的群体，差别将会很大。

当环境形成了一个群体，并且其中有着不同民族但比例大体相同的个人时，他们所继承的心



理成分，给人的感情和思想方式造成了相当大的差异，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突出，无论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多么一致的利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社会主义者试图在大型集会中把不同国家的工人代表集合在一起的努力，最后总是以公开的分歧作为结局。拉丁民族的群体，不管它是多么革命，还是多么保守，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一例外地请求国家的干预。它总是倾向于集权，总是或明或暗地倾向于赞成独裁。然而，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群体就不拿国家当回事，它们只求助于个人的主动精神。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这些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由此而论，种族的气质对群体性格有着重大影响。它是一种决定性力量，限制着群体性格的变化。所以可以认为，一条基本定律就是，因为种族精神的强大，群体的次要性格相比之下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群体状态或支配群体的力量类似于野蛮状态，或者说是向这种状态的回归。种族正是通过获得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才使自身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最终走出了野蛮状态。除了种族因素之外，对异质性群体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把它们分为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和有名称的群体——

如精心组织起来的议会和陪审团。前一种群体缺乏责任感，而后一种群体则发挥了这种责任感，这往往使它们的行动有着很大的不同。

## （2）同质性群体

同质性群体包括：①派别；②身份团体；③阶级。

派别是同质性群体组织过程的第一步。一个派别包括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的归属方面大不相同的个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这方面的例子是宗教和政治派别。身份团体是最易于组织起群体的一个因素。派别中包括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大不相同的个人，他们仅仅是被共同的信仰连接在一起；而身份团体则由职业相同的个人组成，因此他们也有相似的教养和相当一致的社会地位，这方面的例子如军人团体和僧侣团体。

阶级是由来源不同的个人组成的，和派别不太一样，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也不像身份团体那样，是因为相同的职业，而是某种利益、生活习惯以及几乎相同的教育。这方面的例子是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本书只讨论异质性群体，把同质性群体（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放在另一本书里研究，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后一种群体的特点。在结束对异质性群体的研究时，我会考察一下几种典型的特殊群体。

##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在兴奋期过后，群体就会自动进入一种纯粹自动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它深受各种暗示的左右，因此似乎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犯罪群体。我暂时保留这一错误的定性，是因为最近一些心理学研究使它变得十分盛行。的确，群体的一些行为，如果仅就本身而论，的确是犯罪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同一只老虎为了消退而让其幼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血肉模糊，然后再把他吃掉的行为是一样的。

群体犯罪的动机一般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群体犯罪的历史透露了实情。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这位监狱长的堡垒被攻破后，一群极度

兴奋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打脚踢。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把他挂在马尾巴上。在反抗的过程中，他偶尔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脖子，他的建议立刻赢得了群众的赞同。

“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这样，于是他也深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因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所以他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以上指出的过程的作用，清晰地反映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服从别人的蛊惑，它会因为来自集体而更为强大，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同，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从法律上可以看作犯罪，然而从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并无差异：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良好或恶劣的感情加以夸大、表现出某种道德，

等等。

我们会看到，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即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中间，这些特征全部都有。其实，它与制造圣巴托洛缪惨案的群体相当类似。这里我引用了泰纳根据当时的文献所作的详细描述。

谁也不知道是谁下了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也许是丹东或其他人，这并不重要。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参与屠杀的群体受到了强烈的怂恿。

这个杀人群体杀了大约三百个人，而且它明显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主要是一些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鞋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在别人的蛊惑下，他们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双开门的办公室，不仅当法官而且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在犯罪。

他们坚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

和王室、仆役全部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一一进行审判——换言之，在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眼中，对于所有的个人，只凭职业就可判断他是罪犯。其他人将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就尽情地释放了。我在别处讨论过这种本能的来源，集体总是会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正像群体通常表现的那样，这种本能并不阻挡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激进。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在阿巴耶，那帮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二十四个小时没喝上水后，甚至想把狱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们为他求情，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一名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告无罪以后，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高兴地与他拥抱，疯狂地鼓掌。”然后开始了大屠杀。在这个过程中，欢快的情绪从来未间断。他们围在尸体旁跳舞唱歌，“为女士”安排了长凳，以享观处死贵族的乐趣。而且这种表演一直充满着特殊的正义气概。

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当时就抱怨说，为了让女士们看得真实一些，将她们安排得太近了，使

在场的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享受了痛打贵族的乐趣。于是决定让受害者在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让他们用刀背砍他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受害人被剥得精光，在半个小时里施以“凌迟”，直到每个人都看足了瘾以后，再一刀刀地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刽子手并非完全无所顾忌，我们指出过的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也表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拒绝占有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在会议桌上。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特有的那种幼稚的推理方式。因此，在屠杀了一千两百个到一千五百个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建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因此不如把他们统统杀掉，他的建议立刻就被采用。他们中间当然也有人民的敌人，一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一个下毒者的寡妇：“她肯定对坐牢非常愤怒，如果她能做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她肯定这样说过，她已经这样说过了。除掉她算了。”这种说法好像很令人信服，囚犯被无一例外地处死了，其中包括五十名十二岁到十七岁的儿童，他们当然也变成了人民的公敌，于是全都被解决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的这些处决也终于止歇，刽子手们想来可以休息一下了。但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了大功，于是前往政府请赏。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被授予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相似的事实。既然群体的势力在不断增长，政府的权力在它面前节节败退，因而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

###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由于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类型的陪审团全部进行研究，因此我只想评价一下最重要的，即法国刑事法庭的陪审团。这些陪审团为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们会看到，它也表现出很容易受暗示和缺乏推理能力的特点。当它处在群众领袖的影响之下时，也主要受无意识情绪的控制。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时还会看到一些不懂群众心理的人犯下错误的有趣事例。

首先，组成群体的不同成员在做出判决时，其智力水平没什么关系，陪审团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已经知晓，当一个善于思考的团体就某个并不是完全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



时，智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比如，一群科学家或艺术家，仅仅因为他们组成一个团体这个事实，并不能就一般性问题做出与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十分不同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期，特别是在1848年以前，法国政府规定对召集起来组成陪审团的人要谨慎地选择，要从有教养的阶层选出陪审员，即选择官员、教授、文人等。如今，大多数陪审员来自小商人、小资本家或雇员。然而令专家匪夷所思的是，不管组成陪审团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判决总是一样。甚至那些敌视陪审制度的地方长官，也必须承认判决的准确性。贝拉·德·格拉热先生是刑事法庭的前庭长，他在自己的《忆录》中用下面的一席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选择陪审员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市议员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环境中的政治和选举要求，把人们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上划掉。很多选陪审团的人都是商人（但并不是像过去那样重要的人）和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的雇员。只要法官的开庭时间表一定，他们的意见和专长便不再发生作用。许多陪审员有着新手的热情，有着最良好的意图，被同时放在了恭顺的处境下，陪审团的精神并未改变：它的判决依然像原来一样。

对于这段话，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它的结论，

而非那些软弱无力的解释。对这样的解释我们不必感觉奇怪，因为法官通常和地方长官一样，对群体心理完全不知道，因此他们也不了解陪审团。我从一个与刚才提到的这位作者有关的事实中，还发现了一个证据。他认为，刑事法庭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之一拉肖先生，苦心孤诣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所有案件中反对让聪明人出现在名单上。但是经验最终会告诉我们，这种反对是毫无益处的，这可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即今天的公诉人和出庭律师，以及所有那些关在巴黎监狱里的人，都已完全放弃了他们反对陪审员的权利，因为正如德·格拉热先生所言，陪审团的判决并无变化，“它们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如同群体一样，陪审团也受感情因素极强烈的影响，很少会被证据所打动。一位出庭律师说：“他们见不得有位母亲用乳房喂孩子或者一个孤儿。”德·格拉热则说：“一个妇女只要装出一副俯首帖耳的样子，就足以赢得陪审团的慈悲心肠。”

陪审团对自己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的罪行绝不手软，当然，这些罪行对社会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对于一些因为感情原因而违法的案件，陪审团却十分犹豫不决。对未婚母亲的杀婴罪，或者用泼硫酸来对付诱奸者或抛弃自己的男人的妇

女，他们极少表现得十分严厉，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社会在照常运转着，这种犯罪对它并不产生多大威胁，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姑娘不受法律保护的国家里，她为自己复仇，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因为这可以事先向那些未来的诱奸者示威。

陪审团就像任何群体一样，也受名望的影响极深。德·格拉热先生十分明智地指出，陪审团的构成尽管非常民主，他们在好恶态度上却很贵族化：“头衔、出身、家财万贯、名望或一位著名律师的帮助，总而言之，一切不同寻常或能给被告增光的事情，都会使他的处境变得极为有利。”

杰出律师的主要用心就在于打动陪审团的感情，而且正如对付一切群体似的，不要作很多论证，或只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一位因为在刑庭上赢了官司而声名赫赫的英国大律师，总结出以下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进行辩护时，他要留心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机会一直都有。律师依靠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从陪审员的面容上领会每句话的作用，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步是要确认，哪些陪审员已经赞同他的理由。确定他们的赞同不必费很多时间，然后他应把注意力转向那些看来还没有拿

定主意的人，努力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敌视被告。这是他的工作中十分微妙的一部分，因为指控一个人除了正义感之外，还可以有许多的理由。”这几句话道出了辩护术的全部秘诀。我们可以了解，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为何效果甚微，这是因为必须随时根据印象改变措辞。

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那些左右着普遍观点的灵魂人物就可以了。正如所有的群体一样，在陪审团里也存在着少数对别人有支配作用的人。“我通过经验发现，”前面提到的那位律师说，“一两个有势力的人物就足以让陪审团的人跟着他们走。”需要用巧妙的暗示取得信任的就是那两三个人。首先，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取悦于他们。群体中已成功获得其欢心的那个人，是处在一个就要被说服的时刻，这时不管向他提出什么证据，他很可能会认为十分令人信服。我从有关拉肖的报道中摘录一段反映上述观点的趣闻逸事。

众所周知，拉肖在刑庭审判过程的一切演说中，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眼睛离开两三个他知道或感到极有影响力又很拘泥不化的陪审员。通常他会把这些桀骜不驯的陪审员争取过来。不过有一次在外省，他不得不对付一个陪审员，他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采用最狡猾的论辩，此人依然不

为之所动。这个人是第七陪审员，第二排椅子上的第一个人。局面令人尴尬。突然，在激昂的辩论过程中，拉肖停顿了片刻，向法官说：“阁下是否可以命令把前面的窗帘放下来？第七陪审员已经被阳光晒晕了。”那个陪审员满脸通红，他微笑着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被争取到辩方一边来了。

许多作家，即使一些最出众的作家在内，最近开展了一场反对陪审制度的强大运动，而面对一个不受约束的团体犯下的错误，这种制度是保护我们免受其害的唯一方法。有些作者主张仅从受过教育的阶层招募陪审员，然而我们已经证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的判决同回到目前的制度全无二致。还有些作者以陪审团犯下的错误为依据，希望废除陪审团用法官取代。真是令人费解，这些一厢情愿的改革家怎么会忘了，被指责为陪审团所犯下的错误，首先是由法官犯下的错误，而且当被告被带到陪审团面前时，有一些地方官员、督察官、公诉人和初审法庭已然认定他有罪了。由此可知，若是对被告做出判决的是地方官而不是陪审团，他将失去找回清白的唯一机会。陪审团的错误历来首先是地方官的错误。所以，当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时，首先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地方官，比如近来对一个医生的指控便是如此。有个愚蠢透顶的督察官根据

一位半痴呆的女孩的揭发，对他提出起诉。那个女孩指控医生为了三十个法郎为她进行非法手术。若不是因为惹恼了公众，使最高法院的院长立刻给了他自由，他是一定会被送进监狱的。这个被指控的人得到了自己同胞的赞誉，这一错案的野蛮性由此昭然若揭。那些地方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他们极力阻挠签署赦免令。在所有类似的事情上，陪审团在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自然会倾听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搞清楚最复杂的事态上训练有素的官员，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那么，谁才是错误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审团还是地方官？我们应当大力维护陪审团，因为它是唯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可以缓解法律的严酷性。这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来说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特殊情况。法官是冷漠无情的，他除了法律条文不理睬任何事情，出于这种职业的严肃性，他对黑夜中的杀人越货者和因为贫困、因为受到诱奸者的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施以同样的刑罚。而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与逃避开法网的诱奸者相比，被诱奸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对她应当宽大为怀。

在了解了身份团体的心理，也了解了其他群体的心理之后，对于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案件，

我不可能依然认为，不应当去和陪审团打交道，而应当去寻求地方官。从前者那里我还有些找回清白的机会，让后者认错的机会却是微不足道。群体的权力令人望而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害怕。

## 第四章 选民群体

选民群体即有权选出某人担任某职的集体，属于一种异质性群体，但由于它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规定已经十分明确的事情，也就是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所以它们只具备前面讲到过的少数特征。在群体特有的特征中，这种群体表现出很少的推理能力，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而且头脑十分简单。另外，从它们的决定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以及与我们列举过的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

请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办法，从最为成功的办法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动力。

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候选人应当享有名望。能够代替个人名望的只有财富。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的因素。

极为重要的另一点是，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

须能够迫使选民不经过讨论就接受自己。选民中的多数都是工人或者农民，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原因就是这种人在他们中间没有名望。当他们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时，一般也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比如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选民平常要依靠他——泄愤，或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一时产生成为其主人的幻觉。

候选人若想确保自己取得成功，只有名望是远远不够的。选民特别在意他表现出贪婪和虚荣。他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许诺。

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为过。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毫无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对付断言，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绝对化，否则他的对手将来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但是在口头



纲领中，再夸夸其谈也不为过。可以毫无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做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但它们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而选民绝对不想为这件事伤脑筋，他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行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即便他以为正是这个纲领使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在以上这种事情中，能够看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我们在各种口号和套话——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所发挥的作用中还会看到它们。一个明白怎样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他能够用刀剑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可以做到。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虽然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除此之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匮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1873年，西班牙那场血腥的革命，就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当时的一位作者描述了这种说法的出现，值得引用于此：

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它们，议会全体一

致宣告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可是这个说法却让人精神振奋。人们无比高兴并沉醉于其中。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义者若是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以这样的话互致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对军队没有纪律这种奇怪的美德以及士兵拍手称快。人们对“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些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和行政分权制类似的制度；还有些人则以为它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提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按照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终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毁坏电报线和铁路，以便中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的头脑可能产生的影响，要

想对这个问题不产生任何疑心，千万别去读那些有关选民集会的报道。在这种集会上，信誓旦旦、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此起彼伏，但绝对听不到任何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从报纸的上千个类似事例中选出来的关于公众集会的以下报道，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会议的组织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跃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对；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一个眼睛被打青了的公民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一片喧闹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说话的权利转移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猛烈抨击社会主义者，他们则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的叫骂声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提出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是“白痴”或“可笑之人”。

昨晚，在“五一”节工人庆祝会的预演上，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发起了一次大会。会议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的这些恶言恶语都会引起相互攻讦，演讲者和听众甚至会动起手来；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等等，不一而足。

切莫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并且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怎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任何两样。我已经说过，当人们会聚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譬如，下面是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材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持续高涨。我不相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从这里或那里大声叫喊，或者是喊声四起。掌声中夹杂着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相互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打断演说的人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

去！”或“让他说！”

在C先生的嘴里，都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宣称要把这些东西全都消灭，等等。

人们或许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如何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等于是在集体享有自由的程度这件事上掩盖一个奇怪的谬论。群体持有别人赋予它们的意见，但是它们绝不能信口说自己持有合乎理性的意见。在这里所讨论的事情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是操控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政治人物，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力。谢乐先生是今天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他说：“你可知道选举委员会是什么？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天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对群体产生影响是很容易的。根据挥款人的认证，三百万法郎就足以确保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这样。它和其他群体

一样：既不更好也非更差。

因此，我从以上所言并没有得出反对普选结论。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因此由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我们是通过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结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作进一步的论述。

无须质疑，普选的弱点十分明显，所以人们很难做到视而不见。无可否认，文明是由少数智力超常的人创造的，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减少，它们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低劣成员的选票，是不会令人放心的。另一件无须怀疑的事情是，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会很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我们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取得胜利，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十之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些不同意见虽然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在实践中却毫无势力。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上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击，但是如今它

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不妨设想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被送回了中世纪。难道你会以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尊无上的权威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假如落入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飧，他还会对存在的魔鬼或女巫提出怀疑吗？用讨论的方式与飓风作对，这比群众的信念明智不了多少。普选的教条今天就有着过去的宗教所具有的威力。演讲家和作家在提到它时表现出的恭敬与媚态，即使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得到。因此对于它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能够对它发生影响。

除此之外，破坏这种教条的努力更加没用，因为它具有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有关他们彼此之间完全相同的说法，但是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几乎不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同样开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对于选举权进行限制，若有必要，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如此便可认为，这样做会改变群众投票的结果吗？我永远也无法承认会出

现这种情况，这是基于我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集体，无论其成员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在群体中，人们总是会瞬间变得智力平平，在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院士的投票不会比四十个卖水人的投票更加高明。所以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有所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全部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如贸易保护、双本位制——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异同。

所以，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上多少。这些人将依然主要受到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还是一个也无法解决，而且肯定会受到团体暴政的压迫。

群众的选举权不管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给予，也不管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



权利，不管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统统都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种族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当选者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禀性，然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不会有太过明显的变化。

由此可见。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经常遇到它，由此会产生另一种认识，即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控制，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 第五章 议会

在议会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例子。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不断变化，各国亦有所不同，不过它们的特征却十分相似。在这个场合，人们会感受到种族的影响力在增加或削弱，抑或群体的共同特征得到强化，但是不会妨碍其表现。彼此有很大不同的国家，像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也表现出了很大相似

性，使其政府面对同样的困难。

不过，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它是一种观念的体现，即在某一个问题上，一大群人总比一小群人更可能做出明智而且独立的决定。虽然从心理学上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但人们却普遍赞同。

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但是由于其构成特殊，也有一些表现很独特，现在我们就来简单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它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的党派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党派，都存在一种倾向，它们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那些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不同的党派原则也不同，但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一部分的这个事实，它们就总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并非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加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的意见。

议会有着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就为此提供了最完美的例证。他们待人教条而逻辑，观念普遍含混不清，忙不

迭地贯彻着死板的原则，不关心事实究竟如何。对于他们，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这帮家伙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在一些简单教条的引导下，他们自以为能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结果却发生倒退，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退到了更早期的阶段。这些人为实现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人特点相同。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其道路上的一切全部毁掉。不管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什么热月派，它们全都秉承同样的精神。

议会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就像所有的群体一样，暗示都是出自名望很高的领袖人物。不过，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比较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对人们十分必要。

在有关地方或某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有牢固而且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的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比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事情上，即使天赋如秋摩西尼 [12](#)，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选民们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了暗示，足以压倒其他方面的一切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不可思议的维护。

不过，涉及一般性的问题，像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虽然方式与普通群体有所不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之间的势力有时不相上下，旗鼓相当。所以结果是，一个众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了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迟疑不决。这解释了为什么他经常会在十五分钟之内就做出相反的表决，或者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比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随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中也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善变的意见。大体上说，一般性问题的数量更多，所以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十分平常，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因为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来迟一步，这对领袖的影响力是一种制约。但是在无数的辩论中，当议员们对涉及的问题没有强烈的先人之见时，那些领袖依然会处在主导地位。

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这些人才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群体没了头头儿便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说，议会表决其

实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他们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名望。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自己因何威信扫地，影响力也就随之消失了。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和头衔或名声无关。对这个事实，西蒙 [13](#) 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的权威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两个月以前，路易·拿破仑还无所不能，现在却完全无足轻重了。

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皮阿说话一样，但他并没有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谈到皮阿，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和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基内聪明过人，智力超群，却一点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中他却是个小人物。

才华横溢者对于政治集会是不关心的，他所留心的只是那些有利于党派发生在各种时间的滔滔不绝的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如

果想得到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就需要有急迫而且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可以。一旦缺乏这个或者没有危险，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引用上面的话，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事实，而非它所提供的解释，其心理学知识十分贫乏。群体一旦对领袖效忠，不管是政党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马上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处在领袖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会受到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那些名望足够高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多年的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但他只消做一个手势，内阁就倒台了。

有一位作家用下面的一席话说明了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并且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有过之而

无不及。

对这种领袖我们不必太苛责，虽然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民意在殖民地的事务上，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会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所以他也会助长其中的全部错误。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名望外，还包括之前多次提到过的一些因素。领袖如果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对群体的心理了然于胸，至少可以自觉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怎样向它们说话，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拥有特殊的辩才，包括言之凿凿，卸去证明的重负和生动的形象，再伴之以笼统有效的论证。在所有的集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才能，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虽然它号称最严肃的议会。

英国的哲学家梅因<sup>14</sup>说：

在下议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断看到，辩论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大话和愤怒的个人之间的交锋。这种一般的公式对于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

断言，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即便它从未得到过证实——其实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以上的引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么重要也不过分。我们多次谈到了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它必须以能够塑造生动的形象为准。

下面的这段话摘自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这艘船将驶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那片遍布热病的土地，把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关在一起。难兄难弟们可以促膝谈心，彼此视为在一种社会状态中互助互利的两派。

由此唤起的形象非常鲜活，演说者的所有对立面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它的威胁，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热病肆虐的国土，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他们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义不明确的可怖政客中间啊！由此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之于国民公会的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肯定会向他投降的。

喋喋不休地说些最为离谱的大话，对领袖永



远有利。刚才我引用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并且不会遇到强烈的抗议，他认为金融家和僧侣在资助扔炸弹的人，所以大金融公司的总裁也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在人群中，这种断言永远发生作用。无论如何激烈和可怕的断言、声明，都不算过分。要想吓唬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为有效的办法了。因为在场的人会担心，如果他们表示抗议，就会被当作叛徒或其同伙而打倒。

如我所言，这种特殊的辩术在所有的集会中都非常有效。在危难时刻，其作用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那帮大演说家的号叫，读来都十分可笑。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必须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再对暴君破口大骂，发誓不自由他就死。听众站起来热烈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坐回去。

当然，偶尔也会有高智力和高学历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对他来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的复杂，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那他的智力就会帮他变得宽宏大量，这将削弱他的信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的力度。在任何时代，尤其大革命时期，群体领袖的头脑之狭隘让人瞠目结舌。不过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那种头脑最为偏狭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他经常自相矛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当然只看这些演说是搞不明白的，看看这个独裁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

教条式的常识与废话，糊弄小孩子拉稀的拉丁文化，采用小学生歪理的攻击和辩护观点。没有思想和令人愉快的措辞，讥讽也无法切中要害。只有令人厌恶的疯狂断言。在经历过这种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我们不免会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长叹一声：“唉！”

头脑的极端狭隘结合一个强烈信念所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的权力会是什么样的，想想就让人心惊肉跳。要想无视各种阻碍，表现出很高的意志力，一个人就必须满足这些最基本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人和领袖，因为群体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一次演讲要想在议会里取得成功，并不取决于演讲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完全依靠他的名望。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讲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了名望，那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的影响，就是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力去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无名小辈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讲稿出现时，如果他只有论证，那只能让人听听而已。有一位具备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的这段话为我们描述了一位缺乏名望的众议员：

走上讲台后，他从公文包拿出了一份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面前，然后开始自信地发言。

他曾经吹嘘自己能让听众确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抒发论证，并对那些数字和证据充满信心。他坚信自己可以说服听众。因为面对他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是没用的。于是，他一厢情愿地开讲了，他相信同事的眼力，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和跟随真理。

但他一开口，就惊异地发现大厅内并不安静，人们在发出噪音，而且让他有些恼怒。

为什么不能安静一会儿呢？为何不留意他的发言？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他们不礼貌地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很不安，皱着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

励下，他又提高嗓门开始发言，加重语气，做出了各种手势。但周围的噪音越来越大，最后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只好又停了下来。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闭上你的嘴！”他便又开始说起来。然而，喧闹声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当议会陷入极致兴奋时，它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有两样，它会表现出总爱走极端的特点。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了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了最为恶劣卑鄙的过失。其成员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完全失去了自我，去投票赞成一个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充分说明，议会能够多么严重地失去自我意识，让那些和自己的利益极其对立的建议牵住鼻子。对贵族来说，放弃自己的特权的巨大牺牲。但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了不起的晚上，成员们毫不犹豫地做了。议会成员放弃了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就使自己永远地面临死亡威胁，而他们却能迈出这样的一步。

这些人并不害怕对自己的阶层滥杀无辜，虽然他们很清楚，今天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可能就轮到他自己。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一种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建议都无法阻止

他们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提议。

下面的话摘自于他们中的某个人，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非常典型地记下了这种情况：“我们一直极力谴责的是，两天前或一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危机，再无其他的原因。”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情绪激昂的所有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无意识的现象。泰纳因此说：

他们批准并且下令执行一些自己引以为荣的措施。这些措施愚蠢透顶，而且是犯罪：杀害无辜和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全体左派在热烈的掌声中把丹东——他们的天然首领，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同样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为恶劣的一条法令。议会全体一致地在一片热烈的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的赞扬声中，一再举行改选，让杀人魔政府留在台上；平民派憎恶它，因它杀人如麻，山岳派厌恶它，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但不管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或少数派，最后都落了一个同意为它们的自相残杀出力的下场。比如雾月的22日，整个议会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

的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言后的十五分钟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

这幅场景看似昏天黑地，但十分准确。如果议会兴奋和发昏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流体，被一切刺激所控制。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一位有着毋庸置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斯布勒尔先生。我把这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转引如下。它为我曾经说过的群体富有夸张感情的特点、为它的多变性——使它始终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提供了一个绝妙例证。

共和派由于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疑，还有盲信和无节制的欲望而坠入了地狱。它的普遍怀疑与它的质朴、天真不相上下。和缺乏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的表现伴生的，是肆意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就算农民和孩子也胜过它们。它们的冷酷和缺乏耐心一样严重，残暴与驯顺不相上下。这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事儿能让这种人吃惊，可是任何事情又会使他们慌乱不已。因为恐惧或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既能够赴汤蹈火，又会胆小如鼠。

不管原因和后果，同时他们也不在乎事物的

关系。这些人忽而灰心丧气，又忽而斗志昂扬，很容易受到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他们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者状态中。总之，他们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能指望这种人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还好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一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个性，这就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制定出非常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起草人都是专家，他们是在安静的书房里进行拟定的，所以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非集体的产物，当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的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结晶时，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无论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品质总是低劣。专家会阻止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者根本行不通的政策。这时，专家就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影响不到他，但他可以影响议会。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这么多困难，但它仍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发现的最合适的统治方式，特别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那些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当然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现实中它们却也造成了两种严重的危险：第一种危险是财政会不可避免地浪费；第二种危险是对于个人自由会不断增加一些限制。

第一种危险是各式紧迫问题和当选的群体缺乏远见的必然产物，假如有一个议员提出一项很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比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将保证所有的工人得到养老津贴，或者提议为所有的国家雇员增加薪水，那么其他的众议员因为害怕选民，就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项政策。虽然他们清楚，这实在是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要设立新税种。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有任何迟疑。开支增加的后果还在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现在带来不利的结果，但如果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争取连任而露面时，后果就会立刻展现了。

除了这是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以外，还有另一个同样富有强制性的原因，就是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众议员没有办法反对，因为它同样反映着选民的急切需要，也因为每名众议员只有同意同事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

第二种危险是议会对于自由不可避免地限



制，这看起来不怎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总是一种限制性的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觉得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由于它目光短浅，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其结果是无知的。

危险当然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即使在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英国，也没有逃脱该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他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已经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说：

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按照我指出的路线前进。迅速膨胀的独裁的政策不断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在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同时，公共负担日益沉重，尤其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他的自由。这种对于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大量的立法措施——全是些限制性的法令不断地通过，必然

会极大地增加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以及影响。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而且是永久存在。实行压迫性的专制，具备了这三种特点的人非常胜任。

不停地制定限制性的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人们最为细微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难免会把公民的自由活动限制在越来越小的空间。各国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所以它们每天都在创造一些越来越让人不堪忍受的束缚。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就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的精神与活力。到那时，它们不过是一些太阳下的影子，是消极顺从和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个体注定就要去寻求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无望同步地增加。因此就必须表现出个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就迫使它们要承担和领导一切，把所有的东西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成为全能的上帝。但是经验告诉我

们，这样的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会十分强大。

某一些民族中，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让它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并没有失去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面所起到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之先兆。

基于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非常触目惊心的对于先兆的判断，我们的很多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的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要不可避免地经历这样的生存阶段，因为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它已发生过的画面。

对于文明进化的这些共同阶段，很容易做出一个简单的说明，我将对它们作一个概括，来为本书做出总结。这种速记式的说明，或许能够对我们理解目前群众所掌握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迪。

假如我们依据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和衰败的原因给出评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诞生的开始，一群来源各不同的人，他们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了一起。这些人血缘、语言和信仰都不同。使他们结为整体的唯一共同的纽带，就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一个头领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具备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着种种的弱点，容易冲动而且性情狂烈。他们是野蛮人，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漫长的岁月会产生相应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会发挥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大的群体，在遗传的作用下它们日益稳固。这群人就变成了一个民族。他们有能力摆脱野蛮状态，但是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必然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后，才能使它获得了某种理想，完全形成一个民族。这个理想是什么性质并不重要，不管是对于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其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到达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就诞生了。种族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或

缺的素质。不用怀疑，它有时依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的背后，又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也就是一个种族特有的禀性，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变化，支配着历史机遇。

然而，时间在做完创造性的工作以后，就开始了破坏的过程，神仙和人都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某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的程度以后，就会止步不前了，一旦这样，它注定就会进入衰落的过程了。所以此时，它的老年期就来临了。

在这种无法避免的时刻，总是以理想（种族支柱）的衰弱为明显的特点。与这种理想的衰弱对应的，是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将逐渐发生动摇。

随着该种族的理想不断地消亡，它也慢慢地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和强盛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是能增长的，但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替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联合体和整体的人群，最终却会变成一盘缺乏凝聚力的散沙，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聚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因个人利益

和愿望而四分五裂的人，已经失去了管理自己的能力，所以在最为细微的事情上，通常也需要别人的领导，于是国家就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了。

古朴的理想丧失以后，该种族的才华也就完全消失了。它不过是一群独立的个人，由此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它没有统一性和未来，只有“乌合之众”的特性。它的文明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到处是野蛮的风气。文明也许依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赐给它的外表尚在，但它已经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当下次风暴到来，它便立刻倾覆了。

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发展到了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就会走向衰落和死亡，这正是一个民族生命循环的过程。

## 第二部分 革命心理学

### 第一卷 革命的一般特征

#### 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 一、革命的分类

提起“革命”这个词，我们在潜意识里会本能地反射出“政治变革”这四个字。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可以这样来解释：所谓“革命”，是由“革”和“命”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要先“改革”然后重新“任命”。而实际上，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一切因质的改变而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变化，既包括表面的巨大的变革，也包括内在的质的激变。例如某种信仰的突然流失、思想意识的骤然飞跃、论辩学说的突然锋变，以及科学理论的巨大进步等。

像我们所说的意见和信仰，它是定位人的行为的一种决定性因素，而像那些理性的、感性的、情感的以及神秘主义的诸多因素，在意见和信仰的起源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我们在别处已经探讨过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赘述了。

革命的结果不仅仅是政权的交替，一场革命最终可能衍变成一种信仰，但驱动它的动机却往往是很理性的：或是对苛刻的暴政的反抗，试图改变现状；或是对令人憎恶的专制政府的反抗，发泄自己的不满；或是对某个不得人心的君主的反抗，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革命的起源都是有一定规律性可查究的，尽管革命的爆发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将理性的认识转变成感性的行为，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造成太大的影响。

理性逻辑可以制造充分的理论依据，以此来揭示暴政必然被摧毁的原因，但是，如果想用它来引导和影响大众来反抗暴政，恐怕所期待的效果不是很大；因为作为普通大众，受限于文化水平、政治理解等诸多原因，使得不可能对革命领袖的政治理念完全地认同、接受，只有激起民众的认同感，以及具有煽动性的神秘主义因素才能够引导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大众群体。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哲学家运用理性逻辑和很系统的理论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企图以此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成员，激发人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当这两种逻辑相撞时，导致了



最恶劣的放纵；集体逻辑支配着俱乐部、议会等团体和机构，推动其成员的行动，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犯下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导致的暴行。

无论一场革命是怎样出现的，除非它已经深入人心，渗透到大众的思维，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所以，历史事件由于大众的独特心理而获得了特殊的形式，而大众运动也因此而具备了共性的特征，以至于只要描述和分析其中的一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他的运动。

因此，大众是一场革命的工具，却不是它的出发点。大众象征着一种无组织的存在，如果没有人在前面领导它，它终究是徒劳的。大众一旦接受了某种正确性的刺激，很快就会响应它，乃至突破和超越它原本的局限性，然而大众却不能自己创造刺激。

突然的政治革命虽然能给历史学家以突兀的惊喜和强烈的震撼，但它通常是无足轻重的；真正伟大的革命是在行为方式上的革命和思想领域中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恐怕未必能将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改变，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它的灵魂。

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呢？真正的革命，也就是那些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总是进行得如此之缓慢，以至于这种“循序渐进”的革命状态使得历史学家甚至很难指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此，“进化”这一说法比“革命”似乎更为贴切而准确。

所以，当我们深入考察大多数革命的起源时，就会不难发现，如果要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话，那么我们前面列举的各种要素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如果仅仅从革命对象这一个角度考虑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 二、科学革命

到目前为止，科学革命是这三种革命对象中最重要的革命。尽管科学革命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但它却往往能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非政治革命所能及的。因此，我们对它首先加以考虑，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地研究它。

譬如，如果说自大革命时代以来，我们的宇宙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已非神学时代那么浅薄，那仅仅是天文学上的发现以及

试验方法的应用所产生的革命性后果。可是当人们在描述宇宙现象时，就可以从科学上寻求依据，已不再求助于上帝之类怪诞的想法，而是已经认识到它是受永恒规律支配的。

由于这样的革命进展得极其缓慢，所以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进化”；但其中仍有一些例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学革命，虽然有同样的效果，但由于它们进展迅捷，所以配得上“革命”之名。著名的例子，当属达尔文的理论，进化论在短短数年中就颠覆了整个生物学界；又比如，巴斯德的发现，他的科学成果，在巴氏有生之年即给医学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还有，物质裂变理论（theory of the dissociation of matter），之前人们都认为原子是永恒的，但自从这个理论出现后，它向人们表明，永恒的原子亦不能摆脱宇宙万物衰变、消亡的法则。

这些发生在观念领域内的科学革命都是纯粹知识性的，一般来说，我们的情感和信仰与此无关，对它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们，遵守它们，而由于它们的结果受到实验的控制，我们无从得知其中的真伪，所以它们可以免除外界的一切批评。

### 三、政治革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对人类长远意义上的作用则远远赶不上科学革命，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科学革命的起源不同于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它唯一的起源就是理性因素，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完全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支配，理性对它们起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在《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已经详尽地探讨了信仰的两种起源——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科学革命起源于理性，而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往往都是受非理性因素的控制，它表明政治的信仰或宗教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精微的无意识信仰行为，不管其外表如何，理性对这种信仰无从施加控制；我同时也证明了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和左右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活生生地明摆在眼前的事实，信徒们对它崇拜而狂热。人们对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坚信不疑，使它拥有了一股神奇的力量，以至于它竟可以完全地

控制人们的思想，至于说它的力量是否会消退，那也只有时光的流逝才会使它发生改变。

正是由于信仰被视为绝对真理这一事实，使它必然变得不宽容。这就往往产生暴力、仇恨和迫害等诸多因素。而恰恰是这些不宽容因素，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和派生品，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最为典型。

信仰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因素，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当人们互相交往时，他们不能互相宽容，不能互相调和，甚至是相互敌对或仇视，其实这都是神秘主义的信仰作用于情感而体现出来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不到信仰的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看不到信仰必然的不宽容，看不到人们在交往时不可能实现的和解，看不到神秘主义的信仰对情感所支配的强大力量，那么，大革命历史中的某些阶段依然得不到理解，那就再自然不过了。

上述这些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显得过于新奇，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试图继续通过理性逻辑来解释那些显然与理性无关的

种种现象。

我们看一个例子，宗教改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湮没了法国，已经说明了它本不是由理性的影响决定的。可是，甚至是在最近的著作中，人们仍然运用理性逻辑来对它加以解释。比如，在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著的《通史》中，我们就读到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民众自发式的革命运动，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参与这场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这一切都表明个人可以拥有极为虔敬的道德心和非常大胆的怀疑精神和推理能力。

与这些历史学家的断言恰好相反，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如下几点：首先，诸如此类的运动绝不是人们自发的；其次，理性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拥有撼动世界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源于情感的因素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它们既不是由理性塑造的，也不受理性的引导和控制。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法则，那就是：它们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了非理性的力量，而非理性的力量。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是迥然不同的思想形式，然而，它们却有着相同的情感基础和神秘主义基础，它们遵循的是一种与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逻辑。

政治革命可能是由深植在人们头脑中的信仰所导致的，但革命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这些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不满”。只要不满开始普遍化，人们的抱怨情绪开始高涨，一个反对派就会形成，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其强大程度，甚至常常可以跟当时的政府相抗衡。

不满要想发挥其强大作用，必须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酝酿和积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一场革命通常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现象，而这期间，它的演化有加速度之势，而不会是那种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阶段接踵而至的现象。但是，几乎所有的当代革命都是突然爆发的运动，它们顷刻之间就导致了当时政府的垮台，比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以及中国的革命都是如此。

与我们的寻常观点相反，通常那些非常保守

的民族，却往往热衷于最激烈的革命。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其保守，所以它们才不能接受缓慢的进化过程，适应不了环境的各种变化，所以，当矛盾来临，而且变得过于激烈时，它们常常倾向于突然间的突变。于是，这种突然间的进化就演变成一场革命。

即便是那些适应渐进而缓慢演化的民族，也并不总是能够避免革命的发生，比如，在英国，君主苦心孤诣地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和无上权威，而身处其下的人民则主张以代表为媒介实现政治上的自主和解放。这场斗争拖拖拉拉近一个世纪，直到1688年，它才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此做了一个了断。

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引燃导火索，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政治上的枷锁和精神上的枷锁，革命的威力则属于人民。

在一场革命中，军队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如果离开了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革命过去就不会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并不是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王权在法国才开始丧失，而是早在国王的军队不再臣服于他，拒绝保护他的那一刻起，王权就已



经不存在了。

军队渐渐生出叛逆之心，对现存秩序的存亡更加不放在心上，正是通过精神传播这种方式达到的。所以尽管希腊和土耳其这两种制度并无类似之处，但是，当土耳其少数军官的联合成功地推翻了土耳其政府时，希腊军官便受到土耳其军官的熏染，密谋步其后尘，改组希腊政权。

一次军事武装行动也许能够推翻政府，摆脱旧秩序的压迫——比如，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个共和国国家，其政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但是如果革命想取得重大成效和长久果实，它就必须依赖人民对旧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普遍希望。

除非广大民众的不满是普遍而强烈的，人们迫切追求新的政治生活，否则仅仅是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领着一伙人进行劫掠、破坏和屠杀当然不难，但是，要发动整个民族，或是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取得最终革命成功的果实，则非得要革命领导人具有坚韧持久的勇气、突破重重困境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夸大不满，向愤愤不平的人们灌输仇视的思想，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罪恶，尤其是长久之匮乏的唯一根源；并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说，他们所提

议的新制度将造就一个幸福的时代，人民如何可以享受旧制度下所不能享有的权利。通过借助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这些思想得以萌发、展开和传播，一旦时机成熟，革命也就水到渠成了。

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酝酿成熟的，只不过后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而前者则颇费周折，酝酿时间比较长久。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拥有了一支可供自己支配的军队，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则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赢得物质权力。开始时，基督教仅有的一些信徒就是下等人、穷人或是奴隶。他们虽然满怀热情，憧憬着自己今生悲惨的生活能换取来世的幸福，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处于混沌阶段，因而忽略了如何改善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历史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染，教义最终扩散到一个国家的上层。但是，新的教义必然会添加一些下层民众的意志和利益，甚至这些意志和利益与上层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逆道而行，所以君主不得不斟酌考虑。在一国之君认为新的宗教信徒众多到足以接受为国教之前，这肯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 四、政治革命的结果

当一个政党取得胜利时，在建立新的秩序时，它很自然地就会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组织社会。至于说把社会组织成什么样，这得视革命是受士兵、激进主义者，还是受保守主义者等的影响而定。获胜党派之所以取得胜利，这与背后支持它的社会阶级力量是分不开的，因此新的法律和制度将取决于获胜党派以及支持它的社会阶级的利益，比如说教士的利益。

革命如果只是通过纯粹的暴力斗争而取得胜利——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胜利者将全盘否定旧的法律体系，已经倒台的旧制度的支持者将不得不受到迫害、流放或消灭。

获胜的党派在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之外，还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因此，在这些迫害中所使用的暴力就会达到极致，对于敌对势力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那些被征服者休想得到一丝怜悯。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要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之所以要对异教徒施以火刑，国民公会要实行严刑酷法以及法国最近颁布法律禁止宗教集会的关键原因。

胜利者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有时会导致他们采取极端而荒谬的措施，例如，国民公会就曾颁布法令用纸币代替金币，对商品进行限价，等等。

不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价上碰了壁，对它的非难之声四起，法令也得不到行之有效的实施，到大革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已被人们唾弃。同样的事情最近也发生过，澳大利亚的一个几乎完全由工人组成的社会党内阁，颁布的法律是如此荒谬，一切以工会的特权为转移，因此这项法律必然会受到其他群体阶级的不满，结果遭到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不到三个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

不过，我们所考虑的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例外，大多数革命都是以一个大权在握的新元首之确立而告终。这个新元首深知，若要永保革命成功的果实，维持他的权力，首先就不能只考虑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该折中调和，兼顾各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在各种势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这样便不会受到任何一个阶级的威胁。允许某个阶级做大无异于听任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政治心理学中最确凿无疑的定律之一。法国历代的国王都深谙此道，他们励精图治，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积极巩固王权，他们不得不对下层人士有所让步，先是抵制了贵族的侵蚀，随后又削弱了教士的势力。只有这样他们才避免了重蹈中世纪德意志皇帝不幸命运的覆辙，就像亨利四世，被教皇赶出了教门，名誉扫地，最后不得不前往卡诺萨觐见教

皇，谦恭地乞求他的宽宥。

同样的法则在历史进程中屡试不爽，不止一次地得到印证。在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炙手可热，煊赫一时，皇帝处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必须得完全依靠他的兵士，因为其存亡、废立全取决于他们的意愿。

因此，对法国来说，长期地由一个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来统治，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由于这样的君主鼓吹君权神授，以此为依托，所以他享有极高的威望和无上的权威。没有这样一种权威，他就不可能拥有钳制封建贵族、教士乃至议会的势力。如果波兰在16世纪末也拥有一个既具有绝对权力又能受人尊敬的君主，那么，它就不至于日渐衰微以致从欧洲的地图上消失了。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政治革命可能伴随的重大社会变革。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跟宗教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相比，它们显得多么举足轻重。

## 第二章 宗教革命

### 一、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

探讨法国大革命，是本书任务之一，这场革命既然充满了暴力行为，那么它自然存在着重要的心理原因。

有一些历史事件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从何而起，缘何而终，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如果我们将它视为一种新的宗教，那它就一定遵循着所有宗教传播的普遍法则。如果从这点来看，先有群情激愤，后有血腥杀戮，其前因后果就让人恍然大悟了。

在研究一次重大的宗教革命的历史中，比如宗教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在法国大革命中异常活跃的一些心理因素，在这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在这两种革命中，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在信仰的传播过程中，理性的价值是那么无足轻重；迫害尽管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却从未间断过；在两种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必然会存在相互抵触的因素，因此几乎无不可能实现宽容；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我们同时也看到，所谓的信仰通常是利益的一个幌子，与信仰完全无关的利益往往借助一种信仰进行掠夺。最后，我们还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不同时改变人的生活状态，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无法改变他们的信念。

通过这些现象的印证，我们就会明白，大革命福音的传播方式何以与一切宗教福音，尤其是加尔文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毫无二致，就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传播方式。

不过，虽然像宗教改革这样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政治革命，在起源上是如此相近，但它们的长远后果却迥然有别，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持久力。在宗教革命中，虔诚的信徒限于宗教思想上的束缚，没有任何挣扎，因此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向其信徒们揭示他们受到了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当民众发现自己受到欺骗和利用时，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就会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因此，到督政府（the directory）统治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的实施导致法国陷入了如此一种毁灭、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以致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信仰者自己都不得不弃绝他们的那套体系。他们的理论除了少数几条带着美好幻想却无法得到经验证明的原则——诸如平等会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等之外，已经荡然无存了。

## 二、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的第一个信徒

宗教改革对人类的情感和道德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然而其朴素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反对教士的恶习。事实上，宗教改革只是对福音书的回归和皈依，但它从未奢求那些自由的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更宽容。实际情况是，在那些实行了宗教改革的国家，仅仅是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而几乎没有赋予人民太多的实际权利，君主给人们的权利并不比以前多，他自己所行使的权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在法国，由于人们思想的渐渐开放和造纸术的传播，人们借助于宣传和交流的手段，新的信仰才开始慢慢地传播。大约是在1520年，路德招募了一批专家，而且直到1535年，新的信仰才得到广泛的传播，新的信仰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下层人士的权利和利益，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了皈依此种信仰的必要性。

遵照人所熟知的心理学规律，这些行为仅仅是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地方官员，但是，主要是一些对这些信条含混不清的手工业工人。限于阶级性质，这些工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为薄弱，所以他们改信新教几乎完全是传染和暗示的结果。

一旦新的信条得到了传播，我们就会看到，



聚拢在这一信条周围的是一群鱼龙混杂的人物，他们对新教教条是冷淡的，漠不关心的。但是，这些人都找到了借口或机会以满足他们的热情或是贪婪，因而对旧教怀有抱怨之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利于新教的传播，使得新教在与旧教的对抗中也有了一丝优势。这种现象在实行宗教改革的诸国比比皆是，而以德国和英国最为严重。路德在新教教义中宣称教士没有拥有财产的需要，德国的封建领主则从这一信条中受益，因为这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攫取教会的财产。亨利八世更是以同样的手段发家，那些常受教皇骚扰的君主则对那些政教分离的教义窃喜。诸如此类的教义使得统治者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更加如鱼得水，因此宗教改革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 of rulers）的影响，反而增强了它。

### 三、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

整个欧洲都被宗教改革所颠覆，法兰西也随之倒了霉。它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已经沦为了一个战场。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其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一份事业都无法比拟的。

不胜枚举的事实可以证明，信仰的传播是与所有理性相互独立的。正如我们从加尔文那里知

道的一样，神学的教义虽然能把人们高涨而热烈的情唤醒，但在理性逻辑面前，经不起半点检验。

深受“救赎理论”（theory of salvation）的影响，路德对恶魔有一种格外的恐惧。他知道，忏悔无济于事，他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万无一失的手段来“讨好”上帝，以逃过炼狱之灾。从抨击教皇卖“赎罪券”（indulgences）开始，路德就不但否认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否认了他自己的权威。路德谴责宗教仪式、忏悔、圣徒的礼拜，并宣扬基督徒“唯信称义”，他还认为每个人只能蒙上帝的恩惠而得救。

这被称为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最后一条教义连路德都摸不准，但它却被加尔文清晰地表述出来。加尔文认为多数新教教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这项由他奠定的教义，“一些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些人则得救，这在全能的、永恒的上帝那里是注定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这一点来看，加尔文不过是根据圣奥古斯丁的某些见解有所延伸并发展而来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有些人注定了要在来世饱受炼狱

之苦，然而对于他们的功行和美德是全然不必考虑的，这样的思想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此令人厌恶的思想显然是精神错乱之作，但它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令人崇拜而虔诚地遵守着，使这么多人为之折服，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是在今天，此种情况仍有过而无不及。

由此不难看出，加尔文的心理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是有一定亲缘性的，同后者一样，加尔文自以为手中掌握了绝对真理，对于那些拒绝不接受他新创的教条的人，他毫不怜悯地把他们处死。对此，加尔文还打着上帝的幌子声称：上帝要求“我们在捍卫上帝的荣光时，哪怕毁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加尔文歿其信徒的例子表明，从理性的角度看，即使再悖谬不过的事情，在那些受到信仰之蛊惑，迷惑其中的人看来也是极为正常的。根据理性逻辑，将一种道德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无法避免。要么获得上帝的拯救，要么受到审判，甚至是处死的命运。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完全非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非常严格而残酷的道德标准。他的信徒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他们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觉得必须以自己的行为作为楷模。

## 四、宗教改革的传播

新信仰不是通过演说来传播的，更不是通过论证来传播的，而是通过我们前述作品中描述的机制，即通过断言、重复、精神传染以及大造声势，在后来的岁月中，革命思想也效仿这样的途径在法国传播开来。

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信徒的迫害只能促进新信仰的传播，每一次迫害之后，新信仰对人们的威慑力便增长一分，因此也就会有人接受新的信仰，就像我们在基督教早年的经历中所看到的。市政议员阿内·迪堡被判火刑，就在他走向火刑柱的时候，他还在苦口婆心地规劝围观的群众改信新教，一位目击者说：“比起加尔文的著作来，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更多大学中的年轻人皈依了新教。”

旧教统治阶级为了阻止他们向人群布道，他们在烧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头；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折磨作为对人群的警戒，在行刑时还给他们缚上一条铁链，这样在把他们投入烈火中之后，行刑的人可以再把他们拖出来，反复施虐。

但是虔诚的新教教徒却甘之如饴，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能使他们退缩，反而让他们觉得烈火的

考验是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无上的荣宠。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放弃他先前的宽容态度，下令在巴黎同时设下六处火刑场来惩罚新教教徒，而正如我们所知的，国民公会在同一座城市中只是设了一座断头台，而且受难者的痛苦也没那么惨烈。殉教基督徒的大无畏精神亦早已有目共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其信仰的催眠和盲目追随作用下，信徒们可以变得完全无所畏惧。

新宗教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到1560年，在法国就已经有了两千多座新教教堂，许多大的领主一开始还无动于衷，但目睹了新宗教的影响之剧烈，后来也渐渐地转信了新教。

## 五、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冲突：宽容的不可能

我已经说过，不宽容是强势宗教信仰的必然伴生物。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事实的大量证据，从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宽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宽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长期以来把法国

搞得四分五裂的那些教派，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它们在根本的宗教理念上并没有存在多大差异。天主教和新教都信仰同一个上帝，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信仰方式的不同。要是理性能对它们的信仰产生一点作用的话，那么，它们很容易就会明白，对上帝来说，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崇拜他，是无关紧要的。

对那些狂热的大脑来说，理智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继续爆发持久而激烈的冲突，历代君主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让它们实现和解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虽然一再遭到镇压和迫害，但新教的势力增长势头却依然迅速，并吸引了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员。为了促成双方的和解，王后于1561年召集主教和牧师在普瓦西举行宗教会议，就两种教义的融合问题进行讨论。尽管王后精明过人，但这一计划只能说明王后对神秘主义逻辑的法则一无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听说过一种信仰因为辩驳而毁灭或削减的先例。卡特琳甚至没有想过，个人之间的宽容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是可能的，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她的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与会的神学家唇枪舌剑，并对对方的首领百般侮辱，但没有一个人发生动摇。因此这次会议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变得愈加糟糕。此后，卡特琳还在1562年颁布一项敕

令，敕令规定：“允许新教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开集会，举行礼拜仪式。”

从一种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是高尚而可贵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不明智的，它除了进一步激怒双方的矛盾之外，没有任何收效。在法国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米迪地区，新教教徒大肆迫害天主教教徒，企图通过暴力迫使他们改宗，如果天主教教徒不顺服，新教教徒就要割断他们的喉管，并且洗劫他们的教堂。同样的状况，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对新教教徒的迫害亦不分轩輊。

这样的对抗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内战，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战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饱受兵燹之灾，血流成河，城市被劫掠，居民遭到屠杀。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所特有的那种残酷本性在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场景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中再次出现。

老人、妇女和儿童，统统遭到杀戮。有个叫多普德的男爵就是一个典型，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他丧心病狂地杀害了三千人，毁坏了三座城池、二十二个村庄；一个叫蒙吕克的人则可以称得上是卡里埃的先驱，他把加尔文教徒悉数扔入井中，直到井

被填满为止。新教教徒也仁慈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的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大肆毁坏坟墓和塑像，其行径与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对待圣丹尼斯王家墓地的行为如出一辙。

在教派纷争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影响下，法国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变得四分五裂，它被肢解成一些小的市政共和国，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王室的权威荡然无存。布卢瓦邦直接向被迫逃离首都寻求避难的亨利三世提出自己的要求。1577年，旅游家利波马诺游历法国时，看到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奥尔良、图尔、布卢瓦、波瓦第尔，已经完全被毁坏，大大小小的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墓地也是七零八落，狼藉不堪。这一场景与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法国没什么两样。

在这一时代的诸多事件当中，于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或许不是杀人最多的，但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最为灰暗的记忆。历史学家认为，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发动了这场大屠杀。

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有多少深刻的心理学知识，就可以明白，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发布这样的命令。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王室的阴谋，而是教众们犯下的罪行。当时，卡特琳·德·梅迪



奇相信，有四五个新教教徒的首领正在策划一场威胁到她以及国王生命的阴谋，于是她就根据当时通行的做法，派人将他们刺杀。巴蒂福尔先生对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作了很好的解释，他写道：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谣言四起，满城风雨：整个巴黎的胡格诺教教徒都要被处死。于是，天主教的贵族，卫队的士兵、弓箭手以及普通民众一句话，所有的巴黎人纷纷冲上街头，手持利刃，随时准备参与屠杀。杀死胡格诺教教徒！杀死胡格诺教教徒！叫嚣声一时响彻街头，于是大屠杀就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爆发了。那些胡格诺教教徒或被击毙，或被溺杀，或被绞死，凡是被怀疑为异教徒的人都在这场争斗屠杀中惨遭厄运，在巴黎，大约有两千人被杀。

通过传染的作用，外省群众纷纷以此效尤，大约有六千名到八千名新教教徒惨遭杀害。

当时间冷却了人们的宗教狂热之后，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只要提起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无一不表示强烈的愤慨。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人要想理解另一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是何等困难。

然而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在当时非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人士当中激

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闻此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给法国国王的贺信纷至沓来，其热烈程度甚至远胜于他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

没有谁比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此更兴高采烈了，为了纪念这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件，他让人铸造了一枚金牌，点起狂欢的焰火，鸣炮祝贺，并多次集会，举行庆典。他还命令画家瓦萨里在梵蒂冈教廷的墙壁上绘制出大屠杀的主要场面以资纪念。此外，他还遣使者至法国，对法王的善举通令嘉奖。此类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信徒的心理，大恐怖时期，雅各宾主义者所具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就非常类似于格列高利。

新教教徒对这样一场大屠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奋起反抗，直到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通过《博利厄赦令》，赋予他们完全的信教自由、对八个城市的占领，并且，在议会中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各占一半议席。

然而尽管新教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但天主教这些勉强的让步并没有换回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为首领的天主教同盟开始形成，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不过，它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知道，亨利四世在1593年宣誓脱离新教，后

来又颁布了《南特敕令》，终于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

这场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依然没有终结。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新教教徒依然没有偃旗息鼓，1627年，黎塞留被责成围攻拉罗谢尔，杀戮新教教徒一万五千人。后来，更多地出于政治上而不是宗教上的考虑，枢机主教还是对新教教徒表示了难得的宽容。

这种宽容没有持续多久，只要一方觉得自己有能力与对方抗衡，或者是将对方压垮，那么，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就不会达成和解，最终的结果也往往是双方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到路易十四时代，新教教徒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斗争，但求和平相处。此时，他们的数量在一百二十万人左右，拥有六百多座教堂和大约700位本堂牧师。

可是在天主教牧师看来，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继续存在异教徒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迫害这些异教徒。由于这些迫害收效甚微，于是，路易十四在1685年再次向武力发起援助，派出龙骑兵大肆追捕、屠杀新教教徒，许多人惨遭屠戮，但没有更大的收获。在天主教牧师尤其是博絮埃的压力下，路易十四最终

收回了《南特敕令》，新教教徒被迫走上绝路，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一悲壮的移民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说，大约有40万名法国人远走他乡，这些移民都是些品德高尚之士，他们遵从了自己的良心，置物质利益于不顾，毅然踏上了背井离乡的不归之路。

## 六、宗教革命的结果

如果仅仅根据宗教改革这段灰暗的历史来判断宗教革命，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宗教革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些宗教革命就产生了相当大的文明影响。

这些宗教革命通过实现精神统一，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柱，极大地增进了一个民族的物质力量。比较突出的就是伊斯兰教，毋庸置疑地说，由穆罕默德建立的这种新的信仰，一下子将阿拉伯那些弱小贫困的部落改造成了一个强悍的国家。

这样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并不只限于追求一个民族的统一，往往是它取得了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部法典都不可能实现的效果：它明显地改变了那些几乎是不可变更的要素，即一个民

族的情感。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革命——基督教的诞生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它抛弃了一切异教的信仰，代之以一个来自加利利平原的上帝，新的宗教理想告诉人们：为了获得天堂中永恒的幸福，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欢乐。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理想很容易为那些穷人、奴隶以及被剥夺了所有此生幸福的人所接受，在他们看来，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即将被美好的未来所取代，这就从而给予了他们心灵上的安抚和精神上的鼓舞。操行上一丝不苟的生活既容易为穷人所追随，也好为富人所接受。这正是新的信仰所展现的力量。

综观基督教诞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基督教革命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明的紧张程度。宗教信仰随即征服了文明的一切要素，并使之很快地为宗教服务，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宗教，这样，人类文明就发生了迅速的转变。作家、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只不过是符号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新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或是政治信仰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非但理性对它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它会寻找理由迫使理性为这种信仰做出牵强的解释和合理化证明，并企图把它强加

于人。在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概也会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大谈特谈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这与其他时代的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以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在一个教派之间水火不容的国度里，我们千万不要指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够欣然地接受宽容。在古代社会中，只有多神论者才会保持宽容。在当前这个时代中，实行宽容的国家正是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多神论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已经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它们实际上信奉着相去甚远的神祇。

信仰的自由和多样性既导致了这种宽容，但与此同时，这也自然而然地削弱了信仰。于是，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心理学难题：如何在保持坚定信仰的同时又能做到坚持宽容？

我们在前文中简要地阐述了宗教革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信仰的巨大力量，虽然它们的理性价值甚是微薄，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历史才得以塑造，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它们不再成为一盘散沙。在任何时候，人类都依靠宗教和信仰来指导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行为得以引导，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取

代它们。

### 第三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为

#### 一、革命时代中政府的虚弱抵抗

现代许多的国家，如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在20世纪中革命迭起，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旧政府。

在现代社会中，传播消息的渠道更加方便快捷，这使得精神的传染变得异常迅速，因此，革命的突发性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一旦遭到革命的袭击，政府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它向我们表明，政府由于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盲目乐观，结果根本无法理解和预见革命的发生。

不过，颠覆政府如探囊取物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但发生在那些通常是被宫廷政变所推翻的独裁体制中，而且也会发生在那些得到公共舆论和人民代表支持的政府身上。

在这些迅速崩溃的体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查理十世颁布《四项赦令》之后，我们都知道，国王仅在短短四天之内就被推翻了。查理十世的首相波里尼雅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王本人也自信巴黎平安无事，于是就外出狩猎了。这种情况就如路易十六时代一样，军队丝毫没有反叛之意，但由于统治者没有坚定慎重对待的态度，因而导致指挥失误，结果在一小撮起义者的进攻面前居然显得不堪一击。

路易·菲利普在他统治时期并没有采取专制独裁的统治措施，但依然在顷刻间倒台，这就使得他的例子更具有典型性。这位国王并没有像查理那样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的倒台起因一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的不起眼的小暴动。

一个以装备精良的军队为后盾的、根基稳固的政府为什么如此轻易就被少数几个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推翻呢？历史学家对此匪夷所思，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把路易·菲利普的倒台归咎于某种所谓“深层”的原因。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玄奥，那些被委以防守之重任的将军在暴乱中所做出的无能表现，就是国王倒台的真正原因。

在可以引用的例子中，这一个案例最为典



型，也最富教益，因此，它值得我们花些工夫去思考。在这一案例中，埃尔兴根将军亲历其中，以亲眼所见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根据埃尔兴根将军所作的记录，博纳尔将军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当时在巴黎有三万六千名士兵，但软弱无能的军官们阵前手忙脚乱，根本无力指挥他们。不但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而且，最为危险的是，普通民众竟被允许混杂于军队之中，以至于后来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如此一来，军队不免束手束脚，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起义就成功了，国王最终被迫退位。

正是把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上述事件中，博纳尔将军向我们揭示了，导致路易·菲利普倒台的暴动，实际上很容易就可以控制住。特别是他证明了，如果那些指挥官能够处变不惊的话，只需要派出一支非常小的军队就可以阻止起义者闯入议会，而当时的议会主要由保王派组成，他们必然会宣布由巴黎伯爵在其母摄政下继承王位。

这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中。

这些事实表明，在一些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或革命之中，常常会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之

而起，对于其中的错综影响，其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它同时告诉我们，对于普遍的历史规律，要依照规律进行总结，不可妄下断言。如果路易·菲利普不是被暴乱推翻，我们可能就看不到1848年的共和国、1852年的第二帝国，也就没有什么色当之役的惨败、普鲁士的入侵，当然就不会有阿尔萨斯被割占的事了。

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革命中，军队在捍卫政府的过程中虽然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它也没有背叛政府。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常常是军队引发了革命，土耳其和葡萄牙就是如此。在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中，军队更是进行了无数次的革命。

当革命受到军队的影响时，新的统治者必然会处在军队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罗马帝国末期，皇帝的存亡废立都是由军人决定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前文也已提到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亦可得到验证，下面的这段话就是从报纸上关于希腊革命的新闻中摘录下来的，它告诉我们一个处在军队支配之下政府会沦落成什么样子：

某天，八十名海军军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那些受到他们指控的领导人的职务的话，他们将集体辞职。还有一次，一个属于王储的农场（梅泰里）里的农民要求瓜分土地。政府许诺晋升佐尔巴斯上校，这一举动引起了海军的抗议，于是，佐尔巴斯上校在与海军上尉台帕多斯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磋商后，决定撤换参议院的议长。在此期间，市政联盟诋毁了海军军官，一名代表谴责海军军官，这些军官及其家属都应该以强盗论处。当指挥官米亚乌利斯下令向叛乱者开枪时，那些曾经为台帕多斯马首是瞻的士兵却在阵前倒戈。古希腊时代的米斯托克利与伯里克利之间的那种默契和一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的话，那么一场革命通常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但是，往往在军队还没有介入之前，革命就已经发生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0年革命都是如此，在1870年革命中，色当的投降使法国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因此人们一举推翻了第二帝国。

大多数的革命都发生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即首都，随后又借助传染的作用蔓延发展至全国，但有时也不尽然。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列塔尼和米迪等地就是自发起来反

抗巴黎的。

## 二、政府的抵制如何才能克服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在上面所列举的这些革命中，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大多数都由于自身的软弱性而造成的毁灭，面对革命，政府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政府在革命面前都是无所作为的。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就表明，只要政府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扼制革命的发展势头，并最终取得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对一个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革命更具有威胁了。在东方遭到惨败之后，长期处在极端专制统治之下的俄国社会各阶级——包括一部分军队和舰队，纷纷揭竿而起。铁路、邮局、通信部门罢工不断，偌大一个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通由此中断。

俄国的社会主体本身是农民阶级，此时的农民阶级也开始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当时，在俄罗斯当时背景下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极为悲惨，在米尔制度下，他们被迫耕种土地，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于是，政府为了防止农民暴乱，当机立

断决定将这些农民转化为经营者，以此来安抚这一庞大的阶级。为了迫使地主将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政府颁布了特别的法律，并且银行为那些土地购买者准备了必要的贷款，贷款的利息则由从每年的收成中抽取出的小额养老金来支付。

由于缓和了与农民的矛盾对立，确保了农民的中立，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那些狂热分子了，这些人正在焚烧城镇，向人群中投弹，并不断挑起激烈的争端。所有的这些人都应该被赶尽杀绝，这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可以保护社会免遭破坏的唯一办法。

取得胜利的政府知道，除了必须满足国内那些开明人士的合法要求之外，还应该另有作为，于是，它建立了一个议会来指导立法，控制财政支出。

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的天然支持者逐一不存在时，它依然可以凭借其智慧和意志，克服一切棘手难缠的障碍，进而保证自己政权的巩固。因此，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地说，没有哪个政府是被人推翻的，它们的失败常常是自取灭亡。

### 三、政府进行的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政府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阻止一切革命，它们决不会革自己的命。有的时候，出于暂时或是长远需要的考虑，它们也会小心翼翼地進行一番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它们却不会先于这些要求进行改革，而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形之下，为了缓和矛盾而被迫改革。但是，有时某些政府也会进行一些突发的改革，我们常称之为革命。这种改革努力的成败将取决于国民精神状态的稳定与否。

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它们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nation mind），那么，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通过武力将那些半亚细亚的人口欧洲化的。

日本为我们提供了由政府发动革命的又一典型，不过，被彻底改造的不是它的精神，而是它的机器。

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哪怕是部分地完成，都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独裁者，并辅之以一个天才人物。改革者常常会发现，整个民族都会起来

反抗他，因此，与一般革命中的情形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是革命的，而人民则是传统而保守的。只要作一番细心研究，你很快就会发现，人民事实上极端地保守。

在这些尝试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管革命是由上层阶级动员的，还是由下层阶级自发的，一般都不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精神状态，革命只能改变那些由于时间的销蚀而慢慢变得落后而腐朽的东西。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十分有趣却注定要失败的实验，它试图通过政府来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古老的君主制王朝之所以被革命推翻，从间接原因上说，就是因为清政府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企图强制推行改革，可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下的人们无法接受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因此引起普遍的不满。禁烟禁赌、改革军队、建立新式学校等改革措施必然要提高税收，这一后果连同改革本身都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所以，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欧洲学校里接受过教育的少数几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借助这种不满，发动人民起义，并宣布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共和制根本就是中国人以前闻所未闻的。

这种共和制注定不能持久，因为，催生它的动力并不是一个进步的运动，而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共和”一词即使对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也仅仅意味着摆脱一切法律、习俗和长期建立起来的规范之束缚与羁绊而已，然而他们仍然体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剪掉了辫子，戴上帽子，自称为共和人士，年轻的华人试图控制他们的天性。这与大革命时期大多数法国人所接受的共和观念又是多么相似呀！

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魔界，即借助于它的力量能够不通过纪律来挽救一个社会。当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强力加以规制；但是，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

作为上述断言的一个印证，我们可以举最近在土耳其发生的一个与中国极为相似的实验为例。几年前，几个在欧洲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满怀爱国热忱，在一群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苏丹的政权，尽管这一政权的专制程度还不至于令人无法忍受。当时的土耳其还是一个文明和野蛮均占一半的国家，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内乱不息。然而，就在这



样一个国家里，革命者对规则的神奇力量像我们拉丁人一样虔信，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代议制政体来。

这一努力至今仍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发起者不得不认识到，尽管自己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统治方法仍然延续着苏丹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几乎没有改变。他们既不能制止，草率地处决，也不能阻止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屠杀，他们甚至无法废除某种陋习。

因此而责备他们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传统的民族，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宗教热情是如此强烈而高涨，伊斯兰教教徒虽然只占少数，却可以根据他们的法典合法地统治其信仰的圣地；在这个国家里，民法与宗教法还没彻底分离，对《古兰经》的信仰仍然是民族思想得以维系的唯一纽带，要阻止伊斯兰教成为它的国教，谈何容易？

要想打破这种状态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然会看到这样一种状态，专制体制打着立宪主义的旗号掩人耳目地再次登台亮相，也就是旧制度改头换面后的卷土重来。诸如此类的尝试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民族除非首

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就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

#### 四、革命后存留的社会要素

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the stable foundation）。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使我们体会到了历史悠久的政府体系的力量，比如说古代的君主政体。一个君主政体很容易为一群反叛者所推翻，然而，改朝换代后依然实行原来的政体，并没有改变君主政体所体现的原则，如此看来，改朝换代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拿破仑下台以后，取代他的并不是他的嫡亲子嗣，而是波旁王朝的后代，后者体现了一种古代原则，而“皇帝的儿子”这一人格化的观念尚未在人们的心目中牢固确立。

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大臣尽管有旷世之才、盖地之功，却很少有能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一手创建了德意志联盟，然而，他的主子却能运其生死于股掌之间。由此看出，在公共舆论支持的原则面前，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通过政府而体现的原则随着政府的变化而消失，该社会组织的要素也并不会同时一股脑儿地消失，我们可

以从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中得出这一结论。

如果我们对法国以前的历史一无所知，而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一个多世纪的动乱的话，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陷入严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然而，法国的经济生活、工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现在却表现出一种连贯性，似乎并不因一切革命和政府的影响而受到任何阻碍。

事实上，除了历史上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件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琐事，这些琐事常常并不受人重视。它们受那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横的必然性的支配，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真实框架。

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名义上的法兰西政府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当我们去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时，我们就会发现，与这些表面上的变迁相反，真实的法兰西政府几乎未有任何改变。

主宰一个民族命运的真正力量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自然是国王和大臣。但是，他们却在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似乎是无足轻重的。真

正对一个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部门，它并不是为个人的意志服务的，政府的更迭亦不足以对这些要素产生太大的影响。行政部门守护着传统，人们很难说清它们，但它们却经久不衰，这种神秘主义的力量几乎掌握着一切其他要素。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它们的作用甚至达到这样一种危险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可以在形式上的国家之外，构成一个权力更为强大的无名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法兰西实际上是由各部落的首脑以及政府职员所统治的。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革命的历史，就越会发现除了标签之外，它们所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根本就无从说起。发动一场革命容易，但要改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

##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 一、民族精神的刚性与柔性

如果想要理解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个人虽然可以从理论上否认过去的历史——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今天有许多人还在这样做，但历史的影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和沉淀，思

想、情感、惯例乃至偏见才能够汇集成一种民族精神，它赋予一个民族以力量。没有这种民族精神，人类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每一代人将不得不从头开始。

只有当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刚性之后，这种民族精神才算稳定地建立起来。但这种刚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或者说它还得具有柔性。

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和传播，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融合、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过于柔韧，其结果必然是革命的不断发生，而民族精神如果过于僵化，则会导致这一精神走向没落衰亡。同人类一样，普通物种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如果固守原来的意识形态，不能融入新的时代，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就要面临灭亡，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很少有几个民族，能够在刚性与柔性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间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点，能够实现这种平衡的完美典型，大概就要数古代的罗马和当代的英国了。

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由于不能通过逐步地演进自己，以求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当这种适应必须做出时，它们将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

民族精神的刚性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一个民族若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灿烂历史，首先就不得不先建立其自己的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只要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它就是一个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尚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因此自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以来，法兰西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虽然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但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又开始变得过于僵化。如果它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可能就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了。

以上思考向我们指出了大革命在民族方面的起因，以及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并且它还揭示了同样的革命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一样结果的原因。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有

些民族对它怀有崇高的热情，而有些民族则态度冷漠，甚至是反感厌恶。反应为什么会如此迥然相异，其实都是因为民族精神之不同的缘故。

英国经历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把一位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但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英国的民族精神非常稳定而坚固，这种稳固的精神足以守成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柔韧性，这种柔韧性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规矩。基于英国这样的民族精神，因此英国人从来没有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着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建立一个全新而不切实际的社会。

索列尔写道：“法国人蔑视政府的无能，憎恨、厌恶牧师和贵族的腐化，反抗挣脱法律的束缚和枷锁，而英国人则把他们的宗教、宪法、贵族制以及上议院视为荣耀。在英国人看来，这些东西就像巴士底狱中林立的塔楼，擅入者以藐视罪论处。英国人承认，这一城堡内部的命令颇具争议，但是，这仅限于内部解决，他们绝不容许陌生人越俎代庖。”

民族气质对各民族命运的影响，体现在西班牙

牙语系的南美各共和国的历史中再明显不过了。在这些国家里，革命时常发生，政变也在不断更迭变换。这些国家的人民大多是混血儿，也就是说，他们纷杂的遗传已经将其祖先固有而明显的特征稀释掉了，他们原来的民族气质和传统性格也慢慢变得不是很明显了，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稳定。事实表明，混血的种族往往是最难统治的。

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由于民族原因而导致政治能力的差异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去考察那些曾经先后被两个民族统治过的国家。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相当常见的，晚近的古巴和菲律宾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原来都受西班牙的统治，后又易手转而由美国统治。

古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时，素以混乱和贫困而著称于世；然而，当这个岛国在被美国接管统治以后，其繁荣昌盛的局面又在世界上有目共睹。

无独有偶，在菲律宾发生的情况与古巴如出一辙。西班牙控制菲律宾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可是这个国家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被弄



得一团糟：灌木丛生，随处都流行着病疫，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商业，人民的生活相当凄惨而艰难。可是经过美国短短几年的统治以后，这个国家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疟疾、黄热病、瘟疫和霍乱这些病疫被彻底消灭；沼泽得到了治理和改善；农村开始建设铁路、工厂和学校；十三年里，人口死亡率竟然降低了2/3。

我们应该用这些实例给那些理论家提个醒，千万不要忽视“民族”这个词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并且不要忘记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是多么重要，它是可以决定其命运的。

## 二、人民是如何看待革命的

人民在所有革命中的角色都无二致：他们既不会自己去发动革命，也不能胜任指导革命的艰巨使命；在革命运动当中，人民的行为必然是受革命领袖支配的。

最近香槟省（Champagne）所发生的事件非常直观地展示给我们：只有波及和触动人民的直接利益时，人民中的各个部分群体才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抗，然而这种运动局限于地方性的限制，导致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一场骚乱罢了，不会

形成真正的革命。

当革命领袖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超凡的影响力时，革命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生了，葡萄牙和巴西最近发生的革命就很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令一种新的思想深入人心，让人民去身体力行地接受它、实践它，确实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然而一般情况下，人民往往是在他们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还没有对新思想真正产生全部的认识，就已经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一场革命；等到他们终于理解了要革命的原因时，革命早已结束很久了。

人民参加革命仅仅受到了革命领袖的鼓动和动员，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理解革命领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片面地去理解革命的意图，而这种方式却绝不会是革命的真正发动者所向往和希冀的。法国大革命显然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资产阶级想要跟贵族阶级共同分享权力，也就是说，精明强干的新精英要取代平庸无能的旧精英。

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的议题几乎涉及不了人民。虽然议题会公布人民主权的原则，但

所谓的人民主权也仅仅是意味着人们享有选举代表的权利，而与人民自己的权利没有关联。

普通老百姓在文化、见识这方面的修养上普遍不高，我们不可能期望他们也像中产阶级那样，渴望跻身社会上层，当然，以他们长久以来的陈旧观念，也绝不会认为自己与贵族是平等的，甚至从来也没有同他们地位平等的奢望。因此，无论是在观点上还是在利益上，普通老百姓与社会上层阶级都有天壤之别。

一个国家，其主要群体构成毕竟还是普通民众，因此议会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都需要普通民众参与进来，以求获得这个庞大的团体的支持和拥护，因而结果是民众越陷越深，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众革命。一种思想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只有在具备了支持和拥护它的情感以及神秘主义基础之后，它才会发挥不可估计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理论在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前，必须根据明显的实际利益转变为一种新的、极为明确的信仰。

当政府向人民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如此强大的诱惑摆在民众面前时，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实际利益，自然会积极地响应和拥护政府的革命，于是这种转换就起到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烧杀抢掠，并且因受到政府的蛊惑而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革命原则之所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就是源于它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尚未发生革命之前，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

群众在革命领袖的许诺和鼓舞之下变得开始盲目起来，心目中原本存留的那些社会约束逐渐被卸除了，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命不凡，被那种拥有无限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兴高采烈地看着他们以前的主子被驱逐、被掠夺。既然大家都是主权之人民，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被允许的呢？

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革命领袖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对真实希望和信念的执着追求，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使人们被一时的欲望和仇恨迷失了头脑，而这些格言已失去了它本身的真正含义，而是很快地成了人们为此进行辩护的合法借口，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不久就因失序、暴

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的原因。

当革命从中产阶级蔓延到社会下层时，由于下层阶级的局限性，使得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也就相应地终结了，进而转变成了本能支配理性。隔代遗传的本能对理性的这种胜利是可怕的，社会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种努力对社会的存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律的力量来限制人类的自然本能，这些自然本能是人类原始兽性的遗传。控制这些原始本能是可能的——一个民族越是能够克服这些本能，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它们越不会彻底被根除，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激活，而一旦萌发，这种本能所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计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的激情被释放点燃以后会变得如此危险的原因。它就像奔流的洪水，一旦冲垮了堤坝就一泻千里，直至泛滥成灾，浮尸遍野。“将一个民族的精神糟粕激发出来，无异于引火烧身！”里伐罗尔在大革命之初就曾经哀叹道，“对民众进行启蒙开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三、人民在大革命中的作用

大众心理学的法则告诉我们：尽管人民可以通过追随、夸大他们所受到的刺激，从而所引起的高涨热情必然会在革命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如若一场革命中缺失了领袖的指导，人民就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从来就不能引导自己的运动，也不会有开明的思想和意识去完成革命使命。回顾历史，在所有发生的政治革命中，我们都很清楚地认识到领袖的作用。他们虽然自己并不创立什么理念用以作为革命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却知道怎样将理念当作一种手段，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思想观念、领袖、军队和大众对一场革命来说，这四种要素缺一不可。

群众在领袖的鼓动下，队伍迅速壮大，借助人多势众蜂拥而起，这样的一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他们的行动就好比一颗炮弹，在借助外力的激化作用下，能够产生一种它本身所不具备的足以穿透钢板的冲击力。在民众的追随拥护下，革命如火如荼，然而群众对于革命的性质和具体这么做的原因却是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忠实地追随其领袖，按照领袖的意志去展开革命工作，而从不问一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群众之所以推翻查理十世，是因为他颁布了《四项敕令》，但至于这一敕令的内容，他们却毫不关心，甚至对《四项敕令》的具体内容都丝毫不知；后来他们又把路易·菲利普赶下了台，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

要这样做的话，恐怕他们会十分尴尬，无言以对。

许多作家，从米什莱到奥拉尔都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没有真正看穿事物的本质，因此他们无一不认为是人民发动了我们伟大的革命。

米什莱曾经断言：“革命的主角是人民。”

奥拉尔写道：“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即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少数几个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发动的……我相信，从1789年到1799年，在整个这段历史中，没有谁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来引导或左右事件的发展：不管是路易十六、米拉波、丹东还是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主角是法国人民吗——只要我们看到法国人民是一些有组织的群体，而非乌合之众的话，答案便是肯定的。”

柯钦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还坚持这种流行的观点。

他写道：

米什莱说得对，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们

越是深入地了解他们，就越会感到这些事实就像天方夜谭。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既不依靠领袖，也不依靠法律，整个就是混沌一团，却在五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统治，对全国发号施令，其言行所表现出的明确、连贯、一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无政府状态对他们教益颇深，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与纪律很快就建立起来……散布于三万多个街区社团之中的两千五百万人行动起来步调一致，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同时采取的这些行动真的像作者设想的那样，是完全自发的话，那么它确实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但是奥拉尔先生自己很清楚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说起人民时，他谨慎地指出所谓人民就是指群体，并且，这些群体可能受到了某些领袖的领导。

那么，是什么令全体国民凝聚团结在一起呢？在国王发动进攻、内战威胁国家统一的紧要关头，是谁力挽狂澜拯救了这个国家呢？丹东、罗伯斯庇尔，抑或是卡尔诺？这些人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真正维护了团结、捍卫了独立的是人民俱乐部，它把法国人民组织成为公社或群众团体；迫使欧洲反法联盟不得不撤军的正是法国的地方自治团体和雅各宾派的组织。如果作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团体当中，



总有几个人在这个群体中显示着惊人的才干，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上，还是在决议的执行中，他们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领袖风范，但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我们阅读人民俱乐部的会议记录时），他们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他们自己，远不如说来自团体。

奥拉尔先生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所有这些团体都起源于“一场充满了博爱与理性的自发运动”。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小型俱乐部遍布法国，它们唯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总部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是事实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可是许多人出于对雅各宾派的幻想，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 四、大众及其组成要素

为了确立某些理论上的概念，人民被设想成一个神秘的实体，它无所不能，且具备一切美德，政客对它大加赞赏，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人民在法国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又是如何被编造成一个概念的。

不管是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还是今天的雅各宾派，都是将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

它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它从不会犯错误，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人民可以无所顾忌地烧杀劫掠，可以犯下滔天罪行，他们今天把英雄捧上天，明天又会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就是这样。政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吹嘘人民的崇高美德、非凡智慧，并对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俯首帖耳。

那么，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革命者奉若神明、崇敬有加的神秘实体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我们可以把人民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第一类包括农民、商人和各种各样的工人，这些人愿望得到安宁的生活和稳定的秩序，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了。这一类人构成了人民群体中的大多数，但这一部分人对于发动一场革命从来没有动过什么念头。他们只是想在默默无闻的劳作中维持着生计，然而历史学家常常把他们忽略。

第二类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坏性和报复性的社会渣滓，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安，也往往是由于他们从中作梗。酗酒成性的穷困潦倒之徒、盗贼、乞丐、市井无赖、居无定所的雇工，所有的这些人构成起义队

伍中最危险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这些人虽然肆无忌惮，但是对惩罚却怀有恐惧之心，因此会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平时不得不收敛自己的犯罪倾向，一旦当惩罚的危险消失，他们邪恶的本能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一帮凶犯。

那些玷污了一切革命之美誉的大屠杀就得归咎于这一罪恶的渊藪。

正是这一帮人，在其领袖的指挥下，不断地冲击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心理学议会。这群无法无天的家伙除了丧心病狂地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外没有任何理想，对革命理论、原则，他们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

另外还有那些从最底层的平民中吸收过来的渣滓，这群人游手好闲，整日无所事事，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他们也参与进革命中来。于是他们开始浑水摸鱼，大喊大叫，是因为其他人也在疯狂叫嚣；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其他人也在进行暴动，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的目的没有任何明确意识。他们随着外界环境和周围民众的变化而变化，外在环境的暗示力量使他们进入催眠状态，一举一动无法自持。

从古至今，这样一群骚动不安却又极其危险的投机分子和乌合之众，向来都是一切起义的始作俑者，煽动家看中了他们这一点，所以才对他们极为关注。在煽动家看来，他们就是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人民。然而事实上，所谓拥有最高主权的人民主要是由底层的广大民众构成的，这些人正如梯也尔所描绘的：

自塔西佗见证了大众为罗马皇帝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击节叫好以来，他们的本性始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帮野蛮的家伙聚集在社会的底层，蠢蠢欲动，一旦得到权力的首肯，或者是受到革命领袖的青睐，他们就准备以罪行来玷污人民的美名，破坏一切事业。

法国大革命如此持久地受到社会最底层大众的支配，像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自1789年开始，早在国民公会之前，一旦大众的兽性被激发释放出来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便已开始了。这些屠杀的残酷性令人发指，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在“九月屠杀”中，囚徒们被暴徒用马刀一块一块地割成碎片，故意延长和加深他们的痛苦，慢慢地屠宰他们以取悦观众，而那些暴徒则从受害者抽搐的场景和痛苦的尖叫声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

早在大革命之初，类似的场面就在法国随处可见，当然，那时还没有对外战争可以作为借口，事实上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这种残忍开脱。

从3月到9月，一系列的烧杀抢掠使法国血流成河，泰纳曾列举了一百二十个这样的例子，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城市均落入大众的占领和控制之中。

他们把特鲁瓦市市长的双眼用剪刀戳瞎，令他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死去；把原龙骑兵团团长贝尔鲁斯活活地剐成碎片。甚至在许多地方，他们惨无人道地把遇害者的心脏挖出来，用枪尖挑起，在街上招摇过市。

这就是那些底层民众原始野性的规范体系在被轻率地打破限制之后，所实施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之所以如此纵容嚣张，正是因为他们的暴行迎合了那些对其百般奉承的政治家的野心。我们姑且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数以千计的暴民压缩为一个人，那么这将是一个何等残忍、狭隘、可憎的怪物，它将是摧毁一切的魔鬼，比起历史上最残酷嗜血的暴君，更要可怕得多。

不过，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镇压得住他们，这些冲动而残忍的大众就会立即变得俯首帖

耳，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往往是暴戾程度越高，他们的奴性也就越强。因此，各种各样的专制暴君无一不深谙此道，想方设法将他们拉拢过来加以利用，比如恺撒必然会大受他们欢迎，另外还有卡利古拉、尼禄，马拉、罗伯斯庇尔、布朗热等。

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些具有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大众行为是主要的，但是，诚如我们上文中已经指出的，这些所谓的大众都是社会渣滓。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大众，他们不会像那些社会渣滓一样地丧心病狂，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劳动的权利。有时，他们确实可以从革命中受益，但他们从来就不会自己发动革命。革命的理论家对他们了解得少之又少，对他们亦不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传统而保守，旧观念根深蒂固。事实上，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一个国家之所以还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其实都是他们的功劳。在恐惧的作用下，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得极为懦弱而驯服，甚至在领袖的蛊惑和怂恿之下一时也会做出极端过激的行为，但是，民族传统的惯性力量不久就会再次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在革命开展过程中产生厌倦的原因。当革命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得过头时，他们的头脑中固有的传统精神将被激发出来而与之对抗。这时候，他

们就会冷静地考虑，寻求一位能够重建秩序的领袖。

这样的人民，对革命领袖的命令听之任之，同时又强烈地爱好和平，可见他们显然没有什么非常崇高或是复杂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通常是非常简单的，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生活，非常类似于独裁政府，这就是为什么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往往在无政府状态之后，独裁政治继之而起的真正原因。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开始出现，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再到后来，虽然在统治之下遭到了一些反对，但路易·拿破仑依然连续4次当选共和国总统：当他的政变受到了人们的认可，他又重新建立了帝国，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他的统治一直是稳固的。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这些事件当中人民确实受到了蒙骗，但如若不是因为革命的阴谋导致了失序和混乱，人民就不会被迫去寻求摆脱革命的方法。

如果我们想全面地理解人民在革命期间所扮演的各种角色，那么，这一章中所回顾的这些事实就不应该被遗忘。人民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是

不容小觑的，但是它与传闻中所想象的截然不同，传闻只能再现其生动性，至于其他方面就属于郢书燕说了。

## 第二卷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化

#### 一、人格的转化

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已经详尽地论述了某种关于人的性格的理论，如果对这一理论缺乏了解，我们就绝对无法理解某一时期，尤其在革命时期，人们在行为上的变化及其内在矛盾。在这里，我择其要点介绍如下：

每一个个体除了具有某些惯常的精神状态之外，还具有一些变动不安的性格：前者一般说来，只要环境不会发生变化，它就是稳定的，而后者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往往由突发事件引起。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所有环境的产物。整体的自我是由难以数计的小我（cellular egos）构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积淀物。通过组合，这些要素达成了某种平衡，只



要社会环境是稳定的，这一平衡就能持久而稳定地保持下去；一旦这种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譬如说突然爆发了动乱，那么平衡即将被打破，那些达到的平衡突然分崩离析，继之通过一种崭新的组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格。这一全新的人格将由其思想、感觉以及行为表现出来，这时我们会看到，同一个个体将发生惊人变化，简直就是前后判若两人。因此，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我们看到，诚实、敦厚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以友善著称的温文尔雅政府官员，竟然变得嗜血成性，残忍好杀。

所以，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左右，旧的人格很可能会被一种全新的人格所取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重大宗教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参与者看起来似乎与常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实际上却与我们并无多大分别；类似事件重复发生将塑造出同一种类型的人。

拿破仑对人性的这种特征了如指掌，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中，他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我们在做出政治决策时，偶然性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深刻意识到这个道理，我才能抛弃成见，对人们于动乱之中的所作所为并没

有求全责备……在革命期间，人们只能说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事；对那些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说三道四则有失明智……客观地理解人类行为确实困难……大众能够真正了解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吗？他们能自圆其说吗？事实上，随着环境的不同，他们表现出来的善恶大相径庭，甚至判若两人。

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正常的人格因素开始分解，这时，新的人格又该如何塑造形成的呢？新的人格形成有很多途径，但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心中对一种信仰有着强烈的执着追求，它为我们理解新人格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就像磁铁能将金属屑聚拢过来构成规则的曲线一样神奇。

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特别是在像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会清晰地观察和认识到新的人格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环境的变化捉摸不定，或者是非常微小，所以我们通常只能看到现实生活中个体所具有的单一人格。但在某些时候，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也会出现多种人格相互替代的现象。

这些人格之间可能是不相一致的，甚至是处于完全的对立状态。这种与正常情况相背离的现象，在某些病例条件下会变得相当突出。在病态心理学中，单一个体具有多重人格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我们可以参见莫顿·普兰斯和皮埃尔·珍妮特两个人所征引的案例。

在所有这些人格变异的例子当中，人的智力并没有什么异常，而是构成性格的诸多情感发生了改变。

## 二、大革命时期突出的性格因素

我们在革命中看到，社会的约束被打破后，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受到压制的情感暗中开始滋长，等待一个可以自由发泄的机会。

这些社会约束包括法律、道德以及传统，它们不可能完全被解除。在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那些社会约束很大程度上是在苟延残喘，而实际上它的压制力已经非常微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危险情感的恶性爆发。

在这些社会约束中最有力的约束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中大多数人的观察、体验和志愿的面貌，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遗

传性习俗，再没有比习俗更强大的纽带了。

这种民族性的影响限制了一个民族的变化，而且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它的作用超出了一切表面上的变化。

比如，从历史上来看，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在一个世纪之内似乎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它就由大革命转向恺撒主义，进而复辟君主制，接下来又产生了革命，最后一位新的恺撒应运而生。从表面上看，时局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然而，实际上整个从根本上仍保持原样，根本没有被触动到什么。

在此，我们无意深究国民性变化的局限，却不能不考察某些情感因素的影响，在革命期间，这些情感因素的发展变化导致了个体和群体人格的变异。在这些情感因素中，我将特别地提到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我们将考察它们在历史巨变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的案例。

## 1.仇恨

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心

理，就越容易发现那些情感现象的作用是惊人的，仇恨就属于这样一种情感，但它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情绪。对人的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情的仇恨深深地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对他们的敌人显示出极度的仇恨，而且对自己的同党也是憎恨的，正如最近一位作者所指出的：“要是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指控的话，那么，我们会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叛国者，他们总是夸夸其谈，既腐败又无能，干尽了暗杀的勾当，骨子里与暴君没什么两样。”我们知道，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心理，人们才相互迫害，相互残杀：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罗伯斯庇尔派等派别概莫能外。

产生仇恨心理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宽容，这些狂热的宗派主义者以虔诚的使徒自居，他们自以为绝对的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产生骄傲情绪，但是当所有的信徒都有了这样的想法时，他们只能是相互排斥，视他人的信仰为异端的见解。神秘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信念总是伴随着一种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的需要，这种信念对他们来说是绝不可更改的。所以一旦大权在握，大屠杀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果造成革命者处于分裂、对立状态的仇恨还可以具有一定的理性起源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如此持久，但是如果仇恨是出于情感的或神秘主义的因素，那么人们是不可能遗忘的，同时也是不可能宽恕的。即使派别不同，但是他们仇恨心理的根源是如出一辙的，即都表现出同样的暴力倾向。现有的资料向我们展示出，吉伦特派的做事风格并不比山岳派温和多少，它们是最早提出失势的党派应该被消灭政见的；奥拉尔先生指出，它们曾经还尝试着为“九月屠杀”进行辩护。不应该把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肤浅地认为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而应该看作是取得胜利的信徒运用抢来的权力来消灭其可恶对手的普遍做法。他们即使能够宽容那些在思想上与自己存在着巨大分歧的人，也绝不能容忍信仰上的差异。

我们从历史中得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往往在宗教战争和政治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必将置失败的一方于死地而后快，失败的一方是绝不可能得到任何宽恕的。从割断两百多名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喉管、屠戮了五六千罗马人的苏拉，到镇压巴黎公社，随即枪毙了两万多人的暴徒，这一血腥的法则都得到了屡试不爽的验证。过去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法则，恐怕未来也难逃这样的铁律。

信仰上的分歧并不完全是大革命中仇恨心理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些感情，如嫉妒、野心以及自私等，这些感情心理同样为仇恨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那些不同派别的领袖，之所以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断头台，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

此外，我们还应当记住，派别的分裂以及由此衍生的仇恨情绪似乎已经成了拉丁民族精神的构成要素之一。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就曾因此而丧失了独立，这一点给恺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任何一个城市都分裂为两个派别；即使是一个郡、一个村庄、一个家庭都与派系纷争脱不了干系。如果哪个城市在一年之中，没有发生武装袭击别的城市或是不曾全力抵抗外来的侵略，那反而让人感到奇怪。

由于人类现阶段还不可能进入知识的时代，所以，迄今为止控制和引导人类行为的还是感情和信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某军事院校的教授科林指挥官，对于仇恨这种情感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了如下评

述：

在战争中，仇恨是最能激发士兵的士气，鼓舞其战斗力的，普鲁士人凭借仇恨战胜了拿破仑。回顾一下那些最为壮观的演习、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如果它们不是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天才所创造的非凡杰作的话，那么，我们会不难发现，它们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激情而不是出于深谋远虑的筹划。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对德国人的仇恨，那么我们恐怕很难预料到1870年的那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科林指挥官也许还应该把日俄战争补充到他的评述中，由于日本人曾经在俄国人面前忍受过屈辱，所以日本人对俄国人怀有强烈的仇恨之心，或许这也算是日本人能够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一个原因吧，而俄国的士兵从一开始就对日本人怀有极度的轻蔑，根本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仇恨可言了，这正是俄国人失败的一个原因。

在大革命期间，确实存在大量有关博爱的言论，可这也是无济于事的。今天，这种言论更多了，“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团结”都已经成为现代各种政党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时惯用的流行



口号，可是，有没有人知道，在这些大话、套话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深刻的仇恨呢？它对我们现代社会又将构成怎样的威胁呢？

## 2. 恐惧

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乎和仇恨的作用同等重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个人所表现的勇敢无畏的士气状态与集体所暴露的胆小懦弱并行不悖。

我们在重温革命议会的历史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面对断头台，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总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显示出绝佳的勇气，但是，当暴乱者闯入议会，发出种种威胁时，他们又常常显得十分懦弱，宛如过街老鼠，对那些荒谬透顶的要求和指令言听计从，不敢违背。

在大革命期间，流行着各种形式的恐惧。其中最流行的恐惧就是怕被人指斥自己为温和派，国民公会的代表、公共检举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争先恐后地表明对手远不如自己更激进、更进步。恐惧是导致这一时期一切罪行的主要来源之一。要是真的出现什么奇迹，使革命的议会能够免除恐惧的话，那么，他们的举动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而革命本

身也就可能会向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 3.野心、嫉妒、虚荣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情感因素的影响都被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可容许的范围内。就先以野心为例，它必然会受到一种社会等级形式的限制。尽管士兵将来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但这只能是在长期的服役之后。而在革命时期，情况则会有所不同，士兵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将军，根本不需要等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机会论功行赏，加官晋爵，所以个别之人的野心急速膨胀，即使最卑微的人也都相信自己有超凡脱俗的能力，来胜任最高的职位，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所以，每个人的虚荣心忽然之间就被调动了起来。

所有的激情，包括野心和虚荣，一旦融入革命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于那些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人艳羡不已，而且这种羡慕之情是在不断增长的。

嫉妒心在革命时期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显得尤为明显。在这场革命中，民众对贵族的嫉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之前的中产阶级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

财富上已经超过了贵族，并且表面上看似已经与贵族身份越来越像，越来越融合，但他们依然有那种被贵族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种嫉妒心理引起了他们对贵族阶级由衷的愤恨和仇视。这种心理状态使得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地从潜意识里成了平等这一哲学教条的热诚拥护者。

受到伤害的自尊和嫉妒，因而产生了怨恨，由于在当今这个社会，贵族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可能很难想到这一点。国民公会中的许多代表——如卡里埃、马拉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奉命于大贵族门下，他们不甘于寄人篱下、苟延残喘般地生活，因此他们视其为生平耻辱，由耻辱逐渐转化为仇恨；出身寒门的罗兰夫人终生不忘这样一件事情，在旧制度的统治之下，她和她的母亲一同应邀到一位贵妇家里去做客，结果就餐时她们被贵妇人安排到仆人的席位上，这对罗兰夫人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

哲学家里伐罗尔的一段话曾经被泰纳征引过，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因受到了伤害的自尊和嫉妒而产生的仇恨对革命的影响。

他写道：“这个民族到底被什么激怒了呢？既非繁重的苛捐杂税，亦非国王的密札，也不是

权力的滥用；不是国家的管理者们犯了过错，更不是司法机关效率的迟缓；事实上，引起人们深仇大恨的恰恰是贵族阶级对平民阶级的偏见和盛气凌人。这一个事实最能说明这一点：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钱人，也就是那些对贵族因嫉妒而怀恨的人，利用了城市里的贫苦市民以及乡下的农民阶级起来造反。”

这一言之凿凿的判断居然部分被拿破仑的格言所验证，他说：“革命本是由虚荣心造就的，所谓自由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 4.热情

发动革命的始作俑者的热情，丝毫不输于那些虔诚地信仰穆罕默德的信徒，而且，第一次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的确有想过要建立一种宗教。他们试图彻底粉碎一个旧世界，从而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这一诱人的幻想比什么都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新教义宣称，平等和博爱将把所有的民族都带到这个永恒而幸福的国度里；未来的新生世界也将被沐浴在纯粹理性的光辉之中。于是，人们被这种教义深深地吸引，热情也忽然随之高涨不已，依据最光辉、最雄辩的原则，翘首企盼黎明的到来。

但是，暴力很快就被这种热情所取代，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改革者提出的教义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人们不可能长久地沉醉在梦幻的世界中，当幻想觉醒的那一天，可能也就是革命灾难性的一天。我们很容易想象，大革命的使徒们在看到身处的现状与自己梦想的情境完全不同时，他们的内心会是怎样的雷霆万钧，怒不可遏。革命者原本试图将过去全盘否定，拒绝传统，全面地改造人类以实现完全不一样的新生，但过去的阴影已经扎根于人们的心中，非但挥之不去，反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并且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也开始对改造产生了抵触情绪。在此情况下，改革者可谓是步履维艰，但是又绝不会屈服，于是他们将借助暴力手段，强制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样的专政局面势必会让人们对旧制度产生无限怀念，于是，最后发生了复辟也是在所难免。

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激情虽然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革命议会中并不能持续维持太长时间，但它却能够在军队中长久地持续而不衰退，并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源泉。实事求是地说，在法国还没有成为共和国的时候，大革命的军队就已经是共和主义者了；在君主专制复辟、共和政体被放弃之后很久，军队还一直坚持共和主义的信念。

回顾本章的内容，我们发现，人格的变异通常是以某些共同的渴望和环境的变化为条件的，它们最后会表现为少数几种非常同重化的心理状态。仅以比较典型的心理状态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4类：雅各宾心理、神秘主义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 一、神秘主义心理

我们姑且将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和集体逻辑的影响放在一边，而只考虑神秘主义因素的重大影响，神秘主义的因素在许多革命中大畅其风，法国大革命尤其如此。

神秘主义逻辑的主要特征就是它为那些超人格的存在或力量赋予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些超人格的存在或力量则常表现为偶像、崇拜物、文字、口号等形式。

神秘主义精神是所有宗教和绝大多数政治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抽出了宗教和政治信仰赖以为基础的神秘主义因素，那么，这些信仰，通常就会行将就木，土崩瓦解。

神秘主义逻辑常常嫁接在感情和激情的冲动之上，它是大型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源。如果说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人寥寥无几，那么，时刻准备着为自己崇拜的神秘偶像而献身的人却比比皆是。

大革命的信条很快就激发了一股神秘主义的热潮，这与此前那些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狂热几乎毫无二致。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将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状态的发展方向进行彻底改变。

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所表现出的野蛮、狂热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的神秘主义精神与宗教改革时代的新教徒相比殊无逊色。雅各宾恐怖专政时期的领袖人物——库通、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等——就是大革命的忠诚信徒。正如波利提斯为了宣扬其信仰而捣毁异教的祭坛一样，这些人对改造世界怀有坚定的梦想；他们更将他们的激情散播于整个地球。他们坚信，自己那些无与伦比的信条足以令一切君主为之颤抖，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欧洲的国王宣战。坚强的信仰远胜于那些让人充满怀疑而逡巡不前的说教，这种信仰也激励着他们在与整个欧洲的战争中屡战屡胜，最终颠覆王权。

大革命领袖的神秘主义精神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能够显露出蛛丝马迹。罗伯斯庇尔本人就坚信他从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得到了无限力量的支持：他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试图让听众相信上帝“在开天辟地之初就早已有过预示，即颁布圣令，实行共和政体”。他还以一种国教大祭司的角色，鼓动国民公会通过一条法令，宣布“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的信念早已在法国人民心中得到了认可”。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仪式上，巍然高居在国王宝座上，进行他冗长的布道。

凭借这股神秘主义因素而产生的激情，由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最后倒承担了一个政务委员会的所有功能。马克西米利安宣布了“最高主宰（great being）的观念，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垂怜关爱着那些受到压迫的下层无辜者，审判惩罚那些高傲而自负的罪人”。

那些所有批评雅各宾正统派的人都被视为异端而将被革出教门，也即是说，他们将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等待他们的将是断头台。

以罗伯斯庇尔为典型代表的神秘主义心理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也没有随之而销声匿迹，在今天法国的政治家当中仍然有许多具有同样心理状态的人。他们的思想已不再受旧宗教信仰的左右，



但罗伯斯庇尔式的心理却在他们的心中牢固地树立了起来，并且愈加坚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将自己的政治信条以强迫的方式施加于人。能够传播他们的信仰的方式即使是杀戮，那么他们通常也会在所不惜的。这些政治家手中一旦掌握了大权，其布道的方法就会同一切时代中所运用的神秘主义方法完全一样。

因此，罗伯斯庇尔至今仍有众多的信徒就不足为奇了，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并没有同他本人一道殒命断头台，类似的思维模式在数以千计的人身上再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罗伯斯庇尔式的思维及其最后的信徒就不会消失。

长期以来，一切革命中的神秘主义都被大部分历史学家，时至今日，他们仍然试图借助于理性逻辑来解释与大量理性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在我前面已经引述过的一个段落中，拉维斯先生和朗博先生认为，宗教改革是“个人自由反省的结果，它向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极为虔诚的良心和一种大胆而勇敢的理性”。

诸如此类的运动，永远不会被那些认为它们起源于理性的人所理解。曾经震撼世界的那些信仰，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规律。它们的形成与理

性无关，甚至可以说是与理性完全相反的因素塑造了它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巫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唯灵论等，看起来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信仰形式，但我有必要再重申一遍，它们具有相同的神秘主义和情感基础，并遵循着与理性毫不相干的逻辑形式。它们的历练恰恰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理性既不能创造信仰，也不可能改造信仰。

在我们当代的政治中，信徒式的神秘主义心理状态亦不罕见，在一篇与我们最近的一位大臣有关的文章当中，我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现在，我就从杂志上摘录一段如下：

人们可能会问，应该把某先生划归到哪一类当中去呢？比如，我们能说他是属于没有信仰的人吗？不，绝对不能！当然，他没有接受现存任何一种信仰：无论是罗马的天主教还是日内瓦的新教，他一并咒骂；他拒绝一切传统的教条和任何一支的教会。但如果他要是能够扫除一切，并在这样一个空白的基础上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的话，那它将比其他所有的教会都独断专行；并且，他的宗教裁判所在残忍与不宽容程度上，比起臭名昭著的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来，将毫不逊色。

他说：“我们不能容忍学校保持中立这类的事件，我们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能力对学校实行管制，哪怕因此而成为教育自由的敌人。”如果说他还没有建议埋好火刑架，堆起柴堆的话，那也仅仅是出于礼貌上的考虑，不管他是否愿意，对于此点他还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不过，即使他已经不能在人的肉体上进行任意的惩罚，但他依然可以调用世俗的权力来宣判他人的学说为死刑。这就是宗教大法官的立场主张。对于思想，他也发起了同样猛烈的攻击，这个自由的思想者拥有无限广阔的自由精神，以至于世间一切哲学他都拒绝接受，在他看来，那些哲学不仅是荒谬的、怪诞的，而且更是罪恶的。他甚至不可一世地认为只有他自己才可以绝对地掌握真理，正是由于他是如此自负，以至于在他看来，有任何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是面目可憎的魔鬼和全体国民的敌人。他对于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哪怕是他个人的观点仅仅是出于主观臆想；他当然更不会怀疑自己这样考虑问题可能比别人更加荒诞可笑：他们往往是不理智地认为只要别人否认神性就断定他们对神圣的权力有觊觎之心，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是假借否定神性，而实质上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建神性——这只能使人们对过去的神更加怀念。某先生可以说是理性女神的一个信徒，他制造了一个摩洛神，一个让人难以忍受

的神，因为他需要将人当作祭祀品。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同道，无论是谁都不配享有这种思想自由，这就是某先生的自由思想。这一见解的前景确实是吸引人的，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为了实现它已经打碎了太多太多的偶像。

为了自由的缘故，让我们来祈祷吧，所以我们应该警惕了：千万不能让那些丧心病狂的狂热者最后成了我们的统治者，如果是这样，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假设理性的无声力量可以胜过神秘主义的信仰，那么讨论革命思想或政治思想的理性价值就毫无意义了，但人们对此依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们也仅仅是对它们的影响感兴趣，至于说假想的人类平等、人性本善，以法律的手段重建社会的可能性等，诸如此类的幻想理论是否已经被观察和经验所揭穿，那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怎么说，这些空洞的幻想却一直激励着人们去追求，是人类目前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行为动机。

## 二、雅各宾心理

尽管“雅各宾心理”（Jacobin mentality）这一术语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正式的分类，但我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很洗练地概括了一种

得到明确界定的精神集合，足以形成一种真正的心理类别。

这种心理状态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起到了重大的主导作用，然而这并不是说这种心理状态是他们所独有的特征，直到今天，在我们政治生活中最为活跃的要害仍然是这种心理状态。

我们已经在前面系统地考察过的神秘主义心理，其实是雅各宾心理的一种实质性的要素，但是，雅各宾心理并非由它单独构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考察其他那些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因素。

雅各宾党人完全不觉得自己怀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心理，反而恰恰相反，他们一直标榜自己是坚持着以纯粹理性作为思想指导的。他们在整个大革命期间，都在一直不断地强调理性，将理性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向导。

大多数历史学家对雅各宾党人的精神状态都采用了这种唯理主义的观点，甚至连泰纳也不例外，他在探究雅各宾党人大部分行为的根源时，也误用了理性。不过，在他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著述中，也包含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现的真知灼见，并且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这些见解是非常出色

的，这里我摘录出其中一段最为重要的部分：

在人类的本性当中，那些过分的自爱或是教条论证并不罕见，在所有的国家中，雅各宾精神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就是凭着两大根源，常常是秘而不宣却又坚不可摧……20年前，当一个年轻人面临这个世界时，他的理性与他的自尊几乎同时被激发了出来。首先，不管他将来要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比起纯粹的理性来，这一社会都是值得可鄙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固守不变的，它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便的需要，经过长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并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那些年轻的理性主义者总是对于那些古老而神秘的建筑耸耸肩，不以为然。他们总以为选址是荒谬的，其结构支离破碎，其不便之处显而易见……很大部分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想要立志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轻狂傲慢的心态和举止都或多或少地沾上了些许雅各宾派的习气……社会腐败导致了雅各宾主义的泛滥，这就好似发酵的土壤对于菌类的繁殖有很大的帮助一样。思考一下这一思想可资纪念的精彩耀眼之处吧，是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政治演讲，立宪派与国民会激烈的雄辩和争论，还是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冗长的言辞或是虚伪的政治报告？从来没

有人信誓旦旦地讲过那么多，然而真真切切地说得这么少；无聊的官场空话和膨胀到了极点的重点淹没了千篇一律的演讲之下可能存在的任何真理。雅各宾派的头脑当中充满了对海市蜃楼的空幻追求；在它的眼里，这些空想远远比实实在在的生活更加真实，它唯一能认同的就是这些虚幻的空想，它会以其全部的真诚阔步行走于空想的追随者的行动之前。成千上万的形而上的意志和信念都是它个人意志的虚幻想象，人们异口同声地，甚至不遗余力地支持它，而它则如鸡群中的仙鹤，就像是一场胜利与欢呼的合唱，其他声音只不过是它声音的回应而已。

在对泰纳的描述表示钦佩的同时，我想他对雅各宾党人的心理并没有完全切中要害。

不管是在大革命期间，还是在现在的今天，雅各宾党人的真实心理都是诸种要素的集合，如果我们想认识到它的功能，就必须先了解一下它的构成要素。

这一分析将首先向我们揭示，雅各宾党人绝不是理性主义者，而是信仰至上者。他们的信仰不可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他们用理性来掩饰其信仰，尽管他们的言论中到处都充满了理性主义的陈词滥调，但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当中却远

远背离了其理性口号。

一个雅各宾党人，如果真有人对于理性的言辞与其思想行为相一致，有时倒确实可以听到散发出理性的声音，可是通常就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而言，从大革命开始直到今天，雅各宾党人从来就没有本着理性的原则而有所行动，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拥有了如此神奇的力量。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雅各宾党人为什么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视野和度量过于狭隘，从而使他们对理性的东西表示出无为抗拒强烈的冲动，因而只好任其支配。

当然，仅仅由于理性不足和激情有余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构成雅各宾心理，这里面自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激情只能支撑起信念，却不能创造信念。既然真正的雅各宾主义者拥有坚强的信念，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在支撑着这些信念呢？这里，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的神秘主义因素就发挥其用武之地了。雅各宾党人属于神秘主义者，他们凭借着语言和口号的魔力，用塑造新的神祇取代了原有的上帝。这些虔诚的徒众为了侍奉这些严厉的



神祇，并不在乎采取最激烈的措施。当代的那些雅各宾主义者所通过的法律其实正是为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雅各宾心理的特征是极端狭隘而狂热的，事实上，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狭隘而僵化的心灵，对于任何的批评，它是绝不可能接受的，除了信仰，它从不考虑其他的任何事情。

神秘主义要素和情感因素占据了雅各宾主义者的心灵，从而使他们的头脑变得过于简单。他们只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表面联系，但若是让他们从根本上分清异想天开的幻觉和现实的存在，这是绝不可能的。他们对事物的因果关系视而不见，只知道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梦想当中，以致达到了无法自拔的境地。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雅各宾主义者并没有超脱于其逻辑理性的发展之外，由于他们对这种逻辑知道得很少，因而常常变得十分危险。雅各宾主义者的那点极其微弱的理性在他们的冲动面前早已灰飞烟灭，在有识之士视为穷山恶水，不敢贸然前行的地方，他们却大大咧咧地走了过去。

因此，尽管雅各宾主义者都是些口若悬河之

辈，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受理性引导的。当他们自认为是在接受理性引导的时候，而实际上他们正受着激情和神秘主义的支配。同所有那些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疑，因而被信仰迷失了的人一样，他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被自己所束缚的困境。

一个真正好斗的空想家，与我们前文所描绘的加尔文教的信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被信仰蛊惑着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不惜任何代价，他们狂热地认为，凡是与他们的教义相背离的人都应该被处死。加尔文教徒与这些激动人心的演说家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他们像雅各宾主义者一样，并不认为自己正受着神秘主义的支配，坚定不移地相信理性才是自己的唯一指南，但实际上，他们却不得不受神秘主义和激情的奴役。

真正信奉理性主义的雅各宾党人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如果雅各宾党人被视为理性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只能为理性感到悲哀；但另一方面，充满激情和神秘主义色彩的雅各宾党人则很容易理解。极为微弱的理性力量、强烈的激情和浓厚的神秘主义，正是构成雅各宾精神的三种心理要素。

###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 一、革命心理

我们刚才已经指出，神秘主义要素只是雅各宾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不是全部。现在，我们就来观察一下这些神秘主义因素是如何构成另一种很容易定义的心理状态，即革命的心理状态。

从历史上看，在任何时代的社会中，都会包含一些浮躁而不稳定的心理情绪，带有这种情绪的人常常对社会有所抱怨和不满，他们不安于现状，随时准备揭竿而起，反对一切现有的秩序。他们似乎对犯上作乱有特殊而浓厚的兴趣，如果有某一种神奇的力量刺激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不惜铤而走险。

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的来源常常是个人对其所处环境的错误判断和适应，或者是极端的神秘主义，当然，它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气质问题，或者仅仅出于病理上的原因。

反叛的心理需要（the need of revolt）可以体现出极为不相同的强度，有些仅仅是直接针对人和事，用言辞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而有些则表现得比较强烈一些，达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程度。有时候，个人会形成一种自己难以控制的疯

狂。在俄罗斯，我们可以到处看见这样的疯子，纵火或向人群中扔炸弹这样的暴行对他们来说简直太稀松平常了，最终他们甚至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暴动，比如，苦行派以及其他类似的教派就是如此。

这些天生的反叛者，一般都对暗示的影响感触相当敏感，并且他们的神秘主义心理总是被一些固定的思想所支配。尽管他们在行动上活力四射，但事实上，他们内心的性格是极为软弱的，甚至不足以抵挡内在的冲动。他们被神秘主义精神冲昏了头脑，并以此为借口企图替自己的暴行进行遮掩和辩护；这种神秘主义精神亦使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改革者。

毋庸置疑地说，每个社会都必然会产生一些反叛者，但是在正常的年代中，他们常常受到法律、环境的约束，即一般社会规则的约束，因此，他们并不显得引人注目。但是，一旦发生动乱，这些约束和限制就会忽然松弛下来，并且叛乱的发生刚好适应他们内心自由发泄的心理，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合适的温床，于是，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革命的目的和动机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这时他们也不管是红旗还是白旗，或者是国家的解放之类隐约听说过的目标，他们都会盲目

地愿意为之献身。

革命精神在有的时候并不总是被推向危险的极端，如果它不是受情感或神秘主义冲动的支配，而是源于理性和智识，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有时候，传统和习惯的力量之强大程度不是我们所能预料得到的，以至于它们甚至将文明束缚住了，这时，就需要由类似于革命的精神来打破这种枷锁的束缚，从而推动和引导知识上的革命。科学、艺术以及工业等方面的进步往往更加需要具有这种冲决精神的人，伽利略、拉瓦锡、达尔文、巴斯德等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即使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必要拥有如此众多的具有这种革命精神的人，但是一些这样的人的存在还是非常必要的，若非如此，人类恐怕现在还过着洞穴生活，过着那种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旧石器时代的生活。

这种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和气魄是一种非常少见的能力，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能够使人足以摆脱世俗陈腐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事物的表面看穿事物的本质。这种形式的革命精神是具有独立创造性的，而此前我们讨论的那种革命精神带

有强烈的破坏性。

因此，革命心理可以被理解为个人在生活中常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它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一旦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和范围，它就会变成一种危害性极强的病态心理。

## 二、犯罪心理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总有一些社会渣滓在拖累着它，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中有的是退化了，有的是不能适应社会，还有的就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污点。到处闲窜的流浪汉，沿街乞讨的乞丐，逃避惩罚的逃犯、小偷、刺客以及安于现状的下层饥民，都构成大都市的犯罪群体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拖累文明的社会渣滓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警察的约束和管制。但一进入革命期间，这些束缚和管制就会完全地无影无踪了，而他们就会变得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潜藏在他们内心的本能一瞬间得到任意的释放。这些社会糟粕便成为在任何时代的革命中所要补充的新生力量，这些人只是一味地热衷于烧杀抢掠，他们不会将自己宣誓要捍卫的事业放在心上；如果他们觉察出在反革命的对立阵营中可以更加自由地获得杀人越货的机会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靠对方，阵前倒戈。

在这些可以明确地称之为罪犯的人——任何社会都无法根治的痼疾——之外，我们还得留心这样一个半罪犯状态的阶层：那些偶尔做些坏事的人，只要既定秩序还有足够的能力抑制住他们，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是，一旦这种对既定秩序的恐惧稍有减弱，他们就会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去。

这两类犯罪群体，即惯犯和偶尔性的犯罪，为社会构成了一股很不安定的力量，它们除了给社会制造混乱之外，几乎是一无所能。因此，所有的革命者，即一切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创立者，常常基于这一点，想方设法地寻求这些人的支持，以便于他们的图谋能够达到成功。

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这些带有犯罪心理的人，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强大而剧烈的作用。在所有发生的暴乱中，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到最前面。某些历史学家曾满怀敬意地记述过如下的场景：英勇无畏的人民群众手持长矛——有时长矛的尖上还挑着刚刚被他们砍下的头颅，他们勇敢地冲入议会大厅，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国民公会。

其实，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所谓主权人民的代表，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除了一小部分头脑简

单、完全顺从于他们领袖的人之外，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社会糟粕几乎占据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诸如“九月屠杀”、德郎巴勒公主被杀之类的暴行，他们都是罪魁祸首，真要追究起责任来，他们是难辞其咎的。

从当初的制宪会议到后来的国民公会，这些会议都曾受过他们的胁迫，而且他们对法国的蹂躏和糟蹋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如果说某些奇迹会发生，及时将这支犯罪大军剪除的话，大革命的进程或许会因此而改变，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景象。自从大革命开始兴起，又到最后的衰落，这些人始终都在以鲜血玷污大革命。对他们而言，理性在他们的心中泛不起一丝波澜，反而恰恰相反，他们所做的种种暴虐的行径表明了其对理性的反对。

## 第四章 革命大众的心理

### 一、大众的一般特征

无论为何产生革命，但假如它没有渗透到群众的灵魂当中，它就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就这个层面来讲，革命体现了大众心理的一个结果。

我在另外一本书中已经详尽地论述过集体心



理，但在这里我还是有必要对它的主要法则再次重复论述一下。

个人在作为大众群体的一员而存在时，与他在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时具有某些很大不同的特征，他有意识的个性将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埋没。

个体不一定需要实质性的接触才可产生大众心理，由某些特定事件所激发的共同情绪和激情，一般情况下就足以实现。

集体心理极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就形成，它常常表现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集合，它的主要特征是它完全受一些无意识的因素左右，并且服从于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

在群众所具有的另一些特征中，我们还应当注意这样几点，那就是他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蛊惑而轻信别人，对事物也非常敏感，他们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而且往往不会注意到理性的影响，因而也不可能做出反应。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往往就可以很容易地将他们说服，他们对事实和一贯是忽略掉，不加考虑的。群众对任何事情都深信不疑，在他们的眼里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群众对事物的敏感是极其强烈的，所以，他们的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总是非常夸张。尤其是在革命期间，这种夸张更加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是一点小小的刺激，都可能成为他们采取最狂暴行动的导火索。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轻信本就已经严重，更何况是在革命时期，那就显得尤为严重，痴人说梦话般的呓语都会让他们深信不疑。阿瑟·扬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在克莱蒙附近的水泉处游历，在半路上，他的向导忽然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原来，他们也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竟以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来这里准备引爆小镇的。那个时候，那些关于王室的可怕谣言到处流传散布，最后越来越夸张地将王室说成是盗尸者和吸血鬼的聚集区。

种种的特征表明，群体中的个人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已经堕落到一个非常低的层次。他沦为了一个野蛮人，野蛮人的一切性情和缺陷他都具备了，突如其来的狂暴、热情和英雄主义都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以智力来说，群众是无法比拟个人的；然而就从道德和感情上来说，群众则可能要比个人略胜一筹。群众很容易就犯下罪行，正如他们很容易就做出自我克制一样。

个人的特性在群体中很快就会消失，而群体

对个人施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可以使吝啬的人都会变得无比慷慨；使对一事物存在怀疑的人立刻变成忠贞不贰的信仰者；使一个最诚实守法的人沦落成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也可以使一个懦弱胆小的人变成一个英勇无畏的勇士，诸如此类的转变在大革命期间遍地都是，早已屡见不鲜了。

在陪审团或国会面前，整个集体人做出的判决或者是要颁行的法律，都是其中的个体做梦也想不到的。

受到集体的熏染和影响，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构成单位，他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样造成最突出的后果就是他们在感情和意志上会趋于同质。这种在心理上的同质化给予了群众一种不一般的力量。

一个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仇恨、狂怒或是热爱之类的情感在叫嚣声中迅速传播开来，并且很快就会得到支持，反复强化，从而形成了在精神上的统一体。

这些同质的情感和意志源于何处呢？很明显，它们是通过群体中相互感染而传播的，但是感染的源头在哪里？因此，这种感染在发生作用

之前肯定会先有一个声音的呼唤，即有一个出发点。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没有鼓噪的源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是不会迈出固有的藩篱的，他们就是一盘散沙，寸步难行。

如果我们具备了大众心理的知识，能够深入了解它的规律，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解释在大革命中的诸多因素，也很容易理解革命议会的种种行为及其单个成员的转变。在受到集体无意识力量的推动的时候，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图往往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却往往投票赞成了那些他们原本反对的决议。

尽管有时候一些眼光独到、手段高明的政治家会凭借直觉将集体心理的定律识破，但政府部门中的大部分人对这些定律从来就缺乏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也正是这方面的原因，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就轻而易举地被赶下了台。我们了解到，有些政府居然会莫名其妙地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动乱所颠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路易·菲利普的君主政体，这不禁令我们感到很不可思议，然而事实上，这都是忽视集体心理造成的，其危险后果就很明显了。1848年法国的军队拥有足够的战斗力来保护国王，但是当人民群众和军队掺杂在一起的时候，法军统帅依然没有理解到这将会意味着什么。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军队在受到群众的暗

示和传染的作用下，法军的统帅竟茫然无措，以至于最后仓皇离职。原因就在于他不知道群众对威信的敏感度有多大，因此实力的展示会给他们留下入木三分的印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时，这样的展示可以立即镇压反对派的示威。同时，他也对这样一个事实忽视掉了，即所有的集会都应该立即被驱散。所有的这些教训早已经被历史经验所验证，但在1848年，却没有人对它加以重视。在大革命时期，谁又能真正地理解大众心理呢？

## 二、民族精神的稳定性如何限制大众心理的摇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就好比是一个群体，这一个群体具有某种特性，但民族精神或民族心理又限制了这些特性的变动。民族精神具有一种确定性，而群众的短暂心理是不具备这种确定性的。

当一个民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它的传统精神以后，传统精神就会潜移默化地控制了群众精神。

一个民族与群众有所不同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是由一些各不相同的群体聚集而成的，而这些

群体的利害好恶又有所不同，而严格意义上的群众是由五花八门的社会最小单位——个人组成的。譬如在一次群众性集会中，则必然包含了各种各样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个人。

一个民族偶尔会像群众一样，易变而波澜起伏，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它的易变性、热情、狂暴以及毁灭性的背后，民族精神仍然凸显出它极为顽强和保守的本能。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革命及其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里保守精神是如何最终战胜破坏精神的，一个又一个政府体系被人们打破了，然后人们又一个接一个地将它们恢复。

种族心理，也即民族心理，它与大众心理有所不同，它不太容易发生变化。对民族心理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比较缓慢的（如会议、杂志、书籍、演讲等），而说服民族心理的原则不外乎标题中已经列出的那些，诸如重复、断言、感染和声望等。

精神的传染在有的时候可能会迅速地蔓延到整个民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由一个群体感染另一个群体。宗教改革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法国传播的。

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它是不会像群众那样容易产生激动的，但是有一些事件会例外，比如国家遭受了耻辱、面临着外敌侵略等，这些事件很可能会立即唤醒这个民族。这种现象在大革命时期中已经屡见不鲜了，特别是当布伦瑞克公爵在宣读他那篇傲慢而放肆的宣言时，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骤然达到了顶峰。当公爵企图以武力震慑这种民族意识时，他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对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布伦瑞克公爵的此举不但对路易十六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他本人也是引火烧身，因为他的干涉激起了全法国人民的愤怒，激化了与法国人民的矛盾，这使得人们迅速组建一支义勇军奔赴战场。

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这种整个民族同仇敌忾之情通常是在突然之间爆发。当拿破仑在做出大举入侵西班牙和俄罗斯的那一刻，他就低估甚至是忽视了这种热情将会迸发出的力量。一群乌合之众的肤浅心理可以很容易就被瓦解，但是在历史悠久的民族精神面前却常常变得束手无策。俄国的人民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天生粗野且狭隘，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然而，当他们听到拿破仑要入侵的消息后，就犹如脱胎换骨般，仿佛立即变了个人似的。我们只要读一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妻

子伊丽莎白所写的一封信，就不得不信服这个事实。

自从拿破仑到达我们边境，这一消息马上就在俄罗斯全境传播开了。在这样广阔而浩瀚的疆域内，一则消息竟然能够同时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并且引起整个帝国子民强烈的愤怒，这种愤怒的呐喊声一旦响起，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我深信，即使在地球的那一端都可以听到回声。随着拿破仑的进军，这种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那些丧失了全部财产或几乎失去全部财产的老人说：“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决不能接受耻辱的和平。”那些亲人在军队里服役的妇女将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她们所畏惧的，仅仅是耻辱的和平。和平虽然美好，也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这种和平目前对俄罗斯来说无异于一张催命符，在这一点上它是绝不会有所退步的；沙皇本人没有想过与拿破仑媾和，而且即便有这种想法，群众的民族意识也不能容忍他这样做。这就是我们的英勇立场。

与此同时，王后还讲述了这样两个故事给她的母亲听，这两个故事会加深我们对俄罗斯人顽强的抵抗精神的了解。

在俄国的首都莫斯科，一些不幸的农民被法



国士兵抓住了，他们企图强迫这些人留在自己的部队里服役。法国士兵在他们的手上打上了戎装战马的烙印，以防他们逃跑，其中一个农民问他们这个标志所代表的含义，于是法国人告诉他，这就说明他已经是一个法国士兵了。这位俄国农民惊呼道：“什么？我是法兰西帝国的一名士兵？我怎么做法国人的士兵？”说完，他立即拿出一把短柄斧子，把烙有印痕的那只手砍下来，并把那只断手扔到在场的法国士兵脚下，狠狠地对他们说：“拿走吧，那就是你们所要的标志。”同样也是在莫斯科，一些村民成功袭击了法国运送粮草的部队和正规部队的分遣队。法国人抓住了其中的二十个农民，为了使俄国农民对他们产生惧怕，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他们希望用杀一儆百的方法来震慑其余的村民。因此，他们让那些农民靠墙站成一排，并用俄语宣读他们的判决：如果他们能跪地求饶，臣服于法兰西帝国的话，还有机会挽回自己的性命；否则，他们将被处以死刑。法国人开枪将他们中的第一个人打死了，他们在等待着其余的人在恐惧中向他们求饶，答应他们不敢再对法军有所反抗。但适得其反，俄国的农民在枪口之下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们就向俄国农民继续开枪，打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最后将所有的人都杀死了，但那些农民没有一个人打算向敌人摇尾乞

怜，磕头认罪。因此在俄罗斯，拿破仑一次也没有体验到“褻渎”给他带来的快乐。

我们不得不说，对于大众心理的种种特征，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多多少少地免不了会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人们总是对那些虚无缥缈的存在——如政府、伟大人物或神祇——坚信不疑，并相信它们拥有可以任意改变事物的魔力。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偶像崇拜的强烈需求，而这种神秘主义心理恰恰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教义，人们的心中必须要有一个进行崇拜的对象。因此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人们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时，他们会迫切企盼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整个民族也同群众一样，很容易由崇拜某一个对象发生到后来转变为憎恨，不过这需要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在某个阶段被人所崇拜，被视为救世主或民族英雄，可是最后他又受到人们无情的诅咒和憎恨，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里，大众对政治人物的态度发生逆转的情况已经再寻常不过了，克伦威尔在盖棺定论之后，他生前死后的荣辱变幻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 三、革命运动中领袖的作用

就像我们所强调的一样，不论哪一种类型的群众——同质的或是异质的，不管是议会、民族，还是俱乐部等，当他们中间还没有一个领袖站出来领导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团结起来的，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会采取共同的行动。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生理学上的实验来证明，在其他地方，群众的无意识集体心理与领袖的心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领袖将单一的意志赋予群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领袖尤其钟爱以暗示的方式来蛊惑和影响群众，他所激发的这种暗示方式直接决定着他的成功或者失败。一个集体对暗示的服从程度可以通过许多实验得到证明。

通过领袖暗示的影响，群众所做出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镇静或狂怒，罪恶或英勇，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暗示偶尔也激发出理性的一面，但这种理性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而已。事实上，群众是很难朝着理性的道路行走的；只有以想象的形式激发的情感才唯一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

群众由于受到不同的领袖的影响和刺激，往往会做出截然对立的过激行为，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群众对埃贝尔派、吉伦特派、丹东派以及恐怖主义者的相继胜利和倒台，都感到万分欢欣鼓舞。因而我们从中可以掌握一点，那就是群众对这些走马灯似的政治事变根本没有清醒的了解，至于这些事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从长远来看，我们只能懵懵懂懂地认识到这些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幕后的操纵者。如果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研究一下，那么我们会很深入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时我们就会看到，领袖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一场极为激烈的群众运动。在这里，我们对邮电工人罢工或是铁路工人罢工之类小的事件先不进行考虑，因为，在这些事件中，主要是雇员对于现状的不满，而群众不会对它产生什么兴趣。我们姑且举一个例子，观察一下少数几个社会主义领袖是怎样在巴黎平民里面挑起一场群众骚乱的。费雷尔在西班牙被处以死刑后的第二天，尽管法国民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费雷尔这个人，哪怕在西班牙，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他的死刑。但在巴黎，少数几个领袖就借此事件煽动起一支民兵冲向西班牙大使馆，并打算将大使馆焚毁，所以政

府不得不派出一部分卫戍来保护大使，尽管这些攻击者被成功地击退了，但是仍然有些商店被他们洗劫一空，而且还设置了一些路障，最后肆无忌惮地扬长而去。

无独有偶，领袖的巨大影响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里也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明。最后，这些领袖猛然意识到焚烧外国使馆所酿成的后果的危险性可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第二天他们又改变了行动策略，以和平的示威运动取代之前的暴行。群众对于领袖自然是无不从命，就像起初他们接受指令发动暴乱一样。这两个事例最能体现出领袖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群众在领袖面前的温顺、驯服了。

从米什莱到奥拉尔，那些历史学家，都认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革命大众照样能够行动自如，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革命大众的心理。

## 第五章 革命议会的心理

### 一、革命议会的心理特征

像一个国会这样大的政治议会，实质上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往往派系

林立，政见不一，所以，它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行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由于这些被不同利益驱使的派别的存在，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议会是由一些下级群体所构成的，这些异质的群体只会服从于各自的领袖。大众心理的规律，其作用的发挥只限于这些派别内部；这些不同派别在议会中根据同一个目标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不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出现例外情况的。

每一个政治派别在议会中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人一旦成了某个派别的一员，他个人的意志将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意志，即使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与集体意志是相违背的，他也必须要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维尼奥在路易十六受到审判的前夕，还在强烈地谴责投票赞成路易十六死刑的建议，但是，在第二天他却双手赞成。

将那些摇摆不定的意见确定下来就是一个群体所产生的作用，当一切软弱无力的个人信念一旦转化为集体信念，就会变得坚如磐石。

在偶尔的情况下，拥有巨大威望的领袖或是非比寻常的暴力，可以在议会中对所有的派别产生影响，从而将其他派别也吸收进自己的派别当

中。比如，在一小撮领袖的影响之下，国民公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通过了那些与自己意志背道而驰的法律。

在一些活跃的派别面前，集体对此不得不被迫做出适当的让步。在整个大革命议会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那些议员尽管可以对国王指手画脚，任意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但在暴民领袖面前，他们又犹如过街老鼠般胆小怯懦。当飞扬跋扈的领袖指挥着一帮狂热之徒，疯狂地冲进议会向议员们发出威胁的时候，这些议员往往是当场就投票通过了那些荒唐透顶、破绽百出的议案。当一个议会一旦具备了群众的特征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像群众一样，它的情感也会步入极端。它一方面表现得暴虐至极，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得胆小如鼠。一般来说，它在弱者面前总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在强者面前，它又显得低声下气，奴性十足。

当初，年轻而意气风发的路易十六手挥着鞭子，发表他简短的演说时，议会对他是何等的谦恭卑下，大气都不敢出声；然而就在路易十六大权渐丧，无力还击的时候，制宪会议却随之变得傲慢无礼起来；最后，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之下更是独掌大权。所有这一切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一位君主在他的权力开始变得不稳固时召集议会，从此他绝对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失误，议会的这一特征已经成了一条普遍的法则。三级会议的召开使得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由他可以追溯到亨利三世。当年，亨利三世被迫离开首都巴黎以后，他决定在布卢瓦召集等级会议，结果这一愚蠢的举动使他差点丢掉了王位。等级会议的代表们一旦意识到国王的虚弱，他们就会俨然以主人自居，要求国王修改赋税，解散政府官员，并宣称他们的决定应该具有法律效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佞妄情绪在大革命时期的所有议会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制宪议会刚开始的时候对王室的权威及其特权是极为崇拜而尊敬的，但到最后它竟然不再臣服于王室，声称自己享受最高的权力，而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仅仅被看作一个官员。国民公会由起初比较温和的状态，迅速演变为崭露头角的恐怖形式，那时，虽然国民公会已经拥有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判决还需得到某些法律程序的保证；然而紧接着，国民公会的权力开始随心所欲地上升，由国民公会颁布法律，被告的辩护权利被彻底剥夺了，而且仅仅依据指控就草率地判定嫌疑人的罪。因此，国民公会对自己的狂热和暴虐愈加肆无忌惮起来，最终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埃贝尔派、吉伦特



派、丹东派以及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就是因为这样而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断头台，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而终结。

议会为什么总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总是走上与自己设想的完全相反的道路？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情绪上的这种佞妄和极端。当初保王主义者、制宪议会以及天主教教徒的代表，原本是决意想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从而可以保卫宗教信仰，但结果却与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法国引向了一个暴虐的共和政体，而教士也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政治议会是由各种政见不一的派别所组成的，议会中有着许多不同的声音；不过，在某些时候它们也可能是由同质的派别所组成的，某些俱乐部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俱乐部曾经起到了不可估计的作用，它们的心理很值得我们对此进行一番详细的考察。

## 二、革命俱乐部的心理

在观点、信仰和利益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一些小的社会团体通过统一其成员的情感以及意志，可以将不利于自己情感和意志的声音消除

掉，这是它与大的团体有所不同之处。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宗教集会、公社、市政社团和俱乐部，19世纪上半叶的秘密结社以及今天的共济会和工团组织等都在这类小团体的范畴之内。

只有深刻地领会一个异质的团体与一个同质的俱乐部二者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一直到督政府时期，这些俱乐部还在操纵着大革命的始终，特别是在国民公会期间。

尽管没有派系的相互对立，这些俱乐部在意志上能够实现统一，但它们仍然逃离不出大众心理学的规律范围之外。所以，俱乐部的灵魂依然是其领袖，从罗伯斯庇尔所控制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案例中，我们应该会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一个俱乐部中，即在一个同质的群体当中，由于俱乐部的成员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趋于相同，因此领袖就需要有超凡的能力，懂得如何驾驭他们，否则的话，弄得不好反而会被别人领导。而对于异质群体，则只需要很少的手腕就能实现控制，所以在同质群体中，领袖所应具备的功能和实力要远远高于一个异质群体中领袖的功能。

同质化群众为什么会显示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若将原因细究起来，在部分程度上就是他们是匿名的。有些显而易见的例子，几个匿名者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其命令足以焚毁巴黎那些最好的纪念性建筑物：审计法院、市政厅、杜伊勒里宫、荣誉勋章获得者、纪念碑等；“烧掉财政部，烧掉杜伊勒里宫。”由一个匿名委员会发出的简短命令立即得到了执行；罗浮宫及其藏品之所以能够免于浩劫，不过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在那些匿名的工会首领制定的最为荒唐的指令中，我们还知道时至今日所谓的宗教关注是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的那些俱乐部和起义者公社权力达到巅峰，这些机构只要发出一纸命令，就足以将一个议会推翻，只要凭借一拨军队就可以直接实现其统治。

至于国民公会的历史，我将在另一章中进行总结，我们在那里将看到民众对议会入侵的频繁程度。据说，议会对于这一小撮起义者蛮横而傲慢的要求，也往往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于是督政府根据得到这些经验的教训，刻意将俱乐部关闭，并且加强警卫戒备，终于在防止民众入侵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国民公会在政府问题上，很早就意识到同质群体显然比异质群体要优越得多，基于此点原

因，它将自己分为若干个由有限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像救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在大议会中形成了一系列小的委员会，一般情况下，只有俱乐部的权力可以制约到它们。

群体对其成员的意志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通过以上的考察，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如果群体是同质的，那么将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它是异质的，那么这种影响虽然会有所减弱但仍然非常重要，这可能也是议会中较为强大的群体将支配那些在凝聚力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具有传染性的感情常常会传播到议会中每一个成员的身上。

在1789年8月4日的那个夜晚，发生了在大革命期间关于群体影响最让人难忘的一个例子。贵族们投票一致通过了他们其中的一位成员所提出的废除封建特权的决议。可是我们都知道，大革命一部分起因源于教士和贵族拒绝放弃他们的特权。他们开始的时候拒绝放弃特权，可是后来又主动放弃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没有太过复杂的原因，只不过是当人们一旦结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行为与单独一个人是有所不同的；对个人来说，任何一个贵族成员都是不会自愿放弃特权的。

为了解释议会对其成员的这种影响，一个奇怪的例子曾被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征引过。他说：“在这一时期，如果你亲身接触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与你听闻到的不一样，那是最稀松平常的事了。比如说，人们也许会认为蒙日是个可怕的家伙：当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他登上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说辞，他宣布要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最先被敌人所伤的两个士兵，他要亲眼看到贵族们得到严厉的惩罚，等等。可是实际上，蒙日是个非常文弱的人，他甚至不愿意让人当着他的面杀一只鸡，更不用说让他亲手去杀一只鸡了。”

### 三、对议会中情绪不断激化之原因的一个尝试性解释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一条曲线来对集体情感进行剖析，从而对其进行准确测量：这条曲线经历了由开始时的缓慢上升，到后来的急速攀升，又到最后的直线下降。这一曲线的方程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情感变化的方程式，它很有条理地反映出集体情感受到持续的刺激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事实上，如果要详尽地解释某些情感在某种激励因素的持续作用下的加速度过程，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心理学的规律与力学的规律相类似的话，那么，某一原动力在同一个维度上连续作用于情感，这种情感的强度将会迅速地增加。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维度和方向上恒定的一个作用力，比如说地心力对一个物体的引力作用，将会产生一种加速度运动。因此，在重力的影响下，自由落体的速度在第一秒内大约是三十二英尺，在第二秒内则达到六十四英尺，在第三秒内将达到九十六英尺，等等，依次类推。如果移动的物体从一个足够的高度落下来，它所产生的速度很容易就会穿透一块钢板。

虽然这种解释对受到一个持续刺激的情感而产生的加速度同样可以适用，但是这种加速度的作用为什么最后消失了，我们无从得知。可是如果我们将心理学的因素引进过来的话，那么这一结果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快乐就像痛苦一样，如果超出一定的限度，反而会达到不好的效果，而且，即使是再美好的情感，如果过于激烈，都会给人一种麻木的感觉。我们的有机体支持不起过量的欢乐、痛苦或努力，而且它必定也不能长久地承受这种极限。同样的道理，紧握着一个测力计的手掌，当它的能量在短时间之内消耗殆尽之后，最后还不得不突然地脱手松开。

通过研究议会中某些群体情感迅速消失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议会中除了那些凭借实力和威望而占据优势的派别之外，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派别存在，由于受到占据优势派别力量或威望的限制，这些派别情感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环境的偶然变化忽然使得占优势地位的派别力量削弱，这时敌对派别的那些积郁已久的情感在瞬间爆发而占据上风。历史上的山岳派在热月之后便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由于心理现象产生的条件是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因素的演化，所以，我们将心理现象的规律与物理现象的规律之间做出类比，很明显是不够严谨的。然而，如果我们对大脑功能的机制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它们也就只能限于此了。

## 第三卷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 一、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

法国大革命迄今尽管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即使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似

乎还是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它。人们对大革命的看法，仍然存在着诸多分歧：在梅斯特尔眼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桩魔鬼的事业”，“这一举动的黑暗精神是如此之昭然若揭，世所罕见”，而当代的雅各宾党人则对此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它使人类获得了新生。

在法国侨居的外国人觉得法国人自己都很难说清它，何况是不熟悉法国历史的外人？故而至今在其交谈中对此事件始终不置一词。

巴雷特·温德尔写道：“这一记忆及其传统几乎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着非比寻常的魅力，以至于它勾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它们既能引发人们的热情，也能激起人们的仇恨，人们无一不带有一种热诚洋溢的派性精神来看待它们。越是理解法兰西，你就越会发现，即使时至今日，法国人仍然没有找出一项对大革命切中肯綮、客观公允的研究成果来。”

巴雷特的这一观点论述是极其准确的，假如想要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做到毫无偏见，那么，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件就必然不会再产生实际的后果，而且不能涉及政治的信仰或宗教的信仰，我们已经阐述过，这些信仰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宽容。



因此，我们对这种情况应该保持平衡心态，那就是历史学家对大革命所作的评价往往有天壤之别：有的人称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之一，然而另有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似乎已经成为研究大革命情形的惯例了。研究法国大革命这一题材的所有历史学家，都相信自己对法国大革命过程的研究和叙述是客观而公允的，然而他们的研究理论歧义百出，论证方式更加惊人简单。有关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内容却相互矛盾，他们有意无意的选择，很容易使他们各自的理论得到证明。

老一辈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如梯也尔、基内——尽管此人天分极高——以及米什莱本人在今天已经不再备受人们关注了。他们的学说过于简单而缺乏系统，一种历史宿命论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出现。梯也尔认为百年导致的君主专制是导致大革命的原因，而大恐怖则是外敌入侵的必然性产物；基内认为长期专制导致了1793年的佞越与过激行为，但他又宣称历史上本没有必要发生国民公会的暴政，并且认为暴政妨碍了大革命的事业；米什莱则简单地把大革命视为他所盲目崇拜的人民之事业，并首开先例对它赞誉有加，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历史学家在效仿他们。

所有的这些历史学家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被

泰纳给抹杀了。虽然泰纳同样也对大革命满怀激情，但是他的研究却饱含着真知灼见，后世若想取代他的成果，无疑需要一个漫长而遥远的阶段。

不过，即使是再完美的著作也不免会有一些瑕疵。泰纳对事实和人物的叙述令人钦佩，但他试图依据理性逻辑的准则对一些事件作出判断，而这些事件根本不受理性支配，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他运用心理学在描述事实方面做出的成绩是卓越的，然而，当他在试图对事实进行解释时却显得底气不足。仅仅断言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具有十足书生气的“冬烘先生”（swotter）并不能揭示他能拥有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的绝对权力的真正原因，并能在几个月之内持续进行肆无忌惮的屠杀。如果说泰纳洞若观火却不求甚解，应该是非常公正的。

即便存在一些缺陷，但他的著作不乏洞察深刻的见解，所以仍然是瑕不掩瑜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与之比肩。他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从他与正统雅各宾派的忠实辩护者进行的一场口诛笔伐中见其一斑。在雅各宾派的忠实辩护者中，当代主教、巴黎大学的奥拉尔教授花费了两年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书中的内容矛头直指泰纳，其字里行间都浸透着热情。但是，他只是用

了两年的时间来修正了少量材料上的错误，不但与大体无关，而且同时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柯钦先生曾经在评论奥拉尔的著作时指出，奥拉尔时常被他自己引证的资料所蒙蔽，而泰纳所犯的错误明显要比奥拉尔少得多。柯钦先生还告诫我们，奥拉尔所使用的材料是不足为信的：

这些材料——小册子、会议记录、杂志以及爱国者的著作和演说——确实是可信的爱国主义出版物，它们是由爱国者编辑而成的，往往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出版的。奥拉尔更应该将这些材料当作是被告的特殊答辩词；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对大革命史已经有了一套既定的认识，它对“人民”的行动逐一地进行了展示，从“九月屠杀”到牧月法令。被告对共和政体的辩护正是这一先入为主的解释的根据。从某种程度上讲，泰纳的研究是不完整的，这或许是对其著作最公平的批评，他重点研究和论述了平民及其领袖在革命期间所起到的作用。他用数页之多来表达一种义愤，这至今仍令我们感到钦佩，但是，他却忽视了大革命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无论人们对大革命有怎样的看法，但泰纳学派与奥拉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之间势如水火的分歧存在是必然的。后一派学者认为人民是至高无上

的，是值得赞美的，而前一派的学者则告诉我们，当至高无上的人民一旦将自己的本能释放出来，一切的社会约束对它都无能为力时，人民可能会因此而蜕化为原始的野蛮人。

奥拉尔的观点与大众心理学的训诫是泾渭分明的，但现代雅各宾党人对它却一如既往地崇拜和尊敬，在他们眼里，它神圣得就像宗教信条一样。他们以信徒的方式将大革命的历史书写下来，并把那些虚无缥缈的神学家的论证和观点当作博学的著作。

## 二、大革命的宿命论

大革命的鼓吹者或是诋毁者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天命在革命事件当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埃米尔·奥利维尔所著的《大革命史》一书中，这一理论被完美地整合，书中这样写道：

任何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即过错不在于那些已经离世的人，也不在于那些劫后重生的人。仅仅是单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事物的要素、预见事件的发生的，因为它们源于事物的本性及其所处的环境。

泰纳本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

当三级会议（the States General）召开的时候，观念与事件的进程早就已经注定了，而且是可以预见的。在不知不觉中每一代人都延续着过去，孕育着未来；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前，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同泰纳一样，当代的另一些作者虽然对革命的暴力都表示出极强的义愤之情，但他们同样确信这种宿命论。索列尔首先回顾了博絮埃关于古代革命的格言：“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考虑事情的特殊缘由，那么一切事物都可以令人惊异地矫舌不下；然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在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按正常的秩序进行而已。”之后，他又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而这种意见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搞明白，“大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它是倾覆了旧欧洲世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使旧欧洲死灰复燃。事实上，在欧洲历史上，这场革命有着自然而必要的结果，而且，这场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太过出人意料，它可以从这一段历史中得到验证，并可从旧制度的惯例中得到解释。”

基佐最初也尝试着证明大革命是在自然情理之中的，并没有给社会产生什么根本的改变，并且，他非常错误地把它与英国革命相提并论：

欧洲历史的自然进程不但没有被革命所打断，而且可以说，无论是在英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的、所做的、所向往的，早在革命爆发的一百年前就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企盼过。

不管我们是认总的原则，还是具体运用这些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立法公民权利，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权力还是自由——来看待这两次革命，我们都会发现革命本身不会创造出什么来，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出现任何事物，或者说在我们称之为正常的年代里产生。

所有这些论断不禁使人回想起那条老套的定律，那就是，一种现象只不过是先前现象的结果罢了，我们从这样的一般性命题中得不到太多的启示。

理论家所采纳的宿命论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tality）我们只能拿来借鉴参考，但千万不要用这些东西来解释太多的事件。这些所谓天命的意义其实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探讨，而且我也提到过，只有竭力摆脱这些天命的控制，才有可能铸就文明的成就。不错，历史上很多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但是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但结果却发生了的偶然性事件也同样出现在历史中。拿

拿破仑本人在圣赫勒拿岛曾分析过有六个环境因素可能对他的伟大事业构成掣肘，他在其中提到1786年他在奥克兹纳洗浴时，在一座沙丘的掩护下，他幸运地得以全身而退。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拿破仑死掉了，那么可能会出现另一位将军的崛起，并极有可能像他一样成为独裁者；可是即便有，拿破仑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也是他们所能及的吗？他们也会像拿破仑一样横扫欧洲各国的首都吗？帝国的丰功伟绩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大革命视为一种必然性，但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的斗争，它是在那些抱有一种全新理想的理论家与支配着人类，但尚未被理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规律之间发生的——我们前面所引证的相信宿命论的作家从来没有论述过这一点。恰恰是由于这些规律不被理论家所理解，他们试图指导事件进程所作出的努力只能以失败告终，他们最后被自己的失败激怒了，最终诉诸暴力。他们颁行法令宣布被称作指券的纸币应该与黄金等价，但他们的威胁根本就不能阻止这种货币的虚拟价值狂跌至分文不值；他们颁布最高限价法令，结果反而增加了他们意欲救治的罪恶；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布：“所有穷苦的平民都可以从由富人提供的公共财政中领取开支。”可是即使发布了

这样的命令，再加上断头台的威胁，但国库中依然空空如也。

在打破了人类的所有限制之后，大革命中的人们才猛然觉醒，一旦没有了这些限制，一个社会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下去。但是，当人们打算建立新的规范时，他们又意识到哪怕是最强有力的社会，即使再加上断头台的威胁，也不可能将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风纪完全取代。更不用说，判断人类的心智，理解社会的演化，预见所颁布的法律之效果，他们更是很少去考虑了。

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件，看上去其结果存在必然性，但是这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它们与其说是环境的结果，毋宁说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并且事情本来发生的与实际上所发生的差距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路易十六能够顺从别人的劝谏，或者在群众起义时制宪议会不表现得那么懦弱胆怯，那么，大革命还会这样发展下去吗？革命定数论只有在以暴力不可避免的名义下，在为之辩护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

无论是对待科学还是历史，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隐匿在宿命论教条下的无知。最初的时候，我们的命运完全受大自然支配，然而到现在，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我们逐渐摆脱这些



命运的控制。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指出来的，消除这些天命与定数，就不得不需要那些精英人物发挥作用。

### 三、近来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之犹疑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考察了某些历史学家的思想，了解到他们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非常热衷。由于信仰的限制，他们不愿知识的王国进行深入观察，大革命在保王派作家看来不啻洪水猛兽，然而自由派作家却对大革命的暴力现象进行百般辩解。

现如今，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一场运动正在兴起，它的兴起必然会促使对大革命的研究成为一种对科学现象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作者并没有太多的成见和信仰方面的因素，因此不会给读者造成什么怀疑和困惑。

不过，在这一确信阶段尚未到达之前，我们的状态仍停留在怀疑阶段。过去那些自由派作家是如此斗志昂扬，而如今已经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和认识大革命了，我们可以从最近一些作者的如下摘录中看到这种新的心理状态：

曾经极力渲染大革命功绩的阿诺托发

问：“是否为大革命之结果所作出的牺牲和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并且他还补充说，“从长远历史来看，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不能轻易给出明确答案的，并且这种踌躇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马德林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表现出与阿诺托相似的疑问：

哪怕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轻易做出绝对的判断。我甚至发现，即使是一个简短的判断我都不能给出，在我看来，这个事件的原因、事实以及结果都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对于大革命的官方辩护者的最新作品，我们就可以从这种旧观念的转换中获得一个更为明确的印象。以前，他们仅仅从自卫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出发，对一切暴力行径进行辩护，而现在他们辩护的前提只是限于情有可原的情况。我在供学校使用的《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这种新心绪的一个显著证据，在由奥拉尔和德比多尔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关于大恐怖的地方，有这样一种说法：

血流漂杵；不公正的和犯罪的行为随处可见，哪怕是从国家防卫的角度观察，它们也是不

必要的，而且是可憎的。但是，身处动乱中的人们却丧失了理智；爱国者对于应付各种危险都已身心疲惫，于是他们在愤怒中采取了行动。

从这本著作的另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位作者中的奥拉尔身上有着强硬的雅各宾主义立场，但他一点也没有对他先前视之为“国民公会中的伟人”的那些人表示原宥。

外国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研究总是异常苛刻，可是当我们回想起在法国发生巨变的二十年中整个欧洲所陷入的痛苦时，我们对此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在这些外国历史学家中，最为苛刻的莫过于德国人了，对于他们的看法和认识，法居特作了如下的总结：

让我们忠诚而勇敢地探讨一些法国大革命吧，因为爱国主义就必须以说出自己国家的真相为首要内容。德国人对于法国持有这样的观点：过去这个民族高举“自由”“博爱”之类的旗帜，但实际上它却饱受蹂躏、谋杀、掠夺、欺诈、压迫长达15年之久；现在这个民族又打出相同的旗号，组建了一个专横暴虐、为所欲为，令人们避之不及的民主政体；这一点就是德国人在法国所

看到的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我们可以确信，随手翻看一下他们的书籍和报章，他们就是如此认为的。

而对其他民族来说，不管它们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判断价值何在，我们或许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作家将会对此怀有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并且将它当作一个富有教益的事件来看待。

一个残忍严酷政府竟然将豆蔻年华的少女、年过八旬的老人和懵懂无知的儿童以绞刑处死，使得法兰西因此毁于一旦，然而我们看到，在军事上它的确成功地击退了欧洲各国的入侵；奥地利的公主、法国的王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数年以后另有一位公主，她是前一位公主的亲戚，她嫁给了一个成为皇帝的陆军中尉，这些都是举世罕见的悲剧。心理学家首先应该从这一段历史中吸取教训，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关注的人并不多见。毫无疑问，他们迟早会发现，只有摒弃那些虚构的理论，走出实验室来研究我们周围的事件和人物，心理学才可能有所进展。

#### 四、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

历史学家认为，公正无私是最本质的品性，自塔西佗以来的历史学家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

证说他们是公正无私的。

但事实上，作家看待历史事件并没有严肃谨慎的思维逻辑，其自由、散漫就宛如画家看风景，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带上个人的特性、气质以及民族精神。

由于许多艺术家在自己的心中总不免带有个人主观情绪和观点，在面对同样的风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它理解为不同的样子，对于一些别人忽视的细节，他们反而会突出强调，因此，对于客观风景的再现都变成了一项个性化的工作，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独特的敏感性方式加以理解的。

作家同样是这样。事实上，历史学家并不比画家公正、客观多少。

当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可以只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复述，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髦，可是关于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文献，简直是浩如烟海，一个人穷其一生都不可能全部阅览完这些资料。因此，历史学家不得不做出选择。

作者有时是自觉的，但在更多时候，他们喜欢不自觉地选取那些对应于自己的政治、道德和

社会观点的材料。

所以，如果一个史学家仅仅满足于简单的年代学，那么，只需要将每一个事件和它发生的日期汇编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是不可能写出一部真正公正、客观的历史来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公正无私，其实我们不必表示遗憾。那些单调、沉闷、庞杂、乏味的著作就是当代普遍盛行的客观性主张的产物，这些著作使得对一个时期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可能。

难道历史学家就必须要在客观性的托词之下，来逃避对人的认识和判断吗？他们不愿以敬佩或憎恶的口吻讨论某个人与某件事吗？

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办法，每一种办法从各自假定的立场来看都是无比正确的，那就是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立场。

伦理学家必须以社会利益为依据来考虑问题，因而对人物的评判也只能根据社会利益。正是由于社会是存在的，并希望继续存在下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必须采纳一定数量的规则，来确立一种不可触犯的善恶标准，从而对恶性和美德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样，一种普通人的模型

就最终会被社会建立起来，一定阶段的人由此多少可以紧密地凑合在一起，如果游离于这一模型过远的话，那么难免就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伦理学家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所必须根据的正是由于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模型和规则，所以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誉誉臧否时，伦理学家试图建立一种得到的模型，它是文明进程必不可少的，并且作为楷模以引导他人。譬如像高乃依那样的诗人所塑造的英雄往往比大多数人要高超许多，他塑造的英雄是无法模仿的，但这却激发出极大的努力。一个民族的心灵若想要得到提升，就必须要以英雄为榜样。

以上是伦理学家的观点，然而心理学家则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即便是一个社会可以有不容的权利，那是因为它的首要义务就是生存，但是，心理学家却可以很好地把握火候，做到不偏不倚。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就像科学家一样不必计较功利价值，而只求问题得到解释和答案。

这就是心理学家在观察任何现象时所处的立场。我们在读到卡里埃命令将其受害者掩埋至脖颈，让他们失明，承受着可怕的痛苦这一段时，肯定无法做到无动于衷，但是，我们想要真切地理解这些行为，就必须像生物学家看着蜘蛛在慢

慢地享用一只苍蝇一般，不必过于冲动。理性在受到鼓动之后，就立刻不再是理性了，它将解释不了任何东西。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职责是不尽相同的，但我们却可以要求他们用智慧的方法来解释事实，透过事物的表象，洞悉其本质。

## 第二章 旧制度的心理基础

### 一、君主专制政体与旧制度的基础

我们从许多历史学家那里听到他们的断言，君主制的专制独裁是大革命矛头的直接指向，可事实上，大革命还未爆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国王并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

一直到法国历史的晚近时期——路易十四即位——国王才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路易十四之前的所有君主，即使将权势煊赫的弗朗西斯一世都包含在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也都是与诸侯、教士、议会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做斗争，而且他们往往还得不到胜利。弗朗西斯本人在反对索邦神学院和议会时就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来，因而连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保护得住。他的



朋友贝尔干议员得罪了索邦神学院，于是被该院逮捕了，国王命令将他释放，结果却遭到神学院的断然拒绝。最后国王不得不派遣侍卫将他从孔西埃日监狱转移了，将他藏匿在卢浮宫里，除此之外，国王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索邦方面丝毫没有退让，他们利用国王不在的时候，又一次将贝尔干逮捕，并由议会审判，上午10点他被判有罪，中午即被活活烧死。

法国国王的权力是在演变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到路易十四时代时，国王的权力臻于顶峰，但好景不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国王权力又随即迅速衰落，因此，确实很难说什么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

国王表面上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实际上那只是他的宫廷、大臣、教士和贵族的奴仆，他被迫接受他们的意志，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很少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在众多国家之中，或许很少有像法国国王这样缺少自由的了。

君主制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最初是起源于它神圣而高贵的血统，以及经过若干个世代所积聚起来的传统，一个国家真正的社会框架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

当它赖以为基础的传统力量削弱的时候，旧制度也会随之消亡。在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之后，以前的拥护者也会越来越少，于是它就像一座根基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那样，顷刻间轰然坍塌了。

## 二、旧制度的弊端

只有得到他所统治的人们的认可，一个政体才可以最终长期地确立起来。它的弊端一直被习惯所掩盖，可是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的时候，它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等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高声呐喊自己怎么能够忍受这些弊端。所以，真正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相信自己是悲惨痛苦的人。

这样一种信念更加激化了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作家在其中发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我们稍后再研究他们的著作。那时候，旧制度隐藏下的弊端已经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了，这些弊端不在少数，我们在这里提及其中的一些。

首先，尽管中央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但这种威严是王国通过对独立省份的连续武力征服形成的，因此被分割为若干个区域，各个区域内的法律和习俗也都不尽相同，并且所征收关税

也是不同的，国内的税务机构相互分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国的统一是人为的，它仿佛是由各个地区七拼八凑而形成的一种简单集合。包括路易十四在内，历代国王虽然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但都未能成功地从根本上实现法国的完全统一，而法国的大一统却在大革命中得以实现。

除了在区域上的分立，法国还呈现出社会分离的现状，即社会各等级间的分离。社会被严格地分为3个等级，即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这种等级间的严格界定是任何人不可以逾越的。

旧制度中权力的来源之一，便是这种等级间的区分，所以法国民众必须严格地遵守，但其结果却引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憎恨。因此，资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后，以种种暴行来报复和宣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的蔑视和压迫。一个人的自尊心如果受到什么伤害，那么往往会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伤痛，何况第三等级受到的伤害是相当多的。在1614年召开的一次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被迫取下礼帽放到膝盖上；当一个第三等级的成员冒昧地说三个等级应该如同兄弟一样时，贵族代表的发言人立即回答说：“贵族阶级与第三等级绝不存在任何兄弟关系；与其让我们

与第三等级交往，倒不如与皮匠和鞋匠的后裔称兄道弟。”

那时启蒙运动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是贵族和教士仍然固守着自身的特权与要求。然而，由于他们不再承担先前的服务功能，这些特权与要求也就丧失了合理性。

在公共管理职能的运作方面，教士和贵族遭到了王权的排斥，王权对他们并不信任，资产阶级逐渐取代了他们：资产阶级正变得越来越博学多才，于是贵族和教士的社会功能就空剩了一副烂皮囊，泰纳对此的解释相当准确：

既然贵族特殊的才能已经丧失了，而第三等级却获得了一般的才能，这样一比较，他们在教育与才智方面就已经等横了，所以他们在等级上的严格界定就显得有害而多余了。不平等仅仅是多年积淀的习惯的产物，可是现在人们的意识已经不再承认它了。

第三等级对特权表示愤慨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贵族既然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然而资产阶级却有贵族所没有的才能，所以也就没有理由存在特权了。

由于长期的传统造成了等级之间森严的壁垒，所以，我们很难寻找到一股力量能说服贵族与教士放弃他们的特权。当然，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当事态已经发展到他们无法掌控局势的时候，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但那时已经晚了，大革命就像一只脱缰的野马，任凭谁也很难驾驭了。

毫无疑问地讲，大革命所欲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实现平等，消除由于出身之特权等，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自然演进来实现。即便是拉丁民族的精神很保守，也仍然会像大多数民族那样，最终实现这些目标。如果照这种方式进行下去，那么二十年的战乱与破坏或许我们是可以免除的，起码不会像这样惨烈，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必然会与现在大不一样，尤以政治家为甚。

资产阶级对那些自我标榜的上层阶级怀有深深的敌意，这是构成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大革命胜利之后，身居第一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会遭到获胜者的疯狂劫掠，资产阶级就像征服者一样，将掠夺来的财富坐地分赃——就像征服者威廉在征服英格兰之后，将掠夺来的土地赏赐给他的士兵。

不过，资产阶级虽然对贵族充满了憎恨，却没有在王权上打主意，他们并不主张废除王权：国王在行为上的笨拙以及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只会使人们对他感到厌恶。

第一届议会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事实上，它其中的一部分成员都是忠诚的保王派。他们仅仅是想将绝对君主制废除，从而建立君主立宪制，他们只有在意识到君主的权力开始不断上升的时候，才感觉到有抵制国王的必要，但他们仍然不敢颠覆他。

### 三、旧制度下的生活

若想清晰地认识到旧制度下的生活，尤其是旧制度下农民的真实处境，是比较困难的。

就像神学家捍卫宗教信条一样，那些为大革命辩护的作者描绘了一幅阴暗无比的画面，来反映旧制度下农民的生活，以至于使我们不禁产生疑惑，为什么这些悲惨的生灵在很久以前没有死于饥饿呢？这类风格的典型著述源于前巴黎大学的教授朗博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中，我们会特别地注意到一幅作为图例的版画《路易十四统治下农民的贫困》，其中一个画面最为引人注目：一个男子正在与几只狗抢夺一些已没有肉的

骨头；而在他的身旁，是一个肮脏的同伴正佝偻着身体，压着自己的胃；后面较远的地方一个妇人却躺在地上吃草；而在前景后面的地上，伸展着一些说不清是尸体，还是行将饿死的人的轮廓。作为旧制度统治下的实例，作者告诉我们：“在某个地方，只需要花三百里弗就可以在警察部门谋得一个可以挣到四十万里弗的职位。”当然，这些数目在那些肥缺位置上的人看来是绝不会看在眼里的。他还告诉我们，“只要花上一百二十里弗就可以把一个人投进监狱”，而“在路易十五时代颁发的密札超过十五万封之多”。

大部分关于大革命的著作都缺乏客观性和批判精神，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很少能了解到真相的原因。

当然，相关的文献是相当多的，但它们往往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根据拉布耶里的著名描述，对于英国旅行者所描绘的热烈景象，我们可能不会接受，在他的笔下，法国一些省份的农民处在一片繁荣之中。

他们真的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吗？就像有些人叙述的那样，要他们支付收入的 $\frac{4}{5}$ ，而不是现今的 $\frac{1}{15}$ ？事实上，我们谁也不能给出确凿无疑的

答案。可是一项重要的事实似乎可以向我们证明，农村地区居民在旧制度下的境况并没有如此悲惨，那就是整个法国有1/3的土地已经被农民购买了去。我们从财政制度方面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这一制度是非常苛刻的，而且极为复杂。预算通常显示亏空，农业大臣无度地横征暴敛，乘机提高各种关税。由于财政上的这一状况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因此大大刺激了大革命的到来，在三级会议的记录上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记录并不能代表以前的状况，但起码可以说明由1788年歉收和1789年冬季萧条所导致的财政危机的真实情况。这些会议记录如果是革命爆发前十年写的，它能向我们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虽然面临着各种不利的环境，记录也没有表露出革命的念头。最激进的主张也不过是要求征收赋税时必须经三级会议的同意以及所有等级平等缴纳而已。同一记录有时还表达出这样一种愿望，即国王的权力应该受到一部确定他及其国民权利的宪法的制约。这些愿望一旦被满足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立宪君主制若要取代绝对君主制是轻而易举的，而法国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大革命了。但是很不幸，贵族与教士的势力过于强大，而路易十六的力量则相对显得过于微弱，所以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得到实施。而且，资产



阶级的要求也过于激烈，因为作为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他们想取贵族而代之。由中产阶级发动的这场运动很快超出了他们的希望、需要和渴求。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主张平等，但广大人民也要求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革命最后演变为大众政府（the popular govenment），这种结局是他们当初所始料不及的。

尽管人的情感要素经过非常缓慢的演变，可是在大革命期间，不仅是人民对君主制的感情前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就连革命议会也是如此。从第一届议会的代表们满怀敬意地簇拥在路易十六的周围，到砍掉他脑袋的那一刻，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已。

与其说这些变化是深刻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因为它们只是对同一秩序的情感发生转移罢了。在这期间，人们对国王的敬畏迅速转移到新政府上，这一转变机制很容易得到证明。

在旧制度下，君主掌握着无可比拟的权力，上帝的意志给予他一种超自然的权威，他的臣民在这片国土的每一个角落仰望着他。

只要当事实多次证明，他们所热衷崇拜的偶像，其实是一种虚幻的时候，他们对君主绝对权

力的这种神秘主义信仰在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而国王的威望自然就会化为乌有。一旦君主的威望不复存在了，这个曾经蛊惑过他们，但如今已经倒塌的偶像就不会得到群众的原宥了，而且他们还要寻求另一种新的偶像来取代他，要知道，他们如果没有了偶像，是无法生存的。

在大革命还未爆发之前，就有若干迹象向那些狂热的信徒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王室拥有的权威早已有名无实，其他的力量足以与之抗衡，甚至还略高一筹。

譬如，当群众看到议会限制着国王，而且在巴黎的中心地带，面对武装进攻，无力保卫自己最为坚固的要塞时，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

王室的虚弱已经很明显地表露出来，而议会权势的直线上升也都被人们看在眼里。现在，在群众的眼里虚弱者威信扫地，他们总是会倾向强力的一方。

在这一时期，国会议员们的感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急速，所以，在攻占巴士底狱以及国王向外国君主寻求援助的时候，他们仍保留着对君主制残余的忠诚。正是由于对王室的忠诚，所以巴黎的暴乱与事变虽然能将路

易十六押上断头台，但这种忠诚最终也未能摧毁。在外省，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他们对古老的君主制仍然保持着长期的虔敬。在整个大革命期间，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对国王的忠诚，因此保王党人的阴谋和起义可以凭借这一点让国民公会头疼不已。只有在巴黎，这种忠诚很明显已经消失了，因为国王的虚弱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但在外省，王权仍然被视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享有无上的权威。

人民对王室的情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经得起断头台的考验。保皇主义的运动事实上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从未间断过，并在督政府执政期间一度气焰嚣张，分别来自四十九个地区的保王党代表到巴黎请愿，最终引起了果月政变。

对君主制的这种情感是大革命所无法压制的，它促成了波拿巴的成功，当他开始占据古代国王的宝座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建旧制度。

###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与哲学家的影响

#### 一、革命思想的起源与传播

在任何时代，人的外在生活都是由其内在精

神所模铸的，内在精神是这样一套框架，它包括传统、情感、道德影响力等，这些要素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并维持着某些他们无须检讨就加以接受的基本观念。

如果削弱了这套社会架构的抵制力，那么，以前没有多步力量的新思想、新观念就会萌芽滋长。在大革命期间取得巨大成就的某些理论，在两个世纪之前曾遇到过顽强的抵抗，结果铩羽而归。

指出这些因素，是想提醒读者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革命的表层事件通常是人们的心理发生转变的一个结果。对革命的所有深刻研究必然是对孕育它的指导思想之精神土壤的研究。

一般来讲，思想上的演变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如果仅仅是一代人，我们通常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只有通过同一个社会阶级在心灵演化曲线的两个极端上的精神状态进行对比，思想演进的程度才可以得到明确的显示。为了方便理解路易十四时期到路易十六时期，有教养的人对王室的不同观念，比较一下博絮埃与杜尔哥的政治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博絮埃将政府的权威凌驾于上帝的意志之

上时，他所表达的观点，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普遍观念：“凡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评价国王的行为，只有神才可对此裁判。”那时候，对宗教的虔诚与对君主的忠诚是一样的，二者密不可分，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以撼动的。

路易十六的改革大臣，比如杜尔哥的著作则焕发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君权神授似乎只是一句口号而已，而人民的权利开始得到明确界定。

诸多的事件，比如不幸的战争、饥荒、关税以及路易十五统治末期的普遍贫困等，促成了这一事件的演变，对君主权威的崇敬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场精神上的反叛，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走上历史舞台。

原本的精神架构一旦开始解体，这就意味着末日即将迅速来临，这就是为什么大革命期间，那些一点也不新奇的思想观念在一夜之间急速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真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此时如此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思想观念其实早就存在了，英国的政治生活受它们的

鼓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远在2000年前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就曾著书立说，捍卫个人尊严，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暴君，宣扬人民主权。

尽管发动了大革命的中产阶级的父辈和他们一样，肯定在教科书里都已经知道了这一切，但他们丝毫得不到什么触动，因为这些思想还未来得及对他们发生作用。那些老一辈的人把一切等级制都视为自然，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对这些言论有深刻印象呢？

哲学家在大革命起源中的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他们并没有向人们揭示什么新的东西，但他们却做出了一项贡献，即发展了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是任何教条都无法抵制的。

正由于受这种批判精神发展的影响，不再被尊崇的事物越发失去威严。当传统和威信消失的时候，社会的大厦轰然坍塌，那就再自然不过了。这一连锁的崩溃最终传递到人民那里，当然它并不是由人民启动的。人民向来只追随榜样，但自己不会身先士卒，起到表率。

尽管哲学家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却对民族中已经开化的那一部分人起到极大的影响。那些贵族整日无所事事，由于被社会职能褫

夺了传统，所以他们倾向于追随其领袖，对社会百般挑剔。由于缺乏远见，他们第一个跳出来与自己唯一赖以根基的传统决裂。如同今天的资产阶级一样，他们也沉溺于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中，他们以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挖着自己特权的墙脚，就像今天最热心的改革者往往是命运的宠儿一样。贵族阶级鼓励各种关于社会契约、人权和公民平等；在剧院里，他们为抨击特权，揭露上层人物的飞扬跋扈、专横无能以及滥用各种职权的演出大声地鼓掌喝彩。

当引导人们行为的精神架构在其心中失去信心时，他们一开始会感到不安，随后就会感到不满。所有的阶级都感到自己以前的行为动机正在渐渐消失。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神圣的事物现在不再神圣了。

那时，贵族与作家的批判精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颠覆传统，但是，这一举动增加了其他更为强大的势力的力量。我们在征引博絮埃时已经说过，今天的宗教机构与世俗政府已经大大地隔离开来，可是在旧制度下，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实，即使在君主制观念发生动摇之前，宗教传统的力量在有教养的人当中就已经大大收缩了。人们用观察获得的真理替代神学的真理，从而推动了知识的不断进

步，越来越多的人从神学转向科学。

虽然至今我们仍不能清晰地抓住精神上的这一演化，但足以表明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引导着人们的传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应有的价值。人们都同意赋予以理性以传统和神祇似乎已经失去的力量，但人们为什么对理性的力量就深信不疑呢？理性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认定如果把理性运用到社会的建构上来，就可以全盘地改造社会，这样有合理性的依据吗？在那些思想开明的人当中，理性可能具有的作用急速地增加，所以相比之下，人们对传统渐渐地不信任了。

我们必须把赋予以理性的至上权威看作是终极观念（the culminating idea），因为大革命不但由它而产生，而且它的主导地位贯穿于大革命的始终。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人们想要与过去决裂，做出了最为艰巨的努力，他们力图根据一项按逻辑制定的全新蓝图来重建社会。

当哲学家的唯理论逐渐渗透到底层时，人民就觉得：过去被尊重的一切事物现在不再值得尊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从前的老爷和主人都不必服从了。

群众轻而易举地就终止了对上流阶级自身已



经不再尊崇的事物的崇敬，当崇敬的藩篱被拆除时，革命就大功告成了。

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普遍的不服从，维热·勒布伦夫人向我们讲述，在隆上普斯漫步的人群跳过马车的底板，叫嚷着：“下一年你们将被甩在后面，而我们则坐在里面。”

表现出这种不顺从与不满的不仅仅只是平民，在大革命的前夜，这样的情绪是很常见的。泰纳指出：“下层教士对高级教士，外省贵族对宫廷贵族，封臣对领主充满了敌意。”

在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不但贵族与教士存有这种心态，奈克尔的军官们也开始变得人道主义化，士兵虽然没有哲学化，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驯服了。在他们简单的头脑和逻辑中，对上级和主人，乃至一切命令的反抗就是所谓的平等观念。在1790年，有二十多个团的士兵向他们的军官发起威胁，甚至在有些地方如南锡，他们竟然将其军官投入监狱。

旧制度消亡的首要原因，就是无政府状态散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并且最后蔓延到军队中去。里伐罗尔写道：“正是由于军队受到了第三

等级思想的影响才导致了王权的最终毁灭。”

## 二、18世纪哲学家对大革命起源之假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厌恶

哲学家通常都被人们视为法国大革命的鼓吹者，他们无情地抨击了那些特权及其滥用，但我们如果由此把他们看作是大众政府的同党，那就大错特错了。一般来说，民主政治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对破坏以及暴力之类民主的必然伴生物，并没有忽视，并且都知道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就被定义为“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法律，在这样的国家里都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可以像僭主一样恣意行事，而且往往为一些巧言令色的煽动家所控制”。

伏尔泰的真正先驱——皮埃尔·贝尔对雅典大众政府的后果作了如下评述：

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所展示的是群众的骚乱，造成城邦分裂的内讧，困扰城邦的煽风点火；最出众的人物遭到迫害、放逐乃至在一个罪恶的饶舌者的怂恿下被惨遭处死。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断定，对自己的自由如此自负，这样一个民族，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小撮阴谋家的奴隶罢了。那些被称

为煽动政治家的人，一会儿指示他们向东，一会儿引领他们向西，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即使是在马其顿实行的君主制，也不会出现像雅典这样频繁的暴政。

对民主政体的看法，孟德斯鸠也没有表示出更多的敬意，在描述了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三种政体之后，他明确地指出了大众政府可能导致的后果：

过去的人们通过法律手段获取自由，如今追求自由的目的，却是反抗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跑出来的奴隶；过去的准则被现在的人们说成严厉，过去的规矩被说成是拘束，过去的谨慎则被叫作畏惧。在那里，节俭反而被看作贪婪，然而占有欲却不是贪婪。从前，私人的财产是公共财产，但是现在，公共的财产却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就只不过是几个公民的权利和全体的放肆而已。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形成了许多小暴君，这些小暴君具有单一的暴君本身带有的一切邪恶。人民残存的一点自由，不久也沦为了不可容忍的东西；这时就产生了单一的暴君；人民便将丧失他们的一切，连腐化的好处也丧失了。

所有这些被认为是激发了大革命的人所持的观点远不是颠覆性的，他们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中，卢梭是为数极少的几个民主主义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社会契约论》成了大恐怖时期人们所追捧的对象。要宽宥那些产生于无意识之神秘情感冲动的行为，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必需的恰当理由，但是，哲学不可能鼓动这些冲决。

实事求是地说，卢梭的民主主义直觉也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他自己就曾承认过，立基于人民主权的社會重建方案，仅仅适用于一个非常狭小的邦国，而像法国这样的大国则适用不了；所以当后来波兰人邀请他们为他们起草一份民主宪法方案时，他建议波兰人选择一个世袭君主。

在卢梭理论中关于原始状态完美至善的理论获得了巨大成功，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卢梭断言，原始人是至善至美的；导致他们堕落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通过良好法律的规范，一个社会可以重新获得早期世界的幸福。可是由于他对心理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卢梭相信不管何时何地，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受同样的法律与制度的约束和统治。这种信仰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爱尔维修写道：“人民的恶行和美德通常是立法的一个必然结果……对一切民族而言，

美德都是智慧，这种智慧或多或少是完美的，对此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吗？”再没有比这种论断更为荒谬的了。

### 三、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

大革命期间，一个法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到底是什么？若是要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或许可以把它们简单理解为平等、博爱以及大众政府，这几条集中体现在《人权宣言》中的公式中，我们从那里可以征引一些段落。

现代科学根据古代残存的遗迹对我们祖先的生活状况所作的推断，早就证明这一学说是错误的。原始人本就是无知的、残忍的，他们同现代的野蛮人一样，对善良、道德以及同情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只受自己本能冲动的支配，当他们饥饿时，他们就会走出洞穴，攫取捕杀猎物；当仇恨涌入他们的内心时，他们就会将敌人吊死。理性只要尚未产生，他们的本能是不可能被遏制的。

文明的目标与一切革命信仰截然相反，它是要逃离自然状态，而不是要返回自然状态。正是由于雅各宾党人将文明赖以为基础的一切社会限

制都破坏了，所以他们使人类又回到了原始状态，使政治社会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

这些理论家关于人之本性的理论所具有的价值，与一个普通罗马人关于预兆之力量的想法没什么不同。然而，我们不能小觑这些理论作为行为动机的力量，国民公会总是被这样的思想所鼓动。

在对我们原始祖先的看法上犯下了错误，这当然是值得原谅的，因为那是我们的科学尚不发达，在当代的发现向我们揭示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清晰的了解。但是，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人类心理所表现出的绝对无知，远不是那么易于理解。

看上去确是如此，18世纪的哲学家与作家似乎并不擅长进行最细微的观察，虽然他们置身于同时代的人之中，却既没有看透他们，也没有理解他们。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对大众心智的本性从未产生过怀疑，他们总以为自己梦想所塑造的理想模型就是人民所追求的。他们对心理学的无知就像是对历史教训的无知，他们认为平民大众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博爱的、知恩图报的，并且随时服从理性的指导。

国会议员所发表的言论足以表明这些，他们的幻觉是多么深刻，当农民疯狂地焚烧城堡时，他们在吃惊之余，竟忙不迭地以最动情的长篇大论对他们发表演讲，企图阻止他们的暴行，劝诫农民不要“惹恼了他们好心的国王”，并请求他们“以美德来打动国王”。

#### 四、决裂与法律改造人性力量的幻想

有一个原则可以被视为革命机制的一块基石，即人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与其过去一刀两断，而通过制度可以对社会实现全盘重建。理性说服人们相信，除了原始时代之外，过去代表着谬误与迷信的一项遗产，当代的立法者可以与过去彻底决裂。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意图，他们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纪元，变换了历法，更改了月份和季节的名称。

我们设想一下，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所以他们的立法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当孔多塞说“一项良好的法律必定对所有人都是良好的，犹如一个几何命题对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时，他一定对自己这个论断深信不疑。

大革命的理论家对事物的表象从来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不可能洞察到隐匿在它们背后的

原动力。生物学上的进步要想使人们认识到这些理论家所犯的错误是如何地让人痛心，还得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而这种进步同时也会告诉我们，不论哪一个民族，它的进化，离不开传统的根基。

大革命中的改革者不断地与过去的影响发生冲突，尽管并不理解它，却总是妄图消灭它，结果反而被它所消灭。

立法者对法律和制度之绝对力量的信仰，虽然到革命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革命之初他们却是坚信不疑的。格雷古瓦教士在制宪议会的讲台上发表这样的演说时，一点也没有引起惊讶：“我们也可以做到改变宗教信仰，只不过目前我们不想这样做罢了。”在后来的历史中，他们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他们失败得相当惨烈。

然而，雅各宾党人还是掌握了所有成功的要素，他们依靠暴政扫除了一切障碍，他们强制推行的法律非常顺利地就被通过。经历了十年的破坏、焚烧、掠夺、屠杀、暴力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自己的虚弱暴露无遗，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然后，整个法兰西都在企盼，独裁者不得不对已经遭到毁灭的大部分事物加以重



建。

雅各宾党人企图以完美理性的名义重新塑造社会，这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实验，这样的实验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尽管这个教训是很可怕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重要之阶级的头脑里，它似乎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即使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仍然可以常常听到社会主义者要求根据他们的空想计划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建议。

### 三、大革命原则理论价值的幻想

建立一种新的分配关系就是大革命基本原则的目的，它包含在一系列的权利宣言之中，这些宣言相继公布于1789年、1793年和1795年。这三个宣言都同意这一声明：“人民享受主权。”

至于其他方面，这三个宣言的有些说法不尽相同，尤其是在平等问题上。1789年的宣言规定相当简单（第一条）：“人生来就始终是平等的。”1793年的宣言走得更远，它向我们断言（第三条）：“所有人按其本性一律平等。”1795年的宣言则较为适度，它说（第三条）：“平等意味着法律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对待的。”除此

之外，说到权利时，第三个宣言认为首先应该提及义务，它的道德完全就是福音书的道德，宣言第二条说：“一个人与一个公民的所有义务都来自于天然地铭刻在所有人心中的这样两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这些宣言的实质性内容，也是真正保留下来的内容，就是关于平等和人民主权的那些部分。

虽然存在推理意义上的缺陷，但是平等、自由、博爱这一共和主义图景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不但在许多墙壁上至今仍装饰着这一充满魔力的公式，而且我们也时刻铭记于心，它确实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得归功于那些古老的巫师所使用的蛊惑性字眼。

它的许诺所唤起的新希望给它带来了相当惊人的扩张力，甚至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惜为它舍弃了生命，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爆发革命的地方，都会援引同样的公式。

选择这一公式实在是幸运，因为它属于那种模糊不定的能够激起人们对未来憧憬和向往的词句，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爱憎与希望来解

释。而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倒反而显得无关紧要，它附带的意义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革命宏图的三个原则当中，平等是最富有成效的，本书的另一部分我们将会指出，唯有这一原则至今还存活，并且成绩斐然。

当然不能说只有大革命才把平等思想介绍到世界上来。不必追溯到古希腊的共和国，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在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包含着许多很明显的平等理论。作为同一个上帝的臣民，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他们的美德就是对他们唯一的评判标准。上帝面前的所有灵魂一律平等的教义在伊斯兰教教徒那里和基督教教徒那里是同等重要的。

但是，一项原则的声明并不足以保证它的实现。基督教会很快就不再遵从理论上的平等办事了，而大革命中的人们也仅仅是在演说中才想起它来。

“平等”一词因使用它的人不同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常常隐含着与其真正意义截然不同的情绪，从而表现出不让任何人胜于他人的这样一个专横的要求，同时也不乏自觉高于他人的念

头。

对于大革命时期以及今天的雅各宾党人而言，“平等”这一字眼只是意味着对一切优越的一种嫉恨，为了消灭这些优越，这些人便佯称要统一礼仪、习俗和地位。除了他们自己施行的专制，一切专制似乎都是可憎的。

因为自然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对它们拒绝认可。1793年的第二个权利宣言对事实不屑一顾，公然断言“所有人按照自然一律平等”。如此看来，大革命中的许多人对平等的炽热激情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对不平等的强烈要求，正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拿破仑才不得不重新启用贵族头衔和装饰。泰纳指出，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从最桀骜不驯的革命者中选拔出最驯服的臣僚，其秘密就在于此。他接着说道：

“忽然之间，通过他们有关自由与平等的布道，他们对权力以及支配他人的本能欲望暴露无遗；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就连下属也对金钱和享乐充满了渴望。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与帝国的大臣、长官或次长之间并无多大分别。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装束而已，先前穿的是短套，而后穿的是编织外套。”

平等教义的第一个产物就是资产阶级对人民主权的声明，然而，人民主权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却一直停留在理论上，只是一种空谈。

## 第四卷 制宪会议

### 第一章 制宪议会的心理

#### 一、神秘主义成分

大革命一旦在普通群众那里得到深入，理性的影响立即就会遭受情感力量和集体力量的排挤，并且很快消失。至于其中的神秘主义要素，作为革命信仰的根基，它使得军队如痴如狂，把新的信仰散播到全世界。

我们将看到，这些错综复杂的要素不但体现在事件中，而且也反映在个人的心理上。神秘主义成分或许就是大革命最为重要的要素，因此，我们若想清晰地理解大革命，就必须将大革命视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构成，这一点是很显然的。我在其他地方对一切宗教信仰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大革命，譬如，在涉及宗教改革的章节中，读者会看到它与大革命的相似之处不在少数。

关于在研究宗教信仰的理性价值的这个问题

上，哲学家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因此，他们现在能够更恰当地理解理性的作用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信仰的要素对文明中诸种要素的转变才是最为重要的。

信仰可以使人们与理性相分离，并且能够将人的思想和情感推向一个极端。纯粹的理性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的，因为理性在人们心中不会产生太大的热情。

宗教的形式很快被大革命所采用，这就是它之所以会有惊人的扩张力，并且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威望的原因。

这座伟大的纪念碑应该被视为一种新宗教的奠基，然而，却有很多历史学家能看出这一点。我认为，托克维尔是最早洞悉这一点的人。

他在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披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从其常规和典型的特征来看，它确实有许多与宗教革命的相似之处：像宗教革命一样，它不仅传播甚远，而且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的方式在人们心中牢固树立。这是一场激发人们改变信仰的政治革命，人们欢欣鼓舞地在国内完成革命，

又以同样的热情向国外传播。试想这样的景象是何等的新奇啊！”

假如我们承认了大革命的宗教因素，那么就很容易解释接踵而来的狂热与破坏了，因为我们从历史中得知，这是宗教的伴生物。所以说大革命必然要带来暴力和不宽容，这是取得胜利的神灵对其信徒发出的指令。大革命在整个欧洲倒行逆施了长达二十年，它也导致了法兰西成了一片废墟，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国家也屡遭侵犯，但是不付出灾难性的代价就不足以改变人们的信仰，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铁律。

尽管信仰的基础通常是神秘主义的因素，但有时候某些情感的因素和理性的因素很快也会掺杂进来。这样一种信仰可以服务于情感领域，也就是群体的情感、激情和利益；至于理性，它可以掩饰这一切，为事件的合理性寻求辩护，当然，它实际上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

当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愿望为新的信仰披上各式各样理性的外衣。人们看到在大革命中，曾经使他们饱受欺凌的一切专制，无论是政治上的、宗教上的，还是等级上的，统统受到镇压；像歌德这样的作家和康德这样的思想家梦想着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理

性的胜利；更有甚者，像洪堡这样的外国人士还特意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观摩专制的葬礼”。

但是，这些幻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持续太长时间，整个事件的戏剧性变化很快就暴露了梦想的真实基础。

## 二、旧制度的瓦解与三级会议的召开

在大革命来临之前，革命思想就已经在人们的心中酝酿。在经过我们已经研究过那些因素的准备之后，路易十六的登基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成为现实。中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他们对此百般挑剔，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改革在当时的环境中成为人们最响亮的呼声。

路易十六虽然完全能够懂得改革的效用，但由于他自身的软弱性，使得他根本无法驾驭教士和贵族，他甚至对自己的改革大臣马勒谢尔伯和杜尔哥都保不住。饥荒频繁出现、赋税逐年加重、各个阶层面临贫困的窘境，尽管如此，法国宫廷依然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与这种普遍的贫困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法国的贵族们试图挽救财政危机，他们被召



集起来，但拒绝接受一个平等的税收体系，而只是批准了一些意义不大的改革措施。高等法院拒绝登记这些改革法令，最后不得不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仿效巴黎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被解散。但是他们主导着舆论，法国各地都要求召开已经近两百年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

决议是这样的：在五百万名法国人中，有十万名教士，十五万名贵族，派出各自的代表。总共有一千两百名代表，其中五百七十八名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们主要由地方官员、律师和医生组成；而三百名教士代表中有两百个人是平民出身，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第三等级连在一起，共同反对贵族和教士。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不同精神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代表之间就在心理上发生了冲突。特权阶级代表的华丽高贵装束与第三等级代表的寒酸落魄形成了一种让人感到羞辱的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贵族和教士成员分别依照他们的阶级特权，在国王面前没有免冠，第三等级的代表想要模仿贵族和教士阶级，结果引来了特权阶级代表们的一致抗议。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更多自尊受到打击的抗议不绝于耳，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那些坐在单独大厅里议事的贵族和

教士代表为他们的权力作见证，结果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最后，根据西哀耶斯教士的倡议，第三等级的代表认为他们代表了国家95%的人口，宣布由自己组建一个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于是从那一刻起，大革命的序幕就由此拉开了。

### 三、制宪议会

对手的强弱，是一个政治议会力量的衡量标准。制宪议会（The Constituent Assembly）为它遇到的微弱抵制感到惊讶，并且在一小撮煽动家的操纵下失去了理智和自制能力。从最初的会议开始，制宪议会的一言一行就像是一个主权实体，特别是它佯称自己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这在国王看来，不啻是对自己权威的蔑视和挑衅。

路易十六作了软弱无力的抵抗，他仅是将三级会议的议事大厅关闭了。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代表们，他们开始在网球场的大厅里集会，并且宣誓：如果不能通过一部宪法，他们就决不解散。大部分的教士代表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国王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并命令代表们解散。当大司仪官布勒泽侯爵想要劝说他们服从国王的命令时，议会主席巴伊答复说：“我们在这里集会代表了全体国民，任何命令我们都是拒绝的！”而米

拉波则向国王的特使扬言：“议会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召集起来的，除非诉诸武力，否则我们不会撤退。”因此，国王不得不再次做出让步。

在6月9日的会议上，代表们采用的是制宪议会的名称。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岁月里，这是国王第一次被迫认可了一个新权力的存在，而在此之前，不管是人民的权利，还是由人民的代表所行使的权利，国王都一概置之不理。这个事件可以向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君主专制政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路易十六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威胁，于是便从凡尔赛召集了一些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兵团。制宪议会要求这些军队撤离，国王拒绝了，并将奈克尔解职，代之以布洛利元帅这样一个以独断专行著称的人。

但是，议会会有许多坚定的支持者，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一些人向群众发表长篇演说，大声疾呼，要他们保卫自由。他们敲响了警钟，组成了一支一万两千人的民兵，从残废军人院取来了步枪和大炮。7月14日，武装的民众向巴士底狱进发，这座要塞几乎没有设防，法国军队的抵抗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里面找到了七名囚犯，其中一人还是个疯子，另有四人是被指控做伪证的

刑事犯。

巴士底狱曾让许多人成为在专制权力下的牺牲品，而在许多人心目中，它有着王权的象征，但攻占它的人并没有吃过它的苦头，因为巴士底狱的犯人一般都是贵族阶级。

巴士底狱因为被攻占而所产生的影响相当巨大，甚至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像朗博德这样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向我们断言：“攻占巴士底狱不但是法国，而且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如此的轻信稍许有些过分，事件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那就是人民第一次得到了一项明确的证据，它表明不久前还是令人敬畏的权威竟然如此软弱无能，不堪一击。

权威的原则一旦在公众心目中受到损害，就会在顷刻之间坍塌。对一个无力保卫自己的重要堡垒、抵挡群众进攻的国王，还有什么要求不可以提出呢？同样，主人的权力也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了。

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历史上比比皆是的精神腐化现象的开始。外国雇佣兵尽管对革命

不存有太浓厚的兴趣，但也已经开始显示哗变的前兆，于是，路易十六被迫将他们解散。他召回了奈克尔，回到了巴黎市政厅，他的出现表明了已经认可了既成的事实；他从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夷特手里接过了三色帽徽，它由代表巴黎的红、蓝两色加上代表国王的白色构成。

随着巴士底狱的攻破，骚乱虽然暂时中止了，但决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历史上的一个终极性事件”，不过它的攻破确实是大众政府的开端。

在整个制宪议会统治期间，保王派中有绝大多数的法国人和议会成员，所以如果国王接受一种开明君主制的话，那么他还是可以掌权的。但是，路易十六似乎不愿意向议会妥协，因而也就没有做出多少承诺。

或许，他认为，稍许的妥协也都是绝无可能，如果他同意变革历代传承世袭的君主制，那么，他会觉得自己给列祖列宗丢了脸面，甚至即使他有变革的想法，他的家族也绝不会容忍他这样做。那个时候，君主制所依赖的古代世袭等级，贵族和教士的权势几乎可以与国王本人比肩。在他看来好像每次都向议会的命令屈服了，其实那也是迫不得已，并且是企图赢得时间，卷

土重来。在看到所有的天然防卫都起不了作用后，孤注一掷的国王只好向外国势力求助了。

国王，尤其是王后对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就是法国的竞争对手——可能给予的援助抱有非常荒诞的幻想。即使奥地利不冷不热地表示同意出手相助，但这种承诺也只是想得到巨大的回报罢了。

当俱乐部的民众领袖发现议会中保王派有着不小的势力时，他们再次发动群众来反对它。于是他们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选举机构来审判路易十六。

不管怎么说，制宪议会对国王敬意是依然存在的，它感到革命的煽动性越来越强烈，所以决定对人民的行动进行反击。在拉法夷特的指挥下，国民自卫队的一个营开进马尔斯广场，驱散聚集在那里的群众，结果造成了五十个人死亡。

议会虽然势单力薄，但并没有坚持它的微弱抵抗，由于对人民的畏惧之心很强烈，因此对国王日渐傲慢，不断对他的特权与权力进行剥夺。现在国王可怜得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

议会指望自己能够行使从国王那里僭夺的权力，但是它的能力还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使命。权力的分散也必然导致它的虚弱，米拉波说：“没有什么比由六百个人来行使主权更可怕了。”

议会曾经宣称它可以集中国家的所有权力，并像路易十六那样行使这些权力。然而不久，议会就变得寸步难行了。

议会的威信日渐削弱，无政府的混乱却在骤然增长着。被民众领袖不断地煽动起来的暴民所引起的骚乱和起义终于成了唯一的权力。议会每天都要受到喧嚣和专横代表的冲击，他们时而提出要求，时而发出威胁。

议会出于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无计可施，只得俯首帖耳。事实上所谓的群众运动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运动，它们仅仅标志着一股新势力正粉墨登场，即与议会并行存在的俱乐部和巴黎公社。

在这些俱乐部中，最有势力的自然要数雅各宾俱乐部，它在法国已经迅速地建立了超过五百个直接听命于总部的支部。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它一直占据着优势。议会听从于它，因而它也是法国的主人。它唯一的对手就是巴黎公社，但公社的权力仅限于巴黎。

制宪议会在遭受失败的情势下变得异常虚弱，失败更使它名誉扫地，它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感到自己的势力正在逐渐消亡，所以决定加紧制定出新的宪法以便自行解散。它的最后一项措施规定制宪议会的成员不得被选进立法议会，真是幼稚至极。也就是说，立法议会的议员将失去了他们前辈的经验。

1791年9月3日，它制定并完成了宪法，并于13日得到了国王的批准，此前，议会已经恢复了国王的权力。

制宪议会创建了一个代议制政府，由人民选举的代表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归国王所有，并且对议会的法令享有否决权。旧的行省制被新的部门分工所取代，关税业已被废除，至今仍在实行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取而代之。

在结束了领土分裂，推翻了旧的社会组织之后，制宪议会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改造这个国家的宗教组织，它特别提到，神职人员应该由人民选举生成，并且不受教皇的任何影响。

对教士的民事规定是一直持续到执政府统治时期的宗教斗争和宗教迫害的起因，这引起了2/3



的牧师对新宪法的不赞同，他们拒绝对新宪法宣誓效忠。

在以制宪议会为象征的三年里，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可观的。首要的成果，应该就是特权等级的财富开始向第三等级的转移。正是由于这一点，引起大革命的热情追随者为新制度辩护的兴趣，如果一场革命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支持，那么它所产生的力量必然是强大的。无论是第三等级，还是购买了国有土地的农民，他们自然很清楚，旧制度的复辟必然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其实从本质上讲，对大革命的积极辩护仅仅是为他们自己的财富辩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大革命的某些阶段会有接近一半的地区揭竿而起，反抗压迫他们的专制。共和党人战胜了一切反对派，他们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在捍卫一种新的理想，同时也在捍卫新的物质利益。我们将看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大革命，并且极大地促成了帝国的建立。

## 第二章 立法议会的心理

### 一、立法议会期间的政治事件

在考察立法议会（The Legislative Assenlbly）的精神特征之前，先让我们简要地总结一下，在它短暂的执政岁月中所发生的值得回顾的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在立法议会的心理表现中自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立法议会同样对君主制十分留恋，国王在它看来只是有些不可信任，但它仍然希望保留国王的权力。

路易十六整日郁郁寡欢，他不断地向外国发起求助。这位胆怯的国王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在他的身旁，只有守护着他的瑞士侍卫，他在一片反对声中显得无依无靠。他大肆收买杂志企图扭转公共舆论，但是编辑杂志的愚昧文人们对群众的心理根本不了解。他们只能用绞刑架来恫吓大革命中的参与者，以及对外宣称一支解救国王的军队即将入侵法兰西。

王室此时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外国宫廷，贵族们络绎不绝地移居国外。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都在向法国发出了战争的威胁，路易十六在背地里也支持它们的行动。面对三家国王的联合反法，雅各宾俱乐部提议反击各国的联盟。于是，吉伦特党人连同雅各宾党人就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们鼓动群众来武装自己，于是六百万

名志愿者整装待发。宫廷接受了一位吉伦特派的大臣，在他的操纵下，路易十六被迫向议会提出建议，与奥地利作战，并很快得到同意。

在宣战时，国王是言不由衷的，王后向奥地利透露了法国的作战计划以及委员会的秘密决议。

战争之初的法国损失相当惨重，好几个纵队遭到突袭，溃不成军。在俱乐部的煽动与说服下，巴黎近郊的人们相信国王与外敌相互勾结，于是最终发动起义。他们的领导者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丹东在6月20日向杜伊勒里宫递交请愿书，提出废黜国王的要求，然后冲进杜伊勒里宫，百般辱骂国王。

路易十六在命运的驱使下，一步一步走向悲惨的结局，当雅各宾党人对国王的威胁引起许多地方的义愤时，人们获悉一支普鲁士军队已经到达洛林前线。

国王与王后对外国支援的希望抱有极大的幻想，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奥地利与法国人的心理持有一种相当严重的错觉。看到法国人为一些狂热者所慑服，她就认为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恐吓巴黎人，通过威胁使他们重新对国王的权威产生敬

畏。于是在她的授意下，费逊公布了布伦瑞克公爵的宣言，该宣言威胁说：“如果王室受到什么侵扰，巴黎将遭受到极大的威胁。”

但是，这项声明导致了与其料想的完全相反的结局，它更加引发人们对国王的极大愤慨，国王被视为外国入侵者的勾结者，更加声名狼藉，人民怨声载道，他注定要被拉上绞刑架。

在丹东的操纵下，一些地区的代表在巴黎市政府建立了一个起义者社团，他们逮捕了效忠于国王的国民自卫军司令，敲响了警钟，装备国民自卫队，并且同平民一道开进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召来的卫队一哄而散，很快就没有人守护他了。国王身边仅有的瑞士侍卫以及几个绅士几乎无一幸免，只剩他孤身一人在议会中避难。群众要求应该对国王进行审判，立法议会宣布剥夺他的权力，并等待未来的议会，即国民公会来决定他的命运。

## 二、立法议会的精神特征

立法议会是由新人组成的，从心理学角度看，它表现了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很少有议会能像它这样深刻地反映政治集体的特征。

立法议会由七百五十名代表组成，可以分为顽固立宪保王派、共和派、吉伦特派、保王派以及山岳派。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律师和文人，此外还包括为数不多的高级官员、牧师和几位科学家。

这个议会成员的哲学思想似乎尚未成熟，许多人对卢梭回归自然状态的幻想如痴如醉。但和他们的前任一样，所有的人都热衷于对希腊和罗马遗风逸事的回忆，他们的言论中充斥着和装饰着加图、布鲁图斯、格拉古、普鲁塔克、马可·奥勒留以及柏拉图；当演说者想凌辱路易十六时，就直接叫他卡利古拉。

这些议员在希望破坏传统方面，是很具革命性的，但在主张回到遥远的过去时，他们又显得极端反动。

立法议会的心理特征也是制宪议会的特征，但前者更为突出，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动摇、敏感、虚弱和胆怯。

这种动摇与敏感使他们的行为反复无常：前一天还在相互攻讦争吵，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他们“相互拥抱，热泪盈眶”；他们为一场要求对那些请愿废黜国王的人进行惩罚的演说热烈鼓掌，

然而，就在同一天，他们又将议会的荣誉授予一个要求国王下台的代表团。

在面对威胁时，议会成员的胆怯与虚弱淋漓尽致地表露出来，虽然他们带有保王色彩，但还是投票同意废除国王的权力，并顺从了巴黎公社的要求，将国王及其家室监禁在丹普尔堡。

由于同制宪议会一样，立法议会的软弱性，使它没有能力行使任何权力，只得任由民众社团和俱乐部的摆布，这些社团和俱乐部的领袖人物包括塔里安、罗西涅尔、马拉、埃贝尔、罗伯斯庇尔等人。

直到1794年热月为止，起义者社团一直构成国家主要权力的中心，它的举动与它曾经指控过的巴黎市政府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议会打算把路易十六囚禁到卢森堡宫时，正是这个社团提出要求将他关押到丹普尔堡的塔楼；也正是这个社团将大量嫌疑犯投入监狱，然后下令处死。

我们知道，最骇人听闻的是，一伙大约一百五十人的匪徒，领着每天24里弗的津贴，在几个社团成员的指挥下，四天之内消灭了一千两百

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九月屠杀”。巴黎市市长佩蒂昂满怀敬意地迎接了这帮凶手，并且以美酒款待他们。几个吉伦特党人发出了抗议，而雅各宾党人对此则默不作声。

起初，吓破了胆的议会对大屠杀不闻不问，噤若寒蝉，“九月屠杀”还受到议会中几个较为有影响的代表尤其是库通和比约·瓦伦的纵容；议会最后决定谴责他们，但对他们施暴的行为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意识到自己的虚弱之后，立法议会在两星期后自行解散，让位给国民公会。

虽然立法议会的意图是好的，但其工作显然是灾难性的，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作为保王党人，他们抛弃了君主制；作为人道主义者，他们纵容了“九月屠杀”；作为和平主义者，他们将法国推到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中去。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一个软弱的政府注定要毁灭自己的国家。

早期两个革命议会的历史再次向我们证明，其间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因果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这些因果关系构成了一连串的必然性之链，当我们选择其中的第一环，我们往往控制不住后面的环节。当我们自由地做出一个决定时，也往往预料不到它的结局。

制宪议会最初的措施是自发的、理性的，但事情发展的后果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志、理性或预见。

无论是路易十六之死、大恐怖、旺代战争、旷日持久的断头台，还是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以及继之发生的一个军人铁腕统治之下传统与秩序的恢复，如果回到1789年，有谁敢期望或预测这样的事呢？

在革命议会早期行为之后的事态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大众政府、暴民统治的兴起与发展。

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这些事实——攻占巴士底狱、进军凡尔赛、“九月屠杀”、袭击杜伊勒里宫、残杀瑞士侍卫以及国王的垮台与入狱——的背后，我们很容易察觉到影响群众及其领袖心理的规律。

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群众的力量是如何逐渐加强，又是如何战胜其他所有的力量，并最终取代它们的。

### 第三章 国民公会的心里



## 一、国民公会的传奇

国民公会（The Convention）的历史不仅为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它还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即使是紧随其后的继承者，都几乎无法对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和他们周围的人形成准确的想法。

自从大革命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但人们也只是直到现在才开始对这一时期作出判断，尽管这些判断仍然存在许多疑惑和争议，但至少已经比上一代人的看法要稍微正确些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文献材料供人们加以研究，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围绕暴政时期的种种神话般的传说已经逐渐洗尽铅华，露出庐山真面目。

在所有的神话传说当中，最为持久的应该就是关于“国民公会之伟人”这样显赫称号的大人物的传奇。

国民公会不仅要镇压国内的王党叛乱，而且还要抵抗欧洲君主的入侵。这使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的英雄似乎是

超人或是提坦巨人式的人物。

只要对这一时期的事件仍然没有完全清晰的概念，“伟人”称号看来还是正当的。仅仅因为同时发生的缘故，军队的成就被盲目地混淆为国民公会的成就。前者的光芒掩盖了后者的阴霾，并沦为辩护恐怖时期大屠杀、国内战争的暴行以及法兰西毁灭的借口。

在现代批判敏锐而细致的洞察下，事件的种种异质性谜团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共和国的军队依旧保持着它们素有的威望，但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公会的成员完全消耗于内部的派系斗争，对军队的胜利几乎没什么贡献，至多也不过只有两三个议会的委员会成员关注着军队；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军队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归功于它们人数的优势以及年轻将领的天才之外，还来源于一种新的信仰所激发的热情。

在后面专门讲述革命军队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它们是如何在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成了它们战斗的动力，在这些思想的鼓舞之下，它们身赴前线，并在前线滞留了很久，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政府的精神状态。它们对政府的精神状态最初没有任何了解，然而到后来却变得极为鄙视。

国民公会成员与军队的胜利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行动只限于依照领袖的指令，仓促地制定法律，这些领袖声称法兰西可以通过断头台获得新生。

但是，正是凭借这些勇敢的军人，国民公会的历史被塑造成一部神话，使得几代人都对它产生宗教般的崇拜和敬畏，时至今日仍余音不绝。

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研究一下国民公会那些“伟人”的心理，就会发现他们的声誉将会被贬得一文不值。一般说，他们没有任何值得夸耀之处，即便是他们最热心的辩护者，比如奥拉尔也承认了这一点。

奥拉尔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对此做出如下评述：

人们都认为从1789年到1799年的那一代人，完成了伟大而可怕的事业，他们是一代天才，或者说，他们就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伟人。事实上，这是人们产生的错觉，对大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那些人，成立市政公社的市民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等全国性团体的成员，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时代或路易·菲利普时代的法国人更出色，无论是在所受的教育上，还是才智上。那些才华出众的人士

至今仍然流芳万世，那是因为他们出现在巴黎的舞台的缘故，还是因为他们是各种革命议会中最雄辩的演说家呢？米拉波某种程度上可以配得上天才之称，至于其他人像丹东、罗伯斯庇尔、维尼奥是否比我们今天的演说家更具才干呢？在1793年这个被称作巨人的时代里，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法兰西的经营仿佛都已耗尽了：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消逝确实令人惊讶，除了侏儒之外几乎看不见几个出色的人物。”

在对国民公会单个成员进行考查之后，再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可以说无论从智力、德行还是从勇气上讲，他们都显得那么平庸无奇。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表现得如此胆怯，除了在演讲中，或是危险远还没有来临之前，他们没有任何勇气可言。这个议会在谈到国王时是如此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其实是有史以来最软弱、最驯良的政治集体了。我们看到它对于俱乐部和社团的指令言听计从，在天天冲击议会的民众代表面前，它瑟瑟发抖；对暴动者的命令，它是如此驯服以致可以向他们交出自己最优秀的成员。国民公会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幅可悲的场景：它在民众指令下，所投票通过的法令竟然荒谬到一等他们离开大厅就不得不废止的程度。

还有哪个议会能表现得如此虚弱呢？我们只

消看看国民公会，就知道一个大众政府可能堕落到

##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之后果

在赋予国民公会特殊面貌的诸种事业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一种革命宗教的牢固确立。革命教义起初尚在酝酿之中，但毕竟还是建立起来了。

这一教义由一些显得并不协调的要素糅合而成，人权、自由、平等、自然、社会契约、对暴君的憎恨以及人民主权等，这些在它的信徒看来，是不证自明的福音书。新的真理使得这样一些使徒被俘获了：他们拥有某种权力，并最终和世界上所有的信徒一样，试图通过以武力的方式强制推行这些真理；将异教徒的观点和意见置之不理，他们被消灭乃是罪有应得。

就像我们在宗教改革时期看到的那样，所有伟大的宗教都不可避免地对异教徒产生仇恨，由此我们对雅各宾宗教的不宽容就很容易理解了。

宗教改革的历史同时表明，同种信仰的两个分支之间的矛盾是异常尖锐的。所以，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讶：在国民公会里，雅各宾党人猛烈地攻击另一派与自己的信仰几乎完全相同的共和

党人。

新的使徒对布道充满热情。为了使外省的民众皈依新教，在武力的拥簇下，他们往那里派遣了虔诚的信徒。新信仰的检察官对谬误丝毫不含糊，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共和国绝不容忍一切反对它的事物。”如果国家拒绝获得新生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它愿意与否，它必须再生，卡里埃说：“如果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法兰西，我们就要毁灭它。”

由新的信仰所产生的雅各宾主义政策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一种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的专政指导下，实现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经济规律以及人的真实本性之类的实用性思想，统治法国的理论家根本一无所知，他们完全醉心于演讲和断头台。他们的演说幼稚至极，泰纳说：“他们除了抽象的事物之外，从不提及事实，一长串的句子都是关于自然、人民、暴君、自由、理性等，如同许多被鼓得大大的气球，一升到高空就彻底破裂。我们如果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在实践中都以可怕的灾难而告终的话，可能还以为他们是在做逻辑游戏、学校作业、学术证明或是思想实验呢！”

雅各宾党人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专

制，在他们看来毋庸置疑的是，拥有最高主权的国家必须得到服从，与在地位和财产上大致平等的公民进行讨论是毫无必要的。

他们赋予自己的权力并不比他们之前的历代君主所行使的特权少多少，反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他们限定，并僭称自己有权任意处置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他们对革命信仰的再生功效有着坚信不疑的信念，以至于在对君主宣战之后又开始了对上帝的宣战。他们启用新的历法，抹去了历代圣人的名字。他们又建立了一个新的上帝，理性之神，并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处女”祭坛上举行崇拜庆典，其仪式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毫无二致。这一祭祀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用一种私人宗教取而代之为止，罗伯斯庇尔任命他自己为这一宗教的大主教。

作为法国唯一的主人，雅各宾党人及其信徒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全国抢劫，虽然他们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不是多数派。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人数，只知道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泰纳估计在巴黎七十万名居民中有五千位党徒；在贝桑松三十万名居民中有三百位

党徒：在整个法国约有三十万位雅各宾党徒。“一种小型的强盗封建制度接管着一个臣服的法国”，用泰纳的话说，他们的人数虽然很少，却足以支配整个国家，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他们的信仰赋予了他们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其次，由于他们充当着政府的代表，而多少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又一直都温顺地臣服于这些发号施令的人；最后，由于人们无知地认为，如果他们被推翻了，将要导致的后果就是旧制度的复辟，许多国有土地的购买者对此自然是深怀恐惧。他们的暴政只有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时，才会有那么多的地方起来反抗他们。

他们权力中的第一个要素至关重要，在强势信仰与弱势信仰的冲突和对抗中，胜利总是倾向于前者。由一种强势信仰所产生的坚强意志，压倒微弱的意志，是很自然的。雅各宾党人自己最终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暴力激起了成千上万微弱意志的聚合，一旦当这些意志凝聚起来，就会超过雅各宾党人的坚强意志。

被雅各宾党人残酷迫害的吉伦特党人，确实也有其坚定的信仰，但在随后的斗争中，他们所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克制这些信仰，并学会尊重某些传统和他人的权利，而这些犹豫在他们的对手那里丝毫不成问题。



“吉伦特党人的情感，”埃米尔·奥利维尔写道，“多半是细腻而宽宏的；而雅各宾暴徒的情感则是粗俗、低劣而残忍的。‘超人’马拉的声誉与维尼奥不可同日而语。”

起初，凭借过人的才能和雄辩口才的吉伦特党人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很快他们就拜倒在山岳党人手里。那帮不值一提的狂热分子，善于活动，并深知该如何煽动平民大众的激情。国民公会给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理智。

### 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征

除了一般议会普遍具有的特征之外，每一种议会还会因受环境与时事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些特征，它们构成了任何一个具体议会的独特面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大部分引人注目的特征，以一种集合的形式在国民公会身上再次得到体现。

国民公会大约由七百五十名代表组成，其中有超过1/3的人曾在制宪议会或立法议会中任职。雅各宾党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党派在选举中获胜，对选民进行恐吓，结果，七百万名的选民中有六百万名的选民选择了弃权。

从职业上看，国民公会成员包括大量律师、公证人、法官、法警、退職官员以及几个文人。国民公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同质的，这样一个由特征迥然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议会很快就会分裂为几个小群体。于是国民公会很早就形成了三派：吉伦特派、山岳派以及平原派。原来的立宪君主派已经不复存在。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是典型的两个极端，它们各自拥有大约一百名成员，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领袖人物。山岳派包括了最激进的成员：库通、埃贝尔、艾罗·德·塞舍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马拉、科洛·德布瓦、比约·瓦伦、巴拉斯、圣茹斯特、富歇、塔里安、卡里埃、罗伯斯庇尔等；吉伦特派则包括布里索、佩蒂昂、孔多塞、维尼奥等人。国民公会中另外的五百名议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形成了所谓的平原派。

平原派是一个随波逐流的群体：它没有一定的主见，胆小怕事，优柔寡断；它随时听命于自己的冲动，并且因为片刻的激情而失去控制；它对前两个派别中较为有力的一派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在追随了吉伦特派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听命于战胜了对手的山岳派的领导。我们前面已经表述过的规律之自然结果，便在这里得到了证明，按照这一规律，弱者不可避免地要服从于较

强意志的支配。

伟大的操纵者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在国民公会统治时期更是表现得尤为明显。国民公会通常受到暴戾而狭隘的少数人的制约，这些人强烈的信念赋予他们巨大的力量。

胆小怕事、动摇不定的多数人总要受残忍而大胆的少数人的支配，这可以解释我们在一切革命议会中所观察到的一个永恒趋势，那就是它们必然会走向极端。国民公会的历史再次验证了我们在另一章里所研究的加速度规律（the law of acceleration）。

因此，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从温和一步一步地滑向暴虐，最终走向自相残杀，这似乎是注定好了的：在最初领导国民公会的一百八十名吉伦特党人中，就有一百四十个人被处死或流放；最后，最狂热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出现，他仅以一人之力，独自控制了这群吓破了胆的奴仆般温顺的代表。

当然，大多数人在这五百名代表中虽然没有自己的主见，喜欢随波逐流，但其中不乏富有才智和经验之士，国民公会中承担实际工作的技术性委员会都得从平原派中征募委员：

平原派的成员或多或少都对政治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状态，他们很不希望有人会对自己表示出特殊的关注。他们自我封闭在委员会中，几乎很少在议会中抛头露面，也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国民公会中常常只有不足1/3的代表参加出席会议。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能干而诚实的人在性格上显得异常软弱，他们受着恐惧的支配，对于他们暴虐的主人所提出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措施，通常投的是赞成票。

平原派的议员们对强制他们接受的一切措施，例如设立革命法庭、实施恐怖政策等，都投了赞成票，正是由于他们的协助，山岳派最终镇压了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清除了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和所有孱弱的人一样，平原派总是追随着强者。平原派的这些温文尔雅的慈善家，虽然国民公会由他们构成了大多数，但由于他们的胆怯，反而促成了国民公会可怕的暴行。

可怕的恐惧，是盛行于国民公会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异常特殊的恐惧，使得相互猜忌，人人自危：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先砍掉他人的脑袋。

我们当然非常容易解释这样一种恐惧心理：不幸的议员们在民众领袖的叫嚣与喧哗中在议会议事，而且时刻都会有手持长矛、粗横无礼的家伙破门而入，所以大多数议员不敢再出席会议。他们偶尔也会参加会议，但那也仅仅是在山岳派的威胁下默默地投票，尽管这些人只占议员总人数的1/3。

事实上，山岳党人自身也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只不过他们很少显露出来罢了。他们清除异己，不仅是由于他们狭隘而狂热的党派之争，大多数情况下，还在于他们确信自己的生存已然受到了威胁。革命法庭的法官们同样也在颤抖，他们其实并不想宣判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的遗孀以及其他许多人有罪，但他们已经身不由己了。

不过，悬于国民公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罗伯斯庇尔成为唯一主宰所造成的阴影。领袖的一瞥使得他的同僚们瑟瑟发抖，面无血色，在他们的脸上只会看到“惊惧的苍白和绝望的呆滞”。

所有的人都惧怕罗伯斯庇尔，而罗伯斯庇尔又惧怕所有的人。正是因为他害怕人们会反对自己的阴谋，所以他砍掉了人们的头颅；也正是因为恐惧，其他人默许了他的暴行。

国民公会的议员的回忆录非常明显地显示了他们对这段黑暗时期所保留的记忆。泰纳说，巴雷尔在沉默了二十年之后，对救国委员会的真正目的和隐秘想法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自我保护；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得以保全；我们处在当时的环境中，生命随时随刻都在受到威胁。当你砍掉邻人的脑袋之后，就不用害怕他会把你拉上断头台了。

国民公会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它告诉我们领袖对议会所施加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

## 第四章 国民公会时期的法国政府

### 一、国民公会时期俱乐部与巴黎公社的活动

在整个国民公会存在期间，它一直为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领袖们所支配。

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对前两届议会的影响，在国民公会期间它们的势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民公会的历史其实就是

俱乐部和巴黎公社控制国民公会的历史，它们不但操纵议会，而且控制整个法国。众多外省的小型俱乐部在首都俱乐部的指示下监督地方官员，惩治嫌疑犯，执行一切革命命令。

当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决定采取某些措施时，议会就会在它们的施压之下，被迫当场投票通过。如果议会胆敢加以抵制，它们就向议会派出武装代表，这些所谓的武装代表，实际上就是那些由平民中的渣滓充任的武装团伙。它们传达的指令总能使议员们无条件地服从。巴黎公社对它们的势力非常有自信，只要是不喜欢的议员，它们可以直接要求国民公会将其驱逐出去。

国民公会的成员一般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巴黎公社的成员则大半由小店主、佣工以及手艺人组成，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的领袖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操纵下，他们总是游离于俱乐部和起义者公社这两股势力中，后者在巴黎所行使的权力更大，因为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国民自卫队只接受了四十八个委员的命令，这些委员要它所做的无非是杀人、洗劫，并且抢劫是第一位。

巴黎公社在巴黎所实施的暴政异常可怕。譬如，公社任命了一个名叫夏拉朗东的皮匠对首都

的部分地区进行监控，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被  
视为嫌疑人而送上革命法庭，并由此送上断头  
台。就这样，巴黎某些街区的人口几乎就这样被  
他给逐一杀光了。

起初，国民公会试图与巴黎公社作微弱的斗  
争，但仍然无济于事。冲突的顶点是国民公会想  
逮捕巴黎公社的朋友埃贝尔，而巴黎公社立即派  
出武装代表威胁议会，并要求将提出该项动议的  
吉伦特党人驱逐。但是被国民公会拒绝了，巴黎  
公社在1793年6月2日按照昂里约的命令，派它的  
革命武装将议会包围了。议会在恐惧之下，不得  
不开除了二十七名议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  
黎公社随即派了一个代表团，对议会的屈服表示  
祝贺。

在吉伦特党人垮台之后，国民公会已经完全  
沦为了巴黎公社的传声筒了。巴黎公社下令招募  
一支革命军队，以配合革命法庭和断头台；为了  
惩治嫌疑犯，这道法令贯彻到全法国。

直到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国民公会才力图  
挣脱雅各宾党人和巴黎公社的束缚：它关闭了雅  
各宾俱乐部，并将其首要分子处以死刑，但此时  
国民公会自身也即将不复存在。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民众领袖仍然没有停止煽动平民对国民公会发起进攻。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国民公会再次受到围攻，武装代表团甚至成功地迫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重建巴黎公社，并召集新一届的议会，在起义者撤离后，国民公会惧于压力赶忙废除那项措施。国民公会耻于自己的恐惧和屈服，它召集了军队解除了巴黎近郊的武装，并拘押了近一万人，起义的二十六个头目被处死，与暴动有关的六名山岳派议员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国民公会的反抗是不会起到大作用的，当它摆脱了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控制之后，它又不得不对救国委员会唯命是从，对救国委员会拟定的法令无须讨论便可全票通过。

“完全可以这么说，”威廉斯写道，“国民公会将欧洲一切的君主和国王都推翻了，但它自己却沦为一小撮唯利是图者的奴隶。”

## 二、国民公会时期的政府：大恐怖

1792年国民公会刚刚召开，就颁布法令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体，尽管当时有很多议员尚存疑虑，因为他们知道外省都属于保王派的。

它相信这样的宣言可以把法国改造成成为一个文明的世界，它制定了一种新的纪元方式和历法，这种纪元的第一年，标志着一个只受理性统治之世界的黎明。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国民公会拉开了序幕，这一举动来自于巴黎公社的指令，但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议员并不希望这样做。

事实上，在一开始，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它相对温和的部分，即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主席和秘书都是从这个派别中选举出来的，这时候罗伯斯庇尔的影响还非常小，他在主席选举中只获得了六票，而佩蒂昂则获得了二百三十五张选票。

山岳派最初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它们的权力在后来经过了逐渐的增长。在它们掌权时，温和派议员在国民公会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

山岳党人虽然是少数派，但还是找到了一个办法逼迫议会将路易十六交付审判。对国王的审判是山岳派对吉伦特派的一大胜利，也是对所有国王的谴责，它标志着新旧秩序之间的彻底决裂。

山岳派圆熟地耍弄政治手腕以实现其目的：从外省发出的要求审判国王的请愿书雪花般地涌

向国民公会，巴黎的起义者公社派出的一个代表团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按照大革命时期所有议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国民公会只能向威胁屈服，做出与自己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事情。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不敢抵制这些要求，只得决定审判国王。

从个人来说，吉伦特党人是不希望国王被处死的，可是一旦集合到一起，就出于害怕而投赞成票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甚至连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都和我们一起投了赞成票。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他若是死后有灵，那么他会看到，这些由于软弱的吉伦特派议员，其大部分成员将跟在他的后面走向死亡之渊。

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看，处死国王也是大革命的一大败笔，因为它导致了国内战争和欧洲的武装干涉；即使在国民公会内部，它也引起了派系的相互攻伐，并最终由此造成山岳党人的获胜和吉伦特党人的被清洗。

在山岳党人影响下通过的措施最后变得暴虐无比，以致有六十个地区都爆发了叛乱。若非由于保王党人参与其中，从而使人们对旧制度的复

辟产生恐惧，这场由被放逐的国民议员们所领导的起义或许就成功了。事实上，在土伦，起义者就高呼路易十七的名字。

从此，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国内战争一直都在持续。战争进行得极其残酷，甚至殃及老人、妇女、儿童；村庄、谷物被焚毁一空。仅在旺代，估计就有大约五十万人到一百万人被杀。

国内战争接踵而至的是对外战争。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之下，雅各宾党人希望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来缓解这种矛盾。所有的革命议会都保持着这样一个传统，即相信法律的神奇法力。在法国，这个信念从未由于实践的失败而破灭。

大革命的一位伟大的仰慕者朗博德先生这样写道：“一个坚定的信仰在支撑着国民公会的事业，它深信一旦当大革命的原则被制定为法律，它的敌人就将束手无策，抑或改变信念；正义的降临将会平息一切叛乱。”

在国民公会存在期间，它曾前后起草过两部宪法，1793年宪法或共和元年宪法和1795年宪法或共和三年宪法。但前者从未付诸实施，它很快就被一种绝对专政所取代；第二部宪法则是在督政府时期制定的。

国民公会里有一大批律师和行政官员出身的议员，他们马上意识到政府的职能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庞大的议会来行使的。于是，国民公会不久就被划分为一些小的委员会，它们各自独立存在，比如财政委员会、商业委员会、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以及艺术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提交的法案，议会通常闭着眼睛就投票通过了。

幸亏有了它们，才使得国民公会的工作不至于完全是破坏性的。它们制定了许多非常有效的议案，比如建立一些重要的大学、确立度量衡公制等。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议会的大多数成员试图在这些委员会中寻求庇护，以躲避对他们构成性命之虞的政治冲突。

居于这些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务委员会之上的是救国委员会，它成立于1793年4月，有九名成员。救国委员会最初由丹东领导，同年7月改由罗伯斯庇尔领导，它逐步把持了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发号施令的权力。

尽管委员会所通过的法案很明智，并构成了国民公会的事业，但是全体议员在代表团之威胁下通过的那些法案则显得相当荒谬。

这些法案与公众的利益或者国民公会自身的

利益都没有多大关系，其中包括1793年9月通过的最高限价法令，它打算固定日用品的价格，其结果却导致了持续的短缺；此外，还有毁坏圣丹尼的王家墓地、审判王后、大规模焚毁旺代、建立革命法庭等。

国民公会时期政府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恐怖政策，它开始于1793年9月，共持续了六个月，直到罗伯斯庇尔之死为止。虽然某些雅各宾党人曾经徒劳地建议在审判时尽量温和，但这项建议的唯一结果就是提议者被处死。最终导致这一可耻阶段终结的恰恰是公众的厌倦。

派系斗争持续不断，以及趋于极端的倾向，把曾经在国民公会里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都吞噬了，最后，它却被罗伯斯庇尔支配了。就在国民公会把法国搞得动荡不安，饱受蹂躏之际，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它们攻占了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荷兰，《巴塞尔条约》认可了这些征服。

我们已经明确地指出，并且我们后面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即必须把军队的工作与国民公会的工作完全区分开来。那个时代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然而今天它却常常被忽视。

当1795年国民公会被解散时，它已经引起了

普遍的不信任。由于长期充当民众奇思怪想的牺牲品，它不但没有使法国恢复安定，反而把它推进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瑞典驻法国临时代办德林克曼男爵在1799年7月的一封信中极好地概括了人们对于国民公会的一般看法：“我希望不要有哪个民族，再像法国那样，从它自由开始以来，一直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统治了，他们简直就是残酷低能的无赖。”

### 三、国民公会的终结与督政府统治的开始

在它行将解散的时候，国民公会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以替代1793年宪法。立法权由元老院和众议院分享；行政权被委托给督政府，执政官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的提名任命，每年通过选举更换其中的一人。它特别规定新的议会中2/3的成员应当从国民公会的议员中选出，这项措施成效不大，只剩下十个部门仍然对雅各宾党人效忠。

为了避免保王派当选，国民公会决定将所有的流亡者永远驱逐出境。

这部宪法的公布并没有对公众产生预期的效果，它没能制止平民的暴动，最重要的一次是1795年10月5日威胁国民公会的暴动，起义领导

人对议会动用了一支正规武装。面对挑衅，国民公会最后决定反击，它召集了军队，并将指挥权委托给巴拉斯。

波拿巴受命承担了这次的镇压任务，由此他开始脱颖而出。有这样一个指挥官，行动自然是迅捷有力的。圣卢克教堂附近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最后起义者被击退，几百人当场被击毙。

这次行动暴露出一种国民公会还很不习惯的果断，但它完全得归功于军事上的神速，因为就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议会还准备俯首帖耳地听命于起义者派出的代表。

## 第五章 革命暴行的实例

###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动机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革命理论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

作为人道主义者，革命者常常感情用事，他们鼓吹自由和博爱，但是同许多宗教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学说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实际上，没有什么自由被容忍，博爱也很快被狂热的屠杀所替代。



原则与行为之背离源于一切信仰的不宽容，一种宗教或许充满了人道主义和自制精神，但它的信徒总是想通过武力强加于人，于是，暴力就产生了。

所以，大革命的暴行是一种新教义在传播过程中与生俱来的结果。宗教裁判所、法国宗教战争、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南特赦令》的废止、龙骑兵对新教教徒的迫害以及对詹森教派教徒的迫害等，和大恐怖都同属于一个家族，其心理根源是一样的。

路易十四其实并不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但是，他在信仰的驱使下，先是射杀了一大批新教教徒，又放逐了一些人，最后将几十万名新教教徒驱逐出法国。

一切信徒所采取的迫害手段不是源于他们对异教徒的恐惧，路易十四时代的新教教徒和詹森派教徒毫无危险可言。不宽容首先源于心灵上的义愤，它深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对于那些否认这些真理，因而必定不会根据良善的信仰行事的人，怎么能保持宽容呢？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剪除谬误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容忍谬误呢？

这种心态体现在各个时代的信徒身上，后者

当然也一样，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些真理在他们看来是很明显的，并且它们的胜利必然会使人类实现再生。这样，他们对待自己的对手会比法国的教会与国王对待异教徒更宽容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恐怖是所有信徒都视为必然的一种手段，因为宗教法典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之上，为了强迫人们遵守、遵行，信徒们试图以威胁恫吓他们。

雅各宾信仰的使徒们的行为与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将看到同样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果一种新的信仰明天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将会采用类似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的布道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看作是一种宗教运动结果，我们就无法全面地理解它。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取得了胜利的宗教信仰，聚集着许多人的利益，这些个人利益附着于这一信仰。大恐怖是由几个狂热的使徒指挥的，但是除了这少数几个热诚皈依者之外，还有一大帮只想从中牟利的人，他们欣然地追随那些领导人，因为这些领导人允诺他们可以享受掠夺的成果。

“大革命时期的暴徒，”索列尔写道，“之所以求助于恐怖政策，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权力，而这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做到的。他们使用恐怖政策是为了拯救自己，但在事后他们却声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国家：在恐怖成为一种制度之前，它仅仅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制度只不过是使手段合法化而已。”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埃米尔·奥利维尔在其关于大革命的著作中对大恐怖做出的如下结论：“大恐怖首先是一场暴动，一场合法化的抢劫，一场纠合了各种罪行的规模浩大的盗窃。”

##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s）是大恐怖行动的主要机构，除了巴黎外，革命法庭还遍及整个法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建立者丹东最终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泰纳指出：“当时法国一共有一百七十八个法庭，其中有四十个巡回法庭，它们可以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宣判死刑，而且往往是就地执行。在1793年4月16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巴黎的革命法庭共处死了两千六百二十五人；而外省的法官们在奥林奇小镇一地，有三百三十一人被送上

断头台；在阿拉斯市，二百九十九名男子和九十三名妇女被处死.....在里昂，革命专员们批准了1684宗死刑.....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大约是一万七千人，其中有一千两百名妇女和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

尽管法国的革命法庭仅仅宣判了二千六百二十五个死刑者，但应该注意的是，所有的嫌疑犯在9月就已经被草率地处决了。

巴黎革命法庭事实上只是救国委员会的一件工具，起初，革命法庭还循规蹈矩地遵循一些法律形式，但很快就被取消了；质询、答辩、证据最后统统不需要了，道德证据，也就是纯粹的猜疑就足以定罪了，法庭庭长通常只需要对被告提一个问题即可。尽管如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富基埃·丹维尔还提议就在法庭内设立断头台。

巴黎革命法庭把因党派之争而被捕的人一律送上断头台，并很快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沦为血腥暴政的工具。它的始作俑者之一丹东，在走向断头台之前，曾公正地请求上帝和人类宽恕自己帮助建立了这样一个法庭。

无论是以拉瓦锡之天才，卢茜娅·德穆兰之温厚，还是以马尔泽布之美德，在它这里没有任何

怜悯可言，在劫难逃。“这些天才，”邦雅曼·贡斯当说，“就这样被一帮最胆怯、最野蛮的人给杀害了。”

如果要为革命法庭找出理由，我们就需要回到雅各宾党人的宗教心理上，这项工作在精神上，抑或是在目标上，都可以与宗教裁判相提并论。那些为之供奉牺牲的人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是人类的救星，因为他们是在镇压异教徒，那些新信仰的敌人，而这些信仰将使地球获得新生。

在大恐怖时期，受到惩罚的不只是特权阶级。有大约四千名农民和三千名工人也成了刀下亡魂：

今天我们在目睹执行一桩死刑时，往往会产生恻隐之情。有人由此设想，一次对那么多人处以死刑，将使人们产生一种怎样的强烈情感呢？但是，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是如此迟钝，以致最后都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那时候，母亲们经常带着她们的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

日常的杀人场景使得人们对于死亡无动于衷。吉伦特党人在登上断头台时都异常平静，他们高唱着《马赛曲》，仿佛自己是在攀登楼梯。

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源于习惯的法则，它可以使人的情感迅速钝化。面对保王党人起义，人们已经对断头台不感到畏惧了。大恐怖在进行，却不再使人感到恐惧；只有在它尚未实施时，恐怖才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策略，真正的恐怖与其说来自它的实现，毋宁说来自它的威慑。

### 三、大恐怖时期的外省

外省革命法庭的死刑只能反映屠杀事件之一部分。革命军队在法国境内烧杀劫掠，肆意横行。泰纳如下指出：

在贝多因，一个只有两千居民的小镇，有人砍倒了那里的自由树，于是，四百三十三座住宅被毁坏或焚烧，十六个人被推上断头台，四十七个人被射杀；其他人则被驱逐，他们的生活，就像沦落到山林里的流浪汉，并且只得在地上挖出洞穴来遮风避雨。

被送到革命法庭的那些人，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对革命审判的谴责很快被压制。在南特，卡里埃根据他的猜疑，将近五百万人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淹死或射杀。

这些屠杀的细节在热月反动之后的《政府通

报》（Moni-teilLr）上记录了下来，我这里征引几则：

托马斯说：“在攻占努瓦木提埃后，我看到有许多男人、妇女和老人被活活地烧死……妇女，一个十四五岁的幼女遭强暴后被残杀；刺刀上挑着稚弱的婴儿；他们把幼儿从母亲身边拉开，并当场绞死。”

同一期《政府通报》上，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个名叫朱利安的人提供的证词，他说卡里埃强迫受害者自掘坟墓，然后把他们活埋。1794年10月15日的《政府通报》上，刊载了蒂翁维尔的梅兰的报告，证实“勒德斯尼号”舰长接到指令，将四十一名受害者沉溺到海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七十八岁的盲翁，十二名妇女，十二个女孩和十五名儿童，这些儿童有十个人在十岁到六岁之间，其余五个还在吃奶”。

在对卡里埃的审判中（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30日），他还被证实曾“下令溺死、射杀妇女和儿童，并且命令哈克索将军将旺代所有的居民都杀死，将他们的住所也付之一炬”。

卡里埃从目睹受害者的痛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在革命法庭捕杀牧师的过程中，”他

说，“每当看到他们垂死之前的痛苦表情，我就会开怀大笑，生平快事，无甚于此。”（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22日）

为了配合热月反动，卡里埃成了被审判的对象，但是，在其他许多城镇，都发生了类似于南特屠杀的事件，富歇在里昂杀害了两千多人；在土伦遇害的人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以至于几个月里该地人口从两万九千人锐减为七千人。

公正地讲，这帮邪恶的家伙，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是他们得到救国委员会的不断鼓励，卡里埃在对他的审判中给出了这一证据：

“我承认，”他说（见《政府通报》，1794年12月24日），“每天有一百五十名或两百名囚犯被枪毙，但那都是委员会发给我的指令，我只不过充当一个执行者。我告诉国民公会，数以百计的匪徒已经被击毙，他们对这一数字很是赞赏，并命令把它载入公告。为什么当初这样做的代表们现在却对我如此愤慨激昂呢？他们当时会拍手叫好，并继续让我执行任务这是为什么？难道因为那时我是国家的救世主，而现在却成了一个嗜血的人？”

不幸的是，卡里埃不知道就在他做出这样的



论述时，国民公会还掌握在七八个人手里，所以他们无法反驳卡里埃的辩白。卡里埃被送上断头台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整个国民公会成员也逃避不了任何干系，他们应该一起被处死，因为屠杀的命令经过了他们的批准。

后来救国委员会的一些信件证实了卡里埃的辩白，信件中的内容始终督促那些“执行任务”的代表采取行动，这就表明大恐怖时期的暴行并不是由少数几个人自发地冲动而为，而是源于一种机制。

大恐怖时期的这种破坏欲望并不只是对人的毁灭，对无生命事物的破坏更为严重。真正的信徒总是喜欢打破偶像，他们一旦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他们在消灭一切能够让人回忆起旧信仰的偶像、庙宇以及象征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就像是在消灭自己信仰上的敌人。

我们知道提奥多西皇帝在改信基督教以后，首先将屹立在尼罗河畔的6000多座庙宇摧毁。因此，当我们看到领导人攻击纪念碑和艺术作品的那个时代之遗迹时，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塑像、手稿、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以及金银餐具统统被砸烂，当富歇作为国民公会的代表

被派到涅夫勒时，他下令摧毁一切城堡的塔楼和教堂的钟楼，“因为它们同样是有害的”。

对艺术品的革命破坏行为甚至殃及坟墓，在巴雷尔向国民公会宣读了一份报告之后，位于圣丹尼的宏伟壮观的皇家墓室被砸成碎片，棺材也被撬开；蒂雷纳的尸体在被一个看守拔出牙齿当古董卖掉以后，被送到了博物馆；亨利四世的上髭下须也被一拔而光。

这些看来还是比较有文化修养的人，竟然会同意毁坏那些艺术珍品时，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呢？因此，我们应当铭记：强烈的信仰导致的后果必然是最恶劣的暴行，国民公会也不例外。面对暴徒的冲击，这些议员不得不屈从于大众的意志。

一方面，这一记录所显示的是狂热盲信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它还在告诉我们：人们一旦摆脱了一切社会的约束，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他们手里掌握了权力的时候，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 一、革命议会与军队

如果我们对议会，尤其是国民公会的情况一无所知，不了解它的内部纠纷、它的弱点、它的暴行，那么对它的回忆必然是很模糊的。

但是，即使在敌人的心目中，也仍然保持着一项毋庸置疑的光荣，那就是它在军事上的成功。就在国民公会解散的时候，法国的版图已经拓展到了比利时，并且一直延伸到莱茵河左岸。

若把国民公会看作是一个整体，说它推动了法国军队的胜利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分析这个整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它们各自的因素，那么它们之间的分离与独立立刻就会显示出来。我们会看到，国民公会在這時候对军事行动的贡献是相当微弱的。前线的军队与巴黎的革命议会俨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相互的影响；它们看问题的视角亦截然不同。

国民公会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它在大众的要挟下，自己毫无主见；它的确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深刻典型。它控制不了任何东西，相反倒在不断地受人支配，所以，它又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军队呢？

议会完全消耗在内部的争吵上，军事问题无

暇顾及，而交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几乎由卡尔诺一人指挥，而卡尔诺的真正作用就是为军队提供后勤和弹药。卡尔诺的功绩在于他除了要将七十五万两千名军人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之外，还要督促军队的将领们采取进攻，并保持严格的纪律。

国民公会在国家防务上唯一的贡献就是颁布了普遍征兵的法令，不过，面对大批强敌压境，任何政府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曾有过一段极短的时间，国民公会曾经派代表下令处决某些将领，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取消了。

议会在军事活动上无足轻重，这是千真万确的。凭借人数、热情以及年轻将领所采取的灵活战术，军队才取得了这些胜利。它们南征北战，东突西进，完全独立于国民公会。

## 二、反对大革命的欧洲战争

在列举那些促成了革命军队获得成功的各种心理因素之前，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欧洲战争的起源与进展。

在法国最初爆发大革命的时候，外国的君主们正幸灾乐祸，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法国的国王

视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普鲁士的国王相信法国将由此受到严重削弱，自己可以从中渔利，所以，他建议奥地利的皇帝以割让佛兰德斯和阿尔萨斯为条件帮助路易十六，这两个君主在1792年2月签订条约建立了反法联盟。在吉伦特党人的影响下，法国先发制人对奥宣战。起初，法国军队受到了几次挫折，反法联军突进到香槟省，并且离巴黎只有一百三十里之距。杜穆里埃在瓦尔米取得胜利后，奥普联军被迫撤离法国。

尽管在这次战斗中，只战死了三百名法国士兵和两百名普鲁士士兵，但它产生的意义却极为重大，号称无敌之师的普鲁士军队英勇不及年轻的革命军队，被迫撤退；而法国军队则四面出击，几周之内，瓦尔米的士兵就将奥地利人逐出了比利时，在那里他们被当作解放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但正是在国民公会的统治时期战争才显得如此重要，1793年年初，议会宣布比利时并入法国，由此产生了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一直持续了二十年。

1793年4月，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集会，他们决定将法国肢解，普鲁士人打算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奥地利

人想得到佛兰德尔和阿图瓦；而英国则觊觎敦刻尔克。奥地利的大使主张通过恐怖粉碎大革命，“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统治这个国家的派别”，面对这样的处境，法国必然是要么打垮敌人，要么坐以待毙。

在1793年到1797年第一次反法联盟期间，法国不得不在从比利牛斯山到北部的所有边境拉开战线。

在战争初期，法国先前的战果不仅丧失，而且受到几次重创：西班牙人占领了佩皮尼昂和巴约纳；土伦被英国人占领；奥地利人占领了瓦朗谢讷。这时候，1793年年末，国民公会命令对所有年龄在十八岁到四十岁的法国人，实行普遍征兵制，并且大约七十五万人被成功送到前线。旧的王室军队各兵团合并到志愿者与新兵的队伍中。

于是，反法联军又一次被击退了，在茹尔丹取得瓦提尼大捷后，莫伯日的围困被解救；奥什收复了洛林；法国采取攻势，再次占领比利时和莱茵河西岸；茹尔丹在弗勒留斯击败了奥地利人，将他们赶回莱茵河，并占领了科隆和科布伦茨；荷兰也受到侵犯。反法联盟的君主们被迫求和，不得不面对法国的军事战果。

法国的胜利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敌人从未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战争，它们那时正忙于瓜分波兰，从1793年开始直到1795年才如愿以偿，每一方对此都心无旁骛以期待得到更多的领土。这一想法已经导致普鲁士国王在1792年瓦尔米战役后就撤军了。

另外，反法联盟各国的迟疑和相互猜忌，对法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有利的，蒂埃博将军说，奥地利人如果在1793年夏就坚持向巴黎长驱直入，那么，“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但他们却贻误了战机，结果拯救了我们，为我们赢得了时间”。

《巴塞尔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在欧洲大陆除了奥地利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对手了。在督政府时期，法国在意大利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波拿巴负责这次战役，经过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一年的战斗，法国再次得到胜利，最后一个敌人也被迫求和。

### 三、决定革命军队胜利的心理因素与军事因素

革命军队之所以节节胜利，是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热情、忍耐与克制，它们对革命的原则坚定不移，它们相信自己是一种新宗教的传播者，

这种宗教将使世界获得新生。

我们回想一下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它们受到穆罕默德理想的热情鼓舞，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可怕军队，迅速征服了古代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和国战士那种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就来源于类似的信仰。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精神，而且从未动摇过。当国民公会让位于督政府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他们开始把战争推进到敌国境内，在这一时期，只有士兵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信仰是会传染的，法国大革命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所以几个受到君主专制压迫的国家都把入侵者当成了解放者，对他们崇拜不已。萨瓦的居民跑出来迎接法国军队；在美因茨，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种植自由树，以此欢迎他们，并效仿巴黎成立了一个国民议会。

所以，只要军队所面对的民族仍然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轭之下，那么它们是很容易就取得胜利的，但是，如果与它们发生冲突的民族拥有和它们同样强烈的理想，它们将会遇到重重阻碍。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信



仰、并苦于它们的主人专制压迫的民族充满了诱惑，但是对于那些有着自己根深蒂固之理想的民族，它自然无计可施。也正因为这样，共和国的军队与布里多尼人和旺代人抗争了若干年。

1793年3月，旺代与布列塔尼的起义已经蔓延到十个地区，旺代人在普瓦图，舒安分子在布列塔尼共投入了八万人作战。

两种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冲突总是无情的，在旺代的战争立即变得极为残酷野蛮，其惨烈只有在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这场战争持续到1795年，奥什将军使国家获得了最后的“安定”，这种“和解”的实现仅仅是其捍卫者在肉体上被消灭的结果。

“两年的国内战争以后，”莫雷纳写道，“旺代地区无异于一片废墟，大约有九十万人在兵燹中死于非命，幸免于难的少数人也躲不过冻馁之灾，因为田地被毁坏，篱笆和墙舍被推倒，房子也被付之一炬。”

使他们能够无往不胜的除了他们的信仰之外，大革命的士兵还得益于那些杰出将领的指挥，这些将领往往热情饱满，身先士卒。

军队大部分先前的将领，因为贵族出身都被撤换了，于是不得不组织一个全新的军官集体，因此一些军事天才便得以大显身手，脱颖而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提拔，越过所有军衔。比如奥什，1789年还是一个下士，可是他到二十五岁时就成了一个师的将军，并成为一支部队的司令。这些军事领袖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他们的敌手所不习惯的。他们完全靠军功升迁，在战斗中果断勇敢、灵活机变，可以迅捷地制定出能够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的战术、战略。

军队中的士兵虽然缺乏与职业军队作战的经验，但他们的训练和操练方法与七年战争以来普遍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面对这种复杂的战略，老式的方法根本应付不了。

他们在进攻时采取大批军队同时行动的方式，由于配置的人数很多，相当数量的缺口可以通过这种野蛮但不失有效的方式得以迅速补充。

人数众多的军队可以用刺刀袭击敌人，并且迅速地击溃那些作战保守的传统军队。那个时代烽火传递信息的速度很慢，所以法国人的策略比较容易有效，但是，它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士兵的大批伤亡，据统计，从1792年到1800年，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超过1/3的有生力量（两百

万人中的七十万人）。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中继续推演出一些结论。对巴黎的革命群众和军队中的革命群众进行的一项对比研究，展示了两幅截然不同却易于理解的画面。

我们已经指出，群众根本没有能力驾驭和运用理性，他们仅仅受自己的感情冲动支配，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英雄主义也乐于接受，甚至经常产生高度的利他主义，所以很容易发现很多人准备献身于一种信仰。

他们的心理特征复杂多变，根据环境的不同可以产生相去甚远，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行为。国民公会和军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向我们展示了由相似要素所构成的群众，在巴黎和前线的行为方式是如此不同，以致几乎无法让人相信我们所谈论的是同一个民族。

在巴黎，群众是暴虐的、混乱的、凶残的，他们反复无常，一切政府管理由此陷于瘫痪。

而在军队的景象却完全不一样，同样是一群不寻常的人：他们恪守勤劳农民所具有的那种本分与克制，严格遵守纪律；他们在富有感染力的

热情的激励下，帮助穷人，视死如归；他们的应变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并打垮了欧洲最为可怕的军队。

纪律可以改造人，一旦摆脱了它的约束，任何民族和军队都可能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这一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被遗忘，我们日渐忽视了人类集体逻辑的基本规律，总是喜欢追随大众的意志，而不是学会如何引导它；群众必须被指引上路，他们不适合自己的选择。

##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 一、大革命时代人的精神状况：暴力与虚弱的影响

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智力作出判断，而其行动却受自己性格的支配。为了充分地理解一个人，必须把这两个因素区分开来考虑。

在重大的变革时期，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是性格。

我们在好几章里都曾描述过盛行于动乱时代的各种精神状态，所以我们不必马上就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些精神状态属于一般的类型，此外

它们还要受到每一个人的遗传性和获得性精神状态的修正。

我们已经看到，神秘主义因素对雅各宾党人的心理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新信仰的皈依者那里导致了残忍的狂热。

同时，我们也看到，并非所有的国民公会成员都是狂热的盲信者，发展到后来，只有少数人是盲信者，因为，即使在革命议会最为暴虐的时候，绝大多数议员也都是温顺软弱的中间派。在热月政变之前，议员们因为害怕而投票赞成暴力，热月之后他们又附和温和派。

在革命时代，这些适中性格的人在人数上占大多数，然而他们对最极端的冲动屈服。事实上，他们和那些暴力性格的人同样危险，后者的力量因为前者的软弱而更加嚣张。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到，一小部分心胸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总是支配着绝大多数通常富有才能，但缺乏性格的人。

除了狂热的使徒和性格软弱者之外，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只考虑如何牟取一己私

利的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用环境从中渔利，比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迎合强者，欺压弱者成为他们唯一的政治信条。

从大革命一开始，这些“暴发户”就为数不少，卡米尔·德穆兰在1792年写道：“我们的革命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和自爱，它们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普遍利益。”

如果我们在另一章里加入观察到的这些细节，即关于政治巨变时代人们所体现出的各种精神状态的那一章中，我们将得出关于大革命时代人们性格的一个一般性观念。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已经得到详细说明的原则运用到革命时期最为显赫的那些人身上。

## 二、委员会委员或特派员的心理

在巴黎，国民公会议员的行动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支配、限制或鼓动。

为了对他们做出恰当的评价，我们应该在他们行动自由、不受外部控制的时候观察他们，当国民公会派遣特派员到各个部门或地方“执行公务”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特派员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们。

一个“执行公务”的特派员可以视其需要，对个人财产实行“征用”、扣押或充公；如果他认为合适，可以任意抽税，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监禁、放逐或斩首，在他的辖区内他就是一个“帕夏”。

他们把自己视为“帕夏”，在地方吃喝玩乐：“乘坐着六匹马的马车，前后卫兵环绕；坐在铺了三十张罩子的华贵餐桌旁，一边用餐，一边听音乐，周围簇拥着一群演员、交际花和阿谀奉承者……”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庄严威仪活脱脱一个土耳其显贵。不经过三番五次的请求，没有人能见到他一面；在进入他的接待室之前得先通过好几个房间，并且必须和他保持至少十五步的距离”。

我们能够想象这些擅权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镇时所表现的傲慢和神气，在前簇后拥的卫队面前，稍有不轨举动就要脑袋搬家。

此前，他们都是些找不到顾客的律师、没有病人来就诊的医生、被革去圣职的牧师、落魄的代理律师，生活窘迫而乏味；忽然之间可以和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暴君平起平坐。他们毫无怜悯地

斩首、溺亡、射杀，于是，他们由先前卑微的地位青云直上到最显赫的当权者。

无论是尼禄还是赫利奥加巴勒的暴政都没有超过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限制，而这些特派员根本毫无任何限制和阻碍。

泰纳写道：“富歇拿着望远镜从他的窗户里观看对里昂两百一十名居民的屠杀；科洛、拉波尔特和富歇在执行死刑（对犯人排射连发）的日子里大宴宾客，每一次发射，都要发出欢乐的叫喊和欢呼，舞动他们的帽子。”

在那些“执行公务”的特派员中，我们可以以前牧师勒蓬为例，来观察一下他嗜血好杀的精神状态，这家伙凭借无上的权威蹂躏了阿拉斯和坎布雷。他以及卡里埃的例子有助于显示一旦人类摆脱了法律和传统的约束，会堕落成什么样子。这个凶残的议员所表现的残忍，因虐待狂而加重，他在自家的窗户下架起断头台，这样他、他的妻子以及助手就可以从屠杀中获得即时的乐趣！在断头台的底下，设立了一个小酒馆，无套裤汉们可以进来喝酒，为了娱乐他们，刽子手们在人行道上把被斩首者的裸尸摆成各种荒谬的姿势。



阅读1795年在亚眠印刷的对他的审判的两本卷宗，就宛如是一场梦魇。在二十次的开庭过程中，阿拉斯和坎布雷大屠杀的幸存者每次都经过亚眠古老的市政大厅，那里，前国民公会的议员在接受审判。我们已经听不到那些哀恸的亡灵在述说着什么，整条街的人被处死；九十多岁的老人和十六岁的女孩就因为谴责了一次审判而被杀害；一边是被殴打致死，遭受凌辱，一边是张灯结彩，眉飞色舞；伴着音乐执行死刑；童子军被征募来守卫断头台；这样一个精神变态的总督道德败坏，玩世不恭；萨德的传奇故事竟然变成了英雄的史诗。当我们看到这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事件被揭露时，仿佛整个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恐怖统治之后，在最终吐净它的暴戾，向那些怯懦的人复仇，可是它覆灭的都是些不幸的人，他们成了一个令人憎恶的已经消失的制度的代罪羔羊。

唯一可以为这个前牧师辩护的就是他只是在负责执行命令，他受到指控的那些事实早就众所周知，但国民公会从未因此而谴责过他。

我已经指出，这些“公务在身”的特派员一下子就拥有了一种超过以前最有权势之暴君的权力，自然会嚣张至极，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他们何以如此凶残。

这源于其他的因素。作为一种严格宗教信仰的使徒，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就像宗教法庭的检察官，绝不会怜悯为他们牺牲的人。而且，一旦摆脱了所有传统和法律的束缚，最残忍的本能就失去了羁绊，留在他们身上的就只有原始的兽性了。

文明抑制了这些本能，但它们从根本上没有断绝。猎人的搏杀欲望就是一个永久的证据，居尼塞一卡尔诺在下面的这段文字里向我们展示，这种遗传性倾向在最没有危险的游戏是如何表现其力量的，它唤醒了每一个猎人身上残留的野性：

可以说，为杀戮而杀戮的乐趣是非常普遍的，它是狩猎本能的根基，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文明国家中，狩猎本身就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事实上，我们继续从事的这种活动，在我们未开化的祖先那里是生存所强加的：他们如果不去捕获猎物，那么就得饿死，而今天它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合法理由了。但是，它还继续存在着，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或许我们永远也挣脱不了这一加在我们身上如此之久的枷锁：我们无法消除自己在看到动物流血时产生的那种强烈的、经常是充满激情的快感；当我们为一种追猎的欲望所控制时，我们的怜悯之心就全部丧失

了：最优雅、最机灵的造物，歌唱的小鸟，春天里的宁馨儿，栽倒在我们的枪口下，或者卡死在我们的陷阱中；我们看到它们受惊吓、流血，在可怕的痛楚中扑腾，用它们可怜的断爪寻求逃生之路或者拼命地抖动根本无法支撑它们的翅膀，这一切本都是你我的罪过，可是我们却从中发现了乐趣，丝毫没有同情的战栗……唯一的借口是这种返祖现象是如此强烈而冲动，即使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无法抗拒。

在正常的年代里，这种异常的返祖现象是受到法律的限制的，它只能在动物身上得以发泄，但是，当法律规范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它立即就向人身上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恐怖分子可以从杀戮中获得强烈的乐趣的原因了。卡里埃说他在看到那些受害者承受痛苦的面部表情时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就是一个典型。在许多文明人中，残忍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本能，但它绝没有根除。

### 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中的两个中心人物，对于前者我不打算对他描写过多：他的心理状态并不复杂，而且我们是很熟悉的。起初他是俱乐部里的雄辩家，冲动而激烈，似乎总是热衷

于煽动人民，但他的残酷仅仅体现在言辞中，他甚至常常为这些言辞所导致的结果感到后悔。从一开始，丹东就在上流社会中光彩照人，而他未来的对手罗伯斯庇尔，相比之下要暗淡得多。

丹东曾经一度是大革命的灵魂，但他缺乏韧性和行为的坚定，并且他生活窘困，而罗伯斯庇尔则不是。罗伯斯庇尔持续不断的狂热最终击败了丹东间歇性的努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罗伯斯庇尔这样一个强大的民众领袖最后竟然被他软弱而平庸的对手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作为大革命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已经被人反复加以研究，但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要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巨大力量赋予了他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很不容易的，无论对大革命的敌人，还是对那些根本不可能敌视现存政府的同僚，都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应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泰纳评价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沉溺于抽象观念的“冬烘先生”；米什莱认为他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原则；他同时代的人威廉斯说：“他统治的一大秘密武器是通过诽谤或栽赃陷害而将对手搞得臭名昭著，以此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垫脚石。”

有人认为罗伯斯庇尔雄辩的口才是他成功的原因，这是不得要领的：他总是把眼睛掩藏在风镜背后，痛苦地宣读他的演说，通常是一堆艰奥晦涩的抽象文字。国民公会里才华出众的雄辩家有太多了，比如丹东和吉伦特党人，可是最后，他们都被罗伯斯庇尔给击败了。

这样的主流观点我们确实无法接受，即最后获得胜利的总是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里没有一点影响力，就逐渐地成了议会和雅各宾党人的主人。比约·瓦伦说：“当他进入救国委员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了。”

“他的历史叫人不可思议，”米什莱写道，“远比波拿巴的历史更了不起，他的崛起不露痕迹，看不到手腕，看不到势力的增长。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操行一丝不苟而尽忠职守，天赋中等，却能在一夜之间崛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大变革，就是在《天方夜谭》里也见不到这样的事。他随即拥有了比君主还要高的权威，并猛烈地抨击教权，真是一段惊人的历史！”

当然，他也得益于他所处的环境，人们把他当作主人来寻求安慰，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偶像，但是，当时他已经声名鹊起，而且我们力图寻找的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我愿意相信在罗伯

斯庇尔身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个人魅力，只不过逃过了我们的眼睛，这一点可以从他与妇女的良好关系中得到验证。那些日子里，“他的演讲可以让妇女哭泣……七八百人坐在看台上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在雅各宾俱乐部，他的讲话引来女人们动情的呜咽和叫喊，男人们的跺脚声则似乎要震翻大厅”。一个每年拥有1.6万英镑收入的年轻寡妇夏拉布尔夫人，给他写了封炽热洋溢的情书，并急切地盼望嫁给他。

我们不可能在他的性格中寻找他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原因：他是一个性情急躁的抑郁症患者，他资质平平，抓不住现实，总是沉醉于幻想之中，狡猾而造作；他的突出特征是极端的自负，而且这种自负日胜一日，并在他末日来临时达到顶点。作为一个新宗教的大主教，他相信自己是被上帝派到人间来建立美德之统治的，他甚至声称自己就是永恒之主应允派来改造尘世的弥赛亚。

为了文字上的虚荣，他殚精竭虑地修饰自己的演讲稿。他对诸如卡米尔·德穆兰这样的雄辩家或文学之士，怀有深深的妒忌，这也正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之一。

“暴君怒火发泄的特殊对象是那些饱学之

士，”我们上面征引过的那位作者写道，“对于他们，一种对同僚的嫉妒混杂着被压抑者的愤怒，因为他在迫害他们时所表现的憎恨与其说源于他们对其专制的反抗，毋宁说源于他们使之黯然失色的天才。”

独裁者对他的同僚极为蔑视，他也直认不讳：他在盥洗的时候接见巴拉斯，修完胡须后对着他的同僚漱口，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更是傲慢至极。他对待资产阶级和议员们几乎是同样的鄙视，只有群众才能在他的眼里发现善意。“当至高无上的人民在行使他的权力时，”他说，“我们在他面前只有低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德和真理，不存在任何过激、错误和罪恶。”

罗伯斯庇尔患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他砍掉别人的头颅不仅仅是因为他肩负着信徒的使命，还因为他相信自己处在敌人和阴谋者的包围之中。索列尔写道：“尽管他所顾虑的那些同僚是如此懦弱、胆怯，但他对他们的恐惧还是与日俱增。”

罗伯斯庇尔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所实行的绝对专制，是某种领袖权力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暴君，在得到军队的支

持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任何一个他想剪除的人，但是，仅凭一人之力竟然成功地将一大批与他平起平坐的人送上断头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是如此专横，以至于他可以把最显赫的国民公会议员送上革命法庭，因而也就等于送上断头台。曾经烜赫一时的吉伦特党人在他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他甚至对可怕的巴黎公社发起了进攻，处死了它的领袖，并代之以一个听命于他的新公社。

为了加快除掉他所不喜欢的那些人，他诱使国民公会颁布了《牧月法令》，该法令允许处死仅仅有嫌疑的人，正是借助这一法令罗伯斯庇尔四十九天内在巴黎处死了一千三百七十三人。他的同僚，成了疯狂恐怖的牺牲品，再也不敢睡在自己的家里；每次开会不到一百名代表出席；大卫说：“我相信我们山岳党人将不会剩下二十个成员。”

让罗伯斯庇尔丢掉性命的正是他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力和国民公会的懦弱。他打算让它们投票通过一项措施，该措施将允许不经过议会授权，而秩序救国委员会的命令就足以把国民公会的代表送上革命法庭，也就意味着送上断头台。



几名山岳党人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员合谋起来推翻他。因为他自己知道已经被列入死刑黑名单，因而也就不必害怕失去什么的塔里安，在国民公会会议上大声地控诉罗伯斯庇尔的暴政。罗伯斯庇尔希望通过宣读在手里放了很久的一份演讲稿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无济于事的：以逻辑的名义摧毁对手是可行的；以逻辑的手段来领导议会却是痴心妄想。合谋者的叫喊淹没了他的声音；由于精神传染的作用，在场的许多议员都跟着重复“打倒暴君！”的口号，这就足以导致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议会当机立断，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人，并宣判了对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打算营救他，但议会宣布被捕者“不受法律保护”，在这一充满魔力的口号之作用下，罗伯斯庇尔彻底倒台。

“在这一时期，被宣判不受法律保护，”威廉斯写道，“对一个法国人所产生的效应无异于被宣判患上瘟疫；宣判不受法律保护就等于对民事权的褫夺，这就好比说人们相信自己会因患者所呼吸过的空气而受到感染一样。这对那些曾经把大炮对准过议会的炮手同样有效，无须进一步的命令，只消听到公社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立即就掉转炮口。”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所有同伙在热月10日到21日全部被送上断头台；次日，新的一批七十名雅各宾党人紧随他们的脚步；再后一天，又有十三个人被处决。于是，持续了十个月之久的大恐怖终于结束了。

雅各宾大厦在热月的垮台是大革命期间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心理事件之一，那些促成了罗伯斯庇尔倒台的山岳党人从未料到它竟然意味着大恐怖的结束。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罗伯斯庇尔是因为他曾经镇压了埃贝尔、丹东、吉伦特党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当群众的欢呼告诉他们罗伯斯庇尔之死被当作是大恐怖的终结时，他们赶忙装得好像这是早已预料到一样。他们更多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平原派——也就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人——曾经完全屈从于罗伯斯庇尔的控制，现在他们要猛烈地攻击这种政策，长期以来，哪怕是在他们对之憎恨至极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装作赞同它。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一群人曾经恐惧过，但现在已毫无恐惧可言了：平原派要为自己在山岳党人当政期间所经历的恐怖复仇，它们反过来要对山岳党人实施恐怖。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的同僚对他的卑躬屈膝，绝不是心悦诚服地顺从于他的。独裁者让他们感到一种恐惧的心理，因此，他们对他竭尽吹捧之能事，但在这些钦佩和热情的掩饰下，内心一股强烈的仇恨在滋长着。当我们在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政府通报》上读到各个代表所撰写的报告，尤其是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这三驾马车的阴谋”之报告时，同样会感到不可思议，就连奴隶也不会对一个倒台的主人如此恶言相加！

我们读到，“这些恶魔一度重新起用了最恐怖的马略和苏拉的伎俩”，罗伯斯庇尔被视为一个极可怕的恶棍；我们被告知“同卡利古拉一样，他不久就会要求法国人民对他的坐骑也要顶礼膜拜……他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就把所有哪怕引起他一丝怀疑的人都处死”。

这些报告遗漏了一点，即它们所影射的马略和苏拉之权势都得到了强大军队的支持，而罗伯斯庇尔的权力则除了多次得到国民公会议员的纵容之外，没有得到过任何支持。要不是他们的极端胆怯，独裁者的权力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诚然，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憎的暴君之一，可是他与其他所有暴君所不同的是，在他所

实行的暴政下，并没有士兵的支持。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罗伯斯庇尔的信条：或许除了圣斯特之外，他是雅各宾信仰最完美的化身，在他的身上，这种信仰之狭隘的逻辑、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以及不折不扣的严峻无一不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仍有许多仰慕者对他崇拜不已，昂墨就称他为“热月的殉道者”。已经有人提议为他树立一块纪念碑，我对此欣然同意，因为它有助于保存这样的证据：只要领袖们知道如何去操纵运作，群众将是何等盲目，议会将是何其温顺；他的塑像将让我们回想起，就是在国民公会打算推翻他的前一天晚上，它们还在为独裁者最具威胁的措施发出赞许和欢呼。

#### 四、富基埃·丹维尔、马拉、比约·瓦伦等人

我将用上一节文字来谈一谈某些以其残忍本性著称的革命者，他们的暴行由于掺杂了其他的一些情感、恐惧和憎恨而变本加厉。

富基埃·丹维尔是革命法庭的检察官，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险恶。此人从前颇有慈善仁义的美名，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残忍的嗜血者，以致对他的回忆只能激起人们的无限厌恶，这恰恰可以

证实我在其他著作中得出的一个观点，即人的某些本性在革命时期会发生质变。

在君主制被颠覆的时候，他还相当贫困，在这场社会巨变中他渴望得到一切，却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他属于那种在动乱时期总是乐于把无政府状态维持下去的人。

国民公会把权力移交给他，他不得不对近两千名被告的命运做出判决，在这些被告中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党人、丹东、埃贝尔等。他当面处决了所有的嫌疑犯，并毫不犹豫地背叛他先前的保护人，一旦他们中的哪一个落入他的手中，他都会做出指控。大革命为富基埃·丹维尔非常低劣的灵魂提供了一个让其发挥到极致的机会。在正常的年代里，由于职业规则的限制，他一生也就是一个平静而黯淡的公务员，这正是他在革命法庭的副手或者说代理人吉贝尔·利当东的命运。迪勒尔写道：“他应该和他的同僚一样为恐怖政策感到惊骇，然而，他却在帝国长官的高位上完成了使命。”

一个有序社会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它确实能遏制那些危险分子，对于这些人，只有通过社会的约束才能控制住他们。

富基埃·丹维尔至死都没有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判有罪，从革命的立场来看，对他进行审判是没有理由的。他难道不是仅仅在无条件地服从、执行他上级的命令吗？把他与派往各省的、无法控制的特派员等量齐观是不合理的，国民公会的议员审查了所有他经手的判决并最终得到了批准。他的暴行以及他审判囚犯的简便程序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上司的鼓励，他们怎么可能保留自己的职位？在宣判富基埃·丹维尔有罪的同时，国民公会也等于在宣判自己那套骇人听闻的统治体制有罪。它当然理解这一事实，它把一些恐怖分子送上了断头台，而富基埃·丹维尔只是其中的一个忠实代表。

除了富基埃·丹维尔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到主持革命法庭的迪马，他也表现出了一种极度的残酷，这种残酷随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与日俱增。他在外出时总要带上两把装满子弹的手枪，他为自己的住宅设置了种种障碍，来访者只能通过一个小窗口和他说话。他对任何人都完全不信任，即便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例外，他甚至把她投进了监狱，并打算在热月前把她处决。

在国民公会所揭露的人当中，比约·瓦伦是最为疯狂，也是最为残忍的一个，他或许可以被视为野兽般凶残的一个完美典型。

哪怕是在极为愤怒与痛苦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平静，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并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一项可怕的任务：在阿培监狱大屠杀时，他代表官方向刽子手表示祝贺，并许诺给他们金钱，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回家了，就好像他只是在散步一样。他身兼数职：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国民公会的议长、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他先是把吉伦特党人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是王后；他以前的资助人丹东在提到他时说“比约是口蜜腹剑的家伙”；他先后批准了里昂的炮击、南特的溺杀、阿拉斯的屠杀；他组织了残酷无情的奥伦治委员会；他参与了《牧月法令》的炮制；他曾竭力怂恿富基埃·丹维尔；在所有的死刑判决书上都有他的签名，而且通常是第一个，并往往当着同僚的面率先签字；他毫无同情心、感情和热情可言；当其他人畏惧、犹豫、退缩时，他夸口要“揪住狮子的鬃毛”自行其是；为了使他那张阴沉冷漠的面孔与他周围的热烈气氛更协调，他现在给自己套上一副黄色假发，除了比约·瓦伦那阴险的脑袋之外，任何人带了这副假发都会使人发笑；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反过来遭难时，他又弃之而去投向敌人，并把他们推到屠刀之下……为什么？他居心何在？没有人知道：他一点野心都没有，既不爱权，也不贪财。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已经说过，在

某些罪犯那里非常普遍的对血的渴望可以很好地解释比约·瓦伦等人的行为。这一类罪犯为了杀戮而杀戮，犹如运动员的射击游戏，他们仅仅为了体验破坏的快乐。在正常时期，具有此类嗜血倾向的人，一般出于对警察和绞刑架的害怕而克制了这些冲动，一旦他们可以自由地发泄它们，任何东西都制止不住。比约·瓦伦以及其他许多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马拉的心理状态更为复杂，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杀戮的渴望结合了其他因素——受到伤害的自尊、野心、神秘主义信仰等，而且我们还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半精神错乱者来看，他一直都经受着自大症和各种顽固思想的折磨。

在大革命爆发之前，他提出了一些伟大的科学构想，但没有人对他的唠叨感兴趣；他梦想着地位和荣誉，结果只在一个大贵族家里谋得一个极低微的差事。大革命为他打开了前途无量的未来之门，他带着对没有能够认可他才能的旧制度的满腔仇恨，成了最暴虐的那伙人的首领。在公开进行了“九月屠杀”之后，他创办了一份杂志，公然抨击每一个人，并不断叫嚣要求更多的死刑。

马拉言必称人民的利益，一时成了群众的偶



像，但他的大多数同僚对他却极为鄙视。就算他能逃过夏洛特·科黛的匕首，也必然躲不了断头台的铡刀。

## 五、大革命后幸存的国民公会成员的命运

国民公会中除了那些心理状态表现出特殊个性的成员之外，还有一些人如巴拉斯、富歇、塔里安、蒂翁维尔的梅兰等，完全没有原则和信仰可言，他们只知道牟取一己私利而已。

他们竭力从公众的不幸中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只会被视为十足的无赖，但在革命时期，一切善恶准则似乎都消失了。

尽管还有几个雅各宾党人仍然执迷不悟，但大部分人在得到财富以后就和他的信仰断绝了关系，并成了拿破仑的狂热追随者。康巴塞雷斯在与沦为阶下囚的路易十六的谈话中称呼他路易·卡佩，等到帝国时，他却要他的朋友们在公开场合叫他“殿下”，而在私人场合叫他“阁下”，这就充分暴露了许多雅各宾党人在对平等的渴求中所暗藏的嫉妒之心。

“大多数雅各宾党人，”马德林写道，“都非常

富有，而像沙博、巴齐尔、梅兰、巴拉斯、布尔索、塔里安、巴雷尔等人都拥有城堡和地产，那些至今还不富裕的人不久也会腰缠万贯……在共和三年的委员会中，仅热月党成员中，就有一个未来的公爵，十三个未来的伯爵，五个未来的男爵，七个未来帝国的参议员，六个未来的地方议员；除了他们之外在国民公会里，还有未来的奥特朗托公爵和未来的勒戈尔特伯爵，不下于五十个共和派在十五年后都拥有了头衔、纹章外套、羽饰、马车、养老金、必要的不动产、旅馆以及城堡；富歇在死的时候资产竟达六十万英镑。”

于是曾经被严厉谴责的旧制度之特权很快又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重新恢复。为了实现这一结果，毁灭法兰西、焚烧整个外省、扩大苦难、使无数家庭陷入绝望、颠覆欧洲乃至在战场上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都是必要的！

在这一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人们可能做出的评价。

伦理学家不得不对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行作严格的区分，是非善恶，泾渭分明，因为他所依据的评判标准是社会如果要成功地维持下去就必须得遵从的标准，但心理学家不能这样：他的目标首先是理解，知道其所以然，批评将在完全的理

解面前退隐消失。

人类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在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木偶很少能摆脱那些驱动它们运转的专横力量，这些力量包括遗传、环境与现状。我们现在正试图对那些人的行为做出解释，但没有人敢肯定假如自己就是那些人，我们的行为会是什么样子。

## 第五卷 古代传统与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

### 第一章 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挣扎：督政府

#### 一、督政府的心理

由于各种革命议会的部分成员是同一些人，所以，有人可能就认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非常相似的。

在正常情况下，这或许是事实，因为一种不变的环境往往意味着性格的稳定。但是，一旦当环境发生如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迅速变化，人的性格必然会发生改变以适应它，督政府的情况就是如此。

督政府包括几个迥然不同的议会：两个大议会，由各自不同类别的代表组成；一个非常小的议会，有五位督政官构成。

两个较大的议会因其软弱而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国民公会：它们不再受民众暴动的胁迫，督政官已经有效地防止了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它们得无条件地服从督政官的专断指令。

由选举产生的第一类代表大多数都是温和派，他们已经厌倦了雅各宾党人的暴政。新的议会梦想在法兰西的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并建立一个没有暴力的自由政府。

但是，由于受到命运的捉弄，这些代表跟他们的前任一样，或许可以说他们做的事情总是与他们所希望的恰恰相反，这是大革命的一条规律，同时它也表明事件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意志之外。他们希望适可而止，结果却仍然不加节制；他们打算清除雅各宾党人的影响，结果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力图挽救国家的败落，结果却带来了新的祸患；他们立志实现宗教和平，最终却用大恐怖时期更为严厉的方式迫害、屠杀牧师。

由五位督政官所组成的小议会之心理状态完

全不同于下议院。每天面对新出现的困难，督政官不得不解决它们，而大议会却全然不顾现实，一心想着实现自己的抱负。

督政官中盛行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们对原则不感兴趣，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住自己法兰西主人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不明智的措施，为了扫除障碍，他们甚至取消许多地区的选举。

督政官感到自己没有能力统治法国，索性就让它放任自流。他们竭力通过专制手段支配法国，却从未治理法国，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国最需要的就是治理。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国民公会在历史上是一个强硬的政府，而督政府则是一个软弱的政府。事实恰恰相反：称得上强大政府的恰恰是督政府，而不是国民公会。

从心理学角度看，我们或许很容易就可以解释督政府时期的政府与此前国民公会时期的政府之间的差异，只要我们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由六百或七百人构成的集体非常容易受到感染性狂热情绪的影响，就如8月4日之夜贵族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那样，甚至容易受到个别意志坚强者

之一时冲动的支配，就如他们向欧洲诸君主发起挑衅那样。但是，这样的热情或冲动实在太短暂不足以拥有持久而强大的力量。而一个五人委员会则很容易为一个人的意志所左右，因而更容易受到持续的决心之影响，也就更容易遵循一个固定的行为模式。

督政府时期的政府被证明是缺乏治理能力的，但它从不缺乏坚强的意志：没有什么可以制约它的行动，无论是对法律的崇敬，对公民的顾虑，还是对公众福利的热爱；它把一种专制强加给法国，这种专制之程度不亚于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大恐怖时期的政府。

尽管它所使用的方法与国民公会的方法非常相类，并且它以一种最为残暴的方式统治着法国，但是，督政府和国民公会一样，它从来就不是法国的真正主人。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我前面已经指出的：物质的强制不足以支配道德的力量。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是：人类的真正指导原则乃是其历代祖先建立起来的道德架构。

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被庇护于法律和值得尊敬的传统之中，所以

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一基础已被抽空了的国家里，生活状态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周围的环境，我们只看到这一伟大事物令人厌恶的一方面，而很容易忘记社会只有在强加了某些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存在。法律、礼仪和习俗对人类那些野蛮的自然本能构成了一种制约，这些本能在我们身上从未根绝。

国民公会以及随后的督政府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一个摧毁了自己传统结构的民族，妄图依靠并不充分之理性来充当人为的社会黏合剂，将会导致何等程度上的混乱。

## 二、督政府的专制统治：大恐怖的复发

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使军队忙于军务而无暇他顾，并掠夺以获取财富，督政官决定再次发动征服战争，这一伎俩在国民公会时期曾颇为灵验。

督政府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军队赢得了骄人的胜利，尤其是在意大利。

一些被入侵的民族是如此天真，以致指望这些入侵者能够保护它们的利益，但它们不久就发现所有的军事行动都伴随着压迫性的税收、对教

堂和国库的掠夺等。

这一扩张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一个新的反法联盟形成，该联盟一直维持到1801年。

督政官对国家的状况以及自己在重建国家方面的无能漠不关心，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与一系列的阴谋做斗争以保住自己的权位。

这项任务足以使他们自顾不暇，因为各个政治派别的武装尚未解除。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在企盼一个强有力的手腕来恢复秩序。每个人都感觉到，督政府以及共和政体将不复存在。

一些人梦想复辟王政，一些人妄图重建恐怖体制，而其他人则在期待一位将军主政，唯有那些国有财产的购买者害怕政府发生任何变动。

督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1797年5月，议会中有1/3成员改选，新当选的大多数议员都对督政府体制充满敌意。

督政官当然不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被牵制，他们宣布四十九个地区的选举无效；取消了一百五十四名新议员的资格，其中还流放了五十三人，



在最后一批人当中有大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人物：卡尔诺、特隆松·杜·库德雷、波塔利斯等。

为了胁迫选民，军事委员会支持督政府，胡乱地处死了一百六十人；将三百三十人放逐到亚那，其中有一半的人流放不久就死了；驱逐了大批回到法国的流亡者和牧师，这就是所谓的果月政变。

这场政变主要打击对象是温和派，但也并不止于温和派；随之而来的是对激进派的迫害，督政官发现雅各宾派的议员太多了，因此宣布取消其中六十人的选举结果。

督政官的专横本性在上述事实中被一览无余，在那些措施的详细细节中明显地暴露出这一点。我们所看到的是，法国的新主人同大恐怖时期最残忍的代表们一样嗜血好杀，残酷无情。

虽然没有再架起断头台来当作家常便饭，但是他们却以流放的形式取代断头台，受害者的生存机会少得可怜。比如，将他们装在铁笼里送到罗什福尔，让他们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中生存，然后，把他们塞到小艇上运走。

“在代卡德到贝翁内瑟之间的甲板上，”泰纳

说，“那些可怜的囚犯，他们处在热带的高温下，空气的缺乏使得他们将要窒息，他们在受尽欺辱压榨之后，最终死于饥饿或窒闷；等到主亚那航程结束时，被押送的一百九十三名犯人在二十二个月后才到达代卡德，那时存活下来的只剩下三十九个人；而送抵贝翁内瑟的一百二十个人中，仅有一人幸存。”

当督政官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天主教在复兴，因而他们认为这些牧师正在图谋不轨，暗地里反对他们，因此仅在一年之内，就有一千四百四十八名牧师被驱逐或送上船艇，毋庸置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草率地处死了。大恐怖事实上完全死灰复燃。

督政府的独裁专制已经渗透到各个行政部门，其中以财政部门为甚。它打算收取六亿法郎的税收，所以就强迫那些议员通过一项增税法案，但最终的结果却不甚理想，只收到了一千两百万法郎；迫不得已，它决定强制借贷一亿法郎，导致的后果就是大批工厂关闭、商业停顿和家庭失业，以这一毁灭性代价换取了四千万法郎的收入！

为了确保更加有效地控制外省，督政府通过了所谓的质押法（the Law of Hostages），这项法

律使每个地区都因为各种过失上缴了一大批抵押财产。

我们很容易能够想象得到，像这样一个体制，自然太容易激起人们的憎恨了，到1799年年底，先后有十四个地区发生叛乱，四十六个地区的起义一触即发。如果让督政府继续执政的话，社会的彻底解体将是无可避免的。

单以财政方面而言，当时的社会解体已经相当严重了：无论是金融，还是工商，所有的一切都在崩溃；随着指券贬值到原来价值的百分之一，财政部的借贷收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对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和政府公务员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拿到报酬的。

在外国旅行者的印象中，这个时候的法国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并被其居民遗弃的国家。毁坏的桥梁、堤坝和荒废的建筑物使得在交通上极为不方便；土匪常常出没于废弃已久的道路上，进行烧杀抢掠，有些地段甚至只有从这些帮伙的头目那里购买通行证以后才得以通过；工厂和商业基本歇业，在里昂，一万五千家工厂和作坊中有一万三千家被迫关闭，勒阿弗尔、波尔多、里尔、马赛、里昂等地都变成了一座座死城；当时的普遍现象就是贫穷与饥荒。

同样骇人听闻的，是道德上的混乱与失序：奢侈与享乐的欲望、豪华的宴会、珠宝以及富丽堂皇的豪宅被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独自享有，他们包括股票经纪人、军队承包商以及那些实际上靠掠夺发家的掩人耳目的金融家，他们使巴黎在表面上呈现出一幅繁华祥和的虚假景象，同时它也迷惑了许多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学家，惊人的奢侈挥霍的背后，很少有人看见被它掩盖下普遍的穷困。

书本里的督政府编年史对于我们理解谎言所编制的历史极有帮助。近来，这一时期为题材常常出现在戏剧当中，并且这种风尚仍然有人在着，一种大恐怖后的歌舞升平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事实上，督政府上演的戏剧比起大恐怖来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其残忍暴虐毫无不同。督政府最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憎恨，以致它自己都感觉到已经无法维持统治，于是它们就为自己物色了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不但能够替代自己，而且还能够保护它们的利益。

### 三、拿破仑的崛起

在督政府统治的后期，无政府状态及社会解体在法国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每一个人都企盼一个精力充沛，并且可以恢复社会秩序

的人。早在1795年，一些议员就曾经考虑过王朝复辟，但是路易十八却宣称，他要彻底恢复旧秩序，将所有财产都物归原主，并对那些参加革命的人加以严惩，因此他很快就被别人抛弃了。基贝隆毫无意义的冒险最终使那些未来王权的支持者与之疏远。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保王党人所表现出的平庸无能和心胸狭窄证明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大部分都是合理的。

既然不可能恢复君主制，那么，当务之急就应该寻找出一位将军，当时唯一可以承担此重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波拿巴。意大利战争使他声名鹊起，在穿越了阿尔卑斯山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先后攻破米兰和威尼斯，几乎无往不利。然后，他挺向维也纳，当奥地利皇帝决定战败求和的时候，他的军队仅差二十五里路就已抵达维也纳的城门。

虽然他的声望逐渐升高，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为了使自己的名望得到进一步抬高，他说服督政府入侵埃及，以此削弱英国的势力，于是，1798年5月，他从土伦誓师出发。

这种对威望的不断需求源于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观念，这一点拿破仑本人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时说得很清楚：

那些最有势力、最开明的将军，长期以来一直力劝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将军采取措施，登上共和国元首的宝座，但他断然拒绝了；他还没有把握仅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稳操胜券。他深谙统治的艺术以及这个伟大民族所需要的东西；大革命时代的人以及议会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分歧太大，他知道自己尚不可任意而为，他不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冒险。他决定向埃及出发，但是一旦环境许可，他就会再度崛起。

拿破仑在埃及并没有待多久，他很快就被他的朋友召回了，他在弗雷儒斯登陆，人们对拿破仑的归来饱含热情，处处张灯结彩：两位督政官和一些主要的部长早已事先做好了准备。计划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得到了实施，雾月18日的政变易如反掌地取得了成功。

在摆脱了那伙压迫、剥削这个国家如此之久的邪恶小人之后，所有的派别都精神振奋。毫无疑问，法国将出现一个专制政体，但它不可能像之前的那个政体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雾月政变充分证明我们已经说过的一点是正确的，即那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极为容易理解与确认的历史事件，不管有多少人亲身经历过，仍然不可能形成准确的判断。

三十年前，人们对雾月政变是怎么评价的呢？它被视为一个野心家所犯下的政治罪行。但事实上，军队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将少数几个顽抗的议员驱逐出议会的甚至并不是士兵，而是议会自己的卫队。政变的真正发动者是政府本身，而整个法兰西都是同谋。

#### 四、大革命持续的原因

一系列的后果都由大革命的基本原则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放公职，人民享有主权，控制国库开支等。如果我们以此来限定大革命持续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说大革命仅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到1789年年中时，所有这些目标都已基本实现，接下来的岁月里没有增加什么新花样。然而，大革命实际上所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

依据官方历史学家给我们的期限，我们将看到，大革命只延续到拿破仑的崛起，其跨度在十年左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即在新的原则确立之后，竟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混乱不堪、充满暴力的阶段？我们在对外战争中是不可能找到原因的，对外战争曾因反法联盟内部的钩心斗角以及法国的节节胜利而多次中断；我们更不可能将

它归咎于法国人对革命政府的同情，因为大革命时期历届议会的统治更加令人痛恨和鄙视。无论是造反还是麻木地投票，大多数法国国民都对这种体制深恶痛绝。

法国人对革命制度的憎恶，长期以来都被人所误解，近来的历史学家对此深有揭露。作者马德林最新出版的一部关于大革命的著作，对他们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

从1793年开始，一部分人就一直操纵着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国；现在，有3/4的法国人希望大革命可以适可而止，或者宁愿把它从那些可憎的剥夺者手中解放出来，但这些人殚精竭虑地支配着这个不幸的国家……只要他们仍然掌握着权力，大恐怖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在他们的打击下，不管是谁敢反对其恐怖政策，都必然会遭到他们的迫害。

直到督政府结束统治的时候，政府还把持在雅各宾党人手里，他们努力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希望通过谋杀与掠夺获取不义之财，因此只要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他们继续享有这些东西，他们情愿将法国交给他。他们同拿破仑议定雾月政变，就是因为路易十八满足不了他们的愿望。



但是，这样一个暴虐而软弱的政府竟然能够苟延残喘这么多年，我们到底又该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不难解释，那就是：有很大一群人可以从大革命的延续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一点是根本性的原因，假如大革命只是一种理论信仰，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很可能极为短暂，但是这种刚刚确立的信仰随即就脱离了纯理论的范畴。

大革命确实没有仅仅只是褫夺君主、贵族和教士的政治权力，它在将旧的特权阶级的财富和特权转移到大多数农民和资产阶级手里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革命体制顽固的支持者。那些人从贵族和教士那里掠夺来财产，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土地和城堡，他们对君主制的复辟很有警觉意识，生怕一旦旧制度卷土重来，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一个政府才能得以存活，直至一个铁腕人物出现，重新构建社会秩序。这个铁腕人物所许诺的除了大革命的道德成果之外，还包括其物质成果，波拿巴自然很清楚

人们需要的是什麼，所以他很快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革命尚存争议的物质成果以及仍很脆弱的理论原则都被他的制度和法律所吸引。所以，说大革命是随拿破仑的崛起而告终的，这是很错误的观点，然而恰恰相反：拿破仑完成并巩固了大革命，而并非破坏了大革命。

## 第二章 秩序的恢复：执政共和

### 一、大革命的成果如何为执政官所认可

我们从执政的历史中寻求到的心理学材料，就像先前阶段那样丰富。首先，它向我们揭示，一个强有力之个人的工作效率要比一个强有力之集体的效率高出许多。波拿巴很快就结束了困扰共和国十年之久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秩序暂时得到了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四届议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哪怕是采用最严厉的镇压手段，然而，他只凭一人之力，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实现了。

波拿巴的权威立即镇压了巴黎的各种叛乱和冀望着王朝复辟的反抗，并重新确立了法兰西在精神上的统一，它曾经由于强烈的敌视和仇恨而分崩离析。波拿巴用一种个人专制代替了集体专制，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利益，毕竟他的专制远

比当时的暴政要宽松。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很少有人厌恶他的统治，不久人们就怀着无限的敬畏和虔诚接受了他的统治。

过去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共和政体被波拿巴颠覆了，今天看来，明显是迂腐的，事实恰恰相反：他保留了一切可以保留的共和遗产，如果没有波拿巴，共和主义的遗产将几乎全部毁灭。正是波拿巴通过制度和法典，巩固了大革命一切可行的工作——特权的废除，法律面前的平等，等等。此外，执政府还继续称自己为共和政府。

如果没有执政府，那么复辟的君主制很可能会取代督政府，而大革命的绝大多数成果将毁于一旦。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波拿巴，那么督政府不可能在人们的普遍厌恶中幸存下来，它必然要被推翻，路易十八很可能将重登帝位。当然，十六年以后，他还是如愿以偿了，不过在这十六年中，波拿巴通过法律和习俗赋予了大革命强大的力量，以致复辟的君主根本不敢动摇它们，财产权也没有恢复到旧制度的状况。

如果督政府当时就被路易十八所取代，那么事态的结局将截然不同：他可能会将所有的旧制度都恢复，而新一轮革命势必要爆发，我们知道

使查理一世垮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企图恢复原来的统治。

抱怨波拿巴的专制多少有些天真：法国人在旧制度下受着多种多样专制的压迫，而共和政体建立的是一种比君主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专制。专制那时候是一种正常情况，它如果没有带来了秩序的混乱，人们是不会反抗它的。

大众心理的一条永恒规则是：在他们制造出无政府的混乱之后，就会寻求一个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的主人。因此，波拿巴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对象。

## 二、执政官时代法国秩序的重建

一旦掌握了权力，波拿巴就得承担起重建法兰西的艰巨任务：国家现在是伤痕累累，百废待兴。在雾月政变的第二天，拿破仑就着手起草一部宪法——几乎是他独自一人操刀，这部宪法注定要赋予他绝对的权威，以使他有足够的 ability 统御各个派别，重整国家。只花了一个月时间，这部宪法就制定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共和八年宪法》，直到拿破仑的统治结束后，这部宪法才终止使用，这中间

只有少许修改。三位执政官行使行政权，其中两位执政官只拥有建议权，因此第一执政官也就是波拿巴自己，他成了法国的唯一主宰。大臣、国务委员、大使、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其他官员都受他任命，并拥有宣战或媾和的权力；他同时也拥有立法权，因为只有他可以创立法律，这些法律然后交给三个议院：参议院（the Council of State）、保民院（the Tribune）和立法院（the Legislative Corps）讨论和投票，第四院也就是元老院（the Senate）事实上充当了宪法的护卫者。

尽管拿破仑是独裁的，但即使是在议定最琐碎的事务之前，他也要召集其他的执政官来商议；立法院在他统治期间的影响无足轻重，但若没有得到参议院的咨询，他从不签署任何法令：参议院由全法国最知名、学识最渊博的人士组成，他们将法律准备好之后，交送立法院讨论通过。由于是秘密的投票，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对法案提出批评。在波拿巴的主持下，参议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最高法庭，它甚至可以对大臣们的行为进行审查。

拿破仑对参议院非常信赖，因为它的成员都是杰出的法学家，他们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专长。波拿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学家，他从不信任那些平民出身、纸上谈兵的大多数议员，整

个大革命期间，这些人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波拿巴希望实现为人民的统治，但并不求助于他们；人民在他的政府中无足轻重，他们只享有对新宪法投票的权利；偶尔他也会诉诸普遍的投票，但这种情况是相当少的。立法议会成员的填补更替由各议院相互推举产生，而不是由选举产生。

在筹划一部旨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宪法过程中，第一执政从未指望它能在重建国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在他草拟宪法的同时，也为重新建设法兰西承担了大量司法、财政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巴黎集中了各种权力，每个省

（**department**）设省长，由一名秘书长协助工作；每个大区（**arron dissement**）设区长，配备一个委员会；市镇（**commune**）设一名市长，连同同一个市政委员会工作。所有的官员均由部长任命，而不是像共和国时期那样由选举产生。

这套行政体系使一个全能的国家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得以确立，后来的政府继承了这套行政体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在一个自身陷于深刻分裂的国家里，为了避免地方专制，中央集权始终被沿袭。

正是由于对法国人国民性的深刻认识，这套行政组织的基础才得以建立。它很快就恢复了法国被中断了如此之久的平静与秩序。为了完成国家的精神和解，政治放逐犯被赦免，教堂重新向教徒开放。

在社会大厦的重建过程中，波拿巴还亲自操刀起草了一部法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旧制度习俗的借用，正如有人指出的，它是新法律对旧法律的一种过渡或妥协。

第一执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么繁重的任务，他首先就不得不使一部宪法赋予他绝对的权力。如果他的一切措施都提交给议会，那么他绝不可能将国家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出来。

《共和八年宪法》显然已经将共和政体转变成了一个君主政体，这个政体起码和路易十四“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同样专制。作为适合于当时形势需要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宪法，它反映了一种心理上的必然性。

### 三、执政府事业成功的心理因素

所有能够对人发生作用的外部力量，最后都有可能转化为心理的力量。一个深谙谋略的统治

者必须理解这些心理力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历届的革命议会对这些力量视而不见，而波拿巴却深谙如何运用它们。

历届革命议会都是由相互对立的派别组成。拿破仑意识到，要想驾驭这些派别，自己就必须独立于任何派别之外。他深深地懂得，一个国家的精华乃是那些散布于各个政治派别之中的优秀分子，于是他对他们推崇备至，一律加以擢用。他在政府中的代理人都是从保王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等多种政治势力中分别挑选的，尽可能做到唯才是举。

波拿巴一方面接受旧制度支持者的帮助，但另一方面还是谨慎地让他们知道他打算维持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许多保王党人还是团结在了新政府的周围。

从心理学角度看，执政府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它实现了宗教和平。造成法国分裂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还不如说是宗教意见的纷争。旺代一部分地区的彻底性破坏因为军事斗争的结束而终止，但它并未平息人们的心灵。既然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教会的首领可以促成和平，于是波拿巴就毫不犹豫地同他进行妥协。他与教皇签订《教务专约》乃是一个真正心理学家



的明智之举，他知道道德的力量无须使用暴力来征服，武力迫害只能导致更大的危险。尽管他与教士实现了和解，但仍然竭力将他们置于自己革命心理学的控制之下，主教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资，这样他依旧是主人。

拿破仑的宗教政策是高瞻远瞩的，然而现代雅各宾党人往往会忽视它的意义，他们一味地沉溺于自己狭隘的盲信，他们无法看清这一点：将教会从政府中分离出去就意味着又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所以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将遇到一个阶层的反对，一个在法国境外对法国怀有敌意的主人——教皇，将会蛊惑这些人反对本国政府，给敌人一种他们本不该拥有的自由是极端危险的，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让教士独立，而我们今天的做法却与之恰恰相反。

波拿巴此时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大于他在加冕称帝以后所遇到的困难，只有对人的深刻理解才能帮助他战胜这些困难。

未来的主人目前为止还远不是真正的主人：许多地方仍有叛乱爆发，土匪还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米迪地区正在经受各派党徒的兵燹之灾。

作为执政，波拿巴还不得不与一些将军进行周旋与抚慰，甚至连他的兄弟也合谋反对他。拿破仑是皇帝的时候，他没有敌对的党派要对付，但在他还是执政官的时候，他就得和所有的派别斗争，并在它们中间保持平衡。这一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自20世纪以来，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政府还不多。

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策略、意志以及交际手腕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混合。作为执政官，波拿巴感到自己此时尚未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于是他为自己建立了一条准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按照大多数所希望的那样统治”。作为皇帝，他通常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要根据自己的理想来统治即可。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历史学家和诗人，都对雾月政变存在很多的争议，这样的时代已经销声匿迹了。断言“法兰西在穠月的阳光普照中获得解放”实际上是多么虚幻！维克多·雨果等人对这一时期所作的判断同样地荒谬。我们已经看到“雾月罪行”的积极同谋不仅包括政府本身，而且还包括所有的法国人，事实上，把法兰西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就是雾月革命。

有人或许要问，那些聪明饱学之士为何做出

如此错误的论断呢？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在根据自己的信仰看待历史事件，我们知道，真理在那些挣脱不掉信仰之束缚的人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最明显的事实也会被遮蔽，事件的历史沦为梦想的历史。

希望理解我们刚才简略勾画出的这段历史的心理学家，如果他独立于任何一个党派之外，并对一切党派所具有的激情了如指掌的话，他所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他决不会奢望对过去横加指责，那是一个不可克服之必然性的时代。当然，拿破仑也使得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壮丽史诗因两次远征的失败而落下帷幕；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他所遗留的威望还能将继承他姓氏的子嗣推上帝位，但拿破仑三世所发动的第三次远征同样功亏一篑，其影响我们至今挥之不去。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和它们的起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其理想演变中，为一种重要现象所付出的必要代价，那就是人们不可能试图一下子就与他们的祖先割断联系，除非他们自己的历史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章 最近一个世纪的传统与革命原则  
相冲突的政治后果

## 一、法国革命运动不断的心理原因

在后面检讨最近一个世纪里革命思想之演进的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在半个多世纪里革命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速度相当缓慢。

在这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民和资产阶级对革命思想并不感兴趣，只有非常有限的几个信徒受其蛊惑，但他们的影响足以激发几次革命，这主要是政府的过失。在我们考察了引发革命的心理因素之后，我们将对这些革命作检讨。

我们最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动乱史足以证明：人们更多的是受自己心理意识的支配，而不是受他们的统治者竭力强加给他们的制度之支配。

法国连续不断的革命是这个国家中心理意识迥然不同的两部分人相互斗争的结果：一部分人信仰宗教，主张实行君主制，并长期以来一直受传统的影响；而另一部分人实际上也受传统的影响，但赋予传统以一种革命的形式。

从大革命一开始，两种对立的心理意识之间的斗争就已经存在得很明显了。我们看到，尽管进行着最可怕的镇压，叛乱和阴谋却一直在进行着，直到督政府的统治结束。这就证明，过去的

传统深深植根于大众的心灵之中。有那么一段时期，六十个地区都发生叛乱反对新政府，直到几次大规模屠杀之后才被镇压。

波拿巴所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在旧制度与新理想之间建立某种妥协，他必须得找到一些制度来调和造成法国分裂的这两种对立的心理意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主要是采取了一些折中的措施，此外就是为非常古老的事物冠以新的名称。

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兰西实现了精神上的完全统一，这在法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但这种统一依赖拿破仑的权威而存在，在他垮台之后，原来的各个派别迅速死灰复燃，并一直延续到当代。一些派别依赖着传统势力，而另一些派别则对传统势力剧烈地排斥。

如果在信徒与冷漠者之间发生这种冲突，那么它就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冷漠总是宽容的，但不幸的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之间产生了斗争。世俗的派别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宗教的外表，它伪称的理性主义几乎成为最狭隘的教士精神的替代形式，近年来，尤为明显。现在，我们已经指出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是不可能和解的，因此，一

旦教士掌权，他们对自由思想家不可能比今天后者对前者更宽容。

在法国，大多数政治信仰的起源，甚至在老练的政治家身上都能激发强烈的仇恨，这常常让外国人大为惊讶。

在法国，不同的信仰者之间的相互憎恨、攻讦常常加速政府及内阁的倒台，少数派之间从不拒绝联合起来反对得势的党派。我们知道一大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被选进当今的议会，靠的就是保王党人的支持，这些人和他们在大革命时期一样，还是愚蠢至极。

导致法国分裂的诸原则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且它肯定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谁可以预见它将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巨变。纪元之前的雅典人如果能够推知他们的社会纷争将导致整个希腊的倾覆，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内讧了，但是他们如何才能预见这一点呢？

## 二、百年法国革命回顾

在考察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法国所经历的革命运动的心理原因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这些接连不断的革命作一下大致的概括了。

反法联盟的君主在击败了拿破仑之后，将法国的疆土缩减到它原来的边界，并把唯一的君主候选人路易十八拥上了王位。

通过一个特别宪法，新国王接受了代议制政府下立宪君主的地位，他认可了大革命的一切成果：法律面前的平等、信仰自由、民事法典以及对国有财产的售出不予追究等，但投票权受到了限制，它仅限于确定税收的数目。

这部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遭到了极端保王党人的反对，他们企图复辟旧制度，归还国有财产，并重新享受原来的旧特权。

路易十八害怕这样一种反动会导致一场新的革命，于是解散了议会，温和派议员再次当选。路易十八清醒地认识到，在法国任何复辟旧制度的企图都将激起一场普遍的叛乱，因此，他能够按照既定原则继续他的统治。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后继承王位的是前阿图瓦伯爵查理十世，此人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他吹嘘说自己从1789年以来从未改变过想法，他准备了一系列法律：给予流亡贵族四千万先令的赔偿、渎神法、恢复长子继承权以及授予教士的特权等等。

大多数议员对他的反对就愈加严重，1830年，查理十世签署法令解散议会，镇压舆论自由，并开始复辟旧制度。

运动的领袖梯也尔、卡齐米尔·佩里埃、拉法夷特等人，传唤路易·菲利普——此前人们很少注意过他的存在——到巴黎，并宣布他为法国的新国王。

面对人民的冷漠以及仍然效忠于正统王期的贵族的敌意，新国王向资产阶级请求援助。一项新的选举法把选举人减少到二十万人，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绝对支配地位。

一方面，共和主义者通过他们的秘密社团——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民众社团，在1830年到1840年发动了数次间歇性的暴动，但很快就被镇压了。

另一方面，教士和正统主义者也没有停止他们的阴谋：亨利五世的母亲德贝里公爵夫人在旺代试图起义；至于教士，他们的要求最后使他们变得如此不宽容，竟然发动了一场叛乱，巴黎的大主教官就是在这次叛乱中被毁坏的。

一场支持选举改革的运动在1848年演化成一



场新的暴动，结果出人意料地将路易·菲利普推翻了。

一个临时政府在巴黎市政厅宣告成立，以代替倒台的君主。它宣布建立共和国，确定普选，并颁布法令要求人民对一个九百人的国民议会进行选举。

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如今再度重演，新成立的民众社团的领袖不时地鼓动群众胁迫议会，而其理由通常严重缺乏常识，比如要求政府去镇压波兰的一次起义等。

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初期，它是一个专制政府；在其后期，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他的统治维持了十八年，1870年9月4日的起义推翻了帝国，那是色当投降之后发生的事情。

自此以后，革命运动就很少发生了，唯一的一次重要的革命就是1871年3月的革命，这次革命致使巴黎的许多纪念物被焚毁，处死了两万多名起义者。

1870年战争以后，选民们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后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们把大批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保王党代表送进了议会。由于无法在

建立君主制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任命梯也尔为共和国总统，后来又代之以马歇尔·迈克马洪。1876年的选举，同后来的所有选举一样，大多数共和主义者再次被选进了议会。在此之后的各种各样的议会通常都分裂为数个派别，并由此导致内阁多次更替。

然而，多亏这种党派分裂所形成的平衡，换来了四十多年的相对平静。共和国的四任总统都不是因为革命而倒台的，即使有零星的暴动，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88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布朗热将军的民众运动差一点颠覆了共和国，但它最终还是安然无恙地幸存了下来，并成功击败了各个派别的进攻。

目前的这个共和国能够得以维持，有这样一个原因：首先，在相互对立的派别中还没有一个强大到可以压倒其他所有派别的程度；其次，国家首脑只具有象征性，有名无实，所以国家所遭受的不幸无法归咎于他，即使把他推翻了，那也于事无补；最后，由于最高权力分布在数千人手里，责任同时也就分散了，因此很难确定谁是始作俑者。一个暴君很容易就可以被推翻，但是对于一群匿名的小暴君，你怎么来反对他们呢？

因此，国家的暴政不断地得到延伸，这是我们历次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我们所知道的法国一切政府体制的共同特征。这种形式的暴政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民族观念，因为法国持续动荡的唯一结果就是这一暴政的强化。国家主义

（Statism）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制度，其他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帝国制——都只不过只是空洞的标签、毫无意义的影子。

## 第四章 革命原则的新近发展

### 一、大革命后民主思想的逐步传播

如果一种理论一旦在人们的思想中稳固地扎下根来，并有坚硬的外壳，那么它就会经历多少代的风风雨雨而不衰，持续地发挥作用。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那些理论也遵循这一法则。

尽管作为一种政府形式而言，大革命的历史是相当短暂的，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大革命的原则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这些原则以一种宗教信仰的形式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情感和思想方向。

虽然几度中断，但大革命却薪火相传，直到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响：拿破仑的作用不仅在于他

颠覆了旧世界，改变了欧洲的版图，再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当年开疆拓土的奇迹，更重要的是，由大革命及其制度所树立的新的人民权利观念已经通过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征服者军事上的丰功伟绩早已烟消云散，但是他致力传播的革命原则却得以传之后世。

继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出现的五花八门的复辟，使人们对大革命的原则多少有些遗忘了。在其后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大革命原则的传播极为缓慢，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已经完全把这些原则抛之于脑后。只有那么几个理论家还接受革命原则的影响，作为雅各宾派简单主义精神的继承人，他们相信通过法律可以实现社会从头到脚的彻底改造；他们试图说服人们，让人们相信，第一帝国只是中断了大革命的任务，他们希望能够把这项任务继续下去。

他们期待着卷土重来，重整河山，同时，他们致力于以著述的形式传播大革命的原则。作为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的忠实追随者，这些理论家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问一问自己：他们的改革计划是否同人类的本性相一致。他们实际上正在为一种理想的人建立一个空想的社会（chimerical society），并且相信，一旦他们的梦想得以实现，人类将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

任何时代的理论家都缺乏建设性的设计，他们总是倾向于破坏。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曾断言：“即使专制的存在坚如磐石，那些理想主义者和那些理论家也会想方设法地将它碾为粉末。”一大群空想家如星河灿烂，如圣西门、傅立叶、皮埃尔·勒鲁、路易·布朗、基内等，在他们当中，我们发现只有奥古斯特·孔德才懂得态度和思想的转变必须先基于政治的重建。

理论家的改革蓝图绝不是支持了民主思想的传播，恰恰相反地阻碍了它们的传播。有几位理论家声称，社会共产主义（Communitistic Socialism）将使大革命的雄风得以重建，结果，这使得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感到恐慌。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些念头的恐惧正是导致帝国复辟的主要原因之一。

19世纪上半期，那些作者苦心经营出来的空想主义著作都无足深论，今天，我们对这些观念本身已经不屑一顾了，尽管如此，仔细比较一下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趣的。改革家深信，新社会的建立，没有宗教信仰和道德信仰将会一事无成。为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建立这样的信仰。

但是，这样的信仰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呢？答案很明显，当然是理性。既然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创造出复杂的机器，那么，为什么理性就不能创造出宗教和道德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东西呢？那些改革家都深信宗教或是道德的信仰是以理性逻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奥古斯特·孔德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他曾创立过一个所谓的实证宗教，而且至今还有一些追随者。在这个宗教里，科学家将在一个新教皇的指导下构成新的教士阶级，这个新教皇将取代天主教教皇。

所有这些观念，从长远来看，只能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使群众越来越远离民主原则。

如果那些民主原则最后确实被普遍接受了，那么，它也不能归功于这些理论家，而只能归功于在新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推动了大型工场的建立。经济的扩张逐渐开始支配政府和人民的意志，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工团主义的扩张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成了民主思想的当代形式。

## 二、大革命三个基本原则的不均衡发展

我们可以用一个警句完整地概括法国大革命

的遗产，那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其中，平等原则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这是其他两个原则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虽然这些字眼的含义看起来十分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理解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会对同一字眼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是历史上引发各种冲突的常见原因之一。

譬如，对国民公会的代表来说，“自由”仅仅意味着拥有无限专制的权力；对一个年轻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同样的一个字眼就意味着摆脱了那些让人厌恶的东西：传统、法律、高傲等；而对现代的雅各宾主义者来说，自由的意义则主要在于迫害对手的权力。

尽管政治演说家在他们的演讲中，还经常提及自由，但他们已经很少提到博爱了。他们今天要教导我们的不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联合，而是它们之间的冲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以及领导它们的政党之间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自由已经变得疑窦重重，博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平等的原则却在肆无忌惮地疯长。

在20世纪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变革中，平等原则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的法律、行为模式以及风俗习惯都必须以平等为基础，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对平等的渴求——不仅是法律面前的平等，还包括地位和财产的平等——正是民主的最新产物，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枢轴。这种渴求尽管与一切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法则相背离，但它仍然非常强烈，以致在社会各个方面散布开来。一度中断的情感与理性之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是情感而非理性。

### 三、知识分子的民主与大众民主

到现在为止，一切发生巨变的思想观念都遵循两条规律：一条是，这些思想的演变非常缓慢；另一条是，它们的意义将随着接受其精神状态的不同而发生彻底的变化。

一种学说就好像是一个生物体，它只有进化以适应环境，才能得以存活：对那些瞬息万变的事物，著作是不可能做出及时回应的，所以，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发展的阶段只能属于过去。著作无法反映活生生的现实，而只能反映那些死寂的



东西：一种学说的书面陈述常常代表了该学说中最没有生气的部分。

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已经作过探讨，制度、艺术以及语言这些要素在由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我还探讨了这些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与书本中所描述的真理是如何不同。我现在提起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说明，在讨论民主思想时，为什么我们很少会把注意力放在反映这一学说的文本上，以及为什么我们只关注隐藏在民主思想背后的心理因素和这些心理因素在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各式人中激起的反应。

首先，我们来对大众的民主考察一下。我们得知，书本或期刊上的民主思想仅仅是来源于文人的抽象理论，民众对它们完全不了解，而且，这种理论的实现不会给民众带来任何东西。尽管从理论上说，工人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竞争，冲破他们与上层阶级之间的网罗，从而进入上流社会，但是，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建立一种选择机制，就是知识分子民主的唯一目标，以便从他们当中挑选精英，充当领导阶级。如果选择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民主本无可争议，它恰好证明了拿破仑的那句格言：“统治

的真正方法就是雇用精英，但必须在民主的形式下进行。”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民主只能导致一小撮专制寡头的神圣权力代替国王的神圣权力，它的狭隘与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之花并不会因此而绽放。

大众民主决不会以选举统治者为目标，平等精神和改变工人命运的渴望已经完全支配了它，因此，大众民主不接受博爱的观念，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显示在自由方面。除非是在独裁制度下，否则政府是不可能实现大众民主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大革命以来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而在今天，工人阶级的公会也是按照独裁的方式运作的。

情况一直如此，而且这也正是从柏拉图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思想家从来就没有谁拥护过大众民主的原因。埃米尔·法盖对这一事实极为震惊，他指出：“几乎所有的19世纪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尽管我挖空心思想要找到这么一位，以便我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当然，他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民主主义的职业政治家，但是，这些职业政治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的凤毛麟角。

#### 四、天赋不平等与民主平等

当今时代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民主平等与天赋不平等之间的调和问题。我们知道民主渴望的是什麼，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自然（Nature）是如何回应这些要求的。

从古代希腊英雄时代一直到当代，民主思想曾多次激荡全球，但它却总是与天赋不平等发生冲突。一些观察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由教育造成的。

事实上，自然并不知道什麼是平等，它从不均匀地赋予人们以天才、美貌、健康、活力、智力以及所有那些使一部分人比其他人优越的能力。

这些差异并不是理论所能改变的，因此，民主学说将只能停留在字面上，除非遗传的法则可以让人类在能力上实现整齐划一。

自然不但不知道如何促进平等，而且，自创

世以来，它始终借助连续的差异，也就是说，借助逐渐的不平等，从而实现进步。恰恰是这些不平等才使得早期地质时代那些低微的细胞进化为高等生物，这些高等生物的出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同一种现象也发生在社会当中。那种从平民阶级（popularclasses）中挑选优秀分子的民主形式，最终将导致知识贵族的产生，这一结果与那些抽象的理论家的梦想是相矛盾的，他们的梦想在于将社会中的精英分子贬低到一般人的水平。

自然的法则虽然与平等理论矛盾，却为现代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机会。科学和工业要求越来越多地考虑知识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必然会进一步扩大。

因此这样一个显著的现象摆在我们眼前：法律与制度试图拉近个人之间的差距，而文明的进步则倾向于进一步扩大个人之间的差距。封建制度下的农民与男爵在知识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但工人与工程师之间的差异却太过明显了，并且，这种差异正在与日俱增。

当能力成为促成进步的主要因素之后，每一个阶级中那些精明强干之士的地位就会直线上

升，而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则只能维持原状，或者每况愈下。必然性之所属，势不可当，法律又能做些什么呢？

那些无能之人声称自己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因而也就在力量上占据了优势，这无异于掩耳盗铃。优秀的大脑所做的工作将使所有的工人受益，一旦没有了这些大脑，他们将很快坠入贫穷与无政府的深渊。

在现代的文明社会当中，精英的重要角色似乎太过显而易见了，以至于无须过多强调。一个民族，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其一般民众皆为平庸之辈，在这一点上，各民族之间相差无几，而前者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它所拥有的那些优秀的大脑。美国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禁止中国工人移民入境，因为这些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在能力上是接近的，但他们要求的工资较低，这将对美国本土工人构成强大的竞争。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群众与精英之间的对抗性越来越强。精英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但也没有哪个时代的精英像今天这样难以为继。

科学、艺术以及工业的进步使一个国家的实力得到增强，促进了成千上万名工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这还是得益于一小部分优秀的大脑。

设想一下，如果发生什么奇迹使得社会主义早在一百年前就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了，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风险、投机、首创精神都将受到压制，进步将是不可能的。那些劳工还将一如既往地贫困下去；人们所获得的将只是一种一群平庸的心灵出于嫉妒而渴望实现的贫穷中的平等。人类永远都不会为了满足如此低劣的理想而终止文明的进程。

## 第五章 民主演进的结果

### 一、非理性价值对社会进化的影响

自然的法则与民主的热望并不协调；这一事实从来就没有使人们心目中的教条发生过动摇，被信仰所支配的人是不会为民主的真正价值所困扰的。

研究一种信仰的哲学家就不得不探讨它的合理性内容，但他更关心的是这种信仰对普通人的影响。

如果用理性来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伟大信仰，那么，这一对比的重要性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诸如名目繁多的神祇，如果以理性观点来看，它们仅仅是一些幻想而已，然而，它们对人

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小觑的。

这一对比同样也适用于中世纪流行的诸多信仰。虽然都是些幻想，但它们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好像它们与现实完全吻合。

若有人怀疑，就请比较一下罗马帝国的统治和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吧。前者的统治是相当务实的、脚踏实地而丝毫没有掺杂任何幻想的东西，而后者虽然纯粹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之上，但它却是完整而强大的。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正是由于教会的统治，那些半野蛮的民族才接受了社会的约束和规范，并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这种民族精神，文明自然也不会有。

教会所拥有的力量再次向我们证明，某些幻想的力量相当之强大，它甚至足以使人们产生一些与个人利益甚至是社会利益截然对立的情感。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民主的演进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民主正在加速其演进的过程。对于中世纪的教会，它拥有一种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心理状态的力量。在考量民主学说所导致的某些后果时，它们的力量丝毫不逊色于教会的力量。

## 二、雅各宾精神与民主信仰的心理

当今一代的雅各宾主义者不但继承了雅各宾派的革命原则，而且也继承了促使他成功的特殊心理状态。

在我们考察雅各宾精神（Jacobin spirit）时，我们曾经描述过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看到，它总是试图通过暴力推行其自以为真实的幻想：在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拉丁国家，雅各宾精神最终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所有的政党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甚至包括那些保守的政党：不但资产阶级深受它的影响，而且，普通大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雅各宾式的不宽容（Jacobin intolerance）流毒甚广，以致统治者常常肆无忌惮地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对待他们的敌人：任何一个政党只要稍加反抗，就会遭到残酷的迫害，甚至会被剥夺财产。直到今天，我们的那些统治者，其一举一动还同古代那些征服者如出一辙，被征服的人别指望从胜利者那里得到任何宽宥。

不宽容绝不是只存在于社会下层阶级，在统治阶级之间，同样盛行不宽容。米什莱早就指出，有教养的阶级实施的暴力常常甚于普通大



众。当然，这些人并不会去砸毁街灯，但是，他们却足以使人人头落地。在革命的过程中，最激烈的暴力莫过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所实施的暴力，比如教授、律师等。人们常常以为接受过古典教育的大学教授一定是温文尔雅的，但是，从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去读一些高水平的期刊，你就会对我刚才所说的确信无疑了。

这些人的著作同他们的文章一样，对暴力的溢美之词充斥其中，人们不禁感到奇怪，这些命运的宠儿内心隐藏的仇恨怎么会如此之多呢？

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是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利他主义（altruism）热情的驱使，但这一点非常引人困惑。我们更愿意相信，抛开狭隘的宗教心理（religious mentality）不说，希望受到当权者的注意或希望得到一种有利可图的声望，才是他们在作品中竭力鼓吹暴力的唯一可能的解释。

在我以前的一部作品当中，我曾经从法兰西学院一位教授的著作中摘录了几段文字。在那里，作者对资产阶级加以抨击，并竭力煽动人民剥夺他们的财产，我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诸如此类著作的作者当中，一场新的革命很容

易就会找到它所需要的马拉、罗伯斯庇尔和卡里埃等人。

雅各宾主义的信仰（Jacobin religion）同古代的信仰一样，对那些低能的心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些人被信仰蒙蔽了眼睛，他们相信理性是自己的指南，然而事实上，真正让他们心驰神往的只是他们的激情和冲动。

因此，民主思想的演进不仅产生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政治后果，而且它还对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任何人在社会财富或智力上只要一超出了中等人的水平，就会招来嫉恨。这种对优越性的仇恨心理今天仍盛行于社会的所有阶级当中，从下层的工人阶级到上层的资产阶级无一例外。导致的结果就是嫉妒、诽谤、好斗、嘲讽、迫害、愤世嫉俗以及对正直、无私和知识的不信任。

在法国，从最普通的公民到那种有深厚涵养的名流，他们之间的交谈无不充满了对一切事物、一切人的诋毁和辱骂之词，甚至连那些最伟大的死者都在劫难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贬低著名人物丰功伟绩的书籍，哪怕这些人曾经被视为我们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嫉妒和仇恨似乎在任何时候都与民主理论牵扯不清，但是这些感情从未像今天这样肆意蔓延，它让任何观察者都感到触目惊心。

其他的一些后果虽然带有间接性，但其意义之深刻毫不逊色。所有的这些影响均以一种普遍的不服从和无政府状态的形式表现出来。

社会运动继之而来，它就像一台加速运转的机器，因此，这种感情的结果将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感情在那些后果日趋严重的罢工事件当中一次又一次地暴露。

这里所引征的言论只是叙述了众所皆知的一些事实，它向我们表明：共和政体最坚定的支持者自己都认识到了社会的无序化发展。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一事实，但人们也都意识到，既然到了这种地步，谁都无可挽回。实际上，这一局面完全是由心理影响造成的，它的力量远远超越了我们意志的力量。

## 第六章 民主信仰的新形式

### 一、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工团主义运动

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民主问题或许源自工人阶

级近来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正是由工团主义运动或公会运动造成的。

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组合在一起的集体，我们就称它为工团主义，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工团主义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全球性的运动，某些工团组织的财政预算甚至与一些小国比肩而立。

劳工运动（labour movement）在每一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表明，它并非乌托邦理论家的幻想，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它的目标、手段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亲缘联系。在《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一书中，我对此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因此，这里我只想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两种教义之间的区别。

如果说工团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是以社会主义的萎缩为前提的话，那么，我再重复一遍，这仅仅是因为这种合作运动综合了现代工业专业分工所带来的某些需要。

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工团主义的诸多表现形式。在法国，它取得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工团主义在法国采取了革命

形式——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所以，它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掌控之中，至少暂时还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对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本身都不太感兴趣，他们仅仅是想利用新的学说来达到破坏现代社会的目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他们在指导思想看起来有很大不同，但是，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对他们财产的掠夺使他们有了共同的最终目标，他们因此而走到了一起。

工团主义者的学说与大革命的原则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可以说它在许多方面与大革命是完全对立的。更确切地说，工团主义代表了向集体组织形式的一种回归，它类似于大革命期间被禁止的那些行业协会或社团。因此，工团主义所构成的这种联合正是大革命所谴责的，工团主义坚决反对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国家中央集权。

工团主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原则没有任何兴趣，工团主义者要求其成员绝对服从纪律，这就等于取消了一切自由。

由于这些辛迪加组织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相互之间施加暴虐，所以，它们目前还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情感，勉强还可称得上博爱。但是，一旦它们强大起来，它们之间的利益对立必然会导致

冲突的发生，就像古意大利共和国时期的行会组织那样，到那个时候，目前的博爱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平等转瞬之间被最强有力的一方施加的专制所取代。

这样一种黯淡的前景看来已经为时不远了。新的力量在迅速增长，政府在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只能通过不断的让步和屈服聊以自保：让步这一可耻的策略一时半会儿或许派得上用场，但从长远考虑这样的危害甚大。

然而，最近，当矿工协会（MineIB'Uruon）威胁要举行罢工使英国的工业生产陷于停顿的时候，英国政府不得不在无奈之中被迫采取这种妥协退让的办法。协会为其成员要求最低的薪资保障，却不受最低工时的限制。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奇怪而危险的景象：区区一个俸禄居然威胁要让一个地区赖以生存的商业和制造业陷于瘫痪，并且，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矿工所拥有的力量几乎是无穷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与之相匹敌的力量。封建制度下的男爵能实施这样一种暴政吗？有哪个美国的托拉斯组织在行使其合法的权

利时能够如此蔑视普遍利益呢？我们的法律、社会组织以及各行各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达到了一种相当完美的程度，但是，同它还在比较粗陋的时候相比，它使我们的先辈更加容易受到重大的威胁，就像我们目前这样……当前，我们正目睹这一势力的首次示威，如果我们对此稍有疏忽，它将吞噬整个社会……政府对矿工的无理要求表示屈服，这一态度解释了某些事实，那些反抗社会的人正在取得胜利。

## 二、当代的一些民主政府何以会逐渐演变成官僚政府

今天，由民主思想所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冲突正在把一些政府推向一个难以预料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将使政府最后只能保留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对于这一发展过程，我将简要地指出它的影响。专横的必然性依旧是控制事件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它的压力下，政府权力被褫夺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它的影响。

现在，民主国家的政府是由那些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投票，通过法律，从他们当中任命和撤换部长，并且临时行使行政权。这些部长自然是经常变动的，这是投票的要求；由于他们的继任者属于一个不同的政党，所

以他们将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统治。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很简单的，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表面上进行统治的部长，实际上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治理国家；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制约和支配，仅限于发表一些几乎没人关注的演说，并处理少数无关紧要的事务。

内阁部长这一表面的职权，既没有权威，也不可能持久，不过是政治家的傀儡罢了，但在其背后，却有一种隐藏的力量在暗地里发挥着作用，它的权力正在持续增长。这种神秘的力量来自惯例、特权阶层和连续性，那些部长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是根本无法同这一力量相抗衡的。在行政机器中，职责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以至于一位部长根本就不会发现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在反对他。他一时的冲动将受到一个由规章、惯例以及法令构成的网络的钳制，因为他随时需要利用这一网络，并且，他自己对它所知甚少，因而根本就不敢对它稍有违背。

政府的公务员阶层为这一法则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证据：他们得势以后，就开始变得不可一世，不时发出威胁，甚至举行罢工。因此，行政部门的权力在国家中形成了一个小



的“国中之国”，并且，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它很快就会成为国家中唯一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中，将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力。因此，我们所有的革命都将导致国王的地位和权力的剥夺，以便将权力和地位赋予那些不负责任的、无名而专制的政府雇员阶层。

我们不可能预见到所有那些可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阴影的冲突，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只能说，这是一种需要，它最终会为各种冲突的事物带来平衡。世界平和地按照它自己的旨意运行，而不管我们那些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或早或晚，我们都得设法使自己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困难是如何能尽量地避免更多的摩擦，尤其是要摆脱那些空想家的白日梦。他们即使没有力量重新建设世界，却总是竭力想颠覆世界。

雅典、罗马、佛罗伦萨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但它们最后都成了这些可怕的理论家的牺牲品，无论在何时何地，它们都导致了同一种后果，那就是：无政府状态、独裁和衰落。

但是，这些沉痛的教训并没有警醒当代为数众多的革命家，由他们的野心所激发的运动将会

把他们自己吞没，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所有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唤醒了群众心目中依然泯灭的希望，刺激了他们的欲望，并且侵蚀了多少个世纪以来慢慢建立起来的对群众构成约束的堤坝。

盲目的群众与少数精英之间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连绵不绝的事实之一，历史多次证明，失去平衡的人民主权的胜利是一种文明行将结束的显著特征。精英从事创造，而平民则倾向于破坏；前者一旦失势，后者紧跟着就开始了其钟爱的工作。

伟大的文明要想繁荣昌盛，首先就必须控制住它们所包含的低劣成分。一种民主的暴政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独裁、扩张以及最终独立的丧失，不只是在古希腊才会发生；个人的暴政常常产生于集体的暴政。在伟大的罗马，它完成了第一轮循环，在野蛮人的统治下，它完成了第二轮的循环。

我们在本书中研究了历史上重大的革命，但我们特别关注所有的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达20年之久，其影响至今余音未绝。

法国大革命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

文献资源，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如此丰富的经验。

我在各种不同的著作中所详细论述的那些原则，无一不可在这场伟大的戏剧中找到无数的例证，这些原则包括大众心理的短暂性、民族精神的持久性，信仰的作用，神秘主义因素、情感因素和集体因素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逻辑之间的冲突等。

在国民公会当政期间，类似的悖论更是随处可见。国民公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痛恨暴力；作为多愁善感的哲学家，他们热烈地呼唤自由、平等和博爱，但结果却是以最可怕的专制而告终。

在督政府统治时期也出现过同样的悖论。一开始，议会的意图是极为温和的，但它们却不断地通过血腥的政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希望重建宗教和平，但最终却把成千上万的牧师送进了监狱；它们打算在法兰西的废墟上重整河山，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徒然地增加了废墟的数量。

因此，在革命时期，人们的个人意志与他们所组成的议会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真实的情况是：投身革命的人常常会受到一

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使他们身不由己。尽管他们相信自己是按照纯粹理性来行动的，但实际上，他们接受的是神秘主义、情感以及集体要素的影响。他们自己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我们也不过是直到今天才开始理解的。

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不甘心接受人类本性的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试图以理性的名义来改造人和社会。

任何一项以此为使命的事业，从一开始就要注定失败。那些声称能够改变人性的理论家，必然要动用一种超过以往任何一位暴君的权力。

然而，纵使他们拥有这种权力，即使革命军队取得了胜利，他们用尽了严刑酷法和接连不断的镇压，大革命留给人们的却只是一堆又一堆的废墟，并且最后不得不以独裁统治而告终。

既然经验对教育人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样一种尝试变得毫无意义，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如果没有大革命，对这一点我们恐怕很难证明，即完美的理性并不能改变人性，因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根据立法者的意志进行重建，哪怕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

民主权的原则，改革者才试图将他们的教条强加于人。在领袖的引导下，人民不断地干涉议会的决议，并犯下了最残忍的暴行。

大革命时期的大众史具有不同寻常的教育意义，一方面，它让我们看清了那些赋予大众精神以一切美德的政治家的谬误所在；另一方面，大革命的历史也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旦从作为文明之根基的社会制约中解脱出来，放任其本能的冲动，它很快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现其祖先的野性。每一场取得胜利的大众革命都是向野蛮主义的一次暂时回归。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持续下去的话，它就可能再次上演恐怖的一幕。由于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杀那么多的人，所以它只好将首都的珍奇无比的纪念物付之一炬。

各种心理力量一旦从那些用以约束它们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就会发生冲突，大革命正好体现了这样一种冲突。大众的本能、雅各宾主义的信仰、古代的影响、欲望、爆发的情热，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人们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激烈冲突当中，在这10年的时间里，法兰西血流成河，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座废墟城市。

从长远来看，这似乎就是大革命的全部结果。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

件，因此，只有借助于分析，才能理解和领会这一伟大戏剧的实质，为我们展现不断激励着其主角的动机。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受到各种形式的逻辑的支配，这些逻辑包括理性逻辑、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神秘主义逻辑，它们之间或多或少能够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但在大变革时期，这些逻辑发生了冲突，于是，人们也就变得不是自己了。

在本书中，我们绝没有低估大革命在争取人民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果的重要性。然而，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是废墟和流血；它们本来可以在稍晚的时日里通过文明的自发进程毫不费力地获得。为了赢得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物质灾难和道德瓦解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承受道德瓦解的后果。载入史册的那些残忍暴行将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至少今天尚存。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更愿意采取行动，而不只停留于思考上。对于哲学家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他们不屑一顾：那种连物质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弄明白的空洞思考，怎么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呢？

敏于行动自然是一件好事，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行动的结果，但只有受到恰当指引的行动才是有益的。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是对行动的重要性确信无疑的人，然而，他们却把幻想作为行动的指南，结果最终犯下了灾难性的大错。

对事实不以为然的行动常常不会是有利的，它声称要剧烈地改变事件的进程，但人们不能把社会当作实验室中的仪器用来做实验。我们所经历的政治剧变向我们表明，为这样的社会错误所付出的代价之惨重。

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实验几乎毫无好处。空想家在追求他们自己的梦想时，也激发了群众的欲望和热情，各个民族每天都在扩军备战。所有的人都感到在目前世界范围的竞争当中，弱小的民族几乎无立锥之地。

在欧洲的腹地，一个可怕的军事大国正在崛起：其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它渴望支配世界，以输出商品。它不久将无力养育本国逐渐增长的人口，它要为这些人口寻求生存的空间。

如果我们继续为政党纠纷、国内的明争暗斗、无聊的宗教迫害以及束缚工业发展的法律所困扰，内耗使我们的凝聚力减弱，那么，我们不

久将要失去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我们将不得不让位给那些更加团结的民族，它们能够使自己适应自然的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ies**），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现在不是过去的重复：虽然在历史发展的细节中充满了不可预见的因素，但其发展的主线却遵循着永恒的法则。



[1]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约公元前540—约前480），古希腊哲学家，最早提出世界受“逻各斯”（理性）支配，其对立统一学对后世影响甚巨。——译注

[2] 圣德肋撒（Saint Therese，1873—1897），法国著名的天主教修女，死于肺结核。——译注

[3] 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公元前82—公元前30），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恺撒的密友。——译注

[4] 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为中世纪墨洛温王朝时代（6—8世纪）由法兰克人的两个王国。——译注

[5] 古代埃及和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兽，向过路者出一谜语（即勤勉的“一物出生四足，长大后两足，最后三足，此为何物”——人），答不出者即被它吃掉。——译注

[6] 齐奥普斯（Cheops），公元前3—4世纪的埃及法老，曾建金字塔。——译注

[7] 指耶稣。其父为木匠，居于古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地区。——译注

[8] 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1050—1115），法国修士，创建修道院，并曾率信徒到达耶路撒冷布道。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新教创始人，影响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萨伏那罗拉（C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宣教士，对当时的意大利政治和宗教生活有过重要影响。——译注

[9] 内伊（Michel Ney）和缪拉（Joachim Murat）均为拿破仑手下的杰出将领。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游击战专家，对意大利的统一作出过重要贡献。——译注

[10] 巴拉斯（Paul-F.-J.Barras, 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家，贵族出身，是最早赏识拿破仑的人之一。——译注

[11] 佛教语。出家人多行法施，在家人多行财施。

[12]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伟大的演说家。——译注

[13] 西蒙（Jules Simon, 1814—1896），法国政治家、激进思想理论家，两度当选议员，1876年一度担任总理。皮特（Felix Pyat, 1810—1889），法国记者，激进思想的鼓吹者，1848年进入议会，1871年再度当选议员，同年进入巴黎公社。基内（Edgar Quinet, 1803—1875），19世纪法国重要思想家之一，1871年入选议会。——译注

[14] 梅因（Henry Maine, 1822—1888），英国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古代法》（有中译本）、《早期制度史》等。——译注



# 心理学 统治世界 3

战争篇·理性操控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张晓宁 译


Gustave  
Le Bon

大众心理学创始人勒庞经典全集  
全面超越勒庞成名作《乌合之众》

读懂世界格局，你将掌控时代的命脉！

3次被禁，7次限级阅读，被译成24种语言，畅销全球136国。

全球经济学家、政治家、心理学家都在推荐的心理学巨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版权信息

心理学统治世界.3，战争篇：理性操控

作者：（法）勒庞

译者：张晓宁

责任编辑：梁一红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 目 录

---

## [版权信息](#)

### [序言：两条战线上的战争](#)

## [卷一 当前研究必需的心理学原理](#)

### [序言：战争的心理学研究](#)

### [第一章 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及其在国家生命中的作用](#)

### [第二章 人格的多种形态](#)

## [卷二 现代德国的演进](#)

### [第一章 德国实力的崛起和发展](#)

### [第二章 德国哲学家对国家的定义以及对历史的阐释](#)

###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演进](#)

### [第四章 现代德国的心理](#)

## [卷三 战争的远因](#)

### [第一章 战争的经济与政治原因](#)

### [第二章 种族仇恨](#)

### [第三章 德国的侵略姿态与复仇思想](#)

### [第四章 神秘主义影响在战争起源中扮演的角色/霸权理想](#)

## [卷四 战争的近因](#)

### [第一章 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和外交谈判周](#)

### [第二章 英国起初的反战情绪](#)

### [第三章 英国国内心理的演变](#)

[第四章 德、奥、俄、法在外交谈判进程中的各自作用](#)

[第五章 大众心理对战争起因的影响](#)

[第六章 奥、德、俄三国君主意志的作用](#)

[第七章 结论：究竟是谁想要战争？](#)

[第八章 德国和各国国内就战争起因的观点](#)

[卷五 战争涉及的心理因素](#)

[第一章 战争手段的变化](#)

[第二章 战争激发的新型情感与新型人格](#)

[第三章 作战勇气及其起源和形式](#)

[第四章 战争中由于缺少远见和心理错误导致的结果](#)

[第五章 源于心理错误的战略错误](#)

[卷六 德军在战争中运用的心理战术](#)

[第一章 德军作战方法的心理基础](#)

[第二章 德军对作战原则的具体运用：烧杀劫掠](#)

[第三章 德国的作战方法对于中立国家感情的影响](#)

[卷七 战争中的未知变量](#)

[第一章 现代战争的直接后果](#)

[第二章 不可靠的战争报道](#)

[第三章 马恩战役假说](#)

[第四章 和平问题](#)

[结语](#)

# 序言：两条战线上的战争

古斯塔夫·勒庞的《战争心理学》成书于1915年之秋。当此之时，法国已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渐已习惯战争特有的负担、节奏与艰辛。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兵，都进入了斯多葛主义那种屈从现实与放任自流的状态：一时满怀希望迎接胜利，一时坐看战争苦难持续。尽管法国还在盼望下一轮“大推进”将带来胜利与和平，但在1915年的秋天，局势已很明朗：战争至少还得持续一个冬天。9月下旬，法军在香槟战区发起新一轮攻势，却和阿图瓦与弗兰德斯春季攻势一样，未能打破西线的僵局，年内结束战争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如此，香槟攻势失利的苦涩与失落并没有动摇法国人的信念：为夺取最终胜利，法国将不计代价、继续战斗。士兵们要奋战到底，平民们要出于道德义务为祖国奉献力量，知识精英与道德权威们也要担当起引领全民的特殊使命，为法国参战寻找合理解释。勒庞撰写《战争心理学》正是基于以上背景。

在开战的头几个月内，法国的学者与作家们纷纷加入笔者谓之为“知识动员”的宣传活动，在国内外出版刊物并进行公共演讲。在国际舆论战

场上，他们与德国人展开激烈交锋，驳斥德国人对战争不负有责任的主张；在对国内及中立国的宣传中，他们也详尽论述了法国为何必须战斗并将继续战斗，直至获取最终胜利。

在以上活动中，法国人发现了两个问题，并纷纷给予了极大关注。第一个问题有关德国学者们在开战头几周内的奇怪表现：为什么93名最杰出的德国学者公然违抗众所周知的事实，抛出一份颠倒黑白的宣言？这分明与他们客观、公正的学术作风大相径庭。在这份臭名昭著的《93宣言》中，德国学者们全盘否认了德国的一切罪行：蓄意挑起战争、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残害无辜平民、违反国际法、故意无视既定公约。这彻头彻尾的谎言激怒了法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决心列出所有罪证，让一切针对德国的指控都变得不容辩驳。

《93宣言》引起法国知识界思考：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世界知名的德国学者背弃学术声名，抛弃真理，转而捍卫谎言。与此同时，法国人还发现了第二个问题：在香槟攻势失败后，法军处于空前的不利地位，却体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非凡的决心，这又该如何解释？第一个问题使人警觉，第二个问题则令人敬畏。德国学者在战争动员下发表《93宣言》的行径为人不齿，法军面



对战争的表现出人意料，二者却同样发人深省。

对于以上问题，古斯塔夫·勒庞在《战争心理学》中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都基于一些他在已有著作中充分阐述的原则。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看来并非为加入本来就已是众说纷纭的公共讨论，而是要改变这种讨论的性质，利用心理学规律更充分有力地解释德国学术界何以如此癫狂、法国人何以如此充满斗志。勒庞坚信只有心理学才能揭开集体行为的谜团，因此否定了所有现存解释，认为它们不准确、没有说服力，没能认识到“那种感性、神秘、共同的力量”在政治家、知名学者和普通士兵的集体行为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战争心理学》一书引入了心理学原则，以弥补以上提及的不足，同时也捍卫了勒庞本身的学术地位——当时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直至1914年，占据学界主导地位的都是笛卡尔主义与新康德理性主义学派。

勒庞一直力图在作品中宣介，集体行为是非理性（但是真实的）力量的产物，这对当时统领法国学术与教育界并限制勒庞学术成就的理性主义思维构成了挑战。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名学者若要成就学术名誉，就要在巴黎大学获取一席教职，或是获准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五个学院之一。在这两条前进道路上，勒庞都持续地、反复

地受到阻遏。他不仅不能在巴黎大学或是巴黎任何一所与之相当的教育机构获得教职，也没能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他逐渐开始厌恶这种被学界放逐与边缘化的处境，被迫加入法国知识界的大讨论中。因此，《战争心理学》不仅针对国外敌对势力，也是对国内知识界主导思想与个别人士的反驳。

乍一看来，与“一战”期间法国学者们写作并出版的许多文章和书籍相比，《战争心理学》并无特殊之处。在此书中，勒庞每每不留情面地将德国人称作禽兽，这或许比同类作品更加露骨地流露出反德倾向，但也不算太突出。说到底，反德在当时是法国学术界的流行趋势，勒庞只是在书中采取了更多形式，并用更多论据抨击德国人。与许多其他同处“一战”时期的作家一样，勒庞肯定了德国应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谴责了德国的战争暴行，批评德国学者软弱且毫无原则，并刻画了德国人在服从政府权威时体现的奴性和在欺凌弱小时暴露的残暴。勒庞指出，普鲁士利用自己的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爱国社团，加速了德国军事化进程。法国人的著作普遍指出，“一战”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普鲁士王国寻求在德国全境和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勒庞在书中还提出一些观点：德国的

科学在1914年之前备受全世界尊崇，实际上却多为派生与模仿；德国的教育无论如何严谨苛刻，都缺少反思。勒庞坚称，这是由于德国更加注重小节而缺乏全局观念。帮助德国在全球工业和技术制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不是智力，而是“组织性”——这在现代世界非常有用，也促成了现代德国的大量成功，但并不值得赞扬。

因此，尽管《战争心理学》一书中某些论点似乎与法国其他学者一致，分析过程却大为不同。该书就一些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提出质疑，而不是一味赞同。如果认真研读，读者便会发现勒庞并不认为德国在1914年是有意识地发起战争，并不认同战争是理性计算的产物，也不认为是德国哲学催生了泛德主义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他与许多法国评论家一样，认为德国确实对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犯下暴行，并从中立信息来源搜寻了许多证据来佐证这一观点。解释德国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谎言时，勒庞敦促读者考虑到“心理传染”在此种情境中的恶性影响。

在战争初年，多数法国学者都认为，德国宣战是由于其坚信自己有权利统治欧洲。领土扩张主义和自负情绪持续发酵，最终驱使德国不断推进前线并压迫邻国。在解释德国为何将1914年的巴尔干冲突转化为世界大战时，诸如加布里埃尔·

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evy-Bruhl）和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等法国学者都强调了泛德主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

其他学者认为，德国的侵略性并非来自近期的历史，而来自至少一个世纪前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传统。如果将战争归罪于泛德主义及其政治盟友的投机主义，显然存在问题，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没有深究泛德主义的渊源。拉维斯

（Ernest Lavisse）、布特鲁（Emile Boutroux）和许多其他法国学者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可被视作泛德主义的创始人，而泛德主义应为德国的侵略负责。因此，费希特和黑格尔应对1914年战争的爆发负责，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来自其哲学传统。

勒庞认为以上观点既没有充分理由，也不具有说服力。尽管他认同德国应对战争负责，却否认德国在1914年8月确实希望发动战争。他承认曾由于爱国主义冲动“和法国多数人一样认为德国在找借口向我们开战”，但是出于对现有证据的尊重，他对此予以重新检视。当他更认真地研究这些资料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得出这一结论：尽管德国导致战争最终不可避免，在战争真正爆发时德国却并不希望如此。”勒庞尽管知

道在就这一点的看法上自己是少数，却毫不犹豫地指正索邦大学的教授们关于德国有意挑起战争的说法。对此他自己也观察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直到最近我看了巴希（Victor Basch）的作品，才得知他也持同样观点。”

若要相信德国利用了1914年危机并故意挑起世界大战，就必须相信德国的行为完全出于理性计算。勒庞将这种看法斥为“现代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事实上，如果德国真是理性的，就将与邻国和睦共处。因为如果理性权衡，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方式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因此，参战的决定违背理性，因为德国不仅失去了之前的市场，还驱使先前习惯其存在的民族转而起身反抗。勒庞认为德国或许可能出于理性而停止战争，因此得出结论：德国的动机完全未经深思，而且相当不理性，完全不是索邦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

此外，勒庞还对认为德国的侵略根本源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提出质疑。如已浏览过《战争心理学》一书，读者便会发现勒庞在其中提出这一观点：他确实也在从黑格尔开始的德国传统哲学中找到了能够证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主义正当性的内容，但经过一番分析，他最终并

不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应该归咎于哲学（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他人的）。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侵略精神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在对军事力量的推崇中，德国哲学家们仅仅是在学术上为德国已经确立的军国主义倾向寻求正当性。勒庞写道：“哲学家们承担起为这些理论构建理性基础的任务，因为历史早已显示这些理论是非常有用的。”他在提及黑格尔和尼采时，承认他们确实“激起了国人最不切实际的期许，尤其是那些征服、屠杀和掠夺的天性”，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因为“如果不能支配这些天性，就只好予以赞美”。在勒庞的分析中，思想并不产生行为，与此相反，行为来自“天性”，然后促进思想的发展。哲学或许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出现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却不是优先的和主要的原因。

如果理性计算和狂妄哲学都不足以导致德国在1914年的侵略行为，那么合理的解释在哪里呢？勒庞认为，战争并不是“任何一国刻意计算的结果——甚至不是德国，而是人类激情与情感超越理性计算的力量体现”，只有心理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已在其先前著作中提及的理论——足以解释战争的起因和特征。他尤其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人的行为更受情绪推动，而不是理性计算；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神秘主义信仰比理性思想更为强

大。确实，“神秘主义和理性……各属完全无关的领域，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是由于暗示或心理传染，却从来不是来自推理”。因此，要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行为，如果仅仅依靠理性，便会误解人们动机的本质。勒庞更倾向于在“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中寻求将欧洲拖入战争的解释。

勒庞意识到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导致“一战”的爆发，因此沉痛地指出情感因素对每一个参战国都构成了影响。某些国家是由于荣誉、职责或骄傲，另一些是由于种族仇恨、自负和野心膨胀。例如，英国奋起保卫比利时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道德义务；法国则是认为有必要捍卫国际条约并捍卫受到侵害的东欧盟国。与此相反，德、奥两国却并不是出于如此高尚的情感因素：奥地利是出于对塞尔维亚的深刻仇恨，德国则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非理性信仰。无论如何，理性在任何国家的权衡中都不占据任何地位。

导致七月冲突转化为欧洲战争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各国在心理上的短视。在一系列外交交锋中，各国都暴露出心理洞察力的不足。例如，德国和奥地利没能看到将驱使俄国保卫塞尔维亚的心理因素，即便参战完全有悖于俄国的根本利

益。德、奥两国还误判英国将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破坏袖手旁观，但是英国做出的反应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荣誉。勒庞认为，德国最糟糕的误判便是没能预见英国全民对荣誉和尊严的重视。

尽管情感力量和心理误判使得各国的行为完全脱离，甚至违背了理性。但是勒庞认为，最终将欧洲拖入战争的却是德国对自身“上帝赋予的优越性”的神秘主义信仰——他将其特征定义为“热爱神秘、热爱超自然力、蔑视经验、相信上天的力量作用于世俗现象”。他认为：“神秘主义是导致德国最终发起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的神秘主义有一些已经确立的内容：德国人经上帝挑选，注定将要统治欧洲。这一套信仰在19世纪时受到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莱希特（Lamprecht）的推崇，似乎也在德国工业的惊人发展和军事扩张中得到证实。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鼓励人民相信上帝选派了德国统治欧洲，因此德国人如同受到催眠，愿意忽视所有理性的个人利益，并全力寻求履行天赋使命的机会。

神秘主义在当时德国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政治家还是学术领袖都不能免受影响。在勒庞看来，这明显体现在起草《93宣言》的那些哲学



家、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行为之中。与许多法国学者一样，勒庞十分愤怒这些德国学者狂热地、一致地、不顾事实地为德国的错误和暴行找借口的行径。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德国侵略原因的法国学者还认为，德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也解释了德国学者为何能够快速集结起来捍卫祖国。这种文化传统更强调服从而不是学术独立，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并把一切不合法、不道德、不名誉的事物正当化，因此最终导致《93宣言》的出台。勒庞却直接否认了上述观点，并基于心理原则给出解释。他承认宣言的签署者“在某些情况下深负名望”，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人“展现出最奇怪的推理缺陷与对他国心理的全然无知”。勒庞如此解释《93宣言》现象：“德国人（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反映出，基于暗示和心理传染的信仰丝毫不受论证的影响……即使是最高智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奴隶。”勒庞在《93宣言》中证实了他很早以前即在书中指出的事实——“当置身于集体影响中，即使是最睿智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判断力。”若不是这样，又该如何理解那么多颇有成就的学者为何能够抛弃一切独立判断力，全然不顾事实，辩解德军并未犯下任何暴行呢？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关于德军暴行的争论也在激烈进行。在英国，布莱斯委员会用耸人

听闻的细节报告了德军的罪行，这些故事情节如此可怕，甚至导致某些读者认为其真实可信。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重新研究了这些事实，找出一切证据和原因，来探寻德国评论家们为何承认针对平民的行为并非“暴行”。约翰·霍恩等人证明，针对德军的许多指控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但是同时德国对此的否认也并非毫无理由。德军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对平民的行为正当，因为他们真心相信平民大多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平民往往是游击队或士兵伪装而成的。因此，在1914年8月行军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德军杀死了许多村民和乡村牧师，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平民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以上这些分析基于战争期间备受关注的一些材料——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处收集的日记和战地手记。受到《93宣言》的刺激，法国学者们成立了一个战争资料研究委员会，以质疑德国人对种种事实的否认，并极力证明——无论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传的那些关于德军暴行的故事多么可怕，它都是真实的。关于这一问题，有两本宣传册。第一本发表于1915年，题为《德国的战争理论与实践》，其中关于德军暴行的资料

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或许清楚这些证据不够中立，因此在之后又发表了《德国人之暴行》宣传册，该手册中的事实证据来自德国方面，主要是1914年9月间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日记。这些自证其罪的材料反映，德军确实焚烧了村落、屠杀了平民、处决了战俘并残酷对待妇女儿童。面对这些证据，德国学者坚称德军未实施任何暴行显然非常荒谬。

勒庞承认自己关于德军暴行的材料很多都来自以上手册。他也从德军士兵的日记中引用了一些事例，以直接反驳德方对此的否认，因为“德方很难否认自己士兵所述事实”。就此而言，勒庞的研究方法与许多其他法国评论家一样，希望基于来源非本土的资料建立论据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在整本书中，勒庞将很多论述重点都放在与法国毫无关联也不具偏袒性的资料来源上，以便彰显法国学术态度的客观和公正。此外，他也希望基于以往作品中提出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畸变，关于德军行为是否为暴行的争论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为解释德军为何如此轻视关于士兵行为准则的既有规定，勒庞转而引用其有关民族性格是内在与不变的理论。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他提出国民性格是“构成种族天赋的无意识因素”的产

物。与许多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在同一国家中成长的所有个人，由于负载了同样的历史，受到同样理念的激励，因此在某些方面基本相似。尽管任何国家中，个人可能由于教育与成长方式不同、家庭影响不同而彼此大不相同，但“种族天性”却不能被完全忽视：“即便在智力和学识上大不相同的人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天性、激情和感觉。”

勒庞关于“种族特征”的概念与20世纪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种族“纯洁性”不过是荒谬的虚构概念。尽管如此，他坚称人的个性是由若干遗传而来的核心因素组成，具有“相当固定的心理内核”。以德国人为例，虐待、残忍、蔑视文明行为都深深根植于其集体心理之中。勒庞认为，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在各个方面都与公元头几个世纪中的事件相似”，这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未能完全驯服自身原始的、残忍的天性。他总结道：“如果认为文明的进步能够通过开发我们的智力来转变我们的情感，那便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社会约束会隐藏起一些民族的部分野蛮本性，但这仅仅是伪装。约束一旦消失，这些本性便会重现。”勒庞坚信德国人永远都是“法兰西民族与法国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否定了多数学者的乐观倡议——德法将在战后出于对国际准则的共同尊重而建立持

久、和平的关系。

\*\*

除了对以上德军暴行与德国学者的谬论感到震惊之外，法国学者们还同样——尽管更加喜悦——惊讶于法国士兵们所表现出的刚毅与勇气。法国知识界经历过1871年惨败之后的阴影，嘲笑过法军反对共和的倾向，害怕法国会因为自负而堕落，如今却为全民面对战争爆发所显现的决心而震惊。怎样才能解释法国士兵们为何下定决心离开安逸的家庭生活、投身于战争的无边苦难之中呢？倾向于从宗教角度寻找原因的评论家们认为，自1914年8月起，一场“奇迹”已经改变了法国。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在面对战争挑战时，法国士兵们展现出一种在和平年代从未出现的精神活力。

在“一战”之前的最后几个好年头中，法国的社会评论家们哀叹现代社会的道德腐败，并常常用出生率下降或离婚率上升等事例证明法国确实正在走向衰落。鼓励生育者们纷纷哀叹：已婚夫妇为了舒适生活而选择不要孩子，以便在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中满足种种私欲。他们忽视了国家需要，因为国家只有当人口持续增长时，才能承担自我防卫的职能。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法国

公民也对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漠不关心。爱德华·贝伦森（Edward Berenson）指出，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不断攀升的离婚率成为引起全国警觉的话题，因为这被视为当代法国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社会腐朽的一大症状。

勒庞本人也非常关心法国的道德败坏问题。尽管他并不认同鼓励生育者们关于“国家实力完全基于人口出生率”的主张，却与许多保守派评论家一样认为法国国力即将衰落。他在1895年写道：“当今这代人受到的教育让我们无望地看到——学校里培养出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已为法国未来的衰落铺好道路。”那么，他该如何解释“成千上万的人抛弃奢华与安逸的生活，投身危险和贫困之中，像古代最威武的勇士一般奋勇战斗”呢？

就以上问题，勒庞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给予了关注。为何受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教育的一代人能够抛弃自我放纵和物质享受，积极地响应参战？勒庞就此援用了在《乌合之众》中阐述过的三大概念：环境决定论、心理感染和集体的遗传（或种族）特性。

在写作此书20年前，勒庞说过：“所有心理构成都包括各种潜在性格，这些性格可能会由于

环境的突然变化而得到显现。”随着情境的变化，人也会发生变化。这条规律在战时变得尤为明显——国民所处的新环境让所有先前潜伏的性格特点全部浮现上来。勒庞认为“一场漫长的战争有能力改变我们精神生活的平衡”，因此得出结论：一个个体的性格会在战争中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其可能做出使身边人甚至本人都感到震惊的举动”。如果个人会受到环境因素的改变，国家也一样。1914年的法国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抛弃了反教权政治，抛弃了国际主义的倾向，抛弃了自我放纵的习惯，转而去拥抱政治信仰、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一战”虽然可怕，却似乎证实了勒庞的理论：稳定不变的人格仅仅源于稳定不变的环境……每个人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潜在性格特征，会在环境的压力下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

单凭环境因素不足以解释法国在“一战”中的心理转型。“心理感染”也是重要因素。勒庞将心理感染定义为“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并认为其在士兵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单凭心理感染便能产生集体凝聚力，这是军事行动的必备要素。无论是在兵营中、训练场，还是前线战壕中，士兵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集体精神”的驱使，从而“根据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意志去感觉、思考和形成观点”。

从该说法本身可以看出，“心理感染”并不总是积极的力量。其也曾使得德国的知识分子误入歧途，并严重误导了德国的士兵们。法国军队也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其负面影响。勒庞从前线的信息来源中找到证据，证明了法国士兵们的勇气会受到心理感染的消极影响。尽管如此，勒庞还是认为：当心理感染与天赋秉性结合时，士兵们便能够发扬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精神。

尽管出于保守与审慎，勒庞为群体可能“极易过度反应”而感到不安，却还是承认，尽管群体可能拥有黑暗、危险的力量，但是也可能拥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 and 最崇高的美德。事实上，他们“甚至可能比孤立的个人更倾向于展现这些美德”。如果得到恰当的引导和足够的激励，群体中的人将能展现出“克制、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等精神。因此，关于群体的分析使得勒庞相信，在群体的影响下，个人的性格能够被改造——而且并不总是负面的改造。对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等情感的追求，尤其可能影响集体中的个人，而且经常足以驱使他为之奉献生命……集体主义本身便能够激发强大的无私和奉献精神。1914年，当数百万人离开家庭和日常生活，成为法国军队这庞大集体的成员之后，便充分地证实了以上理论。



勒庞认为，“战争和革命”是不稳定的历史作用力，会取消那些在世界和平和国家稳定时期约束个人的“禁令”。德军从这些禁令中解放出来后，便开始肆意放任最原始的野蛮天性。如果战争使得德军士兵从社会禁令中解放，为什么法国和英国士兵没有发生同样情况呢？为了解释法国士兵为何没有成为一个危险的群体，而变成一个英雄的群体，勒庞再一次引用了关于民族性格的理论。因为每国的公民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不同的核心信仰，因此会在同一刺激下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所以，德国士兵可能倾向于恐吓平民，而法国与英国士兵则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行为。与德国士兵不同，英法士兵“受到了社会约束的长期影响，以至于他们的感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稳定”。根据勒庞估计，自我约束需要经过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培育，才能够成功地遏制野蛮天性。

或许这一解释能够让英国读者们满意，但是对法国又适用多少呢？法国具有革命与起义的狂暴历史，自然不可能在公民中培育出所谓的“社会稳定性”——勒庞将之视为文明行为的必要前提。最近的历史显示，法国既不具备内部稳定性，也不具备自律性。事实上，在1914年，很难想象还有国家比法国的历史更为动荡和缺少约束。勒庞研究过1789年的大革命，了解本民族倾

向于绕开社会约束并放纵追求“原始的野蛮”。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他用环境决定论解释了国民议会（1792—1795）的野蛮属性：革命带来的“环境突变”解释了为何在国民议会最野蛮的成员中竟有原本非常温和的人——他们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平和、高尚的公证员或法官。在《战争心理学》一书中，他还指出了革命主义的其他方式：由非理性、神秘主义和暴力激发的泛德主义激进表现。革命精神不是由理性产生的，而是由那些“与智力毫无关系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力量”所塑造。勒庞认为，尽管“这场悲剧（法国大革命）的主角总在试图寻求理性”，但是“操纵着演员的秘密力量却来自理性主义之外的其他源头”。

在“一战”中，法、德两国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德军总参谋部在1914年发动战争时，首先下令军队调离近期攻占的地区，这一战术早在一百多年前便为拿破仑在1796年进军意大利时运用过。两国的相似之处远不只以上这些，勒庞不仅承认它们，而且还予以强调。他认为，德国的暴行并不是士兵个人对平民的行为，而是“之前便确定的作战手段的结果……是基于恐怖”。对一个法国人提及“恐怖”一词，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其联想到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主义和1793年~1794年的种种惨剧。勒庞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为他

将“恐怖”做了这番定义：既为君主也为革命者使用的技术手段——旨在震慑敌人并迫使其迅速投降。

因此，当勒庞运用国民性格理论解释法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时，便不知不觉地产生内部逻辑矛盾。其论证的核心存在一个站不住脚的简单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德国人和法国人同样容易受到心理感染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却对战争爆发做出不同反应，那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截然不同的集体性格——德国人嗜血、残忍、放纵，而法国人爱国、自制、稳定。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法国在1793年～1794年间同样出现了1914年德军犯下的恐怖行径。

此外，尽管勒庞一贯强调德国和法国截然不同——德国总是毫不理智地渴望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却是文明与秩序的代表。尽管如此，他还是举出事例，证明了法国军队的先辈们曾和德军一样暴力、嗜血并缺乏理智。

鉴于以上矛盾，勒庞的集体行为理论仍然无法解释法国人在1914年为何能够表现出荣誉感、勇气和正派。

因此，读者在《战争心理学》中会发现，勒庞将1914年的德国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法国做了隐晦的比较。在这点上，勒庞并不是唯一，在战争期间许多学者都采用了类似手法。这样东拉西扯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勒庞尽管对保皇派的反革命倾向保持中立，却发现共和派的政治理念留下了许多恶果。他担心如果“民主社会主义”在战后流行，法国必将灭亡：“所有大而化之的广义概念，例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海牙公约和其他一切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理念，从未发挥过任何影响。”尽管他自信地宣称这些理念都已“永久破产”，却无疑了解共和派知名学者们希望在战后将其恢复。1915年，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和维克多·巴希（Victor Basch）基于康德哲学指出，法、德两国在战后能够达成和解并建立持久和平。勒庞则认为康德基于国际合作的永久和平论不过是危险的妄想，便将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与德方划为同一阵营。因此，当他说到雅各宾派和德国知识分子同为一丘之貉时，他是在隐晦地诋毁所有将自己视作革命后代的法国学者。

尽管这本书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却依然对我们理解勒庞非常重要。初步浏览，这本书似乎只是重新概括了其他学者早已论述过的主题，事实上，它却是试图颠覆而不是附和当时的学

术“正统”观点。勒庞不仅向法国众多权威学者提出质疑，还指出他们的政治原则与德国的某些讨厌做法极为类似。对于那些更为保守的人，他更是批评：“正是这些人的爱国主义导致他们失去了学术上的进取心。”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勒庞的朋友们拒绝帮助其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任何委员会，这不足为奇。《战争心理学》一书中的观点无疑为勒庞赢得了一些追随者，但是其中含蓄的指责却未能为其减少对手。在与20世纪初统领法国学术文化的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之战中，勒庞并未收获战果。

玛莎·汉娜（Martha Hanna）

# 卷一 当前研究必需的心理学原理

## 序言：战争的心理学研究

在本文中，我并不打算研究“一战”中的具体事件，只打算分析有关“一战”起源与发展的心理学现象。由于太多的情绪煽动，当前很少有人能够就此给出可信解释。几代人虽然创造了一段历史，却并没有记录和书写历史。只有历经了一段时期，待尘埃落定之后，历史的重大闹剧才能从人们的激情中沉淀下来，渐渐成形并为人们所理解。对于生者，历史从无公正可言。只有在面对逝者时，历史才是公正的。今天我们面对种种事件，其背后都隐藏着众多无形的推动力量，因为有形的世间万象其实都源自一个无形的世界。在这个无形世界中，所有统治我们的感情与信仰都在被不断加工、不断完善。因此，我打算深入这个无形的领域中一探究竟。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一声惊雷，打破欧洲的和平，并将如此之多的国家拖入战火。当时欧洲诸多国家都已做好战争准备，同时希望通过外交谈判与斡旋在政府层面缓和冲突、维护和平稳

定。但是，和平并未到来，经历了一周的外交谈判之后，欧洲便燃起熊熊战火。

战争是非常重大、令人生畏的事件，其爆发并不基于任何人的独立意志，而是来自各种深刻、长远的原因。这些原因一直在缓慢并持续地累积发酵，直至有一天突然爆发。就此存在一个规律：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中，事件起因似乎总呈代数式演进，而事件效果却呈几何倍数扩大化并加速发展。

如果想要了解欧洲战争的起源，必须回溯至战前的历史事实，尤其需要深入研究现代德国人的心理变化。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行为其实是民族心理的产物。

战争是心理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战场上，种种势力都在相互较量——理念对理念，个人自由对集体制约，个人主导权对国家社会主义专政，国际道义、条约对武力霸权……德国努力践行武力至上的理念，这种理念事实上毫无新意，其一直在历史上占据绝对地位。为了替换这一理念，欧洲已经挣扎了两千年，但依旧未能成功。日耳曼武力至上理论一朝取得胜利，将会把各国带回历史上最黑暗、最暴力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弱肉强食是正义的唯一基石，弱者被无情地

碾碎，无用者被残忍地抛弃，国家被征服、被掠夺，平民被屠杀。但是，人们渐已开始遗忘那段黑暗的年代，甚至有人相信，文明的进步将一劳永逸地摧毁原始年代的野蛮习俗。但是，这种想法不过是危险的幻觉，因为即使在几个世纪之后，现代人类仍旧与其祖先同样野蛮残忍，甚至还未放弃奴役世界的野心。

这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德国人理解并推崇，是因为其以一种宗教形式呈现。与穆罕默德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一样，日耳曼民族也产生了集体幻觉，他们认为自身是更高等的种族，命中注定将要先征服世界、再改造世界。

一个民族膜拜的神明不仅是其幻想与物质需求的体现，也是其嫉妒与仇恨等情感的体现，德意志新时代的诸神也不例外。这些全部属于在历史上占据突出地位的神秘主义势力，为确保这一势力获得胜利，数百万人不幸献出生命，众多繁荣的城市纷纷衰落，在其废墟之上，最终出现了强盛帝国。

现代战争与古代宗教战争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引起的幻觉相同，表现出的矛盾、狂暴和残忍也相同。战争完全受非理性所操控。如果国家和君主的欲望全部受到理性制约，今天就不



会再有战争了。

如果试图调动理性与逻辑来解释历史事件的连锁反应，无疑将徒劳无功。因为，如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其起源和发展似乎都混沌一片、充斥着完全不可能的因素，即便最有远见、最睿智的人都无法予以预见。

既然如此，战争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研究数据呢？

首先，它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国家的君主（此处指德皇威廉二世）25年来都在为帝国繁荣而极力维护和平，某一天却突然放任自流，不情愿地卷入一场浩大的战争；其次，一个国家甘愿放弃商贸与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不仅对一场将带来长远损害的血腥冲突不予反对，反而还神智错乱般地欣然参战；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场战争中，正是来自文明国度的人们焚毁了在先前战争中都能幸免于难的城市、百年图书馆和艺术名作。——这么多的前后矛盾，有哪个预言家能够提前预知？

在战争所有不可预知的事物中，人们必然注意到德国国民迸发出的不知从何而来的狂暴情绪，甚至德国最权威的学者们也未能例外。因为

这种心理感染力已远远超越了理性，完全化作一场疯狂的风暴席卷了全国。

同时，法国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变化。在连续数月面临着戕害与死亡的潜在威胁后，法国这样一个随性、不稳定、无序的国家突然变得果敢与顽强。此外，除了以上这些惊人变化之外，历史也必将铭记比利时这个英勇小国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在战火中，比利时的城市被焚烧，妇女和儿童被杀戮，但这个国家却毫不迟疑地挺身捍卫荣誉。所有大国——尤其是德国都没预料到，这样一个弱国面对强敌时竟能如此顽强与无畏。

以上这一系列悲剧事件中，并没有一件事能为理性所预见，因为理性并不是事件中任何一方的动机。那么，我们该从何处探究事件的起因呢？

学者们若仅仅在理性逻辑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就会认为世间万事都由理性主导，当事物表象超越了理性认知范围时，他们就会感到愤怒。但是他们忘记了，引领科学家开展研究、哲学家进行思考的不仅仅只有理性与智力，还包括那些与智力全然无关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作用力。这些作用力分别拥有自己的逻辑，与理

性逻辑大相径庭。前者或许是科学的基石，但却绝对不是历史的基石。后者长期不为人知，因为它们与智力无关，它们与万事的关联都被埋藏在无意识的模糊地带，并且刚被学者们纳入研究领域。只要这些作用力所扮演的角色尚未引起重视，学者们就将继续生搬硬套理性逻辑来探究事件起源，以至于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反倒加入了太多虚构成分。

当前，这些思想尽管非常重要，却还是全新的课题。因此，当我在一些著述中提到它们时，我还是倾向于结合具体事实来说明其作用，比如将之适用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在那场悲剧中，主要革命人物们向来推崇甚至膜拜理性。但是，在革命年代中，理性发挥的作用却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微小，因为诸多革命人物的言行都与其自身想法格格不入。在这场闹剧中，主导演员行为的神秘力量绝不是来自他们向来推崇的理性，而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源头。如需查明这些力量的本质，就要借助现代科学来加以分析。

当前这场战争中体现的心理学问题与大革命时期同样复杂。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原理与规律，那么这些原理就不仅能够解释目前所有国家错误观念的来源，也能解释许多看来显然无法为

人理解的事物——关于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引起举世震怒的烧杀掠夺暴行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开启了新的时代，促使我们的生活习惯、情感、思想都开始发生剧变。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我们或许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思想与准则都在发生变化，新的贵族政治正在出现，各国正在匆忙奔向看不到一丝光明的黑暗未来。从前被认为不可撼动的政治与道德理念也似乎在迈向消亡，所有理论学说都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再也没有确定的未来，心理力量正在开始发挥作用。在事实面前，演说家和作家们的幻想都已黯然失色，在枪炮声中，一切论争都已归于沉默。

尽管如此，法国必然能够从当前的悲剧中获得重生，并变得更加强大。这是由于法国人民在保卫祖国期间所显示的英雄品质已向我们证明，我们以往对法国人的印象过于肤浅，法国绝不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对我们这些观察者而言，法国年轻一代的无畏与勇气是极大的安慰。这些年轻人将会历经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开拓年代，这个年代的宏伟壮丽将超越过去所有的传奇。全世界都在惊奇地注视着这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与此相比，荷马、查理曼时期那些武士、术士的功绩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人能够预见，在法国这样一个阶级分化异常严重的社会中，来自完全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体现出完全一致的品性。他们从各自安逸宁静的生活中响应号召，从农田、作坊、政府、学校甚至王宫中走来，迅速投身这场重大与非凡的冒险之中，这在从前似乎只会存在于梦中。这些人事实上曾被法国政府视为威胁，但在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这个国家——这是先辈精神的复兴，这种精神或许一度进入蛰伏，但从未消亡。在托尔比亚克、布汶等地，在听到祖国第一声召唤时，英雄的后裔立即感到先辈的精神在他们体内复活了。置身于战争这样一个可怕的人间地狱之中，他们却常常能够说出一些充满英雄气概的豪言壮语，并载入史册，传流千古。“站起来再死！”在一条被敌军围困的壕沟中，一个士兵对被敌军机关枪火力压制得匍匐不起的负伤战友们喊出了这句话。若是在古希腊，这个士兵必将被授予桂冠，他的事迹也将被广泛传唱。

对于一个认为自己将命归虚无——除了一个空洞与无谓的存在的人而言，为一项崇高事业英勇牺牲是值得艳羡的事情，因为衡量生命价值并不是基于存活的天数，而是基于成就的事业。我们祖国神圣土地的捍卫者，我们未来的创造者，正是他们在命运的铁砧上锻造了一个新的法兰西。他们虽已牺牲，却将永生。他们已经进入万

神殿接受全国人民的供奉与膜拜，并且经受住历史的检验。他们将永垂不朽。

## 第一章 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及其在国家生命中的作用

### 1 生命的周期

如果仅仅肤浅地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看到各国军队及各种武器展现的科学技术，有些人可能会轻易认为，理性逻辑仍旧能够安全、可靠地解释所有现象。若仅限于战争的技术层面，以上结论倒也没错，但是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便会迅速发现一个事实：参战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还受到了更高级作用力的影响。

当然，战争运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武器，但真正操控它们的却是心理力量。在堆叠着无数尸体的战场上，心理力量才占据着最高统治地位，战士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它温顺与不自知的臣服者。如果仔细观察，在每一门大炮、每一柄刺刀之后，都存在着无形的操纵者，这一无形的力量才是战争的真正主导者。

为了说明这些力量的实质，我必须简要地重述一些在先前著述中提出的心理学原理。（作者

写过《人类进化心理学法则》《群体心理学》  
《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真理的生命》  
《政治心理学》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合集被命名为“时代格言”，涵盖了作者提出的所有心理学原理。）

一些至关重要的现象尚被包裹在迷雾中，目前还难以予其解释。我们只能说，事件在整体持续推进，但是一切生理、心理和其他种种组成因素都独立存在，并遵循一种特殊逻辑形式——即所有现象确切的连续性。

生理逻辑主导有机生命的周期以及维持生命的必要欲望，心理逻辑控制人类的感情和直觉，集体逻辑影响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神秘主义逻辑创造神明和教义，智力逻辑则促成能够改变人类存在的科学探索。因此，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周期都有独特的自身法则，以上每一种逻辑形式都无法单独解释生命的独立现象，因此我们的解释方法必须随着现象层面的改变而改变。

所有生命的根源都有一个有机的周期，这种纯粹的同一体性使得人类、老鼠或鸟类的细胞在生命法则下拥有相似的活动方式，尤其是在苦与乐——所有存在的两大极端感情之下。

在包括情感、激情等元素的心理周期中，以上同一性稍有弱化。但是，所有生物都依然非常相似。例如，爱、憎、嫉妒、勇气、奉献等情感在某些家畜身上体现得与人类并无二样。

只有在理性生活中，我们才能看到人与低等动物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各类人群之间的知识差异。但是，尽管理性逻辑排他地主导了科学家的实验室，其对于个人与各民族行为的影响却甚为微弱，因为这些对象的存在主要受情感的、神秘主义的与集体的因素所制约。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生命，必须了解这些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因为国家的思维与行为根本不受理性指导。

## 2 心理与智力的力量

性格源于感情与心理因素的遗传与发展，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对万事的理解需要通过智力，我们的行为却受到性格的控制。智力让我们思考，性格让我们行动，并切切实实地在行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相应的，性格是个人与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其形成与发展与智力并无丝毫关联。玛蒙将军曾经说过：“当理智统治性格时，人总是在改变观点、方案和行动路线，因为大智慧总是时刻从不同视角审视问题。”



我们感情的发展独立于我们的意志。没人能确定自己的爱憎，并能维持爱憎永久不变。有关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也在此提供突出例证表明：与情感因素相比，理性因素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重要。这或许有时令人感到意外，但确实是基于一个事实——理性与情感并不遵循同一逻辑形式，因此无法相互影响，一种感情可能影响另一种感情，却不可能影响理性。

至今为止，最知名的哲学家似乎都未就感性与理性各自扮演的角色得出确切结论。根据布特鲁的观点，法国人受感性主导，而德国人受理性主导。但是，我认为这种大而化之的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尽管德国人可能十分理性，但他们依然和其他国家国民一模一样，受自身感情、好恶的主导。残忍与善良同样有权被列为一种感情，同样是感性世界庞大疆界内的一小块领土，任何人都无法从其上逃离。

情感是对历史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事物之一。它们从不同层面赋予我们思想，并引导我们从不同视角看待事物。所有国家都继承了一种自有的集体情感，并在心理上受到这种情感的指引。因此，不同国家、不同祖先的人看待同一问题时采取了不同视角，从而引起绵延不绝的种族仇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如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重大国际冲突中，这些仇恨主要是情感上而不是理性的——表现得极为强烈，并完全冲击了其他感情。这非常好地印证了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当两种痛苦同时产生时，其中相对更加剧烈的痛苦会令人忘却另一种痛苦（*Duobus doloribus simul obortis vehementior obscurat alterum*）。

战争爆发时，法国国内还存在着政治仇恨与宗教仇恨，的确已经足够令人痛苦，但是当我们面对侵略者时，对外敌的仇恨便使得我们忘却了国内矛盾。“一战”爆发前，英格兰正处于与爱尔兰发生内战的前夕，但是一旦对德宣战，英国所有政治党派却为捍卫同一面国旗而紧紧团结在一起。同样如此，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也在面对外敌时共同转变为俄皇的忠实拥护者。这种现象如此多见，说明其背后存在着普遍的心理学规律，如果德国能够观察到这种心理学规律的存在，就不会指望英、法两国的国内问题能够为德国取得胜利助上一臂之力。

以上我所指出的较弱情感能为较强情感所抑制，明显只适用于同一类别的情感。一种强烈的仇恨或许能够抑制较弱的仇恨，但却可能允许另一性质的情感存在，甚至因此变得更为强烈。例如，我们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不仅会出于对其暴行的愤怒而有所增强，也会出于对比利时英勇抵

抗侵略的同情而受到更大激发。

### 3 集体的力量

当个人身处群体中时，其心理与孤立状态时是绝不相同的。这是因为，群体不可能等同于组成群体的个人，正如生物不等同于组成生物的细胞。

集体心理几乎完全不受理性的影响，而由集体逻辑主导，这是一种仅仅为集体独有的逻辑形式。群体在智力水平上总表现得稍逊于个人，但在情感上却可能优于个人。这是由于群体尽管可能并不通晓感恩之类的特定情感，但却拥有利他主义、奉献为公、英雄主义等更难付诸实践的情感。加入集体之后，普通个体的力量一般能够得以增强，但是优秀个体的力量则可能受到剥夺削弱。

群体的情感不仅更加强烈，而且变化无常，能够急速从崇拜转为仇恨。群体情感由于往往欠缺实践性，因此常常将希望当作主要的养分。它还受到神秘主义浸润，因此需要领袖并往往将其神化。此外，对个人发挥作用的心理感染也对集体有作用，但是由于群体不运用理性，因此心理传染对其仅仅发挥了引导作用。

同样，群体非常乐于接受幻觉。幻觉一旦变为集体所有，便立即上升至真理般的权威地位。在当前的战争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原理在很多事例中得到体现。

集体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极少是自发产生的，因为群体实际上是无定形的有机体，不能自发行动——除非出现一位领袖，用断言、重复、威望、感染等蛊惑方法对群体施加影响。这里提到的所有方法，都归情感逻辑所特有。但是，这个领袖不一定非要向群体高谈阔论、慷慨陈词，在一些经过预热的情境中，这一角色也可能由信仰或既有感情所扮演。无论如何，公共舆论的真正起始点始终是领袖或其替代物，自始至终，群体都需要一位领袖来创建与引导公共舆论，即便在民族冲突中也同样如此。

尽管如此，这一原理却被很多学者所忽视。莱维-布留尔（Levy-Bruhl）却在其关于战争起源的著作中做出以下总结：

在危机与冲突的历史剧中，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演员正是爱默生所称的“代表人”——这些人是集体意志的独立体现，其言行代表了无名大众的意愿和激情所在。

这一观点受到了德国所有历史学家的支持，目前在法国学术圈里也广受推崇。该观点基于一项事实：在某一特定时刻，群体地位会变得至高无上，群体领袖可能被其自身的创造赶下台，并转变为群体的追随者。如果再继续深入跟进事件发展，还会发现：群体观念通常都源自个人观念。

显然，这条原理不仅适用于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同样适用于重大政治危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统治艺术的一大基石，即：能够创造集体情感与普遍观念，并予以维持。在今日，再没有任何一位独裁者强大到能够对抗公共舆论。但是所幸公共舆论是容易被创造的。德国在战争中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外笼络人心，也证明了其认识到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和威力。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德国都能调动国民感情、引导公众舆论，以实现自身目标。德国的媒体、作家与教授们纷纷响应国家意志，将寻常的冲突升级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如今，整个德国都已参战，战争已经绝不再是某一位君主或某一个军事团体的事了。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只有当国民的群体好战情绪完全凌驾于公民意志之上时，政府的任务才最为轻松。

大型议会也具有群体的主要特征，诸如智力水平中庸、容易激动、容易动怒、不宽容、盲从领袖等等。但正是在这些议会之上，文明大国的国家命运才最终得以确定。经验表明，此类议会的集体专制比个人独裁或某一团体专制具有较大优势，因为议会通常需要商讨提交的议题，并由于不愿受到太多批评而避免了许多不当行为。俄国人就此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在再三遭遇战争失败之后，他们创设了国家杜马，将之作为国家决策的最终机构。

在平常时期，一国最优秀的学术势力能够轻易主导国内各个群体。但在战争、革命和其他重大的危机中，情况便不再如此。这是由于群体力量来自个体的影响力，并可能变得非常强大，足以不可抗拒地将整个国家推向混乱之中，并导致国民心理出现新的表征。

## 4 国民心理

个人心理仅仅是短暂存在的，但是种族心理却永恒存在，并且不会分崩离析。种族心理——或者说国民心理并非一朝形成，而是漫长历史的产物。文明国家的历史其实是国民心理塑造形成的历史，正是国民心理帮助国家离开蛮荒、走向文明。

当国民心理日臻稳定时，便与个人和群体的不稳定心理形成对抗之势，限制其波动变化，并由此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实力。

在当前的战争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世代相传形成的国民心理能够让同一国家的人在重大场合保持思想与行为的一致。如果所有生逢战争年代的法国人都能够毫无怨言地抛弃个人利益与自身优越处境，甘愿为祖国献出生命，那是因为种族心理突然战胜并支配了他们的自私与个人冲动。事实上，若要战最激烈的厮杀其实并不存在于生者之间，而存在于死者——即由祖先世代遗留的国民心理之间，这也丝毫不是夸张的。

在这里，我无须再花费篇幅深入探究种族心理的形成过程。这是因为，尽管德国历史学家做出过很多荒谬论断，但在当今的文明国家中已再无完全纯粹的种族。国家是历史事故的产物，当出身完全不同的种群——例如现代普鲁士人长期置身于同一生活环境中并由共同利益联合起来时，国家往往就诞生了。此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还包含一个经久不衰的要素：语言和宗教共同体。

在其各个生存阶段，每一个种族都必然会出

现特定的制度、道德准则、信仰、艺术，也必然不会出现一些其他事物。比如，一国绝不可能直接适用另一种文明，而首先必须将其归化。

这正好补充说明了我在上文中提出的观点：每个人都同时具有个体心理与遗传心理，前者主导了我们的日常行为，后者则在重大事件中——尤其是涉及国家存亡的事件占据主导地位。个体心理应该是自私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个人首要考虑的必然是其本身。但是，遗传心理则专门关注民族与国家利益，所以当其指引个人为种族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时，也是同样自然而然的事。

## 5 神秘的力量

“神秘主义”这一术语在宗教与哲学中的意义完全不同。这个词的内涵随时代与使用者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说来，神秘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包含神秘因素、热衷超自然现象、轻视经验、相信世俗现象受到更高作用力的干涉。

几个世纪来，神秘主义为人类提供了许多便利的解释。在古代，即使当各国已经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时，人们依旧没能认识到，自然界遵循一些不变法则。在他们眼中，所有现象都由众神



主宰：海神统治海洋，谷神掌管丰收。

神秘主义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出现，但其信徒对神明的狂热信仰、对封建迷信的追随却同政治领域中不可思议的现象有类似表现，这是因为宗教、政治、社会领域的神秘主义都是同宗同源。

神秘主义具有其自身法则，其逻辑联系与情感逻辑或理性逻辑大为不同。情感逻辑与神秘主义逻辑为数不多的共性之一，即不经任何理性论证的断言。在任意情况下，神秘主义与理性都属于完全无关的领域，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源于建议或心理感染，从不是经由推理论证得来。这些信仰只能为理性所摧毁，而不能为其所创造。因为它们总是伪装成绝对真理出现在信众面前，它们的证据总是表现得明白无误，若予以反驳似乎都有失公正。要理解这种假定的威力，自然不难。

在神秘主义思想里，既无理性论证，也无物质需求。在其影响下，痛苦、私利甚至母爱都不复存在，这一点我已在其他作品中用著名的事例做出说明。一个神秘主义者能够以信仰为名，毫不犹豫地消灭至亲。因此，正是由于神秘主义，我们才能在宗教、政治与社会领域看到各式各样的殉道者。

神秘主义通过心理感染和信仰强化，极易以一种集体形式体现。古时的犹太人、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与今天的德国人都已证明，神秘主义能为一国提供最好的理由，促使其自认为被上帝赋予了改造世界的天职。

没有人能够言之凿凿地自称能够完全摆脱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当骚动与混乱颠覆了社会的精神生活时，即使神智最清醒的人都不能确信自己不受干扰，因为到了那时，人们完全改变，所有现实概念都丧失殆尽，人们心中的理性逻辑也纷纷瓦解。我们在“一战”的萌芽和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神秘主义发挥了重大作用。

神秘主义的力量尽管长期受到科学的反对与轻视，却在主导人类行为的动机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若我们能逐一系列出人类世界出现以来所有冲突的根本原因，便会清楚看到神秘主义的突出角色。

人类世界中重大冲突的主要原因可分为三类：生理的、心理的、神秘主义的。

在生理因素中，有古代日耳曼游牧部落一度经历的饥饿与匮乏——部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以至于原有森林已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生存资

源；心理因素包括仇恨、贪婪等各种各样的感情，正是这些感情将许多国家带入交战状态，并摧毁了多个文明；神秘主义因素的表现则有：阿拉伯人为传播宗教而进军罗马帝国，欧洲国家同在宗教驱使下的十字军东征，等等。正是由于神秘主义，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在欧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造成许多人的殉难。

神秘主义一直是人类各种动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正是它创造了一系列加速历史进程的幻觉，正是它影响了庞大帝国的建立与毁灭，正是它奠定了文明的产生。现代世界认为自己已经摆脱神秘主义的作用力，但是当今人类其实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受到了它的奴役。在政治、宗教、社会领域，神秘主义依旧在发挥着同样作用、施以同样的法则，而未能被理性所征服。

如果说欧洲今天陷入战火，如果说各个国家的年轻人牺牲在血腥的战场上，如果说无数家庭都已家破人亡，那不过是因为有些国家自认为担负改造世界的天职，有些国家妄想通过参与战争取得世界的主导地位——这正是神秘主义的体现。

## 第二章 人格的多种形态

# 1 人格的稳定性与多变性

以前的心理学将人的灵魂视作同类又有区别的元素，叠加在肉体上却又有别于肉体独立存在，人格则被认为是严格固定并难以改变的。但是，如今这种观点再也站不住脚了。早期理论中具有固定人格的人在当今看来，不过是虚构而已。真实的人其实与之大不相同。无论他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还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都代表了一系列元素的集合，在这一集合的作用下，便产生了通常所谓的“自我”。自我一旦以此方式形成与确立，只要环境不变，就将持续不变。

因此，人格的稳定全然依赖环境的持久不变。一旦环境产生变化，构成个人心理的元素集合也会遭到颠覆，从而导致新集合的建立与新人格的出现。

在革命时期，这种人格转变时有发生，我已在以前的著述中指出。在当前的战争中，我们也能毫不费力地观察到这种现象。但是若要试图预见人格的本质及其在仓促间的构成过程，显然不可能。战争的恐怖阴影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事例，证明了即使是最温和的个人也可能变得热衷杀戮。而且我们根本无须更多探究，便可以断

言：没有人能事先预见德国知识分子们在战争中的无耻行径，也没有人能预见法国人在战争中体现的优秀品质。

在战争中，人格转变每日可见，我也将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提及其中几个非常突出的事例。但在此处，我将仅仅引用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在探访战争前线后所说的一席话：

我们有时自认为了解某个老朋友，当这个老朋友面对至高挑战时，我们会发现在他身上有一些能够超越所有知识与信仰的转变。他能够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甚至轻松地到达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高度。他仍旧是我们圈子中的这个老朋友，但他的的确确又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伟大。对英国来说，这个老朋友正是今天的法国，法国已经发掘出自己灵魂的力量。

人格永恒不变的旧学说仍然盛行。尽管如此，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人们在转变地位或进入新环境后，也随之改变了行为与观念。然而，既然他们已经变得与以往大为不同，又将如何修正自身行为呢？

即使没有任何足以改变人格的重要事件发生时，“自我”依然脆弱，依然容易受到重大波动的

影响——疾病会使它受损，悲伤会使它沮丧，幸福会使它膨胀。日复一日，我们的人格可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些波动。如果没有文明对自我施加各种制约并不断限制其偏差，这种波动可能会更加剧烈。如果没有诸多不容侵犯的规矩、法律、风俗施加制约，那么人类便很难保持人格稳定，社会生活也很难实现，没有一个文明能够无拘无束地存在。

战争与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事例，充分显示了在法律——文明的保护伞缺失的情况下，人性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全世界都在震惊地注视着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所犯下的野蛮暴行——它们出自文明与智力水平高度发达的民族，这个民族的野蛮天性原先一直受到社会秩序的制约，但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天性便不再受到压制，统统释放出来。当然，并非所有参战国都是如此，因为有些国家的国民长久受到社会约束与规制，情感状态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

国民情感越在传统作用下趋于稳定，社会约束就越无必要对原始的野蛮秉性加以抑制，因为届时内在的自我约束已替代了法律的外在约束。很少有国家达到了这种稳定的程度，即便如此，社会约束仍旧必不可少。因为对一些反复无常、优柔寡断的人而言，其心理状态是不稳定的，也

难以受到任何作用力的调整。这类群体如尘埃般没有固定形状，屈从于全部内在冲动，又如哈姆雷特一般永远犹豫不决，永远不能下定决心。

## 2 自觉意志与不自觉意志

由意识所感知的现象仅仅是我们未知的内在精神投影，但这些现象却阐释了一些最重要的行为诱因。在对这些诱因的阐释中，便引出了意志。意志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自觉意志——唯一经过心理学家验证的意志；另一种是不自觉意志，尽管尚未受到承认，影响却相对更为广泛。

自觉意志意味着自由投射和客观讨论，而在不自觉意志中，无意识投射给我们的便是其自身。当触及我们的自觉意识时，所有结论都已成形，除却少数遭到否认，多数都被人接受。

不自觉意志源自围绕我们人格的种族、群体与环境，反映了我们的种种需求、欲望与期待——其扩大为各种暗示与冲动，一直引领着我们的潜意识，偶尔还完全成为主宰。多数人的行为完全受到不自觉意志的操控，只有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言行完全不一致时，他们才能意识到这点。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民心理一般已趋于稳定，能最大限度地促使人们的行为有益于社会整体福祉，在此处既有自觉意志，也有不自觉意志。尽管每个个体心理都是环境影响的产物，可能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但其行为都大同小异。

要证明这一命题，有许多充分的事例，此处我仅仅引用《泰晤士报》政论编辑H.W.司迪德（H.W.Steed）关于英国人心理的观察结论——他与我使用的术语或有不同，但理论其实一致：

英国人尤其受到直觉主导，他们不信任思想、排斥逻辑……一种比理性根植更深的直觉告诉他们，生命本身就不符合逻辑，生命由能量组成——这些能量向来都是盲目的，并源自心理学家所谓“意识门槛”之下……认真观察英国人，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与其表达的思想形成鲜明矛盾。英国人生活在完全矛盾的状态中，而且并不自知……英国人的心理分为两大区域，一个区域主管思想，另一区域主管基本冲动，二者被严格分隔，毫无任何关联。从一个英国人在日常安宁生活中的言行中，丝毫无法预知其在个人或国家危亡之际的表现，只有那时，他才能真正展示自我，发现自己真正的脾气，讷于言，敏于行。



因此，无意识在所谓“自发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一般难以被人察觉。不自觉意志常常具有长久渊源，但也可能出自习俗、风尚、瞬间感情或我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等等。它无须麻烦我们思考，便每每能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事。

### 3 意志的变化

无论意志是自觉抑或不自觉的，其范围也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意志常常经历意想不到的波动变化，会受到特定因素的刺激，也会受到奢华、享乐等因素的抑制。

当一个国家中人人意志消沉、畏惧承担责任时，该国就注定将要衰落。例如罗马，当丧失国家意志时，它也从历史上消逝了。

意志也在国际冲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因为战争本身便是意志的斗争，正如我们在马恩战役中所见。

在许多战役中，胜负关键都完全取决于哪一方的意志更顽强。在马恩战役中，正当法军打算撤退时，敌军右翼提前撤退了；在伊瑟战役中，敌军在阵亡15万人后便决定撤退，但若其再多支撑一小段时间，便能获得胜利。有法军将领

说：“如果德军再多坚守阵地一刻钟，他们就可能全面突破我们的战线。”类似情况在决定南锡命运的考伦战役中也有发生。据马勒泰尔将军报告，1914年9月7日，314军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尽管他本人并不同意，但不得不服从军令。正当他准备撤军时，敌人撤退了。这一系列显著事实都表明，意志在战争的最后关头总是发挥重要作用。

为群体赋予不自觉意志是领袖们的任务——诸如那些伟大的将领、国家元首或宗教创始人。这种不自觉意志越能协调于国民的传统情感取向，就越能取得成功。所有的著名将领都具备强化士兵意志的本领，正是由于激发了群体意志，他们才能率领士兵在诸多战役中取得胜利。他们和拿破仑一样，了解怎样能在无形之中通过话语、行为和手势唤起他人的力量。

强大意志所激发的个人能力向来都令人惊讶。无须提及当前事例，我只用举出黎塞留的事例——克莱孟梭已将此做如下总结：

当黎塞留攻占马翁港时，他震惊地看到，士兵们在面临枪林弹雨时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勇气。他对这一切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为了找到答案，他下令在次日再次进攻同一防御工事——当

然，这次已没有守卫工事的抵抗力量。但是，这一次实验徒劳无果。法军士兵发现没有抵抗，便不能发挥此前的勇气和意志。他们需要最难以克服的障碍，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他们的英勇。

能够移山的，不是信仰，而是意志。

## 卷二 现代德国的演进

### 第一章 德国实力的崛起和发展

#### 1 普鲁士的历史

如果要获得对一个国家哪怕是最粗浅的了解，必须首先研究其个体及社会心态的起源，以及其感受、信仰和思想，因为政治生活只是其历史的一个要素。

决定国家演进的因素各有不同，当今人们似乎对经济因素太过偏重。而实际上，受种族、环境、建制、个体或集体行为及诸多其他条件影响，经济因素的作用也各有不同。

因此，国家历史极端复杂，并且其重要性难以确定，除非这个国家是一个新兴国家，并且仅受少量根本因素的影响——普鲁士正是绝佳的例子。

要了解普鲁士统一之后的现代德国，首先需要管窥必然导致当下这场战争的心态之源。

尽管普鲁士实际统一德国尚不足50年，但有

很多人主张，德意志的融合自公元时代之初就已经开始：法兰克人、撒克逊人、斯瓦比亚人以及奥地利人都曾经轮流将德国若干地区整合到其治下，霍恩施陶芬家族更是在12世纪建立了持续甚久的帝国。

然而这些统一的努力最终都殊途同归，流于败绩。至于如今普鲁士建立起来的统一能持续多久，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不过，普鲁士的统治似乎能持续得更久一些，因为普鲁士对德国的影响较之任何先前者都更为深远。整个德国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便完全对普鲁士产生认同，以至于人们不禁要质疑冯·比洛（von Bülow）（前任德国首相）在其一本著作中担忧“德国会反抗普鲁士统治”的论调是否合情合理。

关于普鲁士统治下的德国人的心态，我会在另一章节中予以探讨。在本章节中，我只想简单概述现代德国的领主是如何形成的。

古代普鲁士的心态与一些民族类似，这些民族的生存条件导致他们数百年来为了争夺土地而与邻邦战火不断，而且其作风、习俗、道德及法律均源自对征服的专横欲望。

普鲁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其边界因不

断地吞并而缓慢扩张，也吸纳了源自不同背景的族群。数百年来她孜孜不倦地试图扩张，而这些尝试不止一次地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倒退。1640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个国家被摧毁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有些地区只剩下了不到一半的常住人口，而像普伦茨劳这样的城市，人口更是从6000锐减到了600。在这一时期，普鲁士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常住人口，并因此成为邻邦随意出入的驿站。幸运的是，南特敕令的废除将成千上万的异见人士驱逐出法国，这些都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普鲁士国王更是英明地从中吸引了两万多人到其治下，这一移民潮的涌入成就了普鲁士史无前例的繁荣。

这些新移民给勃兰登堡带来了诸多崭新的工业及农业技术，他们在勃兰登堡开设了玻璃厂和钟表厂，并兴建了农场。柏林曾经只是一个肮脏的小镇，大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人口也仅有6000人。在这些新移民的影响下，柏林成为一个繁荣城市。法移民在普鲁士迅速繁衍，到1740年时，法国裔人口在普鲁士250万常住人口中已经达到60万之多。时至今日，仍有大量法裔普鲁士人，虽然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已将自己的姓名改为德语了。

普鲁士国王是其疆域上拥有至高地位的统治

者。在现代德国哲学家所处时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都被视作至高无上的存在，理应建立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而人民对此唯一的职责便是服从。弗莱德里希一世曾经明确下令，禁止臣民做出任何论争与反驳，这根本毫无必要——普鲁士的臣民做梦都未想过这件事。

普鲁士统治的根本原则是无休止地扩张其疆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常常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也是通过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来为侵略正名的，而且并未遭遇当今政府所面临的种种阻碍。这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那个年代中，普鲁士君主的意志完全取代了民族优越性理论。

为了实现其征服的梦想，普鲁士的历代君主将其主要资源倾注在军队上。全民兵役制于1733年成为法定义务。在弗莱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位当年，普鲁士军队的编制为38000人，而在他去世的1739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83000人。而同一时期，法国军队有16000人，奥地利军队只有10000人。在这支庞大军队的支持下，威廉一世的继任者弗莱德里希大帝得以建立了一个大国，并通过吞并西里西亚和波兰的部分地区将普鲁士的疆域扩大了一倍。直到拿破仑时代，普鲁士如此呕心沥血建立而成的王国才被摧毁。但是，这

种分裂仅仅是暂时的：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普鲁士一雪耶拿会战失利之耻；1815年更是将莱茵河流域各州收入囊中，其中不乏诸如科隆、美因茨、特里尔这样的著名城市；此后的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最终奠定了普鲁士的伟业。至此，所有德国城邦都臣服于普鲁士的统治，小王国蜕变成了强大帝国。

随着实力上升，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也与日俱增，以至于最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以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口中的“特权种族”，他们还相信自己被上帝赋予了重塑世界的使命。

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普鲁士民族血管里流淌着征服的血液，也正是靠着征服，其才能铸就自身的伟大。因此，欧洲各国居然长期没能看出普鲁士的本来面目，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当然，法国国王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普鲁士的警惕，甚至在黎塞留时期阻挠过德国统一的企图。然而从伏尔泰时代至今，普鲁士在法国极受欢迎——哲学家和作家将普鲁士称为“自由的力量”，丹东将普鲁士看作“天然的盟友”，因为普鲁士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一样，同样遭受了许多误解。米什莱也十分支持普鲁士并且希望德国的统一，他说：“由于上天的恩赐，我们将可能见证一个强



大辉煌的德国。”

法国对普鲁士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甚至持续到了萨多瓦战役。法国某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写道，“从逻辑上，法兰西是跟普鲁士站在一起的”，另有一份大报甚至宣称：“德国的统一是大革命的胜利，支持普鲁士是对终极正义的追求。”这是何等的谬论！

## 2 帝国战略和平开端——好战情绪死灰复燃

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帝国首相俾斯麦构建出自己的一套战略。他一心想通过维持和平来实现德国国内的整合，而他战略的核心则是确保德国盟友的支持，以防法国开展任何报复活动。他一直相信法国可能实施报复，并且经常在国会演讲中提到这一点。以下演讲片段便清晰地说明了他的本质意图：

法国一旦占领了梅斯、图勒以及凡尔登这三座城市，德国的边境便会面临严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对此遗忘了，而我今日旧事重提只是因为历史的关联。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梅斯了，也无意夺回图勒或凡尔登。但是，由于边界问题，每一代德国人都被迫将战争的利刃指向法兰

西。那么，现在这场与法国的边界之争已经尘埃落定了吗，抑或是没有？这个问题恐怕在场的诸君都无法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根本上转变两国关系的定位，并改变我们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因此我只能与诸君分享个人的意见，那就是，这场边界之争并未结束。

在掌权时，俾斯麦不断致力于维持和平，这与当今德国皇帝起初的政策一致。德意志帝国团结如一、经济极其繁荣。德国的商船船队日渐扩大，航程覆盖了世界每一个角落，除了英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而英国作为竞争对手，日益成为德国恐惧和厌恶的对象。

曾经令俾斯麦夜不能寐的法国终于不再使德国焦虑，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国力已被宗教和政治的纷争大大削弱了，使得复仇的旧观念不复存在。但是，德国仍然存在与法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就是在法国与英国结成盟友的情况下，因为德国早晚要与死敌英国决一雌雄。

在俾斯麦统领国家时，战争被视为德国必须尽力避免的危险，而当德国国内贸易和制造业开始发展壮大时，战争又成为德国夺取世界霸权的有效途径，从而变成了德国人民期望的对象。当时，德国各军队派系、爱国团体、媒体以及大学

联合发起了一场运动，意在激起公众舆论并为战争做准备。政府倾尽全力支持这场运动，以便引起国会对于早期敌对行为的忧虑，从而得以通过增加税收的法案，以此进一步强化军力。

### 3 德国作家制定的征服策略

当前欧陆战争的舆论制造很大程度上是冯·伯恩哈迪将军的杰作。但事实上这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伯恩哈迪表述的只是大多数德国人的观点，特别是诸多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所谓爱国团体的观点。尽管其作品只是罗列了德国舆论的共识，但若在此引述其中若干片段，可能仍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以下是伯恩哈迪著作第十章中主要观点的摘录（由于德语原版在这本书付梓时尚无处获得，故我在此使用英文版）：

国家运行时所需考虑的唯一因素只有武力，除此之外国家可以无视一切规则，除非可以从中获利。

难道我们可以容忍一个人口只有区区4000万的手下败将（此处指法国）对德国的扩张计划指手画脚吗？

我们要粉碎三国协约、羞辱法国并树立德国应有的威信，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现在正处于独立状态的中欧国家必须被并入德国……直到我们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不算是失败。

宣战的时机必须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独立意志，同时必须要让我们的敌人措手不及。

不仅是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要随时做好战争准备，我们的外交政策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在有关国际仲裁的一章中，伯恩哈迪则试图说明向仲裁员提出法律问题的困难性：

大国之间解决争端只应该靠实力，而不是靠正义……对正义的理解见仁见智，而正义的概念本身也会随着不同个体和国家而产生不同变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正义标准、愿景和野心，而这些都是由其历史和民族个性形成的……没有人可以说清，究竟哪一种正义才是正当的。

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可以规制国家之间差异的成文法……每个行业、每个国家对荣誉感都有自

己的独特理解……普遍仲裁条约必然对富有雄心的新兴国家产生特别大的危害，德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她尚未达到政治和国家发展的最高峰……由于普遍仲裁条约，所有需要改变疆界的国家行为都会受到阻止，强国也会受到限制而不能发展，只有衰退中的国家才会因为这样的仲裁条约受益。

人们不能把个人道德的概念套用于国家之上，国家的道德是基于其本身的，必须符合国家特点且取决于其国家性质与国家目的，正如个人道德必须建立于个人的性格及其对社会的责任之上。

强权是国家的本质，软弱是国家的罪过。

如果一个国家不断膨胀的人口要求其不断扩张权力，那么不寻求这种扩张是不道德的……国家绝不能允许自己受到条约义务的约束，那会危及或者至少不利于国家的存续。

显而易见，以上理念与欧洲文明数世纪来的理念大相径庭，并且把我们带回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君主们所遵从的原则（伯恩哈迪的理论招致了许多国家的不满，他对此相当惊讶——那些国家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复述了在德国普遍存在

的观念。他感到有义务接受采访并辩白他受到的误解和妖魔化。但是他的论调是如此明确，很难再让人们做出任何其他角度的解读。）

伯恩哈迪并不属于那种超然古怪、无人附和的人，他的观点不断被各种学者反复阐述。以下是从一本书名为《假如我是君王》的作品中摘录出来的片段，这些片段被1914年9月的《记者》杂志转载：

既然德国的地位最高，自然就有权享有一切。德国应该以铁血手腕摧毁阻挡本国扩张的一切事物。我们必须摧毁英国，也必须摧毁法国，这样才能夺取他们的殖民地，以及在必要时夺取他们的领土，以换取我们的安全；至于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必须受到德国高高在上的监护；更不用提俄国，其将会被轻易征服，而德俄的边界地区将统统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海尔·舍尔是俾斯麦的拥趸之一，他的以下言论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的政策：

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应该把“坦诚是最好的政策”这样的陈词滥调扔到儿童启蒙读物中去。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诚实，将来也不会有。政治家必须毫不在乎自己对敌手是否不坦诚或不

公平，而应当毫不迟疑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一直以来，普鲁士政治理念的本质特征之一便是对弱国发自内心的蔑视，普鲁士甚至拒绝承认弱国应当有权存在。前任比利时驻柏林公使巴郎·贝恩斯讲述了他与德国外交大臣的部分对话：

他（德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大国才有殖民的权利以及权力。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如果欧洲发生变化，只会对最强大的国家有利，那些小国将不可能获得先前许诺给它们的独立，必将最终灭亡或为大国所吞并。

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大肆鼓吹下，德国统治世界的美梦也使其人民日渐开始出现幻想，认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优秀种族。最终，以上所有鼓吹带来了相应后果，好战派在德国国内的势力日渐强大。

## 4 德国政治演进概要

自从普鲁士统一德国以来，对于德国的历史和愿望，可做如下总结。我们已经看到，是普鲁士创立了现代德国，这个国家由征服塑造而成，又由征服获得兴旺繁荣。在1870年战争之后，普鲁士统一了各个邦国，自然将自身的完善组织结

构加诸联邦之上。

政治心理学的主要原则之一，即制造并传播特定感情，并使其集体化。这是因为，如果能够操纵情感，便能巧妙地控制一国国民的意志。如能使这些情感稳定持久，便能重塑国民心理。

利用自己的大学教育、历史学家、哲学家、爱国社团以及军事制度，普鲁士在不到50年时间内改造了德国人的价值观。历史学家们说服德国人民相信，他们优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哲学家们鼓吹，在强权面前，公理不过是无力的幻想；政治学家们宣扬，德国将统治世界；军事教育尤甚，渐渐奴役了德国人民的意志。

面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德国愈发需要足够强大的陆军与海军，这不仅是为在各个地区宣示德国的政策，更是为了为发动战争做好准备。德国政府大肆宣扬，来自其他国家的嫉妒和敌视已经严重威胁到德国的生存。

在其他所有国家中，英国是德国最为畏惧的敌人。为激起民众对英国的愤怒与敌视，德国学者们一直宣称英国是德国扩张道路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甚至匆忙组建了一支舰队，旨在摧毁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



当激起公众热情已经变得相对容易之后，公众的这股热情很快便成为难以制服的强大力量，对其加以约束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德国政府很快发现，公众热情再也不受约束，各个激进党派已经形成，并开始着手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到了这个时候，公众如此热切渴望战争，战争一触即发。

## 第二章 德国哲学家对国家的定义以及对历史的阐释

### 1 德国国家概念的起源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向来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仅有少数大国能够在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建立令人满意的平衡状态。在古代，尤其是古代东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出于统治众多种族的需要以及吞并邻国领土的野心，普鲁士不得不采取绝对专制的统治。普鲁士的历任君主都相信，国家权力高于一切，国家意志应当凌驾于道德与法律之上，国家义务即通过征服不断扩大统治，而国家遵守条约仅仅是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此，普鲁士君主一贯完全认同：战争无所谓正义与否，只看胜败，胜利的战争便是正义的战争。

尽管多数普鲁士君主从未明确宣扬过以上信条，但却全然依此行事，并由此塑造了德国的历史。德国哲学家们的任务，便是为这些信条构建理论基础。因此，黑格尔和费希特等知名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国家”概念的哲学原理，然后由特赖奇克、尼采、拉森、伯恩哈迪发展并予以推广。

黑格尔是首先提出国家绝对权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强权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居于国家地位之上，应被当作上帝来崇拜。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理念都仅在德国各所大学之内流通，直到很久以后才在更大范围内被普及，并在广大读者之中引起强烈反响。

德国哲学的部分理论宣称：普鲁士代表上帝意志，高于其他一切国家，不受道德法规的约束，绝对有权征服弱国。因此，这些理论受到普鲁士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由于德国哲学家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暗含着很强的侵略性，其支持者试图将这些理论与罗马时期的理论加以联系，以证明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帝国体制下，国家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并拥有绝对权力。之后，他们

还曾力图证明德意志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延续。然而在事实上，德国关于国家的观念与罗马毫无相似之处，反而与亚洲国家更为类似。

以上有关国家的哲学理论是普鲁士全部体制和历史的渊源，这不仅因为其框架与内涵都已完全形成，更因为它们由于实践而深入人心，成为德国人民行动的激励因素。

## 2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上述国家观念既已在德国形成，则必然将导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事实上，这已在现实中发生——首先在普鲁士，然后在整个帝国之内。国家供应着一切，同时也管理着一切。国家的官僚体制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令人无法忍受，在德国却受到普遍容忍。这是由于德国人民本身具有内在的服从性，并且早已习惯了过分严苛的军事体制。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国家具有神性，人人都应自愿对其服从。诺瓦利斯甚至说过：“打个比方，国家是一个神明的化身，法庭、戏院、政府等公共场所便是其身体器官。”

根据哲学家的理论，国家的这种神性仅仅需要受到人民的服从，而不是来自理性的赞同。因为国家地位如此至高无上，已远远超越了一切赞

美和批评。不过，在德国很少有人想到要批评国家，因为普鲁士的统治制度已使得臣民无比热爱国家，如今他们更是渴望令德国全体人民都产生同样的情感。

在法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我们更多是将国家视作与我们本身完全分离的实体。我们或许偶尔会利用国家来获得某些好处或庇护我们的软弱，在更多时候却将其视为敌人。但是，德国人却将国家视作全种族的集体化身，他们认为，如要反对国家抗争，便是反对自己。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国家的地位在德国至高无上，对国家的崇拜深深根植于德国人的灵魂之中，统治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够确保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法国和英国人民热切渴望自由，而德国人却热爱服从。德国对专制具有一种热情，一旦获取任何权力，便将抓住机会实施专制统治。

普通士兵更是完全被视为国家的奴隶，这明确反映在1891年德皇在波茨坦的征兵演讲中：“你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如果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父母开枪……你们必须一言不发地遵照我的命令。”除了德国之外，试想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的统治者胆敢说出这种话？

由于德国人的服从性，统治他们成为一件易事。因为在法国常被违反的制度规则，在德国却总是得到严格遵守。例如，巴黎的阿斯托利亚酒店事件若是换作在德国，就绝不可能发生：这座酒店的建筑商非常清楚，在法国违反法规是家常便饭，因此该酒店的建筑高度远远超过了有关规定的允许范围。尽管塞纳辖区、巴黎市政委员会和国务院从1907年起不断下发禁令，该酒店却依旧在持续加高。

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法国政府不仅毫无威信，而且没有能力确保其规章制度受到尊重与遵守。如果此事发生在德国，结果将大为不同——超出建筑标准的楼层在24小时之内便会被拆去，甚至根本不可能事先被许可建造。

一些德国学者在战争期间发表了若干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公共舆论，但是依然具有一定代表性，并值得受到关注。因此，我摘录了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以下言论：

由于强大的组织能力，德国达到了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文明水平。在我们的敌人中，俄国还处于游牧阶段，法国和英国刚刚到达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比我们落后了五十多年。除此之外，德国高度发达的制度和组织性也

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至高地位。你或许会问我德国想要什么。好吧，德国想要接管欧洲，因为欧洲向来缺乏组织与管理。德国想要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想要实现集体力量的理念。这一宣言必然迎合了某些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却很难说服更多学者——他们认为重大发现与进步都是少数优秀者而非集体的工作成果。

在需要群策群力的情况之下，集体的优越性便体现出来了。这对德国人尤其有利，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和群体性使得集体合作非常容易，而个人单打独斗则非常困难。但是，集体却完全剥夺了德国人的个性。在战争期间，审问德军战俘是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德军军官和士兵的思想似乎都是由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这也给审讯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神秘主义形式出现，几乎化身为一种宗教信仰。柏林大学的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教授曾对德国人和英国人关于国家的理念做出过如下比较：

事实上，我们在此探讨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理念，它们也在经历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英国与德国不仅在关于国家的理念上存在分歧，更因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有关自由的思

想。对于英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个人享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无限权利，不受国家、多数人意志或公共舆论等任何干涉。对于德国人而言，自由则意味着对集体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服从。

“英国人将国家视为施加强制力的工具，主张国家的权利和需求应当尽可能有限地影响个人。而德国人则将国家视为民族宏伟目标的体现形式，主张国家权力应当覆盖全民生活，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都应将国家禁令视为自身意志的体现。个人只有无条件履行义务与服从国家，才能称得上是高贵和有尊严的。因此，德国人将全民兵役制视为自由国家的基石和最高体现，而英国人则将之视为最令人憎恶的事物，称其是一种有悖自由理念的专制强迫手段。”（1915年3月，《科学评论》）

以上言论已经明白无误地向我们展示，德国计划在胜利之后将强加给欧洲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正如它已经强加给阿尔萨斯的一样。

一个人可能消极被动地服从，也可以认为这种服从是“其自身自由意志的体现”。这种心理幻觉甚至会使古代的奴隶相信，他在某个黑暗的作坊里拉磨也是出于自由意志。

一个国家要确立其国民的服从性，必须先实施历经数代的军事化管理。没有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能够容忍德国的制度，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个人，而不是个人的存在是为了国家，而且他们认为自由与独立比被动服从重要得多。

曾有人客观指出，德国哲学家构想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区别，前者极端强调实用性，并充满了征服欲；后者则以理论为主，尽管充斥着极端的威权主义倾向，却宣扬和平主义和博爱精神——当然，那些曾经受到无情迫害的阶级显然不是他们和平与博爱的对象。

### 3 对武力的崇拜

经由上文对德国国家观的阐述，读者已然已经感受到了德国对武力的极端重视。普鲁士无须借助任何理论指导来认识武力的好处，因为这个国家本身便是由武力创建，也正是在武力支撑下持续发展壮大的。

为了使武力的成果正当化，德国学者们自然需要抛出一种理论，将武力标榜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并将胜利定位为国家价值和谁为强者的唯一



体现。

这样一来，武力便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无须表现任何同情与怜悯——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不断重申，武力有权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写道：“征服者的权力即法律。”尼采也说过：“道德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义务。至于那些低等或外来的对象，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任何方式予以对待。对强者而言，怜悯是最大的危险。”

当我在另一章中提及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指令时，将有机会向读者说明：以上宗旨是如何分毫不差地得到适用，又是如何残酷地摒弃一切人道的。

显而易见，这些宗旨和基督教教义以及文明进步都已相去甚远。德国名义上还是基督教国家，但其《圣经》里的耶稣已经变得和欧丁神一样野蛮，唯一目标便是征服和杀戮。这种新型的基督教具有很强的邪教性质，全盘否定了《圣经》道德。根据尼采的学说，《圣经》主张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温顺、仁爱、慈悲都是软弱的表现。武力创设权利，因此最强的国家才有权利统治他国，并没有义务表示任何友好和善意。德国整个知识界都对威廉二世的这句话推崇备

至：“我们不需要慈悲为怀。”因此，这样的宗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德军在本场战争中犯下的种种冷酷暴行。

当德国人民看到武力确实带来的一些好处并令德国变得强大时，自然开始涌现对武力的崇拜。此后，德国还出现了新的理论学派，不断鼓吹德国人是优秀种族，肩负征服世界的使命。由此，战争在德国人眼中变成了新时期的十字军东征，要席卷一切可能反抗德国的国家。德国征服者们不仅煞费苦心地剥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还提倡用自己的思想主宰其他所有劣等民族。

如果不能控制人的天性，最好就顺应它们并激发它们。基于这一原则，德国哲学家们巧妙地激发了人民对于征服、屠杀、掠夺的天然渴望。

## 4 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即使在最绝对的君主政体中，国家与宗教往往都是两大独立势力，尽管有时意见不合，却极少出现一方完全受制于另一方的局面。但是，由于国家绝对权力理念的树立，普鲁士王国的创建者们难以容忍任何宗教势力与国家抗衡。事实上，新教信仰在德国向来都被世俗势力所淡化，宗教和政治根本没有必要产生冲突，也不会产生

冲突。但在1870年战争之后，当普鲁士将统治范围拓展至德国全境，却发现全国有2500万天主教徒和4000万新教教徒。尽管俾斯麦如此神通广大，却也无法解决从中产生的难题。他起初坚持了一段时间，最终仍然不得不予以妥协。尽管如此，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虽然“一战”使得这些矛盾暂时消失，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由于教派之间的分歧，德国在长时间内必然难以实现完全统一。

在德意志政治中，2500万天主教徒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是帝国的基石，却依然受到国会制约，国会还可能在税收等问题上否决政府决策。天主教会在国会建立了中央党，并与一些反对派团体结盟而占据多数席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控制了多数报纸与评论渠道，并且不太听从政府引导。1909年，他们的投票甚至导致当时的德国总理冯·比洛的辞职。

天主教党派在政府圈子内自然不受欢迎。事实上，某一国务大臣甚至曾在一次国会演说中将其称为“帝国有机体中的脓疮”。但是，天主教势力如此庞大，并不需要任何外部支援，便足以对抗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和新教教会都认为普鲁士国王是德意志帝国唯一的首脑；天主教会则承认两个首脑——皇帝和教皇，后者是上帝在世

间的代言人，因此地位高于前者。新教不愿向天主教妥协，因为新教认为德国的强大正是来自新教精神，许多历史学家也支持这一观点。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我将引用特赖奇克的著述就此予以说明。

综上所述，宗教的二元对立将迟早成为德国的短板。

## 5 德国理论学者对国家和法律的阐释

不熟悉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实际上夸张了他们的观点——从黑格尔到特赖奇克，再到伯恩哈迪，这些人的观点似乎来回重复、大同小异。在本书另外部分，我还将引用上述学者们的一些学说加以说明。此处我仅仅选取柏林大学教授拉森（Lasson）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摘要——这本书在战争爆发之前便已出版，其中一些内容也已被《泰晤士报》所刊载：

在国家之间，仅仅存在战争，因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规则与本质，友谊不过是意外和特例。

只要人们还具有自由意志，仅靠强制便能确保法律的实施……

国家之间没有法律。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认可法律，便意味着承认自身的软弱，并降格至经允许才能存在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根本没有能力行使国家的基本职能。

国家的存在与其国力有关，一个小国根本无权存在。国家之间的唯一法律便是强者的法律。

不管存在任何条约，弱国都是强国的猎物，强国可凭借自身能力和愿望对弱国为所欲为。只要这种情况合理，便可以称之为道德的。

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有智力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爆发的冲突只能由武力解决.....为了避免战争，必须首先压制国家本身。

.....未对战争做好准备标志着一个国家在物质和道德上的双重衰落。

.....无论一个国家在学术、道德或物质领域取得何种进步，终究都将是徒劳的，它将成为其他国家文明的肥料，除非能够捍卫自身和取得的成果。

征服的战争和防御的战争同样具有正义性。反对为征服而战是愚蠢的行为，征服这一目标本

身便是唯一有趣之处。

战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却绝不可能出于某种理念，因为这将意味着对国家生命所有健全基础的颠覆。

民族国家能在最高形式上实现了种族文明，这只能通过摧毁其他国家得以实施。

独立并不是所有国家固有的权利，必须经过艰辛与劳苦获得……

对于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若其文明并不利于国家的集中化和军事化，就必须服从于另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政治军事体制的野蛮国家……

在不同文明之间，只存在冲突与仇恨。

对于他国事务的干涉是一个国家的权利，其唯一限制便是他国的国力。

弱国往往习惯自我欺骗，认为那些保证他们可怜存在的条约不可侵犯，但是只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唯一保证。

有人谈论所谓的民族权利。但是，允许一个民族或其部分自己决定某些国际问题。例如，该

民族应当属于哪个国家——便如同任由一家之中的孩子投票选择谁是他们的父亲。所谓民族权利，不过是法国人最无聊的幻想。

在公开宣称以上信条的国家面前，没有武力支持的权利主张是虚弱无力的。关于抽象权利的美好之处、权力与权利的比较，还是留给学者们去探讨吧。普通人更应当掌握自我防卫的方法，毕竟这比理论要可靠多了。

在武力面前，仅仅主张权利是毫无用处的。在历史上，许多传教士确实曾经违背君主意志而成功主张过权利。但是，尽管他们手下没有士兵，却绝非没有权力。与之相反，他们手握重权，因为他们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

德国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历史倒退，并将我们带回过去的某一历史阶段：君主们蔑视条约，认为条约能够任意违反，自己手中的宝剑才是最可靠的。当前，德国的军事制度已经和工商业发展完全脱节了，二者处于截然不同的文明阶段。一个深信强者之权利的德国记者说，德国如果胜利，不需要对其他国家履行任何义务。德国当然不需要，但是人们会禁不住思考：哪一个国家会愿意和持有这种信条的国家相互往来呢？

如果说正是德国的上述理论导致其最终对比利时的野蛮入侵，应该算是客观公正的结论。正如莫姆森所说：

请注意，这个国家（德国）曾经兼具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如今文化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

由于德国的错误理论，欧洲被迫陷入了长达45年的紧张备战状态，最终只能以全面战争的形式收尾。

##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演进

### 1 德国的工商业繁荣

历史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贫穷的国家为了自身富足而向邻国开战，普鲁士王国也是典型例子之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过拓展海外贸易而早已变得富强，又拥有一支强大军队来抵御任何外来侵略，还会贸然发起一场无论胜负都毫无收益的战争吗？——显然，多数国家都不会。尽管如此，今天的德国还是这样做了。

德国进入繁荣阶段不过25年，但在这短短期间内，其人口显著增长，贸易、商业都得到大幅



度发展。正当其经济成就正在超越英国花费100年所达到的水平之际，德国却参战了。

从以下数字和资料中，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德国在“一战”初期的工商业扩张。

从1888年～1914年，德国人口自4800万上升至近7000万；同一期间内，其国家财富从100亿英镑增至1488亿英镑。

（以下是1915年4月的Reveil National刊登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国家财富的统计结果。在此我只提供数字，不确保其准确性：

1.私人资产，包括不动产与个人财产——88亿英镑

2.城市资产——20亿英镑

3.农村资产——20亿英镑

4.私有采矿企业资产——24亿英镑

5.海外投资与所持外国抵押价值总额——10亿英镑

6.国有矿产、国家机构、公共建筑、港口、

运河——6亿英镑

## 7.流通账单、银圆、货币——24亿英镑

以上便得出了1488亿英镑的总额。另据估计，德国的年度税收为16亿英镑。）

德国的商业覆盖了全球所有角落，尽管德国自己的殖民地不多，但是整个世界都在逐渐为其提供贸易市场。在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军事化德国崛起的同时，一个工业化的德国也在数年之内发展壮大，并逐渐赶上了原本领先一步的英国和美国。

在推动德国工业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煤矿的发现。德国的煤矿产量从1870年的2600万吨上升至1913年的10900万吨。而在1913年，法国的煤矿产量尚不足4100万吨。（其中，2700万吨都产自目前被德国占领的地区，法国四分之三的钢铁也产自这些地区。）

英国曾经便是因为煤炭的开采而变得富强，有此先例，德国必然也将因为煤矿业而繁荣兴旺，德国有能力将部分煤炭资源供应于对外出口。与此相反，法国则不得不进口部分煤炭用于消耗。

如要正确理解上文中数字的含义，则必须思考它们所代表的财富。在全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工业发展阶段中，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产力。直到最近，这种生产力的唯一来源都是人类的手工劳动力，直至煤炭出现后，煤炭的燃烧便取代了人类的手工劳动力，成为这种生产力的重要来源。

经由许多实验证明，一个劳动者在8小时的工作日内每秒劳动做功432尺磅。如果同样的工作由蒸汽机烧煤完成，只需耗费15磅煤炭，如果按一年工作300天来计算，一年需要消耗0.2吨煤炭。因此，1吨煤的工作效能相当于5个人的劳动力，100万吨的煤炭效能就等于500万人的工作效能。当我们说德国每年生产19亿吨煤时，意思是这些煤炭提供的机械劳动力相当于95亿工人。

此外，煤炭能源非常经济，100万吨煤炭通常费用为60万英镑。如果我们按每天4便士计算每个工人的工资，500万工人的工资总额将高达3亿英镑。（我的计算结果或许乍一看来令人震惊，但却是经一位矿产监督与科学委员会的朋友核实过的。）因此，一个国家煤炭产量的增加实际上等同于国民人口数的增加。煤矿多人口少要远远好于煤矿少人口多，5000名矿工一年能开采出100万吨煤，这100万吨煤又能够完成500万名

工人的劳动任务。

现代工业的所有产品，从巨大的军舰到榴弹炮，都是煤炭转化为能量的体现。一个国家煤炭越多，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工厂、铁路、军舰、火药和大炮。

德国巨大的煤炭产量无疑是其近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其国内经济和国际活动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这些影响之一，即德国开始重视工业、轻视农业。德国过剩的煤炭产量与人口使得其能够制造极具竞争力的廉价产品，因此大大带动了出口，并促进了更多企业的建立与扩张。例如，克虏伯旗下有10万工人，曼内斯曼有15万人，巴登钢铁有8000人，拜耳也差不多有8000人。多数企业都在不同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从而得以避税减税。他们参照的是美国默克公司达姆斯达特分公司的事例，该公司基地在德国，在伦敦有附属机构，所用配方多为法国提供，生产场所则坐落于巴黎附近的蒙特涅。

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非常巧妙。以拜耳为例，拜耳有14名经理，手下管理着304名药剂师、67名工程师、8名医师、4名律师、650多名

技术工人（包括机械工、电工等）。工厂车间有3万盏照明电灯，每天产出30车产品。

德国人在各个工业领域都非常出色，例如制造实验室设备、摄影镜头等，法国制造商只能望尘莫及。

德国的成功导致其不断扩大产出，这种速度使得其不断需要开拓新市场。这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德国作为工业世界的新来客，发现自己处处受到以英国为首的竞争对手的制约。因此，德国不久便意欲对其开战。

但是，这种工业过度扩张有其非常危险的一面。德国著名金融家海尔法里耶估计，德国的年度税收为20亿英镑，国民财富总值为160亿英镑。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我们还是能够接受。但是它们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它们意味着德国制造业过于庞大的产出已远远超过国内消费能力，因此必须寻求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一旦关闭，将会导致数百万德国工人陷入困顿。因为在7000万德国人口中，仅有1500万人依靠农业生存。因此，德国制造业的繁荣和分配利润完全取决于产品的销售能力，否则将断绝收入来源。所以，德国不得不持续累积财富，否则将失去所有。

制造业被成功冲昏头脑，不停地进行扩张。德国电气公司成立于1883年，初始资产500万马克，现在已有24000万。显然，如果想在如此庞大的资本总额基础上获得分红，便一刻也不能停止生产。

综上所述，便可以理解德国为何如此警惕竞争对手，又为何如此痛恨其中最危险的敌人——英国。

## 2 德国走向繁荣的各种原因

正如我们所见，德国近年来的繁荣主要由于发掘了国内丰富的煤矿资源。但是，这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原因——若干是真实的，若干则是假想的。假想的原因包括：德国的经济成就是1870年军事胜利的结果——这一错误观点常常出现，也常常受到否认。最近，阿弗内尔的一篇文章又对此观点提出反驳，他轻松地证明了国家财富与统治地位各自独立，军事实力从不能促进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有些非常富裕的国家——诸如美国、荷兰、瑞士等根本不具备军事实力。如果说德国由于法国在1871年的2亿英镑赔款而变得富强，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以军备维持的45年武装和平期间，德国的花费已经超过24亿英镑。此外，在1870年战争之后的前8年至10年

间，德国实力并不突出，因为那场战争在事实上使全欧洲的工商业发展放缓而不是加速。

在德国工业繁荣的真正原因中，首先必须提及的便是其杰出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树立纪律、秩序的军事化教育。这两者其实有共通之处，因为工厂和军营非常相似，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是非常轻松的事。

德国人自己也承认军营生活的影响。一位经济学家如是说：“正是由于德国军队的纪律精神，我们才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由此引发英国对我们无比嫉恨。……军事制度是我国劳动阶级的学校。”

我认为，至于那些僵化严苛的军事制度所要求的纪律和规则，只有德国人才能容忍。但是，他们究竟是如何对此加以利用的？他们到底利用了何种手段发展工商业呢？

在我的前几部作品中（《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我已解释了后一个问题，并说明了卡特尔的功能以及德国是如何在商业上入侵其他国家的。一位博学的经济学家——M.米利奥德（M.Millioud）也在1915年4月刊出的《日内瓦学报》上发表了同一主题的调查文章。他的结论与

我相似，但是由于他是中立国学者，因此我将主要选摘一些他的观点。

米利奥德首先指出德国日渐明显的扩张趋势，尤其是在比利时等国——德国在这些国家之内设立了众多商行和代理处，以便进行各种直接与间接贸易。

强大的卡特尔制度不仅通过制造商进行人员的组织管理，更是通过设立办公室来调控价格、获取收益并分配收益，从而使得德国制造商得以低于成本价销售货物，击垮竞争者。米利奥德举例说明，德国冶金产业在本国国内的钢筋销售价格为130马克1吨，在瑞士为120马克1吨，到了意大利则仅为75马克，这甚至比成本价低了20马克。

通过此类削价销售，再加之长达12至18个月的信贷周期，德国企业在各个国家都锁定了庞大的客户群，并消灭了竞争对手。最终，他们便可以基于这种垄断地位而随意制定市场价格。德国政府则同时作为客户和后盾，为制造业全力支持，同时政府还制定了有差别关税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出口贸易。

以上方法需要大量的资金，若要追溯这些资



金的来源，则是很有趣的事。德国工商业的主要资金来自银行业。德国银行首先吸取国内存款和法国的存款（通过从法国金融机构取得贷款），随后向国内各种工业企业注入资金。如果这些资金仍然不够，就加入股票，这意味着将银行的现金储备转化成难以转让的商业票据。

此处存在一些缺陷和风险，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的崩溃。此外，基于巨额资本之上的分红要求不断提高产量，这使得德国的工业产能远远高于国内市场需求，因此不得不开拓更多海外市场以调控价格、管理产品供给。但是，德国在此遭遇了很多竞争对手，尤以英国为首，后者的贸易增长几乎已与德国保持同样速度。

因此，米利奥德得出以下结论：

德国人感觉在各方面都受到威胁，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想要威胁他们。德国人宣称为了捍卫自身存在而斗争，这完全没错，因为德国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政治早已将其推上经济征服的征程之上，再无回头路可走了。但是他们的所为却给自身带来麻烦，虽然还没遭遇失败，他们却早早地清楚看到胜利正在离他们远去。随后，德国人便面临这一问题：是否应该坐等失败——坐等贸易停滞、贷款蒸发、经济萧条、民众暴

怒？德国人一定自问过，目前局势的演变是否会迟早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如果德国能够先发制人取得胜利，该不该抓住时机？无论如何，正如马克西米兰·哈登所说：胜利者才有资格谈权利。

我确信，上述经济原因终有一天将促使德国发动战争，因为德国学者已对此做了再三强调，以至于这点根本不容置疑。但是，由于战争尚未体现出其必要性，开战时刻并未到来，而是正在不断接近。有报道称：

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汉堡-美国蒸汽轮船公司的主席、德皇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巴林（Herr Ballin）发出了极具预见性的警告，值得引起法国所有媒体的关注。巴林沉痛地指出，德国的海外市场正在全面萎缩，甚至可能完全消失——那将意味着德国市场的全面崩溃和几百万工人失业。开战之前，柏林已有10万名失业工人，制造商想以8%的利息进行贷款都已变得非常困难。一言以蔽之，德国再怎么努力奋斗，都难以承受海外市场萎缩的严重后果。

因此，德国确实已经足够繁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繁荣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 3 德国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扩张

尽管面临上述风险，德国却依然能够保持繁荣发展，并且在全球各处与他国展开了激烈竞争。

商业竞争并不仅仅旨在带来金钱利益。毫不夸张地说，工商业入侵与军事占领一样，迟早能够帮助一个国家完成对另一个国家的征服。对于德国而言，这一现象正在许多国家中渐渐成为现实，尤其是比利时、俄国和法国。德国的工商业已经占领了许多地区，甚至达到了全面入侵的程度。例如，蓝色海岸地区从圣哈法尔到意大利边境的所有大酒店都已经是德国酒店。法国大量的制造企业，如药剂、光学设备、化学品、洗染用品等，都已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德国还在利用其企业组织、商业手段、技术教育和劳动力等优势不断地蚕食法国主要制造商。根据统计，在法国已有12000家德国企业，如果再保持这种速率扩张20年，德国人根本无须开战便早已成为法国的真正所有者了。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意大利和俄国，那里多数银行和制造企业都为德国人所有。此外，德国人也对英国开始商业入侵，但相较于其他国家，程度要小得多。

综上所述，德国正在迅速进行对全世界的商

业入侵，若不是由于战争爆发，这一任务不久便能圆满完成。事实上，俄国正在逐渐被德国同化，俄国国家杜马开会时的一些讲话其实已经警觉地指出了这一点。1915年9月12日的《日内瓦日报》就此刊载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德国在俄国的经济扩张与渗透的程度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深，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俄国政府向来懒散，代表们根本不介意是按马克还是按卢布领取津贴，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渗透，更别提德国在俄国设立的各种公立或私立的代理机构。俄国的银行大多数都为德国所有，商行也是，采矿业也是，许多大型制造企业更是如此。至于那些叶卡捷琳娜二世150年前在俄国乡村地区设立的德国殖民地，更是完全没有失去德国民族特色，那里的人完全不说俄语，呈独立族群存在，而且这些殖民地恰恰分布在俄国的战略要冲和通信主干道沿线。在过去几年间，这些德国殖民地与泛德主义组织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目前其行为尤其引人怀疑。德国对俄国统治者的影响也越来越令人警觉。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对俄国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如果将殖民地定义为一个国家为谋取利益而对另一个国家的剥削，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法

国、比利时、俄国都是德国的殖民地。

为了获取新的市场，德国人不仅满足于对欧洲的商业侵略，更开始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这种扩张非常迅速，甚至促进了德国语言与文明的传播。

当战争爆发时，身处日本的法国教授贝勒索特（Bellesort）写道：

在离开15年之后，我又回到日本，抵达后注意到的第一个变化便使我感到恶心——德国在日本几乎完全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尽管英国在该国的影响力基本不变，但是我们丧失的，全都让德国人得到了。

此前，我们的军事院校、教材、教学方法和语言都受到高度推崇，但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却是德国的教授、教材、军队、语言和科学。在东京的法律院校中，只有100名学生选修法国教授的课，其余1000名都在德国教授的课堂里。在24名赴欧洲留学的学生中，19名去了柏林，其余5名虽然赴巴黎就学，却最终还是居住在德国。在大学中，如果俄国人获得一席教职，那便意味着法国人而不可能是德国人减少了一席教职。此外，当日本谈论欧洲医学和欧洲音乐时，他们所指的

完全都是德国的医学和音乐。

贝勒索特认为，德国的成功是由于在日本大量发行报纸、评论并设立各种机构。同时，他也批评了当时统治法国的狂热民主党人所犯的严重错误，正是民主党人的宗教迫害使得法国在日本的传教机构被德国人完全取代，后者不仅在东京成立了一所大学，更使得日本媒体做出如是评论：“自此以后，远东的天主教徒将全部受到德国皇帝的庇护。”

法国在日本的天主教会学校中有800个就学名额，并将法语设置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但是，由于民主党人在法国本土对天主教会的镇压，这些学校不能再录取任何学生，也招募不到新的教员。

德国领先而法国落后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日本，也出现在很多其他地区。贝勒索特指出：

在过去20年中，无论我去到任何地方——美国也好、远东也好、欧洲也好，我总是能遇见无礼、可恶、虚伪的德国人。德国人不仅并不满足于利用我们的失误，当然它有权利这样做，而且熟练地篡改我们的历史，伪造我们的产品。所到各处，我都能听见德国人公开宣扬或刻意暗示法

国正在衰落。德国的教授、商人、外交官和海外移民全都一样，不仅无视事实，还为自己的不公正和不诚实寻找借口。我个人只有资格就日本的情况发言：我们在该国曾经享有如此的荣耀与威信，我们甚至占据了道德权威，但在15年后重返日本之际，我却发现这一切都遭到了德国人的窃取与剥夺。我从未发现，竟有一个国家会如此孜孜不倦地采取各种手段针对我们，并一项接着一项地剥夺我们的权利。

我刚一离开法国，便意识到1870年的战争其实还在世界各个角落持续进行着。我们还在不断地让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无论发生什么，都比这种缓慢地分崩离析要好。

类似现象随处可见。1915年3月1日的《巴黎评论》刊文提醒读者注意，德国正在对波斯的内政进行政治干涉，正在利用外交与商业手段不断地在该国炮制混乱和分裂主义阴谋。

尽管德国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商业扩张，却仍然认为自己并未达到“太阳般的中心地位”，德国还宣布已经做好准备打击任何试图扩大殖民地的国家——例如法国在摩洛哥。但是，德国在非洲的经历显示，尽管其做出大量牺牲，甚至曾经血流成河，却从未能够建立任何繁荣兴旺的殖

民地。这是因为德国作为商人，或许能在全世界获得认可，但若作为主宰者，受到的则只有厌恶与反抗。

## 第四章 现代德国的心理

### 1 现代德国心理起源

现代德国的心理是历时不超过50年的人为产物，因为其最早只应该从普鲁士统一德国起算。普鲁士兴起时，该国家并不是仅由一个种族构成，而存在许多拥有共同特征的不同种族。事实上，现代德国是许多不同人种的混合——斯拉夫人，凯尔特人，蒙古人，巴登、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和撒克逊人等都在此贡献了不同特质。

（人类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确定了德国现有居民的起源，并说明了其复杂构成。普鲁士人具有斯拉夫起源——梅克伦堡人、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都是种族融合的结果，具有或多或少的俄罗斯血统，前者金发长头型，后者发色则较暗。古代日耳曼人的真正后裔散布在荷兰、巴拉丁领地、阿尔萨斯、德属瑞士等地。）但是，政治的统一性却迅速使得德国形成一种奇怪的心理，这种心理虽然未能使得现代德国形成民族融合，但却赋予他们同样的期盼。由于德国人向来都对征



服者怀有深深的景仰，因此能够迅速认同新的统治者，并非常轻易地完成同化过程。拿破仑当年进入柏林时，普鲁士诸位王公贵族甚至卑躬屈膝地向法军索要佣金，这种可耻行为曾令拿破仑感到厌恶，他于是给达乌元帅写信道：“这些人在稍有得意时便傲慢自大，在失意时却又是如此可鄙。”

正是由于其本身历史，德国人渐渐发展出一种对至高权力的宗教式崇拜。数个世纪中，他们都生活在不同统治者的主宰之下，受到了系统性的严苛对待。只需浏览一眼他们的历史，便能明白德国人为何长久以来都缺少鲜明个性。德国学者们需要召唤起国民的所有爱国热情，才能够向其灌输些许同质化的历史观念。他们要想获得成功，只能编造历史，就像为某个爬上贵族阶层的暴发户编造一套全新的家谱一样。

德国学者提出过一个最匪夷所思的理论：通过对欧洲的侵略与对罗马文明的破坏，古代德国游牧部落切切实实地改造了世界。事实上，这些部落毫无文明传统，也难以受到教化，还得再过几百年才可能建立一个合格的文明。M.迪律伊（M.Duruy）在《罗马史》中写道：“400年来，这个掠夺成性的民族都是世界的灾祸之源……”图尔斯的宗教领袖也指出：“德国人对誓

言毫无敬畏，对征服对象毫无同情，对妇女、儿童和弱者也毫无信义。”

德国历史学家们还指出，中世纪的德国向世界贡献了许多艺术与文学瑰宝。但是，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清楚地证明，代表中世纪最美形象体现的哥特式建筑实际起源于法国，它是中世纪的一种抒情艺术形式，出自有关帕西法尔、特里斯坦、伊索尔特等人的神话传说。此外，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也都并非源自德国，德国总是试图予以模仿，却从未有过任何创新。直到今天，德国的各处建筑模仿的主要还是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宫廷的建筑风格。

我们必须明白，德国人秉性中的服从是其哲学的基础，也是其模仿精神的基础。如果明白了德国人的这一性格特征，便能理解德国为何得以成功改造其国民心理。

## 2 德国人心理的一般特征

要探讨国民心理，只有着眼于一般性，而不是细究特例。因为尽管所有国家无疑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是依然存在很多区别。不仅国家如此，一国之内的各个省份也可能存在极端差异，弗莱芒人、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马赛人便具

有全然不同的心理。除此之外，不同职业也会给人们打下特有烙印——工人、牧师、法官、公务员都各有差别。但是，与动物学中的现象一样，这些差别完全没有排除普遍特征的存在。例如，不同品种的狗可能非常不相像，但却仍然能被归为同一物种，这是因为其相似性远远高于差异性。

在当今德国人心理的一般共性之中，不仅有团结意识、对官方权威的服从，还有对集体优越性的自信——后者或许部分是由于德国人无法从其他角度看待问题，因此对其他国家国民的心理一无所知。我们都已看到，德国外交家们在战争爆发之前体现了多少这样的无知。

不仅德国普通国民具有这种虚荣心，德国的知识阶层之中也充斥着这种观念。学者们甚至开始对德国所谓的民族优越性开展起专业化研究。

由于德国人的奴性与服从，弗雷德里克大帝甚至声称，他已经厌倦了统治一群奴隶。但是，统治者其实并无理由作此抱怨，因为正是其统治的权威使得德国人成为愿意相信一切的奴隶。例如，德国人民被告知，德国入侵比利时是因为比利时背弃了自身的中立地位，因此需要受到惩罚，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样，他们也相信，德

国对法国宣战，是因为法国的军用飞机炸毁了德国的一条铁路。关于这些说法的真实性，竟然没有一个德国人给予质疑。

德国人不仅信任统治者，也信任专家学者。德国人被反复告知，其祖先是蓝眼睛、长头型的日耳曼人，但是，这主要源自学者们持续不断地大力鼓吹——普鲁士的祖先更多是斯拉夫人，而不是日耳曼人。

若要列举德国人最普遍的心理特征，可能是野蛮、缺乏教养、缺乏骑士精神——无论普通民众还是知识阶层全都一样。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资料中，再也没什么比战争期间从德国战俘处缴获的笔记更能清楚地揭示这些基本特征了。一位负责翻译其中部分材料的法军上校就此表示：

我希望，我们缴获的这一大批德国信函有一天能被发表。这些信函的作者范围甚广，有中产阶级、商人、教授，还有艺术家。他们充分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环境和各个阶级的思想。

从这些信函中，我们看到，德国人是如何冷血，如何在不断地破坏中满足其艺术天性，又是如何赤裸裸地暴露其愚蠢与残暴的。我们看到了

掠夺者的贪婪、虐待狂的病态残忍。我们还看到，这些人竟然在战争哲学中寻求杀戮的借口，煽动军队洗劫村庄、戕害妇孺。这就是德国人，我们的官兵亲眼看见了一切。

泰晤士曾经刊登过题为《一个德国中尉的思考》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大力鼓励屠杀、掠夺、纵火、强奸等暴行，并希望战争应该在“堆积如山的尸体和血泪成海中”继续进行。他说：

文明应该从堆积如山的尸体、血泪成海和垂死之人的痛苦中树立起自身的神殿吗？是的，当然应该。如果一个国家有权征服他国，那么其威力便是至高道德法则，所有被征服者都必须对其低头。对于那些被征服者，只有表示同情了！

上述作者后来在伊普尔被俘获，因此我们能够了解其本人具体情况。他曾经是一所大学里的历史老师，是黑泽勒（Haeseler）元帅的追随者，他甚至声称自己和海瑟勒的观点完全一致。总之，正是从这些人的言论中，人们得以准确了解德国军人和许多学者的心理与思想。

凡是有中立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到访德国，都对德国知识阶层的残忍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西班牙人伊贝罗（M.Ibanez de Ibero）作为见证者，

在一篇评论中做出如下描述：

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之中，我发现了有关战争最激进、最顽固的想法。在我看来，相比之下，政治家和金融家们的观点要温和得多。大学教授们却常常顽固不化，完全误解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中，他们的思想似乎受到严重误导……他们的思想一点也不复杂，他们有时可能怨恨、有时可能狡诈，但却缺乏心理学知识。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拉丁国家高度重视的文雅与礼节受到德国人的完全鄙视，德国人将温和与仁慈视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词。为了给其残忍正名，德国人声称德国不欠其他国家任何善意或怜悯，因为德国是由上帝选中来将自身意志施加于其他国家的。因此，才有了威廉二世的那句话：“在我看来，人道与慈悲到了孚日山脉这一侧便该消失了。”

德国人不仅野蛮残忍，还缺少教养和圆滑性，这也令外国人印象深刻。众所周知，在法国大使离开柏林时，德国皇帝令其受到了何种对待。康邦（即法国大使）本人亲口告诉我，他被关进一列由警察看守的火车，整个旅程长达26小时，其间没有任何食物供应，还被迫支付了5000

金法郎的过路费。俄国的皇太后当时也在德国，也遭遇了类似对待。而与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驻法大使回国坐的却是豪华列车。

如果进行过海外游历，德国人自己便会意识到自己缺乏教养。根据1914年10月31日的《日内瓦日报》，哥廷根大学的W.沃伊特教授

（W.Voigt）在一次演讲中称：“有教养的法国人和英国人通常比普通德国人更为优秀，因为他们是更加古老文明的产物。”

德国人极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因此报纸和书籍才能对其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德国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轻信臭名昭著，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荒谬的宣传。但是，早在很久以前，德国人心理的这种易受暗示性便已有所体现。在歌德和席勒的时代，《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致了許多人的自杀，《强盗》也激励了许多德国学生到森林里生活。到了现代，德皇威廉二世也常常幻想穿着锃亮铠甲的中世纪骑士，并受到深刻影响。

易受暗示的特质使得德国人希望与他人保持一致，而英国人却恰恰相反，更加倾向于独立思考，与他人保持不同。

不诚实也是德国人最普遍的缺陷之一，或许

还是最古老的一大问题。早在公元纪元开端，彼得克特（Velleius Paterculus）便写下：“非常可怕的是，日耳曼人的性格混杂了残忍和狡诈，他们是天生谎话连篇的民族。”

在上文中，我仅仅研究了德国人心理的若干层面，尚未提及帮助德国人获得成功的要素。在以下章节中，我将予以说明。

### 3 普鲁士军事制度对现代德国人心理造成的影响

莱布尼兹曾经说过，通过教育，能够在100年之内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理。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能发挥作用影响的，除了教育之外，还有军事制度。

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也承认，是军事制度从本质上改变了德国人的心理。当其所有健全男子都必须经历军营生活时——先是两年，然后将有固定时间间隔，这个民族自然便会终身养成精确、纪律和服从等习惯。德国的军事教育完全基于恐惧这一心理因素，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下列言论便清楚予以指出：

你看到的所有这些人，若每一个人单独存



在，都会怨恨我。但是他们一旦形成行伍，并意识到长官正手持棍棒站在他们身后，便会开始在我面前颤抖。他们不仅畏惧我，还将奋力保护我。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只要我一声号令，他们便会积极地投身战斗，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因为他们尽管甚至不知战争究竟为何，却坚定地相信自己必须为我而死。如要问我是如何获得这一成果的，棍棒的力量是第一位的。

棍棒和皮鞭的使用向来都是德国军队中的一项传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一位德国骑士在参加拉施塔特会议时便指出：“每天早晨，我都会被巴登军团的长官们体罚士兵的叫骂声吵醒。”

尽管德国报纸批评过不下数百次，这种军事制度的严酷性丝毫没有放松。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其更是影响到境内所有士兵，甚至采取了更高强度。正是在这种军事制度的鞭策之下，年轻的德国士兵才认识到秩序、纪律、规则、服从的必要性。即便触犯最小的规矩，他们也会受到无情的责罚，因此，他们很快便对长官产生了绝对服从的心理。

在战争期间，德国士兵同样受到了这种严苛军事制度的折磨。据1915年4月23日的《每周时报》报道，一位目击者声称，他看到士兵们由于

犯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绑在树上狠狠抽打长达数小时。

1915年6月11日的《泰晤士报》详细报道了德国国会长达5小时的关于前线军官虐待士兵的辩论。各方代表都声称，他们就此问题收到了数百份抗议。《泰晤士报》就此评论：

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手段似乎很对德国人的脾气……

必须指出，他们存在、生活、行动都遵循着军事制度，而欺凌和暴力是这种军事制度中不可避免的部分，摧毁了个性并统一塑造了人的身心。实际上，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正是在于这种军事制度已获默许并已存在多年。

很久以前，人类对动物的驯服便已经展示，对于鞭子的系统运用将能带来多少成果。同样，现代德国的许多成就也都是基于此。终其一生，许多德国人都不时回头看看身后的鞭子，正是这条鞭子促使他们在职责、义务这条既直且窄的道路上行进，也正是这条鞭子促使德国发展出令文明国家无比震惊的关于权利与权力的理念。一个士兵若遭受了长官肆意的鞭打，便会发现单靠权力便可剥夺并占有权利。从那之后，二者在他眼

中将毫无区别。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在经历这种训练之后可能获得某些成就，德国人也在几个世纪的服从之后渐渐适应了这种制度。但是，倘若换作别的民族，则必然无法忍受这种军事制度——除了黑人奴隶和一些亚洲部落。

德国军官因其在军队中的权力受到极大尊重，而且还幻想自身天然优越于其他人，所以不用遵守除了军纪之外的任何法律。此处有一典型事例：一位上校将30多名平民和一位法官投入地窖并监禁了24小时，仅仅是因为认为他们没有给予自己足够的尊重。他被带上军事法庭之后，不仅被一致同意无罪释放，而且还因此受到皇储的祝贺。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发生在英国，他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甚至被送上绞刑架。

德国军官除了自身职业之外对任何事物都非常无知，除了赌博和酗酒之外也无其他业余爱好。因此，其心理同中世纪那些酗酒、粗野、四处掠夺的骑兵非常相似。

## 4 教育对现代德国人心理的影响

除了军事制度外，影响现代德国人心理的还

有德国的教育——尽管重要性不如前者。从基础教育直至高等教育，德国都做出调整以满足现代工业社会的需求。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其发达，设有包括烹饪在内的所有职业学校。无论是技术教育还是其他高等科学教育，其中都有一条成规：劳动的细化分工。高度关注局部细节、忽视整体的准则不仅被适用于学术研究，也被适用于各类实验操作中。

M.克鲁瓦塞（M.Croiset）如此评价德国学者：“他们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花在校对手稿、编目、整理参考文献等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这使得那些更加智慧、灵活的人对此深恶痛绝。”

但是，上述言论不应被视为批评。因为，以上方法能够为最不聪明的人提供为研究奉献力量的途径，从而对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弥足珍贵。

在科学和工业实验室中，都存在这种劳动分工，因此也为技术领域贡献了许多实际成果。即使是最优秀的化学家也都将其研究的分工划分成非常精细的领域，例如细菌学家欧利希（Ehrlich）赫赫有名的操作方法：

在确定最终配方之前，他首先需要许多药剂师为其准备许多类用砒处理过的化合物。这项工

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因为任务非常繁重且非常麻烦，对每一种化合物都需要先做化学分析。

这种细化分工的制度对于现代工业非常有必要。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只有德国人才掌握这一方法，真是大错特错，英国和美国对德国的挑战恰恰证明了其他方法也能奏效。有分工便是有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进步，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罗马的繁荣正是基于此，而土耳其等国因为从来没有组织性，未能获得任何长久的成果，始终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事实上，若不是欧洲人的帮助，这些国家甚至没有能力修建公路与铁路。

但是，德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只有国家才能发挥组织作用。德国成功地实行了僵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其已经实现高度军事化，国民能够迅速适应最严格细致的规范与管理。但是，如果说这种制度是最好的，显然不对。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述，英国和美国也非常成功，但他们却采取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制度，将政府干涉降至最低限度，并且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主动性。

国家社会主义与个人主动性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两个概念，根本无法实现相互转换。在个人自

由和国家至上之中要选择哪一种，完全取决于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状态。

## 5 宗教对德国人心理形成的影响

与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相比，宗教对现代德国人心理产生的影响非常微弱，我甚至本来都无须提及。但是，为了佐证我在之前作品中提出的观点，在此我还是决定探讨宗教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如果持有同一宗教信仰，各国便都可以保持一致，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因为所有国家在适用某一宗教之前，都已经事先依照自身心理将宗教进行了转化。

基于各民族的不同心理构成，同一宗教——或具体说是同一本宗教经典可能发挥不同的影响，这很有趣。例如，新教信仰在英国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却处于弱势。新教信仰在英国通过解读《圣经》传播，而《圣经》对于新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宗教经典，事实上，对其教义的绝对服从正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解读

《圣经》对英国人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种自由解释非常吻合英国人的独立精神，也注定将带来英国宗教的崛起，让英国人在其中找到真正的情感表达渠道。不久，《圣经》中的耶和华便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上帝。

在另一方面，德国人则认为基督教的神明过于温和仁慈，便将其赋予了更多野蛮、粗暴的特点——鄙视弱者，仅仅保佑强者。这种篡改并不令德国哲学家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神明并不会改变国家民族的内在灵魂，相反，神明产生于信仰者看待他们的具体方式。

基督教在现代德国的演进过程中，以上观念随处可见。德国将福音派关于慈善、温和、保护受压迫者的理念（这被尼采斥作“奴隶道德观”）与武力、野蛮、征服等完全不属于基督教教义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看来，这确实是一件非凡的事。由于神秘主义的逻辑不受任何限制，因此德国的政治理念与宗教理念虽然完全相悖，却依旧能够形成彼此融合。

以上两类理念的融合在德国得到了神学家的支持，在法国却遭到反对。由于政治和宗教的融合，德国政府受到了宗教势力的支持，这种情况在法国却恰恰相反，也给法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内相互敌对的势力总是准备好彼此发难，将在极大程度上削弱国家实力。

德国的新教教会绝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团体。平时，新教势力无法损害天主教会，因为后者人数众多，足以自我保卫。但是在战争中，新

教却找到机会发泄宗教仇恨。因此，他们毫无理由地处决了大量天主教教士，还尽其所能毁坏了大量天主教堂。

## 6 现代德国人心理的统一性：强调集体而缺乏个性

在以上章节中，我们看到的所有影响都在普鲁士的铁腕统治下改变了德国人的心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磨灭了德国人的个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集体心理。

在德国人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在心理上达到如此的高度统一性。我之前提到，任何人若有机会审问来自任一社会阶级的德国战俘，都会因其思想言行的一致而印象深刻，都会认同《洛桑报》一位记者的以下评论：

我绝对不曾相信，德国民众竟然能在心理上达到完全统一——有人可能会说，这几千个人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大脑思考。达到这种程度，到底是可喜还是可悲？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心理感染的现象，还是战争宣传教育的产物？尽管这些德国人感情不同、智力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其个性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在德国，没有任何个人，只有民族、社会组织和强有力的国家



机器。

当前，勇气、主动性、决断力都是德国人的集体品质。德国人要想有所行动，只能融入工会、企业或社团等集体组织。即便一个德国人独立存在，其依然是集体的。在科学的最高研究领域，德国人的工作更是完全集体化的，越是精细学科的论文，越是由许多作者共同撰写完成，例如关于眼科的研究文章。

我们必须记住德国人心理的集体性，才能理解为何能有93名德国学者联合签署了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这份宣言包含了许多值得用心理学深究的内容，并清楚地体现出集体心理在智力上的欠缺，一定会在未来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此外，这份文件还证实了我很久以前便在作品中指出的事实：当受到集体影响时，即便是最睿智的人也会丧失一切判断力。当集体进行观察时，一切不容置疑、清楚无误的事实证据都似乎为集体视而不见，失去力量，不复存在。

《93宣言》的主要宗旨，便是为德国的杀戮、劫掠和四处破坏进行辩护。以下是这份宣言的片段：

我们并没有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事实证

明，是法国和英国决定破坏其中立地位。比利时是与英、法签订协议的，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将会带来自杀性的损失。

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伤害任何比利时公民，也没有毁坏他们的财产，除了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

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向鲁汶发泄怒火，他们不得不轰炸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只是为了向这些地区的部分敌军和暴乱分子复仇。

关于上述种种否认的真实性，已经毫无必要再作探讨，因为官方文件早已证明了确凿事实。到了现在，这份宣言的起草者们可能也已明白事实真相了，多数人无疑将为此非常后悔。但是我敢说，很少人能有勇气写下马克西米连·哈登（Maximilian Harden）的以下言论：

我们不要再费力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找借口了，停止对敌人的侮辱与攻击吧！战争并没有违背我们的意志，也不是突然被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想要战争，我们不得不发动战争。我们不接受欧洲的审判，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其管辖权与合法性，我们将用自身武力在欧洲建立新的法律。德国参与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世界上争取

更多生存空间与更大的产品市场。

## 7 德国人为何能在心理上迅速适应现代世界工业发展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国家能够持续保持发展和进步。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发展和繁荣之后，国家便会陷入衰落甚至灭亡。有些国家已被彻底摧毁，以至于其首都的遗址都无处可寻，只有在现代人们进行考古时才被发现。直到昨天，特洛伊、尼尼微和巴比伦的遗址才被发掘出来。

这些兴衰周期发展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其中我必须指出，动物世界的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中同样是主导法则，当环境发生变化，所有生物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环境。能够做到这点的物种便能进化发展，不能做到这点的则会逐渐灭亡。

正如每一个气候变化都会引起动植物发生进化转变，每一个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变化都将注定促使国家与民族心理发生特定改变。但是，对于不同环境的变化，各国适应能力也有所不同。在某一环境中最有优势的素质到了另一环境中，便可能失去作用。

今天，科技与工业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存环境，使得德国人某些在原先毫不起眼的品质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现代生活要求高效实际的成就，这使得细化劳动分工变得尤为重要。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一个民族必须具备耐心、规范、专注等品质，这对于那些过于机灵或过于充满幻想的民族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德国却非常容易，这些都归功于德国人的天性和无情的军事制度。

以上这些品质直至20世纪初还未体现作用，在现代社会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世纪初，工业发展尚处早期阶段，科学发展较为缓慢，急需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大师来奠定基础。然而，当今世界却不再需要这样的科学巨匠，他们的地位已被数百万蚂蚁般的劳动者所取代，这些劳动者通过细化分工将物理世界划分成无数的小块。德国的实验室现在已经如同巨大的蚁丘，有数千名专家在其中进行最精细、最具实用性、最具营销价值的研究。冯·比洛对此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自从1870年起，德国已遍地是商人了。

所有这些专家都对工业发展做出无价的贡献，却对许多一般性法则知之甚少。在德国的科学家之中，从未出现过诸如达尔文、巴斯德、贝

尔纳等天生具有哲学精神的学者。在德国的实验室里，也从未产出电话、飞机、汽车、无线电等现代发明。但是，尽管自身还存在这些不足，德国的虚荣心却冲破一切界限，驱使一些学者对历史做出最最怪异的解读——张伯伦宣称，但丁、伦勃朗、帕斯卡尔、莱辛等人都是德国人；其他知名学者在撰写有关化学和细菌学的书籍时，居然只字未提拉瓦锡或巴斯德。

尽管德国实验室很少产生新思想，却总能将世界先进思想理念系统化适用于自身，从而获得进步。不仅在科学领域如此，在哲学领域也是一样。德国所有的大哲学家和大思想家都生活在德国统一之前，生活在未被普鲁士军事化的小国宗法制度之中。自德国统一之后，却没有出现一个可谓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的大家：例如尼采，其作品虽然最为流行，却只是在宣扬武力崇拜，而这不过是在重复早期德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而已。

无论如何，我必须重申，德国人已经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技术进步。因此，昨天他们或许还微不足道，今天便突然向全世界昭示野心。

既然取得成功，德国人自然便要总结并列出为其带来成功的要素。由于德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制造业、贸易和军事，因此德国宣称自己在这些

领域中具有许多国家无法超越的优越性。

在德国提出种种优越性的表现中，有三个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作为价值标准所接受的。首先是其军事奴役；其次是其动物本能——正是这点令德国人毫不节制地生育繁衍；第三便是群体精神，正是出于这种精神，德国人奴性地服从国家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思想。

未来各国是否会遵循德国人的标准，这一点十分值得怀疑。人类的理想难道便是大量生产酸菜、香肠、铁器、啤酒和各种中看不中用的杂物，将这些东西倾销至世界各国，同时又用大炮确保没有国家同其竞争吗？

我们无从获知各国的未来命运。但是一旦普鲁士军事制度获胜并传播各处，自由将被遗忘，人道主义将被再次长久地束缚，人类将再也没有未来。

# 卷三 战争的远因

## 第一章 战争的经济与政治原因

### 1 战争的真实原因与想象原因

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在本卷部分，我将带领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一探究竟。

当前战争的远因既有真实存在的，也有想象的，但是想象并不意味着无法有效激励人的行为。我常常主张，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审视人类动机的理性价值，而是研究其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类历史充斥着各种想象，如果将所有关于理性与幻想的较量抹去，历史便将所剩无几。

在“一战”的种种起因中，既有已酝酿半个世纪的，也有在一周之内迅速发酵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战前半世纪内，究竟有哪些起因正在酝酿过程中？二、在外交谈判进行的那一周之中，究竟是谁希望战争爆发？

这两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交战双方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德国人坚信，法国人和英国人长期以来都在酝酿发动战争；法国人也同样认为，德国人渴望战争，并在第一时间抓住机会挑起战争。现在，让我们暂时抛开战争的近因问题，首先开始研究使欧洲深陷战火的种种远因。

## 2 对德国人口过剩的假设

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德国人口过剩是导致德法开战的原因，但这种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这是将自然法则生硬地套用到人类社会中——这是普鲁士学者的常用方法。伯恩哈迪尤其喜欢将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础，却常常得出一些远远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结论。自然法则无法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因为尽管动物世界可能完全臣服于自然的统治，人类却有能力通过自身活动对抗自然、挑战自然。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理论主张：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天然倾向于过度自我繁殖，但由于物种数量与生存资料的密切联系，这种过度繁殖将会受到限制。例如，战争和流行病会把种群数量减少并控制在合适范围内。

随着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某一特定地区必将



逐渐有能力容纳大量居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均衡最终会被打破。当一部分人口发觉其生存遭遇困难时，就必须向外迁移，或是对另一个人口不太稠密的国家开战。在历史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包括先前的德国，也包括今天的日本。

尽管一些德国学者声称，德国也是由于人口即将过剩，所以必须参战。但是，无须复杂的证明便可知悉，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当今的德国并不符合上述情况。我从伯恩哈迪的著作《现代战争论》第一卷中节选出以下内容：

基于当今世界形势，我们必须将战争作为保障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必要手段。

德国与法国的领土面积相当，德国目前供养着6700万人口，而法国人口总数却只有4000万。此外，德国庞大人口数量还在以每年100万的增幅攀升。同时从长远看来，德国的工农业却难以安置这些持续增加的过剩劳动力。因此，除非我们继续寄希望于邻国国力日益昌盛，有利于我国国民像从前一样移居国外。否则，我们就必须扩张殖民地，为过剩的人口提供劳动岗位和物质保障。

鉴于当今世界的政治势力划分，我国若要取得更多领土，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地或是结盟。但是，唯有我国在欧洲立足更稳、地位更高，以上方法才具有可行性。这是因为我国外交政策目前再无前进空间，要想向那些比我国更强大的国家做出政策宣示，只有通过战争手段。对我们而言，这种负担与压力简直难以忍受。

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德国学者的认可。伯恩哈迪还指出：

与激增的人口相比，我国国土面积太小。我们需要更多领土，而且只能从那些人口正在缩减的国家手中获得，因为其很快将没有能力充分利用大部分土地。法国便处于这一趋势中，所以请敞开国门，迎接德国人的占领吧。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那么德国向国外移民的数量理应持续增长。但在事实上，德国移民的人数反而减少了，甚至低于英国海外移民的数量。德国不仅没有出现人口过剩的状况，反而由于转型为制造大国而出现劳动力缺口，在特定季节中不得不从意大利、克罗地亚和其他国家引入数以千计的劳动力，参与德国国内的收割与采矿。

德国人口数量以每年80万的增幅上升，到如

今已接近7000万，但还不算过剩。在全球范围内，德国甚至根本排不进人口最密集国家的前列，参见以下各国每平方公里居民人口数的列表：

国家	每平方公里居民人数（人）
法国	74
德国	120
意大利	121
日本	139
英国	144
荷兰	182
比利时	254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从德国学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尽管统计数字显示的事实与他们所描述的完全不一致，但是我们姑且承认，德国确实需要在其他国家为自己的过剩人口寻找出口。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理解，德国参战可以就此带来任何好处。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覆盖许多国家，又已凭借低价商品占领了全球市场，从而得以在许多地区获得很大的行动自由度。即使德国赢得这场战争，那些被它战胜的国家也不可能以比过去更加友好的姿态欢迎它。因此，假设德国是由于人口过剩而发动战争，这绝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判断。

我同样认为，国家随人口增长而强大的理论

也是错误的。尽管这种理论在法国盛行，尽管贝蒂荣博士（Dr.Bertillon）已经对我表示过愤怒，我还是不得不坚决予以反对：如果一个国家人口众多，便能拥有强大国力，那么中国和俄国早就应该排在世界强国前列了。但是事实表明，俄国不仅在日俄战争中一败涂地，也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接连遭遇失败。

决定国家实力的最主要因素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交通、军火和财富。我们可以断定，一支5000人的军队若配备无限数量的武器弹药，并能通过铁路运输调遣至任意地点，必将战胜一支人数更多但交通不便、缺少弹药的军队——这里体现出的正是俄国军队的弱势。

再来说说法国，法国的人口近年来并未增加。既然我们不能增加人口数量，就应当尽全力改进人口质量。从个人角度出发，我更希望自己属于希腊之类的小国而不是波斯等所谓的大国，因为前者人口虽少，却能用自身的文明照亮世界。我认为，人类的理想自然是成为上帝选中的一小部分人——虽不能成群，却是少数精英。当然，少数精英无法阻止普通人群不断扩张，也无法阻止普通人群给世界带来威胁。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小国家也会联合一致反抗侵略者的入侵，当前的战争便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我还很遗憾地发现，有一些学者竟然唯数字至上，这其中包括法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的科尔森（Colson）。这种唯数字论会使人产生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人类的唯一目标便应当是在一家工厂中制造商品，在另一家工厂中制造大炮，然后用大炮保障商品的流通销售。但是，如果人类除了以上两件事外再无别的期盼，那么将会很快丧失生存的动力。

### 3 领土扩张与商业扩张的欲望

对于那些军事实力持续增强的国家，拥有扩张与征服的欲望是非常正常的心理。如果一个国家国力增强，那么原先仅仅将其视作贸易对象的国家便会转变态度，将其奉为宗主。但是，这些国家如果不愿承认这种扩张欲望仅仅源自其野心与骄傲，便会自然而然地为此寻找基于物质的借口。就德国而言，德国学者们就此找出的借口，即拓展贸易市场的需要。但是这一借口同此前提出的人口过剩假说同样荒谬，因为我已在上文中指出过，德国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对外扩张中建立了广阔的贸易市场。尽管如此，多数法国学者却和德国学者持相同看法，同样认为德国对外拓展商品市场的需求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托的下述言论即代表了法国学者

的观点：

众所周知，德国发起当前战争有一关键原因——要为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占据更多世界市场，从而为全体国民的生活与福利提供保障。我给德国这一政策取了个名字，叫“饱腹政策”。正是这个政策让德国人像一群饿狼般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索邦大学的莱维·布吕尔教授也在其探讨战争的经济起因的作品中发表了类似观点：

如果德国能够拥有广大富饶的殖民地，便将必然占有安全、长期的市场，像英国、法国、荷兰一样与这些市场进行定期商贸往来。但是，德国缺乏殖民地，这使得它感到愤愤不平，正是这种愤恨间接推动它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德国还会自问，如果强大的军事实力不能为自己确保商贸往来的必需市场，那么拥有这种实力又有何意义？

以上引述言论所蕴含的观点，即德国对建立贸易市场的渴望是当前战争的一大诱因。这真是当今最大的谬误之一，我甚至奇怪居然还会有人持这种观点。这是因为，实际上只要粗略扫一眼贸易往来的统计数字，便足以否定这种观点：法

国与英国的最大贸易对象绝对不是其海外殖民地，而是它们从未想要征服的那些大国；此外，即使德国将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全部收归己有，获取的商业利润也永远赶不上其与法国、英国与俄国之间的贸易收益。在这些事实证据面前，又怎能声称德国确实需要开拓更多海外商品市场？战前，德国的商品能够流通进入所有国家，不曾受到任何阻碍。既然德国已经不用一枪一弹、不费任何代价地占领了市场，到现在又何必再动用武力呢？在我的另一本《政治心理学》中，我已在其中题为“殖民的新形式”一章中说明，迄今为止，德国是如何将本国政府的问题与损失转嫁到别处，又是如何剥削其他国家的——以德国在蓝色海岸长达125英里的殖民地为例。此处，让我们回答这一假设：如果德国战胜了英、法两国，德国与这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会增加吗？答案是否定的。德国与这两国的商贸往来不但不会增加，反而还会减少，因为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另外两国的战败与贫弱。

因此，我必须再三强调，德国参战的真实动机并不是为了开拓市场，因为其早已占据了这些市场。若不是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以上谬误观点，并任其广为流传，我原先根本不会在本章中提及这一问题。

## 4 殖民竞赛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意欲通过战争争夺殖民地，不仅是为开拓贸易市场，更是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在海外建立海军基地，为德国舰队提供补给。

通过摩洛哥危机，德国向世界展现了野心，也发现欧洲各国其实并不担忧他国入侵其殖民地。目前，世界的主要殖民地势力范围早已划定，德国若想获取新殖民地，就必须通过武力手段。这对德国而言轻而易举，因为其早已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实力超群的海军。

在阿加迪尔事件中，德国的殖民野心遭到法国与英国的阻挠，这使其大为恼火。英、法两国认为，德国只是在寻找借口和时机，因为其野心必然无法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俾斯麦所犯下的错误为数不多，但其中之一便是令德国在殖民竞争中失去先机。俾斯麦的原本计划是推动法国采取殖民政策，从而将战火引入英、法两国之间，德国坐收渔利。此法却未能实现，反而致使德国未能获得殖民优势。由于俾斯麦的错误，英、法并未反目成仇。恰恰相反，法国与德国之间却爆发了利益冲突。但是，俾斯麦的主张受到了他所处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想到，法国的殖民政策实



际上与德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因为当时德国海军还未获得发展壮大。

但是，我并不认为德国参战是为了摩洛哥。因为德国的野心不仅更大，而且着眼于更近目标。在另一本书中，我曾经指出，德国迟早都会发动战争，因为德国需要夺占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将其作为海军军港。

尽管我们不能断然将“一战”的最初原因确定为安特卫普的归属问题，但这一问题确实是德国的首要目标之一。如果读者对此仍存疑虑，不妨读一读下面这封德国于1915年4月17日写给美国的公开信（当时，德国的前殖民政策部长登伯格受政府委派前往美国，向美国公众阐述德国参战的原因，力图以此扭转美国公众对德国政府的印象）：

比利时占据了德国西面的贸易要道，但是德国必然会向西扩张，因为那是保障德国贸易的唯一海上通道。比利时的政治地位是由英国一手树立并维护的，原本便旨在剥夺德国的天然优势。因此，我们不能对比利时坐视不顾。

除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之外，德国还在觊觎着法国的阿尔萨斯。因此，自从比利时沦陷后，

我便一直主张——这将会是一场异常漫长的战争。

## 5 政治错误

当前战争的起因或多或少源自一些遥远的政治事件，至少回溯至普鲁士对丹麦的占领。当时，欧洲各国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场军事征服，随后，各国又任由普鲁士占领了奥地利。这算是当时欧洲政治家们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若将此全部归咎于这些人的政治盲目性，恐怕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理由。

此处我不能花费太多篇幅细说这段历史，只能谈谈英、俄外交官在1870年犯下的一些错误，这也属于当前战争的诸多远因。在这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即出自英国内阁的无知——他们拒绝了一项提议，而这项提议原本是能够阻止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在很多年前我已经发表作品并在其中指出过这一错误的后果，此处仅做简要复述：

如果英国现在艰难挣扎着增加税收，指望以此扩大舰队并应对德国的挑战，那都是因为英国的统治者们在40年前未能预见到一切。出于私心，英政府在普法战争之后拒绝成立欧洲代表会议、联合遏制德国的提议，这大大地改写了历

史。事实上，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经日夜担心这样一个会议真正召集起来。

英国和俄国的政治家如今肯定都在为前任们的错误悔恨不已，俄国显然不会忘记阿诺托某天说的话：俄国在1870年通过对奥地利施压并阻止奥参战，从而帮助德国战胜了法国。

柏林会议也为过去的错误添上重重一笔，因为其导致了巴尔干的复杂局势，从而最终引起了战争。

但是，我要重申，在此我并无意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当我们研究政治心理学错误导致的后果时，还有机会探讨这些问题。

## 第二章 种族仇恨

### 1 源自心理差异的种族仇恨

巴尔干各国由来已久的种族仇恨也是当前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在进一步深究其影响之前，我们需要细述这类种族仇恨的起因。

正如我们随后所见，种族仇恨可能随着利益冲突而进一步深化，但其根本原因却埋藏得非常

之深。不同种族具有的心理渊源不同，对同一现象的印象不同，对同一刺激的反应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与行为也都截然不同，因此无法达成共鸣，并且最终导致彼此无法理解。

当然，对于知识领域内的科学或技术问题，各国国民尚容易达成一致；但是对于政治、宗教、社会等其他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他们则容易受到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冲动所摆布，无论智力水平多高，他们都无法理解彼此。这种相互理解的缺乏，主要由于他们的多数观念都源于周围环境对潜意识的暗示，而这种潜意识正是种族性格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同种族不仅无法相互理解，更是难以接受他人观点居然不同于己方观点。但是，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不同种族之间还存在语言障碍问题——我们若是希望彻底理解他人，必须先能听懂对方观点。

即使处于同一语言环境中，各种族的情感差异在长期过程中仍然无法掩饰。这是因为，尽管人们可能说着同一种语言，但同样的话语却不能在相同头脑中形成同样的意象。话语的内涵基于说话者的心理变化而变化，只有具体词汇——即含义清楚、指向明确的词汇才拥有客观、普遍、恒定的意思。而诸如灵魂、自由、自然等所有抽象词汇的含义，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

些词汇是主观的，任由每个人根据自身好恶加以解释。

在国际交往中，即便缺乏相互理解，各国也可能形成友好关系，或为维护共同利益制订条约。但是，如果国家之间希望长久维系友好关系，则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国民情感产生冲突。因为不同国家可能拥有相同理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感。

## 2 源自宗教与物质利益冲突的种族仇恨

宗教与物质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能够在一个国家内挑起极端仇恨。因此，其自然更可能加剧各国国民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天然仇恨。

我根本不必赘述关于宗教分歧引发仇恨的事例，因为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所引发的暴力事件几乎充斥着人类的整个历史。因此，我将跳过这一话题，仅仅在此处探讨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种族仇恨。

德国人对英国人的仇恨就是一例。这两个民族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却因为在世界许多地区中的贸易竞争成为死敌。因此，德国投入大量

金钱建成并装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以在军事上与英国人抗衡；德国的许多报纸也将英国描绘成不惜任何代价都必须摧毁的敌人。这种仇恨不仅在德国平民中普遍滋生，也在德国学者圈中蔓延——可参见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迈尔的以下言论：

下个世纪的一大特征便是英、德两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仇恨。我们都确切地知道，英国是德国的死敌，英国想要摧毁德国的文明与存在。我们两国尽管暂时对外表现和平，但却根本无法逾越彼此之间的鸿沟。或许需要在许多代人之后，两国才会出现和解方案。（Scientia，《科学》，1915年3月1日）

德国对英国的憎恨并不仅仅是竞争对手间的仇恨，也是种族感情的完全对立。德国人坚信自身是至高无上的民族，对英国的全球霸权感到恼火，并认为英国国力与财富增长是不公平、不能容忍的。德国哲学家和作家们持续不断地将英国批判为全人类的敌人，声称英国现在不过是在炫耀自身实力，未来必将被德国打败。

《93宣言》的签署者之一，海德堡大学的勒纳（Lenard）博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在其中引用了M.Hovelague的以下言论：

泰晤士河岸边集中了全世界所有的虚伪，我们必须摧毁它们。不要再向莎士比亚、牛顿、法拉第的坟墓致敬了……要想与英国这样一个光天化日下的强盗真正地和平共处，除非是它消亡或被摧毁了。我们要与这样一个恶棍斗争，不再仅仅是为捍卫祖国的存亡与荣誉，而是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为了保障诚实与正直仍然存在于世界上。（Revue de Paris, 《巴黎评论》，1915年3月4日）

从以上两位学者——至少其中一位非常著名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推想德国普通学者们的愤怒。这种愤怒并不止步于英国，还蔓延至其他国家，甚至让人联想到宗教信徒对邪教徒的仇恨。关于此类宣传的论调，从以下在美国发行的德国报纸选摘中可见一斑：

当我们征服敌人并占领其土地时，无论是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劣等民族，若有人胆敢发出一声声响，我们便会将其碾碎。

总有一天，我们会摧毁这些国家虫蛀的教堂和其他丑陋建筑，然后建造更大更美的教堂与神庙，供奉德国皇帝和我们其他的伟大祖先，正是他们帮我们清理了这世上的劣等民族。

哦！我们要感谢上帝选择了无与伦比的德国皇帝来履行这个崇高使命，达尔文不也说过吗（他肯定是向我们伟大的德国学者借鉴了这一思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从任何角度来说，德国人不正是适者吗？因此，让所有德国人高呼吧：消灭一切腐朽！只有德国人才是最高贵的民族！（转载于《泰晤士报》，1915年6月29日）

以上便是德国人对其他种族的印象。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中，无论是大众还是学者们都对邻国人如此无知。德国的世界观完全处于学者们的理论主导下，这种狭隘无疑导致了其在“一战”之前外交政策的短视。

### 3 源自不同政治理念的种族仇恨

一个种族的心理决定了其政治制度，或至少决定其更倾向于接受何种政治制度。我们已经看见，德国人是何等迅速地接纳了普鲁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德国人是如此习惯这种制度，以至于再想不到任何其他可能实行的制度。不仅如此，德国人还想将之推广至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而言，德国人的意识是受国家领导的集体意识，而英美人的意识则为个体意识，只有非常小的部分从属于集体。



如果德国取得胜利，将意味着自由在欧洲的终结，随着军事独裁占据最高地位，自由将最终消亡。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这句话恰恰道出我的心声：“如果德国获得胜利并主宰欧洲，我宁愿死去或离开，也不愿在这种状态下生存。”

由此可见，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仅此一条便足以激发彼此不可调和的仇恨。

## 4 种族仇恨在政治冲突中扮演的角色

种族问题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将长期持续如此；但是，我们或许应当用“民族”一词替换“种族”，尽管前者并不具备任何有关人种的含义。对于由于种族、宗教、风俗、语言等凝聚而成的群体，政治家们一般采用“民族”一词为其命名。

尽管“民族”的概念根基还不牢固，却还是逐渐成为现代政治团体的主要纲领，并取代了有关均势的旧学说（尽管后者也并不可靠，但却相对没那么危险）。

欧洲未来的政治基础或许很难稳定。这是因

为当前在同一君主国辖下的各民族间具有极端差异，一旦其各自为政，必将彼此争斗。这些国家中以奥匈帝国尤甚，该国内部划分了许多民族，一会儿按照人种划分，一会儿按照宗教或语言划分，一会儿又按照风俗习惯划分，从未实现过民族融合。该国有1200万德国人，1000万马扎尔人，650万捷克人，500万波兰人，350万乌克兰人，400万拉丁裔（罗马尼亚与意大利）混血人，等等。多年以来，德裔和匈牙利裔一直矛盾重重，现在双方却暂时达成谅解，联手压制国内其他民族。

如果奥地利战败，这些民族必然会分裂。特兰西瓦尼亚、达尔马提亚、加利西亚、黑塞哥维那、匈牙利和其余地区将从帝国分裂出去，各自建立小国。这些小国仍将完全缺乏同质性，因为他们本身是自成一体的种族集合，彼此毫无关联。

巴尔干诸国都存在类似的民族混杂现象，这些国家里的民族依其宗教、语言、愿望等被独立划分。根据《巴黎评论》刊载的统计数据，罗马尼亚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地区包括以下民族：

特兰西瓦尼亚有154万罗马尼亚人、38万匈

牙利人、56万捷克人、234万日耳曼人与54万其他族裔；而布科维纳的人口统计显示，该地区有208万罗马尼亚人、268万乌克兰人、91万俄罗斯人、5万日耳曼人、25万波兰人和大约8000名匈牙利人。

这种混杂的人口构成之所以危险，在于我之前提过的事实：各民族彼此痛恨，如果不受严格约束，将会大肆开展屠杀。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便是鲜明例证。

巴尔干诸国只要处在土耳其统治之下，就不得不和平共处。但是，一旦他们组成临时联盟、成功脱离穆斯林统治，尽管胜利尚存余热，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向彼此开战。塞尔维亚与希腊在一天之内就与盟友反目成仇，保加利亚也只是在等待复仇的合适时机而已。

这些国家的所谓愿望不过是侵占邻国土地、杀戮邻国国民，越多越好。保加利亚觊觎着马其顿全境和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塞尔维亚希望获得保加利亚部分领土和波斯尼亚全境，罗马尼亚想要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和比萨拉比亚，希腊则盼望统治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小亚细亚沿岸国家。一家瑞士报纸说过：

这些国家的不幸在于：这么多民族不得不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尽管他们无法消除由来已久的积怨，更不能容忍比肩生活。每一个民族都说自己的语言，按照自己的方式养育后代，并遵从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强者压迫弱者总是不可避免，在布加勒斯特条约划拨至希腊与塞尔维亚的马其顿地区中，这显露无遗。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匈牙利人在奥地利境内辖区的300万罗马尼亚人身上：

他们被视为民族威胁，并受到最严酷的暴力与专制统治。对他们而言，基于宪法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平等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受法律保护，没有集会与结社自由，报纸因遭到审查而被禁言，报纸编辑们动辄被处以罚款和数月监禁。

巴尔干诸国为夺取地区主导权而争斗，却一无所获。因为无论哪个国家成为统治者，当其对地区各国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涉，并通过行政制度具体付诸实施时，必然采取最残酷的手段。因此，许多巴尔干人民已经开始后悔脱离土耳其的统治了。

种族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以往的外交尽量避免触及这一问题，并尽量不去改变近东地区既

有的种族格局，这是明智之举。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之前被时间、传统等种种因素所缓和所管控的种族问题都再次爆发。

在所有仇恨与对立最终平息之前，还将有很多可怕的冲突。因为，这些相互憎恨的种族一旦获得过多自由，便会撕碎对方，而一旦受到限制，便将不停反抗。

### 第三章 德国的侵略姿态与复仇思想

#### 1 德国的侵略姿态

我在上文中已经阐述，德国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战胜所有对手，如何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全球多个地区。这种物质的持续发展对德国国民的性格与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们一旦意识到本国的贸易霸权与军力增长，便容易自视为至高无上的优等种族。

集体虚荣是一种飞速增长的激情，在德国作家学者的煽动之下，德国人的虚荣心最终冲破了一切界限。全体国民不久便确信，德国是被上帝选中来统治世界的。

对这类思想，柏林大学教授拉森已做过如下总结，此前我也引用过：

陌生人就是敌人，除非有反例证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都优于他人，我们是无与伦比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种全球霸权的思想不受任何阻碍，日渐发展，直到当今一位德国作家张伯伦（Chamberlain）说出了以下言论：

当前最为紧要的任务便是将德语推广至全世界，无论是现在或在将来，都没有关系。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处，每个德国人都有职责驱使外国人说德语，直至德语也像德国的军事力量一样获得全面胜利！……人们必须受到这样的训诫：不懂德语的人都是贱民！德语必须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

在战前数年中，德国的集体虚荣虽然并未达到这种程度，但却一直逐渐滋生；随着野心的膨胀，其在外交上也呈现出更加跋扈、好斗的姿态，以至于在法国，即便连和平主义者都清楚知道，必须下定决心自我捍卫了，否则法国的国家地位将一落千丈。当所有人都认为事态再也不可忍受时，法国最终对德宣战。

实际上，德国的傲慢举止并未超过外交上的所谓“忍耐限度”。但是，每个法国人都知道德国人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并强烈地感到耻辱。德国的政治家们持续发出了一系列威胁，德皇的演说愈发具有挑衅性，不断建议本国“保持火药干燥”“磨利刺刀”。法国处处让步，却没能使德国的态度稍有缓和——在摩洛哥、巴尔干局势，在奥地利吞并黑塞哥维那的事件中都有体现。但是，我身为法国人，这么说自然会令人怀疑，因此我宁愿引用以下来自中立国人士的观点：

德国的行为越来越具威胁性，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在各方面夺取发言权的姿态也越来越强硬。与此同时，法国却表现得越来越审慎，倾向于做出最大让步，尽量避免与对手发生冲突。事实上，在不持偏见的旁观者眼中，法国为了避免让人怀疑其有野心或侵略意图，甚至牺牲了许多合法利益。

法国的过分忍耐引发了各方的不同反应。盟国们对此感到困扰，并为法国影响力的日渐下降感到悲哀；和平爱好者对此警觉，因为他们了解这种妥协不会让德国罢休，只会促使德国提出更多无理要求，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诸多小国因此感到恐惧并担忧自身独立，因为现在再没有任何制衡德国的力量了，德国很有可能进一

步侵占它们。

我们没有忘记德国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和好战倾向，这一切都令法国人感到憎恶，以至于旁观者们不禁发问：莫非这是德国惯用手段，一方面是为了“考验”法国，一方面意在挑起战争或蓄意羞辱法国人。1913年，德国肆意践踏阿尔萨斯，法国尽管愤怒，却沉默着坐视不管。最终，法国经受住了德国的这次“考验”。国内媒体非常冷静，在事态最激烈之际，法国总统还与德国大使共进晚餐。（瑞士《洛桑报》，1915年3月24日）

上文中每一处细节都绝对真实。法德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历史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法国不得不战，除非愿意附身屈就，把自己在文明国家之中的地位降到最低。此外，即使战争爆发能够推迟，也只能推迟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无论德国皇帝多么热爱和平，他都不得不对外宣战。只有这样，他才能顶住国内压力，确保自己对德国军队的领导权——这支军队已经足够壮大，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意志。

不计其数的资料都已表明，德国人已变得多么自负。当德国的战争准备迫使法国人恢复了三年制兵役时，德国国会的一名议员说道：“这是



法国对我们的挑衅，我们绝不允许！”许多德国军人和平民都宣称，法国只有4000万人口，无权与德国竞争。事实上，自摩洛哥危机初始阶段，德国就认为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待法国——但是法国经受住了一切。

## 2 复仇思想

当前战争的间接原因还包括：德国认为法国一直希望报1870年战争的一箭之仇——这种恐惧一直存在于德国人心中。

我们所被告知的是，俾斯麦起初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最终却迫于国内军方压力，不得不下令侵占这一地区。他几乎像是能够预知未来，因为这一行动的军备耗费大大超出了其带来的实际利益。如果德国的治理方式少些严苛、多些仁和，最终一定会赢得阿尔萨斯的民心，法国也再不会想要收回该省，毕竟其已经高度德国化了。但是，德国显然不可能这么做，向来喜好独立的阿尔萨斯人也觉得德国的军事制度不可容忍，尽管德国人自己毫不反对这种制度。

尽管如此，当今这代法国人早已不再想要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箭之仇。德国媒体虽然屡屡暗示此事，却只是为政府不断扩大军备力量寻找

借口而已。通过不断地重复，德国的领导者们最终成功说服人民：法国只是在为宣战寻找理由，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法国发现任何可用的理由，都会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利用其对德开战。

尽管法国的政治家们几乎完全放弃复仇思想了，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依旧对法德关系存有很多影响。法国驻德大使告诉我，德皇常常表示希望能与法国发展友好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位皇帝领导下的德国外交风格向来都是粗野、好斗的，无论是在摩洛哥，还是在其他地区和任何问题上。

当然，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是战争的重要远因之一，尽管仅仅发挥了间接影响。在所有事件中，这一问题都被不断地用来挑起德国人民对法国的仇恨，从而促使德国大大增强军力。如果没有这一背景，德国的战备速度不会如此迅速，以至于不久便把法国逼到不得不战的地步。

## 第四章 神秘主义影响在战争起源中扮演的角色/霸权理想

### 1 “一战”之中的神秘主义作用力

所有国家，无论是野蛮还是文明，都受到了神秘主义的摆布。这是因为神秘主义比理性拥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在古代，神秘主义冲动曾经诱使迦太基人将其子女献祭给摩洛神，也诱使美国的印第安人因部落迷信剥下战俘头皮以示光荣。正是出于这种冲动，穆斯林为了传播真主安拉的荣光而出兵征讨另一个庞大帝国。正是出于这种冲动，德国人如今摧毁了众多繁华都市，只是为了确立其种族的至高地位。

这种神秘主义冲动之所以威力无穷，实际是由于其不具备任何理性基础。人们的理想若一旦变得理性，便不会轻易为其献身。理性或许能够主宰一个身处实验室中的学者，但却不具有激发大众的威力。

一个理想必须经历数个阶段，才能逐渐以神秘主义的形状出现。当我们试图探索“世界霸权”的神秘主义理想是如何在德国形成的，我们便会对此有一些了解。我们的调查将会显示，有哪些因素是从一开始便围绕这一理想的。历史并没有单一的原因，每一个原因都伴随着一系列的次级影响，这些影响起初是该原因造成的后果，随后又转变为原因本身，如此循环往复。

神秘主义作为德国最终宣战的决定性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德国毫无地位，仅仅在一些小圈子里具有些许影响力。只有到了宣战时刻，神秘主义才将其影响扩大到德国社会各阶层，从少数人的梦想变为全国的共同理想。

## 2 霸权理想的种族主义渊源

很少有民族不是自认为优于其他民族，因为这的确是一种集体的虚荣心。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刺激，但也有不幸之处：那些自认为优秀的民族有时会受到引诱，并试图通过武力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在过去30年中德国出版的许多著作中，读者都能看到，德国人比历来的任何民族都自视甚高，也许只有《圣经》里的犹太人和穆罕默德时期的阿拉伯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这主要由于德国全民一致认为，自己是被上帝特别选派的种族，身负征服世界并最终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

大力鼓吹以上思想的主要有两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和兰普莱希特，其后还涌现了不可胜数的诸如张伯伦之流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充斥着此类观点，最好地反映了集体心理均衡状态的崩溃，在20世纪一系列集体疯狂事件中堪称之

最。

在特赖奇克眼中，历史的发展不过由众神操纵，旨在捍卫新教教义。他认为，世界必将为德国人所征服、主宰，因为这个民族是由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变得强大，而这场改革本身便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开端。

特赖奇克的某些观点并不这般幼稚、自大，多半甚至还有些道理，如下列这段：

决定国家命运的是行动，不是思想。但是，没有指导思想的行动同没有行动一样，终将毫无建树。特定宗教和政治思想一旦出现，必将随之改变国家的命运。

特赖奇克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他表达了德国精神的最高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并不如他所想的是源于新教教义，而是基于普鲁士军事制度。

特赖奇克基于神学理论论证了德国的优越性，而兰普莱希特的观点更为唯物主义。不管怎样，后者与前者主要目标一样，都是为了证明德国民族命中注定将改造世界。兰普莱希特并不认同神的旨意一说，他认为人类是自我的主宰，天主教与新教不过是落后的信仰，终将被某种信

仰所取代。

兰普莱希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历史的最重要因素，他还大力颂扬了德国的工业进步。他同时声称，在国家间的和平竞争中，一旦竞争一方有足够能力对另一方强加自身意志，就将必然引发战争。（此处需指出，这是德国最流行的思想之一。）

毋庸赘言，兰普莱希特和其许多同僚一样，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不仅呼吁政府的全面干涉，而且指望政府担负起一切行动，包括战争。他的伦理体系与纳粹的非常相似，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当作无用与过剩的事物全然抛弃。

兰普莱希特提出的征服方案也明确昭示，德国学者们是如何在国民之中煽动野心的。他认为，德国应该吞并瑞士、荷兰、比利时；对于智利、巴西等不易征服的国家，应在该国建立学校、银行、工厂来加速其德国化；至于俄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尽管暂时还无法使其臣服，但今后会采取同上手段将其德国化——总而言之，德国将最终统治欧洲乃至全世界。

以上类似内容其实还有许多，因为许多学者

们都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想法还有一丝天真，例如吉泽布雷希特（Giesebrecht）的以下言论：

主宰世界是德国的特权，因为德国是一个高贵的国家，德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德国应当像每一个能力、智慧超群的人对待身边的庸人一样，行使好对邻国的权利与义务。

更有甚者，德国知名学者布伦奇里（Bluntschli）进一步指出：

德国对涉足的任何活动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德国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条约。

为了迎合公众，其他学者们只能进一步发扬这一观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休斯敦·张伯伦，他据此编纂了长篇巨著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十九世纪的基础》）。据说德皇个人支付给他一大笔创作资金。这部作品的观点虽然事实上并不都是原创，但是尽其所能满足了德国人的骄傲与虚荣心，因此大获成功。作者以一种阿谀奉承的口气重申德国是各国之最，并为先前的侵略而感到愤恨不平：

德国人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到斩草除根。这种宽容导致的后果就是种族混杂……

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像这位作者一样，那我们就会认为，罗马人先前没有把所有日耳曼部落淹死在沼泽中或烧死在树林里，而只是杀死了几十万人，真是太可惜了。如果罗马人根除了日耳曼人，世界文明将大大不同于今天，历史上也根本不会有中世纪存在。

我在上文中引用的段落已充分展示，随着这种心理发展，德国最终宣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上文也充分证明，追究到底是哪位君主发动战争毫无用处，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场战争或许可能被推迟，但却无法受到阻止。

### 3 霸权理想的经济与军事渊源

如果仅仅是在理论上设想其种族优越性，德国人还不足以想要实施全球统治，因为这种设想最初什么也不是，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美梦罢了。但是，德国军力增长与工业发展成了两大重要支柱，共同促进了这个梦的实现。

德国军队在1871年时共有401万人，随后逐渐增至815万人，海军舰队也不断地改善装备，



如今足以匹敌英国海军。

德国的霸权理想由军力的巨幅增长奠定了基础，随后便迅速席卷全国，在全民心中形成野心，这种野心自开战以来便可见于德国外交家和宣传家的各种言论中。

1914年11月16日，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构想：分割比利时、占领英国在刚果的殖民地、占领法国边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等。（他没提到吞并意大利和西班牙，应该只是忘记了这两个国家。）而奥斯特瓦尔德

（Ostwald）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则并没有前者如此强烈的野心，他仅仅提议摧毁英国舰队、消灭欧洲其他国家的全部陆军力量。

德国学者尽管设想各不相同，但却一致认为，德国应该接管那些“无权继续存在”的小国。

由于筹备战争的传统方法可能缓慢，因此一个名叫菲罗特（Vierordt）的教授在为《巴登报》撰写的文章中颇具独创性地指出，当务之急是成百万地屠杀德国的敌人，将征服的土地变成净土，专供富有美德的德国人繁衍生息。

这些文章更有趣之处在于其充分反映了作者

们的心理——渴望完全摧毁欧洲。毫无疑问，奥斯特瓦尔德的追随者们主张把欧洲未受战火摧毁的地区开发成大型工厂，用普鲁士无情的鞭子驱使百万奴仆辛苦劳作，以供养全体德国人，尤其是它的诸多学者们。

## 4 德国神秘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

我们已经说明，是何种作用力引起了德国的霸权思想，这种作用力源于什么样的物质基础。许多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德国野心中神秘主义的一面，因为这种虚妄的梦想确实具有现实基础。例如，科斯特列夫（Kostyleff）在一篇重要评论中表示，他看不到神秘主义对现代德国心理有任何影响。他甚至进一步质疑，在当今的时代中，神秘主义信仰是否还能普遍适用。

我非常担心他与许多持同样意见的人一样，并不清楚我们所说的神秘主义的概念。在上文中，我已经解释了神秘主义的含义，我的读者们也应该已经了解神秘主义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虽然神秘主义的重要性至今仍未获得足够认可，但是在当前战争中，许多作家都清楚地指出了它的影响，例如法国的谢弗里荣（Chevrillon）。下文是他关于德国神秘主义研究作品的部分节选：

上帝的选民？这个表述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自大、神秘主义的集体思想，与历史上其他推动力一样对全世界构成巨大威胁，甚至更加危险。因为伴随着这种思想发展的不仅有相关学说，更适合德国的实力与胃口。

德国人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永恒力量的最高体现；德国人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上帝的精神打破了一系列旧形式，旨在赋予其新生命……这些思想牢牢占据了德国人的头脑并滋长了他们的骄傲自大，它决定了德国人的天然倾向，使他们认为基督教传统伦理是束缚他们脚步的障碍，使他们认为德国的贪婪实际是前进动力，使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完美是德国人的本能。

在德国人眼中，只有一条法则：生命的职能不是追求善良与真理，而是获取力量完成生长、发展甚至自我超越。鉴于这一目的，憎恨、对抗、消灭、侵吞其他外来或弱势种族都是公正合理、势在必行的。

神秘主义思想对人的引导正是如此。尽管文明的整个进程都是在遏制人类的原始本能，德国哲学却使得人们重新对这种原始本能产生兴趣并加以推崇。在德国人眼中，武力就是一切，宽容与怜悯没有任何地位。一个优越民族并不会像其

他民族一样，甘心接受普遍原则的约束。与一个上帝选定的种族斗争，便是与上天的旨意斗争，这项罪孽如此深重，什么严酷惩罚都无法弥补。

长期以来，这些学说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但是学者群体们缓慢地将其灌输进德国人心中，将其变为屠杀和破坏的真正根源，为文明世界带来了恐怖。意大利学者西格诺尔·帕雷蒂（Signor Pareti）如是说道：

德国人信仰其文化和使命，信仰自己是上帝选定来统治世界的，信仰自己优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种族——这才是战争的真正根源。这尤其从神学与形而上学意义上赋予这场冲突以宗教战争的特征。对手并不仅仅是敌人，也是异端、是德国神圣文明的亵渎者、是违背万神旨意的罪人。对于这样的敌人，仅仅征服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摧毁。比利时胆敢拒绝德国的神圣大军跨过其领土，简直就是逆天的罪行。因此他们是背叛众神的罪人，必须受到正义的惩罚。

## 5 心理因素在战争爆发中的作用概述

浏览过本书中有关战争远因章节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章节中仅仅提及生理、心理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却丝毫未提及理性因素。这是

因为理性与当前的战争以及历史上的多数战争都毫无关系。当然，作战过程中或许需要理性一定程度的参与，但是理性并不是战争的成因。因为理性仅仅屈从于神秘主义和心理冲动的必要产物，理性是奴隶，而不是主人。

如果我的读者受到理性主义学派的过多渗透，从而无法立即理解我所陈述的事实时，我建议他们回忆一下战争的起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许能够得出与我类似的结论。此处我将不再探讨经济因素，而是探讨那些激发各国军队士气的心理因素，包括那些情感的、集体的和神秘主义的动机，但却不涉及任何理性因素：

①奥地利。促使奥地利参战的情感力量主要是对塞尔维亚人的强烈种族仇恨。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人利用欧洲的和平努力在其强大邻国中进行煽动挑唆，将矛头引入奥地利境内，导致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Francis Ferdinand）遇刺。因此，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这个小国的仇恨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国内公共舆论最终演化成为一种渴望战争的强大集体作用力。

②俄国。情感力量在此处以一种自尊心受伤、仇恨积聚的形式发挥作用，因为奥地利占领

了波斯尼亚。此外，俄国还怀有一种恐惧，害怕塞尔维亚若受到攻击，俄国将在斯拉夫人中失去一切威望。

③法国。法国的主要情感力量是荣誉感，尽管法国对盟国的处境毫不关心，却出于荣誉感而不得不与其联手。此外，法国还受到了席卷全国的集体情感影响——法国人民再也不愿忍受德国人的傲慢自大。

④英国。英国保卫比利时起初是出于情感动机，之后是出于道德义务，因为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英国经由条约所保证的。除了这种正义感之外，英国也担忧德国这一劲敌将占领安特卫普、切断英国贸易通道。

⑤德国。德国自始至终的动机都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总体说来：德国希望再次羞辱俄国、让其束手就擒，从而向欧洲昭示自身的霸权威力，正如奥地利数年前吞并波斯尼亚一样。战争一经宣布，那些为酝酿战争而积累的神秘主义因素便统统爆发了，这些因素全部源自德国统治世界的理想。

在之前的总结中，我已经说明了理性因素在战争初始的微小影响。对德国而言，这一事实尤

为明显。因为如果理性逻辑能在人们的意志中发挥作用，就会指引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冲突。实际上，德国工商业发展、国民向世界各国流动渗透，很快便能带给本国很多靠武力无法获得的利益。这一事实非常明确，已经无须反复强调。从理性观点看，德国曾经有意阻止战争，但最终还是受到神秘主义作用力的完全操纵。（在另一本书中，我已经说明神秘主义能在各种层面完全凌驾于理性之上，此处也可以再加入德国的事例。）在神秘主义面前，任何事物都不得不屈服。

我们对战争远因的研究至此告一段落，结论已经很清楚，以至以下再要在其他章节中探讨战争的近因，对读者而言都已经显得有些多余。

尽管再追问这场战争——德国人已经长期宣扬其不可避免，为何要在某一时间而不是另一时间点爆发，实际上都毫无用益。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看来，最有趣的莫过于研究情感的结合、升华及其在特定时刻对战争的催化作用；最令人触动的，则莫过于目睹那些爱好和平的外交家是如何奋力对抗将他们拖入可怕战争的强大力量。在时代变迁中，要见证无意识作用力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或许再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好的机会了。

# 卷四 战争的近因

## 第一章 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和外交谈判周

### 1 外交文件中的心理教训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目前唯一可供考据的官方文件即各国大使提交给本国政府的报告。它们被编成一系列出版物，分别叫作蓝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

蓝皮书几乎全是英国驻外大使与其外交事务大臣之间的通信，该书英文版首先在英国政府发行，接着又在其国内发行了法文版。随后，该书的另一版法文译本也在巴黎出版，仅与前一版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有些差异。

黄皮书则是法国方面的外交资料，其中囊括了法国政府收集的各类文件。该书有两个版本，法文版仅仅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发行，英文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并做了一些增补。

此外，比利时发行了灰皮书，德国发行了白



皮书，但都并未收集到多少资料，俄国的橘皮书也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因此，我在本书中引用的内容基本全部出自蓝皮书与黄皮书。这些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学价值，不仅证明了情感和神秘主义冲动完全凌驾于理性之上，更展现出要政府违背初始意图决策是多么容易。

德国和奥地利因为一系列心理学错误而卷入了这场战争。德国原本认为，法国、英国、俄国根本不会介入战争。但是，后来当德国看见俄国不仅没有在其威胁面前止步，而且开始进行战争动员，便担心俄国可能将在战备上抢先一步。同时，德国政府听从军方的建议，在坚信英国将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要求俄国解除战备状态。当这一要求遭到俄国拒绝后，德国对俄宣战便不可避免。

虽然我用了以上很短的一小段内容总结了事态发展，但其绝不是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很快将会看到，人并不能在一天之内便下定决心，也不能立即形成固定想法。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读者将看到，起初打算远离纠纷的英国政府在最终下决心介入战争之前是多么犹豫不决、不知所措；读者还会看到，德国皇帝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罔顾自身利益发动战争的。

要在官方文件中读到这些内容，只需花费一点注意力。但是，这些文件表述非常模糊，经常将主要观点隐藏于次要事件之中，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选取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片断，并从心理学角度为其归类。出于这一目的，我按照不同的表现主题做出了文件摘要，诸如英国的犹豫不决、奥地利的毫不退让、奥地利认为俄国将保持中立的错误观点等。

关于外交谈判周的文件资料并不包含战争的远因，因为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探讨过这一问题。因此，如果单看这一部分而不看其他内容，可能会对战争的真正根源不甚了解。这些文件只是单纯地反映了各国的外交努力。阻止水滴继续落入杯中，否则水迟早溢出。但这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究竟是谁在一直缓慢地往杯子里注水，而不是谁往里面倒了最后一滴水。

各国的外交工作尽管仅仅持续了一周时间，但这短短一周却足以改变世界历史。

如果一个作者没有其他文件资料，所掌握的仅限于这些外交书信的话，他可能会认为根本没有人想发动这场战争。事实上，确实没有人真正想要这场战争，也没有人不害怕爆发战争。尽管如此，战争最终还是来临了。这也证明：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们在面对那些激发公众狂热的棘手问题时，究竟是多么的无力。在签订战争宣言的君主中，四个中有三个是独裁者，是陆地与海洋的绝对主宰。但是，他们的专制权力并未能在此发挥一丁点儿作用，因为君主们的意志不全由自己掌控，同样要受到命运的操纵——古人将命运称为诸神与人类的共同主宰。

在从外交信件中收集所需信息之前，我将首先简要地梳理一下外交谈判周期间的一系列事件。

## 2 外交谈判周

外交谈判周自1914年7月23日起，至8月1日止，最后终结于一场注定将改变欧洲面貌的战争。因此，这一周算得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之一。

下文是这一周内每日事件的简要总结：

周四，7月23日。各国都已知悉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遇刺杀。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主要敦促塞方接受奥匈政府派遣的联合代表团，在该国“镇压可能破坏奥匈帝国领土完整的后续活动”。

周五，7月24日。俄国要求奥地利在最后通牒中放宽对塞尔维亚的时间限制。德国驻法大使宣布，德国希望将冲突限于塞尔维亚境内。

周六，7月25日。奥地利拒绝延长对塞尔维亚的时间限制。英国提议与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进行调停。英国声明将保持中立，德国听信。

周日，7月26日。为了支持塞尔维亚，俄国对奥地利采取干涉措施，并要求德国配合。奥方向其国内下令局部动员。

周一，7月27日。根据蓝皮书所述，德国大体同意由四国对奥地利和俄国进行调停。但是根据橙皮书内容，德国驻法大使“坚持主张排除一切调停或协商的可能性”。

周二，7月28日。奥地利下令全国动员并对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对奥方毫不妥协的态度表示支持。俄国随之要求英国介入调停。

周三，7月29日。德国似乎暂时倾向于和平解决方案，建议俄奥重启对话。由于奥方无视外交协商努力而发动国内动员，俄方也下令在奥边境发起局部动员。德国警告称，若俄方不停止战

争准备，德方也将发起战备动员。俄方称其尚不明确奥地利的态度，因此不能同意德方要求。

周四，7月30日。俄国表示，如果奥地利能够证明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符合欧洲利益，俄国便会停止战争准备。

德国驻俄大使见战争不可避免，大受触动，恳请俄国外交大臣提供可作为最后一线希望的任何提案，由驻俄使馆电报发回德国政府。

周五，7月31日。俄奥重启对话，后者接受了英国的基本调停方案。与此同时，德国宣布，俄国的军备迫使德国不得不采取相同措施。

周六，8月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在12小时之内解除动员。奥重作表态，宣布愿意接受欧洲对奥塞冲突进行干涉。

俄国再次做出避免战争的尝试，其声明如能确保塞尔维亚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俄国将就此罢休。

但是为时已晚，当晚七时，德国对俄宣战。

周一，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

接下来，我将花费一些篇幅研究以上事件，尤其是这些事件背后的心理学因素。

### 3 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怨恨和对其开战的决心、奥方在谈判期间毫不妥协的态度

奥匈帝国采取双君主立宪制，遇刺的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正是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奥地利将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归因为塞尔维亚人的阴谋，长期对其怀有怨恨，最终还以明显不可接受的措辞向奥地利发去一份最后通牒。其中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即塞尔维亚有义务“接受奥匈政府派遣的联合代表团，以在该国镇压针对奥匈帝国领土完整性的破坏活动”。

诸国刚刚知悉这道最后通牒，便意识到这不过是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的借口罢了。

1914年7月23日，法国外交大臣获悉：

根据法国驻维也纳大使所收集的情报，奥匈帝国的首要意图是向塞尔维亚进一步施压，同时保持八个军团随时待命。

7月24日，法国驻俄大使提请国内注意这一事实：

最后通牒给出的时间非常有限，以至于协约国如果想对奥地利加以约束，将变得更加困难。

无论如何，外交家们并未对奥地利的意图抱有任何幻想。英国驻奥大使在7月24日写道：

俄国临时代办今天上午会见奥外交大臣并表示，依其个人观点，奥方最后通牒的起草形式不仅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措辞也较为反常和专横。奥外交大臣则回应道，已收到指令，除非奥方的主张在明天下午四点之前被塞尔维亚完全接受，否则奥军将不会撤出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政府惊恐万分，便表示将应允奥地利的一切要求。但是这种让步毫无用处，就此我们可以参见英国驻德使馆临时代办7月25日提交给国内政府的报告，其中涉及他与德国国务卿的会谈结果：

国务卿表示，他不知道奥匈帝国蓄势待发所为何事。但是他承认，奥匈帝国意在采取军事行动，希望给塞尔维亚一点教训。

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在7月25日报告本国政府：

奥地利政府已下定决心对塞尔维亚严加羞辱，因此，其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干预，直到行动确已实施并切实令塞尔维亚尝到苦果。

就奥方的意图和态度，所有驻奥大使都持同样观点。7月27日，英国驻奥大使写道：

我与其他国家驻奥大使都做了交谈，我们一致感到，奥方既已起草了这么一封照会，便是明显意在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为了给自己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正名，奥方发布了以下照会：

塞尔维亚长期作乱，妄图将南斯拉夫从奥匈帝国治内分裂出去，并与之联合组成大塞尔维亚国。塞尔维亚国内所有宣传媒介都一直为达成这一目标，在不同场合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大肆鼓吹。直至这一问题最终到达顶点时，危机就爆发了。

在奥地利的强硬姿态面前，塞尔维亚越来越感到不安，最终表示将接受奥地利的所有条件。英国驻意大利大使在7月28日的电报中写道：

今天上午我和塞尔维亚驻意大利临时代办进



行了一场历时较长的谈话。他告诉我，如果奥方能够对塞方就照会第五条、第六条中关于奥地利干预形式的内容稍作解释，塞方可能接受整个照会。

但是，奥地利政府却依然保持强硬态度。7月28日，英国驻奥大使电告本国政府：

俄国大使告知我，俄国向奥政府建议，由俄国外交部部长与奥地利驻俄大使直接讨论解决奥塞冲突，但是这一建议遭到奥方断然拒绝。

由于奥地利的毫不妥协，英国外交大臣不得不在7月29日的照会中承认：

根据从维也纳和柏林获悉的所有消息，我只能推断奥方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调停了。

奥地利既已昭示行动方案，又没有耐心等待外交谈判得出结果，便于7月29日对塞宣战。整个过程中，奥地利看似对于开战怀有迫切愿望，这反映在7月29日英国驻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的急件中：

我认为，奥地利的计划绝不仅限于惩罚性地占领塞尔维亚领土。奥地利大使跟我说，萨洛尼

卡在希腊管辖下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他还提起，希望不满于塞尔维亚统治的伊斯兰人对奥军提供支持。

相较于塞尔维亚这个小国，奥地利的兵力已经非常强大，奥地利现役军队似乎足以轻松取胜。尽管如此，奥方似乎预见到问题并不如想象中简单，便不计一切代价发起了全国总动员——7月31日法国驻奥大使的信件中写道：

奥匈政府今晨下令，全国19岁至24岁的男性全部进入军事动员状态。

## 4 德奥认为俄法军力太弱、无法介入战争

为何在盟友德国的支持下，奥地利采取了如此强硬的态度？为何奥地利主动参与一场有关存亡的战争，而参战目的却看似如此无足轻重？

推动奥地利做出决策的，主要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原因。奥地利和德国坚信，作为唯一利益攸关方的俄国并不会出手干涉。这是因为，早在数年前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时，俄国除了抗议并未采取任何对抗措施。除此先例以外，今天的塞尔维亚根本没有波斯尼亚重要，俄国便更不可能有所行动了。

以上这一判断便是战争最重要的近因之一，奥地利若不是认为没有国家会出兵保卫塞尔维亚，或许不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

从以下一些官方文件的选摘中，读者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对于诸国中立地位的观点：

法国驻奥大使在1914年7月15日写道：

部分维也纳报纸称，法俄两国在欧洲事务中根本没有发言权，更不可能进行军事干预。正是怀有这种看法，再加之德国的支持，奥匈帝国便自信地认为，可以轻而易举、随心所欲地入侵塞尔维亚。

7月25日，法国驻德大使也提出同样观点：

比利时外长对事态发展表现得十分焦虑。他认为，奥地利和德国希望利用好当前的综合形势，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各国都无暇顾及此事——俄国和英国目前国内问题重重，法国国内也正在就军队制度争论不休。

英国驻奥大使也在7月26日报回国内的文件中表示：

我询问德国大使，俄国政府是否可能迫于公

共舆论，为了同一民族的利益而出手干涉。德国大使就此问题表示，一切都取决于俄国外交大臣其本人性格。……他认为，俄国外交大臣不会轻率行动，因为这一行动可能引发更多与俄国利益攸关的边境问题——瑞典、波兰、罗马尼亚、波斯等种种问题都会乱成一锅粥。此外，他还表示，法国的国内情况目前也不允许法国参战。

英国外交大臣也获知相同讯息，并于7月27日向英国驻俄大使电报表示：

据有关消息称，德国和奥地利认为，只要奥地利允诺不夺取塞尔维亚领土，俄国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英国驻德大使在7月28日的报告中写道：

奥地利大使今日告诉我，爆发全面大战几乎不可能，因为俄国既无立场参战，也无胜算应战。在我看来，许多人就此都持同样观点。

英国驻意大利大使在7月29日写道：

……他（此处指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补充道，要令德国相信俄国态度是认真的，似乎还有困难。但是，德国非常热切渴望与英国保持友好

关系，因为德国担心英国将与俄、法联手行动。

法国驻意大利大使在7月29日也写道：

.....奥地利与德国依然坚信，俄国不会参战。

无独有偶，英国驻奥大使也同样指出：

德国大使于7月24日告诉我，他相信俄国将不会进行干预。

## 5 德奥坚信英国将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正如我们所见，德奥认为俄、法不会介入奥塞冲突，也同样坚信英国将保持中立。事实上，这完全不可能。英国驻俄大使7月25日发出的电报中就此表示：

.....很遗憾，德国居然指望我国保持中立。

英国外交大臣也在7月27日的另一份急件中表达了同样观点：

俄国大使告诉我，德国和奥地利外交官们普遍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我国都将袖手旁观。

法国驻英临时代办也在当天表示：

德国和奥地利大使一直主动对外宣称，一旦战争爆发，他们相信英国将保持中立。

由于比利时领土受到侵犯，英国最终参战。尽管如此，即使当英国已确实介入，德国依旧幻想英国将保持中立。

## 第二章 英国起初的反战情绪

### 1 英国强烈排斥卷入战争，以至于起初拒绝在战时支援法国

思虑缜密的人很少做出草率决定，尤其是当他们必须彻底抛弃原有立场，采取完全崭新的观点时。因此，心理学家饶有兴致地研究：在几天时间内，英国外交大臣的心理状态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系列变化，能够使其不再强烈反感战争，尽管再三犹豫，却最终宣布参战。

此前的外交文件只为事态发展提供了一些时间节点与标志性事件，其中未能充分体现英国外交大臣、英国议会及英国人民观点变化的具体过程。冯·比洛亲王指出，德国在政治与心理上都极度欠缺考虑，若非如此，德国本应不会如此粗暴

地伤害英国人民的感情。

现在，让我们看看官方文件的说法。英国外交大臣于7月20日的信件中清楚地表明了对英国介入战争的看法：

我痛恨诸国之间的战争，任何国家若因塞尔维亚卷入战争，都会令我感到厌恶。

我们还应该记住，不像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英国对法国并不负有任何书面条约或口头协议的义务。因为，尽管法国大使在1912年间使尽浑身解数，却无法从英国外交大臣处获得一丝进展，后者回信直接表示，英国不会介入任何冲突。

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在7月23日写道：

如果奥地利、法国、俄国、德国这欧洲四强参战，那么在我看来，这将带来巨大损失——不仅对贸易造成影响，也将引起欧洲信贷与工业的全面崩溃。对于今天的工业大国而言，这意味着情况可能比1848年更糟。无论谁是胜者，都免不了遭受惨重损失。

英国驻各国外交代表都必定得到指示，要求

其采取较为沉默与保留的态度。英国驻俄大使在7月24日给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写信，告知了自己与法国驻俄大使的谈话内容，并表示：

我个人认为，英国政府绝无理由宣布将无条件地对俄国和法国提供武力支持。英国在塞尔维亚并无任何直接利益，英国公众也不会支持为该国产战。

英国外交大臣在7月25日对此信件的答复如下：

我认为，英国公众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支持英国为塞尔维亚问题介入战争。

就法国大使要英方承诺提供支援的恳请，英方于7月29日做出以下回复：

当前在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中，我国并不认为需要采取立场。即使其演化为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矛盾，我国也不认为有介入的必要。该问题涉及德国人与斯拉夫人围绕巴尔干统治权的斗争，而英国的想法则一贯是：我们将力图避免因为巴尔干问题而卷入战争。

尽管法国总统亲自出面，英国政府依然拒绝



承诺给予法国支援。英国驻法大使在7月30日写道：

法国总统坚信，各国和平与否最终掌握在英国手中。如果英国政府声明，一旦法德由于当前奥塞矛盾爆发冲突，英国将站在法国这边，战争便不会爆发——因为德国若听到这一声明，势必将立即改变态度。

我向总统解释，英国将很难做出上述声明。但是他仍然表示，为了维护和平，他必须坚持这一主张。

英国非常坚定地反对加入战争。从法国总统与英国国王之间的书信看来，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德国相信英国想要参与战争。当德国8月1日对俄宣战时（次日德国即对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英国国王在当天给法国总统的回信中的措辞彬彬有礼，但是表达意思模糊。以下是该信件的节选：

为了得出能够推迟军事行动的任何方案，并为列强最终通过和平谈判争取时间，我已对俄国与德国的君主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至于我国的态度，由于事态变化太快，现在还很难预见未来发展。但是您可以放心，我国政府将秉持自由与

坦率的态度，与贵国就任何有关双方利益的问题保持沟通。

## 2 英国为避免欧洲爆发战事所做的努力

爱德华·格雷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爆发，并就此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在各国间平息纷争——有些是其个人的直接努力，有些则是通过驻外大使做工作。起初，他认为最佳解决方案是建议塞尔维亚接受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他在7月24日写道：

如果说要在最后期限之前阻止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就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其一切条件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唯一的机会便是，塞尔维亚不要完全拒绝德方的全部要求，而在时间限制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予以顺从。……我已敦促德国大使要求奥地利不再加快军事行动。

所有大使都对各国做出类似表述，尤其是德国。英国驻俄大使在7月29日的文件中写道：

德国大使请求我对英国外交部做出有利于缓和局势的建议，我告诉他，从一开始我便没有停止过这种努力，现在轮到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发挥这种约束力量了。我还向德国大使明确表示，由

于俄国如此热切，如果塞尔维亚受到奥地利攻击，一场大战将不可避免。

英国政府关于协商解决的提议并未获得有关方面的认可。7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宣布其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建议：

我敦促德国政府提供有效建议，以促使四国联合发挥作用，阻止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法国同意了，意大利也同意了。

即使当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时，英国外交大臣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反而在8月1日写道：

我依然认为，若能在列强开战之前争取一些缓冲时间，还是有可能确保和平的。俄国政府已告知我，奥地利已愿意与俄国协商，也愿意接受俄国的基本调解方案。

但是，这一切都晚了！

### 3 德国如何看待英国在战争爆发中的责任

上述的资料已经不容辩驳地显示，英国人是如何痛恨战争。但是，德国人却未能真正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只需引用德国首相在国会的演

说，便能够证明：情感与神秘主义的因素究竟是如何使明白无误的事实变得软弱无力。从这种观点看来，德国首相在1915年8月底的这场演说非常奇怪，反映了德国人民的共同观念——全盘接受政府告知他们的一切，并认为自己的观点完全正确。若不是我刚才提到的心理因素，德国首相的这种盲目或许令人费解。但是他显然并非蓄意扭曲事实，因为他知道历史将会记录下这一切。

他的演讲包括了诸如下列的主张：

敌人的全部企图即归咎我们有战争野心，同时自称热爱和平，但这一切企图在公开事实面前都以失败告终……

显然，如果我们能够同英国达成维持和平的真正协议，本可避免目前这场正在摧毁世界的战祸。

为了将英国描述为战争的蓄谋者，他又说：

英国在摩洛哥问题上频频插手我国与法国的谈判，以便向每个人昭示它统治世界的目标，这极大地威胁了世界和平。

如果首相不是如此盲目，他或许会就最后这

点指出：“其实是德国意在统治世界，从而威胁到了世界和平。”正是在此刻，也只有在此刻，法国终于意识到，要避免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 第三章 英国国内心理的演变

### 1 英国政府的心理变化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见，英国政府是如何奋力避免被卷入塞尔维亚冲突，又是如何顽强地为欧洲和平而进行干预的。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在短短一周内，热爱和平的英国人是如何转而支持战争的。

这种变化的发生源于德国方面的心理错误。根据其外交官的报告，德国政府相信：英国正在爱尔兰遭遇严重危机，并不希望介入一场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任何好处的战争。因此，德国应该通过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以便更快地剑指法国，这才是更加可行的办法。正是由于德国缺乏判断力，最终为其招来强大的敌人。

要研究英国立场的发展变化，我们应首先参见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7月31日时还犹豫不决的函件：

我已经告知法国大使，我们不能明确表态介入战争。我还告诉他，我们当下不应做出任何承诺，但如果事态出现新发展，我们一定会重新做出考虑。

法国大使随后试图说明，英国的决策将对德国产生何种影响。格雷的态度变得更加确定，但仍然拒绝做出任何承诺。他在7月31日写道：

法国驻英大使康邦（Cambon）今天提及一封已经出示给亚瑟·尼克尔森（英国外交次长）的电报。这封电报今天早晨来自法国驻德大使，其中提到：英国对于是否介入冲突的不确定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德国，如果英国能够明确宣布对俄国和法国的支持，德国将会不得不重新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我（对康邦）表示，英国的内阁今天已经做出决定：英国目前不会提供任何承诺。尽管我们应当将这一决定提交议会审议，却还不能提前向议会做出表态。至今为止，我们和我国公众都没有感觉到，英国在此事上受到任何条约或义务的束缚。当然，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并改变现状，政府与议会也可能会认为有正当理由进行干预。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可能是——我不会断言，我们态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康邦再次重复了他的问题：如果德国对法国发起进攻，英国是否会支援法国。

我说，我只能坚持给出这样一个答复：只要事态保持目前形势，我国将不会介入。

德国大使也拒绝就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做出任何保证，爱德华·格雷在8月1日写道：

今天我告诉德国大使，德国政府就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的答复令英国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英国非常在乎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如果德国能够像法国一样明确保证不会损害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就会大大减轻英国的不安与压力。如果作战一方尊重比利时中立，而另一方则对之加以侵害，英国公众将会对此反应强烈。

英国方面显然已经动摇了，原来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8月2日的一封函件中，法国驻英大使向法国政府汇报：

在今天上午英国内阁会议结束之后，格雷阁下递给我以下备忘录：本人经授权做出如下保证：如果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并对法国海岸或舰队发起攻击，英国舰队将在能力范围

内给予全部保护措施。当然，这一保证的前提是本国内阁决策获得议会通过；此外，直至德国舰队采取上述行动，这一保证不应视为对英国政府具有任何拘束力。

但是，这只是开端，因为这不是英国对德国的宣战，而只是承诺英国舰队将为法国舰队提供保护。如果英国止步于此，德国或许能够克制自己不对法国海岸与舰队发动袭击，从而避免遭到英国的报复。但是，英国方面的心理正在经历持续变化，到了8月4日，英国驻比利时公使根据国内指示向比利时政府致信：

我受命通知贵国政府：如果德国对贵国施压，强令贵国脱离中立状态，英国政府希望贵国能够用尽一切手段给予反抗，英国将提供支援。

如有需要，英国也将愿意联合法国与俄国支持比利时对抗德国的武力入侵，并在将来确保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地位。

事已至此，英国便无法回头了。8月4日，法国驻英大使如愿以偿地给政府发回电报：

格雷阁下刚刚召见我并表示，首相今天将在下议院宣布：英国要求德国收回对比利时的最后



通牒，并要求德国在今晚午夜之前做出回复。

德国原以为英国将保持中立，获悉这一决定后顿时陷入惊愕。德军已经入侵比利时，要撤回军队几乎不可能了。英国驻德大使的报告具体描述了德国首相对此的悲哀与尴尬：

我发现首相极为激动，他立即开始慷慨陈词，至少讲了20分钟。他表示，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简直可怕到了一定程度——只是为了中立这个在战时常常毫无意义的说法，为了一纸空文，英国便对德国这样一个如此亲近与友好的国家开战。由于这最后一击，他为两国友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他一贯致力推行的所有政策都像纸牌屋一样坍塌了。英国人的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就好比在一个人与另外两个对手进行殊死搏斗之际，在其背后给予重重一击。他认为，英国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可怕事件负责。

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我表示，既然德国首相本人希望我能了解，进攻比利时并破坏其中立地位对德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因此我也希望他能了解，这个问题对英国的荣誉而言也是生死攸关的，一旦比利时受到入侵，英国必须郑重宣布尽最大努力捍卫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一神圣的契约必须得到遵守，若非如此，未来还

会有哪一个国家对英国的承诺抱有信心？……当我准备离开时，首相又说，英国加入敌对一方给德国的打击尤为沉重，因为直到最后一刻，德国政府都一直在为维护俄奥和平和英国全力合作。我也表示，目睹英德两国在关系空前友好和睦之际突然决裂，这是个悲剧。

将德国与英国完全割裂的是关于是非的不同认识，这充分体现在以上戏剧化的函件中，何况我只是节选了一部分。以上两个谈话人完全不能理解彼此，因为中立国地位这“一纸空文”对其中一人意义重大，对另一人却毫无意义。

## 2 英国公共舆论对战争态度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外交大臣的和平主义态度在短短几日之内是如何变化的。当然，他的新观点必须为国王和议会接受，没有后面两者的同意，英国是无法宣布参战的。

导致外交大臣迅速改变想法的自然是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但是那些热爱和平又不甚熟悉外交磋商的英国公众又是为何呢？这点极其重要，因为民意在英国无所不能，必须赢得民意。因此，内阁大臣们通过一系列公众演讲开始行动了，媒体随后开始大力配合。

要说服国民为一个无关紧要——几乎没有人知道其名字的巴尔干小国参与战争，并不加任何解释，似乎是一项艰巨任务。无论如何，如果要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必然需要对英国人心理的深刻了解。英国政府最后能够达到目的，并不是通过告知人民他们可以获得什么切实物质利益，而是提醒他们事关国家的尊严和荣耀。换言之，一个大国只有遵守契约义务，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自14世纪以来，英国的政策一直限于对处于英伦三岛和中欧国家之间的国家给予支持。为贯彻这一政策，英国签署了保证比利时中立国地位的条约。“如果我们允许比利时中立国地位被侵犯，我们将会世代蒙羞。”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如是说道。

就此，我将提供一些英国内阁成员在公共集会上的演说内容节选。1914年9月4日，阿斯奎斯（Asquith）先生说：

让我问你们，也问问外面的世界：如果我们足够卑鄙，如果我们去恐吓、去算计、去忽略荣誉和责任、去欺骗世界、去背叛朋友时，我们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誓约与神圣义务遭遇挑战时，如果我们只是忍受，却并未尽全力去阻止这些不能容忍的暴行。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面对祖国良知与荣耀的评判时将如何评价自己？

就我而言，我认为，对于这种武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残忍凌驾于自由之上的灾难，如果我国只是沉默地旁观，我们便实际上自愿成为帮凶，很快，我们自己也将被从历史上抹去。

以下是劳合·乔治在1914年9月19日的演讲片段：

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人比我更不情愿、更抵触卷入一场大战了，因为这种态度贯穿了我整个政治生涯。这个大厅内外，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确信，除非牺牲我国荣誉，否则这场战争将不可避免……国家荣誉是现实的，任何忽视它的国家都将注定衰亡。我们负有捍卫弱小邻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光荣义务。

随后，劳合·乔治提及普鲁士既已签署，后又出于一己私利撕毁条约的事，他表示，国家的生命取决于对条约这“一张纸片”的尊重。

这种纸片其实是一种汇票，能够帮助国家这

艘满载珍贵货物的商船从世界一端驶向另外一端。这些商船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是商人的荣誉。所谓条约，就是国际政治的通货。

德国与英国观点分歧正是在于双方对于国家荣誉持不同理解，因为正如劳合·乔治所说：

德国人能够理解复仇、能够理解为征服而战、能够理解为掠夺领土而战，但是不能理解一个帝国押上资源、儿童的生命和其国家存亡而来保护一个需要它防卫的小国。

### 3 比利时遭受的侵略与破坏对英国民意和志愿军招募的影响

群体几乎不受理性论证的影响，但却对情感或神秘主义的说辞印象深刻。英国公众绝对一致赞成参战，这并不仅仅因为比利时受到侵犯，也因为比利时的城市遭到野蛮损毁、古迹遭到焚烧、人民遭到屠杀，更因为德国侵略比利时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英国人的感情。

即使在德国准备违背承诺的当天早晨，德国驻比利时公使还坚称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8月2日，比利时外交大臣会见了德国驻比公使，他记录如下：

到目前为止，他（德国驻比公使）尚未得到与我们进行任何官方沟通的指示，但是从他的个人态度判断，我们觉得有充分理由对德国保持信心。

我对他表示，在此前多次谈话中，我们对德国意图的全部了解都不允许我们怀疑其对比利时的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说一句，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发表正式声明的必要性，如果德国能发表声明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比利时将非常高兴并不胜感激。

然而，正是在同一天晚上7点，还是这位德国公使提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允许德国军队自由通过其领土。

在见证这种极度背信弃义的行为之后，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外交家们要带着最大怀疑检视彼此的言论，也应当庆幸普通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比国家与国家之间正直一些。不久我们将会看到，各国政府间的极端怀疑也是战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已经了解，德国是如何野蛮地摧毁比利时并无情地屠杀其人民的。比利时难民从被蹂躏的国家纷纷向外逃亡，激起了所有中立国——包

括最初支持德国的瑞士——对德国的反对。各国都怀着最大同情接收了难民们。《日内瓦日报》就此报道：“在听说德国对比利时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暴行之后，日内瓦人民纷纷对难民施以援手，表现出值得赞赏、令人感动的精神。上一周里，天天都有不幸的佛兰芒人和瓦隆人来到日内瓦，他们的家园已被焚毁、被洗劫、被掠夺。人人都在争着为他们提供住所和收留老幼妇孺。这些难民都被迫离开家园，或在逃难过程中失去亲人。他们所经受的，是可怕的不幸，是不可思议的痛苦。”

德国的目标是遵照既定原则，恐吓他国的人民并预防抵抗活动。但是，德国再次犯下了一个心理错误。既然没有镇压住抵抗，德国一切的暴力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激起英国的愤怒，并推动500万毫无作战义务的英国人志愿加入军队。

回顾德国首相就入侵比利时所阐述的理由，其中包含一条德国历史学家普遍主张的原则——“需求面前无法律”。

## 第四章 德、奥、俄、法在外交谈判进程中的各自作用

# 1 俄法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

法国根本未做好战争准备，俄国也一样。当时俄国正致力于修建铁路系统，却尚未获得任何实际成果。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战争。在此我必须重申，奥地利正是坚信这些国家不会卷入冲突，才采取了如此强硬的姿态。

奥地利毫不妥协的态度自最初起就将俄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数年前，俄国为了避免战争而允许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如果现在再一次坐视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必将再无威望可言。然而，俄国仍旧步步妥协，直至德国最终的行为实在令俄国忍无可忍、无法接受。

外交谈判开始之后，俄国对调停的态度最为积极，正如英国驻俄大使于7月25日函件中所述：

俄国认为，塞尔维亚可能提议将此问题提交各国仲裁。如果塞尔维亚真的提请各国介入，俄国将迅速回避，并把问题留给英、法、德、意。

这位大使似乎对这一问题有非常清晰甚至近乎先知般的理解，因为他又提到：



奥地利的行为实际上是针对俄国的，其目的是颠覆巴尔干地区的现状，并建立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Sazonoff）不认为德国真正想要发动战争，但是德国的态度其实是由英国决定的。如果我们坚定地与法国和俄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便不会爆发战争；如果我们现在不与法、俄联合，我们最终必将陷入战争，欧洲必将血流成河。

这段话的预测极为准确。英国拒绝对法、俄明确做出承诺，从而导致德国相信英国将保持中立。在同上一封函件里，另有一段文字清楚地解释了俄国的意愿与动机：

俄国外交大臣向我表示，俄国不可能允许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并在巴尔干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俄国因为有法国的支持而感到放心，便将积极地投身战争。他再次向我保证，他并不希望冲突升级，但是形势将不容乐观，除非德国能够制约奥地利。

但是，俄国未能继续保持如此积极的表态，很快就回归最讨好、最妥协的路线。7月25日，法国驻俄大使电告法国政府：

明天，俄皇将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萨佐诺夫

表现出了最大克制。他告诉我，我们必须避免一切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事情，我认为即使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我们也不应该中断谈判。

俄国这种让步表态，在法国驻意大利大使7月26日的函件中也再次被提及：

萨佐诺夫昨天告诉意大利驻俄大使，俄国正在动用所有外交手段阻止冲突爆发，俄国仍然可能希望奥地利听从各国调解，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尽管如此，俄国绝不可能坐视塞尔维亚被摧毁。

法国驻俄大使在7月26日的函件也再次描述了俄国的缓和态度：

俄国外交大臣还在为最终获得和平解决方案而不懈争取着。他告诉我说：我随时准备前去谈判，不到最后一刻决不罢休。

俄国政府尤其急切地想要阻止战争，甚至表示将愿意考虑做出任何妥协。俄国外交大臣在7月27日写道：

如果无法与奥地利政府直接交换意见，我将愿意接受英国的提议或是任何有助于解决冲突的

此类方案。

不幸的是，由于俄国的这些退让行为，使奥地利坚信俄国将保持中立，并就此认为对塞尔维亚宣战没有任何风险。针对奥地利的这一决策，俄国下令进行局部动员，并在7月28日对本国驻德大使发出指示：

鉴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本政府将于明天（29日）宣布在敖德萨、基辅、莫斯科、喀山的军事区发起动员。请明确告知德国政府，俄国对德国绝无半点战争意图。

即使到了那时，俄国依然没有放弃和平的希望。当日，俄外交大臣发出以下一封电报：

奥地利的宣战明确排除了俄奥直接进行沟通的可能性。英国目前急需采取行动，应该着手开始调停，力图中止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除非军事行动暂停，否则调停可能只会使得事态一路拖延，为奥地利留下摧毁塞尔维亚的充分时间。

经指示，俄国驻奥大使再次向奥提出交涉，但却未能成功，具体可参见他于7月28日的函件：

奥匈政府刚刚表示，尽管有悖于原本意愿，他们却不得不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他们不会后退，也不愿参与任何有关照会措辞的谈判。奥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Count Berchtold）表示，冲突已经加剧，公众也已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即使现在政府想采取其他解决方案，也无从实施。此外，由于塞尔维亚本身并没有体现出足够真诚的态度，这一切就更加不可能了。

即便如此，俄国政府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法国驻俄大使29日给国内发回电报：

我可以断言，俄国政府为了维护和平，将会同意法国与英国的任何提议。事实上，我相信英国大使此刻也正在将相同推断报回国内。

不幸的是，奥地利政府的态度却变得越来越强硬。俄国外交大臣眼见形势随时都在恶化，便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于英国的干预。29日，他向俄国驻英大使发去电报：

从现在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完全依靠英国政府，听任其采取自认为可行的任何行动。

德国起初犹豫不决，此刻似乎也已下定决心参战。7月30日，法国驻俄大使在给国内的电报

中说：

萨佐诺夫今天下午表示，他坚信德国将不会向奥地利明确表态要求维护和平。尼古拉斯二世（俄国沙皇）也持同样观点，因为他与德皇威廉二世已私下通过一些书信。另一方面，俄国总参谋部和海军部都获悉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德国陆军与海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

萨佐诺夫还表示，尽管如此，俄国依然将继续做调停努力。他对我说：我将争取谈判，直至最后一刻。

俄国沙皇也做了类似努力，这在法国大使7月30日发回国内的电报中有所体现，该电报记录了俄国外交大臣对法国大使说的一段话：

沙皇如此迫切地希望阻止战争，以至于我将以他的名义向您做出一项全新的提议：如果奥地利能够意识到，奥塞争端已远远超出两国范畴，事关欧洲各国利益，因此而能够宣布愿意撤回最后通牒中损害塞尔维亚主权的内容，俄国将停止一切战备活动。

可惜为时已晚，奥地利并未退让。7月31日，英国驻俄大使电告国内：

俄国已决定下令全国总动员，这一决定基于俄国驻奥大使发回的报告。报告称，奥地利对各国的干预毫不妥协，正在向塞尔维亚和俄国调集军队。俄国也有理由相信德国正在积极进行备战，如果德国占得先机，这对俄国来说将是不能承受的。

不能让“德国占得先机”，我们应当记住这句话流露出的怀疑情绪。因为正是这种怀疑，使得战争注定不可避免。

萨佐诺夫，这位俄国的外交大臣，最终不得不全盘放弃和平的希望。在一次谈话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无助，参见法国驻俄大使8月1日发回国内的电报：

萨佐诺夫说，他先前为了阻止战争而在一直不断拼命，现在已经心力交瘁。他对任何提议都持开放立场——他接受过四国协商的提议、英国和意大利调停的提议、奥地利与俄国直接对话的提议等。尽管如此，德、奥拒绝了全部方案，并用侵略行径让他的这些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当然，可能有人提出，如若俄国不试图介入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就可能避免这场战争。俄国已经容忍过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占领，为何

这次就不能接受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呢？显然，这次事关俄国的民族情感与威望，只有身处其间，才够资格讨论。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们能够相信，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将极大地损害俄国的利益和名誉，因为这意味着俄国为避免自身受损而任由欧洲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之中。俄国的态度清晰地反映在英国驻俄大使8月1日发回国内的一封电报中：

显而易见，俄国无法忍受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正如英国无法忍受荷兰依附德国一样。

## 2 德国希望保持冲突局部化，直到最后关头仍对挑起全面战争犹豫不决

百分之百地正确判断人类行为的全部真实原因——有时这真是个非常难的问题，因为即使做出行为的那些人都并不总是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至今公开的一些资料显示，德国似乎并不是真正希望发动战争，而仅仅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参战决定的。我将在另一章中解释原因。德国明显不愿对奥地利毫不妥协的态度加以调停，这无疑是由于德国相信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将不会干涉。德国希望借由三国的不作为时抓住机会不

冒任何风险地羞辱俄国，正如此前其帮助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时一样。只要明白了德国的这一如意算盘，便能毫不费力地理解：德国为何授命各驻外大使向各国倡议，共同保证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局部化。

英国驻德国临时代办在7月22日写道：

昨晚我会见了德国外交大臣……他坚持认为，当前这一问题应仅限于在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解决，外界不应介入两国的谈判中。

德国也对法国提出这一倡议。7月24日，法国外交大臣写道：

德国大使提请我尤其注意他的照会中最后两段，因为其中包含了整份文件的最主要观点。我逐字记录了如下段落：

德国政府望强调，在当前事件中，有关问题应当仅限于在奥塞双方之间解决，其他各国应当严格避免介入直接当事方之间。德国迫切盼望该冲突能够保持局部化，因为对他国的任何一个干涉都可能由于不同条约义务而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当时，德国政府似乎非常渴望将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在以下报告中，英国驻德临时代办提到了与德国外交大臣的一段谈话：

德国外交大臣表示，他已对俄国政府解释过，德国最不希望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并将尽全力阻止这样一场悲剧。如果奥俄关系变得危险，德国将迅速接受四国联合调停的方案。

德国似乎非常希望俄国不会干预，法国外交大臣7月27日给各国大使的函件也显示了这一点：

今天下午，德国大使前来对我传达了对法俄两国出于维护和平目的而介入干预的看法。他告诉我，奥地利已经通知俄国，奥地利并不希望扩张领土或损害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奥地利的唯一目标是确保本国的安宁与秩序。俄国是能否避免战争的主要决定因素。德国与法国同样渴望维护和平，并坚定地希望法国利用自身影响力缓和俄国的愤怒。

英国也采取了同样行动。7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写道：

德国政府原则上接受四国在奥塞之间调停的

方案，当然，德国保留了作为盟友为奥地利提供战时支援的权利。德国还要求英国利用自身影响力说服俄国保持冲突局部化，维护欧洲和平。

但是，德国即使要求英法对俄国实施干预，依然认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矛盾不应提交于外国解决，英国驻德大使7月27日发回电报：

德国外交大臣指出，英国建议的协商方案几乎等同于一个仲裁庭，他认为除非奥地利与俄国要求，否则不应召集各国参与。因此，尽管德国渴望同其他国家合作来维护和平，他依然不能同意英国的建议。

奥地利则无论如何都不愿受到外国影响。英国驻维也纳大使7月28日发回电报：

奥外交大臣冷静又坚定地表示，奥方不会就对塞尔维亚发出的照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磋商，奥方今天即将宣战。鉴于奥皇和他自己众所周知的温和个性，可以保证这场战争确实是正义的、不可避免的，必须在直接当事方之间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德国政府似乎仍然希望维护和平。英国驻德大使7月28日发回电报：

今晚，我应邀拜见了德国首相。他说，他希望我能告知英国国内，德国非常热切地希望同英国一起维护和平，正如两国在上一场欧洲冲突中所成功做到的那样。他此前未能接受英国有关多国协商的提议，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这将行之有效。他认为，这种协商其实等同于由其余四国组成最高法院，对当事双方进行审判，因此德国未能接受这一提议，但不是强烈反对进行有效合作。德国已经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都尽了最大努力，一直试图推动俄奥直接、友好地就有关情况进行谈判。

很不幸的是，这些良好意图未能持久，德国很快便将做出可怕的决定。29日，法国驻俄大使电告国内：

德国大使告知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如果俄国不停止国内战备，德国将下令全军动员。萨佐诺夫回答，俄国进行战备，一方面是由于奥地利顽固与毫不妥协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奥方早已动员了三个军团。由于德国大使传达上述信息的强硬态度，俄国政府下令，今晚将增加动员13个军团，做好与奥军的对抗准备。

尽管如此，德国仍对战争犹豫不决。7月30日，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写道：

法国大使从柏林方面听闻，德国驻奥大使受命将向奥匈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抗议奥方意图挑起欧洲战争的谋划。但是非常遗憾，这位德国大使本人非常认同奥地利普遍存在的极端仇俄仇塞的情感，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和平请愿。

有关德国理应在奥地利方面做出的努力，在外交函件中有迹可循。1915年，仅仅在开战一年之后，德国首相才将以下信息报告给国会：

我向我国驻维也纳大使发去电报表示：我们不能再继续要求奥地利与塞尔维亚进行谈判，因为这两国已经陷入战争状态了；但是奥地利不应完全拒绝与塞尔维亚交换看法，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当然乐于履行盟友的职责，但是如果由于奥地利无视我们的建议而把我们卷入全面战争，我们也必定不能同意。……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完全只是由于后来俄国开始战争动员。

这些理由出现得太迟，并且显然并不完全真实。有人曾恰如其分地指出过：如果政府陈述了事实，并且陈述的都是事实的话，就不会再有什么外交了。

那么，德国在外交谈判期间的所有声明都只是在为备战争取时间吗？德国驻俄大使显然对此

持有不同意见。英国驻俄大使7月30日发回的电报称：

德国驻俄大使在今晨两点又拜见了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因为他此时已经因为眼见战争不可避免而彻底崩溃了。他请求萨佐诺夫提出一些提议，以便他能用电报发回德国，作为阻止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萨佐诺夫据此起草并提交给他以下内容：

如果奥地利承认其与塞尔维亚冲突将会影响欧洲其他国家利益，并宣布在最后通牒中删除有损塞尔维亚主权的条款，俄国将承诺停止一切战备活动。

但是，事态发展速度总是超过外交家们的预期。就在此刻，各家报纸刚刚报道德国国内的全面动员。法国驻德大使7月30日的函件称：

昨晚由德皇主持召开的军方会议已决定进行全国动员，这一事实终于让人恍然大悟，各国使尽各种手段（英国宣布保留自由行动的所有权利；俄国沙皇与德皇的书信往来）所得出的解决方案为何迟迟难以实施。

这一僵局并未持续太久，最后的决定性时刻

很快便到来了。8月2日，法国驻俄大使电告本国政府：

昨日晚上7点10分，德国大使向萨佐诺夫传达了本国宣战声明。今晚，大使已离开圣彼得堡。

8月3日，德国驻法大使也向法国外交大臣传达了以下声明：

德国政府与军方都已确定，法国军队已经向德国领土实施了一些公开敌对行为。我奉命通知阁下，鉴于贵国的侵略行为，德国认为与法国开战完全是由法国的过错导致的。

这些当然全是不实托词。德国必须在俄国做好战备之前征服法国，因此必须制造一切借口，刻不容缓地向法国宣战。

## 第五章 大众心理对战争起因的影响

### 1 民意的重要性

在当代，即便是君主都无法对抗民意的力量。民意是缓慢产生的，并为不自觉意志打下基础，这通常比当局的自觉意志更为重要。

在当前战争的起源中，民意并不算是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其影响确实存在。所有国家的外交家都非常重视民意问题，尤其是奥地利；而在与塞尔维亚最无利益关联的英国国内，政府更是注重民意的塑造。

我早已提请读者注意，政治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便是构建情感，并在最后以一种传播手段将其化为集体心理。借由这种手段，德国统治者使得德国人民如此痛恨敌对国家，并轻易地相信：英国和俄国不仅密谋针对德国，而且背信弃义地攻击德国。或许在7000万德国人中，没有一人不持这一看法。要重新还原真相，可能需要至少50年，或等到下一代人和下下代人占据主流。

要想成功地在德国人中激发针对英法的集体偏见，不仅需要个人本身具有强大意志力，也需要拥有强大的宣传工具。事实上，为确保获得期望效果，需要媒体、爱国社团、出版界与学术界的长期合作。在其中，报纸向来是权威的领导者，因为它拥有断言、重复、暗示、声望这一切能够影响群体心理的现成武器。

德国政府尽管强烈倾向于维护和平，却大力支持这种宣传活动，因为这可以为政府提供更多借口提高税收，以满足军队规模扩大之需要。德

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提高德国军队的威名，使得任何一国都不敢做出反抗，从而便可无须通过战争手段而在整个欧洲建立霸权。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方法，因为经验显示，集体观念可能迅速获得巨大的威力，以至于其创造者最终可能再也无法掌控它。

在民意的形成中，媒体可能发挥了最大作用。每当德国政府想要为陆海军扩军征收新税时，媒体便在政府和军工厂的资助下，大量发表宣传文章，宣称法国准备进攻德国并对其复仇。

尽管人们并不总能意识到这点，但民意确实比君主的意志更具威力。当民意明确地做出自我表达时，没有人能够强大到足以与之对抗。

在战争初期，德国显然并不关注中立国的国内感情，但是当其入侵比利时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对时，德国便开始畏惧民意的力量，并在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美国等许多国家收购或创办报纸，试图以此挽回民心。同其他所有方案一样，德国使尽浑身解数，坚持不懈地实施这一设想。但是由于德国人缺乏心理学知识，不能充分把握受众的心理与感情，因此他们反而用了大量夸张的陈述，最终导致读者对其失去所有信任。



## 2 德国的主战派

德国人从来不喜欢法国人，而且嫉妒法国人的古老历史。这种憎恨最近由于种种事情变得更加强烈，尤其是摩洛哥问题。德国媒体更是巧妙地操纵了这一切，并在激起德国公众对法国的仇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黄皮书中收录的以下内容准确地反映了德国人的心态：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由于去年的事件，德国人感到自尊多么受伤、多么仇视法国。1911年11月4日的条约对德国而言，是极大的挫败。

德国每个地区、每个团体都认为法国在摩洛哥夺取了属于德国的那一份，并且一直因此耿耿于怀。

一两年前，德国似乎已经准备好征服世界。他们自认为无比强大、无人能敌，工业、贸易、领土都在迅速扩张……因此，他们将我们法国这个人口4000万的国家视作劣等民族。

主战派在德国拥有众多追随者，但是同样也有许多人支持和平。根据黄皮书中的另一份文件：

就近期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德国公众意见分为两派。首先是主和派——德国有主张和平的势力，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组织，也没有领袖。他们认为战争对德国社会是灾难，仅仅对英国有利。

主战派则又基于阶级地位、学识道德、个人利益和特定主张等被再次细分为几类，但他们大致形成了一个统一意见，并且持续推动战争酝酿。

一些人渴望战争，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前事态下，战争不可避免，德国迟早会陷入战争；一些人认为战争必然爆发，是出于人口过剩、产能过剩、市场贸易需求等引出的经济原因；此外还存在社会原因，这种分歧本身可能预防或者推迟德国国内民主党人与社会党人的势力兴起。

另有一些人对德国的未来没有信心，觉得时机对法国有利，因此认为应该加速战争。还有一些人因“俾斯麦主义”——如果可以使用这一表述——而变得好战。他们对不得不与法国谈判而感到耻辱：他们本身明明拥有更多决定筹码，却要在向来不占优势的谈判桌与会议桌上讨论权利、道理，因此显然不会情愿。

还有一些人渴望战争，是因为他们对革命后

的法国怀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仇恨。

最后，主战派还包括那些希望扩张市场的军火制造商、期望在未来战争赔款中投机的银行家，这些人都认为战争将带来巨大商机。

德国的大学除了培养了一些杰出学者外，还发展了一套战争理论。经济学家通过统计学证明德国需要成为一个殖民与商业大国，从而才能与工业产能相称。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宣传家等都渴望将德国特有的思想感情推向世界，并超越法国在世界文化上的至高地位。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接受这一种观念：未来的这场战争将是法国和德国的决战。

以上报告中的全部信息都似乎非常准确，但就最后一句“法国和德国的决战”的观点，我不能认可。因为德国实际上将英国视作更甚于法国的敌人，对英国怀有更深的仇视与恐惧。德国显然想要在未来某天对英国开战，但与此相反，德国的目标绝不是与法国对抗。这是由于英国是德国的竞争者，法国却是德国的客户，人们会消灭自己的竞争者，对客户却是一副顺从态度。德国的贸易正越来越深入法国和俄国，两者已成为其最好的市场，并为德国的制造业和商业提供越来越

多的财富来源。如果与法国开战确实符合德国政府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必将早已抓住过去的许多好机会了。

德国人唯一害怕的对手就是英国。他们在全球各个地区加速与英国的竞争，对这个强大对手的仇恨也在与日俱增。但是，德国感到自己实力不如英国，因此勉强与英国保持着和平共处。但是，德国却对组建一支足以与英国抗衡的舰队表现出狂热兴趣，因为德国希望掌控世界主要贸易路线。为达到这一目的，德国人必须占领安特卫普，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则必须征服英国。

但是，到了宣战之际，为了履行上述使命的德国舰队却还未组建完毕。对德国而言，一切事态发展都太快了，有些措手不及。因此，德国在当时不可能希望开战，战争的爆发源于各种情况的综合作用。

### 3 各交战国国内人民在外交谈判期间与宣战时刻的感受

英国和法国认为战争的潜在威胁和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承受的灾难；但是，一系列外交资料显示，情况在部分国家内并非如此，尤其是在那些并不真正关心此事的国家。

德国似乎非常欢迎战争，或至少德国媒体对此不持有异议。法国驻巴伐利亚代表在7月10日写道：

目前，德国公众将会支持政府的一切政策，即使其含有将国家引向战争的风险。因为在过去两年中，由于近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公众已经相信战争不再是遥远的事，而是解决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

在现存文件中，包括以下这封法国外交大臣7月26日发出的电报：

柏林爆发了一种沙文主义风潮。法国驻德大使康邦认为，德国将在俄国采取第一个军事行动后直接做出回应，将可能等不及任何借口便直接向我们发起攻击。

当然，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宣战在德国引起的更多是愤怒而不是喜悦，因为我个人从康邦处得知，他和使馆其他人员在回国的路上，途经每个车站，都会受到来自德国各个阶层旅人粗暴的羞辱。

在外交谈判期间及其之后阶段，奥地利的民众——或至少是日耳曼群体似乎非常支持战争，

因为在奥地利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种族仇恨太深了，即便血流成河也很难消除。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写道：

奥地利政府摆出一副如此正义的姿态，以至于奥地利民众似乎无法理解，居然会有任何国家成为奥地利的阻碍。其他国家所做的任何纯粹关乎政策或国家威望的举动在奥地利民众眼中，一概都被上升为萨拉热窝事件的后续复仇行为。

法国外交大臣电告各驻外大使：

目前能做出的最有利猜测，即维也纳内阁感觉自身行动落后于国内新闻界和军方，正在尝试以直接或间接的恐吓手段迫使塞尔维亚做出最大让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奥方必须借助德国的支持。

在数封我已摘录的函件中，英国驻奥大使特别指出了奥民众对向塞尔维亚宣战的狂热态度：

这个国家已经就与塞尔维亚的未来战争陷入狂喜，倘若战争推迟或被阻止，民众无疑将对此感到极度失望……晚间，当得知塞尔维亚的回复遭到拒绝、奥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已代表政府向贝

尔格莱德断绝关系后，维也纳陷入了狂欢，人群纷纷上街游行并欢唱爱国歌曲，直至午夜。

.....奥地利人显然认为除了征服或者被征服，对塞尔维亚再无其他选择。

这种民意走向很好地解释了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英国驻奥大使的另一封函件叙述如下：

奥匈政府已下定决心与塞尔维亚开战；他们认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不需听取任何调解提议，一定要让塞尔维亚受到惩罚。

至于俄国国内的民意，要获取有关信息则非常困难，因为俄国报纸上只有经政府授权的官方材料，俄国民众对奥地利也缺乏了解，甚至很少听闻。因此，在俄国所谓的民意可能仅限于学者、知识分子等高层人士。有关此问题的外交函件也缺乏一定的信息量，以下是我所能收集到的全部内容：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7月23日的信件中提及，奥地利在照会中规定时限“可能激发俄国国内的公共舆论”。

法国外交大臣7月26日的信件提到：“俄国的民意显示，俄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不可能坐视塞尔维亚遭到入侵。”

法国驻德大使在7月27日的信件中提到：“在俄国将不可避免地涌起能够卷走一切的民意狂流。”

但是，上述不过都是猜想，因为这种模糊的结论都是站在俄国之外的远距离推测结果，讨论的只是种种可能性，而不可能准确反映俄国民众对战争的真实态度。

对于战争爆发之后的事情，我们则更加了解。往往是那些根本不知为何要参战的无辜牺牲者在宣战时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俄国农民正是这种情况，一位目击者如实记录：

农民们带着不可思议的热情开赴前线，并受到了上层社会——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的欢送和羡慕……

……战争突然从俄国国民的灵魂深处释放出各类美德与力量，若不遇到这一机会，它们原本可能永远沉睡。



农民们通常认为他们一生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喝酒，但是情况再也并非如此。他们似乎在战争找到了生活的真正意义，也似乎在死亡中找到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对一个俄国人而言，参战意味着将躯体献于神圣的祭坛之上。

当俄国士兵冲向敌人时，当他们冲上前去拥抱死亡的荣耀时，我们在其非凡的勇气中切实感到了先烈的精神。

## 第六章 奥、德、俄三国君主意志的作用

### 1 奥皇的意志及奥地利政策的心理主导因素

以上我们引用了直到宣战之前的枯燥文件，但这并未给我们提供有关战争近因的满意解释。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地进一步探究战争促成者们的心理。

在战争之类的重大事件中，国家元首通常被视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其实他们不具备这种影响力，即使具备也非常有限。当然，他们的自觉意志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们也在潜意识

中遵从着集体所创造的不自觉意志。在某一特定时刻，这种不自觉意志可能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抑制了我在别处曾经提到过的“动机平衡”。

或许天堂里有独裁者，但在人间确实没有，因为所有人都受到意志之上各种因素的主宰。拿破仑就此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肯定态度。历史事实显示，君主们经常不得不违背个人意志或自觉意志行事。例如，法国国王和普鲁士国王在1870年都不希望战争爆发，却都无法予以阻止，并且不得不顺从事态的发展。

奥地利皇帝位列交战国元首第一位，尽管他在长期统治中一直在不停地四处征战，但实际上他却一直渴望和平。由于年事已高，他不能过多参与战争爆发前期的外交谈判。或许正由于他那些平庸的大臣、他不算平庸的继承人以及国内臣民对塞尔维亚的深刻憎恶，他才最终不得不同意挑起武装冲突。他被告知这是一场局部化冲突，将仅限于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之间。

此外必须指出，他对和平的热爱完全是出于对困难的恐惧，而不是出于善良天性。因为自从他统治的起初阶段，他便多次展示过极端残酷的一面。例如，在他继位不久之后，匈牙利爆发了起义。他因此下令对该国最活跃的起义分子处以

绞刑或斩首，将其财产没收，并将这些人幸存的家属公开处以鞭刑。在这些受害者中，甚至有年届八旬的老年人——匈牙利上议院议长兼最高法院院长。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引发战争，是数种心理主导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最显著的有两个：起初是对权威的渴求，最终是对俄国的怀疑。前者促使最后通牒的产生，后者引起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的全国动员。

事实上，大使们的外交函件便突出证实：权威对于奥地利当局而言必不可少。例如，英国驻意大利大使在7月23日的函件中写道：

事态持续恶化，是因为奥匈政府坚信这对维护其权威非常必要，奥认为在巴尔干局势变化引起的一系列幻灭之后，必须在这一事件上获得绝对胜利。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在7月28日的函件中也做出同样认识：

今早我与奥外交大臣举行会见，他宣称奥匈政府不能再推迟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了，也拒绝塞尔维亚复照中提出的一切谈判要求。事关奥

匈帝国的权威，冲突将不可避免。

奥地利当局深深怀疑俄国可能成为塞尔维亚的庇护者，也担忧其他国家的介入，因此在德国的支持下对塞闪电宣战。这是为了避免欧洲各国形成类似仲裁庭的协商机制，否则奥地利将不得不遭受各国的审判，并费力解释自身行为与动机。但是，尽管奥地利确实希望对塞尔维亚施以惩罚，却并不愿意挑起欧洲全面战争。因此，当一场全面战争显然迫在眉睫时，奥军虽然已经进入塞尔维亚领土，态度却突然缓和下来。这可以参见8月1日法国外交大臣写给各驻外代表的信函：

奥地利大使求见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宣布奥政府愿意就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实质内容进行磋商。萨佐诺夫对此表示满意，磋商建议最好在伦敦举行，并有各国参与。

英国外交大臣也在8月1日写道：

我已得到最可靠的消息：奥地利已告知德国，尽管俄国的动员已经改变目前局势，但是奥匈政府充分赞赏英国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愿意考虑我国的调停提议。这一提议的结果自然便是奥对塞的军事行动从现在起还将持续，但英国

必须敦促俄国停止对奥军事动员。

不幸的是，德国在最后一刻却介入冲突——原因我将在下文解释，英国驻维也纳大使报告国内：

随着冲突焦点转移到德国与俄国之间，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对话就此中断。德国在7月31日介入，并向俄国和法国分别发去最后通牒，丝毫未留协商的余地。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3日又向法国宣战。如果德国能够推迟数日再做此举动，欧洲很可能将不会陷入此后的灾难中。

## 2 俄国沙皇的意志与俄国政策的心理主导因素

俄国沙皇显然是当代权力最大的独裁者，同时也是史上最显著的例子，证明君主总是不得不违背自身意愿行事。因为在整个统治过程中，他总是不免被迫去做一些完全不情愿做的事。

沙皇是怀有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在刚即位之际，他希望带来世界和平。尽管如此，在他的统治期间，俄国却经历了最频繁、最持久、最血腥的几场战争。有日俄战争、俄国内战，还有目前与德奥的战争。

正如我已说过的，当今君主是自身意志以上各种意志的集合体。他的权力完全由各种意志组成，并完全受这些意志操控。无论这些意志如何改变其表现形式，都仍会对他产生影响。现代政治的全部艺术便体现于此，这种艺术可以引领事件的发展，却无法创造事件。

在外交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沙皇是多么反对战争，并且为阻止战争做了许多努力。既然如此，为什么沙皇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参战呢？

俄国沙皇的行为也受制于同期主导奥地利政策的心理因素，对权威的渴求，对强大邻国的怀疑。因此他同样相信：俄奥冲突在所难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俄国是巴尔干小国的创始人——这些小国原先被土耳其统治，因此俄国自认为有义务保护这些国家不受奥匈帝国的侵犯。俄国如果允许奥匈帝国吞并这些小国，根本说不上会有多大损失。但是，正如我此前所说，这些问题事关国家尊严，一个外国人是很难回答的。就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小国而言，奥地利的军事动员显然毫无必要，因此这只可能是针对俄国的——奥方一是对俄国心存疑虑，二是无法承受俄国的突袭。

奥方的闪电动员也引起了俄国的匆忙回应，加速了战争爆发。沙皇政府匆忙行动的原因也在外交文件中有所体现。

英国驻俄大使在7月29日写道：

若不是俄国的战争动员显示了其认真备战的态度，奥地利或许还将认为俄国渴望和平，也将相信自己真能为所欲为。

法国驻俄大使在7月29日写道：

俄军总参谋长证实，奥方正在加利西亚前线上加速战备和国内动员。俄方将于今晚向13个军团下达对奥开战的动员命令。

俄方除了因为不信任奥方而发起动员之外，并未表现出任何好斗姿态。为了维护和平，俄国在最后一刻宣布，如果奥方保证尊重塞尔维亚的独立，俄方将就此罢休。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8月1日写道：

俄国大使称，如果奥地利保证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与独立，俄国现在便会罢手。他说，俄国无意攻击奥地利，今天他将再次向奥外交大臣指出，如果奥方拒绝做出这点让步，将导致非

常严重的后果。俄国这次将奋战到底。

### 3 德皇的意志和引领其决策的因素

关于德皇的心理，人们已经多次试图刻画，但在此处，我将仅仅探讨那些可能导致其在最后一刻宣战的因素。

除了为避免任何国家的攻击而下令加强战备外，德皇无疑还是爱好和平的，这清楚地反映在他25年统治的事实中。他曾经解决了不止一个可能将本国卷入战争的难题。法国驻德大使对此不持有异议，甚至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德皇正在努力熟悉与接受一种他先前排斥的思想，这种思想可借用他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必须保持火药干燥”。

威廉二世非常冲动、自私、虔诚，总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派的代表，并常常这样主张。在宣战时，他向士兵们做了以下演讲：

请记住，德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精神已经降临到我——你们的皇帝身上。我是他的武器、他的宝剑、他的副手。让不服从我的人受苦受难去吧！让懦弱者和怀疑者们去死吧！



劳合·乔治如此评论以上演讲：

自从穆罕默德时代以来，再无这种事发生过。疯狂或许向来都很恼人，但是有时也会变得异常危险。当这种疯狂显现在一国元首身上并成为一国政策时，必须无情地将其铲除。

这或许还不是疯狂，但却无疑是神秘主义精神的发作。为了完全理解战争思想是如何在德皇脑海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尽管德皇热爱和平，却总是乐于采取威胁的手段。他时常说要保持宝剑锋利、火药干燥。他前往摩洛哥、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地，宣扬要依照个人承诺履行保护职责，并在各处发表威胁性演说。他希望受到畏惧，因为他认为德国的强大军队是强大后盾，无须征战便可确保他在欧洲舞台上的领袖地位。

他的统治制度并不算糟糕，因为在多年中，他获得了想要的一切，在摩洛哥击败法国，在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也迫使俄国保持沉默。

至今为止，他的威胁姿态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几乎不能相信这在塞尔维亚事件中无法奏效。那些我所摘录的德国外交报告使这位皇帝认

为：法国和俄国绝对不可能参战，英国正处于爱尔兰内战的威胁中，战备情况比德国差得远。

基于上述情况，德皇怎么可能同意召开各国会议？此会议必然会像以往所有会议一样，得出一个无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并阻止奥地利人为斐迪南大公的遇刺而向塞尔维亚复仇。

既然德皇热爱和平，又并无任何兴趣参战，那么，又是何种动机促使他最终决定宣战呢？

我首先要解释的，是看似最终推动其做出决策的军事原因。为了认识到这类原因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证明，军事动员日期在德皇与俄皇看来是多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将德国和俄国推向战争的根本因素和决定性因素。法国大使与英国大使的函件明白地显示，各国对彼此缺乏信任，担忧对方的战争动员，担忧对方占得先机。为了消除这些担忧，他们最终不惜发起一场真正的战争。

奥地利开始战争动员后，俄国立即效仿。法国驻俄大使7月31日报告：

在过去6天内，奥地利发起了全国动员，德国也在秘密并持续地准备动员。因此，俄国也已

下令开始军事动员，因为俄国决不愿冒险让奥地利占得先机。

英国驻德大使在与德国首相会谈之后，于7月31日的报告中写道：

德国首相表示，由于俄国开始对奥备战，他在维也纳为和平与缓和局势所做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当其他国家正在抓紧时间加强防备之际，他不能任由本国毫无准备。如果俄国现在针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他将无法保持沉默。他希望我知道，德国政府很有可能在近期——也许是今天——有非常大的动作，事实上他正打算请示德皇。

首相还说，当他得知俄国正在俄德边境加强战备时，沙皇还在以老朋友的名义写信给德皇，请求德国在维也纳加强调停，而德皇也同意了这一请求。

俄国也为自身加速战争动员提供了充分理由。英国驻法大使在8月1日写道：

据悉，俄国之所以开始全国总动员，只是因为奥地利下令总动员。如果所有国家都解除动员，俄国政府也将愿意这么做。

德国是如此害怕俄国的动员，以至于7月31日向俄国发去最后通牒。这份通牒显然无法被俄国接受，因为其提出了在12小时内解除动员的要求。到了8月1日，德国便向俄国宣战了。

在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之前，德皇个人向沙皇做出停止动员的急切呼吁。这不仅证明了他对俄国动员的恐惧，也表现了他维护和平的真诚愿望。我将在下文中摘录一些文件片段，首先是7月28日德皇给俄皇的信函，以下是其中最重要的段落：

我已知悉奥地利进军塞尔维亚在贵国引起的反应。正是塞尔维亚多年肆无忌惮地煽动，才最终导致了斐迪南的遇刺事件。我并不讳言，对您和您的政府而言，要抵抗公共舆论的压力是多么困难。我谨记我们之间多年的真诚友谊，正在竭尽全力说服奥匈帝国与俄国达成谅解。为了移除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我需要您的协助。

俄国沙皇在回信中感谢了德皇所做的调停，后者于7月29日再次发出电报：

俄国任何被奥地利视作威胁的军事行动都会引发你我正在力图避免的灾难，同样也会使我的调停工作毫无建树。

7月30日凌晨1点，德皇又发出电报：

我国大使已受命提请贵国政府注意，贵国的军事动员可能带来巨大危险和严重后果。这是我在上份电报中已告知您的。奥匈军队的动员仅仅是针对塞尔维亚，也仅限于局部。如果正如您的电报和贵国文件所述，俄国正在针对奥匈发起动员，那么我在您的授权与请求之下进行的调停工作将受到损害，甚至不可能成功。目前，是战是和，都将由您决定。

沙皇于7月30日下午1：20回电：

我国目前的军事措施是在5天前决定的，是对奥地利战备的预防手段。我最真诚地希望，这些措施无论如何不会阻碍您的调停工作，我非常珍视您的工作。

7月31日下午2点，德皇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我原先承担了在贵国政府和奥匈政府之间的调停工作。当谈判还在进行之中时，您的军队却已开始针对奥匈军队——我国盟军进行武装动员。有鉴于此，正如我之前提请您注意的，我的调停工作几乎难以进行。尽管如此，我还在坚持努力。

方才据最可靠的信息称，贵国军队已在我国东部边境部署战备。为了对我国安全负责，我国不得不采取类似防御手段。

我已经为维护和平竭尽所能，我也不应对这场目前正在威胁整个文明世界的灾难承担任何责任。

即便到了此刻，决定权仍然在您手中。没有人威胁俄国的荣誉和权威，俄国最好耐心等待我的调停结果。

这封电报没有得到沙皇的答复。到了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12小时内解除动员的正式通牒，这便意味着宣布战争。

在宣战之后，从德皇对待法国大使不同寻常的粗鲁与暴躁中可以看出，德皇并不是一个因奸计得逞而扬扬得意的人，德皇确实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我已经提到法国外交官们在回国途中遭受的粗暴待遇——他们不得不待在紧闭的火车车厢中，26小时不吃不喝，还被迫支付了5000金法郎（收款人最终因羞愧而将钱返还回来）。

一心维护和平的德国皇帝此刻发现已经不可能再阻止战争了，因此非常愤怒。单是这一事实

就可以解释德国为何在一系列非常友好的通信后，向俄国发出一份措辞专横的最后通牒。但是，我们该从何处来寻找这位君主如此急躁的动机呢？是什么紧急要事促使他在最后一刻失去耐心决定宣战呢？

显而易见，德皇害怕给未来的竞争对手留下更多准备时间。要理解这种说法，必须明白迅速动员对德国将意味着什么。根据德军总参谋部掌握的情况，法军需要20天动员时间，俄军需要近两个月。如果按照德军正常的动员速度，便能够首先摧毁法军，然后再撤回来进攻俄国。但是，如果俄国利用外交谈判尽可能拖延时间加强动员的话，这一方案将彻底流产，德国届时将需要同时面对两个敌人，而不是一个。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德皇才发出最后通牒。

## 4 影响德皇不自觉意志的各种因素

除了理性动机之外，其他因素也影响了德皇的不自觉意志，并促使其做出了自觉的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这一事实：这位热爱和平的皇帝正渐渐地不受军方欢迎，而与此同时，他那好战的儿子在军方的威望正在逐日上升。德国军方曾经有三四次想过开战，尤其是摩洛哥事件爆发之际，但最终都未出手。在泛德主义者们的不断煽动

下，德国统治世界的愿望最终似乎也变得容易实现。但是问题是，过了几年后，这是否会变得更困难。那时俄国应该已经修建好落后的铁路系统。以上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无疑促成德皇最终的决策。

为了对本章做一个总结，我必须再次指出，德国对奥地利的鼓励以及奥地利毫不妥协的态度主要源于奥方这一错误认识——俄国、法国、英国都不会参战。在那关键的一周之内，这一错误围绕着所有的外交谈判。正是由于这些缺乏远见的领袖所做的错误判断，数百万人最终牺牲，多座繁华城市被摧毁，欧洲沦为一片焦土。

## 第七章 结论：究竟是谁想要战争？

### 1 一系列导致战争的事件的总结

我认为，战争爆发之前的事件已经叙述得非常清楚，其实再无特别的必要去对其加以总结。尽管如此，我还是需要稍作小结，以便概括梳理一些事实，因为仅从官方文件中研究事实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

让我们撇开导致大战的系列远因，直接看看奥地利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的起点，塞尔维亚煽



动形成的阴谋。

在其王储遇刺身亡之后，奥地利决心为之复仇，同时想在巴尔干提升威望。因为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奥地利遭遇了一系列反抗与忤逆。因此，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一份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只要塞方予以拒绝，奥方便可即刻向其宣战。奥地利就此看不到任何风险，因为德国已经承诺对其给予支持。而根据所有外交报告，俄国和法国也会因为自身软弱和国内纠纷保持中立。俄国早已在波斯尼亚事件上让步，必然会再次妥协；英国正受到爱尔兰内部威胁，最不可能介入这样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

奥地利当局热切希望吞并塞尔维亚，因为若能将之付诸实施，不仅能增加一个新省，还能对斯拉夫人重树权威。德国虽然不会从中实际获利，但却可能获得同样重要的道德优势。德国将再次将自身意志加诸欧洲，并利用自身迅速壮大的霸权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这其中最妙的一点是，无须任何成本，只需坚定地阻止其他国家介入奥塞冲突之中。

事实上，以上便是德奥两国当局的全部企图。但是在实施其精心设计的方案时，两国的外交家们却不幸忘记考虑某些情感的、神秘主义

的、集体的因素——没有任何历史事件能摆脱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也遵循与理性完全不同的逻辑序列。它们的预测与论证过程或许可能看似无懈可击，但却可能导致完全错误的结果。俄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这次的情况与上次几乎完全相同，但由于俄国太需要维护声誉，既然上次已遭遇了彻底羞辱，这次就绝不能再容忍新的羞辱。

战争起源于一个心理错误。首先，其预设前提就是错的，认为俄国会让步，其他国家不会干涉，随后一系列悲剧便将必然发生。为了使俄国感到恐惧而退却，在俄国为了阻止战争而提议谈判时，奥地利和德国表现得非常傲慢。随着德、奥进一步相信无须担心全面战争，态度变得愈发强硬，直至奥地利最终认为能够安全地对塞尔维亚宣战。这在奥地利外交家们看来是非常明智的决定，但其实极端愚蠢，因为各国一旦决定干涉，奥地利将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事实上，各国在最后一刻果真出手干涉了。

当德国和奥地利——尤其是奥地利发现他们的强硬态度正将导致欧洲滑向战争时，态度就会稍有缓和，并且拼尽全力阻止战争，但却为时已晚。德皇写给俄国沙皇的紧急电报最终都成徒劳，将事态推动至此的人们终将反而被形势所绑

架。

到了11点，就在宣战之前，想要维护自尊和树立权威的情绪，迄今为止的唯一动机在两国之中渐渐消退，一种新的感情出现了，那就是怀疑。

正是怀疑推动各国加速军备，从而不让对手出奇制胜。因为在一场战争中，速度也是胜利的要害。

奥地利已针对塞尔维亚开始武装动员，一方面是为显示坚定决心，一方面是为吓阻俄国。奥地利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常备军足以对付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小国，后者早已在前两场战争中透支了国力。

因此，俄国完全有权利认为奥地利的军事动员是针对自己，因此也开始动员，以避免到时措手不及。

德国不愿让任何国家超过自己，便向俄国发去一份专横的照会，要求俄国立即解除动员，也希望借此一窥俄国的真实意图。俄国的动员显然多少有些鲁莽，但是沙皇绝不可能听从德皇的粗暴命令。双方感情都过于强烈，因此无法妥协，

其最终结果便是战争。

法国尽管真心渴望和平，却不得不跟随盟友的脚步。

英国强烈期望不介入冲突，却也由于心理错误被卷了进去。德国总参谋长坚信，英国将对德国入侵比利时无动于衷，于是将战时条约的神圣性置之度外，毫不迟疑地进军比利时。这一错误早已在战略层面受到谴责，因为这在对手阵营中又加入英国，也没给德国带来好处。如果德军不入侵比利时而直接取道卢森堡，就不会在列日耽误两周时间，也能更快逼近巴黎。

因此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各国在谈判中能够再多一些耐心，战争就可能得到避免，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根据我们所见的战争远因判断，战争只能被推迟，而不可能被彻底阻止。因为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太多矛盾，直到目前为止，欧洲所采取的都是用武力维持和平的手段，其代价过高，不可能长期持续。

## 2 究竟是谁想要战争？

在上一章中，我曾指出，就“究竟是谁想要

战争”这一问题，回答“没有人想要”，毫不夸张，因为事实上确实没有人。尽管如此，德皇还是宣布开战。从心理学的视角上，我们也可以说明，他其实并不想要这场战争。

直到认真研究了许多资料之前，我都与多数法国人持同样观点，认为德国一直在寻找借口向我们开战，一有机会便立即出手。一位知名学者在黄皮书收录的文件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另有两位索邦大学的教授也在一篇费尽心血的论文中提出这一观点——他们的文章遵循所有历史学方法，并且正以“谁想要战争”为题。

但是，即便我起初同意这种普遍看法，现在却有一些因素让我对此产生犹豫和怀疑。在遥远的未来，英德之间的战争或许多少不可避免，但是我却不得不自问：德国究竟能从与法、俄的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法、俄在当时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天都在加大对德国的开放程度，德国有何必要对其开战？如果德国确实想开战，原本也有很多更好的机会。我已经提到过，在俄国败于日本又陷于国内革命之际，对俄开战几乎是最佳时机，因为当时俄国根本无法自我防卫。

随着更加认真地研究这些资料，我灵光一闪，得出了这一结论：尽管德国战备不断加强、

外交态度不断强硬，但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德国其实并不希望得到这一结果。（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人。但是，另一些认真研究过历史材料的人最终也被这些证据说服。索邦大学教授维克多·巴希在《1914年之战》一书中写道：“是的，德国人想要和平，想带来和平，想要一个德国式的和平，想要各国投降而形成的和平。德国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渴望战争，尤其不希望主动挑起战争。”）

即使没有那些我已引用的文件，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些心理学事实足以证明以上结论。

首先，德皇在最后一刻向沙皇发去电报，请求俄国停止军事行动，并指出这种行动会迫使德国不得不开始动员。德皇甚至还提请沙皇谨记他曾经在祖父临终前所发的有关德俄友好的誓言。如果德皇已经决定宣战，以上这些虚伪的言论似乎毫无必要。因此他的这封电报内容或许是非常真诚的。第一封电报写于冲突爆发前三天，毫无疑问，即使已经这么晚了，德国依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参战，仍旧在竭尽全力去阻止战争。

我认为，这封电报具有极强的证明力。此外，德国驻俄大使一番出于绝望的攻击性言论也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英国大使在一份文件中提

到：

眼见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德国驻俄大使）似乎完全崩溃了。他请求萨佐诺夫提出一些解决建议，好让他报回德国国内，作为最后一线希望。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经政府指令致力发动战争的大使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德国外交大臣在某次谈话中也向英国大使流露过类似情绪。这种身处高位又相隔甚远的人，要想勾结一气来伪装出同样的绝望，显然不太可能。在这里，伪装早已毫无必要，因此完全不可能。

除以上几个证据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位法国海军上将在《巴黎时刊》上所述的信息：

7月26日，德国舰队正在远离基地的位置进行部署，如果这时英军舰队去干扰它们，它们根本来不及添煤或等待所有士兵就位。

因此，我们必须否定德皇是想要战争的。但是，的确又是他宣布开战，这又是为何呢？

在上一章中，我已经就此明确地给出答案。德皇最担心的莫过于，如果德国行动过晚、谈判

不成功，便将留给俄国充裕的时间完成动员，由此破坏军方制定的快速进攻方案。如果少些怀疑，他就会多些耐心，因为奥地利当局已经开始显示妥协退让的态度了。但是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受到环境与身边人的影响。

无论如何，德皇与俄国沙皇一致希望避免全面战争，奥皇也不想要这一冲突，但是三者之间的互相怀疑还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

因此，对于“谁想要战争”这一问题，答案可能是“没有人”；对于另一问题“战争的近因是什么”，答案必然是“三国皇帝的互相怀疑”。德国皇帝是三者之中疑心最大的，因此他也被认为应对战争负主要责任，因为最终下定决心宣布开战的正是他。

他也被认为应对鲁汶、兰斯、伊普尔等城市遭遇的屠杀和破坏负责，因为如若没有他的允许，任何德军将领都不敢下此命令。这将成为他永久的耻辱。

我在本书中花费数章的篇幅探讨心理学问题，因为心理学反映了激发人类行为的不同情感的碰撞，并显示了这些感情的产生和发展。尽管教授和学者们都非常关注战争起源，但这一问题



其实毫不重要。战争的不可避免是由于种种形势的共同作用，无论说是谁导致战争的最后爆发，都没有什么区别。

以上正是多数公众的观点。公众不会像学者们一样总要找出究竟德、俄、奥哪一方想要战争，也不会迷失于对模棱两可的外交文件的细致分析中，因此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清形势。公众意识到，德国是在故技重施，要重现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做法。法国各处都在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人们眼见战争不可避免，纷纷准备挺身而出。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德国是否决心参战，都已毫无区别，因为德国一直自恃实力壮大而不断实施威胁，这迟早会导致战争爆发。因此，法国根本不必为了维持和平而继续蒙受羞辱。

## 第八章 德国和各国国内就战争起因的观点

### 1 有关战争观点的心理基础

对于中立者而言，某些德国学者就战争起因的观点和整体呈现的激烈情绪着实令人惊讶。

在以下章节中，我将提到其中一些知名学者

最为突出的表现。为了理解这些观点的起源，请读者参考我的*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观点和信念》）一书。书中提出：理论论证对那些源自集体、情感、神秘主义的信仰完全不起作用，个人心理是与集体心理融合在一起的。

每一个现象都反映了该书中提到的某一原则，我也已尝试对其中部分做出说明，但是在写这本书时，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欧洲战争如此之快便成为这些原则的鲜明例证。

现在我将谈谈德国国内民众对战争起因的观点，这些观点充分显示：对于基于暗示和心理感染的信仰，说理完全不起作用；即使是最高明的智慧，也不能说服一个深受某种信仰主宰的人。

这些观点的表达方式大多非常激烈——这也是新信仰诞生的特征，是无价的心理学研究资料。事实上，当我们看到德国知名哲学家冯特（Wundt）竟然大肆谩骂其他国家，污蔑他们为强盗和杀人犯，我们的惊讶不言而喻。

这种野蛮与暴怒不仅让我，也让别人感到印象深刻。克里斯迪亚纳大学的戈拉乌教授虽然身处中立国，但是在一场演说中，他也对德国如此卓越的思想家因战争变得不可理喻而表示震惊。

他引用了我在多年前总结的集体心理规律说明：在集体心理的包围下，即使是最明智的人也会丧失判断力。就此，他以知名哲学家欧肯（Eucken）教授为例，后者告诉我们德国参战是为了履行复兴人类的使命，“我们不仅为自己而战，而是为全人类福祉而战”。

在上文中，我已经引述过哲学家冯特的言论，但以下这段更加直白：

德国正在向敌人们发起一场真正的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场正义和神圣的战争。法国、俄国、英国发起的战争完全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我们敌国的战争不是真正的战争，绝对不是，甚至根本不能称其为战争，因为战争有其自身的权利和法则。敌国的这些攻击不过是一群强盗的无耻阴谋，而不是手段光荣的公开斗争。

戈拉乌认为，这种集体疯狂一旦病症发作，便很少有德国学者能够逃脱。

## 2 德国外交家的观点

自从冲突开始，德国外交家就在尽全力证

明，德国政府尽管对宣战负责，却不是战争真正的制造者。

在上文中，我已经摘录过一段德国总理的演说。以下这部分是他在1914年12月1日的演讲内容：

英国政府无所作为，坐视这场大战爆发，因为英国认为既然有其他协约国的支持，便将有机会在世界市场上给德国以致命打击。因此，英俄应当为欧洲和世界陷入战火承担责任。

德国总理显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他声称英国希望打压德国。但与此相反，从我在其他章节中引用的资料来看，英国对战争怀有极大恐惧，并竭尽全力想要避免战争。

在有关德国政治的著作中，前任总理冯·比洛很好地刻画了英国政策中极端不具侵略性的一部分：

在通过海军法和启动造船业之后的10年间，英国原本可以肆无忌惮地实施海上扩张政策，完全遏制德国的海上发展，但是英国人并未这么做。英国不愿开战，使得我们有机会抓住海上的部分主导权。

德国首相多次回到战争起源和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原因问题，甚至毫不犹豫地伪造资料来捍卫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在洗劫比利时期间，一些德国人发现英国与比利时军事代表于1906年、1912年的谈话资料，其中提到了如果比利时受到袭击，英国将采取措施提供保护。后来德国总理关于这些谈话的报告却淡化了这些内容，还将“谈话”一词曲译成“协议”。比利时的外交代表自然对此存有异议，并呼吁所有人注意这一伪造文件的丑行。

这种行为向来很危险，是对名誉的严重损害，因为一个谎言需要更多谎言加以支持。

### 3 德国权威媒体和学者的观点

德国外交家可能并没有准确地陈述事实，但他们所述的内容中至少还有一些准确度，远远好于德国的学者们——后者的智力显然已经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层面上了。如今，当这些还算颇具名望的专家走出研究室，开始研究全新问题时，他们的论证能力突然莫名其妙地大打折扣，而且表现出对其他国家心理的全然无知。

他们发表了许多怪异的言论，引述如下：

他们首先攻击俄国驻法大使，称其一直在为战争铺路并最终引起战争爆发。然后他们又谴责英国国王、首相、外交大臣以及俄国沙皇等。……读者若想找到证明材料，请参见10月2日的《新自由报》和3日的《法兰克福日报》。后者刊载的文章题为《协约国的阴谋》，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但却仍不及他们在保加利亚刊发的一篇类似文章，那篇文章声称整个事件都是英国、法国、俄国政府早在巴尔干战争时期就已谋划好的。

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布伦坦诺（Brentano）的言论也同样古怪。他声称，法国开战是为了避免1870年之耻重演，并重新建立王朝。以下是其文章中的部分节选：

法国的反动派不愿看到复仇思想减弱——巴黎人已经开始期盼君主政治的复兴，许多人认为战争将为法国带来想要的一切。在过去数年间，《费加罗报》和《高卢报》刊载的文章和巴黎小餐馆中的歌曲都足以证明：法国——或者至少是巴黎——已经为君主政体和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迈尔和同时代许多人一样，并没有多少原创观点，他所有谴责和攻击的

重点主要集中于英国人：

德国从上至下人人都已意识到，英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英国迫使我们进行殊死一战，也正是英国自私地将其他国家拖入战场，只为摧毁我国，剥夺我们作为一国的独立存在。

……毫无疑问，英国政府是故意挑起这场战争的。

……如果能够暂时推迟战争爆发，他们或许会更加高兴，这就是爱德华·格雷使尽全力要召集协商会议的目的。果真如此，协约国就将赢得更多时间加强战备，德、奥就将遭受更大的羞辱。……德国在俄国开始动员后发出最后通牒，从而搅乱了英国的计划。除非德国愿意被打个出其不意或是任由形势变得更对自己不利，否则便该是我们亮剑的时候了。

这位作者似乎不太熟悉自己国家的历史，因为他下了这一结论：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德国向来不寻求征服政策，也向来不会非法入侵他国，甚至是比利时。

Herr Schrodter这样的大制造商、大实业家也持以上观点。他在1915年1月31日面对德国工程师社团的演说中表示：

这场战争是英国的阴谋，我们就此所掌握的证据正越来越多。

德国毫无根据便一味指责英国的顽固态度给中立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1915年3月26日《日内瓦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便可看出：

当德国报纸将英国描述成战争的煽动者时，他们一定幻想读者们完全不能思考或没有记忆。我们可以说，1914年8月时的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最倾向和平的政府了，因为当时其仍在努力通过海上裁军法案。

## 4 德国军方的观点

多数德国的军方人士也都一致认同战争确实是由英国煽动爆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将之归咎为俄国的快速动员。

以下是对德军总参谋长冯·法尔肯海恩（von Falkenhayn）将军访谈的片断，其刊载在1915年1月25日的《日内瓦日报》上：



这场战争并非我方主动侵略，也不由军队任何派系挑起，而是俄国的军事动员强行导致的。面对这场动员时，我们无能为力，只有加强自身动员。我国皇帝和驻圣彼得堡大使都已给过俄国建议与提醒。俄国当局知道，如果他们开始动员，我们也将下令总动员，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我国的安全。尽管如此，俄国还是一边谈判一边不断地动员。

现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冯·默特克将军也和他的多数同胞一样，将一切归罪于英国。1915年1月23日的《泰晤士报》转载了一份德国报纸对默特克将军的采访。他否认了德国想要发动战争：

如果我们这么迫切要发动战争，那为什么不在日俄战争期间趁俄国之危呢？或是在英国深陷布尔战争时先下手呢？我从未有一刻怀疑过英国将会参战反对我们，因为促成冲突爆发正符合其利益。英国已为此筹备了很长时间，比利时问题不过是借口罢了……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战争将对德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 5 德国公众的观点

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德国人都毫无个人主见，除了那些灌输给他们的。德国人纪律性

强且尊重权威，以至于不愿发表任何不同于政府观点的个人意见。因此若要寻求民意分歧，可能会无果可获。在7000万德国人中，实际上很少有人不相信战争出于英国的邪恶谋划，是为了颠覆德国。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当德国媒体积极炮制出宣战声明后，人民便反馈以狂热的态度。许多电报都带来胜利的消息，但是不会承认任何败仗——马恩战役似乎根本没有被提起，只被称为“影响德军进军巴黎的战略原因”。一个瑞士人在12月上旬访问德国时，如是描述了德国人民的战时心理：

所有德国人都相信德国必将胜利，相信德军战无不胜，还相信德国参战动机是纯洁和神圣的。虽然只有在所有民主国家鼓励首创精神、催生个性观念、激发个人能量，德国人的统治者却赋予全民一种集体情感，只有来自高层的影响才能唤起这种情感。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认为这证明了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性，因为拉丁文明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这点。

鉴于德国人这种古怪的心理，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何会盲目认可统治者的观念，并将其全部视为如同福音书般的真理。因此，当一个德国人声称只有德国陈述了事实、协约国发表的全是谎言时，当一个德国人主张德国由于比利时与英国有

密约而有权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时，他都是真诚的。没有任何反面论据能够说服他，因为他认为只有德国是正确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在撒谎。

在德国人的表现中，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徒的所有心理特征。

在战争期间，有数家新闻机构都接到了持续引导德国公共舆论的指示，其中包括最具争议的沃尔夫社。公众怀着宗教般的虔诚接受了报道中最虚假的部分。例如：年轻的比利时姑娘挖出了德军士兵的眼睛，德军伤员由牧师们负责看管，等等。

沃尔夫社向世人源源不断地提供耸人耳目的新闻报道。1914年10月18日的《法兰西报》发表了一份沃尔夫社发给一个南美小国的电报，节选如下：

一大队德军飞机昨晚已经成功抵达伦敦。德国士兵攻进英国王宫并活捉国王。国王刚被俘，便立即花了1亿金马克为自己赎回自由。

这类叙述当然是留给那些原始国家的，因为他们的人民头脑简单、容易受骗。在这些事例中，报道的作者们肆无忌惮地发挥着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参见一家驻君士坦丁堡的德国新闻机构在土耳其报纸上发表的内容：

根据阿姆斯特丹传来的无线电报消息，如果土耳其同意不派遣强大舰队袭击伦敦，英国政府将提供给土耳其2000头驮满金子的毛驴。

## 6 中立国国民的观点

对于战争的起因，不同国籍的作者持不同看法：德国军方的影响力、协约国的阴谋、德国王储的自大、法国的复仇愿望、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奥地利的野心……尽管如此，许多独立作家还是不愿得出定论，提供了与著名历史学家费雷罗大致相同的结论：

关于在今日文明世界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责任问题，在本次战争中暂时还无法解决。

费雷罗认为，很可能是“德国的宣传机器和主战派在国内营造氛围，导致政府无法再继续做出不明确的姿态”。

一般而言，关于战争起因的中立观点并不是来自对事实的观察或理性查证，却来自情感或神秘主义倾向。天主教徒们——或至少是西班牙与

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们——起初支持德国，这是一种普遍立场，这可参见Dudon（迪东）于1915年1月19日发表的宗教评论文章：

在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之际，他们真诚地希望德国能够获得胜利，因为上帝应许了德国一个辉煌的军事胜利。这是德国应得的，鉴于德皇的虔诚、德国人民的正直、德国天主教徒的善行和奥地利的正统与忠诚，这一切都是德国应得的。如果德国战败，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欧洲最终的主宰权落入信奉新教的英国、推崇分裂主义的俄国和鼓吹革命主义的法国这三者之手，等待它的将是什么？

除非上帝决心用世俗邪恶淹没西方乃至全世界，否则德国必须获胜。因为随着德国的胜利，社会、政治与宗教的正统秩序也将获胜。

但是，战争却改变了很多事物。法国少数天主教徒曾经认为战争是神明对法国的惩罚，但是不久便放弃了这一想法，甚至走上战场，表现出最为英勇的一面。

# 卷五 战争涉及的心理因素

## 第一章 战争手段的变化

### 1 现代战争中不可预期的新元素

此处我并不打算详细探究现代战争全新且难以预期的形式。但是，既然我将重点探讨心理因素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势必需要简短梳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情况。

战争将会有力地推动个人、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因为其将改变武器、战略、人道主义概念、权利观念、风俗习惯——总而言之，改变一切。同时，战争也将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对人类生存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分别研究某些特定变化之前，我将先对其做整体分析，来说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到地上与地下、海面上与海面下以及空中的战争的。

现代陆地战争的首要特征，即军队人数从以前的几十万人上升到现在的几百万人，战场范围从过去的有限空间拓展至如今长达几百英里的战线。

沿着这条长长的战线，士兵们在泥土中挖掘壕沟并进行着殊死战斗。而将领们则除了用电话下令发动进攻或在某些要塞加强防守之外，再无其他活动。

早期的枪支射程都在几百米之内，而且瞄准度很低，杀伤力很弱，如今早已为射程在6至125英里的加农炮所取代。这些大炮的威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数日之内便可彻底摧毁看似坚不可摧的要塞，并能够几乎即时消灭暴露在其炮筒之前的战斗力量。

海上战争也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自战争初始，潜水艇便被投入使用，能够在几分钟内击沉造价达300万英镑的巨型军舰，迫使后者不得不进入港口躲避，甚至不敢轻易驶出港口。

除了这些陆海战争，还有空战——尽管飞机的打击力量尚未获得充分验证，但是由于飞机能够数以千计地飞越边境进入别国领空，其很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战争中，从恺撒至拿破仑，战争一直由将领个人主导，依赖人们的运筹帷幄。将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后方遥控着一切情况。在路易十六和拿破仑时代，有画家为了描绘战场

画过这样一幅画：在画面近景中，士兵们在用大炮向敌人猛力开火，而在画面远景的山坡上，坐落着将军们的指挥部。

若是换作当今的时代，观众们便可看到一幅全新的景象：几十万军队悉数出动，在画面中却不见一人一枪，因为士兵、战马、枪炮、战壕全都隐藏起来了。

但是，如果观众目光敏锐并且保持长时间观察，最终将会不时地看见一些人，他们偶尔从背景显现出来，慢慢地爬过田野，又迅速跳起来跃入战壕。

如果观众希望看见正在指挥这支隐形军队的将领本人，便将发现他正在缓缓地、悄悄地退出画面。他通过接收和发送电报或电话信息的方式，向不同军团发出指令，他最重要的战略部署便是下令用火车将军队运至想要攻打或守卫的地点。

最后，如果我们这位想象中的观众想要找到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则可能需要走上很远的一段路程。如今我们得知，自1914年9月5日至25日，在马恩战役整个过程中，元帅和其副手们都一直待在距离战场120英里的地方。



数以百计、陆续不断的小规模遭遇战也取代了过去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模式。除了在波兰和俄国，在其他地方并未出现大型战役。但是，为了在许多小型战役中夺取一点微弱优势，仍然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除了我在上述指出的变化外，本场战争还为人们带来许多出其不意的感觉。例如，在战争之前，所有军校都教授步兵应该呈开放队形分批前进，以此避免人员的严重损耗。但是本场战争自始，德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大举进攻的冒进方式。德国军队在沙勒罗伊出人意料地采取这种方法，在那时还是成功的，因为这种出其不意的阵势大大挫伤了法军的士气。但是到了伊瑟战役时，这种方法却失败了，因为德军将自己大面积暴露在英法两军之前，成为集中攻击目标，在短短几天之内便损失了15万人。

总体说来，法军将领完全不了解德军的战术。鉴于对法国战备的整体考虑，目前活跃在战场上的马勒泰尔将军（General Malleterre）于1915年8月9日写道：

即便是在最近几年，当法国逐渐从好战转向和平主义，并最终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威胁时，法国军方仍然懈怠地认为东部防线牢不可破，法军

有能力通过阿尔萨斯与洛林发起迅速反击。

但是，德国在1914年8月迅速策划、组织并实施了作战方案，打得法军措手不及。正因如此，当法军首次接触敌人并发现暴露于来源不明的炮火之下时，感到非常震惊。德国攻势的惊人之处在于，在发动步兵之前，先用密集的火炮攻势将法国本就脆弱的防线置于瘫痪状态。我所知道的都是我的亲眼所见，我将永远记住法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坚守与撤退的日子，也将永远记住法军由于根本不能将战线向前推进进一步而愤怒万分。

.....德军于1870年和1914年发起的两次攻势都体现了战略、人数与物质上的强大优势。

由此可见，德国人确实预知了战争中的一切，除了某些尚属未知的特定心理因素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探讨现代战争中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转变。

## 2 现代战术、战线延长、进攻与防守

从战术角度上来看，原先由于供给困难而异常复杂的现代战争已经大为简化，因为先前战争

的宏大部署在目前仅仅意味着发动前线进攻与包围敌人。目前的困难则包括大量人员的调动与部署，还包括武器与食物补给。因此，铁路至关重要。铁路系统比对手发达的作战方仅凭此项便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能够打败人数占多数的敌人——俄国的战败即为实证。德国人能运用铁路系统将军队调遣至预先确定的地点，并用简单的战术战胜敌人——将一大队军团调至敌人侧翼，突袭之、包围之，然后俘获大量战俘与大炮。弗雷德里克大帝很久以前说过：“如果发动突袭，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能够打败十万人的军队。”

尽管如此，法军将领们在战争早期甚至还坚定地相信，德国将难以抵挡俄国的入侵。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德军是胜利的一方。即便俄军胜利，也无法从其大本营向前推进太远距离，因为其交通设施不够发达。如果德军撤退，其必然将摧毁通往其境内的铁路，因此即使俄国入侵德国，也不可能深入其境内。

当前战线的延伸绝对违背了过去完全集中兵力的原则，并避免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现代战争是较大空间范围内的一系列遭遇战，很少产生决定性后果。

此外，战壕的应用大大改变了过去关于攻守

的概念。

从心理学角度看来，进攻方显然比防守方具有突出优势。守方一无所知地等待不知将从何而来的攻击，自然处于劣势地位。自拿破仑时代起，所有军事教科书都提出了这一原则。此外，它还是德国军队的基本教条：

弗雷德里克大帝对路易十五致信称：“即使人数不占优势，也最好主动占据进攻地位”，“敌人在遭遇袭击时常常自乱阵脚，正好提供可乘之机”。弗雷德里克大帝通过主动进攻赢得了许多战役的胜利，这是因为他的敌人们常常拘泥于旧时兵法的僵硬形式与准则，防守十分无力，不能采取有效的反击手段；拿破仑的许多胜利也是由于对手的战略战术有许多破绽，在冯·毛奇（von Moltke）时代，包围敌人的原则也很成功，因为敌人并未找到有效的反制措施。

战壕的出现并未消除进攻方的这些优势，除非涉及重要军事行动，指挥官很少敢于下令大规模向战壕发起进攻。我提到过一个事实：当德军想要占领加莱并袭击法军侧翼时，便贸然对法军的战壕发起攻击，在短短几天内无谓地牺牲了15万人的生命。

尽管如此，守方对攻方这种偶然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攻方如有足够的弹药供给，便能重获优势。俄军总参谋长在1915年6月的军队公报中写道：

总体说来，我们在进攻中的损失并没有防守时大，因为防守需要顶着敌人的重重火力。比如，当我们进攻某一个村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挺机关枪，俘获629名奥地利战俘，其中包括19名军官，而我们自己只有50名人员伤亡。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不像拿破仑的将领，德军的多数成功将领都是老人。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兴登堡（他已在统领第四军团时退休）、麦肯森等人都已年逾七旬，冯·黑泽勒（von Haeseler）元帅更已是80岁高龄。他们都已位列退休名单，好将职位让给更年轻的军官，但是如今却又被召回。在拿破仑时期，年轻人能够战胜资深将领，如今情况却正好相反，无疑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如今确保成功的资质已完全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如今当然还需要大胆攻势，但也需要更多深思熟虑。

### 3 现代战争中的要塞和战壕

当今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关于要塞的概

念。在这里不存在预见性的问题，因为单凭经验便可判断：如果诸如南锡之类的开放城市周围有临时战壕的保卫，便能抵挡围城军队的进攻。但是，安特卫普等地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要塞却在短短数日内沦陷。这场战争将无疑标志着永久防御工事的终结，因为没有一座工事能够抵抗甚至很短的时间。查尔蒙特（Charlemont）的要塞在8月29日受到自75英里之外的攻击，在3天之内沦陷，这期间守军的子弹甚至没有碰到敌军。隆维的要塞在坚持6天之后陷落，安特卫普也没能坚持过两周。当然，德国人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还有比在攻打法国和比利时要塞时所用的射程更远的大炮，因此能够在三四天内摧毁这些工事。

目前战争的结果证明，要塞只是将那些原本应作战的士兵固定住，它们提供的隐蔽不过是迷惑和陷阱罢了。华沙和科夫罗看似坚不可摧，因为前者有30多个工事包围，后者作为俄国后撤的最后一道防线，配备有最先进的现代防御设施，也具有强大的弹药储备，德国人在此处缴获了400多门大炮。

现代战争虽然终结了要塞的时代，但是开启了战壕的时代。战壕是露天的要塞，如果部分被占领或摧毁，就能转移到其他地方。防守战壕仅需很少人力，但是却比构造最为科学的要塞都要

坚固。战壕常常使守方比攻方占据更多优势，因为如果要冲破战壕防线，需要比普通战场上高出10倍的人员和炮弹储备。

战壕如此坚固的一个原因在于，即便费很大力气攻占其中一道，敌人还能在后面再挖几道，于是又不得不发起新一轮进攻。

战壕不仅终结了从前的战略部署，也意味着滑铁卢之类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役的消失。

现代战争中战壕的新颖性在于它的范围、重要性和加固方式，而并不在于它的使用方式，因为战壕其实一直被用于战争中。从前的要塞总是在工事四周平行地挖掘一些战壕，在1640年围攻阿拉斯时，法军便是这么做的，后来在1658年包围敦刻尔克时，也应用了这种方法。

很久以前，战壕不仅被用于进攻，也用于防守。众所周知，惠灵顿迫使马塞纳撤退，是通过双重战壕包围通往里斯本的路线，并分割成两段——前一段长30英里，后一段长75英里。战壕宽度为5米，由25000人用一个月挖掘完成。战壕也在许多现代战争中得到使用，尤其是在特兰斯瓦和日本战场上。

在抗击德军侵略的初始阶段，法国并未使用战壕，尽管军事教材中早已阐述过战壕的重要性。就此我想指出，在1906年10月24日出版并于1911年10月28日修订的《步兵陆地工事指南》中，均有提及战壕，甚至还收录了战壕的几种不同类型，既有露天的，也有上面有所遮盖的。

现代战争中的战壕有几大新颖之处：一、部署了重火力，从而使其真正具备了工事的题中之意；二、战壕本身能绵延长达300或400英里。这一延长本是源于马恩战役后的临时需要——德法两军都要尽力包抄对方，又要避免暴露在对方的火力覆盖之下，唯一适合的掩体便是战壕。因此双方沿着整条战线挖掘战壕，一直伸至海边。这300多英里的地下掩体才花了几个星期就建成了。

接连数月地待在战壕里要求士兵们有不懈的耐心和勇气，因为士兵们不得不暴露于敌军机关枪的扫射与脚下地雷的危险之中。以下这段对战壕的描述文字来自于一位军事作家的亲眼所见：

请想象这样一条沟，有一人身高之深度、两人前后并立之宽度。士兵们就站在沟底开火，火药筒和其他装备碰撞着一面沟壁发出响声，另一面沟壁上掘出些台阶，以便轻松出入。根据地势



不同，战壕的长度也各有不同。

如果有一枚炮弹落进战壕，便足以导致里面所有人丧生，因此士兵们发明了弹片屏障。这些屏障是一些土制的墙体，厚度足以抵挡炮弹碎片，并将壕沟分隔成若干相互连通的部分，每个隔断都留出容纳一人通行的空隙。从上空看下去，壕沟就像一个耙子，弹片屏障便是一个个耙齿，每两个耙齿之间足以容纳三至四个机枪手。如果场地允许，在壕沟一侧或背后还能挖出一块更大的空间，让暂时空闲的士兵稍作休息以恢复体力。这块空间顶部覆盖着厚厚的树枝和泥土，底部铺着稻草。每两道壕沟之间常有过道连通，以便成百上千人在其中来回穿梭——正是通过这种地下工事，敌对两军争相发起进攻。

要夺占战壕已然非常危险，但是此后的防守却往往更加危险。因为这些战壕通常已在此前的战役中被炮弹毁坏了些许，必须顶着敌人的炮火予以维修。一名炮兵说：

我记得在一次进攻中，由于前期火力工作很彻底，受命攻占一组战壕的兵团仅仅花费了13分钟、牺牲了80人便取得胜利。但是之后，他们遭遇了敌人的11次反击战，虽然守住了战壕，却花了整整6天6夜，并牺牲了1500人。

必须承认，战壕除非构造得当、防守有力，否则也并不真正是坚不可摧的。对于俄国人来说，战壕毫无用处。（法军将领不久便亲身体会到：只有将大炮架至要塞前方位置合适的战壕里，才能守卫要塞。一旦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法国许多要塞便从此能够抵挡德军的进攻。）俄国人则不能理解战壕的原理（俄国一份报纸的军事评论文章将其所有要塞的陷落归为战壕的缺陷，也正是该报说：由于缺乏技术专家，俄军没有能力建造合适的战壕抵挡侵略。但是，能力不足永远都是蹩脚的借口。）无法阻挡德军前进的步伐，因此竟沦落到实行焦土政策，野蛮地焚毁自己的城市。

1915年9月3日的《泰晤士报》描述了俄军实施焦土政策以暂时阻止敌人前进的一系列做法：

俄军后撤的沿途已俨然成为一片火海，路边的房屋都被焚毁，绵延有数英里。克莱罗夫的每条街道都在燃烧。当匈牙利人进城时，整座城市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盆，因此他们无法通行，只能绕道而走。当他们抵达弗拉基米尔-沃林斯基时，那里也在燃烧，他们从那里还看见韦尔巴镇和远处的所有村庄——统统都在燃烧。科韦利的整片平原已化为一片熊熊火海，周边所有村庄都在燃烧。没有随俄军撤退的滞留居民惊恐万分，

已经说不出话了。

被焚毁的不仅有村庄，也有大城市。例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原有40000人口，在焦土政策后一切荡然无存，仅有烧焦的残垣。俄军在撤退的路上焚毁了所有东西，似乎尤其重视能将德国人阻止几个小时。

## 4 弹药和军需

当战争爆发时，作战人数被普遍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如今不得不得出这一结论：可获取军需的数量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俄国常常战败的一大原因即军需不足，尽管俄军人数相对敌人要多得多。一位英军将领所言极是：只需两个人和若干挺机关枪守卫战壕，便能抵挡一个旅的攻击。要夺占一个由大炮和机关枪以每分钟600发射击频率守卫的战壕，需要铺天盖地的榴弹炮轰炸。

尽管今天看来似乎非常明显，弹药数量的重要性却在很晚才被认识到。经历了6个多月的战争后，这一理念才被法国、英国、俄国所认可。由于不够及时，已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在战争爆发之际，没有一个法军将领认识到这一事实：必须大规模制造子弹。1914年9月，工厂每日产量不足7000枚，到了1915年5月，每日已能产出80000枚，但即便这一数目仍然不足。

法军将领如此忽视弹药供给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宣战时，兵工厂的多数工人都被送上前线，之后又被分别从所属兵团中抽调回来，但这一过程便浪费了一个月。今天，经验告诉我们，少数人与大量弹药的组合远比多数人和少量弹药更有价值。

## 5 人数因素

充足的军需补给是现代战争的主导要素，但人数的优势同样非常重要。德国人一贯强调人数的作用，尽管他们也很小心地指出其限制。以下是伯恩哈迪的观点：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道德和智力一直是主导因素，在一些可变范围内要强于人数要素。毫无疑问，在一些案例中，道德力量本身便足以抵消其他一切缺陷。个人杰出品质将能提升全军甚至全民族的能力水平.....在一场不确定的对抗中，如果双方实力相当，实力的效果便会逐渐下降，

显示出最高道德和最强牺牲精神的那一方才能最终获得胜利。如果双方的道德水准相当，能够保证最长时间财政支持的那一方将获得胜利。

因此，军队的稳健比人数重要。同一作者又写道：

1870年和1871年时，法兰西共和国派出的大批军队尽管人数占据优势，照样被勇猛的普鲁士军打得落花流水。另外众所周知，日本的军队人数虽然远远少于俄国，却能不断战胜俄国。美国内战也同样如此，南方军队虽然人数占优，却一直输给北方军队的稳健。

尽管如此，如果双方其他差距都不大，那么人数多的一方当然会取得胜利。

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即便是天才面对绝对人数优势也会无能为力；此外，规模够大的群体只要正常发挥，也会战胜一切占智力与道德优势的对手。因此，天才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抗多数优势，因为当多数优势到达某一特定程度时，将显示出势不可挡的威力。

“一战”中的军队人数极其庞大，因为其代表了不同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一些军事作家估

计，德国有900万武装力量。毋庸赘言，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因为这场战争不仅仅涉及各国军队，更涉及各个国家整体，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战争初期，由于采取突然袭击战术和大规模编队，德军损耗严重。自从马恩战役失利后，德军采取了所谓防守进攻战术，即先选定恰当的防守位置，待敌人实力出现减弱迹象时反戈一击。这种方法自马恩战役后使用至今，却并未产生显著效果，因为参战各方几乎完全势均力敌，除非其中一方在实力、弹药、指挥上占据优势，并在敌人前线打开数英里的口子，否则将不可能出现任何变化。如果防线在某一特定位置撕破，整个防守都可能一溃千里。

## 6 海战和空战

海战显然比陆地战争经历了更多发展，因为战役渐渐倾向于在海底进行，而不是在海面上。至于那些花费数百万英镑打造的军舰，能在几分钟之内被一颗水雷或潜艇鱼雷炸沉，未来会不会继续被使用都是问题。潜艇在海战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因为它们不仅通过制造破坏而给敌人带来物质损失，也通过引起恐惧而发挥心理的影响力。正是在恐惧这一心理因素的威慑下，即使最

大的军舰都不得不躲避在港口中不敢再次驶出。

如果德国拥有足够的潜艇，就可以对英国形成有效封锁，但是，至今为止的专家意见都还倾向于部署大型军舰，而将潜艇置于次要地位。这一偏好实在无章可循，因为潜艇在未来的重要性早已被预见到。1905年时，时任英国海军第一上将的费舍尔称，潜水艇将为海上战争带来变革。战前几周，珀西斯科特上将也写道，潜水艇的引进已使水上舰船毫无价值。他说：“潜水艇将把军舰逐出海洋，就像汽车将马车赶下公路一样。”

一个原先为海军总工程师的意大利人建议，将潜水艇改装成军舰与驱逐舰的集合体，既能在水下导航，又在水面不露痕迹，仅露出包含烟囱、发动机和大炮的部分。船体仅在水上部分有装甲护面，因为对于水下部分而言，周围水的密度足以保护其免受炮弹袭击。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文明进入了不稳定状态。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盼望更多其他变化的出现。

## 第二章 战争激发的新型情感与新型人格

# 1 新型人格的出现

一场经久不息的战争，诸如目前使欧洲陷入动荡的这场战争，属于有能力改变人们心理因素均势的基本事件之一。其结果便是：促使人格发生多种改变（已在其他章节中提及）——某个人会做出令其熟人惊讶不已的反常行为，甚至当其本人回到先前环境并试图恢复原有人格时，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

这类变化与引发的事件同时产生。在某一时期，奢华和对安逸的热爱使得人们不可能想过去危险与贫困的生活，也没有准备好日日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战争一旦降临，成千上万的人却能变得与古代最著名的勇士一般英勇无畏，英雄主义对他们来说非常平常。当在文献资料中读到这些人的名字时，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在公民生活中无比平和的人却能在战场上显现出无比的英勇。

因此，“一战”再次证明了我其他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表面上持久不变的人格仅仅来自持久不变的环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人可能变得与之前完全两样，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潜质，在环境的压力下以不同形式出现。因此，没有人可以声称他完全了解自己。



对于军队中的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所有旁观者都为其心态变化而感到印象深刻。有一个法国人如是说道：

我们的士兵们正在形成一种奇怪的心理，环境经常将他们提升到英雄主义高度，他们自愿牺牲、充满狂热并完全无私，却极度厌恶不必要的交谈。在火线上，喋喋不休者是不为人容忍的，因为法国人再也听不进多少好话了。但是，士兵之间及其团结，当需要发动非常危险的突然袭击时，根本不需要寻找志愿者，因为人人都准备好献身。职责与战争使得每个士兵都变得崇高。我认识的一个军官曾经是个猎人，他指挥的士兵是巴黎的一群混混，但如今他们都是出色的军人。在同僚眼中，他们过去的劣迹早已一笔勾销。

（《泰晤士报》，1915年7月27日）

这种新的心态显示出特定情感的变化发展，下面我将指出其中最主要的。

## 2 爱国主义的升华与种族精神的影响

热爱自己的祖国，或爱国主义，使得个人有必要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历经几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与共同利益，种族精神逐渐变得稳定，爱国主义情结也逐渐增强，因为集体保全的

直觉远远超越了个人保全。

种族精神是战争中真正的参战一方，其存在越发受到威胁，就将越发勇猛地捍卫自身。爱国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而非理性的遗传品质，任何仅仅处于理性的爱国主义者都是非常差劲的，他的爱国主义不可能持久。谢弗里荣说过：

如同宗教和道德，爱国主义并不关于理性，而是关于生活。它是一种直觉，是一种随着生活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幻觉与情感，它所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并完善自身展示形式。它部分为保全个体，部分为保全群体，部分为保全种族。因此，如果有人称爱国主义非常愚蠢，是为了死后再无关联的事物牺牲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与其争论，因为其论点本身基于“只有个体才能存在，个人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都仅限于其自身”这一错误前提。与之相反，正如一片树叶的生存依赖并服务于树，一个人的存在也依赖群体并服务于群体，其部分——无疑是主要部分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从这一点来讲，爱国主义是符合逻辑的。当一个人为某样不属于自己的事物而牺牲时，并不是错误或是误判，而是出于集体生活对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平常时期是潜在的，却可能突然苏醒。

由祖先传承而怀有的爱国主义是长期累积的最高作用力之一，总会在关键时刻展现力量。在宣战当天，正是爱国主义将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各派人士召集在一起，正是爱国主义发挥了潜意识的推动作用，使得他们抛弃一切理性论争，同心协力地为其服务。

很多小事都显示了这种情感的惊人影响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即一名士兵于1899年从军队脱逃，成为一名农夫，并与一名德国女子结婚，还生下6个孩子。他对兵役肯定持有极强的憎恶感，因为他为此不惜脱逃。但是，当战争爆发时，他却毅然离开新家庭，返回法国参战。

还有许多类似事件，其中最感人的可能莫过于一名年届花甲的国务大臣报名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参战，最终被炮弹碎片击中而丧生。

### 3 鲁莽与冒险精神

热爱冒险是人性的一部分，并以不同方式呈现，例如：赌博、狩猎、搏击、探险等。

一国的征服者或创建者只有多次将自己置于命运的赌桌上，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于战争来说尤其贴切。但是，

成功的概率比起失败来并不会小太多，因此必须对各种可能性有清晰的概念。

俾斯麦为了统一德国历经了许多冒险。因为若是换作他人，可能还会犹豫攻打看似强大的奥地利，更会为之后是否攻打法国而犹豫不决。

基于很小的成功概率的冒险就是鲁莽，这种形式的勇气既无好处又很危险，并已在这场战争中让我们牺牲了数千条生命。以下内容摘自一位炮兵军官（M.de B.）从前线给我写来的信，之后我还会引用他的有趣观点：

在英勇与鲁莽之间存在许多不同，后者必须绝对禁止和受到惩处，因为后者将害得我们损失整个军团。在德军不屈不挠的攻势面前，我们如此骄傲地鲁莽行事，却经常损失惨重。因为鲁莽，我们失去了一些最好的士兵，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

## 4 战时法国宗教情感的复兴

在法国，战争带来了许多神秘主义的表现，但完全不同于德国在政治上的神秘主义。

在德国人特有的神秘主义理念中，上帝将德

国皇帝命为其在世间的最高统治，从而要与世俗事务保持距离。如今上帝已经选定德国人来改造世界，并为此目的赋予德国人所有优秀的品质，他便再也不必操心了。

德国人的神秘主义理念确信上帝时时在给予庇护，并不需要刻意向其祈求。但是法国的神秘主义理念却不太确信这种庇护，因此要通过不断地祈祷来努力获取。一位知名学者在主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声称：“法国遭遇的这场灾难是对我们所犯下所有罪过的惩戒。所有宗教派别都一致认识到这场灾难的赎罪意义。”

该作者认为，为平息上帝的愤怒，必须发动公众向其祷告，因此政府也收到这样的请愿。当然，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因为一个仅仅能为可怜乞求所打动的上帝，显然对现代人来说过于残暴。尽管如此，这种宗教理论还是影响了战争，谢菲尔将军在1914年12月26日的《高卢报》上发表文章称：

我们很容易理解全能的上帝为何不允许战争拥有我们预期的速度与破坏性，因为这场战争是脱胎于重生，而重生意味着必将有坟墓存在。上帝为法国人安排了一场漫长、艰苦、血腥的磨难，从而促使法国人的灵魂得以重生。这是战争

如此持久的真正原因，它由于超自然而变得最为真实。超自然的力量一直主导着宇宙万物，这无可置疑。

毫无疑问，对于真正信徒而言，神秘主义精神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但是有时也会带给他们一些奇怪的理由。

宗教感情显然在前线出现复兴，但在法国其他地方却并不突出。由于教皇和一些中立国中天主教派的敌意，也由于一些神职人员断言法国的失败是上天的惩罚，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深深的伤害，并开始对天主教普遍反应冷淡。

## 5 战时公众情感的发展变化

要谈论战时公众感情的变化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尽管所有社会阶层的情感和思想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其最终形式却仍然未知。战争停止或是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公众意见，因为事物本身如何，远没有人们如何看待它们更为重要。一个坚信自己必将失败的人不久便将看到失败真正降临。目前，世界受到集体观念的统领，这种集体观念形成缓慢，一经完善之后却有不可阻挡的力量。因此，德国为赢得民意而大费周章。但是德国当局扭曲了太多事实，

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陈述。尽管如此，德国人关于最终胜利的神秘主义信念并未减弱也不会减弱，除非感到战争之神放弃了德国。

一个人可能放弃发现不同国家间真实民意的尝试，因为媒体仅仅报道各国政府允许的内容——或许英国除外。我在此节选了一份匈牙利报纸的文章内容，仅仅作参考资料，并不做任何强调：

在这场已持续8个月的可怕战争期间，公众情感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中，全民都充斥着狂热情绪。到了第二阶段，人们的脾气发生变化，公众渐渐对战争无动于衷，无人对胜利欣喜若狂，也无人对失败激动万分。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公众情感的第三阶段，一种极端的紧张与兴奋取代了先前的无动于衷，产生了极强的反应。公众情感会对任何刺激产生反馈，并被最小的事件所触动。人们的悲痛从未像现在这般深刻，对逝者的缅怀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心碎，对所有事件的感触也不像现在这样丰富。这一切已远远超出了精神上的兴奋，几乎成为一种病态现象。（《匈牙利日报》，1915年4

月4日)

本章和下一章将会向我们显示，我们将如何大大调整关于人格一成不变的旧观念。我必须重申，构成人格各种要素的集合仅仅由于社会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稳定而维持稳定。由于遗传而累积的影响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心理内核，不确定的环境却可能为其带来一些新的因子，从而改变人格，将个体转变成完全陌生的人，不仅使同代人震惊不已，更让子孙后代为之迷惑不解。

### 第三章 作战勇气及其起源和形式

#### 1 勇气的不同形式

生命是人的宝贵财产，但在特定情形中人却甘愿牺牲生命，尤其是当遵从祖国号召的冲动超越自我生存的天性时。勇气可帮助人们反抗对于危险的天然畏惧，其包含不同元素，并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一个整体组合。勇气可能是偶然的，因此相对容易实践。但若要保持不断地保持勇气却困难得多，除非习惯已将勇气变成潜意识的一部分。

“一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能够就勇气这一主题进行许多有趣的思考，因为在不同战



场上的观察记录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在从前线收悉的诸多信件中，我挑选了以下这封来自炮兵军官M.de B.（上文已提及）的信件：

关于英勇这一概念，战争已使我对之前总是混淆的诸多有关品质做出区分。首先，我开始意识到西班牙语中为何有这样一句话：“他只在今天勇敢。”关于英勇，最值得钦佩的是一个人能够离开安全地带，不受战斗的刺激，冷静地投身经过完全估计的已知危险之中。

真正的勇气是谨慎的，严格限制于必要，更不会威吓或咆哮。除非人们开始动摇，必须跟随榜样的力量。

一个人的勇气完全取决于环境，这对于耳根子软的法国人尤其适用。换作德国人，肯定会在在这方面少些波动。

士兵对于司令官的信心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仅仅由于不同的领导方式，同一拨士兵可能在相同情况下成功，也可能失败。

自从战争开始，法军的勇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摒弃了所有草率和冲动的特质——他们使我们损失惨重。起先，士兵们听命于指挥官一

成不变的过时战术指导，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并疯狂地向敌人发起冲击，使得敌人不费一兵一卒地获得胜利。显而易见，这种战术很快便导致法军的惨败，与法军将领的无能一道为德军的胜利做出贡献。

在1914年10月5日的《费加罗报》中，一名德军将领在访谈中强调了这一点：

你们的步兵值得表扬，但他们有非常严重的缺点——其中最危险的便是他们的勇气。你们的步兵不做任何保护便暴露自己，似乎很乐于让自己成为攻击目标，因此瞄准他们并开火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的所为当然十分英勇，却也十分荒谬。你们法国人认为勇气总是有益的，确实，勇气在攻占要塞或白刃战中至关重要。但是太多勇气常常是更加麻烦，而不是优点。你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确是事实。你们似乎不知道，若要攻克目标，首先必须隐藏自己，在伪装中靠近目标，尽量不向敌人暴露自己。在地上挖个坑并藏身其中，利用乡间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处坑洼，看得见敌人但不要让敌人看见自己。

或许你们某天终将从我们这里学到这一切。在战斗中必须冒险，但是在战争之外不要做无畏的冒险。

最终，士兵们通过亲身经历学到了这一切指挥官们在和平时期忘记教授的知识。一名法国军官在1914年11月29日的《闪电》上发表文章总结了法军的变化：

我们关于勇气的概念已经发生转变。我们的勇气并未减少，却变得更加温和适度、更加有所保留、更加小心谨慎——总而言之，更加讲道德。我们原来的勇气与杰出、高贵相挂钩，勇敢的人总能突显于整支队伍。从第一刻起，他们便被视作军中之花，也明显在队伍管理中受到特殊对待。但是，当群体不存在时，例外也不存在了。在战壕中，一个士兵的勇气只有两个见证者——这相当于没有。战壕中的勇气不会带来荣誉，而且通常是不自觉的表现。这种勇气几乎完全等同于保持冷静，以便允许头脑和意志充分发挥功能。那些伊普尔战役的幸存者将会感到足够光荣，因为他们毫不疯狂，也没有露出任何疯狂的潜质。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赢得的荣耀，这并不得益于少数人受性格或环境激发而展现的品质，而是由于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品质。

以上言论清楚地向我们展现：间歇性的、莽撞的勇气已经被一种持久、深思熟虑、谨慎的勇

气所取代，这种无畏将在当前发挥更大作用。

在战火中观察到的事实向来都尤其有趣。以下是若利沃博士（Dr.Jolivot）给我写的信，其中对军官们所发挥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见解：

在重火力的影响下，士兵们变得像受惊的马匹，但还能够盲目地听从长官的指令，如果指挥官们不在了，这些士兵都会很快崩溃。在阿尔贡战役中，我看见一支连队在受到第一次攻击后便迅速溃败，而其他仍然有指挥官的连队却保持稳定运转。这些人或许能够再次集结，但除非长官们能够用声音和行动传递信心，否则一切都是徒劳。这些士兵可能抛弃枪支和行军袋等最有价值的物品，其中部分人还有可能发起暴动。

## 2 英雄主义

现代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必然会导致失败或英雄主义。幸好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所见的是英雄主义——事实上它是如此普遍，可被视作一项基本品质。简单一瞥英雄事迹簿上长长的名单，都会让人对此确信无疑。以下是我随机挑选的一些事例：

126步兵团的一名预备役士兵首先歼灭了德

军所有有机枪手，然后只身跃入由20名德军守卫的战壕，击毙若干，并与剩余一些人展开白刃战。

第三轻步兵团的一位士兵和三名战友受命于1914年10月8日侦查敌军位置。他发现埋伏在篱笆之后的40名德军，杀死其中18名，其余敌人侥幸逃脱。

第四骑兵团的一名下士尽管只身一人，却凭借冷静和勇猛俘获了德军一名上尉和23名士兵。

一名海军士兵，为了掩护同伴撤退，他独自坚守战壕，面对上百名敌军，且只有若干沙包作为防卫。尽管他的一只手臂被刺刀扎伤，却成功地拖住敌人并重新返回队伍。

319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单手杀死4名德军，俘获8名。他两度受伤并被送往后方，却未等伤势痊愈便主动返回队伍。

此类英勇壮举数不胜数，存在于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士兵中，因为英雄主义不分等级。但是，这些都是间歇性英雄主义的例证，现代战争中的战壕却使持续性英雄主义变得不可或缺，并呼吁下文中提到的勇猛。

在1914年11月29日的《闪电》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一名在伊普尔战役中生活在战壕里的军官说道：

24日晚上，我们突然被派往伊普尔附近火线上的一个战壕中，我们在那里蹲守了12天13夜，我在第13天时负伤了。我们全身都是泥土、夜晚被雾水打个湿透、久坐到全身麻木，那些子弹与炮弹却像冰雹一般，日夜从未停止袭击，甚至从未停过一刻钟。

.....我们要向所有戏剧性的英雄主义梦想说再见了，势如破竹的进攻、用敌人的血染红刺刀.....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与此相反，我们被炮弹爆炸的浓烟呛倒、被其巨响震得双耳发聩、被掩埋在弹片中；我们听到伤员的惨叫，却无法移动过去救援他们；我们的脸溅上了一个战友的脑浆，看到另一个人的手臂被炸飞，扶起双脚粉碎的第三个人，又搬走胸腔破碎的第四个人。我们不得不目睹和听见所有一切，我们尽管会战栗，却绝不会畏缩。尽管命运最终将让我们躺进坟墓，对我们而言这进程似乎加快了——因为我们此刻便如同被活埋，并为这地狱般的折磨日夜祈祷。

莱昂·布尔茹瓦（Leon Bourgeois）将战壕中

的生活总结如下：

他们的双脚在冰冷的水里，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沉默地忍受，听着夜晚最微弱的低语，一直不能睡去。他们的双手紧握步枪，时刻准备战斗或死去。一夜接着一夜，一连数百英里——他们都是警惕、冷漠的。他们的指挥官们就在附近，也同样保持沉默。但是当战争打响时，他们便见不到指挥官了，那些指令只能通过电话从远处传达到他们这里。子弹在呼啸，大炮发出突然的轰响，这些强大的破坏物落在战壕上，将它淹没。当一轮袭击风暴过去后，他们便集合队伍，清点剩余的士兵。没有一刻的迟疑与困惑，沉默的士兵们与指挥官们迅速再次就位。

当次日的军中公报描述这场战争时，会用一些直白、简洁的语句概括整场英勇斗争，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些士兵或指挥官的名字。从最高到最低级别，这些军人的脑海里从未出现过荣誉。

### 3 习惯对于勇气的影响

现代战争要求持续的勇气，而习惯在其起源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因为这种勇气是通过重复经历相同危险而形成的。通过习惯，士兵们最终从间歇性勇气迈向持续性勇气。

当我在叙述战壕生活的艰苦时，不能做任何夸张，因为出于不同习惯，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一个总是生活在阳光中的人若展望矿井中的生活，想到那些持续存在的爆炸危险，就会觉得离开阳光、宽敞的环境而前往只能爬行前进的黑暗洞穴，就如同离开天堂进入地狱。但是如果老矿工退休后，或许会怀念先前在地下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那才是天堂，而阳光中的生活才是地狱。

正是出于习惯的力量，战壕里的士兵斗志昂扬，并未显示出任何疲惫。习惯给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当他们从战场上回到工厂、农田或办公室时，不止一个人将会怀念这些致命的战壕。

赫里欧（M.E.Herriot）就士兵们在战壕生活中的快乐做出以下中肯的表述：

这些泥泞的沟里铺着湿稻草，住着我们的士兵。他们确实已到达人类苦难的最大限度，这种苦难包括贫乏、严寒、日复一日的紧张以及没有尽头的危险。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人关于事物的概念有时可能比事物本身要糟糕。另外，人能够逐渐习惯任何事物。我从未听过任何人抱怨，这倒不是由于腼腆，因为我们的士兵毫不腼腆。尽管战壕里的生活条件艰难到了极点，我却不仅没



听到任何抱怨，而且所见的战士都非常愉快，这种愉快源自我们国民性格最大的几项优点——自信、乐观、坚定。

我们必须记住以上几个词，因为那是战壕中士兵们的精神支柱，也是那些指挥官的主要支撑。他们知道其重要性，也采取不同方法予以培养与维系。战壕里的所有人都能很快适应这种可怕的生活，一个在类似条件下生活很久的士兵如是说：

要习惯战壕生活并不算非常困难，至多要花上不超过一个星期。到了最后，士兵们都是如此适应敌军轰炸，以至于如果炮弹响声停止，他们可能会因为过于安静而失去听力。我们每天都能注意到，士兵能随着炮弹的声响入睡，一旦响声停止却会惊醒。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形成了习惯，自从开战以来它的形成速度快得超出人们预期。

前线士兵寄回的所有信件都显示出他们是如何迅速地适应了新生活。以下内容展示了习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显示了法国士兵们是多么轻松地适应了这种战争环境：

此刻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沮丧，无论子弹和大炮如何呼啸，我都不会像一开始那样失去镇

定，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当最初几场战役打响时，我们冲锋过早，因为我们所想到的只有白刃战，最终我们由于过于仓促而被子弹击中。现在不同了，当我们进攻时，我们肚子贴地向前爬行，并利用哪怕最小的土块儿作为掩体，从而得以随心所欲地向德军开火。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子弹来自哪里。上次行动中，我们处于一个几乎难以防守的位置，同时需要抵抗来自侧翼和正面的袭击，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却。

在这里探讨习惯的心理成因并不合适，习惯来自调整适应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无法调整自己，便不能形成习惯。

根据时间长短，习惯能建立临时或永久的自发神经反射系统，请参见一位夜间遭遇突袭的军官所提交的报告：

专业训练的自动作用是多么珍贵啊！几秒钟前我还在做梦——这是晚上唯一的消遣，现在我已站在我的士兵面前，在他们的目光中感到某种神奇的力量。我立即成为冷静沉着的指挥官，坚信自己的命令正确，并自信能够以自身的坚定激励那些软弱的人。

来自习惯的勇气出现在面对已知的危险时，

并不断地在相似情境下加以重复。这种现象常常被注意到，例如总是遭受炮弹袭击的士兵可能不再会注意它们，但是如果投射物发生变化，士兵们可能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不得不形成一种新习惯来克服这种干扰。

我已经阐述了许多事实，足以证明习惯对于持续性勇气的产生所发挥的作用。同和平时期一样，我们在战争时期的行为中四分之三都受习惯控制。

但是，产生持续性勇气的习惯对不可预知的危险毫无效果，因此，对抗不可预知的危险的勇气显然另有来源——其意味着强大的意志、紧绷的神经，很不容易持续。在这种时候，军官们便开始发挥引领作用了。

## 4 心理感染的影响

心理感染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强大的因素，对于士兵的生存更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仅其一项便产生了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或缺的集体凝聚力。

众所周知，心理感染这种现象能够促使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而不是根据自身意

志。它对智力影响很小，却对情感影响很大，在其暗示与操纵下，群体中的所有人的感觉和反应都是一样的。

许多来自各种情感组合的心理状态——例如乐观、悲观、恐惧、勇气等——都可能变得有传染性，某些想法理念也可能偶尔产生传染性，但是这些都与其感性或神秘主义的内容成比例，因为一个完全理性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具有传染性。

当一个人加入诸如军队等某种具备专业特征的集体时，心理感染便对其产生作用了。集体精神随后会叠加在其人格之上，从此他的感觉、思想和意见形成都基于群体的意见，而不是他通常作为个人的所感所想。

塔布罗（Tabureau）上尉写道：

由于某种令人震惊的奇迹，当一个士兵穿上军装时，他的心理状态突然改变了，他的个人感情弱化了，却获得了集体生活的全新感觉。他再也不是杂货商、铁匠或农夫，而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他的个人观点消失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促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如果他听见周围人说“敌人情况很糟，我们可以一口气消灭他们”，他就会确信敌人是软弱、可笑、可鄙的。

但如果周围人告诉他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们被出卖了”，他也同样会确信所有长官们都将他出卖给了敌人。

当我们的士兵们正在战场上时，如果有人喊“各自逃命去吧”，那么他们也会丧失全部理智，像个疯子一样落荒而逃。根本不花片刻时间思考，也根本不去注意危险真实存在与否。

心理感染使得谣言、意见的传播变得非常危险，尤其是当失败已削弱一支军队的士气。以下这封我已提及数次的炮兵军官的信便是例证：

战争开始数日之后，我便发现有一件事证明了您的观点。8月20日在斯特拉斯堡，有传言称敌人的火炮射程很远，我们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袭击。这一传言让几小时前还热情高涨的一队士兵迅速成为一群犹豫不决的乌合之众。仅仅是敌人的火炮，便震撼了军队士气。突然一颗炮弹击中了我的马，我被抛进了一个弹坑中。我也不明白为何会想到您，但在残存一半知觉之际，我震惊地意识到这些士兵受到了心理传染的影响，我们这些炮兵未受影响，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们的群体。5天之后，还是这群人，受到了某些战友事迹的激励，也受到我军在北方取胜传言的鼓舞，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之前那群犹豫不决

的乌合之众再次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不仅如此，这位军官还提醒我注意：“当士兵重新回到原来所属队列中时，他们便表现得异常出色。但若他们被编入其他队列，情况则大为不同——他们一有机会便离开新战友并牢牢地握住机关枪，因为在这陌生环境中，由心理传染激发的自信消失了。”

## 第四章 战争中由于缺少远见和心理错误导致的后果

### 1 政治心理学的普遍特点——缺少远见与洞察力

多数物理现象都能被简化为公式，但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却不能，因为后者包含了诸多不同因素，无法依照某一简单规律予以预见。

即使对于近在手边的事件，预测仍然是毫不确定的，因为并没有太多头脑能够抓住事件发展的最近联结点，更别提更远的结果了。事实上，多数政治家甚至不能在最小限度内预测某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预测遥远未来中事件的难度显而易见，但是

为何少有人能够准确洞察却不易理解。历史显示，政府虽然拥有所有信息来源——驻外使节、军事专员们、间谍和其他机构，本应能便利地获得情报，却几乎连邻国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例如：如果拿破仑三世知道德国在1870年时的真正军事实力，就显然绝对不会向德国开战，从而导致法国损失惨重；如果法国了解1914年之前德国的军备状况和战略意图，就可能及时修补我们此前暴露出的所有缺陷，为战争做好准备。

政治家们向来对国民心理暴露出更加不足的洞察力，因为他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成见对他人做出判断，并用同一标准衡量所有人的心理，这显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伟大的政治家向来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但是即便他们能成功洞悉本国国民的行为动机，其他国家国民的动机对他们而言却像一本合上的书。

拿破仑是如此熟悉法国人的心理，却完全不了解俄国人和西班牙人，正是这种不了解诱使他发动战争，从而导致他的帝国最终灭亡。

俾斯麦最卓越的成就之一，便是他不仅深刻了解德国人，也深刻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民。他知

道该做到什么程度、到何处便该适可而止、该如何着手动员民众。通过在电报中改几个词，他迫使法国宣战——或许在两到三天的耐心研究后，法国人会发现真相，但是俾斯麦了解法国人的心理，并推测出法国人不可能有这份耐心。

如果统治者不了解国民心理，通常会付出沉重代价。英国首相由于不了解布尔人的心理，从而将本国拖入特兰斯瓦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毫无用处，因为英国不得不意识到它不可能征服这一个小国的灵魂，最终只好授予其全部自由，并放弃征服该国的一切念头。

第二帝国时期的所有战争史充分展示了缺乏远见和洞察力的政治特征，因为那一时期的每一场战争。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和墨西哥战争——都显示出法国统治者的无知。他们的利益仅仅在于发起一场战争，再无其他，但是他们的目标本该是阻止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从而削弱普鲁士的实力。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法国就不会遭遇之后的战争灾难。

1870年战争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也在最大限度上暴露出政治家们缺乏远见与理解力。如果浏览1865年~1870年间法国的报纸、议会演说和外交文件等资料，并研究从萨多瓦到色当发生的诸多



事件，便会发现这里充斥着错误判断、可笑的预测和各种错觉，到处体现的都是盲目无知，却丝毫没有任何洞察力的迹象。如果这些事件之后能够为人理解，也只是因为他们的后果已经形成，再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了。

考虑到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必须承认即便是近在手边的事件也难以预测。因此，不必感到惊讶——在“一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法国某位最著名的政治家还能够写出以下内容：

奥匈帝国非常安静平和。其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费加罗报》，1914年6月5日）

各方既不能理解目前事件，又对其后果毫无预知，我们对此如何解释？首先，这主要是由于多数政治家都将自己封闭在源于神秘主义或情感的政治理念中，他们并不从事件中推导结论，而是由结论构成事件。他们的理念无关于现实，通常只是他们感情和欲望的反映。

如果我们能够回溯到很多历史错误的根源，我们总能发现其或多或少都是由于缺乏远见、洞察力与了解。

在政治家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中，心理错误

是可能导致最惨重损失的。因此，政治家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一国的命运都常常受他的远见或过失所左右。凭借远见与判断力，加富尔促成意大利统一，俾斯麦成就了日耳曼帝国。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因为统治者缺乏远见而失去色当，并遭受了入侵。个人的意志并不能完全左右历史发展，却至少能够影响历史的前进路线。我们的鲁莽与过失所造成的后果，最终还将由我们自己承担。

政治家犯错通常是由于忽视了操纵其国民的情感、神秘主义与集体作用力的影响。“一战”提供了许多这类错误的例证，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我们巴尔干政策的失败，尤其是当外交家们认为局势明显缓和时，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却嘲弄般地挑起了冲突。

人并不是棋盘上毫无知觉的棋子，他们不在冷静计算下随便挪动，因为在思辨的过程中，过于自信总会导致人们不能理解起初的动机。

预见未来的天赋对于政治家总是很有用的，但对于个人而言，并不见得特别有益，克莱蒙梭如是说道：

根据长期观察，我发现看得太远的人总是很

不幸，因为短视的同伴们往往将其视为公敌。没有什么比有限的视野更容易助人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了。历史上每一个坏政府的行为都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应当暂时把这些大而化之的内容放到一边，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在战前和战时犯下的一些心理错误。

## 2 法国的心理错误和缺乏远见

法国犯下了许多心理错误，其中最严重之一便是对和平的幻觉。因此，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忽视了战备，甚至反对通过三年制兵役的法案。在此期间，德国持续上升的威胁姿态正使得危险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尽管如此，我们的诸多统治者并没能看清这些，他们确信欧洲绝不会在这一文明时期燃起战火，甚至在宣战之时，多数内阁大臣还投票反对三年兵役法案。当德国人在一天天加强战备时，法国人还在梦想着世界和平。

此外，法国统治阶级还认为，即使战争爆发，冲突也不会持续很久，因为那些现代武器——机关枪、大炮、炸弹能够迅速决出胜败。他们认为，征兵制将抽调出所有18至46岁的健全男子，这将大大损害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交战国

最终将受到贫困的威胁。

经验表明，以上这些推断毫无价值。战争似乎更可能持续很久，而不能迅速终结——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寇松（Lord Curzon）对英国的志愿兵们所说：再过很多个圣诞节，他们才能重回祖国。尽管所有预测都与现实相反，人们早已迅速适应了新环境。老人、妇女和儿童勇敢地取代了男人们的位置，靠劳动为国家产出生存资料，尽管社会生活与生产的节奏慢下来了，却并未停止。

此外，法国统治阶级还普遍确信，只需一两场大的战役便能决定交战双方的命运，因为其将牵涉大量作战人员。然而恰恰相反，本场战争的一大主要特点便是极少有大规模战役，只有非常密集的小规模冲突。

很少有学者预见到目前战争中的种种暴行，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并非难以预料。很久以前，我已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就这场正在迫近且不可避免的战争写道：

我们不要忘记，这和许多载于史册的战争一样，是终极的斗争。同样，它也会使得交战国中的一方永远地消失。在这场战争中，将会涌现许

多可怕、残酷的行径，整座整座的村落都将被彻底毁灭，不会剩下一幢房子、一棵树乃至一个人。

我当时确信战争一触即发，便在那本书里又写道：

让我们铭记这一切，便以此教育子女、训练士兵，让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关于和平、博爱和其他废话——当穆罕默德二世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时，那些拜占庭人正是这么夸夸其谈的。

法国前外交大臣阿诺托（Hanotaux）也指出了统治阶级自战争爆发以来犯下的心理错误，数量还真是不少：

列强有重要理由介入巴尔干局势。早在土耳其控制巴尔干之际，列强就应该对其进行削弱与牵制。土耳其从南部对俄国实施了陆海双重封锁，并威胁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领地。非常奇怪的是，法国在外交上未对此表示警惕，也丝毫没有掌握有关土耳其最终立场的准确信息，因此在开战数日之前还贷给土耳其2000万英镑。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法国在之后显然必须有所行动时，却并未采取任何及时有效的措施。我们在此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目前的局势。

### 3 德国的心理错误和缺乏远见

法国人的心理错误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涉及心理准备不足，并最终导致了灾难。德国人也犯了许多错误，尽管不像法国人那样惨重，却仍然导致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从几年前一位德国名人接受采访的报道中能够看出，德国人主要指望凭借以下因素征服法国：

①法国的宗教与政治纠纷。

②法国国内反军事化倾向。

③法国已形成普遍的劳动者联盟并常常宣布大罢工，因此当战争爆发时，也可能出现军队“罢工”。

④法国人身体和精神的衰颓。

⑤法国陆海军组织混乱。

⑥法国人天性中的和平主义倾向。

事实已经证明，以上推断毫无根据，这点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做出这些推测的人只是在转述其本国内部的普遍想法，却忘了最根本的心理因素——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关键时刻促使所有法国人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德国人不理解的另一件事是：为何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侵犯会惹恼英国，并使得英国国内长期对立的党派立即和解？无论如何，德国人都不会预见到破坏条约的后果，因为德国教科书中关于国际法准则的说法完全不同于英国。此外，德国也不能预知弱小的比利时竟会奋起反抗武装侵略，因为在此德国又忽视了心理因素的力量。

以上种种事例都表现出德国人缺乏远见，正因如此，德国迅速进军巴黎的计划最终流产。

我们早已说明，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错误地认为俄、英、法都不会介入。因此德国建议奥地利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并鼓励其占领塞尔维亚。这也属于本章提出的心理错误范畴。

德国关于意大利的心理错误也非常严重，由于对这一盟友态度过于傲慢，最终还树立了新的敌人。

德国人最严重的心理错误之一，即对所占领国家实施了毫无必要的野蛮暴行。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中立国都与其疏远。这一后果当然不是德国的目的，因为其随后在美国斥资百万买断报纸、印发宣传册、四处演说，只为了改变美国公众的态度。白里欧（M.Brieux）清楚地描述了美国国内感情发展的过程：

一个对我而言最有趣也最重要的事实，即我亲眼看见了美国民意逐渐向法国倾斜。在此我将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Butler）为例：在战争初始，他非常支持德国，并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随着事态发展，真相渐渐变得无比清晰，如今他已经开始坦率地表达对法国的同情了。三个月之后我回去时，他对我的态度比之前热情得多。

在我结束演说时，常有年轻人激动地上前来对我说：“我们是德国人，但是我们希望与您握手。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所以不要让我们再做任何解释。”我当然知道，他们的表现是源于对德军在各地暴行的义愤。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雕塑和建筑的年轻人们甚至交给我一份500多人的签名，以抗议德军的暴行。

德国人的心理错误持续贯穿了战争的始终：



学者们签署了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否定一切显而易见的事实；教授们向中立国公民鼓吹，德国的目标是征服并进一步治理那些小国；电报、小册子、宣传品充斥着夸张与谎言，试图愚弄全世界；德国首相更是无耻地编造出理由，为自己“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的言论辩白。

在以上这些活动中，德国人很少取得收获。他们最大的成就也不过是驱使土耳其对协约国开战，但那很简单，因为只需向土耳其政府亮出金钱和威权——这两样东西向来对土耳其统治者很有效。如今人们承认，如果协约国在1914年12月初允诺一些利益，土耳其将会保持中立，也不可能想要阻止协约国的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只要巧妙地花费几百万英镑，便足以保证土耳其不会制造任何麻烦。

德国人不仅在有关心理的问题上很少获得成功，而且在多数时候都会犯错，这证明了冯布罗关于德国人在政治上无能的言论。这种无能也源自他们对其他国家国民心理的无知，因为德国人总想用同样的标准衡量任何人。

以下段落摘自一份德国报纸，1915年3月29日的《泰晤士报》也予以转载，其中表明，德国人自己最终也承认犯下了许多心理学错误：

我们这么多的计算都错了！我们原以为整个印度都会在欧洲第一声枪响时群起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但是看看，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却和英国人一起与我们斗争。我们以为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会分崩离析，但这些殖民地却与英国空前地保持一致。我们期望南非针对英国的起义获得成功，却只看到了惨败。我们期望爱尔兰发生骚乱，但爱尔兰却把一些最好的部队派来对抗我们。我们原以为主和派将在英国占据绝对上风，但是英国全民都狂热地支持对德开战，包括那些主和派。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堕落了，不可能认真地涉入战争，但英国人却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法国和俄国也同样如此。我们认为法国政府已经堕落，早已失去全民团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法国人也是强大的对手。我们认为俄国政府将不会有所举动，因为俄国人对政府深深失望，不可能愿意为政府出战。因此，我们指望着俄国政府的迅速崩溃。但是俄国政府的动作非常迅速，并成功地动员数百万臣民，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力量。那些诱使我们犯下以上所有错误和误解的人已经为此负起沉重责任。

德国人的心理学错误给每个国家的学者都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意大利学者帕累托在1915年3月1日接受《科学评论》采访时指出：

由于奥地利当局的残暴和德奥想将意大利置于其附属地位，意大利与同盟国这两国的关系已经疏远。

在另一方面，德法之间不可能形成同盟或持久和平，因为德军不仅占据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对其居民进行了残酷迫害，更在通过不断动作想要抢夺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过于激进，未有足够耐心去采取渗透与瓦解手段。如果再等待一段时间，英法两国国内的反战派或许会占据上风。

.....英国和古代罗马一样，能够获得所占领国家人民的友谊，或将其完全囊括于势力范围之内。这便是罗马能够成功抵抗汉尼拔入侵意大利的原因，也是英国在当前保持凝聚力的原因。但是德国却不具备这种统治艺术，看看今天德国统治下的阿尔萨斯、洛林、波兰.....

## 4 俄国的心理错误和缺乏远见

俄国人缺乏远见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德国或法国。其实那并不是缺乏远见，而是源自俄国统治者神秘主义倾向的一系列心理学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俄国人在加利西亚等地非常不受欢迎：当俄国人在战争初始征服这些地方时，却基于宗教原因迫害其新臣民，忘记了宗教信仰其实是一国最

神圣的财富，是无法用武力手段剥夺的。关于俄国人在加利西亚大肆打压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并无具体资料，因此只能从一些国外报纸中获取——这些报纸应该是客观的，因为他们原本一贯亲俄。以下这段来自于1915年2月16日《日内瓦日报》的报道：

根据1914年9月30日颁布的一条法令，加利西亚的所有乌克兰语书籍——甚至包括祷告手册都将被警察收缴并销毁。如不遵守法令，将被判处3个月监禁或罚款3000卢布。禁止一切使用乌克兰语的通信，包括私人信件。奥地利管辖下邮局、铁路等机构的20000名加利西亚员工统统失业，一下子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这些职位空缺全部改由俄国人来填补，尽管他们甚至不懂当地方言。

乌克兰议会代表团主席在1915年4月28日的《日内瓦日报》上发表文章称：

俄国对加利西亚的入侵一举破坏了我们多年的努力，乌克兰语不仅被禁止在官方使用，也在教堂和学校内被禁止。加利西亚的所有乌克兰报纸都受到镇压，图书馆被捣毁，国家博物馆的收藏也被运回俄国。所有乌克兰社团都被解散，数百名重要人士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东加利西亚的所有乌克兰人加入东仪天主教会已有两百多年（在战前几乎无人信仰东正教），该教成了乌克兰的国教，如今却受尽各种镇压。教区总主教被流放至俄国内陆的库尔斯克，许多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徒们在惊恐和饥饿中被强迫皈依东正教。俄国人现在开始将天主教堂改造成东正教堂——“它们在两三百年前就是东正教的，现在理应回归东正教。”

一家俄国报纸称，教廷枢机议会已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俄国人在东加利西亚的宗教生活。沙皇的一份宣言也称：

在历经天主教和波兰人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加利西亚终于回到了俄国神圣母亲的怀抱。

因此，受着残酷镇压的加利西亚人在俄军撤出其国家时，是如此欣喜若狂。

1915年的《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一个法国人在德国的日记》，其中提到：

俄国迫害的唯一结果便是引起波兰人的怀疑，导致他们向德国和奥地利进一步靠近。

该时刊的另一位通讯员也在1915年3月23日

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俄国严酷手段对波兰人情感的影响：

我看到的波兰人非常消沉……其中一人跟我说：“看看俄国在东加利西亚的总督是如何剥夺人民的所有自由的。所有人都开始怀念奥地利的统治，即使是那些原本乐于成为俄国人的罗塞尼亚人。必须承认，这让人丧气。此外，新政府的一半成员都是德裔俄国人，一群前普鲁士密党还在掌控沙俄内阁。他们在1905年违背过沙皇的诺言，如今还会这么做。”

……甚至在华沙也有许多人感到心灰意冷，因为学校刚刚收到新的禁令，迫害仍将继续。报纸甚至不被允许谈论任何有关沙俄王储的事。

这些愚蠢的规定几乎将人带回遥远的野蛮年代，也证实了波兰人的怀疑。波兰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贾沃斯基（Jaworski）在1915年5月15日的《科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称：

会有人相信我以下所说的一切吗？在俄军占领的波兰全境内，所有波兰家庭——所有，我必须重复，都在为亲人们痛哭，他们的亲人只是太热爱祖国、热爱自由了，因此或是被绞死，或是在俄国监狱里被活埋，或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

地里度过余生。

所有爱国的波兰人都深刻了解情况的严峻，并确定了一条行动路线。他们拒绝了俄国皇储诱惑性的许诺，因为他们知道波兰与俄国在文明和国家利益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俄国胜利了，波兰必然毁灭。

我一直关注俄国在加利西亚短暂统治中犯下的那些严重又愚蠢的心理学错误，因为它们证实了我常常在书中提及的理论——神秘主义的心理因素完全超越了情感和理性因素。个人若受到神秘主义的驱使，便会失去了一切理智，全然无视自身利益，也不会受到任何论证的影响。

## 第五章 源于心理错误的战略错误

### 1 战略中的心理因素

所有伟大的将领都坚信，战争既有关于战略，也有关于心理学。拿破仑说过：“在战争中，士气便是一切。士气与意见的威力相当于物质力量的三倍。”

战略错误可能由军需不足、意外事件等各种原因导致，但多数都仅仅源于心理因素。例如，

我们由最权威当局处得知，协约国之所以在战争初始表现不佳，完全是由于指挥官的懦弱和缺乏远见。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在战争时期，诸如坚持、耐心、主动等心理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场战争中，如果起初便犯下心理错误，那么之后可能导致许多战略性错误。例如，法国政府非常了解德军在1870年时的有生力量，因为这一信息在许多文件中都已得到披露。尽管如此，法国还是做出了错误比较并导致了许多误判。即便有梯也尔这样的杰出人士，法国依然以为德国的军事力量绝不会超过法国国民军，尽管后者当时主要由平民组成，严重缺乏纪律性和军事训练。

## 2 法国方面源于心理错误的战略错误

“一战”与之前的所有战争并无相似之处，其不仅比先前有了出乎意料的新发展，还揭示了一些普遍规律的运作方式。伯恩哈迪在《现代战争论》一书中清楚地展示了一些绝对重要的规律：

战争同重大的社会事件一样，在其中总会不断出现一些特定的规律和现象，而且原因和结果之间常常存在一些永不改变的联系。某些情况和原因将永远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大多数特殊现



象都在不断变化。

我无法列举所有错误，只能提及其中一些代价最为惨重的——原本只需一些远见便可以避免它们。

要说法国将领在1914年还不了解德国的军事手段，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某种我所称为“阶级虚荣心”的情感却让法军将领们相信，法军的作战方法更好，直至第一场惨败便让他们知道，德军的作战手段无人能敌。在那时，法军既没意识到大炮的攻击威力，也没意识到战壕的防御能力。这些都能轻松地阻挡德军入侵，但到法军意识到时，为时已晚。在和平时代，这些事情必须引以为鉴。

我们必须承认，法军非常漠视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当战争爆发时，我们再次见证了45年前所有错误的重现——缺少侦察，没能利用自然地势找好隐藏地点，过远发起进攻又缺少火力支持，等等。幸亏我们这次够灵活，成功地改正了这些错误，但却损失了许多人员，并招致数场失利。如果我们的军官看到过德军的大练兵，就会了解所有要点。这些人之所以会忽视如此重要的事情，是由于他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已根深蒂

固，容不下任何与之相左的观念。因此，专家们向来都只能接受自己的想法。如果您将这一规律代入周围某些朋友身上，就会很快发现这完全正确。

在所有源于心理成因的战略错误中，我们可能提及对兰斯教堂的轰炸。法方只是听信一些军官说兰斯周围的要塞已经保不住了，因此下令守军撤退。事实上，只需稍作努力便可以使这些要塞变得坚不可摧，因为德国人在攻占其后在此驻留了一年多，并从此处向教堂大肆开炮。关于这次不可思议的撤退，即便是军方人士也不能给出解释，下令这场撤退的军官必将长期对此耿耿于怀。1914年10月初，谢尔菲斯（Cherfils）将军就兰斯要塞的重要性说道：

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抛弃了埃纳防线，也抛弃了兰斯四处壕沟却毫无损伤的要塞。那些要塞都变成野蛮德国人军事行动的坚实阵地，他们从那些地方向兰斯进行轰炸，并致力于破坏其一切宗教、历史、艺术瑰宝……

在战争早期，法军将领们还抱有非常奇怪的幻想。1914年8月25日，即德国入侵法国并闪电进军巴黎之时，法军官方公报称：

我们完全保留了利用铁路系统的自由，所有海域都为我们补给开放。我们的举动帮助俄国进入战斗状态，并直插东普鲁士的心脏地带。

实际上，俄军离直插东普鲁士心脏还差得远，恰恰与此相反，普鲁士军队此时正在直捣俄国的心脏地带。

从心理学角度看，法军的公报也是站不住脚的。例如，12月5日的公报称“兰斯遭到极其疯狂的轰炸”。德国当然希望这一事实为人所知，但我们却不应告诉公众100万法军竟无法抵挡几千德军，任由他们在法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大肆破坏。

在法国犯下的所有源于心理的战略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即在战争开始时，法军将领相信德军会取道阿尔萨斯。因此，法军所有兵力都向东集结，而实际上敌人却从北方发起入侵。法德两国的学者都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证德国将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境内。直至8月中旬，《泰晤士报》的军事评论员还以地图说明，德军30个军团已在法国北部和西部集结完毕，而在东部边境上只有三四个军团，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这些错误概念的力量太强大，以至于法军将领毫不动摇，其最终苦果便是沙勒罗伊的惨败。

### 3 海战中的心理错误

心理因素在海战中对协约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协约国海军的糟糕表现完全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胆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精神影响可以使物质力量毫不发挥任何作用。当然，协约国中并不缺乏勇士，但却大大缺少果断与有魄力的人。战争伊始，当哥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轰炸菲利普维尔后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如果协约国的地中海舰队能派出些许军舰紧随其后，我们早就能在君士坦丁堡了，也不会在之后再为攻占达达尼尔海峡损失太多军舰和人员。当时指挥舰队的将领本可以轻松穿过海峡，但他却并不敢这样做。

即便是海军内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协约国缺乏远见，还在海战中犯了许多战术错误。海军上将德古伊（Degouy）在《巴黎评论》上说：

首先，这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将影响我们在未来的所有行动。协约国舰队在一开始未能发起迅猛攻击，因此未能释放全部战斗力。

.....我们在战争开端便失去向奥地利舰队给予沉重打击的机会，我们本可以让其长期无法恢复战斗力的。

我们的海军没有准备好开展有力行动，一是由于缺乏准确信息；二是由于缺乏辨别我方和敌方在交战时将采取哪些行动；三是由于缺乏军事洞察力或政治智慧；四是由于缺乏进攻性心态。谨慎——我不愿将此称作怯懦——对我们来说是更加自然与容易拥有的心态，它毫无争议地取代了敏锐、镇静、自信、大胆这些成功的要素。

这位作者还指出尽管英国海军比对手强大得多，却在战争初始表现得胆小懦弱：“在这一事例中，强者对弱者系统地采用了消极防守战术。”事实上，当战争爆发时，德国舰队尚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

当时（7月25日和26日），德军舰队正在卑尔根海岸附近，远离基地——舰队必须回到基地更新设备、添加燃料、增加补给，才能为一场决定性的重大交锋做好全部准备。除此之外，对德国更不利的是，英国舰队正是空前强大的时候。

以上作者评论称，他无法理解英军如此小心的谨慎的原因：

英国的举动完全不符合那句名言，“敌人的海岸便是英国的前线”。当时，英国完全有时间做出一切准备——组织潜艇防卫、核对舰艇与海

岸的信号、装备辅助船只并集结作战单位、加强海岸防卫力量.....但是英军并没有抓住机会积极行动。

在波罗的海地区，情况也同样如此，英军还是毫无动作，显得非常迟钝。

英国海军的怯懦或许源于其政府内阁的犹豫不决，但是这些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危险却再次证实了一点：决断和远见对于一国统治者非常重要。

目前的战争也同样让英国政治家们看到，其前任是多么缺乏远见。黑尔戈兰（Heligoland）岛是德军最重要的海军驻地之一，因为其靠近海岸，并保卫着汉堡的港口。因此，如果这座岛能被英国占领，便可能改变战争的整体格局。数年前，这座岛还属于英国，但是索尔兹伯里爵士于1890年将其让给俾斯麦，以换取德国对英国在桑给巴尔管辖权的认可。他无疑认为自己的所为是抛砖引玉，但事实上却是得不偿失。这又佐证了我在《政治心理学》中提出的一条结论：“缺乏远见的政治家是灾难的制造者。”

俄国方面也犯了类似的心理错误，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海军上将还说过：

俄军有鱼雷艇、驱逐舰、布雷艇、扫雷艇和潜艇等，数量同法国和英国一样。事实上，他们在波罗的海还有许多轻型舰艇，但也同样从不利用这些无价资源，除了简单的防守。俄军也许是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没有做好立即发动攻击的准备，也许还出于成见认为德国海军还如以往一样胆怯、保守、不足为敌——但德国海军的力量早已突飞猛进了，并还在德国造船业的推动下持续扩张……

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反复指出的那条规律：在战争中，心理因素是物质因素的灵魂，因为后者如果缺少强大意志的推动便毫无价值。

从我的上文所言中，读者务必不要认为协约国舰队在战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诚然，它们曾经胆怯地在港口的钢丝网后面寻求避难，但是它们确实上了战场，而且它们的存在本身便给予我们海权，阻止德国舰队入侵北海和波罗的海，也切断了德国舰队与他国舰队的交流联系。英国舰队尽管行动稍显迟缓，却还是为国家赢得了海上主导权。

## 4 德国的战略错误

德国人的心理错误当然没有其对手严重，但

是数量仍旧不少。正如我已在上文指出过的，他们做出了许多错误的预测。

伯恩哈迪意识到了战壕的作用，他在《现代战争论》一书中说道：

我们当然不会藏身于土墙与壕沟之后，德国人的天赋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一个全力捍卫自身的人不会轻易牺牲行动自由，躲进壕沟里。（vol ii p 250）

尽管如此，德国人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进入壕沟。

德国最具名望的将领也同样对未来局势做出了许多误判。一位瑞士作家写道：

冯德戈尔茨元帅并不是第一次做出预言。当1912年巴尔干联盟成立时，他还十分健谈。他应当比任何人都了解土耳其军队，因为那正是他一手组建的，因此他的门口围堵着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甚至法国的众多记者。他口无遮拦地向记者们宣称：可怜的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将会遭遇惨痛打击，土耳其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人人都相信他，他的这番预言也主导了奥地利与德国的全部政策.....随后



发生了阿德里安堡的占领、萨洛尼卡和约阿尼纳的占领、科索沃与莫纳斯提尔战役等一系列惨败，证明这位伟大将领的预测完全错误。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为此倍感耻辱。

与操纵心理相比，开枪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由于不善于操纵心理，为自己招致许多敌人——这些本是他们可以轻松避免的。无论如何，他们的心理战术只注重一点——恐吓。这便导致了我們今日所见的结果。

德国人从未成功了解过敌人的心理，这是他们那些战略预测经常失误的原因。费伊勒（Feyler）上校就此指出：

在战争中，政府有15个月都在承诺尽快达到远期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从未得到实现。德军原本计划在6周内攻占巴黎，却没有考虑到意外事件的影响；他们计划在秋天进军加莱，却无法绕过比利时军队的抵抗；空军本打算轰炸伦敦，却没有对伦敦造成太大影响，反而大大破坏了空军的名誉；海军潜水艇本应封锁英国，却毫无建树；他们还打算在华沙、维尔纳、里加等地围堵俄军，却反而受到俄军的大肆进攻。

# 卷六 德军在战争中运用的心理战术

## 第一章 德军作战方法的心理基础

### 1 战争的目的

德军在打仗时缺乏道德观念，这点无可厚非，因为虽然他们经常用错了手段，但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心理战术。德国作家曾写道，战争的目的即是使用一切手段摧毁敌方的意志，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手。

“只有屈服并消灭了一个国家的灵魂时，才能称之为胜利。”

支配敌国的国魂即是道德效应，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心理层面。不仅如此，德国人不仅仅把战争作为掌控对手意志的手段，还把它作为展示自己国家道德优越性的决定性手段。

这个观点最先由黑格尔提出，后经很多作家加以丰富，最终形成了现代战争学观点。德国作家泽贝格（Herr Seeberg）在一篇题为《战争的道

德正当性》的论文中曾做出过评论，后被意大利《科学评论》在1915年5月刊中总结为：

战争修改了真正的历史价值和力量的关系。它根据国家实力重新定位了国家的地位，并给予他们与自身能力相符的活动空间。战争加速了揭露真理的进程。这就是战争在历史上的道德重要性，我们必须寻找到战争的正当性。没有人认为战争仅仅是炫耀武力，因为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战争恰恰相反。

战争不仅是展现武力上的优越性，也是展现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战争是评断历史的最伟大的法官。有些国家可能崛起，有些国家可能衰落，但战争的评判却永远是公允的。

在审视影响德国人当前的战争心理原则之前，让我们先来回想一下文明国家为了限制战争法则所做出的一些尝试。

## 2 战争的法则

历史上似乎只有瑞典人讨论过战争法则的局限性。波利比乌斯说：“所有战争都是对现有法则的破坏，但战争也有自己的法则。”

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罗马，统治者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则。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毁灭城市，屠杀臣民，幸存的俘虏则被当作奴隶贩卖，或者为了取悦大众，被放在竞技场中被野兽生吞活剥。当时的作家都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即使抗议，程度也不激烈。

这些观念和战争法则都长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情况稍有好转，人们已不再屠城，伤者得到救治，其他改善手段也已出现。

几年前海牙国际法庭上出现了旨在修订战争法则的案件。几个知名的法学家试图成立战争法，虽然他们的努力令人敬佩，但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构想根本无法成为现实。他们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除非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保证遵守战争法，否则战争法本身将毫无意义。《海牙公约》只会对那些遵守公约却被无意遵守的国家侵略的国家造成伤害。这正是德国人的想法：德国人同意通过了他们从来不打算遵守的《海牙公约》，以此制约他们的敌人的行动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德军违反《海牙公约》的行为与大部分法学家的理论不谋而合，他们一直都对试图限制征服者的意志这一做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只要没

有人强大到奋起反抗，征服者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

自格劳修斯以来，几乎每一个德国作家都承认除非出于自愿，否则战争法将对任何国家都毫无约束力。吕德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有时候必须采取一定的恐怖手段以快速结束一场战争——例如对平民毫不留情地施以惩罚。德国人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征服者屠城并掠夺财富。

这个观念与古代的观点如出一辙。在古代，敌国之间没有法则可言，只要征服者认为符合自己的利益，便可以选择杀害伤者和屠杀囚犯。在德国人看来，战争不过是动物王国里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无谓之争，要么做猎人，要么沦为猎物。因此人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理论学家对古时骑士精神遭到无情破坏根本毫不在乎。在另一章中提到的杀戮和毁灭不过是德国人秉承原则的一种应用，正是这些原则激发了德国军事作家的灵感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指令，具体请参看下文。

### 3 德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心理原则

我之前提到过德军引起举世公愤的一些行径，这种行径不仅是个别士兵或堕落的知识分子纵容自己残暴本能的体现，而是德国人长久以来

坚持原则的结果，这些原则由德国理论学家制定，由德国军事作家传播，最终影响了日耳曼军官。其中一些著作由安德勒教授翻译并在1915年1月15日的《巴黎评论》上发表：

德军总指挥部称：

因为19世纪的道德理念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往往沦为感情用事或多愁善感，所以对于有效战争手段的研究常常违背了战争的本质和目的。而未来关于战争手段则给予了我们无限可能.....通过仔细研究战争史，我们可以完全驳斥那些被夸大的人道主义理念。

据克劳塞维茨观察：

任何一个发动战争却不感到愧疚，也不吝啬流血的人，一定会占到上风，除非他的敌人也不心慈手软。若要把中庸之道引入战争哲学，无疑是荒谬的。

哈特曼将军说：

实用的军事理论存在自己的专属利益，必须凌驾于国际法律的科学要求之上.....当战争手段需要动用一切资源时，任何对战争行为的限制都

会削弱整体的战斗力……国际法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给战争设置了障碍，就有可能导致军事行动陷入瘫痪……

从本质上来看，战争就是对现有文明和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则的破坏，因为战争会取代它们的位置，并将武力和个人权力合法化。文明不过是通过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以此支撑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保障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布伦奇里曾经提出过“文明战争”的说法，这当真是无稽之谈，因为文明和战争本来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

只有对敌人施以折磨和伤害，才能真正抑制和摧毁他们的意志。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其效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对作战对象的完全征服。

冯·布鲁姆写道：

战争旨在增加对敌人的伤害。……战争中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进攻对方领土，这是为了扩充军饷，或者使对方市镇彻底陷入瘫痪。

哈特曼将军说：

我们必须用战争为敌国带去痛苦，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必须一直将战争的包袱压在他们身上，这就是国家战争的宗旨.....从军事层面来说，一旦爆发战争，恐怖手段必须成为国家的作战原则。

而对战争征税的权力则是由克劳斯威茨最先提出的：

为了战争而增加税收是国家理所应当的权力，其唯一限制条件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过于贫弱，或者趋于灭亡。

德军将领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更加明确。哈特曼将军说：

税收不仅意味着在侵占地区积累军需，更包括对该地区方方面面的搜刮.....

所以我们在此声明，首先，出于军事需要，不需对公共和私有财产进行区分，军队可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声称对财产的所有权。

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军队应当享有军事行动的绝对自由。这一原则意味着军队必须反对国际战争法中任何试图限制军事



行动自由权的条款.....

这些原则被德国人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本次战争当中，他们毫不在乎那些关于他们破坏了人类遗产和历史文物的抱怨。这点可以从一位德国将军为一份德国报纸撰写，并由1914年12月15日的《世界双月刊》摘录的文章片段中看出来：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们的士兵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都是合法的。如果那些法国人的建筑在我们的枪下毁于一旦，我们根本无所谓.....法国人称我们是野蛮人，我们一笑了之。最多我们会暗自思忖一下，这个头衔有没有道理。我们不希望再有人指责我们破坏了兰斯大教堂或者其他什么教堂和广场，因为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些指责了。如果我们得知我们的军队二次进攻兰斯获得成功，那么其他任何事情根本都不重要了。

德国人十分不能理解中立国家对他们的愤怒，因为在德国人看来，他们只是尽自己义务遵循了实用主义战争理论，而且他们不明白纵火和抢劫有任何不妥之处——腓特烈大帝很久以前说过：“抢劫和盗窃完全是两码事。”

## 4 德军运用的各种心理战术

德国人在战场上运用各种各样的心理战术，比如恐怖袭击、突袭和夜袭等，但所有这些战术都源于同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出其不意地冲击敌方，继而降低敌军士气。下面我将对这几种心理战术进行详细描述：

恐怖袭击——这是德军军官采用的最基本的心理战术，也是德军大屠杀和纵火罪行的来源。我们将在另一章研究这种心理战术的后果，在这里我一笔带过。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致力于恐吓敌军。他们枪杀或者折磨了大批无辜平民，以达到恐吓的效果，最后再烧杀抢掠一番，直至最后的幸存者也变得一贫如洗。建筑都会遭到轰炸，最后除了废墟什么都不会留下。我们很清楚，德军是如何细致地在比利时的城镇和村庄里展开这个心理战术的。将所有人都集中到一个空地上，枪毙其中一部分人，然后洗劫并焚毁所有房屋。这些都是公开行径，并且德国军官们还以此为荣。安德勒说：

在8月22日针对当地政府的声明中，冯·布鲁姆将军提到了德军对昂代恩的大洗劫，他说：“我非常满意，最后总司令下令烧毁了所有房屋，并枪杀了百余人。”

这些指挥者如此野蛮，不过是传承了德国战争传统模式罢了，这种做法在德军之中很常见。20世纪，德皇腓特烈一世时期，每个战俘都要被剁去一只手，在抢掠并焚毁了米兰之后，他还下令杀光俘获的所有居民。在西西里，他的儿子下令将囚犯剥皮，或者弄瞎他们的双眼。1622年，蒂利屠杀了海德堡的所有居民，还烧毁了整座城市。1631年，他洗劫了马格德堡，毁掉了1500座房屋和6座教堂，还活活烧死了大部分居民。萨瓦利特说：

必须指出，德国人犯下的此等暴行必将最终激起对手的报复行为。人们曾经强烈指责卢浮瓦对普法尔茨下达的命令，这在当时震惊了莱茵河左岸，但却是对德军残忍行径的报复。事实上，卢浮瓦就此表示：“如果德国人始终没有学会体面地战斗，那我们必须比德国人做得更没人性。”

德军总指挥部总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直到中立国买账为止。他们甚至声称比利时的神父和小姑娘会挖出伤员的眼珠，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指望这种说法会有人愿意相信。

在敌国领土上开展战争的必要性——这也是德国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要实际运用这个

原则，就必须进行长时间的准备工作，比如建造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仔细研究所有调动与部署细节，等等。德国人太过急于进攻，所以忽略了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尽管这意味着德国有可能与英国交战。事实上，把战场设在敌国具有极大优势，因为这样便于军队对征服地区强取豪夺，从而获取更多补给。一份德国报纸指出：

整个军事行动都基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在军队补给方面，德国花费得越少越好，从敌国获取越多越好，最好能够再把多余的物资运回德国。

整整三个月，五分之四的军需都源于我们已攻占的城市，即使现在补给能力已大大降低，也能满足我们西边军队五分之三的需求。粗略估算，德国每天可以省下300万到400万马克的军费。

胜利带来的收益还不止于此。通过与发达国家开战，我们获益更多。我们可以把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掠夺来的财物运回德国，这些财物包括堡垒、谷物、羊毛制品、金属和木材。德国凭借智慧和商业头脑从战争中获取经济收益，每天可以高达600万到700万马克。自开战以来，西线战场累计已攫取了20亿马克的财富。

综上所述，把战场设在敌国境内的巨大好处不言而喻，几乎无须赘言。尽管如此，法国政治家过去45年来都生活在安逸享乐中，没有认真聆听这样的经验教训，以至于疏于防范。倘若他们认真做过思考，就会尽力守住法国北部边境。从经验上来看，一些战壕本应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抵御敌方进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所有外国军事教材都强调过战壕的重要性，战壕的作用也在日俄战争中得到过证实。

大规模进攻——为取得我前面提到的效果，也就是立即占领敌国领地并成功恐吓敌手，不但需要最先进入敌国，还需要动用武力。在侵略法国和俄国时，德军都成功做到了这点。我在上文中提到，侵略行动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因为如要完成一次进攻，不仅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需要所有储备物资的支援。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收集到相关信息，但是当时德法边境很有可能已经集结了200万德军，这一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

战争后期，德国虽然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但却仍然成功地将大部队集结在进攻点。在第一次佛兰德战役中，尽管面对无数战壕，德军还是以紧密队形不断向前推进。因为这一战术，德军几天内便折损了15万士兵。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获得

成功，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攻下法国北部城市加莱。

威胁恐吓的各种手段，德国总指挥部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削弱敌军士气的办法，他们会采用夜袭、窒息性气体、空投炸弹等手段。事实证明，用气球投掷炸弹并不会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只能影响到敌方的士气。具有最明显心理效果的行动之一，便是趁着英国舰队防范不周的时候，利用巡洋舰向英国沿海小镇投掷炸弹。这种行动其实风险很大，因为很有可能遭遇英国的战舰攻击或者被鱼雷炸沉。但是，由于这一行动极为重要，所以德军还是义无反顾地予以采取。这次行动并未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但是却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这次袭击使得英国政府原计划向法国增援60万军队的计划彻底搁浅。

事实上，这次袭击吓坏了英国人，这是他们即使处在拿破仑时期都未曾体会过的恐怖经历。这促使他们留下了一部分原本打算调遣去往欧洲大陆的军队，以保护自己本土的安全。因此，德军冒着损失几艘巡洋舰的风险，却为自己减少了60万的敌军力量。

所以说，轰炸英国海岸是一场心理战，它与

导致1200名乘客遇难的卢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属于同一性质的行动。只不过德军在击沉卢西塔尼亚号时犯了个大错误，他们没有预见死亡的乘客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人。因而此次事件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愤慨，甚至几乎直接导致美国参战，继而让德国失去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

突袭——当可以采用多种战术时，德国人总是倾向于突袭，所以夜间袭击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了。一名军旅作家写道：

人们并不畏惧强大的力量，而是畏惧未知的力量。危险本身并不让人们心生恐惧，怀疑才是恐惧的来源。夜晚容易催生恐惧，因为在夜幕掩映下，有太多的未知和出其不意。

与此相比，协约国却忘记了军事战争中突袭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协约国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时显得尤为突出。倘若他们在土耳其宣战第二天立即展开行动，打胜仗就会很容易，因为土耳其当时不可能抵御来自海陆的多重同时突袭。但是协约国没有这么做，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商讨哪个国家拥有君士坦丁堡。这种做法无异于在鸡蛋还未孵化出来就开始数小鸡，其结果便是给予敌人充足的时间组织防御。一份英国报纸客观地指出，在这场战役中，英国和法国均未显示出足

够的热情。

在两国尚处于和平阶段便发动快速进攻也是一种打击对方士气的突袭方式，这在现代战争中也较为常见。这种战术的典型范例就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对其盟国希腊和塞尔维亚的侵略。这次侵略以失败告终，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保加利亚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的将军没有消极应战，而是积极反攻，破坏了保加利亚一次又一次的突袭行动，使得原本指望迷惑对手的保加利亚军队反而士气大落。自信本身是好事，但不能盲目夸大自己的实力，也不能指望敌人一定会按自己的设想出牌，因为自己设想的通常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关于现代战争中心理战术的研究，我暂时便探讨到这里，在研究战争中心理战术的特点时，我也已经充分展示了运用心理战术的效果。需要重申，在战场上无论借用了何种物质工具，归根结底都是运用心理战术的结果。

## 第二章 德军对作战原则的具体运用： 烧杀劫掠



# 1 德国战俘日记中对烧杀抢掠等行径的记述

我将要举例证明的烧杀抢掠罪行都是我之前所描述德军所用战术的后果，并通过各种媒介与载体记录下来。

关于事实的准确性，自然难以描述，因为德国人对这些指控全盘否认。但是，类似的证据太多而且相互印证，加之来源不尽相同，所以绝无可能将其全部推翻。无论如何，从德军战犯身上搜出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许多对于罪行的坦白。

在这种情况下，证据的价值更取决于其来源而非数量。比如，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亚述君主会令囚徒们挖出自己的双眼，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将这个场景刻在宫殿的浮雕上。德军战犯的日记本起到了类似的记录作用，尽管他们当时并没有意料到这在今后将成为他们所犯罪行的证据。有鉴于此，德军种种暴行的细节必将大白于天下，人们将会了解，德军方面对比利时牧师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

现在让我们仔细审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首先从德国战犯的日记本开始，我只挑出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以下是贝迪尔教授翻译并发表在

1915年1月1日《巴黎评论》上的文章。文中包括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名和所在军团：

1914年9月3日，在索姆（马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法国平民被直接扔进燃烧的房屋中，活活烧死。

一个撒克逊军官的日记本：

8月24日，阿登的一个迷人小村庄被我军纵火烧毁了。在我看来，这个村子似乎是无辜的，但是有士兵说，有个骑自行车的村民假装摔倒，其实是为了扣动来复枪的扳机，于是我们就将这个村民射杀，又烧了整个村子。

还有一段：

就这样，我们毁掉了8间屋子和里面的住户。其中两个男人，他们的妻子和一个18岁的小女孩儿被活活刺死。我为她感到惋惜，她是无辜的！

还有一本日记本的片段：

8月25日（比利时），300名平民遭到射杀，活下来的人被迫为死者掘墓，你真该看看那些女人！

由于一部分士兵对待他们的战俘较为仁慈，因此第五十八旅的斯坦格将军在8月25日对将士下令：

从今往后，再无战俘一说，我们必须处决所有战俘。无论他们是否受伤，是武装人员还是平民百姓，一律枪决。即使是一个大型军团的战俘，也必须全部处死。我们决不留活口。

某一杂志也刊登了这些日记本里的其他一些片段。以下这则最为骇人听闻：

8月23日，我们抓住了几个自称是狙击队的士兵，我们将其分成三排站好，这样一颗子弹就可以贯穿杀掉三个人。我们占领了默兹，对其大肆破坏。到处都变得乱七八糟，房屋尽毁，那些平民的尸体惨状简直不堪描述。我们还在角落里和修道院里找出一些幸存者，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

保罗·哈扎德是一名翻译官，他翻译了很多德军战俘的日记，我从其处摘录了一部分：

8月18日，我们枪毙了大约50个村民。

另一本日记本：

8月25日夜里，我们杀害了几名平民。你无法想象比利时现在的惨状。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毁了，所有的东西荡然无存。教区神父总是最先受害的，牧师们也不能幸免……

世上的种种恶行本来便无从抵赖，但当这些罪行由德国士兵自己说出来时，更是成了确凿无误、不容置疑的事实，任凭德国百般抵赖都无法推翻。

## 2 关于烧杀劫掠的其他记载

官方文件中记录的军事行动大多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虽然没有上述摘录来得真实可靠，但不管怎样也是确凿的证词，所以我在此引述其中部分内容。以下是从一份官方报告中节选出来的部分内容，有关迪南大屠杀：

在一番烧杀抢掠之后，士兵们放火烧了房屋。这个镇子很快陷入一片火海。简而言之，迪南被彻底毁灭了，原本1400多间房屋最终只剩下了200间。

……委员会手上有迪南大屠杀遇害者的名单，上面有将近700个名字，即便如此，这份名

单仍然还是不完整的。在死者中，有73个女人和39个年龄在6个月到15岁之间的小孩子。

迪南有7600个居民。其中十分之一死于非难，每个家庭都至少丧失了一个家庭成员，甚至有的家庭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1914年11月30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德军在迪南所犯罪行的恐怖细节：

有的家庭被全体枪毙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找来了两把机关枪，上百平民包括男女老少就在露天被全部枪杀了。

对战俘的屠杀和折磨更是数不胜数，1914年12月31日的《泰晤士报》如是报道：

9月6日，一个名叫巴克兰德的骑兵被捕。他被绑起来，被德军士兵用刺刀剖开肚子。在桑布尔维耶，一个法国军官被绑在一棵树干上，他的四肢被分别绑在四匹马上。一声哨响之后，马鞭扬起，马儿奔向四个方向，把人体整整撕裂成了四份！现场目击者至今回忆起来都颤抖不止：“我看见他穿的那条红色裤子被一下子撕裂，整个身子散落成了好几块。”

这份报纸还报道，巴东维莱几名妇女和儿童被浇上汽油，然后被活活烧死。

1915年1月26日《费加罗》报道了隆维一个难民的叙述：

他们把一个老人的脚绑起来，然后用一条电线把他吊在门上，电线不断地勒入他的皮肉中，使得他不断地惨叫。那个老人整整叫了20小时，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比利时发生的众多惨案中，最为血腥的是对鲁汶的洗劫和对其居民的大屠杀。相关报道有很多，但我特别关注了一个名叫福格利斯特的瑞士公民的描述，当时他就住在鲁汶。以下是从1915年5月5日的《日内瓦日报》中摘录出来的：

大屠杀和大火是有预谋的，到了特定时间经过一声令下就开始了。整个场面恐怖得难以言表，德军很快就烂醉如泥，并干出了种种可耻行径。福格利斯特先生听到几个军官说：“……把他们全部杀光、全部烧死。”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鲁汶曾有43000名居民，但现在却只有不到21000人活下来。

福格利斯特先生亲口证实了一系列暴行，他

手上一直保留着证据。在鲁汶发生的惨案让人们见识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

关于官方文档中收集到的一些德军行为，只有虐待狂心理才能予以解释得了：

在某地，182人被枪杀，一个年轻人被活埋，他的头埋在土里，腿在坟墓外面，这样他的折磨者就能一直看着他受尽折磨时的惨状。另外，还有一个比利时战俘的双手被放在锅里煮了。

为了寻找一个适合大规模屠杀的场所，普鲁士人一路拖着一群疲惫不堪的妇女、农民和哭泣的儿童。他们时不时会停下来，因此这些可怜的人以为到了枪决地，于是彼此拥抱，彼此做出临终告别。但是却都不到时候，他们还要继续向前走。普鲁士人会用鞭子抽打他们，用来福枪的枪托推搡他们。最终，一名军官下令他们停下，挨个排好队，让士兵放低来复枪枪口瞄准目标，然后他轻蔑地说了句：“再看你们美丽的祖国最后一眼吧。”

为开脱自己的罪行，德国人声称是那些平民先开的枪，但是对于那些在德国澡堂里洗澡的几千名俄国人受到的痛苦折磨来说，这个理由根本

不够充分。瑞赞诺夫先生的一本书里记载了这个事件。这本书的摘要刊登在1915年8月1日的《两个世界月刊》里。摘要里并没有大肆渲染大众的愤慨，而是主要描述了各个阶层的有识之人特别是那些德国军官的认罪和忏悔。

此外，德军士兵也会当着受害者亲人的面强奸女性受害者，如果这时亲人们显示出一丝反抗，就会立即被枪杀。受到这种刺激，很多人最终因为绝望而自杀或是发疯。这种邪恶行径体现出了德国人性情中残暴虐待狂的一面。这是无从抵赖的。

德国人凶残和掠夺的天性可以说在所有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以下是1807年惠灵顿将军的描述，当时他所在的德国部队在英国部下服役，一起对抗拿破仑：

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德国部队里，从将军到鼓手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是一群嗜血成性、臭名昭著的暴徒。无论路过何处，他们都会杀戮、抢劫、虐待平民。

因此，我所列举的罪行不过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德军侵略比利时不禁令人回想起十几个世纪以前日耳曼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当时同现在



一样，德国人养育了太多的子孙后代，发现自己的国土已经无力养活这么多人，便如潮水般地侵入了邻国的土地。有几次，罗马人曾对这些入侵者大开杀戒，但这还不够。据说普罗布斯大帝曾经杀死了数万名德国人，但依然无法阻挡德国人摧毁高卢战争的宏伟纪念碑。一个世纪以后，德国人卷土重来，却摧毁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如今，德国人更是立誓要鞭笞全世界，正如他们当年鞭笞了罗马帝国一样。

倘若没有德皇威廉二世的直接授意，鲁汶、兰斯和阿拉斯的宗教纪念碑绝无可能遭到破坏。这说明德国皇帝对天主教恨意极深，这点在他早年给改信天主教的亲戚的信中可见一斑。“我恨你信奉的天主教，我要把摧毁天主教作为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1914年10月3日的《法兰西》杂志刊登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里说道：

人们告诉我要对天主教无限崇敬，但是那些天主教教堂在我看来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无礼地漠视上帝，转而崇拜所谓的圣人，而他们在拉丁迷信中大部分都是取代神祇的白痴。兰斯大教堂将他们的法国国王奉若神明，可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通奸者。在兰斯大教堂的门廊里，这

些皇帝雕像的位置居然比上帝的形象还要显眼。

德国人教育我们要配得上自己的民族，当我们提到教堂时就必须对天主教的迷信表示愤慨。

从以上内容便可看出，德国人为何会对古代教堂如此深恶痛绝。

### 3 奥匈帝国军队的暴行

在第一次侵略塞尔维亚时，奥匈帝国军队跟他们的同盟德国军队侵略比利时一样，表现得毫无怜悯。瑞士洛桑大学的瑞斯教授曾赴塞尔维亚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刊登在1915年4月7日的《巴黎评论》上。以下是从报告中节选出的片段，描述了奥匈帝国士兵在长官的命令下的种种暴行：

我亲眼看见了残害和杀戮：受害者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刺死，有的喉管被割开。有的被先奸后杀，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吊死，有的被来复枪或棍棒活活打死，有的被取出内脏，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砍下四肢，有的被割去耳鼻，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被切掉胸部，有的将皮肤切成条状、骨肉分离。最后，有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女孩被扔去喂猪。

这不禁让每个人想起巴尔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打仗时受到的指控。巴尔干半岛国家声称，他们都是半野蛮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都活在互相屠杀中，只有土耳其人才能使他们和平相处。但是因为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德军，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最高形式的文明也不能消除人类的野蛮。我们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学说都必须考虑到这个背景。这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 4 恐怖心理战术的弊端

德军为自己的四处杀戮和纵火申辩称，只有这种做法才能吓到敌国居民，才能迫使他们放弃抵抗，跪下来乞求。

恐怖统治一直是革命家和国王采用的手段，他们以这种手段威慑他们的敌人，让那些对他们心存疑虑、不愿臣服的人以儆效尤。同时，这种施虐还能暗暗满足很多人天性中嗜血的一面。所以，当同样的手段出现在历史上时，我们不应觉得惊讶。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亚述的浮雕表明，的确是国王亲手挖出战俘的眼珠，然后再命令士兵们做一些难度更高的虐待，比如剥下战俘的皮，然后用这些皮来装饰城墙。

我之前还提到过，早期的罗马人跟现在的德

国人一样，对被侵略国家和对战俘的待遇有着相同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任何对于征服者来说有利的战争都是正当的，而战败国毫无权利可言，利益只能最大限度地惠及本国民众，由其独享。

冷酷和野蛮一直是罗马的传统，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共和国后期，罗马人的礼仪和风俗都变得不那么血腥了。《埃涅伊德》里没有记载罗马人的任何野蛮行为，西塞罗称赞马赛勒斯没有毁掉锡拉库扎纪念碑，而同时他却对弗里斯掠劫者大为轻蔑。

当代德国人的残忍在于他们带着我们又回到了历史上最原始的时期，但是他们的谋杀、折磨和掠夺已经形成一定体系，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俾斯麦早就说过，在战争中必须对平民极其残忍，才能尽早达成和平协议。他在1870年说：

真正的战略在于狠狠打击你的敌人。你要尽可能对你进攻城市的居民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以打消他们的斗志，这样他们就会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必须向敌国人民传递这样一个讯息——除了留下他们的双眼哭泣，你不会留下一草一木。

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将战争变得残忍恐怖，

让无辜的平民乞求和平。

我们已经见识了德国人是如何以火一样的热情遵守这个指导思想的，包括放火烧房屋，活烧妇女和儿童，或者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们，但是这些行为除了逼迫居民大规模迁徙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现在从法律或者人性的角度讨论这些做法的合法性无济于事，但我们至少可以反思一下它们造成的后果。这些战术不仅没有如德国人希望的那样卓有成效，甚至还引起了其他国家对德国人的深恶痛绝，从而为德国在世界上树立了无数的敌人。

事实上，恐怖战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有效，那就是战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一旦战线拉长，恐怖战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它只会使敌人奋起反抗，因为一旦被侵略的民族意识到自己得不到饶恕，就会奋力抗争直至最后一秒。而且他们不但会反抗，还会牢牢记住这样的耻辱。开战之前，德国控制着比利时绝大部分的商业，尤其在安特卫普地区。早在和平时期，人人便已承认德国在比利时的地位。倘若德国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如此粗暴地对待这样一个国家。

此外，残酷手段的系统运用是建立在被侵略方永无可能踏入自己领土并进行报复的前提之上，但没有人能保证风水没有轮流转的一天。连拿破仑都做不到。如果哪天10万哥萨克大军踏入柏林，并且对柏林的男女老少施以德国人曾在迪南和鲁汶犯下的罪行，谁来可怜这些德国人？

## 5 德军的辩解

在全盘否认对自己的控告之后，德国人负隅顽抗，试图以报复为由，开脱自己在比利时人和法国人身上犯下的罪行。

众所周知，德国总理在国民议会上发表的言论，在其中他指控比利时小女孩儿挖出德国伤兵的眼珠；德国媒体也报道称，比利时牧师也挖出过德军战俘的眼睛并砍下他们的手指。尽管这些听起来极不可信，但是在所谓的事实面前倒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是这件事彻底推翻了德国人的指控。

德国的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始终存在剑拔弩张的关系，新教教徒早已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就往天主教徒身上泼脏水，而天主教徒为求自保，成立了调查领导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就是澄清对天主教徒的指控。

德国天主教徒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教内的牧师有罪，所以调查领导办公室展开了一系列细致的调查，不费吹灰之力就迫使德国当局承认对比利时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德国人随后辩解道，他们之所以烧毁像鲁汶这样毫无抵抗能力的城市，是因为当地平民先对德军开火。他们认为，平民根本不该掺和到战争中来。但是，一旦这个问题涉及德国的自身利益，规则就反过来了。下面关于俄国进入东普鲁士的段落是从德国报纸上摘录下来的：

当敌人穿过德意志帝国的边境，他们将感受到来自我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我们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任何一个有能力作战的公民都有义务击退这些入侵者，将他们赶回家去。我们整个民族都必须拿起武器，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我们必须用各种方式夺走他们的军火，截断他们的供给，俘获他们的侦察兵，捣毁他们的救护车和战地医院，然后在夜间杀掉他们。

## 6 运用恐怖方法的心理教训

以上我所阐述的烧杀抢掠等行径，早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就被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人使用过了。这种毫无人性的作战方法似乎广为流传，甚

至将我们带回到远古蛮荒时期。

倘若读者认为文明的进步会让人们更加聪明，更富情感，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约束掩盖了一些国家野蛮的本性，但这不过是障眼法罢了，一旦社会失去了约束力，这样的本性就会立即重新显现。

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文盲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天性都是野蛮的，因为人的天性与智力的联系本来就不紧密，而且教育能够施加的影响力更是很小。一旦失去社会约束，德国军人的残暴天性就会暴露无遗。

在历史上，高度发达的文明曾经不止一次与嗜血残酷联系在一起。这种事情在文艺复兴时期、莫卧儿帝国时期都发生过，当时大量诗人、艺术家、学者，这些人为繁星分类，发明仪器测量黄赤交角，但同时也是这些人用战俘的头颅建造了金字塔。

德国战术的广泛传播并不代表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观察家杂志》说：

如果现代战役自此之后不设立一定规则，人类的未来只会是黑暗和不确定的。



如果人类对德国的做法无动于衷，被动承认这是战争所必不可少的元素，那么就无法阻止德国的敌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毫无疑问，未来的战争里所有国家都会采取德国的做法，对敌人不讲人道、冷酷无情，因为凡是遵守《海牙国际公约》的国家在面对无所顾忌的国家时都是异常弱小的。

因此可想而知，人道主义学说正在逐渐退化，这一点通过对比德国军官的言论和他们对烧杀抢掠的看法以及1796年波拿巴对军队下达的命令就可见一斑。

不难理解，所有关于社会学、人道主义学、海牙公约，以及其他一些试图改善国际关系的学说，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早就被人们扔到了大洋彼岸。

一旦这些暴行合法化，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被编入一本特别的读物，而且将被作为初级教育的必读课本，因为与德国毗邻的这些国家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德军入侵意味着什么。如果早就了解德国人的残暴本性的话，法国人民一定会敦促政府加强法国北部边境的防御工事，那么法国的繁华地带就不会成为一片废墟。而且，这本书还能

够防止战后德国从太平洋展开新一轮侵略。虽然这本书不足以完全切断我们与德国人的商业往来，但至少会一直提醒我们，德国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必须与他们保持距离。

### 第三章 德国的作战方法对于中立国家感情的影响

#### 1 德国的作战方法对中立国造成的心理影响

德国喜好毁灭和屠杀的作战方法引起了全球抗议，但是德国人一开始并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不过是按业已形成的原则办事，所以他们并不知晓自己的做法会给中立国带来困扰。但随着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德国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尽管他们的做法在他们自己看来并没有错，但滥用这种做法的后果却给他们树立了更多更强大的敌人。

由于进攻比利时这样一个中立国已经引起了英国的敌意，所以德国不确定招惹其他列强是否值得，尤其是美国。如果无法通过残忍手段获取战略优势，那无疑是个心理上的失误，而且再也无法说服大众顺从德意志的霸权和文化。

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之后，德国人立刻试图通过报纸、讲座和宣传册转变舆论方向，只可惜当时世界对他们的恨意已深，而且他们的残忍行径根本无从抵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了。德国人最后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宣传取得的成效微乎其微，以下从《科伦日报》中摘录的段落足以证明：

我们必须坦白，德国人，尤其是普鲁士人，并没有赢得人心。运用心理战术影响其他国家的情绪并不是德国人的强项。德国人希望通过媒体让中立国对自己产生共鸣，但是这已经为时已晚，而且似乎也缺乏技巧。

在下文中，我将概述世界多国公众对德国的抗议。我就此希望提醒各国，当有一天他们也想模仿德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谴责，也会引起他国公众巨大的敌意。

宣扬骑士精神的时代无疑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当我们抛弃某些律条时，我们时常被带回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体验原始的野蛮人性，这时或许只有公众舆论才能拯救我们。

## 2 美国人的反应

现在我将引用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士之一

的几句话，他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据1914年11月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说道：

比利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但是比利时却受到了侵略，比利时的人民被套上枷锁。

德国人轰炸了不设防城市，尽管这是《海牙公约》里明确禁止的。

《海牙公约》第43条和第50条禁止对平民进行集体惩罚。但是德国人没有遵循这些条款，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条款完全不适用，否则维斯、鲁汶、亚斯科特和迪南就不会被毁灭了。而且德国人对比利时中部施以恐怖和系统的毁灭性惩罚，其实是为了散布恐惧心理，并非为了追索补偿。这正是《海牙公约》里明文禁止的。

1914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艾略特教授说：

德国的作战方法深刻影响了公众的看法。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德国人的种种恶行开脱——他们轰炸平民城市和不设防城市，毁坏珍贵纪念碑和艺术珍品，在北海上埋下水雷，以屠城为威胁勒索赎金，还逮捕手无寸铁的百姓，拘留平民作为换取和平的人质，然后当

发生骚乱时将他们即刻处死。

一位名为沙佩尔的柏林人曾给闻名遐迩的卡内基研究所的校长丘奇先生寄送过一份德国知识分子的声明，而丘奇先生在他的回信中写道：

当我看到德国人固执地希望博得美国人的好感时，我甚至为他们感到惋惜。

沙佩尔博士，如果情形调换，如果别国的士兵在柏林的大街上大步前行，如果柏林的百姓看着自己的房屋被毁、同胞被杀，您和您的92位同僚难道不会向这些入侵者进行疯狂的报复吗？

.....即使你们在未来一千年都友好地对待法国和比利时，即使这一千年里的每一分钟你们都在为赎罪而祈祷，也不足以抵销这两个国家所遭受的战火和洒下的鲜血，也抽不干你们的铁蹄下两国人民洒下的眼泪之海。

.....你们根本没有理由发动这场战争。尽管你们装备齐全，国防强大，但是这世界上总有你们无法攻破的防线。你们的船只曾畅通无阻地在海上航行，你们的商品曾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畅销，你们的祖国曾作为一个人道的国家享誉全球。但是人们对你们的好感已然丧失，今后50年

你们都无法赢回你们曾经在物质和精神上拥有的优势地位。

在为数不多的几位亲眼看见比利时的灭顶之灾的美国人当中，德维尔先生是其中一位。他将他的恐怖记忆写成了一本书，下面我摘录其中一段：

我曾在世界许多地方目睹过大量恐怖而令人反感的事情，但没有哪次可怕过亚斯科特。我丝毫没有夸张，但是亚斯科特确实有三分之二的房屋被烧毁，在那之前被疯狂的士兵洗劫过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犯罪的证据俯拾即是……

### 3 瑞士和其他中立国家的看法

与德国接壤的瑞士一开始是倾向于支持德国的，然而当他们得知德国在比利时大肆屠杀和纵火时，他们就倒戈相向了。

下文是一位瑞士联邦法官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选段：

虽然德国在1867年严肃地保证不会进攻卢森堡，之前也在1831年严肃地保证不会进攻比利时，但是德军依然毫无理由地侵略了这两个国

家。

即使是大海也冲刷不清他们身上的罪孽。

如果国家不再尊重国家之间神圣的契约，整个人类都会处于危险之中，在国际交往之中我们还能相信谁呢？如果法律条文不再有效，反而是谁强谁说了算，那条约还有什么价值呢？历史上那些恐怖可憎的前例难道可以为如今的侵略行为辩解吗？难道基督教1900年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法律的进步以及其他成就全部都是白费了吗？难道胜利就可以掩盖那抹不掉的污迹吗？虽然现在德国人的额头上戴着胜利的花环，但当他们清醒的时候，想到他们引以为豪的德国式忠诚，他们一定会满面羞愧。

我之前说过，这个时代的德国当局企图蛊惑整个民族，让人无从辩驳。在1914年11月6日的《日内瓦日报》上，一位作者写道：

当一个人坚持自己拥有真理所以不动身寻求真相时，我们便拿他毫无办法。就目前来看，德国人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遮蔽天日的高墙，即使是最强大的意念也无法穿透。德国传教士歌颂和崇拜上帝，因为上帝让德国的皇帝、大臣、军队和整个德意志民族变得清白、正义和纯洁，德国人

因此拥有恐怖的自信和伪善的满足感。这样的德国人可以以义愤为由毁灭世界上所有与他们想法不一致的人，还以此为豪。

.....从另一方面来看，德国拥有头脑最清醒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已习惯于仅仅研读国内的文献，对所谓的“真相”深信不疑。他们在德皇和大臣面前歌功颂德时还把我们作为铁证。他们就像一群用功读书的小学生，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老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说服他们校墙之外另有真相呢？我们如何告知他们除了《德国国防报告书》，世界上还有各种书籍，其中记载的内容应该得到不失偏颇的估量？

德意志精神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精神分歧太大，已没有交流和沟通的必要。

德国似乎陷入了病态的兴奋状态，已然集体癫狂，对此，时间是唯一的解药。根据以往类似病例的医学诊断，这种精神错乱症来势迅猛，但紧接着又会从极度兴奋过渡到极度抑郁。

在瑞士人写过的众多文章中，我想引用亨利·波吉博士发表在1915年4月15日《两个世界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他写到瑞士人起初是如何同情德国人，之后又是如何转而对德国人的肆意破



坏行为感到义愤填膺。如果当初德国人了解心理学的话，他们就会意识到肆意焚烧和屠杀不过是逞一时之快，而这样做带来的苦恼往往大于快乐：

战争伊始，即便德国总理在德国国民议会上做了那番愤世嫉俗的演讲，即便德国攻占中立国比利时，瑞士仍然少有人对此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因为，当时瑞士区大部分人和当地报纸都是支持德国的，因为他们种族上较为接近，商业联系较为紧密，两国也世代友好，这些原因都促使他们对德国抱有好感。

.....然而，德国人随后在比利时和法国做出了恐怖而残忍的行径，在他们攻陷而且毁灭了梅赫伦、卢万及兰斯大教堂之后，瑞士德语地区的公共舆论和媒体都开始发生转向，还发起了许多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连当时最著名的泛德主义者维特教授都给德国知识分子写了公开信，谴责德国人在鲁汶犯下的滔天罪行。

荷兰、丹麦、挪威和其他中立国家并没有像瑞士和美国那样坦白表明自己对德国人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离德国太近，一直生活在德国的淫威之下，因而并没有太多的言论自由。比利时的遭遇更足以让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西班牙国内舆论则对德国存在很大分歧。战争初期，西班牙天主教派明确地站在德国人这边，这一点我在之前提到过。但是西班牙的著名学者卡哈尔却坚决采取相反的立场，以下是从他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

我们居住在窑洞中的祖先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烧杀抢掠，在折磨无辜平民的时候，尚不需借助人类学的观点；而今天的侵略者却利用他们深谙哲理、饱读诗书的优势开脱自己的罪行和罪孽，还向世人宣告他们是优越种族，因此可以为所欲为。

这位作者认为好战的种族将永远存在，不会消亡：

被征服的人民只会牢牢记住和极力模仿征服者所用的方法，而且会伺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这帮孤儿长大成人之后，可怕的屠杀又会重新上演。

# 卷七 战争中的未知变量

## 第一章 现代战争的直接后果

### 1 现代战争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

现代战争有着不计其数的后果，其影响力可能波及至未来好几年。举例说来，1870年战争之后，已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但是德国仍然是法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担。

由于当前要完全总结欧洲这场战争的多重影响还不可能，所以我只将简要阐述现代战争可能带来的教训、代价、损失和心理后果。

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哪场战争能像“一战”这样牵涉了如此众多因素、导致了如此多重后果。这些多重的后果，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十分令人困惑，让人无法做出明确区分。

### 2 现代战争的复杂性

在古代打仗期间，对军队进行补给是很简单的事，比如在古罗马军队里，每个士兵都会自己

带上武器和其他必需品，此处“其他必需品”通常是指少量的面粉，他们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就会自己给自己做饭吃。每当试图攻下一个城池，古代士兵便会就地用树干建造投石机、塔楼等攻城武器。

到了现代，情况完全不同，军队兵员众多，武器库庞大，再加上物资和装备，包括工厂、仓库、车间、邮电局、医院和驻扎营地，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城市。许多设施虽然处于后方，但对于在前线作战的军队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现代战场的复杂程度和军队行进所需要的军事战术也对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两个运输系统对运送物资和撤离伤员来说至关重要。一支由45000名士兵、12000匹战马和2000辆战车组成的军队需要30英里的轨道和100列火车进行运送。

交通部门至关重要，俄国战败的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机动作战能力太差，而德奥军队轻松地胜过人数上占优势的俄军恰恰是源于前者可以迅速调动和转移军队。一支拥有50名军官、300个士兵、200匹战马和35辆战车的军队，必须时时刻刻听从来自总部的指令。

每个兵团都是一支独立作战队伍，他们随身只携带着一个星期的口粮，这就要求后方必须建立一个复杂的系统及时为士兵提供粮食和弹药。军队的指挥官分布在上百英里的前线上，都通过电报接受总司令的指令。

在现代战争中，火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法国在20天的军队调动和部署中动用了上千列次火车，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火车的重要性。

马恩战役之后，法国军队试图包抄德军右翼，而德军也用上了相同的战术。在这场为期六周、以伊瑟战役告终的军事行动中，整支英军和部分法军是坐着火车从埃纳河转移到伊瑟河的。“6000列火车将70个师运送到60英里至375英里之外。”

刚才我们只考虑到了运输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把为好几百万人运送食物和弹药也考虑进去，就会意识到这会为国内外居民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困扰。工厂等除了为前线军队生产食物和军需物资，根本无暇顾及及其他，这样必然导致出口大幅减少，国民收入大幅下降。

这就是法国和德国面临的困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量都大幅下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

们还需要从国外进口很多商品。由于进口意味着必须花钱购买国外价值相当的产品，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开销。大量进口是这两个国家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就赚不到钱，无法平衡支出开销。

正常情况下德国的出口总额是480万英镑，进口总额也是这个数。但打仗的时候几乎没有出口，却需要从中立国家进口很多东西，这就导致极大的贸易逆差，德国不得不四处举债，并将大量黄金输出国外。然而输出贵重金属也不是长远之计，因为总有消耗完的一天。

关于战争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我就谈到这里，因为如果再谈下去就要跟我的主题——战争的心理影响偏离了。

### 3 战争对国民的影响

古代战争只会影响到一小部分人，除非是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为那时候缺乏通信手段，居住在不同省份的当地人之间十分陌生，而且打仗的时候只会牵涉到为数不多的军队。所以，除非正好住在军队经过的地方，否则平民百姓的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但是现代战争就大不相同了。以前的军队很少超过10万大军，但如今却动辄百万。这些军队像蚱蜢一样占据着全国的公路、铁路，使得交通系统全部瘫痪。虽然法国境内只有小片区域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这些区域全部成为废墟。根据德国人自己的统计，他们在短短几个月内掠夺了8000万英镑的财产。另据美国上诉法院的亨利·马森法官估算，比利时在战争开始82天中的损失是21600万英镑。

如今的比利时穷困潦倒，因为德国从一开始就残忍无情地烧杀抢掠，不留一草一木，直至将这个国家洗劫一空。

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遭遇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注意，但其他许多重要国家，比如波兰、加利西亚和亚美尼亚其实也遭受了同样惨痛的经历。

关于波兰的情况，在此引述1915年6月5日《日内瓦日报》上的一段话：

战争已经波及波兰四分之三的地区，奥德军队已占领了波兰三分之二的领土，统治了波兰1300万的人口，而且据说他们还轰炸了5000个村庄和200个城镇，使这些地区不是成为废墟就是成为火海。

.....铁路尽毁，贸易中断。波兰引以为豪的煤矿、制糖、纺织业以及加利西亚的采油业都被迫停止，国内饥寒交迫、传染病肆虐。据医护人员说，波兰因饥饿和疾病死去的人比战场上战死的士兵还多。

如果战争对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都能造成如此后果，大家不禁在想，如果入侵者没有约束和禁忌，情况会糟糕到什么程度。倘若真是那样，那么大屠杀和大毁灭将永无止境。一名《晚间邮报》的战地记者从黑海港口霍帕发来报道说：

一场巨大的未知灾难就在眼前。整个亚美尼亚西部地区都在因遭受毁灭和屠杀哀号，这惨痛的经历使人们无比绝望。城市成了墓地。一直仰仗拜占庭帝国之辉煌的特拉比松港口也大半被毁，居民四处躲避战乱。

古时候的战争是野蛮的，但现代战争也一样残酷无情，而且影响范围更广。

## 4 人员伤亡

现代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数目远远超过历史记载的任何一次大型战役，而且很难统计确切数字。以下是法军公布的截至1915年2月15日和同



年5月1日的法军人员伤亡数据：

2月15日 5月1日

死亡.....186541327000

受伤.....415863592000

失踪或被俘.....243321317000

以上这些数据并不包括1915年7月阿拉斯战役的伤亡的113000人，也不包括1915年9月香槟之战伤亡的100000人。即使超过半数的伤员回到了战场，我们也不难估算出法军每年的伤亡人数在100万左右。

德国人的损失可能更为惨重，因为他们被迫双线作战，而且都是大规模军队作战。他们的伤亡人数大约是每年200万以上。

将这些数字统统加起来之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场战争第一年的总伤亡人数接近600万。这个数字没有把囚禁在德国的100万名士兵算进去，这100万人当中有60万都是俄国人。正是在这场可怕的战役中，欧洲有无数的青年献出了生命。

长达20年的拿破仑战争都没有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伤亡，耶拿和瓦格拉姆战役中仅损失了3万人，法兰西第一帝国最大战役——莱比锡之战也才造成了6万士兵的伤亡。

那些曾经称得上激烈大战的战役，在如今看来还抵不上前哨兵的轻轻一扫，在官方公报里也只能占据一两行的报道。虽然就死伤人数来说，现代战争似乎更为重大，但是他们取得的实际效果却不比历史上的战役。以前两场战役即可决定胜负，现在牺牲3万人却只是为了夺取一个小山坡或是几条战壕，而离最终的胜负之分还差十万八千里。

## 5 现代战争的军费消耗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场战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花了这么多钱。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告诉下议院，英国每月的军费高达4000万英镑，但此前看来最奢侈的拿破仑战役中，英国在20年期间总共才花费了84000万英镑。克里米亚战争花费了不到8000万英镑，布尔战争花了两亿英镑出头。

在非战时期的45年里，英国军备花销高达千

百万英镑，作为抵御攻击的保险费。虽然数额庞大，却没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到了战争开始后才发现，英国和法国的准备与德国相比并不充分。法国好几个战队都在德国的进攻下失去作战能力，几百家工厂和几百座纪念碑被炸毁，这说明战前还应该加大军费开支，才能有效抵抗侵略者。

1915年8月20日，时任德国财政部长的赫弗里希在国民议会上说：“战争期间一个月的军费支出比1870年普法战争军费总额还多三分之一。”国民议会刚刚通过的8亿英镑借款即刻告罄，德国不得不再次举债。

火炮和弹药是现代战争中最大的项目开销之一。一艘无畏战舰全速前进时每小时需要燃烧19吨煤，它的12架机关枪在两小时内发射150发子弹要花费20万英镑。一门12英寸口径的加农大炮发射一枚炮弹就价值200磅，就连最寒碜的CZ75手枪一枚子弹还要24先令。

以下数据是刊登在1915年7月19日《蓝色晨报》上一个专家做出的估算：

根据6月17日的法国公报，我们在阿拉斯北部的炮兵在24小时内发射了30万颗榴弹炮，几乎

跟德国炮兵部队在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发射的总数一样多。

据我们估计，30万颗榴弹炮重量达4500吨，这意味着我们当初动用了300辆大卡车和6列火车来运送它们。如果是通过公路运输的话，可能需要4000多辆6驾马车，总花费在375000英镑左右。

除了将近40万英镑的弹药费，几天之后统计的伤亡人数是113000人。这些数字可以很清晰地解释现代战争的代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欧洲战争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也是难以预料的。1914年10月，著名化学家威廉·拉姆齐爵士提醒人们，德国每天需要1000吨棉花制造弹药，如果一开始就阻断了德国进口棉花等原料的途径的话，战争早在4月份就能结束了。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如果英国煤矿大罢工能够坚持再久一些，协约国也会因为缺少供给工厂和铁路的煤炭而休战了。

战争的另一个严重影响就是造成大量人群失业。法国政府不得不为3253367个家庭提供救济金，因为这些家庭的顶梁柱找不到工作。截至6月30日，也就是“一战”爆发不到一年时间，这些

家庭共领取了5200万英镑的救济金，几乎是和平时期法兰西共和国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一。

战争的开销还可以从大幅飙升的财政预算里看出来，1915年6月法国已经花掉了96000万英镑，其中的三分之二全部用在了打仗上，剩下的三分之一用来购买食物（748万英镑）以及偿还公共债务和利息（57008000英镑）。但这个数字不过是战争总开销的九牛一毛，法国几大富人区被掠夺的财产总额还要庞大得多。

到1915年6月，法国有494万英亩的土地被德国人占领，波及325万法国居民。被占土地的总价值大约在4亿英镑左右，而地面上的建筑，尤其是工厂更是价值不菲。

为了支付各项开销，参战国不得不四处举债。贷款这个方法可以一直使用到国民财富和贵金属储备耗尽为止。当然欠债总有偿还的一天，当这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参战国也打不下去了。

经济因素导致这场欧洲战役不可能无止境地打下去，所以不会加入“三十年抗战”和“百年大战”之列。原因很简单，现代战争使用的不仅是加农炮，更是百万英镑制成的“黄金”子弹，而一个国家的财富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这

样的战事长不了，而且参战国一旦意识到财富有限，也不可能短暂的和平之后再次开战。

## 6 现代战争的时间跨度

很有可能以后的战争都会因为经济因素而非军事因素结束，因为堑壕战使得交战双方谁都无法取得绝对的优势，只能一点点耗完双方的防御战术。哪边队伍先消耗完哪边就输了。

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之间长达20年之久的斗争显然不能作为我这个观点的佐证，因为那时候双方的作战方法耗资较低，杀伤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大。而如今我们一年内花掉的军费和损失的人数就超过了拿破仑时期的总和。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战事不断，持续时间不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持续了两年，1899年的布尔战争持续了一年半，美国内战打了5年；但绝大部分战争时间要短得多。1870年的普法战争仅持续了6个月，1904年的日俄战争持续了18个月，1898年的美西战争持续了4个月，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持续了5个月，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不到6个星期就结束了。

现代战争中代价最大、最血腥的莫过于美国

的南北战争了，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媲美目前这场欧洲斗争的战役。1865年内战结束时，美国联邦剩下100万大军，美国南方联邦残余70万大军，而双方人员损失高达100万。美国北方各州债台高筑，达56000万美元。南方盟军彻底垮台，负债高达4亿美元，不过这笔债务是用来偿还南方妇女的，她们在战时捐献出珠宝首饰，当其他一切物资来源都消耗殆尽后，她们剪下自己的长发拿到欧洲市场换钱。当然，获胜的一方也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这在现代战争中屡见不鲜。

## 第二章 不可靠的战争报道

### 1 官方战事报道的真正价值

我无意长篇累牍地列举这场欧洲战争中的主要战役，我只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们留下的心理教训，以及不确定性在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证明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几乎不可能从几千人亲眼看见的事实中发掘出背后的真相。战争的后果虽然是确定的，但是对于这些后果的解读和诠释却基本错误，而且，我们对自己是否把握了每场伟大战役的所有细节感到非常怀疑，尤其是当这些战役只留下文字记录的时候。

关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官方报道由几大强国操纵，而他们的舆论导向出于各国不同的心理原则，在此我给大家一一列举：

①战况逆转时封锁或掩盖消息。

②以歪曲事实的方式影响公众舆论。

第一种做法也称作沉默法，曾为英国和法国媒体使用，特别是战事刚开始的时候；德国人通过篡改事实随心所欲地使用着第二种方法；俄国则是两种方法都用上了。一方面，真相往往让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敌人总喜欢掩饰失利而夸大胜利。

事实上，读者很有可能从不同国家的公报中读到两则截然相反的报道，这样一来就不再有人关心过程而只关注结果了。举个例子，俄国的官方公报宣布已俘获大批战俘，缴获大批机关枪，但当读者最终发现俄军其实已撤离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还在且战且退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官方的说法了。

德军的官方报道也是谎言连篇，导致最后无论他们说什么中立国都一概不听了。1915年4月10日的《日内瓦日报》说道：



仔细研究德国公报就会发现，德国人从战争之初就没有讲过真话。他们的弥天大谎当真是匪夷所思，骇人听闻。

法军总参谋部则是沉默过了头。战争刚刚打响时，他们的电报充斥了最无关紧要的新闻，对诸如沙勒罗瓦等重要战役只字不提。整个1914年8月，法国人对前线战况可谓是一无所知。8月29日，一份急件提到索姆省和孚日省的战况相近，人们这才发觉德国人已经打到自家门口了。但直到9月1日法国民众才突然听说德国装甲部队正在穿越贡比涅森林，而法国政府被迫撤离巴黎。

沉默法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纸包不住火，总有零星信息会传到大众的耳朵里去。我觉得写新闻简报的记者实在不是心理学的行家，他们的这种行为在人们眼里很明显就是欲盖弥彰。比如，新闻里说德军从某个村庄撤退，但是之前却没有关于德军占领这个村庄的报道；还有当受伤的士兵、国外媒体和大使馆工作人员谈论一些重要战役的时候，人们甚至都没有在公报中读到过相关报道。很快，民众们就发现政府隐瞒了很多极其重要的事实，所以当人们惊觉本应还滞留在里尔的德军已经穿过贡比涅森林来到巴黎的大门口，并且还要将巴黎一片片烧为灰烬以迫使法国投降的时候，法国人集体陷入疯狂，到处都是溃败的

军队和逃窜的百姓，这幅景象自1870年普法战争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如果大众早就知道真相，就会慢慢适应。法国之所以陷入混乱是因为人们从小报上读到的恐怖故事。虽然审查制度成功防止了媒体报道任何重要信息，但是没能阻止各家报纸对诸如遭到焚毁的城市、妇女和儿童大屠杀以及俘虏受到的酷刑等事件的详细描述。这点正合德军之意，他们巴不得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德军的残酷手段，使对手再无反抗的勇气和决心。

虽然后来马恩战役暂时拖住了德军进攻的脚步，也给了法军一线生机，但法国政府并没有取消媒体审查制度。我们对战役发生的地点和敌军数量一无所知，德国人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些能够激起公众斗志的英勇行为也没能在民间流传。那些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英雄事迹被描述得模模糊糊，不清不楚。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法国统治阶级才终于意识到精神的巨大力量，才开始宣传之前被包得严严实实的英雄壮举和英勇事迹。这样做不只为了抚慰民众，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利器，通过叙述先前的胜利和成就，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惧和悲哀。英雄事迹即是英雄主义的萌芽。

针对报纸和媒体采用的沉默战术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惧怕公众舆论会对战事进程造成影响。正是公共舆论的压力导致1870年普法战争中发生了一些灾难性事件，比如巴赞元帅的任命、麦克马洪元帅荒唐地下令进攻色当等。美西战争期间，也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西班牙舰队不得不开赴古巴圣地亚哥。可是那个港口实在太窄，每次只能通过一艘战舰，结果在美军的炮火之下，西班牙舰队全军覆没。

我想前面的论述已经十分透彻地表明，要对变化无常的战况做出真实准确的报道难度有多大，以及官方消息是多么的漏洞百出。

## 2 战事报道的价值：第一次佛兰德战役中各国将领们的幻觉

为使大家满足于战事报道的微末价值，我们只需对不同的报道进行比较。这其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比如每个将军都希望自己在报纸上看起来战绩卓勋，这种幻觉和心理暗示就导致大部分战事报道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即使处在同一阵营，两个将军对于同一场战役的描述都有可能完全相反。我们来看看对第一次佛兰德战役的报道。1914年12月5日法国《三

军官方公报》的说法跟英军指挥官约翰·弗伦奇元帅的说法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据法国《三军官方公报》报道，是法国大元帅制订了作战计划，英军只是次要角色，而英方报道则截然相反。我从法国官方文件中节选出以下几段话：

但是这需要时间，而英军不可能在10月20日之前抵达新的作战地点。

另一方面，比利时已孤军奋战了三月之久，可谓弹尽粮绝。总指挥官当机立断，下令立即前往支援。

早在10月4日，他便委任福煦将军带领军队赶赴法国北部进行部署，10月18日至11月12日，法军不断集结，与比利时军队和一个英军军团形成了一支在达波将军统领下的法国军队，在利斯河和附近海域展开军事行动。

在评论这场战役时，《日内瓦日报》称，法军当局在迅速调动大规模军队方面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样的行动力是导致德军在佛兰德战役中溃败的关键因素。

而英国的版本则不尽相同。1914年12月1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约翰·弗伦奇元帅的一份报告摘要，摘要里写道：

很显然，是我们的元帅最先命令驻扎在法国的英军抵御德军进攻的，也是他最先给予德军以迎头痛击的。在他的带领下，英军巧妙地转移到法国北部的埃纳省，截断了德军进攻加莱的队伍……我们的元帅对意志不坚定者的抱怨声和怀疑声充耳不闻，将士兵人数显著不足的军队部署在一条宽广的防线上……当然，我们必须感谢法国战友的可靠支持……达波将军、莫德海将军和卡斯特诺都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英雄。

从这篇报道来看，法军不过是英国大元帅的得力助手。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真的需要英国将军预见并阻止德军进攻，才能避免法军的惨重损失吗？我们只能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人输掉的这场战役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德军损失了15万士兵，英法联军损失了5万。

我们可能需要等很久才能等到关于这场战争的真相，但必须承认，法军公报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有时候态度过于乐观。法国《时报》记者

评论道：

当对当前战况进行评估时，我们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战略和军事部署的首要目标是在德军大肆侵犯兰斯、梅齐耶尔、里尔和阿戈讷之时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荣誉和生命，所以公报中体现出的乐观主义在我看来非常奇怪。

除了几个小角落之外，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几乎整个比利时和法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后者从人口和财富方面来看占到法国的六分之一。即使按最保守最乐观的估计，法国在土地、房屋、工厂、煤矿、铁路、公路和艺术作品方面至少损失了12亿英镑。那么侵略造成的死亡、耻辱和玷污呢？居然还有人说德国没有从侵略法国的过程中得到任何好处。他还想怎么样？

虽然代价惨重，但当我们回首黑暗的1914年8月，我们还是要感谢和赞美我们耐心勇敢、坚韧不拔的军队，是他们为我们筑起了堡垒，抵御了德军的进攻。

我不会在这场战役的结果上多费笔墨，我意在说明获得准确战况消息的难度。交战双方的将军，甚至同一军队的两名指挥官，都会从自身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所以对同一件事的描述可能会

出现多个版本。对马恩战役的不同战事报道就是另一个典型例子。

## 第三章 马恩战役假说

### 1 战役开始后的第一次逆转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法国总参谋部为什么会产生德军将会从东面进攻的幻觉，当时明明已经有大量的军旅作家指出德军会先攻击法国北部。

波拉尔将军在他一篇精彩的文章里提到，德军的整个作战计划都列在伯恩哈迪将军所著《现代战争论》里（第二卷第337页），此书的法语版本出现在1913年。书中写到德军右翼打算取道比利时从加莱进攻法国，这跟当时的情形一模一样。

所以说，德军的意图是可以一眼看穿的，那就是调动大批部队从防守薄弱的法国北部进攻，一举拿下巴黎，迫使法国和谈，再调头进攻俄国。

带着这个目标，200万德军侵入法国。法军当时只有150万，如果全部用于防守，这个数字

也许够了。只可惜法国将军们将这150万士兵分散开来，部署在一条根本不需要加强防守的长达300英里的防线上。同样的错误法国人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就犯过，但这次更加让人难以理解，因为根本不难预见德军会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而且《泰晤士报》1914年8月刊登的地图显示，东部仅有三到四个德国军团，其余的都集结在北部和东北部。

法国总指挥部的这一错误预测几乎导致了灭顶之灾。最终当指挥部意识到这个错误并紧急调动军队从法国东部边境赶赴迪南—沙勒罗瓦—蒙斯前线时，为时已晚。8月20日至23日打响的沙勒罗瓦战役中，法军损失惨重。8月23日傍晚，法军大元帅下令全军撤退。8月24日沙勒罗瓦战役战败后，法军溃不成军。士兵们对这次撤退留下了恐怖的记忆，他们说德军当时就紧紧跟在他们后面，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914年11月10日的《法兰西日报》讲述了此次撤退中一名士兵的亲身经历，而且很多军官都告诉我，这件事绝对真实：

然后我们就开始撤退，情形真是糟糕透顶！……我们一直在赶路，不分昼夜，从不停步，完全不知道在往哪个方向走。我们跟不同军团的人



混在一起；各路兵马冲撞到一起，有丢了战马的骑兵、找不着北的炮兵，还有骑着马的步兵。我赶了整整5天的路，最后发现了我所在的团……

德军则乘胜追击。9月3日克鲁克将军已经抵达了南图—凯伊—桑利防线，法军陷入了绝境。

## 2 德军进攻并焚毁巴黎的系统作战计划

德军攻占巴黎的计划既有心理依据，也有战略考虑。夺取法国首都会产生的精神冲击，在德国人看来拿下巴黎就可以立即停战了。他们打的算盘是巴黎失陷后，法国政府会立即求和，这样他们就不用像1870年那样在法国做长时间逗留。反过来，德军可以将200万大军调去支援尚未部署完毕的进攻苏联的部队。

据已沦为战犯的德国军官坦白，德军总指挥部决定只采用一种方式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一个接一个焚毁巴黎的七大区，包括其居民，直到法国政府求和为止。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决定，认为巴黎应当承受法国参议员特鲁约先生和拉维斯教授口中的命运。特鲁约参议员在1915年4月2日的《法兰西日报》上说道：

如果法国拒绝投降求和，不配合敌军玩这个

所谓的“和平”游戏的话，敌军就打算一一破坏巴黎的七大区，但投降求和就意味着国家的彻底灭亡。敌军的目的就是让巴黎从地球上消失。

拉维斯教授在《巴黎评论》上也说了同样的话：

巴黎现在已经成为人质。看起来德国人是把巴黎分成了七个区，以此要挟法国政府投降。如果政府不同意讨论和平初约，德国人就炸毁一个区，如果政府还想拖延，就再炸掉一个，以此类推。我们丝毫不会质疑德国人摧毁巴黎的能力，正如日耳曼祖先所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汪达尔人的领袖盖萨里克——“我总是有一种一把火烧掉罗马的冲动。”

德军战犯解释说，德国人当时没有其他办法迫使法国政府媾和，但又非常需要立即缔结和平条约，以返回俄国战场。根据我们对德军总指挥部的了解，他们绝不会迟疑采用这种方法的。

### 3 关于马恩战役起源的假说

现在我们处在千年历史长河的关键点上，因为如果巴黎被德军摧毁，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会比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来得重要。它会抹杀

法国的道德存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法国会被贬低到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它遭受的痛苦和耻辱都是未能好好备战的苦果。

但是命运虽然将我们引领到悬崖的边缘，却没有把我们推下去。脱离如此险境的原因某天会与历史上关于理应造成的死亡数字理论相矛盾。这些理论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想法，而且大家马上就会看到，即使是一个小插曲也可能在特定时刻拯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当时德军已在巴黎城门之下。

法军大元帅担心如果不下令撤离，法军就会被德军从巴黎北边和东边两面包围。要想不被包围，只有撤离到巴黎南部，但这就意味着将巴黎拱手相让，任其灭亡。他该怎么做？

当时法军大元帅面临着艰难抉择，多重因素迫使他在马恩河上与德军开战——法军赢得了这场战役，拯救了巴黎。

以上所述都是事实，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我们来假设一位历史学家此刻对这场战役进行深入调查，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元帅没有坚持原定

计划，命法军撤退到巴黎南部，而是对德军开战了呢？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德军明明已到巴黎城下，为什么克鲁克将军会放弃进攻巴黎，往东边奔去？

我们先来看看报纸上的官方消息，虽然不见得能起到什么作用。以下段落是从《法国三军公报》里摘录的：

到了9月4日，德军已经开进到我们大元帅制定的撤退警戒线上，这条警戒线在过去一连两周的激烈作战中已愈发清晰，这点可以从我们撤退过程中取得的零星胜利中得到佐证。所以说，我们的撤退是主动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事先策划好的。每支部队都可以自由调遣部署，霞飞将军在6日下令各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也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每日新闻无疑美化了这个版本。一份日报在谈到法军大元帅的时候说道：

大元帅的作战计划说明他对马恩河战役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从9月5日开始的所有作战指令都由他亲笔书写，而且早在8月27日就已做好了部署。他为战役的不同阶段都做了分析和安排，就好比它们都是一件精密仪器上的零件，从某一

特定时刻开始像钟表一样运转。

普通老百姓十分乐意读到这样的报道，他们无可厚非；但即使是最不长心眼的人也不难发现这其中的漏洞。事实上，法军从默兹河一路奔向马恩河绝无可能“是主动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事先策划好的”。如此明显的夸张反倒证实了1914年12月18日《日内瓦日报》上所做的评论：

真相总是难以大白于天下，即便是完全无从抵赖的事实。就举一个例子吧，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相信法军大元帅从战争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把敌人引到巴黎附近，然后再在马恩河战役上击败他们。马恩河战役对于一支刚刚遭受了一系列打击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华丽逆转，但它并非法军总参谋部的策划。法军不会引诱百万德军入境，然后将最富裕的地区交给敌人破坏和毁灭。

所有占领区的人民都声称他们的撤退是心甘情愿的。《日内瓦日报》不失时机地补充道：

看起来这场战争中的许多战役都是自愿打起来的，至少交战双方都这么说。比如，如果我们读奥地利公报，就不难发现他们吃的很多场败仗

都是故意的。塞尔维亚军队放弃贝尔格莱德是出于自愿。德军也是自愿从阿尔萨斯和佛兰德撤退的。只要大致扫一眼《法国公报》，也能发现诸多类似的自觉行动。这样做无非是出于道德因素的考量。

由此可见，从报纸上我们无法形成准确的观点，所以我们一开始问自己的两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法国将军没有按原定计划撤退到巴黎南部，反而向敌军开战？

现在我们已来到了未知领域。我相信今后会有很多人写书试图澄清这个问题，不过目前我们只有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政府介入，导致法军大元帅不得不放弃撤退。9月1日，大元帅下达第4号军令，指挥军队退守到巴黎南部塞纳河对岸的布雷镇。第五军原计划撤退到诺让塞纳河畔。9月2日，总指挥官向军政大臣汇报：“根据大元帅的提议，法军根本无法在马恩河沿岸组织起有效的防守。”随即大元帅通过第3463号军令宣布，他撤退的目的是将军队从敌军手上解救出来，以便在撤退结束之前做好夺取蓬苏约讷、诺让塞纳河畔、奥布河畔巴尔区、布里安勒沙托县和茹安维尔沿线的准备。第二个假设是法军大元帅想借德

国克鲁克将军突然转向去往法国东面的机会进行突然袭击。9月4日，他下令说：“我建议利用德国第一军来扭转当前危险的局面，让他们来承受法军的联合力量。9月5日，我们将做好一切准备，6日进攻。”

这两个假设，一个是政府介入，一个是利用克鲁克将军的调军，倒不是完全自相矛盾，把两者结合起来说不定就非常接近真相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已到巴黎的情况下德国将军会放弃进攻计划？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

#### 4 关于德军为何撤退而不继续进军巴黎的猜想

这场战役的最大谜团就是德军的突然撤军。当时他们的大部队离巴黎只有两天的行程，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蓬图瓦兹。对于虔诚的新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迹，但也可能这只是出于战略和心理上的考虑。

首先，我觉得我们可以排除一个假设，德军不可能恪守所谓的在进攻一个设防城市之前必须消灭其防守力量的规则；因为他们早已得知法军的一举一动，知道法军已经收到撤退到巴黎南部

的命令，在进攻巴黎时他们不会遇到完全抵抗。也就是说克鲁克将军十分确信自己可以顺利进入巴黎。那么，他为什么停住了脚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猜测，以下这个假设可能性最大。克鲁克将军认为攻占一个毫无防守能力的都城于他的名声没有太大好处，但如果他能一举歼灭东面的一小撮在贡比涅战役中大败而退的英军，就有可能名声大噪。

为了包围这支英军，他突然调头向东面进发。与此同时，法国莫努里将军心血来潮，纠集了一支多种部队也向克鲁克部队的方向前进，而克鲁克对此一无所知。当克鲁克将军发现自己的部队有可能受到侧翼攻击的时候，出于自保，他派遣了一个军团驻扎在莫城北部。德军把这次失利归结为被一支临时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此前德方并没有意识到这支军队的存在。《死亡邮报》在1915年9月12日那期上这样说道：

克鲁克将军的计划从战术角度来看天衣无缝，如果不是因为来自巴黎和莫城北部的两支法军的阻挠，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两支优质部队的突然出现在让克鲁克将军难以预料。

9月3日，巴黎省长加利埃尼将军得知克鲁克



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南图，正在向马恩河进发。加利埃尼将军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下令莫努里将军于9月5日进攻疏于防守的德军侧翼，再从南特伊莱奥杜安进攻敌军后方。莫努里将军的部队跟克鲁克将军不断调遣的部队在乌尔克和南图交战了4天，而克鲁克将军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里就是这场战役的关键。克鲁克将军威胁包围莫努里将军的军队，莫努里军队只好败下阵来，退守到南图北部。9月9日至10日间，克鲁克的军队撤退了——至于是什么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从军事角度出发，克鲁克将军的调兵遣将无可厚非，当然他被指责没能在接近莫城时保护好右翼。当他发现莫努里将军的军队在乌尔克驻扎下来，并企图攻击德军侧翼时，克鲁克将军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了，随即派遣了两个军团为侧翼解围，以此摆脱了暴露军队后的灾难。但是经此一役，德军整体失去了组织性，不得不全面撤退，克鲁克将军的侧翼前脚刚走，福熙将军接踵而至，将中心部队送入了巴黎玛莱的沼泽里。

看起来德军并不是同时撤退的。莫城和塞扎讷附近的德军10日开始撤离，靠近塞扎讷中心的德军13日开始撤离，而东面皇储的部队15日才开始撤离。

德军的撤退太过迅速，以至于过了63小时法国人才意识到自己打胜仗了。如果法军乘胜追击，不给德军喘息的机会，说不定能一口气把敌人赶出法国边境。如果追不了那么远，至少也能将他们赶到兰斯东面。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城市就不会遭到轰炸，兰斯大教堂也不会遭到破坏。

我不会详细描述马恩河战役的情况，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到目前为止可能也没有人了解确切的情况。只有未来才有可能解释法国的这场胜利；现在我们只能断言，这不仅是我们英勇无畏的士兵取得的一场集体胜利，还掺杂了各种运气。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确信地断言，马恩河战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场伟大的战役。它在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内展开，全长150英里，从莫努里将军驻扎在莫城向北15英里的南图维豪杜因，到凡尔登以南。这个半圆形包括莫城、科罗米尔斯、塞扎讷、费尔尚普努瓦斯和弗朗索瓦。

作家马勒塞尔写道：

我们得到了一切想得到的东西，我们可以为这些英雄事迹写上好几本书，有个人的，有集体的，它们都象征着马恩河战役的胜利。把这些事

迹集中到一起，会不会觉得在这次命运的转变中，有些东西比军事战术来得重要？一支战无不胜的庞大军队，一路上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却被一群饱受失败、撤退和饥饿三重折磨的士兵打垮。即使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的心脏还在坚强地跳动。这就是奇迹，一个国家力量的奇迹，一个种族勇气的奇迹，一个法国军事传统的奇迹。

参加这次马恩河战役的法国士兵多达100万人，德军人数比这还要多。战役持续了10天，从9月5日打到9月15日。德军损失了15万士兵，法军伤亡人数也不会比之小很多。

马恩战役使巴黎免遭灭顶之灾，是法国编年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也再次证明了人类可以无止境地刷新战争伤亡人数的上限。

## 第四章 和平问题

### 1 和平道路上的重重困难

最初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实现和平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为了让事实变得更明晰，只需认真思考一下对盟国最有利的假设。让我们假设接受人类虔诚祷告的诸位上天神明赐予我们超凡的能

力，能以每个月100公里而不是100码的速度前进，让我们再祈祷目前驻扎在柏林和巴黎之间的200万或300万德军凭空消失，假设我们已经抵达德国首都并对其实施管控。所有的困难会就此消失吗？绝没有这么简单！

在以上假设情况下应该如何开展后续事宜，即便睿智如马基雅弗利者也未必能预见到。

不管我们怎样假设，把德国划分成数个省区，还是实施强制性的裁军，毁灭性赔偿，或是其他计划，我们都会最终得出结论：想要防止7000万人做出任何报复性行为，我们必须无限期地维持强有力的军事管控，但即便如此也很难阻止他们。耶拿战役之后，拿破仑完全控制了普鲁士，当时他面临的难题跟今天一样，他没能解决这个难题。他自信已经打垮了普鲁士，但若干年之后，普鲁士的将军以征服者的姿态开进了巴黎。

如果不能以出奇制胜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确信，这只是一个长期对抗的开始。这样的长期对抗还会有许多，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旷日持久，期间穿插一些零星的和平时期。30年战争和百年战争便是例证，也许只有在未来才会出现比那些时期更残暴血腥的战

争。

除非这些人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否则欧洲国家显然只能享受一些转瞬即逝的和平时光，而且，哪怕想要令这样的和平时光维持短短10年或15年，我们都必须在这些好战分子战败后削弱他们的战斗力，确保他们无法太快发起这样的对抗。

因此，眼下这场战争很可能只有在某个参战国被完全摧毁后才能真正结束。这并不是实现和平的新办法，历史上有诸多类似的例子，尤其是在美国内战。正如W.艾略特先生写道的：

美国人永远忘不了内战的那5年，交战双方都意志坚决，直到南方的人力和物资都耗尽，战争才结束。南方州的首府在那场浩劫中被夷为平地。

对盟国来说，谋求不稳固的和平比继续打仗后果更不堪设想，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任何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只需回想一下德国驻美国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Count Bernstorff）所设想的情况：

他的出发点是必须把法国削弱到葡萄牙那样

的水平，即便必须杀掉500万法国人也在所不惜。更具体地说，他会分解法国，把1500万居住在圣瓦勒里到里昂一线以东的居民全部归入比利时的省区内，而比利时毫无疑问将成为德国领土。德国会要求我们支付4亿英镑的赔偿金，取缔我们的国界，裁减我们的军备，强迫法国抛弃英国和俄国转而与曾统治她25年之久的征服者为伍。最终，威廉二世将买下俄国，毁灭英国。

1915年5月20日递交给帝国总理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对德国所迫切追求的和平条件做了坦率的描述，那份备忘录上有德意志帝国制造业和农业协会代表的签字：

比利时必须在经济上从属于德国。从比利时边境到法国索默河沿岸的地区，都必须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德国人将掌控法国东部边境的所有要塞，尤其是凡尔登和贝尔福。法国北部及加来海峡等产煤地区必须成为德国领土。在这些地区拥有地产的人应该被驱逐，其土地归德国人所有。应把波兰和波罗的海各省从俄罗斯手中夺过来。

与这份由行业领头人们签署的备忘录相呼应的，是另一份由多名教授签署的声明书。那份声明书更进一步提出了夺取法国殖民地的要求。德

国的和平条件建立在毁灭和剥削被征服地区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从德国总理和财政部长在帝国国会上发表的最后几次演讲中看出这一点。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对这些演讲如此评价：

德国凌驾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其他国家只能享受德国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这便是我们从德国总理的演讲中得出的结论。财政部长还补充，那些德国想要标记为战争教唆者的国家必须在数十年内担负起数百万的沉重赔款。换句话说，德国的想法是，在接下来数十年里，所有曾经反抗过德国的国家都必须辛苦挣钱，以战争赔款的形式向德国上贡。

针对1915年8月19日帝国总理在国会上发表的讲话，《福斯报》（The Vossische Zeitung）曾这样评价：

作为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有责任从此担当起人类先锋的角色。服从比我们低下的人，是一种有悖此使命的罪行。

1915年9月4日的《日内瓦日报》刊登了某位德国知名人士对阿尔萨斯战后命运的看法，其看法非常典型：

战争结束后，整个阿尔萨斯都会匍匐在我们脚下。

所有渴望和平的人士都应该注意以上提到的这些事实。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1915年7月14日德利斯勒的纪念仪式上所说的话更是字字珠玑，一针见血地道破当前形势：

如果像施舍般时断时续的和平降临于我们已经被战火摧残成片片废墟的城市，明天将会怎样？我们已经力衰势竭，却将即刻面临一个内容严酷的新条约。我们将永远在政治、道义、经济上臣服于我们的敌人。法国的制造业者、农民、工人的命运都会被扬扬得意的敌人捏在手中，受辱的法兰西将从此意气消沉、自轻自蔑。

.....我们的敌人不应有任何误会！法兰西已经奋起，并不是为了签署一份岌岌可危的和平协议，这样的和平只可能是提心吊胆、偷安一时的和平，介于一场始于无谓的战争和另一场更严重的战争之间；法兰西的奋起，也不是为了让自己今后再次遭到攻击、经历存亡危机。

## 2 未来冲突的隐忧

不管参战国最后达成怎样的和平，最大的困



难将是制约那些可能引发未来争端的情况，这需要超人的睿智。

和平将会带来一系列改变，民族原则将会取代过去的均衡制。理论上这种变化很完美，因为它允许所有国家选择自己愿意遵循的制度。但此处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对于那些相互交融的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很难落实，例如巴尔干半岛地区，当地的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对该地区内地点、名称一样的省区都宣称主权。这方面的困难似乎难以逾越。意大利城市特里斯特就是一个例子。该城周围的斯拉夫居民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就居住在此，他们是永远不会接受拉丁人的统治的。

除了欧洲本地的问题，亚洲地区也会出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占。在欧洲各国大战的过程中，太平洋地区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侵占，这背后的历史故事值得心理学家进行一番深刻的研究。

我的各位读者应该还记得，当初法国外交官们还幻想过日本天皇能派兵到欧洲来支援他们，他们对亚洲地区的形势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们荒唐的提议得到了媒体的热烈鼓吹，尽

管稍有智商的人都不难看出日本只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出兵，而绝没有任何派兵来帮助我们的想法。（法国报刊当时都一致支持这些大使的想法，其中有一位前外长是最积极的提倡者。我猜想大概当时只有我尝试指出这种想法有多愚蠢。几乎每家报纸都拒绝刊登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只刊登克莱蒙梭的观点。但即便得以刊登，审查人员还是删掉了我原文中的一些关键内容。）也许正如预料的那样，日本利用了欧洲的这一战争冲突——因为各欧洲大国无暇他顾，无法充当中国的保护国，也无法在中国贯彻迅速扫清外国人的政策。

### 3 外国学者如何看待战争的结束与和平协议签署后欧洲的状况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预见欧洲一片黑暗的未来，但所有的预测都仅仅是假设，每个人也许更愿意相信自己最满意的假设，也许不同民族的人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十分值得研究。在诸多已经公布、内容大相径庭的预言中，我选出了一些知名人士的预言。

柏林大学的教授爱德华·迈尔称：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想要世界恢复战前的状

态是完全不可能的。战后的世界将截然不同于战前的世界，尽管很多国家的边界只有少许改变，甚至没有改变。很多新问题会浮出水面，等待我们去解决；而很多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将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往往成为核心问题。

这场世界大战最直接、最灾难性的后果之一，也是英国造成的“多么顽固的臆想”！将是日本力量的可怕增长，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一场争夺太平洋控制权的大规模对抗。正如以往那样，英国的盲目已经使得所有敌人中最危险的那个武力大增。

迈尔认为德国有希望打垮英国，但他同时也补充道：

即便我们能征服所有的对手，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小成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只要有机会，英国便会再次抗争。不论是领导同样的盟军还是有新成员国加入的盟军，英国都会做更充分的准备。这将导致一系列持久、激烈、血腥的战争，直到得出一个最终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英国应对这场世界大战负责！是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其中有很多迹象显示现代文明将从此开始一段缓慢却无法扭转的下滑阶段，就像古迦太基战争之后那段历史一样。

匈牙利前总理安德拉希伯爵（Count Andrassy）曾写过一篇出色的文章——《世界战争和自由》，在文中他对日本和英国都显得毫无畏惧，对俄罗斯却极为恐惧：

如果俄罗斯帝国一下吸收这么大比例的人口，俄罗斯将成为自由生活、知识生活最可怕的敌人，因为没有其他大国可能像沙皇政府那样阻碍知识自由，即便情况会朝着我们预料的那样发展，也没有国家会必然被迫采取那样的高压控制。

.....俄罗斯的政体无法容忍自由，这不仅是由于其自大心理和维持统治的便利，也是由于俄罗斯文化和种族的异质性使其只能通过高强度的中央集权才能保持国家的完整。一个自由的俄罗斯将难以维持统一，因此被纳入这个国家的被压迫种族越多，国家统治就越发具有帝国主义特性，压迫便是一种迫切、基本的必要手段。

.....庞培被打败，接着恺撒死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团被奥古斯都和安东尼摧毁，从那时起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已经盖棺定论。奥克塔维厄斯和安东尼两个征服者之间的激烈对抗不可避免，但那只能决定谁来当世界的主人，而非自由是否得以存留。

“而即便欧洲中央的各个帝国被打败，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即是由英国议会还是白色沙皇获取统治世界的主权。”

届时我们所渴望的和平将更加遥远，我们所希望的自由也将不复存在。

日耳曼联邦各主权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一直对强大的普鲁士帝国俯首称臣，即便后者战败，也很难想象他们会与其决裂。德国跟随普鲁士而军力大增，即便以后被迫分开，再度统一的想法必然挥之不去。前比利时驻德国大臣比恩斯（Baron Beyens）曾公允地评价：

德国其他地区跟普鲁士地区一样欢迎这场战争。慕尼黑的反响比柏林更热烈，德累斯顿的暴徒们打碎英国公使馆窗户时的那股狂暴劲头丝毫不逊于普鲁士首都市民。这样的心态首先证明，不论是以往谦和安静的南部居民还是执迷于自身强大武力的北部居民，他们公开表露出来的这些态度已经十分扭曲，深受泛德意志主义的荼毒。它同时表明，所有的德国人现在都视日耳曼统一为民族自身存在不可或缺的条件。

理智尚未被全国性的狂热完全吞没的一些德国人清晰地意识到缔造和平的重重困难，从以下

摘自奥斯特瑞尔斯教授（Professor Osterrieth）某篇文章的片段即可看出：

假设德国获胜，征服了英国并使其称臣；或者假设盟国成功分裂德国联邦并将德意志南部各国变为阶下囚，不论是两者中的哪种情况，这样的政治结局能否持久呢？

德国永远无法确保欧洲不会受到亚洲的侵略，同时也无力承担从英国接手的海上霸权的沉重负担；而如果盟国获胜，他们则更离不开德国，因为德国是面向亚洲的壁垒。只有在三大强国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才能保存欧洲文明。这三大强国即是德国、法国和英国。三足鼎立，任何一国的失衡将威胁到另外两国的存亡。三国团结一致，便是欧洲的主心骨，其他欧洲国家在政治意义和民族意义上都依仗这三国。

从她自身的独特位置来看，俄罗斯自成一个世界，其正统植根于拜占庭。俄罗斯曾经试图同化我们的文化，但她的力量之源始终在亚洲，随着知识和社会发展，她将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国家，且不像我们这样因传统而聚合在一起。欧洲必须尽力抵御贪婪的俄罗斯，因为她在本质上是亚洲国家。

以下是一些意大利人士的看法，其中包括西格诺尔·帕累托（Signor Pareto）。他们也看到了困难所在，但同样想不出解决办法：

关于现在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有两种假设。我们可以假设最后实现和平，且各个参战国在力量上彼此平等，或接近平等，很明显那只是休战状态。我们也可以假设，最终某个参战国获得彻底的完胜。如果三协约国获胜，我并不认为在摧毁德国军力之后能阻止其再次重建壮大，正如耶拿战争后拿破仑也未能阻止普鲁士的再次强大。相反，战败的悲哀和羞辱感会蔓延，就像普鲁士经历过的那样，斗志会复活并激起德国人的爱国激情。如果中欧帝国获胜，我认为他们也无法在摧毁庞大的大英帝国之后阻止这个凭一腔炙热的复仇精神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以牙还牙，英国届时甚至有可能会获得来自美国这一强国的支持。同时我也不理解为何影响力甚远的俄罗斯会觉得受到威胁并丧失了对光明未来的希望。

另一个意大利人，里尼亚诺教授（Professor Rignano）则表示：

盟国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能够摧毁德国，因为即便他们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对敌人发号施令，他们也必须考虑到，在数年之后像德国

这样的国家将会走出战败阴影。盟国只需回想一下法国在1870年和1871年战败后迅速恢复元气的那段历史便能明白这一点。

以上这些说法表明，尽管人们眼中的未来充满了抗争和不确定性，他们却都认为德国不会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许应该留意，从政治角度来看，德国政体的发展比类似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落后了不止一百年，因此德国现在的政体能否持续下去也值得怀疑。如果德国的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体制，那么德国不太可能再次发起侵略性战争。

我们现在来看看还有可能出现哪些设想，这些设想尚未有人明确地说出来。

## 4 根据经验来谈一谈战争的微小的积极作用

有些人认为，战争终究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冲突是一个自然法则，抗争无处不在——即便是我们身体里的细胞之间也存在斗争，其代谢缓慢则代表着疾病，终止则是死亡。在这些人看来，历史似乎主要是一部战争史，和平则仅仅是偶尔发生的休战状态，因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始建于征战，消亡于和平，而战争本身所造就的品质



是和平无法造就的，这些品质使得参战民族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无法否认这些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以往战争的毁灭性和血腥程度远远不及今天的战争。过去只是军队交战，而非全民参战。而今天，我必须重申，在当今情况下，只有参战国被完全摧毁，战争才会结束。只有当参战国的财富灰飞烟灭、货币贬值、国力衰竭，彼此之间的敌对才会停歇。

未来的人们是否能意识到，如果不能完全避免战争，至少应该尽量减少这种毁灭性的冲突？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各国将会发现什么才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但我们不应对他们的智慧持有过高的期望。

但首先我们应该撇开和平主义者那些“正义必然获胜、和平由此降临”之类的无知意愿，因为和平并不是正义的产物，而是比暴力更深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主导人类的各种思想的一种深层转变。一个民族的思想的细微变化便足以修正整个民族的心态，乃至行为。当德国的工业和经济都被摧毁时，日耳曼的战士们也许会产生以下这些想法：

①也许德国人并不是被上帝派来摧毁这个世界，继而统治这个世界的。

②屠杀自己憎恶的邻居并将他们的杰作和城池付之一炬的确令人心旷神怡，但这种美事对人力、财力都是极大的消耗。

③在当今世界的发展阶段，经济战争也许会让征战国赚上一笔，但军事战争只会让征战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元气大伤。

④比起摧毁敌人，跟敌人做生意更有利可图。

⑤当今这个时代，各国在金融、工业上彼此依赖，这种关系是所有暴力行为都无法抹杀的。国家之间也许彼此憎恨，但各国的气候地形、能力水平不同，必须互通有无才能各自长存。

我想，以上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仅仅在理论上成立，因为催生我们行为的潜意识领域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道理，而在这些道理成为我们行为的动机之前，数百万生命将不复存在。历史证明，在某个理性真理战胜某个感性或神秘的本源幻想之前，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屠杀和毁灭性过程。从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战争，世界曾多

次被卷入捍卫某种思想的战火之中，而那些思想如今已经既无说服力也无影响力。幻想是无敌的，只有时间能消灭它，这也是为什么各种幻想能长时间存在的原因。

# 结语

在本书中我已经展现了欧洲战争的起源，也指出了其中所蕴含的心理层面的教训，但要深入探讨其政治、心理和社会影响，则需另起一册。

本书每章所得出的整体结论都非常具体，无法以一个总结进行简要概说，因此我尽量简约地谈一谈我自己对这些结论的看法。

此前，欧洲一直遭受巨大的震荡，那些欣然相信一切已经结束的人一批接一批地死去；然而，一个新世界从满目废墟中诞生。

从历史上看，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似乎只有在这样重大的危机之时才能继续前进，也许只有这些危机才能将这些国家从已经根深蒂固的旧模式中脱离出来，从业已深入骨髓的习惯和偏见中摆脱出来。

现在德国正以牺牲自己的财富和未来繁荣为代价来追求其他国家屈从她的专横自大，我们诅咒她也完全合情合理；但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德国必然在世界仍保持漠然的态度时逐步将其可怕的霸权之梦变为现实，当其他各国终于意识

到日耳曼暴君带来的沉重压力并试图摆脱时，为时已晚，工业、科学、商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国家财富资源都将落入德国人之手。

和平能带给德国人的是那股巨大的狂热浪潮所无法给予的；但他们被梦想遮住了双眼，看不清真相，因为他们自认可以再建一个罗马帝国。但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即便德国军队能横扫所有的战场，能将所有城池夷为平地，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太渴望自由，进行反抗的方式太多太多，任何恺撒大帝都无望将世界纳入其统治之下。

现代社会的心态已经不可能允许任何主宰世界的统治，尽管这样的想法曾令无数征服者为之倾倒。自我们今天的时代，大部分国家宁愿消亡也不愿屈从凭武力施加的苟活。这些国家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不会让任何独裁者的奴役、他人的欲望得逞，尽管被侵略的国家无疑会遭到破坏，他们却不需担心沦为奴役。

伟大的欧洲各国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得知。未来是一本人类智慧无法参透的书。尽管无人知晓未来，我们至少可以回顾过往。现在源自过去，过去包含着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的因由，以及未来一切的因由。今之颓丧错漏、几近毁灭，

皆源起过往；今乃过往之后果，过往乃今之由来。

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认为，罗马人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总是能认识到敌人的优点，并随之改善自己的方法。我们应牢记这一点，认真地学习德国人的军事和工业体系。当然，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因为他们的心态与我们不同，但可以通过不同的过程，寻求相似的结果。

当今的德国绝不是其历史学家曾设想过的杰出民族。德国人是耶拿战争中被拿破仑轻松征服者的后裔。除了异常严格的纪律和适应现代需求的严密组织，德国人并没有真正的过人之处。

德国的神秘主义倾向并不妨碍其追求实际目标。不像法国大革命时的军队，德国军队并不是为了让某种能令被征服者追随的信仰获胜，而是为了赢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获得商业利润。我们在这方面难以超越德国，但我们其他已经经受时间洗礼的卓越品质仍然会屹立不倒。

德国人计划的战争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但整个战事，德国人始终意图谋求领土——首先是比利时和法国富裕的工业区，然后是波

兰、立陶宛及俄罗斯的库兰地区，最后是君斯坦丁堡，如果有可能则更进一步吞并苏伊士运河和埃及。

但即便德国人能完成吞并计划的最后一步，也无法以此为战争的终结。他们在法国构建起一个防御工事以阻碍反击，那么在吞并其他区域之后，他们同样需要保护自己的战利品，而不是从此清闲无事。事实上，只要英国人卡住海上贸易的通道，德国人便无法长存，他们所有的胜利都会立刻变得毫无意义；而英国人可以一直封锁德国人的海上贸易直到这一封锁不再必要为止，因为英国海军的战斗力无人能敌。

战争结束时，法国将有可能在人力和财力上所剩无几，但也避免了她在正常衰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幻想和错误。

当我们最后总结这一切时会发现，政治和宗教分歧大大弱化了我们的社会结构，这是令人悲哀的。我们必须牢记，那些无法解决内部纷争的国家早已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内忧重重的国家难以抵御外患。

将弱化的社会纽带重新系在一起是个艰巨的任务，而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

将经历重大的改变。

其中最艰巨的工作之一便是让我们不再受恶言言语的欺骗：因为我们那些雄辩家只需大谈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关于进步、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公式化语言便会成功地掩盖事实，而那些沉重的事实已经几乎让我们遭受灭顶之灾。

我们必须培养起责任感，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缺乏这种意识；我们应发扬团结精神，这方面我们更是缺失得厉害。这场战争给予了我们这些优秀的品质，在和平年代我们应该努力把这些品质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我们应时刻高度关注社会法律和教育系统。

关于法国社会立法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读者可以参阅我的《政治心理学》一书，以了解社会立法将把我们引入怎样的深渊。

教育是所有改革的根本，在此我不做详谈。我只从我的《教育心理学》一书中选出一小段关于教师改革的内容：



世界通过科技和工业发展而向前迈进的过程中，那些构成性格的品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主动性、毅力、精确、敏锐、活力、意志、自律以及责任感，没有这些品质，即便再高的智能也只会一事无成，而如果这些品质不能一以贯之地继承下去，教育本身也无法创造这些品质。

我们的大学并不向学生灌输这些品质，而且更糟糕的是，压抑的学术体系会令那些已经具备这些品质的学生丧失这些品质。我们的教育方法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教育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这是我多年以来的看法，最近科学院的杰出人士M.H.勒·切特利尔（M.H.Le Chatelier），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当下一代人无法完成必要的变革，对此我持同样的看法。而我们何时才能有贯彻改革的坚定意志，并找到一批能力出众的教授来担当此任呢？

不论欧洲能从挫败德国霸权大梦的胜利中获取怎样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会延续太久，因为独霸天下的理想是素来难以磨灭的神秘信仰之一。一个受命于天来征服并革新世界的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使命的，而德国在被反复击败之前是不会死心的。

文明国度现在要担心的远远不只是财富和国家精英的丧失，真正的威胁是丧失某些逐步修养而成的品格，那些人类文明因之灿烂、动人的品格，而今具备这些品格的人却面临怀璧之罪，这些品格似乎注定将会消亡。

忠诚、正直、亲切、信守承诺约定，或者换句话说，荣誉的各种形式，拥有这些品质的国家在鄙弃这些品质的国家面前显得软弱，也许这些优良品质难以继续存留下来，但等到它们全然泯灭的那一天，也就是黑暗暴力横扫一切、统治世界的时候，人类将沦入最野蛮蒙昧的倒退，文明的中心必然转移。

某位知名日耳曼学者声称，达尔文关于物种间无情斗争、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必须取代人们越来越熟知的友爱、平等和自由等精神：即德国历史学家所称的生物正义。

尽管自然主义者尚未接受这一血腥的法则，这一法则也许适用于动物世界；但科学的意义正在于保护脆弱的人类，让我们不再受制于残酷的大自然。

难道我们要抹杀文明，让这些夺去国家年轻一代生命、摧毁一座又一座城市、损毁过去最珍

贵文物的可怕的大屠杀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难道残暴的武力注定像世界伊始之时那样成为各国的唯一统治者？难道人类必须屈从于奴役弱者的无情暴虐？没人知道答案。

如果人类赖以多次战胜自然的理性止于这场大战，也许我们会对这种理性感到失望。而倘若所有美好的存在都将被野蛮的斗争所取代，仅以肃杀的沉重的军营生活为例外，人类的未来将无疑是暗无天日的。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会有那样的未来。自然法则无疑很强大，但志在支配自然的科学也非常强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自以为是地谈论自然法则，因为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我们时时求助于自然，而自然却是如此神秘。自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以我们的尺度为标准。我们的知识是短暂而浅显的；而自然只奉行永恒的规律。我们最深重的灾难对大自然而言不过如同无垠海面上难以察觉的微澜。大自然令生从死中来，在她的无穷尽的伟力之下，造就无数转瞬即逝的世间万象。

也许学者们不会受这些控制民众的幻想愚弄，并发现这些表象后面的真相，但他们之中还没有人看透这一切，悟出大自然的万物因果。

让我们心存过去光明岁月里培养起来的希望，因为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急速的变化，未来难以预测，今天的真理可能转眼成为明日黄花。

我们可以用通达的哲学观来看待一切，但我们不应忘记当前的危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法国最繁荣的省份正遭受无休止的践踏，俄罗斯的军队被击退，波兰已经失陷，而其主要城市和要塞已经被付之一炬或者落入德军控制。

如果我们意志坚定地追求胜利，那么这些灾难都是暂时的，因为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远远不够，要主宰一个民族，则必须毁灭其灵魂。

当汉尼拔在坎尼摧毁最后一支罗马军队时，他认为自己已经永远征服了曾经令自己国家恐惧的对手；但是他没能打垮罗马人的意志，最终从世界舞台上消失的是迦太基。

德军所侵略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已经被德国人击垮意志。这些国家都宁死不屈。

有这样的精神便足够了，因为今天没有任何暴君能有如此伟力可以控制不服从他的国民。拿破仑在西班牙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夺取了西班牙的城池，消灭了西班牙的军队，但他即便是历史

上最伟大的战士，也没能令西班牙人屈服。

决定未来的关键，是我们顽强的意志力，征服或者死亡，但永远不会妥协！这是所有德国人将要奴役的国家公民的简短宣言。不论是自然，还是人，抑或是命运本身，都不能与强大、坚毅的意志相抗衡。这个观点我曾多次复述，今天再次重申。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